

船长与大尉

上

卡维林 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船长与大尉

下

卡维林 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

书馆



I5124
97-1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苏联〕卡维林

船长与大尉

上

于光译 陈文笈校



女子学院 0059963

外国文学出版社

I512.4
97-2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苏联〕卡维林

船长与大尉

下

于光译 陈文笈校



女子学院 0059977

外国文学出版社

В. КАВЕРИН
ДВА КАПИТАНА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0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船 长 与 大 尉 (共两册)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

字数 60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7 $\frac{1}{16}$ 插页 18

1982 年 8 月北京新 1 版 198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61,000

书号 10208·104

定价 2.60 元

前 记

温尼阿明·亚历山大罗维奇·卡维林一九〇二年生于普斯科夫城一个音乐家的家庭，是苏联著名的老作家。

卡维林早年就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学时代开始写诗。一九二三年毕业于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次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历史、语言系。一九二〇年，列宁格勒“文学之家”举办青年征文比赛，卡维林以他的第一篇小说“第十一公理”应征。这篇小说得到高尔基的赞赏，此后卡维林经常得到这位伟大作家的指导和帮助，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卫国战争期间，卡维林一直在北方舰队工作，同时担任“消息报”的通讯记者，曾获得“红旗奖章”。

卡维林于一九二二年开始发表作品，早期写了不少幻想小说和侦探小说，如短篇“工长和学徒”(1923)、中篇“哈扎的末日”(1926)等。此后，他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知识分子，他们道德高尚、有一颗献身于人类公益事业的火热的心，有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同时，作者也无情地鞭笞了那种思想腐朽、损人利己的假道学，如中篇“爱闹事的人”(1929)反映学者的工作和生活，长篇“如愿以偿”(1934—1936)描写从事历史和文学探索的学者的活动，三部曲“一本打开的书”(1949—1956)叙述符拉森科娃在微生物学领域的成就和正直的科学工作者同背离科学原则的冒险家的斗争。六十年代初以来，卡

AAE 97/1508

维林又写了中篇“七对魔鬼”(1962)、“学校演剧”(1968)、长篇“在镜子面前”(1971)和文学回忆录“在古老的房子里”(1971)等。

“船长与大尉”(1938—1944)是卡维林最著名的长篇小说，其中描写的是：十月革命前，俄国“圣·玛丽亚号”探险船、船长塔塔林诺夫和他率领的探险队在北极圈内不幸失踪，革命后，苏联空军大尉亚历山大·格利高里耶夫排除重重阻力，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这支探险队和船长的遗物，解开了三十余年来的一个哑谜。作者把现实主义原则同复杂曲折的惊险情节巧妙地结合起来，读来引人入胜，动人心弦。对于主人公亚历山大，作者着力刻划出他的坚强性格和高尚情操，在他身上概括了一代青年的英雄本色。对于反面人物，作者并不是简单粗疏地勾勒出他的丑恶脸谱，而是通过细节的安排，步步深入地发掘下去，最后把这个陷害船长，破坏探险事业，妄想骗取船长妻子的爱情的伪君子的肮脏灵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本书出版后受到热烈而持久的欢迎，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荣获一九四六年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先后重印过几十版，至今仍然是苏联国内外读者最感兴趣的作品之一。

译 者

目次

第一部 童年

1	信。捉青虾.....	8
2	父亲.....	9
3	营救.....	14
4	乡下.....	17
5	伊万·伊万内奇医生。我学说话.....	20
6	父亲的死。我不愿意说话了.....	27
7	母亲.....	30
8	彼其加·司考伏罗得尼可夫.....	34
9	一划,一划,一划,五划,二十划,一百划.....	38
10	达莎阿姨.....	43
11	和彼其加的谈话.....	49
12	卡耶尔·库里在敢死营.....	53
13	送葬.....	56
14	逃跑。我没有睡,我假装在睡.....	64
15	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71
16	第一次飞行.....	74
17	闲扯淡.....	77
18	尼古拉·安东内奇.....	81

第二部 應該好好想一想

1	听講故事.....	84
2	学校.....	87
3	恩斯克来的老太婆.....	91
4	这可是要好好想一想的.....	97
5	雪里有没有盐?	102
6	作客去.....	110
7	塔塔林諾夫一家.....	113
8	学校剧团.....	119
9	柯拉布略夫求婚。教育的責任.....	121
10	“复信謝絕”.....	128
11	出走.....	133
12	严肃的談話.....	139
13	我在想.....	144
14	一枚五十戈比的銀币.....	147

第三部 旧 信

1	四年間.....	155
2	叶夫根尼·奥涅金的审判.....	158
3	在冰場上.....	164
4	变化.....	169
5	卡佳的父亲.....	172
6	更多的变化.....	177
7	批語。瓦尔加的噬齿动物。老相識.....	182
8	舞会.....	189

9	初次幽会。失眠.....	195
10	不愉快的事	198
11	到恩斯克去.....	204
12	故乡的家.....	209
13	旧信.....	217
14	教堂花园相会。不要相信这个人.....	225
15	散步。扫墓。布宾其可夫。离别的一天.....	234
16	在莫斯科什么等待着我.....	240
17	瓦尔加.....	246
18	破釜沉舟.....	250
19	老朋友.....	256
20	本来可以不至于弄成这样.....	265
21	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	271
22	夜里.....	278
23	恢复旧规。不是他.....	281
24	誹謗.....	287
25	最后一次约会.....	293

第四部 北方

1	航空学校.....	302
2	薩尼亚的婚礼.....	308
3	給伊万·伊万諾維奇医生写信.....	314
4	收到回信.....	318
5	三年.....	323
6	在医生家里.....	330
7	讀日記.....	337

8	医生的家.....	352
9	“我們仿佛見過面.....”.....	355
10	晚安!	362
11	飞行.....	369
12	暴风雪.....	373
13	什么叫汽爐子.....	377
14	旧黃銅牙鉤.....	382
15	万龙坎.....	388

第五部 为了良心

1	会见卡佳.....	398
2	柯拉布略夫的庆祝会.....	403
3	无題.....	411
4	許多新聞.....	417
5	在剧院里.....	426
6	又有許多新聞.....	432
7	我們家里有客人.....	439
8	忠貞不渝.....	447
9	她决定搬走.....	453
10	在西夫切夫·符拉什克胡同.....	457
11	忙碌的一天.....	461
12	羅馬什卡.....	465

目 次

第六部 青春常在

1	“你不了解他”.....	479
2	在义犬广场.....	486
3	祝航行幸福和成功.....	493
4	我们为萨尼亚干杯.....	498
5	这上面写着“圣·玛丽亚”号.....	507
6	在姥姥家.....	512
7	冬天.....	519
8	列宁格勒.....	525
9	相逢.....	534
10	夜.....	539
11	妹妹.....	543
12	诀别.....	551
13	小彼加.....	553
14	深夜的客人.....	556
15	青春常在.....	560
16	“我看见你手里抱着婴儿”.....	565

第七部 别 离

1	五年.....	569
---	---------	-----

2	姥姥叙述的事.....	585
3	“可不要忘了，你是相信我的”.....	590
4	“我們一定能見面，但不会很快”.....	595
5	兄弟.....	603
6	現在我們平等了.....	607
7	“叶卡杰琳娜·伊万諾芙娜·塔塔林諾娃-格利高里耶娃”.....	611
8	这是医生的成績.....	616
9	撤退.....	618
10	生活在前进.....	621
11	晚餐。不是說我.....	627
12	我相信.....	633
13	希望.....	638
14	失望.....	647
15	願我的爱情拯救你.....	651
16	再見吧，列宁格勒！.....	658

第八部 奋斗和探求

1	晨.....	667
2	他.....	670
3	能作到的事.....	676
4	“是你嗎，猫头鷹？”.....	678
5	旧恨.....	681
6	来自斯坦尼斯拉夫的姑娘.....	686
7	在小白楊树林里.....	689
8	誰也不会知道.....	693

9	一个人.....	696
10	孩子們.....	699
11	爱情.....	702
12	在医院里.....	705
13	判决.....	710
14	寻找卡佳.....	715
15	同水道測量家尔同志的会面.....	721
16	决定.....	728
17	不在家的朋友.....	731
18	老相識。卡佳的相片.....	735
19	“你杀不死我”.....	740
20	暗影.....	747

第九部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	妻.....	757
2	事情还没有結束.....	763
3	自由巡猎.....	770
4	医生在北极城服务.....	774
5	为海上的人们干杯.....	781
6	遙远的距离.....	783
7	重游北地城.....	788
8	胜利.....	797

第十部 最后一頁

1	謎底.....	802
2	一件最不可思議的事.....	806

3	她就是卡佳.....	811
4	訣別信.....	820
5	最後的一頁.....	824
6	归来.....	829
7	两个談話.....	835
8	報告.....	842
9	最后一章.....	848
	尾声.....	856





第一部 童年

1 信。捉青蝦

我还記得那肮脏，寬敞的院子，和被栅栏圍繞着的一溜低矮的平房。院子紧靠一条小河，每逢春季，一旦潮水消退，院子里便滿是木屑，貝壳，时而还会有比这更有意思的东西。譬如有一次，我們就撿着一个装得滿滿的邮袋，而后，潮水又将那邮递員漂来，把他輕輕地放在岸上。他仰面朝天地躺着，两只手攔在額头上，仿佛是想遮住阳光。这个人还很年輕，头发金黄色，制服上的銅扣子亮晶晶的，——他在最后这次出发送信之前，大概还用白粉将銅扣子擦过吧。

邮袋被警察拿走了，里面的信件因为被水浸湿了，已經沒有絲毫用处，所以达莎阿姨便将它們收撿了起来。但是由于邮袋很新，又是皮子做的，同时鎖得也很严实，所以里面装的信件并

沒有完全湿透。达莎阿姨每天晚上念一封信，有时她只念給我听，有时念給全院子的人听。这是一件十分有趣兒的事，甚至，那些常到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家来玩“頂牛”^①的老太婆，也扔下牌，湊到我們这兒来听。其中有一封，达莎阿姨念的次数最多，以至后来我簡直都将它背得烂熟了。此后虽然过了許多年，可是这封信从头到尾我还記得。

敬愛的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

首先我要告訴您的，就是伊万·李沃維奇現在一切都好。我是四個月以前遵照他的指示，帶領一支十三個人的隊伍離開帆船的。我相信很快就能見到您，所以，現在就不準備詳細敘述我們隨着漂流的冰山向佛蘭茲·約瑟夫漂流的艱苦旅行。我們嘗盡了許多令人難以置信的天災人禍。我只想告訴您一點，就是我們一群人中，只有我一個人平安地（如果不算兩條腿凍壞了的話）抵達弗羅拉海岬。塞多夫中尉探險隊的帆船“聖·福嘉”號收容了我，並把我送到了阿爾汗格爾斯克。我總算是活下來了，不過，這樣也許更糟糕，因為最近我就要動手術，手術以後，一切就只好靠蒼天保佑了。可是今後我沒有腿怎樣生活下去呢？我自己也不知道。以下就是我不該告訴您的。“聖·瑪麗亞”號還在喀拉海上就被凍住，自一九一三年十月便隨着北極的冰山不停地向北移動。在我們離開時，這隻船的緯度是 $82^{\circ}55'$ 。它靜靜地停在一塊冰原上，或者，更確切一點說，自一九一三年秋，直到我離開為止，還停在那兒。今年它也許能解凍脫出，不過照我看來，等到明年，當它漂流到過去“佛蘭姆”號解凍的地方，離開冰原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留船人員的糧食還夠用到明年十月或十一月。不管怎樣吧，請您相信一點，我們之所以離船，並不是因為它的處境已經絕望了。當然，我必須執行船長的指示，但是，

① “頂牛”是一種骨牌遊戲。——譯者注。

不瞞您說，他这次的指示也是符合我个人心願的。在我率領十三名水手离船的时候，伊万·李沃維奇托我帶一件包裹給現已去世的水道測量局局长，帶一封信給您。可是，現在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为了珍惜这些說明自己行为正直的憑証，我不敢冒险經由邮局寄这个包裹和这封信，另外，我在此住院的时间最短也得三个月，因此，請您派专人或亲自来阿尔汗格尔斯克領取。我等待您的回信。謹致：
崇高的敬礼！

尊敬您的，准备为您效劳的远洋航海长

伊·克里莫夫

这封信的地址虽然已經被水泡得看不清了，但仍可以看出，这个地址是用同样又硬又直的笔法写在厚厚的，发黃的信封上的。

这封信对我來說，似乎成了一种祷告詞，——我每天晚上反复地念它，一直等到父亲回来。

父亲从碼頭回来的时间很晚。現在每天都有輪船来，但是不象先前装載的是亚麻和粮食，而是一些沉甸甸的彈藥箱和大炮零件。父亲是一个壮实的胖子，滿脸鬍鬚，戴着一頂呢制的小鴨舌帽，穿着一條防水布褲子。母亲总是唠唠叨叨說个不停，他却一声不响地吃飯，偶尔咳嗽两声，抹抹鬍子，然后就領着孩子——我和妹妹——上床去睡覺了。从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大麻的气味，有时是萍果，粮食的气息，有时又是一种臭机器油味，我还記得，这种气味使我感到多么窒悶。

我記得好象就是在这一个不幸的晚上，我躺在父亲旁边，生来第一次有意識地估量着周围的一切。一間狹窄的小房子，低矮的天花板上面裱糊着報紙，窗下有一條很大的裂縫，从这兒透进来新鮮空气，吹进来河水的气息，这就是我們的家。地上放着两

只用麦秸装填起来的袋子，上面睡着一个披散着头发，肤色黑黝黝的漂亮的女人，这就是我的母亲。一双孩子的小脚伸在破烂被子的外面，这是我妹妹的脚。一个黑瘦的男孩，穿着一条肥大的裤子，打着哆嗦从床上爬下来，悄悄地走到院子里去，这就是我。

早就选好了一个适当的捉虾的地方，绳子也已经准备妥当，甚至引火的枯枝也在大缺口架起来了，现在只少一块臭肉就可以去捉大虾了。我们这条河的河底五颜六色，因此虾的颜色也各不相同——有黑的，有绿的，有黄的。这些虾可以用篝火引来，用小青蛙作钓饵，可是青虾只能用臭肉才钓得到；关于这一点，所有的小孩都是深信不疑的。昨天，总算是走运：我从妈妈那儿弄来一块肉，将它放在太阳下晒了整整一天。现在，甚至用不着拿手去摸，就可以断定它已经腐烂了……

我沿着河边迅速地跑到大缺口，那儿架着生火的枯枝。远处可以望见两个炮楼；河这岸是波克洛夫炮楼，河那岸是斯巴塞炮楼。战争开始后，斯巴塞炮楼里修建了一座军用皮革仓库。彼其加·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证据确凿地说，斯巴塞炮楼里从前有鬼，而且他亲眼看见它们从河对岸摆渡到我们这边来，过河后，凿沉了渡船，就到波克洛夫炮楼里住下了。他还说，鬼怪们都喜欢抽烟，喝酒，头是尖的，由于它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很多都是跛子。近来在波克洛夫炮楼里鬼怪越来越多了，每逢晴朗的日子，就跑到河边来偷渔夫系在渔网上供水神的烟草。

总而言之，当我吹着微弱的篝火，看见围墙缺口处有一条细瘦的黑影时，我并没有感到特别惊讶。

“小鬼，你在这儿干什么？”鬼怪完全和普通人一般地问我道。

縱使我当时能够說話，我也不会回答。我只是瞅着他，不住地打哆嗦。

这时，月亮从云端露出来，因此，可以看見河对岸繞着皮革仓库走来走去的看守人。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胖子，背上的步枪向上面翘着。

“捉虾嗎？”

他輕巧地跳下来，坐到篝火旁边。

“你怎么不說話呢，傻瓜？”他厉声問道。

不对，他不是鬼！这是一个十分憔悴，沒有戴帽子的人，他拿着一根細手杖，不断地敲打着自己的脚。我沒有仔細看他的面貌，但是，我却发现他是光着身子穿了一件短上衣，只用一条围巾来代替衬衫。

“怎么啦，你不想同我談話嗎，賤胚子？”他用手杖戳了我一下。“喂，回答呀！回答呀！要不……。”

他沒有站起来，抓住我的脚，一把将我拖了过去。我不禁嚎叫起来。

“哎，原来你又聋又哑！”

他放开我，用手杖将炭火拨来拨去，坐了很久。

“好一座美丽的城市，”他又厌恶地說道，“家家院子里都有狗，警察都是些野兽。該死的吃虾鬼！”

他开始咒罵起来。

要是我当时能預知一个鐘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縱然我一个字也告訴不了別人，我也会竭力記住他所說的話。他罵了很久，甚至咬牙切齿地对着篝火吐了一口唾沫。后来，他将脑袋往后一仰，抱着膝盖，沉默下来了。我瞧了他一眼；如果他不是那么討厭的話，也許我还会同情他呢。

突然，那人蹦了起来。几分鐘后，他已上了浮桥，——这座桥是不久以前兵士們架設的，——然后在河对岸一閃就不見了。

我的篝火熄灭了，不过，沒有火光我也看得很清楚，我已經釣了不少的虾，可是其中一只青色的也沒有，全是些最普通的，不大的黑虾，——这种虾在酒店里卖一戈比一对。

冷风从后面什么地方吹过来，直往褲脚筒里鑽，我开始感到寒气袭人。該回家了！当我最后一次投下挂着臭肉的釣綫时，我看見对岸的看守人沿着斜坡跑下来。斯巴塞炮楼高高地聳立在河上，从炮楼到河岸是一个滿布着石块的斜坡。皎洁的月光照射在斜坡上，一个人影也沒有，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看守人却一面跑着，一面把枪从肩上取了下来。

“站住！”

他沒有开枪，只是嘩啦一声扳动了一下枪栓。就在这刹那間，我看清了他在浮桥上所追赶的那个人。我之所以写得这样慎重，是因为到現在我还不肯肯定，他就是一小时前坐在我篝火旁边的那个人。可是我現在还仿佛看見这幅情景：靜靜的河岸，月光照耀着水面，反射出的一条蕩漾的光带，从我这兒一直伸展到浮桥下的駁船跟前，两条长长的黑影在浮桥上奔跑。

看守人跑得很吃力，甚至还停了一下，换了換气。不过跑在前面的人似乎更吃力，因为他突然在栏杆旁边坐下了。看守人跑到他跟前，突然叫了一声，身子往后一倒，——大概是冷不防被人从下面打了一下。可是他身子仍然靠在栏杆上，只是慢慢地滑了下去。这时，凶手已經隱沒在碉堡的围墙后面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天夜里浮桥上竟沒有人巡邏：崗亭里空空的，周围沒有一个人，只有看守人側身躺着，两手向前伸着，在他身旁扔着一张很大的牛犢皮。我吓得打着寒战，走到他身前时，

只看見他緩緩地打了一個呵欠。過了若干年以後，我才知道，許多人在臨死前都要打呵欠的。然後，他好像是輕鬆了一些似的，深深地吁了一口氣。一切又歸於沉寂。

我彎下腰看了看他，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就跑到崗亭上看看，——這時我才發現崗亭里沒有人，於是又回到看守人那兒。這時，我連喊都喊不出來了。這倒不是因為我那时候是個啞吧，而實在是因為嚇壞了。就在这當兒，從岸上傳來了人聲，我連忙跑回原來捉蝦的地方去；我從來也沒有跑得這麼快，氣都喘不過來了，甚至感到胸部作痛。我也來不及用草把蝦蓋住，等我跑到家里時，蝦已丟掉了一半；這時哪里還顧得到蝦呢！

我不聲不響地把門微微推開，心兒劇烈地跳動着。在我家仅有的這一間房子里，黑洞洞的什麼也看不見，大家都睡得很安穩，誰也沒注意到我出去和回來。又過了一會兒，我已經挨着父親躺在原來的地方了，可是我許久不能入睡。在我眼前又出現了那座被月光照耀着的浮橋，和兩條奔跑着的長長的黑影。

2 父 亲

第二天早晨，發生了兩件令我十分懊喪的事。第一，是母親發現了蝦，並且把它們都煮熟了，因此我的二十戈比就宣告落空，買捕梭魚用的新釣鉤和假小魚^①的希望也化為泡影。第二，就是我的小刀子遺失了。其實，这把刀子原來是我父親的，因為

① 是一種發光的金屬薄片，一般作魚形，下面帶着魚鉤，引魚來吃魚餌，以便使魚上鉤。——譯者注。

刀刃坏了，父亲便将它贈送給了我。我在屋子里，院子里各处都找遍了，刀子竟象鑽到地底下去了一样，无影无踪了。

我这样直忙到十二点鐘該去碼頭給父亲送午飯的时候。送午飯是我的职务，我感到十分光荣。

碼頭現在是在河对岸，这边的河岸是一条两旁栽着菩提树的林蔭大道，这些菩提树一直到今天还是我們全城最喜爱的一种树。这一天，当我用一块包袱皮包着盛湯的小罐和一些土豆給父亲送去的时候，看見在这条林蔭大道上有許多为工人們搭的凉棚；在碉堡的围墙四周，象金字塔似地堆放着装粮食的草包和口袋；寬大的木板从駁船一直搭到岸上，搬运工人們不住地喊着：“喂，小心点！”順着木板将滿載貨物的独輪車从船上推下来。我还記得碼頭边那飘浮着一层五光十色油迹的河水，那磨損得很厉害的用来系纜繩的木桩，以及魚腥味、树脂味和草席味混杂在一起的气息。

我到碼頭时，大家还在工作。有一輛独輪車陷在两块木板中間，从船上到岸上的交通頓時中断了。后面的人又吵又罵，两个推車工人伏在鉄棍上，用力想把陷下去的車子撬起来放回車轍中去。这时父亲不慌不忙地从他們身旁繞过来，說了一句什么話，弯下腰去……我永远都記得他当时的样子：圓圓的大脸上生着鬍子，肩膀寬闊，毫不費力地抬起那輛載重很大的独輪車。以后，我再也沒有看見他这样子了。

他一面吃着飯，一面老瞧着我，“怎么样，薩尼亚？”这时，碼頭上出現了一个肥胖的警察长和三个警察。其中一人向“大叔”——大家都这样称呼工头——打了个招呼，对他說了几句話。“大叔”惊得啊哈一声，划了个十字，他們便一齐向我們走来。

“你是伊万·格利高里耶夫嗎？”警察长把馬刀按在背后，問道。

“是我。”

“把他抓起来！”警察长脸色漲得发紫，喊道，“他被逮捕了！”

大家騷嚷起来。父亲站起身，大家又沉靜下来。

“为什么？”

“你到我那兒去談吧！抓起来！”

警察走到父亲跟前，架住他的两只胳膊。父亲肩膀一掙，他們不禁倒退了好几步，一个警察連忙將馬刀抽出来。

“长官，这是怎么回事，”父亲問道，“为什么抓我？我又不是什么坏人，大伙兒都認識我。”

“不，老兄，大伙兒还不認識你哩，”警察长駁斥道，“你是强盜。抓起来！”

警察們又围攏到父亲跟前。

“你这个笨蛋，少用你那把臭刀来吓唬人吧，”父亲爱理不理地低声对那个抽出了馬刀来的人罵了一句。“长官，我是有家室的人，我在这个碼头上工作了二十年。我作过什么坏事嗎？請您告訴大家，讓大伙兒也知道知道，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被逮捕。要不然大家还以为我真是强盜哩！”

“哼，你还装蒜充好人哩！”警察长喊道，“我还不認識你！哼！”

警士們似乎还在犹疑。

“喂！带走！”

“稍等一会儿，长官，我自己会走，”父亲說道。“薩尼亞……”他弯下腰跟我說道，“薩尼亞，快跑回去，告訴媽媽……

母亲見他。母亲連說了三次，說父亲是因为杀人被逮捕的；夜里，看守人在浮桥上被杀害了。我当时就領会到，她所說的夜里——就是昨天晚上，看守人——就是那个看守人，浮桥——也就是那个看守人伸着两手躺在那兒的浮桥。我一下跳起来，扑到媽媽身上大声叫喊。她把我抱住；她一定是以为我吓坏了。然而我却是在“說話”……

如果我当时真会說話該多好啊！

我想把所有的情形，原原本本地叙述出来；我怎样偷跑到沙河去捉虾，看見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拿着一根棍子从碉堡围墙的缺口里走出来，他怎样咬牙切齿地罵，然后对着篝火吐了一口唾沫就走了。但是要一个勉强能含糊說出两三个字的八岁小孩来叙述这些事，这任务实在太艰巨了！

“孩子都給吓掉魂了，”达莎阿姨叹息道。这时我沉默了下来，望着母亲，心里想，現在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不，他好象是有什么話要說。薩尼亚，你知道什么事嗎？”

唉！要是我会說話該多好啊！我重新开始講述，用手势比划……母亲一向比旁人更能了解我的意思，不过这一次我却完全失望地看到，就連她也一点都不懂得。也难怪呀，这个只穿着一件衬衫，急得在房里乱轉的黑瘦的孩子，他所企图描述的事多么不象在浮桥上发生的实际情景啊！他一会儿扑到床上，表示那天夜里父亲正在酣睡，一下又跳到椅子上，举起两只握紧的拳头，对着摸不清头脑的达莎阿姨。

最后，达莎阿姨給我划了个十字。

“街上那些淘气的孩子打了他。”

我摇摇头。

“他是在講父亲被捕的情形，”母亲說。“講警察怎样吓唬

他，对嗎，薩尼亞？”

我忍不住扑到她膝上放声大哭。她把我抱到床上，我躺了很久，听着她們談話，寻思着怎样才能把我这不平凡的秘密表达出来。

3 营 救

要不是第二天母亲病了，我一定能設法把这件事表达出来。我一向覺得她是非常奇怪的人，但从来还没有見過她象这次那么奇怪。

往常，当她突然在窗前一站几个鐘头，或是夜間从床上跳起来，只穿件衬衫通宵达旦地坐在桌前时，父亲就把她送回乡下的家里去休息几天，回来时就完全好了。現在父亲不在家，而且，即使現在真送她到乡下去一趟，对她也不見得会有帮助！

她披散着头发，赤着脚站在門厅里，即使有人从她身旁走进屋子里去，她也不迴轉过头来看一下。她一直沉默着，只不过偶尔心神恍惚地說两三个字。

她仿佛是怕我似的。每当我“說話”时，她总是带着痛苦的样子掩住耳朵。她有时用手摸着眼睛，前額，似乎是在竭力回忆什么事。当达莎阿姨劝慰她时，她轉过脸来，皺着眉头，一声不响地用她那烏黑可怕的眼睛瞧着她……使得达莎阿姨不禁暗暗地划十字。

大概过了两个多星期，她的神智才清醒一些。虽然她还是精神恍惚，但已开始稍微說几句话，走到院子外面去，做些活兒了。現在，她愈来愈常說“营救”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最先是司

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兒說的，接着达莎阿姨也这么說，最后全院子里的人都这么說了。應該設法营救！我模模糊糊覺得，这两个字和塞尔吉耶夫大街“埃弗里克”玩具店里挂的鞭炮^①有着某种关系。

不过，很快我就了解到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一天，母亲領着我們——我和妹妹，帶着上訴書到“法庭”去。“法庭”就在市場后面一座阴森的大厦里，前面立着高高的鉄栏杆。

我曾經有几次碰見職員在早晨去法庭上班。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奇怪的想法，我总認為他們就留在法庭里，第二天清早，又是另一批職員去上班，到第三天再換另一批新的，每天如此。

在一条半明半暗，高高的走廊里，我和妹妹在一条鉄凳子上坐了許久。法院的工作人員手里拿着公文跑来跑去，房門砰砰地响着。后来媽媽回来了，牵着妹妹的手，我們就匆匆地走了。我們走进一間屋子，屋子中間被一道木栏牆隔开。虽然我沒有看見媽媽在和誰說話，对誰那么低三下四地行礼，但是我却听到一个人干涩的，冷冷的声音；使我大为驚訝的是，这个人所講的正是那全世界只有我一人能回答的秘密。

“格利高里耶夫·伊万……”这时，响起了翻动書頁的悉索声。“刑法第一千四百五十四条。預謀杀人。亲爱的，你还想說什么呢？”

“老爷，”母亲用一种生涩的，紧张的声調央求道，“他沒有罪，他从来也沒有杀过人。”

① 俄文“营救” хлопоты 和“鞭炮” хлопушка 两个詞很相似。——譯者注。

“这一点法庭会审理清楚的。”

我早就踮起脚尖，将脑袋向后仰得那么厉害，几乎头都要掉下了来似的，但我还是只能看见一只手；露在栏杆上面的手指又细又长，正拿着一副眼镜在慢慢地摆弄。

“老爷，”母亲又说道，“我想给法院递一张呈子。我们全院的人都签了名。”

“呈子当然可以递，但要先交一卢布印花税。”

“已经交过了，老爷。他们检到的不是他的刀子。”

刀子？！我乍听之下，还以为是听错了。

“关于这一点，有被告自己的口供。”

“可能他的刀子已经丢了一个星期了……”

我从下面看到母亲的嘴唇在发抖。

“那早就该被人检去了，亲爱的！不过，法庭总会审问明白的。”

我再也没有听见什么了。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他们逮捕了父亲。不是他，是我失落了这把刀子——这把已经用过很久的电工用的木柄刀子。这把刀子，就是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寻找了很久的刀子。这把刀子，可能是在浮桥上弯腰瞧那看守人时，从我口袋里掉出来的。这把刀子，就是彼其加·司考伏罗得尼可夫用放大镜聚光烙上了我的姓的那把刀子。

现在回忆起这些情节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当时那些坐在恩斯克法院阴暗大厅里，高高的栏杆后面的官老爷们，是根本不会相信我的话的，然而那个时候，我却不是这么想的！我愈想心里愈难受。就是说，因为我的过失，父亲被逮捕；因为我的过失，现在我们全家挨饿；因为我的过失，母亲将辛辛苦苦积蓄了一年才买来的呢大衣又卖掉了；因为我的过失，母亲不得不去法院，对那

个看不见的人，对那个用细长可怕的，干瘪的手指慢腾腾地摆弄着眼镜的人，用那种生涩的声调谈话，低三下四地行礼。

我从来还没有象这次那么强烈地感到自己不会说话的痛苦。

4 乡 下

最后一批木筏已经顺着河流漂去。夜里，当我醒来时，再也看不到河上缓缓流动的小屋里闪闪的灯光了。河上空荡荡的，院子里空荡荡的，屋子里也是空荡荡的。

清晨，当我们还在睡觉的时候，母亲就去医院洗衣服了。我经常到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家去，听那老头儿骂人。

他戴着一付钢丝眼镜，斑白的头发乱蓬蓬的。他坐在狭小阴暗的厨房里的一张矮皮凳上缝皮靴。他有时候缝皮靴，有时候织网，或者用杨木来雕刻小鸟，小马卖点钱。这种手艺叫作“闲扯淡”，他是从伏尔加学来的，他是那兒生的人。

他很喜爱我，——大约因为我是他谈话的唯一对象，他从未听见这个对象反驳过他。他骂医生，骂官僚，骂商人。但被他骂得特别狠的是神父。

“凡人皆有死，可是一个人敢不敢因此而埋怨上帝呢？神父说：不敢。但是，我却说：敢！什么叫做埋怨？”

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埋怨。

“埋怨就是不满意。可是，什么又叫不满意呢？那就是你所希望得到的多于命中注定的。神父说：这可不行。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吃的是土里来的，到头来还要回到泥土里去’。”他苦笑着。

“可是泥土需要什么呢？它不需要比命中注定的更多的东西。”

我整天坐在他那儿。我什么都喜欢——无论是他说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话，或是他那可怕的，使我听了不禁望着他出神的尖锐刺耳的笑声。

这样，不知不觉已是秋天了，前些日子成为我们家庭经济中的一项重要收入的大虾，现在也蛰伏在洞穴里，现在就是用小青蛙作饵它们也不来上钩了。

我们开始饿饭，于是母亲最后决定将我和妹妹送到乡下去。

正由于上面已经说过的我那种出奇的呆气，所以，我也不大记得旅途的一切了。童年时期，我看什么东西和听什么话时都爱出神，对好多事情都不明白。最平凡的东西也会使我感到惊讶。我张着嘴惊讶地思索着眼前逐渐展开的世界……

这时我正出神地望着船上验票的小孩。两个星期以前有人称他明卡，他曾和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彼其加在我们院子里一起玩过击柱戏^①。显然，他已经不认识我了。他穿着一件蓝上身，上面钉着海员服的钮扣，戴着一顶绣有“海神”——船名——两个字的制帽，站在扶梯上，漫不经心地看着旅客。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引起我的兴趣了。无论是那神秘的船长——兼舵机长，在舵机上方的那间小屋里可以看见他那张生着满脸大鬍子的脸，——还是机器发出的猛烈的喘息声，都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明卡使我感到惊异，一路上，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海神”

① 击柱戏是俄国人常玩的一种游戏。玩时分两队人，用木棒击撞排成各种花样的小柱。——译者注。

是一艘有名的輪船，我一直就渴望着能坐一坐這艘輪船。我們在河里游泳的時候，也常常希望它駛來，好乘勢投入它所掀起的浪花中，被滾滾的波濤顛簸着多么好玩啊！可是現在什么都完蛋了。我象中了魔似的瞅着明卡，直到天色漸漸黑下來，直到兼舵機長的大鬍子船長用瘡啞的聲音對着傳聲筒喊：“停車，倒車”。船尾下面，河水翻起了滾滾的波浪，一個水手熟練地接過從船上撒給他的纜繩。

我從來沒有到過鄉下，但是我知道父親在鄉下有一所房子，房子附近還有一個莊園！可是在我知道了“莊園”這兩個字所指的，事實上只不過是一個野草叢生，中間長着幾棵老蘋果樹的小菜園時，我是多么失望啊！

我的父親繼承這份遺產時是十八歲。但是，他並沒有在鄉下居住，從那時候起，這所房子就空着沒有人住。這所房子既然是父親的，因此我覺得也應該象父親那麼肥壯結實。可是我完全想錯了！

這是一所矮小的房屋，不知什麼時候被震歪了，現在還一直保持着傾斜的狀態。這所房屋的屋頂是彎的，窗子全打破了，窗下的橫木已經曲折了。俄羅斯式的爐子只是在我們沒生火以前看樣子還不錯。幾支被煙熏得漆黑的條凳順牆擺着，一個角落里挂着聖象，在那為煤煙熏黑了的象板上隱約地可以看出神靈的臉貌。

不管怎樣吧，這終歸是我們的家。于是我們打開行李，用麥秸裝了草褥子，鑲好玻璃，就住下了。

但是母親同我們在一起只住了三個星期左右，就又回城里去了。代她來照管我們的是我父親的孀娘，也就是我們的隔房奶奶彼得羅芙娜。雖然她長了些斑白的細鬍鬚，令人看不慣，但

她却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不过倒楣的是她自己还需要人来服侍，真的，我和妹妹一个冬天都忙着照顾她，替她挑水，生炉子，幸而她那座比我们的稍好一点的小木房离我们不远。

这个冬天，我和妹妹很要好。她还没有满八岁。我们一家人的头发和皮肤都很黑，可是她却长得很白皙，生着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卷曲的头发扎成小辮。我们一家人都不爱说话，特别是母亲，可是妹妹却是从早上一睁眼就说个不休。我从没看见她哭过，但却可以为一点小事情就哈哈大笑起来。她和我都叫萨尼亚，我叫亚历山大，她叫亚历山得娜。达莎阿姨教她唱歌，因此每天晚上她都那么认真地，尖着嗓子唱许多冗长的歌子，使人听来忍不住好笑。

她才七岁，但却多么善于料理家务啊！我们的家务事也很简单：顶楼的一角放着土豆，另一角放着甜菜，白菜，洋葱和盐。面包是由我们自己到彼得罗芙娜家里去取。

我们两个孩子就这样住在这荒僻的，满地积雪的乡村中一所空荡荡的木板房里。每天早上，我们踏出一条通往彼得罗芙娜家去的小路来。只是在夜间特别可怕：那样的寂静，甚至可以听见轻微的落雪声，在这万籁俱寂的时分，寒风会突然在烟囱里叫啸起来。

5 伊万·伊万内奇医生。 我学说话

有一天，我们刚刚躺下，妹妹也刚刚住了嘴，——她总是要一直说到睡着了的时候为止。这时那种使人无限凄凉的寂静来临了，随后寒风就在烟囱里咆哮起来，突然我听见有人在敲窗户。

这是一个身材高大满脸鬍鬚的人，穿着一件短皮袄，戴着一頂大耳风帽；他竟冻得那样厉害，在我点了灯，讓他进来时，連門都关不上了。我用手遮住灯光才看見他的鼻子都冻白了。他想把背包取下来，但是刚一弯腰，就突然坐在地板上了。

这人最初出現在我面前时就是这付模样兒，我現在能写这部小說也应该感謝这个人。他已經冻得半死，大概是爬到我們这兒来的。他坐在地板上，大声喘气，竭力把颤抖的手指放到口中。我开始給他脫短皮袄。他嘟嘟囔囔說了几句什么話，就側着身子倒下昏过去了。

我曾經看見母亲暈倒过一次，达莎阿姨对着她的嘴吹气。所以这一次我也如法炮制。我这位客人躺在暖爐旁边，虽然我拼命地对他吹气，以至把我自己都吹得头晕目眩了，但我这位客人还是躺着不动。最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救了他，不管怎样吧，他总算苏醒过来了，坐起来开始貪婪地烤火。他的鼻子的顏色也恢复正常了。当我倒給他一杯热水时，他甚至想試着笑一笑。

“孩子，这兒就只有你們俩嗎？”

薩尼亚刚說完：“就是我們俩”，他又呼呼睡去了。他居然能那么快就睡着，使我不免感到恐惧：莫不是死了吧？但他仿佛是回答我的疑虑似的，大声地打起鼾来。

他真正苏醒过来是在第二天。当我醒来时，他和妹妹并排坐在暖炕上正在談話。妹妹已經知道他的名字叫伊万·伊万內奇，知道他迷了路，并且知道無論对誰也不要談他的事，否則他就会被“抓去懲办”。說真心話，我到現在也还不知道这句话的确切意思。不过，我記得，当时我和妹妹立刻就了解到有某种危險威胁着我們的客人，我們不約而同地决定：关于他的事，无

論如何不能向別人吐露一个字。自然，要我不說比起要薩尼亞不說來容易得多。

妹妹絮絮叨叨地講着，伊万·伊万內奇則將手墊在腿底下，坐在炕上靜听。她把什么都說了：父親被抓到監牢里去了；我們遞了呈子；母親把我們帶到鄉下來又進城去了；我是一個啞吧；彼得羅芙娜奶奶住在由井邊數第二座房子里，她也有鬍子，只不過細少一些，而且是斑白的。

“啊，你們兩個小寶貝兒，”伊万·伊万內奇輕捷地跳下暖炕，說道。

他的兩眼炯炯有神，鬍鬚又黑又光。起先，我感到很奇怪，為什麼他的手老是不閑着，做出許多不必要的動作，叫人覺得他就要把手伸到腦後去摸自己的耳朵，或者是去搔腳心似的。但很快我就對他習慣了。在談話的時候，他常突然隨手抓起一件什麼東西，象魔術家似的顛弄，或者是豎在手掌上。

第一天，他就給我們表演了許多有趣的玩意兒：他用火柴，樹皮，蔥頭做了一個形似小貓的可笑的動物，用麵包心做成一只小老鼠，小貓咪嗚咪嗚地叫着捕老鼠，活象真貓一般。他還表演魔術：把表吞下去，再從袖子里掏出來。他還教會了我們用一根木簽穿着土豆烤。總而言之，他在我們這兒住的這幾天當中，我和妹妹都不感到寂寞。

“孩子們，我是個醫生哩，”有一次，他這樣說道。“你們誰有病？我立刻就可以治好。”

我們都很健康。村長的女兒有病，可是不知道為什麼他卻不肯去治。

在這種情況下

我恐懼，害怕

那和尚告发

又将我把地獄下

他念完后就笑了起来。

我第一次从他那儿听见了诗歌。他仿照着土耳其人的姿势坐在火边，扬起眉头，象念诗一般地说着话，甚至唱起来，或者自言自语地低吟。

起初，他大概是很喜欢我什么事也不能问他，特别是在夜间，每当窗外轧轧的脚步声使他惊醒，他一连好久地躺在那儿，支着胳膊倾听的时候，或者是当他躲在顶楼上一直到天黑的时候，——过叶高里节^①时，他就这样度过了一天，——或者是当他拒绝和彼得罗芙娜相识的时候。

但是过了两三天后，他就对我的不讲话发生兴趣了。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是不想说吗？”

我默默地望着他。

“可是我告诉你，你应该说话。你既然听得见，那你就应该会说话。小弟弟，这是极少见的现象，你是个哑吧，但却什么都听得见。也许你是又聋又哑？”

我摇摇头。

“看，这就说明，你还是可以说话的嘛。”

他从背包里掏出了一些器具来。虽然这一天阳光很好，但他还是惋惜说光线太弱了。随后他就把一件器具放到了我的耳朵里去，“耳朵正常，”他很满意地说道，“和常人一样的耳朵。”

他走到屋角上去，低声说：“傻瓜”。

“听得见吗？”

^① 叶高里节是每年的五月七日，按照俄国习俗，这一天人们都到郊外野游，类似中国的清明节。——译者注。

我笑了。

“听得很清楚，和狗耳朵一样。”他对薩尼亚眯了眯眼，薩尼亚正大张着嘴望着我們。“听得清楚极了。亲爱的，你怎么不說話呢？”

他用两个手指夹住我的舌头往外拉得那么长，把我吓得哑着嗓子叫了起来。

“小弟弟，你的喉嚨太好了！跟夏里亚平^①的喉嚨一样。真不錯！”

他瞧了我一会儿。

“亲爱的，应该学习，”他很严肃地说道，“你能对自己說些什么話嗎，在心里說？”

他敲了敲我的前額。

“就是在脑子里說，明白嗎？”

我哼了一声，表示明白。

“喂，說出声来呢？你能說什么都說出声来吧。喂，說‘是’。”

我几乎什么也不能說。但是，总还是說了一声：

“是。”

“太好了！再来一次。”

我又說了一次。

“現在吹一下口哨。”

我吹了一下口哨。

“現在說‘烏’。”

我說了一声“烏”。

① 夏里亚平(1873—1938)，俄国的著名歌唱家。——譯者注。

“你这个懶家伙，原来如此！喂，跟着我說吧……”

他不知道，其实我在心里什么都說。毫無疑問，正因为如此，我才能这么清楚地記得前几年的事。但是，要从我这种无声的談話达到能够发出“叶”，“烏”，“呃”这些字母的声音，达到能够作出嘴唇，舌头，喉嚨所不熟悉的动作还很远，甚至最简单的字音都会在我的喉嚨里卡住。我跟着他能够念出一些个别的声音来，主要的是母音，但是，要象他囑咐我的那样，把这些声音联貫在一起，流暢地发出来，而不是“干嚎”，——这才是我的任务哩！

只有“耳朵”，“媽媽”，“爐板”三个詞一下就学会了，仿佛我曾在什么时候說过这几个詞，現在只要回想起来就成了。事实也正是这样：母亲常說，我两岁的时候就开始說話，可是自从害了一场什么病之后，就突然不說話了。

我的教师盖着短皮袄，把一个发亮的金屬东西放在草褥子下面，睡在地板上，我却翻来复去总也睡不着，一会儿喝水，一会儿从床上坐起来，望着冻上了各式花紋的窗戶。我在想一旦回家后，应该怎样同母亲和达莎阿姨說話。我回想起当我了解到自己不会說話，再不能說話时那頃刻間的情景：这是一个黄昏，母亲以为我睡着了，她脸色蒼白，身子挺得笔直，两条烏黑的辮子交叉着搭在胸前，久久地望着我。那时，在我脑海里最初产生了那种前几年对我影响极坏的痛苦的思想：“我不如別人，我給她丢脸”。

幸福的感觉使我一直到黎明时还没有睡着，我反复地念着“叶”，“烏”，“呃”。当薩尼亚叫醒我时，天已經大亮了。

“我都到奶奶那兒去了一趟啦，你还在睡覺，”她很快地說。
“奶奶的小猫不見了，被穆耳加拖到鍋灶里去了。伊万·伊万

內奇在哪兒？”

草褥子仍然舖在地板上，还可以看出被压过的地方：头，肩膀，脚。但伊万·伊万內奇本人却不見了。他的背包是枕在头下的——背包也不見了。他盖的是短皮袄——短皮袄也不見了。

“伊万·伊万內奇！”

我們跑上頂楼，頂楼上一个人也沒有。

“真的，我到奶奶家去时，他还在睡覺。我还瞅了他一眼，看見他正在睡，心想，我先去奶奶家一趟罢。薩尼卡，你看！”

桌上放着一根黑皮管，两端有两个小圓杯样的东西，一个扁而浅，比較大一些，另外一个稍稍小一点兒，但比較深一些。我們想起伊万·伊万內奇检查我的耳朵时，他曾經把这根皮管連同别的器具一块兒从背包里掏出来的。

他在哪兒呢？伊万·伊万內奇！……

此后，过了很多年。我在白令海上，在巴倫支海上飞行过。我到过西班牙。我观测过勒拿河及叶尼塞河流域間的地形。我始終都帶着他掉在我們那兒的，也可能是留下作紀念的黑皮管，这不是迷信，而是由于对这个人的感恩。不久我就知道了，这原来是听診器，是医生用来診听肺部和心脏的一种极为普通的器具。可是在当时，这个听診器对我來說，就好像是伊万·伊万內奇本人，好象他的一言一动那么神秘和可爱。

“伊万·伊万內奇！”

他沒有告訴任何人，就这样失踪了，沒有下落了，离开了这兒。

我悲伤地走到院子里，围着屋子繞了一圈。脚印！他的脚印上已落上了一层薄薄的雪，这些脚印沒有經過旁边的大路，而是一直到田野里去的。脚印愈来愈稀，到一个小池塘边，在那条

娘兒們去冰窟窿洗衣服的小路上，漸漸消失了。

2

6 父亲的死。 我不願意說話了

整个冬季我都在学說話。早上刚一醒，就高声念伊万·伊万內奇囑咐我每天要讀的那六个詞：“母鷄”，“馬鞍”，“箱子”，“暴风雪”，“喝酒”，“阿布拉木”^①。这是多么艰难的事啊！妹妹說得多么好啊！跟妹妹的发音还差得多远啊！

但是我很有毅力。我每一天都要把这几个詞象念咒一样，反来复去地念上千把次，这几个詞大概对我很有帮助，作梦也梦见它們。我想象着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人阿布拉木，他把母鷄放在箱子里，或是戴着礼帽从屋子里走出来，肩上扛着馬鞍。暴风雪，喝酒！

我的舌头不听从指揮，嘴唇也只能勉强动作。薩尼亚不由得常常要打趣我，我好多次要揍她。夜間，我由于心情的苦悶常常惊醒，覺得不行了，再也学不会說話，永远都是一个残废人，就象有一次母亲說我的那样。但就在此时，我也試着說“残废”这个詞。我記得，最后还是說成功了，于是我幸福地重入梦乡。伊万·伊万內奇囑咐我，在学說話的时候，手不要动，才能改掉一般聋哑患者常有的那种习惯，而当时我的这个习惯已經很深了。因此我就把手插在口袋里，眼睛看着一件东西，看窗戶，看爐子，看水桶，一面响亮地，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讀这个詞。不知为什么，我总讀不好，直到現在我还常把重音讀錯……

① 阿布拉木是犹太人的名字。——譯者注。

有那么一天，我醒来后，沒有讀这六个神圣的单詞，这天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

这一天，彼得罗芙娜很早就把我們叫醒了；单是这一件事就够奇怪了，因为，通常每天早上都不是她来叫醒我們，而是我們到她那儿去生爐子，烧开水。她拄着一根棍子咚咚地响着，走进屋里来，站在圣象前面。她嘟嘟囔囔了許久，不停地划着十字，然后招呼妹妹，吩咐她把灯点起来……

过了許多年后，我已經成年了，在一本兒童讀物里看見过一个老妖婆。这簡直就是彼得罗芙娜的化身：生着細鬍子，拱着背，拄着拐杖。不过，彼得罗芙娜是一个慈祥的老妖婆，在这一天……这天，她坐在凳子上，很沉重地叹着气，我甚至覺得泪珠兒正沿着她的鬍鬚滾下来。

“下来，薩尼卡！”她說道，“到我这兒来！”

我走近前去。

“你已經是大人了，薩尼卡。”她撫摸着我的头。“昨天你媽媽来信說伊万病了。”

她不住地哭泣。

“他在監獄里病得很厉害。他的头都肿了，还有脚。信上說，她还不知道他現在究竟是死是活。”

妹妹也失声哭起来了。

“有什么办法呢，这是老天爷的意思，”彼得罗芙娜說道，“天老爷的意思，”她帶着憤恨的神情重說了一遍，重又抬起眼睛来望着圣象。

她仅仅說父亲病了，但是我傍晚在教堂里方才明白，父亲已經死了。这天傍晚，彼得罗芙娜帶我們到教堂里去，說是讓我們去“求福”。

我虽然在乡下已经住了三个月，但是很奇怪，除了几个一起滑过雪的小孩之外，对谁也不认识。我因为自己不会说话觉得害臊，所以哪儿也不去。到现在，在这座教堂里，我才看到全村的人：一群和我们一样愁眉苦脸，默不作声，衣衫槛褛的妇女和老头。他们站立在幽暗的地方，只有前面，在神父拖着长声在那儿念经的地方才点着蜡烛。许多人在叹息，划着十字。

“主啊，慈悲吧，”神父无休止地重复着这句话。他口里冒着热气，手里拿着香炉不断地摇动，一缕青烟从香炉内升起。我仿佛觉得所有的人都和我一样，不是在祈祷，只是看着那香烟一缕缕地升起来，回旋缭绕，向上飘去，向着蓝色的，结冰的窗户飘去。这时我大约已经忘记了父亲。突然，彼得罗芙娜很生气地在我背上捅了一下——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她为什么捅我，——这时我方才想起父亲，想到他已经死了。

因为他死了，所以大家在叹息，在祈祷；因为他死了，我和妹妹才站在这儿，站在教堂里阴暗的地方；因为他死了，彼得罗芙娜才那么火气地捅我；因为他死了，我们才在这儿“求福”。

彼得罗芙娜将妹妹带到她家去了，我一个人回到家中，也没有点灯，独自坐了好久。奶奶为了招喜特意给我们送来的黑甲虫^①，在冰冷的炉板上悉索作响。我一面吃着土豆，一面哭泣。

他死了，我再也见不着他了！他们正在把他从法院里抬出去，从我和母亲递呈子的那间屋子里抬出去……我一想到那冷冰冰的声音，和那只手指细长，干瘪的手慢腾腾地摆弄着眼镜时，我就咬紧牙齿，停止了吃饭。等着瞧吧，我非跟你们算账不可，

① 依照俄国人的迷信，黑甲虫出现在屋里是一种吉祥的征兆。——译者注。

总有一天你也会向我打躬哈腰，那时，我也将同样回答你：“亲爱的，法院会审问明白的……”他们正抬着棺材在走廊上走着，法院的工作人员拿着公文从旁边来回经过，谁也不去看，谁也不愿意去看。只有达莎阿姨象个修道女似的披着长长的黑头巾从对面走来。她一面走，一面划十字，一面啜泣。我们站了下来，门边也有人站着，人们抬着棺材摇摇晃晃地放到地上……母亲弯着腰，我从下面看到她的嘴唇在颤动……

我一听到自己的声音便猛然惊醒了。大概我是在发烧，因为我说了些毫不连贯的胡话，我骂自己，不知为什么，也骂母亲，并且记得还和伊万·伊万内奇谈话，虽然我心里很清楚，知道他早已走了，甚至他的脚印也只在田野上保留了两天，后来就被积雪盖住了。

可是我说话了，说得既响亮又清晰！我说话了，现在，我能够将那天晚上在浮桥上发生的事叙述出来了。我也能够证明那把刀子是我的，是在我弯下腰去看被害者时失落的。可是已经晚了！我这一生都赶不上了，现在一切都无济于事了！

我双手抱住头，躺在黑洞洞的屋子里。屋子里很冷，脚都冻僵了，可是我就这样一直躺到第二天早晨也没有起来。我决意再也不说话了。为什么要说话呢？反正他已经死了，我再也见不着他了。

7 母 亲

我不太记得二月革命的情形，在回到城里以前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是，记得当时我是把那种莫名其妙的激动，那些

难以理解的谈话，和教会我说话的夜间客人联系在一起。

每天晚上，当我一面用木签穿土豆的时候便会常常想起他，而且他对我是愈来愈神秘，愈来愈富有魅力了。他为什么这样突然失踪了呢？既没有告别，也没有说上哪儿去。他为什么要躲在顶楼上呢？为什么他不愿意给村长的女儿曼卡治病，并且连彼得罗芙娜家也不去呢？现在他在哪儿呢？还会回来吗？每当深夜我醒来时，便侧耳谛听：有人敲窗户吗？是他吗？没有人敲。只有雪花轻柔地，以一种细微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落在我们的房屋上，骤然间，寒风在烟囱里呼啸起来。

关于他的事谁也没有问起过我们。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相信现在一切定会不一样了。现在，他大约不必再躲在顶楼上了！现在，他大概也不会拒绝和彼得罗芙娜认识了！

我没有注意春天是在什么时候结束，但是夏天却是从这么一天开始的：那天我们和妈妈从清早就在码头上等候“海神”号轮船，后来，“海神”号鸣着汽笛，凶猛地开着倒车，停泊在码头边了。

明卡戴着一顶有金字的帽子，穿着一件相当破旧的短上衣，跟往常一样站在扶梯上，神气十足而又满不在意地不时膘一膘旅客。大鬍子船长兼舵机长对着传声筒瘡哑地喊着：“停車！向前！”和“停車！倒车！”甲板神秘地颤动着。我们要回城里去。今天母亲来接我们回家。她近来消瘦了，显得年轻了一些，穿着一件新外衣，戴着一条新的花头巾。

在这个冬天里我常常想，当她听见我说话时，将要怎样惊奇。然而她只拥抱了我一下，笑了笑而已。她这一冬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从她脸上那种生动的表情一下子就看出来了。她一会儿默默地暗自伤心，一会儿又抿着嘴微笑。彼得罗芙娜

認為她是在發神經，有一次，她長嘆了一聲問起母親，母親笑了笑，說沒有的事。

彼得羅芙娜那時用樹皮編鞋賣，有一天，我們到樹林里去替她剝樹皮。我永远都記得母親這天的樣子：烏黑的頭髮，健壯的身體，潔白的牙齒，頭上戴著的花頭巾，打了一個雙十字結系在胸前。她彎著腰，敏捷地砍著小树，然後劈掉樹枝，截去樹根，一下子就把樹皮剝下來了。她打算教我，但是毫無結果，我反而把手指割破了。

後來，我藏在灌木叢里，坐在地上沉思了很久，傾聽著鳥兒啾啾爭鳴，我不時看母親一眼，她正好背向我，越走離我越遠。突然她唱起了歌：

貨郎來在後門外。
我賣了小馬，買香粉；
我賣了小牛，買胭脂；
我賣了奶桶，買眉筆。

太陽照射著灌木叢，她挺著身子，臉兒緋紅，一雙眼睛閃爍著亮光。这里面有些兒蹊蹺！

她很少當著我們回憶父親。但是，每當她十分慈愛地同我談話時，我就知道，她是在思念著他。至於妹妹，她可向來就是喜歡的……

在輪船上，她總是在思索——蹙著眉，搖著頭，——大概她心里是在和什麼人拌嘴。我也在不斷地思索：我想象著我將大搖大擺地在院子裡散步，毫不在乎地突然說上一句什麼話，仿佛我向來就會說話似的。我看河水看得入了神，打起瞌睡來了，夢中我吓得幾乎沒了命，我好象覺得自己又成了啞吧。

“媽媽，”我低聲叫道。

她沒有作聲。

“媽媽！”我吓得叫喊起來。

她這才轉過頭來……

我們回來後，我感到我們的院子十分荒涼，淒慘！這一年來，誰也沒有通過一次陰溝，每家人的台階下面都汙積着漂浮着木屑的污水。几座低矮的庫房經過一個冬天越發傾斜了。籬笆上的窟窿大到可以坐着馬車穿過去。司考伏羅得尼可夫屋後臭氣熏天的骨头，兽蹄和零零碎碎的生皮子堆成了山。

老头兒在熬胶水。他坐在原来的那张皮凳上，罩着围裙，戴着眼鏡。汽爐子放在爐板上，汽爐子上面是一个鉄桶，桶里发出一陣陣可怕的惡臭，我在他那兒坐着心里一直想嘔。

“大伙兒都以为这是普通胶水，”半个鐘头以後，等我想出去呼吸点新鮮空气時，他對我說道，“可是这种胶水是万能的，它什么都能粘，鉄啦，玻璃啦；要是哪个傻瓜想粘磚头，那么磚头也能粘在一起。这是我发明的司考伏羅得尼可夫特制牛皮胶，愈臭得厉害，粘性愈大。”

他疑心地从眼鏡上面瞅了瞅我。

“司考伏羅得尼可夫特制牛皮胶，”他又說了一遍，叹了口气。“要是能再向誰借七个卢布作广告，一定会顧客盈門。乡巴佬在市上买水胶都要花四十戈比一磅。这叫什么呢？簡直是明搶明奪。來，你也講点什么吧！”

我講了一点。他贊許地点點頭。

“唉！我真是可怜伊万，”他說。

达莎阿姨当时不在家，过了約摸两个星期她才回來。只有她因为我突然会說話了，才感到那样的惊喜欲狂。傍晚，我們坐在厨房里。她不断地問我，問我們在乡下的生活情形，一边問，

一边自己回答。

“你们怎么样？可怜的宝贝，出来进去就是你们俩，一定闷坏了吧？谁给你们做饭？是彼得罗芙娜吗？彼得罗芙娜。”

“不，不是彼得罗芙娜，”我突然说，“是我们自己做饭。”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说这几个字时，达莎阿姨脸上的表情。她张着嘴，摇晃着头，好象什么东西塞在喉咙里说不上话来。

“也不闷，”我哈哈大笑说。“就是想你，达莎阿姨。你怎么不来看我们呢，嗯？”

她一把将我抱住。

“我的亲爱的，你是怎么回事呀？会说话了？我的宝贝儿，会说话了！怎么不作声，还假装不说呐，喂，看你！喂，讲一讲吧！”

于是，我就把敲我们家窗子的，冻僵了的医生讲给她听，说我们怎样把他藏了三天三夜，他怎样教给我“叶”，“呜”，“呃”这几个字母的发音，怎样强迫我说“耳朵”。

“萨尼亚，你应该为他祈祷，”达莎阿姨郑重其事地说道。“他叫什么名字？”

“伊万·伊万内奇。”

“祷告吧，每天晚上为他祷告！”

不过，我既不会祷告，也不喜欢祷告。

8 彼其加·司考伏罗得尼可夫

达莎阿姨说我会说话以后变了許多。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

覺。去年夏天我总是迴避着小伙伴們，由于自己生理缺陷而引起的沉重心情使我非常拘束。我那时有一种病态的羞怯，整日无精打彩，郁郁不乐。現在这一点恐怕很难令人相信了。

經過两三个月后，我就赶上了同輩的兒童。十二岁的彼其加·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同我很要好。他是一个細长个兒，长着棕黃色头发的，很有主意的小孩。

我在彼其加那兒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書籍。这些書是“古代战争中猎人的故事”，“尤利·米洛斯拉夫斯基”和“尺牍”。在“尺牍”的封面上画着一个留两撇小鬍子的漂亮小伙子，他穿着大紅衬衫，拿着一管鵝毛笔，在他头上有一个淡青色的橢圓，里面画着一个仙女。

在閱讀这本“尺牍”时，我們就开始要好了。在“亲爱的朋友”或“阿·弗閣下”这些称呼中有着某种神秘味兒，于是我想起了远洋航海长的信，并且第一次将这封信讀出声来。

我們坐在教堂花园里；从这里可以看見对岸我們的院子和房屋，它們很小很小，比实际的要小得多。那是达莎阿姨細小的身影，她走到台阶上，坐在地上洗魚。我好像看到那銀白色的魚鱗剝落下来，閃閃发光，落在她的脚边。那不是卡尔魯沙从河边走过嗎，他是城里的疯子，他不停地忽兒皺眉，忽兒傻笑，然后在我們的大門边停下来，大約是和达莎阿姨攀談起来了。

我在念信的时候，一直望着他們。彼其加聚精会神地听着。

“有趣，”他說道。“我从前也知道这么回事，可是忘記了。后来怎么样了？”

“就写了这些。”

“有趣，不知道这只船后来怎么样啦。可能遇救了。你讀过尼克·卡特尔写的故事嗎？”

“沒有。”

“那个故事里面也有这么一件事。一个百万富翁被人扔到了蓄水池里。他猜出是怎么回事，便把水門关上。这时园丁正打算浇水，心想：为什么不来水呢？就在这最后一刹那間，富翁遇救了。否則，他必定淹死在那里面。你背得挺熟啊。念了很久了嗎？”

“不知道。”

“我現在讀一段东西，你能够重說一遍嗎？”

他讀道：

复信謝絕

塞·勒先生閣下：

辱承垂爱，实深感激。唯因种种緣因，碍难应命，凡此种种均与閣下无关，故不拟贅述。此頌

大安

某某拜启

注：如复信謝絕某事，应力求簡短明要，除必要的客套外，文中不应有与此无关之事。

我逐字把这封信連同附注重背了一遍。彼其加有点不大相信的样子擤了一下鼻涕。

“真行！”他說，“再看这一段怎么样。”

他不停地一口气又念完了下面一段：

給他或她的信

我引一段別人的話来开始这封信：“我本想将往事忘怀，但我留恋那逝去的一切：其中有曇花一現的幸福，还有着我的欢乐和悲伤。”你知道吗？在你身上我找到了我最珍貴的（应指出是什么）。沒有比你更好，更珍貴，更可爱的了。在我看来，你象（應該指出象什么）一

般的可愛。我回想起第一次的眼淚和你在我手上的初吻。我沒有和你在一起已經兩天了(應說明,是快樂,是寂寞,是很好;或者談一點兒家常瑣事)。再見吧,吻你。

我稍微有點兒結巴地把這封信也背完了。

“太棒啦!”彼其加驚嘆道,“你真是好記性!”

可惜我們很少能這樣好好地消度時光。彼其加有工作,他“替中國人賣煙卷”;在我們城里把這項重活是這樣稱呼的。當時住在普克洛夫屯的中國人裝紙煙筒^①,僱傭許多小孩替他們賣。就是現在,我還清清楚楚記得那些中國人里面一位姓李的,他是一個小矮個兒,皮膚又黑又黃,臉上皺紋之多是少見的,但為人十分和氣。一般都認為姓李的給的“招待費”比別的中國人要多一些。“招待費”就是我們(因為後來我也開始作這行買賣了)淨掙的錢,因為實際上我們對所有的人都招待:“請抽煙吧!”不過,好心的顧客接受了招待,必定要付現鈔。這就是我們的錢。煙卷每二百五十枝裝一盒,有“奶酪”、“亞歷山大三世”等牌子,我們把這些煙卷拿到車站上,火車上或林蔭大道上去兜賣。

一九一七年的秋天來到了。假如我想使別人相信,說我看見,或者感覺到,或者哪怕是稍微理解到這段時期對我,對全國,以至對全世界有着多么深遠的意義的話,那麼我就是在吹牛皮。我什麼也沒有看到,什麼也不明白。我甚至已經忘記了春天在鄉下所體驗到的,那種模模糊糊的興奮激情。我只是單純地日復一日地生活着;賣煙卷,捉大蝦,其中有黃的,有綠的,有灰的,只是青色的一次也沒有碰到過。

但是我那逍遙自在的生活很快就宣告結束了。

① 這是指將煙絲填在已經裝好的紙煙筒里。——譯者注。

9 一划，一划，一划，五划，二十划，一百划……

大概还在我們回到城里以前，他就經常到我們家里来。全院子的人都知道他。也象他在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家和达莎阿姨那兒所遭遇到的一样，大伙兒都抱着一种不十分明显的嘲笑态度来对待他。現在他几乎每天必来，有时候还带点东西来，不过，說良心話，我从来沒有吃过他一个李子，一顆炒豆，一块夹心糖。

他生着卷曲的头发，向上卷成一个个小圓圈的鬍子，一张大肥脸，只是身材还相当匀整。他那低浊的声音我認为实在是令人恶心。他正在治疗在他那烏黑的皮肤上非常显眼的粉刺。然而遺憾的是，母亲就偏偏看上了他，看上了他的粉刺，卷毛和沉浊得令人恶心的声音；若不是这样，他能这样每天到我們家里来嗎？是的，她看中了他。她在他面前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有說有笑，甚至也开始象他那样又臭又长地談話。有一次，我看見她独自坐在那兒微笑，我从她的脸上就猜到了她是在想他。还有一次，她和达莎阿姨談話，提到某人时說道：“反常現象不胜枚举”。这是他常說的話。

他姓鉄木什金，但是不知为什么，他管自己叫卡耶尔^①·庫里。直到現在，我也不明白他这样作的用意何在。我只記得他喜欢对母亲說，“在生活中他是一个可怜的小丑”，“他象一片木屑受着生活的顛簸”。

① 卡耶尔即丑角的意思。——譯者注。

在說這話的時候，他作出一副含意深長的面孔，呆頭呆腦，若有所思的樣子瞧着母親。

就是這個小丑現在每天晚上到我們家里來。有一天晚上是這樣的。

廚房里的燈掛在牆上，我的蓬鬆的头影正好遮住練習本，墨水瓶和寫字的一只手；這只手正費勁地在紙上移動着，鋼筆尖微弱地發出刷刷的聲音。

我坐在桌邊描筆划，由於用勁的關係，舌头顶着腮幫在描筆划；一划，又一划，三划，一百划，一千划。我描了不下一百萬划，因為我的這位先生斷定說，若是筆划“不吹直”^①，絕對不能學下去。他坐在我身旁教導我，時而表示出一種不求全責備的樣子瞧瞧母親。他不僅教導我怎樣寫字，還要教導我怎樣生活，他用一些無窮無盡的混蛋論調把我攪得頭昏腦脹，所以我描出來的筆划大肚子的，細尾巴的，應有盡有，但就是沒有直的，沒有“吹直”的。

“每一個人都想撈到一塊肥肉，”他說，“每一個人出於本性也應該這樣想。可是在他得到這樣一塊肥肉以後，能不能就說是滿足了呢，這還是一個問題！”

一划，一划，一划，五划，二十划，一百划……

“譬如說我吧，從小境遇就很苦。我絲毫也不能依賴母親的勞力。相反，當我們家業衰敗，父親又因為被控偷了人家的馬，而被判處監禁的時候，除了我再沒有旁的人能賺錢來養家糊口了。”

一划，一划，粗的，細的，彎彎扭扭的，兩頭尖的，五划，二十

① 卡耶爾·庫里把“垂直”錯說成了“吹直”。——譯者注。

划，一百划……

“最叫人伤心的是，父亲从监狱里回来后便开始酗酒；一个人喝酒喝得越凶，他的家业也就越容易衰败。后来催命鬼找上了門，沒有疑問，他是急病死的，因为他剥了一只死馬的皮，以后就突然死去了。”

我非常清楚我的这位先生的父亲死后的情形：他渾身浮腫，由于尸体較生前胀大了三倍，所以那副刚动工的棺材不得不赶忙重做。有一次我还梦见这种叫人恶心的死相……

一划，一划，一划……鋼笔尖刷刷地响着，一划，一个墨点……

“我們的祖房也空了。那时我才十一岁，可是我毫不悲观失望，也沒有仰仗母亲。”

我的先生盯着我。我那时仅十岁，坐在小凳上听到他这句话也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到飯館里去打短工和跑堂，我从此再不依賴母亲掙錢，白吃飯了。”

毫無疑問，正是他这种出奇的表現手法給了我母亲一个极为强烈的印象。如果卡耶尔的话說得簡簡單單的，那么她一下子就会猜透他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愚蠢，懶惰而残酷的人。不过，关于他非常残酷这一点，不久之后母亲自己也認識到了。

母亲也坐在同一张桌前，仿佛着了迷似的听着他吹嘘。她在补衬衣；这是父亲的衬衣，我知道她是补給誰穿。我預感到要有什么灾祸发生，抬起眼睛来望着母亲蒼白的脸，望着她从中間对分的烏黑的头发，望着她的两只纖瘦的手。我又回头来描笔划……我很想在这一排笔划上加上即使一道长杠也好，那就会

成为一片絕妙的篱笆了。但是，这可不行呀！笔划必須“吹直”。

“可是我的母亲，”卡耶尔繼續說道，“竟然公开地作起善事来了。我当时怎样对付呢？我認識到这样对我的前途和发展无疑是不利的，所以就去找我永生不忘的尼基塔·朱耶夫舅舅，請他来开导开导她……”

关于他这位永生不忘的舅舅我已經听到不下一百次了；在我的想象中，这同样是一个长着滿脸粉刺的老胖子。他乘坐雪橇从乡下赶来，脫下黄皮袄，走进門来拍打拍打身上的雪花，向圣象划着十字。他把他母亲痛打了一頓，而小卡耶尔·庫里却站在一旁，冷眼看着別人打他的母亲。

一划，又一划……篱笆早已划成了，虽然我很清楚这样做会倒楣的，但是我仍然迅速地在篱笆上划了一个太阳，几只鳥兒和浮云。卡耶尔繼續講着，一面斜着眼睛看我，我慌忙用袖子遮掩太阳和小鳥兒。可是已經来不及了！他把我的練習本一把夺过去，豎着两道眉毛。我站在一边。

“阿克西尼亚·費多罗芙娜，您現在看看吧，看看您的寶貝兒子在干些什么！”

父亲在世的时候，我的母亲从来沒有打过孩子，这一次却揪住我的耳朵，按住我的头使劲往桌子上碰。

还有些晚上，我这位未来的繼父也偶而朗誦点东西，但是跟我和彼其加·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在教堂花园里讀的迥然不同。卡耶尔念的老是那一本书：“豪杰日記摘录”。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一首诗：

看今朝，盖世英豪，
为保卫沙皇和祖国，
不惜血染沙場，

虽負五处重創，两处內伤，

但却狠狠地教訓了敌邦。

他讀这本書时那一脸教訓式的威胁的表情，就好象这位英勇的豪杰的一切不幸，其过都在于我似的。

我的課业从卡耶尔·庫里搬到我家来的那一天起就中止了。头一天晚上举行了結婚仪式。达莎阿姨借口生病沒有来。我記得在行婚礼时母亲打扮得艳丽而又可怕。她穿着一件剪毛鵝絨的白色上衣，这是新郎的礼物，头发梳得象个大姑娘似的，辮子交叉着盘在头上。她談話，喝酒，微笑，但有时带着一种奇怪的神情用手摸着脸。卡耶尔·庫里講了話，在講話中他把自己对这个穷苦家庭的功劳吹嘘了一通，他說“因为过去那个家长遺留下一个破烂的局面，所以这个家庭无疑地已走上毀灭的道路”，此外，他还提到他使我受到了“普通教育”，显然他对这个名詞的理解只限于“吹直”的笔划。

媽媽未必听了他这番講話。她低垂着眼挨新郎坐着，突然皺起眉头，神色茫然地直望着前方。

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兒喝得醉醺醺的，走到她跟前，拍着她的肩膀，說道：

“噯，阿克西尼亚，你又換了个……”

她慌忙地强笑了一笑。

結婚后，我的繼父在碼頭管理处工作了約摸两个月。那时，我看到他回来把手脚一伸，一屁股坐在父亲过去坐的地方，使用父亲的湯匙和盘子吃飯时，虽然感到很难受，但总还可以躲着他，装聋作哑，或者待他睡后再回家去，这样勉强对付下去。但是，自从他因为某种不可告人的丑事被管理处撵出来以后，我的生活頓時就变得无法忍受了。他那顆糊塗的脑袋瓜里产生了一

个恶邪的念头——要专心致力于我们，就是我和妹妹的教育工作！从此我连一分钟的自由时间都没有了。

我现在想，他在年轻的时候一定当过奴才，要不然他施用到我和妹妹身上来的这一套可笑而又古怪的鬼把戏，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他首先要我们每天早上去请安，虽然我们睡在地板上，离他的床不过两步远，但我们也只好去。可是任何力量也不能够强迫我说出“早安，爸爸”的话来。早上并不安，爸爸又非真爸爸。吃饭入坐的时候，不许比他先坐；要站起来的时候，须先经过他的允许。虽然母亲仍然和过去一样在医院里洗衣服，饭是用母亲和我挣来的钱由妹妹作的，可是我们还得向他道谢。我始终记得，当可怜的妹妹萨尼亚从桌旁站起来，按照他教导的那样很难看地屈膝行礼，第一次说“谢谢您，爸爸”的时候，我心里的那种愤不欲生的感觉，我恨不得将带着没有吃完的稀饭的盘子对准他那张胖脸摔过去。直到今天，我还懊悔当时为什么没有这样作……

我是多么恨他啊！我讨厌他走路的样子，他的鼾声，他的头发，甚至还有他每天早上闷着劲儿亲自打磨的那双皮靴。每当夜间醒来时，我便愤恨地久久望着他那张熟睡中的胖脸。他没有料想到自己是处在多么危险的境地。若不是达莎阿姨，我当时一定会将他杀死。

10 达莎阿姨

假如不是达莎阿姨那可爱的形象经常浮现在我眼前的话，

我也許根本不会去回忆这一段时间了。达莎阿姨——她是我初次有意識地去尊重和热爱的人。

我每次来到她家，虽是一句話也不說，但她就什么都明白了。她对我叙述她自己的一生經歷来安慰我。我知道她还不到四十岁，感到非常惊讶！可是我总觉得她仿佛是我的亲祖母，特别是她每天晚上戴上眼鏡，讀那些被春潮冲到我們院子里来的別人的信件时（当时她还在讀这些信）。

她二十五岁时就守了寡：她的丈夫在日俄战争开始时便牺牲了。在鋪着花边台布的櫥櫃上，有两个浅蓝色，带螺旋花紋的玻璃花瓶，中間放着她丈夫的遺象。相片后面保存着一封信，自然，这封信我也是背得烂熟的。东西伯利亚第二十六步兵团行軍办公室通知达莎阿姨說，她的丈夫，曾因战功卓著膺获三級和四級战功勳章的列兵菲多尔·亚历山大洛維奇·菲得洛夫，在对日战争中英勇殉国。英雄！很久以后，每当提到这两个字时，我似乎还看到一个头发剪得短短的，留着鬍鬚的男子，他坐在藤椅上，背后是白皚皚的雪山。

后来，有一个比她小十岁的演員爱上了她，但是，达莎阿姨并没有再嫁。她拒絕了同他結婚。不过演員对她的爱情极为真挚。他甚至放弃了剧团的工作，住到我們的城市里来。

虽然达莎阿姨用坚决的神情重复說了好几次，她拒絕他的求婚，但在当时，恐怕她也不反对他这种决心的。

她甚至还允許他永远留在我們城里，并且讓他到她家去玩。这是她最幸福的一段时期。难怪她現在談到这段时期时，还是眉飞色舞，似乎年輕了許多。

但是，不幸得很，这个演員出身于有錢的家庭，他的哥哥是彼得堡的一位大工程师，他出面来干涉这一段“姻緣”了。这是

达莎阿姨一生中最可怕的一天，这位工程师从彼得堡赶来，一开口就說給她五千卢布。

“我刚問他‘为什么？’时，眼泪就止不住流出来了。他一声不响地坐着抽烟，他的脸那么丰满，鼻子上滿是血絲，領帶上扣着一个鑽石別針。他突然說道：‘把我的兄弟还給我吧！（說到這里，达莎阿姨的声音开始抖起来。）把他还給我，您要什么都行。他还年輕，他有他的前程，他在这兒会毀灭的，省里不是他可呆的地方。假如您不忍讓我們年老的父亲因思念兒子而死去，假如您还有一点同情心的話，就請您还給我們兒子和兄弟吧。’我那时并不知道他說的全是謊話，事实上，他的父亲早死了。我当时只是哭个不停，因为我感觉到一切都完了。我們的爱情，我的生命和他的生命，一切都完了。”

这个工程师終於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达莎阿姨对他立下了千鈞重誓：在教堂里当着吉赫文^①圣母象对他发誓，永不再見他的兄弟。她一直遵守着这一誓言。演員回彼得堡去了，但是沒过几天又回来了。無論他怎样哀求，哭泣，写什么样的信，所有这些都无济于事。达莎阿姨不願作一个违背誓言的人。她沒有回信，在街上碰見那个演員时，就閉起眼睛来，从旁边走过去。她再也沒去看过他。

只有那么一次，她允許他到她家里去，而且还是夜間摸着黑去的，这是为了不致破坏誓言。他們一直談到早晨，两人哭了一夜，到天刚一亮，就道別了，永远地离別了。“嗨，就这样我最后一次吻了他，我象是把整个的心都交給他了！……”

直到現在，我还不清楚这段恋爱故事中哪些是真实的。达

① 地名，一五六〇年建成吉赫文僧院，成为教会区，現屬列宁格勒省一城市。——譯者注。

莎阿姨喜欢讀書，过了几年我重回恩斯克时，在她的藏書中发見了一本司湯达的“巴尔瑪修道院”。不过这也没什么，司湯达所杜撰的故事，或者他听来的事，达莎阿姨也可能遭遇到呀。

难怪象她这样純朴的人也那么喜欢不平凡的故事。正象斯湯达的作品一样，在她的故事中，純朴和神秘并不彼此排斥，而是互相补充。不管怎样吧，我那时对这些事都深信不疑。所有这一切——演員的爱情也好，在圣象前的重誓也好，最后一次在黑暗中的幽会也好，我都認為是真实的。

我上面說过，达莎阿姨还和过去一样繼續在讀那次春潮冲到我們院子里来的信件。

达莎阿姨每天晚上讀一封信，这似乎已經成了她生活中的一种仪式了。仪式的开始是达莎阿姨先按照信封上的住址揣測信的内容，但大多数信的地址都被水湿得完全看不清楚了。

然后，进行朗誦，只能說“进行”才恰当；她不慌不忙地，长吁短叹地讀，碰上模糊不清楚的字时，就嘟嘟囔囔埋怨一通。达莎阿姨讀信时随他人的欢乐而欢乐，同情別人的悲伤，对有的人她加以責备，对有的人她加以贊揚。总而言之，这些信就好象是寄給她的一样。她讀書时也同样認真。在“祖国”杂志附送的小册子里，登載着許多王公貴族的故事，她对这些人物的宮庭内幕和个人艳史都了若指掌，就好象这些王公貴族是住在隔壁院子里一般。

“可是列男爵，”她很生动地說道，“我早就知道他要遺弃苏珊夫人的。一口一个亲爱的，到末了，还不是——去你的！好，就是这么一个宝贝！”

当我为了躲避卡耶尔·庫里常到她家去消磨晚上的时候，她已經快讀完这些信了，剩下的不到十五封。其中的一封我应

該在這兒把它記下來。達莎阿姨不明白這封信的內容。但是，在那個時候，我就覺得這封信和遠洋航海長的信有着某種聯系。

下面就是這封信（頭幾行達莎阿姨認不出來了）：

……我懇求你一點：不要相信這個人！可以大膽這樣說，我們的一切失敗都應歸咎於他。舉這樣一件事實就足夠說明的了，他在阿爾汗格爾斯克賣給我們六十條狗，其中大部分在新地島就不得不射殺掉。他這種親屬的幫助使我們付出了多麼大的代價！不只是我，全探險隊的人都在咒罵他。我們這次去冒險，知道一定會遇到危險。但是我們並沒有料到會有這樣的打擊。現在只好盡我們的力量去作了。關於我們探險的情形，我可以對你談的實在太多了！這些故事足可以給卡秋什加講一個冬天。但是天哪！這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我不願意使你想到我們的處境已經沒有希望了。不過你們也不要過份期待……

達莎阿姨結結巴巴地讀着，一面用教訓的神色透過眼鏡瞅我。我聽着她讀。我當時沒有料到經過若干年之後，我會十分苦惱地去回憶這封信上的每一個字。

這封信很長，共有七、八頁，詳盡地敘述了船被冰山封住以後緩緩向北移動時的情形。使我特別驚訝的是連艙房裡都結了冰，他們不得不每天早上用斧頭去砍冰。

我雖然可以用自己的話來敘述水手司卡其可夫在獵熊時怎樣掉進冰縫裡跌死的，講一講大伙兒為了看護生病的輪機員提斯怎樣累得疲憊不堪。但是我能逐字記住的只有上面引錄的十來行文字。

達莎阿姨仍舊在讀，一面不住地嘆息。宛如一幅幻燈畫呈現在我的眼前：白色的帳篷搭在白茫茫的雪地上，一群狗喘吁吁地拖着雪橇；一個身材魁梧的巨人穿着長筒毛皮靴，戴着高氈帽，好象一個披着毛皮法衣的神父迎着雪橇走來……

有一次，我到达莎阿姨家去时，碰见她在流泪。她坐在櫥櫃前哭泣，櫥櫃上放着她的丈夫——日俄战争中的英雄的相片。她一看见我，便把头巾从头上摘了下来。

“他居然敢这样对待我，这个吸血鬼，满嘴胡说白道的东西。”她向我说话时的那种愤慨，使我不免十分惊异。“就是这样欺侮我！你以为孤儿寡妇，就没人保护了吗？有的是哩！”

“达莎阿姨！”

“有的是哩！”她重复了一遍，又哭起来了。“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要走，走了就没有事了，哪儿都能去！”

她坐到床上，脱掉皮鞋往地板上一甩。

“让鬼把你抓了去吧！”她洋洋自得地说道。“就是你这老鬼，放清楚点！你配得上我吗？这样的事绝对办不到。”

我明白她是在骂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儿，因此我问她，究竟那老头儿干出了什么事。但她只是摆了摆手。

我那时就觉得，她自己也不太清楚他是不是欺负她。不管怎样吧，他总是对她说了点什么特殊的事儿，所以到晚上，达莎阿姨又披上她那块花边黑头巾，上邻院占卦的茨冈女人家里去了。

她若有所思的回来了，静静的，也不再咒骂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儿了；反而突然自言自语地道：“他还是个不喝酒的人哩。”

这一奇怪的举动一直延续到第二天。达莎阿姨坐在院子里正织毛衣，这时门口出现了一个生人，红脸膛，身上穿着一件肮脏的帆布大衣，脚上穿着一双厚皮靴子。他向四周围看了看，就对着正在台阶上熬万能胶的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走去。

“请问，是您要卖房子吗？”

司考伏罗得尼可夫看了看他，又看了看达莎阿姨。

“是我，”他回答道，“因为要离开此地，所以打算出卖房屋和全部家具。”

达莎阿姨激动得先是口里不住地嘟囔，猛一下站起来，把椅子都弄翻了，而且和昨天那样，从头上摘下了头巾。

“带地皮嗎？”

“带地皮，籬笆以內的都是。”

达莎阿姨嘟囔的声音越来越大了。

“不卖！”她突然高声嚷道。“这所房子不卖！請走吧！”

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兒带着狡黠的神色閉起一只眼睛来。

“你是房主嗎？”穿帆布大衣的人赶忙問他道。

“我是。”

“那么怎么样，卖，还是不卖？”

“人家說不卖嘛，”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很得意地說道，接着便哈哈大笑起来。

彼其加也在場。他站在厨房門边，輕蔑地冷笑了一声。我什么也不明白，但是不久之后，一切便都得到解释了。

11 和彼其加的談話

当我还在“吹直”的笔划上下功夫的时候，就有逃跑的打算了。我在籬笆上画太阳，小鳥，浮云并不是毫无打算的！后来，我又忘掉了这个念头。但是，我感到回家这事是一天比一天难堪了。

我和母亲几乎見不着面。早上她出去的时候，我还在睡覺。

我每次夜間醒來，有時看見她坐在桌邊，因為過於勞累，她的臉色蒼白得象白粉一般，她在慢慢地吃晚飯，就是卡耶爾遇到她那烏黑的蹙眉凝視的眼睛時，也有些胆怯。

我很喜歡妹妹。但話又說回來了，要是我不那麼喜歡她也許還好一些。記得有一次，壞蛋卡耶爾因為她洒了一小杯素油竟將她打得半死，把她從飯桌上趕走，但我偷偷地送了些土豆給她。她一邊吃着，一邊慟哭，突然想起了在挨打的時候，花玻璃片該不會丟掉了。玻璃片找着了，她又破涕為笑，吃完了土豆以後，她又放聲哭了……

大概是秋天到了，所以我和彼其加才在教堂花園里閑溜躑，赤着腳踢落葉玩。我們坐在一座小山上，小山下面有一條古老的地道，彼其加撒謊，說這條地道從花園里穿過水底一直能通到河對岸，並且他自己有一次似乎都走到地道的半中腰了。

“我走了一夜，”彼其加煞有介事地說道。“在那裡面，每一步都會遇到骷髏。”

從小土山這兒可以看見白色的波克洛夫修道院聳立在高高的河岸上。修道院被一道帶瓦檐的低低的圍牆圍着，後面是一片草地。微風吹來，草地的顏色不斷地變化，時而綠油油的，時而黃橙橙的，好象海洋一般。

不過，我和彼其加那時都很少想到大自然的美麗。我們趴在小山上，去吸吮一種極為苦澀的草莖，可是彼其加卻偏說這草是甜的。

記得這次的談話是從談老鼠開始的：地道里有沒有老鼠？彼其加說，有，他親眼見過，而且老鼠和蜜蜂一樣，也有一個雌鼠王。

“每逢閏年它們都要死光，”他補充說，“不過雌鼠王照樣繁

殖。她长得很大，象一个母兔。”

“你撒謊！”

“撒謊不是人，”彼其加滿不在乎地說道。

我們之間好象是有默契，对某些事可以撒謊，对某些事又不能撒謊。那时候我們还是小孩子，但已經能够互相尊重了。

“不过，在土耳其斯坦却没有老鼠，”彼其加沉思地又补充說，“那兒有跳鼠，草原上有田鼠。不过这已經完全不是什么鼠了，因为它们同兔子差不多，吃的是青草。”

他常常談起土耳其斯坦，照他的話說来，这是一个城市，在这个城市里，梨树，苹果树，橘柑树就生长在大街上，可以随意采摘，想要多少就要多少，也絕對沒有人象咱們这兒果园里的园丁那样，你摘他两个果子吃，他就用大量盐粒作子弹往你背上射击。在那兒，人們露天睡在地毯上，因为那兒沒有冬天，只消穿一件单褂子，所以皮靴，大衣根本就用不着。

“那兒住的是土耳其人。他們全都有武器。弯馬刀是鍍銀的，腰間帶着匕首，胸前挂着子弹带。我們到那兒去好嗎？”

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但他这回并不是开玩笑。他的脸色变得有点兒白了。他突然轉过身去站起来，激动地望着远处的河岸。那兒一位熟識的漁翁正守着釣竿在打盹，釣竿插在紧靠水边的小石子里。我們沉默了一会兒。

“你爸爸呢？他能放你走嗎？”

“我才不去問他哩。他現在顧不得我了。”

“为什么？”

“因为他要結婚了，”彼其加輕蔑地說道。

我不禁大吃一惊。

“和誰？”

“和达莎阿姨。”

“胡說！”

“他對她說，假如她不肯嫁給他，他就要賣掉房子，自己挨村去替人補鍋。她起初不肯答應，可是後來還是同意了。還不就是愛上了他唄，”彼其加又輕蔑地添了一句，同時吐了一口唾沫。

我乍聽他的話還不太相信。達莎阿姨！改嫁！嫁給司考伏羅得尼可夫老头兒？嫁給她自己曾經那麼罵過的人？

“你怎麼樣？”

“關我啥事！”彼其加說道。

他顯出很不高興的樣子，把話扯到別的問題上去了。兩年前，他的母親去世的時候，他哭得象個淚人兒似的，不顧一切地從院子裡跑出去，跑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後來大家費了好大勁才把他找回來。我記得別的孩子還因為這件事打趣過他。

我們又談了一會兒，然後仰面朝天躺在地面上，雙手攤開，看着天空。彼其加一口咬定說，如果這樣不眨眼地躺上二十來分鐘，那麼白天也可以看見星星和月亮。於是我們就這樣躺着看。天空晴朗，遼闊。高處，白雲互相追逐着疾馳。我的眼裡已經充滿了眼淚，但還是竭力忍耐着不眨眼。月亮仍然看不見，更不要說星星了，我立刻就明白了，這是彼其加瞎吹牛。

什麼地方響起了隆隆的馬達聲。起初我還以為是碼頭上軍用卡車行駛的聲音，因為碼頭就在下面，在碉堡圍牆下。但是隆隆的響聲越來越近了。

“飛機！”彼其加嚷道。

一架飛機，灰白色的機身在太陽照耀下閃閃發光，好象是一隻美麗的飛魚。飛機迎着風在飛行，白雲向它涌去。

最初使我感到惊奇的是飞机越过浮云时那种轻松自在的姿态！转眼间，它已飞过了波克洛夫修道院，十字形的黑色投影紧随着它在河对岸草地上疾驰。飞机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可是我总觉得在那遥远的天边仿佛还可以看见它小巧的银灰色的机翼。

12 卡耶尔·库里在敢死营

彼其加有一个亲叔叔住在莫斯科，因此，我们的全盘计划都寄托在他这位叔叔身上。他叔叔在铁路上工作，彼其加肯定说他是司机，可是，我想他大概是司炉。因为过去彼其加一直称呼他是司炉的。这位司机兼司炉五年前就在莫斯科到塔什干线的火车上服务。我这样确切地说是五年，是因为他叔叔已经五年没有来信了。但是，彼其加说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叔叔向来就不爱写信，现在他还是在那条线的火车上工作，何况他最后的一封信是从萨马拉寄来的。我们一块儿看了看地图，的确，萨马拉正好在莫斯科和塔什干之间。

总而言之，只要找到这位叔叔就行了。彼其加知道他的地址。即使不知道地址，也随时可以根据姓名找到人。至于他姓什么，这一点我们丝毫没有怀疑，当然也是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和彼其加的姓完全相同。

在我们想象中，路程的后半段是这样的：只要他叔叔把我们安置在机车上从莫斯科带到塔什干就行了。可是怎样去莫斯科呢？

彼其加并没对我进行说服工作，只是板着面孔听我畏畏缩

縮地提出相反的意見。他沒有答理我，他一切都明白。但是，我只知道一點，要不是卡耶爾，我哪兒也不會去。而現在，卡耶爾突然要走了，只要他肯走，那我就可以留下來。

這是值得紀念的一天。他穿着一身軍服，一雙嶄新發亮，走路來咯吱咯吱發響的皮靴，歪戴着軍帽，一綫波浪式的卷發露在帽子外面。他回到家里，就將二百盧布往桌子上一摔。

在那個年代，二百盧布是一筆聞所未聞的款子，因此母親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種貪婪的神色，用手將這些錢捂住。

但是，使我和彼其加，以及全院的小孩感到驚訝的並不是金錢，完全不是！而是別的東西。那就是在他制服袖子上綉着一副骷髏的頭骨，和兩只交叉的脛骨。繼父參加了敢死營。

諸位讀者無疑已經記不得敢死營是怎么回事了。在那個時期，在各種大會上，在經常有人散步的地方，不論哪兒，只要人多的地方，往往會突然出現一個身背銅鼓的人。他一敲起銅鼓，大家就安靜下來。這時，另外一個人，多半是軍官，也象我繼父一樣，袖子上綉着骷髏和脛骨的，便開始講話了。他代表臨時政府邀請大家參加敢死營。雖然他再三強調說，報名參加的人除了能領旅差費外，每月還有六十盧布，外加制服一套，但是誰也不願替臨時政府賣命，因此參加敢死營的人主要是那些同我繼父一樣的地痞流氓。

但是這一天，當他穿着新制服，一臉嚴肅陰森的神色，拿着二百盧布回家時，誰也沒有感覺到他是個流氓。甚至一向憎恨他的達莎阿姨也走了出來，很不自然地向他點了點頭。

晚上，他邀請了一幫客人，還發表了演說。

“上級所規定下的一切規程，”他說道，“都有限制，窮叫化子鬧革命的自由，因為這些窮叫化里面，絕大多數都是猶太人。他

們和布尔什維克正在進行卑鄙的投機活動，無疑問的，這將使得現時制度的一切成果蒙受災難。對於我們——自由的捍衛者說來，解決這個慘局的辦法很簡單。把武器拿在自己手里，使那些為了個人目的爭權奪利，侵害革命和自由的人倒楣！自由的代價是昂貴的，我們決不將自由廉價出售！這就是目下時局的概況。”

母親這天晚上顯得十分快樂。她穿着一件非常合身的天鵝絨短上衣，拿着一瓶葡萄酒周旋於賓客之間，每干一杯之後便接着給大家又斟上。繼父的朋友，一個殷勤的矮胖子，也是敢死隊員，他站起來，恭恭敬敬地請大家為母親的健康干一杯。在繼父講話的時候，這個矮胖子真誠地笑着，可是這時，却一本正經起來，高舉起一只滿斟着葡萄酒的高腳杯，同母親碰了一下，簡短地說了一聲“萬歲！”

大家跟着喊“萬歲”。她顯出很不好意思的樣子，臉上微微一紅，走到屋子中央，按照舊規矩深深地答了個禮。

“真是個美人兒啦！”胖子高聲說道。

隨後，司考伏羅得尼可夫老头兒致答詞。他喝得醉醺醺的，因此說話中間常常停頓好久，這時大家都鴉雀無聲。

“每一個人都應該懂得死的意義，”他声色俱厲地說道。“尤其是還有一些人，他們白白活在世上只知道醉生夢死，對於这样的人只有一條路，那就是參加你們的敢死營。但是，象我这样的人，却休想用白面包來引誘我。這話怎講呢？因為我不願意為你們的‘自由’去賣命。你們的自由——就是作買賣。你們的敢死營——同樣也是作買賣。為了二百盧布出賣自己的性命。對不住，要是我不死怎麼辦呢？是不是還把錢交回去？”

他還講了些關於資本家部長的事，就坐下了。繼父捏緊拳

头走到他身前。这个欢乐的日子眼看着要很不愉快地结束……但是那个矮胖子（在听老头儿致答词的时候，他也是那么真诚地笑着）赶忙跳起来，抢到他们两人的中间。当他劝解继父的时候，司考伏罗得尼可夫故意踩得皮鞋得得作响地走出去了。

这么一来，这个欢乐的日子也就灰溜溜地收场了。

13 送 葬

大约是在深夜三点钟，我早已睡着了，突然被一声尖叫惊醒。烟草的青烟凝聚在桌子上空，一动也不动。大家早已走散了，继父摊开手脚睡在地板上。尖叫声又重复了一次，我分辨出这是达莎阿姨的声音，我急忙跑到窗前去。一个女人躺在院子里，达莎阿姨正对着她的嘴大声吹气。

“达莎阿姨！”

达莎阿姨仿佛没有听见我在喊她，不知为什么跳起来绕着我们屋子跑了一圈儿，然后又敲起窗子来。

“彼得·伊万内奇！快拿水来！阿克西尼亚倒在这儿了！”

我急忙把门打开，她一进屋就去喊继父。

“彼得·伊万内奇！噯，看你呀，天哪！”继父只是哼哼两声。

“萨尼亚，应该把她抬到这儿来，她大概是在院里跌倒碰伤了。

彼得·伊万内奇！”

继父闭着眼睛坐起来，马上又躺下去了。就这样，我们一直没有能叫醒他。

我们通夜忙着照顾母亲，快到黎明的时候，她才苏醒过来。这虽说是一般的休克，但是在她跌倒时，头又碰到了一块石头

上，更不幸的是我們直到第二天傍晚才从医生口中知道这件事。医生囑咐放冰。但是大家都覺得花錢买冰是一件怪事，因此，达莎阿姨就决定用湿手巾来代替冰。

我还記得薩尼亚怎样哭着，一趟一趟地跑到院子里去，一边用手擦眼泪，一边往水桶里浸毛巾，然后再拿回来的情形。母亲安靜地躺着，脸色和往常一样的蒼白。她一次也沒問起过繼父（他第二天就搬到他的敢死营去了）。然而却一步也不讓我們——我和妹妹——离开她。她老是想呕吐，老是眯縫着眼睛，好象是在用力仔細觀看什么似的，不知道为什么，达莎阿姨非常不喜欢她这付样子。她一直病了三个星期，后来似乎已經开始好轉了，但沒想到又突然恶化了。

有一次，我天沒亮就醒来了，看見她坐在床上，两只光光的脚垂在地板上。

“媽媽！”

她紧蹙着眉头望了望我，于是我突然明白了，她看不見我。

“媽媽！媽媽！”

我想扶着她睡下，但是她总是帶着那种一心在注意着什么似的严肃的表情，将我的手推开……

从这天开始，她絕食了。医生囑咐要强行喂她雞蛋，奶油。这个建議当然很好，但是我們沒有錢，而城里既沒有雞蛋，也沒有奶油。

达莎阿姨急得直哭，罵她，可是母亲只是将黑辮子交叉放在胸上，漠不关心的，阴郁的躺着，一句話也不說。只有一次，达莎阿姨急得沒有办法說，她知道母亲为什么不吃飯，因为她不想活了，所以才不吃飯，这时母亲才喃喃地說了两句什么話，眉头一皺，便轉过身去了。

母亲自从生病以后，对我非常亲热，她疼爱我的程度甚至不下于疼爱薩尼亚。她常常很久很久地看着我；是那样专心一意，好象有点惊奇的样子。她在病倒以前从来没有哭过，而现在却整天地哭。我懂得她为什么哭，她是在后悔以前不够爱我，懊悔自己忘记了父亲；还可能为了自己改嫁卡耶尔，为了他对我们的种种虐待而请求宽恕。但是一种茫然的感覺支配着我。我感到束手无策，我甚么也懒得作，甚么也没有想。我們最后的一次“谈话”是这样的：我們两人誰都没有說一句話，她把我叫到她跟前，拉着我的手，搖着头，很吃力地抑制着她那颤抖的嘴唇，……我明白她是想和我告别，但是我却象块木头似的低着头站着，固执地望着脚下的地板。

第二天，母亲就死了……

繼父全副軍装，肩上背着一杆步枪，腰間挂着手榴弹，在門厅里号哭，但是不知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理睬他……

我和妹妹坐在院子里，無論是誰，只要是来的人都要在我們身边停下，千篇一律地說道：“你們舍不得媽媽吧？”或者說：“現在，就剩下你們一对沒爹沒娘的孩子了嗎？”常到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家玩“頂牛”的老太婆一到我們家就把門关起来，过了一会兒，她們象是洗了地板似的，挽着袖子，提着裙子把水桶提了出来，还有达莎阿姨为了什么“路签”跑来跑去，这是一套极为恐怖的仪式。我覺得只要这一套仪式不結束，我們就必须坐在院子里。我們就这样坐着，等待着。

过了許多年以后，当我讀到巴尔扎克說的“灾难可以使人的观察能力变得敏銳”这句话时，便立刻回忆起給母亲穿寿衣，入殮和殯葬的那些日子。無論是自己的，或者是旁人的一句话，一个动作，我都牢牢地記在心里。我明白为什么在第一天母亲躺

3
在桌上，叉着手捧着一个圣象时，大家当着她谈话的声音那么低，后来声音却越来越大，最后就用通常的声调交谈了。这是因为他们，司考伏罗得尼可夫，继父，还有达莎阿姨，对于她的死已经习惯了！我也非常惊讶地觉察到连我自己也突然开始去想别的事情了。

难道我也习惯了么，难道我是在想那很久以前彼其加送给我的装着铅弹的骨球，由于母亲死了，我便无心去玩这个骨球了！于是，我立即怀着悔恨的心情强使自己去想念妈妈。

出殓那一天也是如此。

萨尼亚因为头痛，大家就把她留在家里了。继父一早被召回敢死营，没有赶上起灵，我们足足等了他两个钟头，才跟着灵柩出发。这里所说的我们，就是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儿、达莎阿姨和我三人。

他们跟在车后步行，达莎阿姨抓住车把，恐怕掉队。我则被安置在小车上。

回想起自己在路上的表现实在是惭愧。当熟识的小孩停下来，目送我们的行列经过，或者有人尾随着我们走上几分钟，询问我们葬的是谁时，我居然会有一种骄傲自得的感觉。但我马上就责备起自己来。我们越走越远，对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的马车夫戴着一顶小帽，穿着一件肮脏的长衫，昏昏沉沉地不时吆喝着那匹瘦马。这时我的思想真是天晓得又飞到哪儿去了，怕早已远远地离开这用一块破白布勉强盖着的棺材了。

走到城墙根了；城墙各处的缺口都有木板堵住，以免没买票的人混进夏园里去。除了我和彼其加之外，谁也不知道倒数第二块木板可以挪开，只消把木板一挪开，你就可以畅畅快地进花园玩了！想听音乐就听音乐，想折花就可以到花园里偷偷摘

几朵紫罗兰，待散场后卖给听众，——五戈比一束！

走到士官学校大楼了；院子里停着满载褥垫的大板车，许多不知是军官，还是学员的人穿着灰色军大衣，不知为了什么在忙着搬褥垫去堵塞二楼上的窗户。走到阿房尼那山岗了，城里传说这是一座被掩埋的教堂，每逢复活节的夜晚，这儿还可以听到地下传出来的歌声。有人在阿房尼那山岗上走动，我定神看了看，原来是那些穿浅色军大衣的人在堆积的树枝间时隐时现。

我顿时恍然大悟。我想到刚才在我们经过市场广场时，看到法院门前站着卫兵，铁栏杆后面的花园里有一些身穿便衣的人匆匆忙忙地来回走着，其中有一个人还拖着一挺机关枪。商店都关着门，街上空荡荡的，走完了塞尔吉耶夫大街我们也没有碰到一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穿着一身脏衣服的马车夫不断地用鞭子抽打着马儿，急急忙忙地赶路。达莎阿姨和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儿勉强能跟得上。我们向着皮萨荒地（这是指近郊与市区之间一片空旷污秽的地方）走去，往前是一个陡坡，通到河岸，再往前是磨坊桥……远处不知是什么声音短促地响了一阵，车夫慌张地四面望了望，迟疑不决地举起鞭子。达莎阿姨追上了我们，破口骂道：

“你疯了吗？这又不是运木头！”

“在打枪呀！”车夫满肚子不高兴地说道。

通到河岸上去的陡坡已平出了一条道来，我们在上面走了几分钟，可是两旁什么也没有看到。有一个地方在放枪，但是枪声已经越来越稀了。我在那儿钓过好几次梭鱼的磨坊桥已经在望。车夫突然欠了欠身，挥起鞭子来……马儿撒腿便跑，我们沿着河岸飞也似地往前跑去，将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和达莎阿姨远远地抛在后面了。

这大約是流弹，打在灵車的车輪上，頓時木屑四散飞迸，一块木屑正落在我的脸上。我用手扶着的一根雕花車桩松动了起来，吱吱軋軋地响个不停，突然間，一次猛烈的顛簸，車桩便掉到路上去了。我听见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在后面叫喊，达莎阿姨用哭泣的声音在叫罵。

車伕往下拉了拉小帽，举起鞭子在头上搖着，赶着馬直往桥上跑，仿佛沒有看見桥头已被一堆木梁，木板，磚头堵塞住了似的。說时迟，那时快！馬兒被挡住了，它左冲右突地掙扎了几下，最后终于停下来了。

从木堆后面跑出一群人來，我認識其中一个排字工人。去年夏天，他曾經租过我們邻院算命女人的房間。他拿着一支步枪，穿着普通大衣，大衣外面系着一根样兒十分奇特的皮帶，皮帶上插着左輪枪。他們都有武器，有的还佩带着馬刀。

車伕下了車，扯了扯长衫，将馬鞭插在皮靴筒里，破口罵道：

“难道你們沒有看見人家在出殯嗎？差点兒把馬打死了！”

“我們沒有放枪呀，你是碰上士官生了，”排字工人辯解道。
“你这个傻瓜，难道你沒有看見障碍物嗎？”

“你姓什么？”車伕嚷道。“你答复我吧！誰出錢修理？”他繞着灵車轉了几圈，一面摸着被打坏了的地方。“你們把我的車輻也打断了！”

“傻瓜，”排字工人又說道，“不是告訴了你，不是我們放的枪，我們朝棺材放枪干嗎？傻瓜！”

“孩子，葬的是誰呀？”一个戴着毛皮帽，帽上束着一條紅絛帶当帽徽用的中年人輕声問我道。

“母亲，”我很吃力地回答道。

他摘下了毛皮帽，向大家招呼道：

“同志們，安靜些，這是出殯的。是一個小孩送母親安葬。總之這樣不大好。”

大家看了看我。大概當時我的臉色不太好，因為等一切都弄妥當了，達莎阿姨哭喊着追上我們，我們一塊兒穿過磨坊往橋上走的時候，我發現在我的小手袋里多了兩塊白糖和一片白麵包。

安葬以後，我們順着沙河彼岸疲憊不堪地回到家中。

這時城里火光沖天，是紅色雅爾斯克團的營房在燃燒。司考伏羅得尼可夫老头兒在浮橋邊和一個他認識的守兵打了個招呼，便刺刺不休地談起來。他們談的什麼我一點也不了解：某個地方的道路被誰破壞了，一個騎兵軍正向彼得格勒挺進，車站被敢死營佔領了。“克倫斯基”的名字不斷地提到。我強打起精神站着，達莎阿姨不停地呻吟和嘆息。

我們回來時，妹妹已經睡着了。我沒有脫衣服，靠着她在床上。

不知道為什麼，只留下我和妹妹兩個人的第一個夜晚，達莎阿姨卻沒有住在我們家里。她給我送來了稀飯，但是我並不想吃，因此她就把盤子放在窗台上了。放在窗台上，不是放在早晨媽媽躺過的桌子上。那是早晨，可是現在是夜晚啊。薩尼亞睡在媽媽的床上，就是那天媽媽額上放了一個聖象，手里拿着“路簽”躺過的床上。那時我還不知道這一卷成筒狀的紙就叫路簽。

我起身走到窗前。院子里一片漆黑，可是河上却被火光映得通紅，一股股黑煙夾着火苗升起來又熄滅了。

營房還在燃燒，不過它們在鐵路後面，離我們很遠，完全是在另一邊！我回想起母親怎樣拉着我的手，搖著頭，竭力忍着不哭的情形。我為什麼一句話也沒對她說呢？她當時是那么迫切

地等待着我，哪怕是說一个字也好哇。

外面大概是起风了，河里的小石子不断地滾到岸上来，雨也落起来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什么也不想，只注視着那沉重的大雨点沿着玻璃往下流，开始是慢慢地，后来就愈流愈快了。

我梦中覺得有人推开門，跑进屋子里来，脫下大衣扔在地板上。我一下子沒有觉察到这根本不是梦。原来是繼父正在滿屋乱轉，一边走一边脫去身上的制服。他呲牙咧嘴地往下脫，可是衣服粘在背上很不容易脫下来。他只穿了一条褲子，光着身子跑到他的箱子跟前，从里面掏出了一个背包来。

“彼得·伊万內奇！”

他瞟了我一眼，什么也沒回答。他渾身毛茸茸的，一身臭汗，匆匆忙忙把衣服从箱子里拿出来装到背包里去。他把被子卷起来，用一只膝盖压着捆上一条皮带。两片嘴唇不时恶狠狠地咧开，因此可以看見两排咬得紧紧的牙齿，又长又大，簡直是滿口獠牙。

他往身上一共穿了三件制服，第四件放在背包里。他大約是忘了我沒有睡着，要不然他从挂衣釘上将媽媽的天鵝絨上衣取下来放进背包里时，大概也会感到于心有愧的。

“彼得·伊万內奇！”

“住嘴！”他把头一揚，說道。“見他媽的鬼！”

他換好了鞋，穿上了大衣，突然看見袖子上的骷髏头和脛骨。他連咒帶罵地又脫下大衣，用牙齿撕起骷髏头和脛骨来。他把背包背在肩上就跑了；从此一去十年，我沒有再見到这个人！他只是在地板上留下了一些污秽的痕迹，以及他用来装袖釦和花別針的一个“酸羊乳”牌空白鉄烟筒。

这一切到第二天就真相大白了。革命軍事委员会宣布在城

里建立苏维埃政权。敢死营和义勇军起来反对，最后都被打垮了。

14 逃跑。我没有睡，我假装在睡

不知道彼其加从哪儿听来的，说现在所有的铁路都可以免费乘车了。大概是免费坐电车的流言传到他的耳朵里，就被渲染成这样了。

“成年人需要护照，”他确切地说道。“但是我们什么也不需要。”

他再也不沉默了。他劝我，刺激我，责备我胆小，轻蔑地嘲笑我。人世間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会使他的信心增强，使他深信我们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应该插翅飞到土耳其斯坦去。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已公开宣布自己是布尔什维克，并且吩咐达莎阿姨把圣象拿掉。彼其加又马上把这件事向他认为有利的一方面去解释，并且证明说，反正现在全院的人谁都不会有房子住了。

“老娘儿们恨不得咬他的肉，”他黯然说道。“我现在真替他担心。”

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捣毁所有的烧锅^①，把酒倒到沙河里去。这件事似乎也有助于我们的计划。

“非把鱼全给醉死不可，”彼其加象个大人似的冷冷说道，“反正是一样，逼着大家自己酿私酒呗。不行，应该走！”

如果达莎阿姨和司考伏罗得尼可夫不在家庭会议上决定把我和妹妹萨尼亚送到保育院去的话，我自己也不知道彼其加最

^① 土法酿酒的作坊。——译者注。

后是否能說服我。达莎阿姨很能干，縫衬衫，作灯罩，样样都行。但是現在誰还要她的灯罩呢？在改嫁司考伏罗得尼可夫时，她可能还指望改善一下自己的經濟状况。但是現在老头兒一心去搞政治活动，連自己的万能胶都放弃了，因此生活便干脆沒有着落了。

她含着眼泪說，以后每天都要去保育院看我們，只送我們去住一个冬天，等到夏天一定接回来。保育院里管吃管穿，还教我們念書。每人发一双新皮靴，两件衬衫，一件带帽子的大衣，还有袜子和衬褲。記得当时我还問过她：

“衬褲是什么？”

我們認識保育院里的一些孩子。他們个个脸色蒼白，穿着灰色夹克和皺得一塌糊塗的灰色褲子。他們善于用弹弓打鳥，然后在保育院花园里把打来的鳥燒熟大家分着吃。这也就是保育院里的所謂“管吃”！总之，他們都是些“小犯人”，我們还同他們打过架。現在，要我也去当“小犯人”嗎？

因此，当天我就去告訴了彼其加，說我同意他的計劃。我們的錢很少，只有十个卢布。我們把母亲的皮鞋拿到破烂市上卖了十个卢布。一共是二十个卢布。我們十分小心地把被子从家里偷出来，但又同样小心地把它送了回去，因為我們要的价錢虽然很低，好象只要了四个半卢布，可是誰也不买。當我們抱着被子在市場上兜售时，不多不少又吃了四个半卢布。因此一共只剩下十五个半卢布了。

彼其加还打算拍卖他的旧書。幸亏沒有人买。我之所以說“幸亏”，是因为現在这些書都擺在我的藏書室里最显著的地方。不过有一本書，大約是“尤里·米罗斯拉夫斯基”还是卖掉了。因此一共有十六个卢布。

我們認為這些錢足夠到達叔叔那兒。到那時候，就將開始最有趣兒，最奇妙的火車生活了。記得當時最令我們焦灼不安和引起許多爭論的便是武裝問題。彼其加有把芬蘭刀，他管這把刀叫作匕首。我們用舊皮靴給匕首縫了個皮套。但是只攜帶一件不能開火的武器上路，這未免太不夠味兒了。到哪兒去弄一支手槍呢？

我們曾一度希望革命軍事委員會發給我們每人一支左輪槍。後來我們斷定大概不會給了，便到破爛市上去。說不定會有逃兵把武器賣給我們？

我們尋找了很久，終於找到了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這是一支雕花木柄的大五輪手槍。的確是五輪的，我一點也沒說錯。五膛可以同時裝彈，每射擊一發，就得用手將槍輪轉動一次。毫無疑問，這是世界上最原始的手槍之一。後來我在博物館里曾經看到過這樣的手槍。但是，當時我們非常喜歡這支槍。正因為是五個槍膛，才使我們感到稀奇。用這傢伙打響才過癮哩！賣這支手槍的不是逃兵，而是一位老將軍夫人，這一點也是使我們肅然起敬的。總之一句話，要不是在我們去取錢的當兒，將軍夫人和她的手槍一塊兒不見了的話，那麼我們的十六個盧布最後恐怕連三個半盧布也剩不下。

現在我才認識到，我們畢竟還是走運的。如果我們要真買了這件武器，並且拿它來試驗試驗的話（我們連火藥都準備好了），那麼，恐怕我們所走的路綫就不会是恩斯克——莫斯科——塔什干，而是從我們家里徑直走進斯巴塞墓場里去了。

這樣一來，我們就決定只用不能開火的武器了。

其餘的一切事都完全辦好了：皮鞋很結實，大衣完整無損，彼其加的大衣甚至还帶着海狸皮的領子，每人兩條褲子。

我在这一天很难过，达莎阿姨安慰了我好几次。可怜的达莎阿姨！要是她知道，我們之所以延期出走，只不过是盘算她的烤餅时，她該怎样难过呀！明天，她就要送我和薩尼亚到保育院去了，因此她整天都在作烤餅，給我們带去吃。她烤了整整一天，不断地摘眼鏡，不断地擤鼻涕。

她要我遵守許多清規戒律：不偷东西，不抽烟，不撞祸，不偷懶，不酗酒，不罵人，不打架，簡直比新旧約全書中的戒律还要多。妹妹这时也十分忧郁，达莎阿姨送給她一条非常漂亮的，古色古香的絲帶。

自然，我們这次完全可以直接了当地从家里跑掉，溜之大吉。可是彼其加却認為这太不够味兒了，因此他制訂了一个相当复杂的，神秘得使我大为惊异的計劃。

第一，我們必須进行一次“友誼的歃血盟誓”。誓言如下：

“誰若违背这个神圣的誓言，除非是他能数清海里有多少沙粒，森林里有多少树叶，天上落下多少雨点兒，他永远也不会得到寬恕。要想往前，咒他向后；想要向左，咒他向右。誰若是破坏这个誓言，只要我把帽子往地上一摔，他立遭五雷击頂。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我們依次讀完了誓詞，互相握握手，随即把帽子摔在地上。这一切手續是出走的前一天在教堂花园里作的。誓詞我是背的，彼其加是照着紙上抄的念的。然后他用別針将手指刺破，蘸着血在紙上签了“彼·司”两个字，意思就是“彼得·司考伏罗得尼可夫”。我費了很大的劲才塗上了“亚·格”两个字，意思就是“亚历山大·格利高里耶夫”。

第二，我必須在十点鐘的时候躺下假装睡觉。其实，我是真睡还是假睡，这一点誰也不会感觉兴趣。到深夜三点鐘的时候，

彼其加應該在窗下吹三声口哨。这是約定的暗号，意思是一切都妥当了，路上通行无阻，可以逃跑。

我們这样一搞，倒比在白天逃跑危险多了；因为白天才真是一切妥当，路上通行无阻，而且誰也不会发觉我們逃跑了。同时，这时城市正处于戒严状态，警犬都松了鍊子，放在河边一带，夜間我們就很可能被巡夜的抓住。但是既然彼其加这样命令，我也就只好服从。这天晚上来到了，这是我在自己家里度过的最后的一个晚上。

达莎阿姨坐在桌边給我补衬衣。保育院虽然也发內衣，但总还是多带一件以防万一的好！在她面前点着一盞灯，灯上盖着天蓝色的灯罩，这是媽媽結婚时达莎阿姨送的礼物。現在連这个灯罩也显露出一副局促不安的样子，——仿佛它在我們空蕩蕩的家中也不好受似的。屋角上黑洞洞的，茶壺挂在爐板上，可是照出来的影子却不象茶壺，倒象是什么人的一个倒悬的大鼻子。一股清新凉气从窗戶下的縫隙中透进来，令人聞到了河上的气息。达莎阿姨边說边縫。在她伸手到桌上拿东西的时候，天花板上的光圈也就随着开始顫动起来。十点了。我开始假装睡覺。

“薩尼亚，你可要記住，什么事都得听哥哥的話，”达莎阿姨向妹妹說道。“你是个姑娘，應該依靠他。我們向来都是依靠男人的力量。他决不会讓你吃亏。”

我心里很难过，但是我尽量不去想薩尼亚。我是想我們到达莫斯科了！彼其加的叔叔在車站上接我們。他和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兒很相象，只是年輕一些，活泼一些。机車停在很远的綫路上，一个烏黑的人正往鍋爐里加煤，火星从烟囪里冒出来，接着又熄灭了。我們疾馳前进，树木在一傍閃过，電話綫一起一伏地波动着。現在是我和彼其加在往鍋爐里加煤，热烘烘

的，快活得很；要是探头往車外一看，风就在耳边呼呼地响。

“你呢，薩尼亚，”达莎阿姨对我說，这时我看見眼泪从她眼鏡后面流下来，落到我的衬衣上，“也要爱护妹妹。你們将被分在不同的班里，不过我去請求他們准許你每天去看她。”

“好吧！达莎阿姨。”

“主啊，我的上帝！要是阿克西尼亚还活着該多好……”

她剔了剔油灯，穿上綫，叹了一口气，又开始工作了。

十点半了。我沒有睡，我假装在睡。我看見一片白花盛开的果树，在树蔭下，在朵朵鮮花的下面，鋪着蓝色的，綠色的，淡青色的地毯。我們到了土耳其斯坦了。滿街都是橘子树。我們动手摘起橘子来，开始时只是偷偷地摘，往后胆子就愈来愈大了。沒有地方可以再装了，彼其加就从袋子里掏出两条备用的褲子来。他把褲口扎住，就往褲管里扔。有一个长鬍子老头兒把我們領到一間白色的小屋里去。墙上挂着各式武器——匕首，五輪手枪，鍍銀馬刀。“好嗎？”他問我們道，并且請我們每人选一柄匕首，一支手枪和一把馬刀。

“他們还能教会你們念書，写字，”我在睡梦中听到达莎阿姨在說話，心想：“她怎么会在这兒呢？”“說不定你还能作出一番大事业来。也許你还要来感謝我們啦。”

我沒有睡，我假装在睡！十一点半，十二点。达莎阿姨站了起来。这是我最后一次，最最后的一次看她那被灯光从下面照耀着的慈祥的面容了。她用手遮着灯罩，用口一吹，屋子里頓時漆黑了！她在黑暗中，为我們画了个十字就躺下了；她今天睡在我們家里。

不想睡觉而又假装睡觉的滋味多好哇！我使劲睜着眼睛。几点鐘了？到三点鐘还早着哩。河上飘来醉汉的歌声。河里的

小石子兒不断地冲到岸上来。可是总听不見暗号的声音，只有滴答滴答均匀的鐘摆声，以及达莎阿姨唉声叹气，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的声音。

我恐怕真的睡着，便坐起来，将头放在膝盖上。我假装在睡觉。可是，这么一来，等我听见哨声时却怎样也醒不来了。

后来彼其加告訴我說，待我听到口哨声时，他簡直象茨崗人一样嗓子都吹哑了。但是在我穿鞋，穿大衣，往口袋里放烤餅的工夫，他一直在打口哨。他的样子很生气，莫名其妙地命令我把大衣領子提起来，我們就这样逃跑了。

一切經過都十分理想。誰也沒有来找我們的麻煩，既沒有碰到狗，也沒有遇見人。不过，为防万一起見，我們沿着城墙多繞了三維尔斯特^①的路。路上我試探着問彼其加，他有沒有把握肯定現在所有的鐵路都可以免費乘車。他回答說是有把握，万一不行，我們可以躲在凳子下面坐到莫斯科。蹲两夜，就能到莫斯科，快車五点四十由这兒开出。

我們繞过崗哨，在距車站半維尔斯特的地方跳过栅栏，到五点四十分鐘的时候，站上却什么車也沒有。黑黝黝的，潮湿的鉄軌暗淡地发着光，搬道机上黃色的灯光暗淡地閃耀着。怎么办呢？在車站呆一夜嗎？不行：可能被崗哨抓走。回家嗎？

就在这时，一个滿面鬍髭，渾身上下沾滿了机器油的接鈎工人从一列貨車下面爬出来，踏着枕木朝我們走来。

“大叔，”彼其加鼓起勇气，問他道，“从这兒去莫斯科怎样走——向左还是向右？”

接鈎工人看看他，又回头看看我。我不禁凉了半截，心想：“糟糕，他要送我們到軍事代表那兒去了。”

^① 維尔斯特系俄里名称，一維尔斯特等于1.067公里。——譯者注。

“小家伙，上莫斯科去有五百维尔斯特呐。”

“大叔，你只要说，是往右还是往左吧？”

接钩工人笑了起来。

“往左去。”

“谢谢您，大叔。萨尼亚，往左走吧！”

15 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凡是躲在车座下面，几个月都不洗一次脸的十一、二岁的小旅行家所作的旅行，一般说来都是大同小异的。只要你看几本描写流浪儿生活的书，就很容易相信这一点。因此我不准备来描写我们自恩斯克到莫斯科旅行的情形了。

达莎阿姨的七条戒律很快就被忘得一干二净。我们骂人，打架，抽烟，有时为了暖和一下身子，竟连干马粪也抽过。我们还撒谎：一会儿说我们的姑姑去奥伦堡买盐时，在路上把我们丢掉了，一会儿又说我们是去莫斯科投靠奶奶的难民。我们假装是两兄弟，这一着特别能感动人。我们不会唱歌，但我在火车上朗诵过远洋航海长的一封信。记得有一次在维什尼·瓦洛乔克车站，一个头发斑白，面貌却很年轻的海员还硬要我把这封信重背了两遍。

“真奇怪，”他用严峻的灰色眼睛直盯着我的脸，说道，“中尉塞多夫的探险队？真奇怪。”

但我们毕竟还没有沦落为流浪儿。我们象阿特拉斯船长一样不断前进（关于阿特拉斯船长的故事，彼其加对我讲得那么详尽，就连儒勒·凡尔纳^①本人也要点头称是）。我们前进，不只

是因为土耳其斯坦有面包，这儿没有；我们前进，是为了去发现一个新的国度——阳光普照的城市，自由的乐园。因为我们是彼此起了誓的。

这个誓言对我们起了多大的作用啊！

有一次快到旧露斯城时，我们走错了路，在森林中迷失了方向。我躺在雪地上闭着眼睛。彼其加用狼来吓唬我，骂我，甚至打我，但都不起作用。我一步也迈不动了。这时，他摘下帽子往雪地上一摔。

“萨尼卡，你是发过誓的，”他说道，“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么说，你现在甘心当一个违背誓言的人了？你自己说的——违背誓言的人永远得不到宽恕。”

我哭了，但还是站了起来。到了深夜我们才走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里的人是信奉旧教的，不过有一个老婆婆还是收留了我们，给我们吃饭，甚至还给我们洗了一次澡。

就这样我们从一个村庄到一个村庄，从一个车站到一个车站，终于辗转来到了莫斯科。

一路上我们将自恩斯克带出来的东西差不多全部卖光，换光，吃光了。甚至连彼其加那柄用旧皮靴作的刀鞘套着的匕首也卖掉了，记得就只换了两块肉冻。

只有彼其加叔叔的地址，和我们用血签着“彼·司”及“亚·格”的宣誓书没有卖掉。

叔叔！我和彼其加谈他谈得太多了！最后，他在我的想象中成了一个机车神：胡须迎风飘着。烟囱里吐散着浓烟，水蒸汽从锅炉里向外喷射……

① 儒勒·凡尔纳(1828—1905)，著名的法国科学幻想小说作家。阿特拉斯是他著的“阿特拉斯船长历险记”一书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终于到了莫斯科！在二月里一个严寒的夜晚，我们蹲在火车的厕所里挨过了最后的一站路，就从厕所的窗户外爬出来，跳到轨道上。这时一片漆黑，根本看不见莫斯科城是什么样子，其实我们对莫斯科也不感兴趣，它只不过就是莫斯科罢了，而叔叔却在莫斯科商业区第七机务段修车厂。我们在枕木间瞎转了两个钟头，交叉的路轨时而分开，时而汇合，把我们弄得晕头转向。天快亮了，我们才找到第七机务段，这是一座阴森森的建筑物，有着许多黑洞洞的椭圆窗子，一扇高大的拱门，门上挂着一把大锁。叔叔不在，甚至找不着人打听他的消息。到了早上，我们才从第七机务段委员会打听到他已经上前线去了。

一切都完了！我们走出来坐在煤台上。

永别了，那长满橘树的街市！永别了，那可以露宿的夜晚！永别了，腰刀和镀银的弯马刀！

彼其加为了碰碰运气，又回到段务委员会去问叔叔结婚了没有。没有，叔叔是个单身汉。原来他从前住在车厢里，后来也就随着这个车厢上前线去了。

天色已经大亮，现在可以看清楚莫斯科了：房子，成片的房子（我还以为这些都是车站哩），巨大的雪堆，稀稀落落的电车。再看又是房子，接连不断的房子。

怎么办呢？

最糟糕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在这个期间，我们什么活儿都干过！我们在配给食物的行列中值过班。因为当时国家颁布了“义务劳动”法令，所以我们便被有钱的人雇去代他们清扫屋前便道上的积雪。我们打扫过教堂马厩里的马粪。我们曾经在门洞里，墓地上，顶楼上过夜。

突然间一切都变了样……

她是个胖婆娘，瞪着两只大眼睛，走起路来肚子不住地颤动，常常到我們包装食品的庫房里来檢查，看东西是否完整无损。

“呀呸！呀呸！你們怎么敢这样作！”

不管敢不敢吧，可是实际上，这活儿做起来可并不那么简单，譬如称猪油时，連一小块也不准碰掉。方块糖常常会自己跑进衣袖和口袋里。但我們总还是忍耐着不动这些东西。嘿！如果我們早知道，反正我們看不到土耳其斯坦，就好象人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那么这老妖婆大概就会发现东西不够数了！

有一次，——这时我們在这个窩里工作已經两个多月了，——她只穿了一件罩衫跑来，手里拿着夜間鎖庫房的鎖，瞪着两只眼睛停在門口，东張西望，臉色惨白。

“不要打，也不要敲，”她低声說道，急忙把头抱住。“別叫嚷！不要作声！”

我們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只听见她沉重地喘着气，将庫房門插上門，挂上鎖，就走了。

这件事来得这么突兀，所以我們起初也真的一声沒有响。后来，彼其加忍不住叫罵起来，躺下睡在地板上。我也跟着躺下去。因为庫房門下面有一条窄縫，我們开始向外張望起来。

起初，外面一点儿声音也沒有；院子里空蕩蕩的，逐渐融化的雪地上留着一些积存着水的黄色脚印。后来，出現了许多穿着結实的黑靴子的生人：一双，两双，三双。这些脚穿过院子向厢房走去。其中的两双脚不見了，第三双脚站在台阶上，脚旁垂着枪托。

“抓人！”彼其加悄声說道，立即跳了起来。

黑暗中他的头撞了我一下，我把舌头咬痛了。但这时已經顾不得舌头了！

“應該逃跑！……”

如果這次我們帶了繩子的話，說不定我的生活會循着完全另外一個途徑演變。庫房里的繩子有的是，但我們上了頂樓以後，才想起繩子來。庫房是石頭砌的，上面有頂樓，屋頂只有一個斜面，後牆上有一個向鄰院开着的小窗口。

彼其加把頭探到窗口外面，向周圍看了看。當我們在黑暗中摸索着打開天花板的板蓋時，彼其加不小心擦破了臉頰，這時他不斷地用拳頭去抹血。

“跳下去怎麼樣？”

不過要在五六公尺高，光溜溜的牆壁上，從一個不大的窗口里往外跳並不那麼容易，這和往水里跳不同，那只消將頭朝下就行了。而現在卻要將兩隻腳先伸出去，坐好，使勁彎腰，再全身向後一挺，就落下去了。彼其加照這樣作了。當我還在考慮是否要回去取一根繩子的时候，他已坐在小窗口上了，他扭不過頭來，只說道：

“沒有關係，薩尼亞，膽大一點兒。”

接着他就不見了。我的心象掉下去了一樣，趕忙跟過去，目送着他掉下去。沒有什麼，籬笆在這個地方正好距倉庫很近，他幸運地落在籬笆那邊一堆潮濕的雪上了。

“跳呀！”

我爬出窗口，把腿彎起來坐下。鄰院的一切現在都一覽無遺：一個小姑娘順着古老的圓柱房子在滑芬蘭式的小雪橇，一隻烏鴉栖在排水管上。小姑娘停下來，好奇地看了看我們。烏鴉也看了看我們，但漠不關心地又掉過頭，把頭縮在翅膀下面了。

“跳呀！”

院子里除了小姑娘和烏鴉以外還有一個穿皮大衣的人。他

站在我們的廂房和另一家人的院子相連的地方。我看着他抽完了烟，扔掉烟头，便稳稳当当地向我們走来。

“跳呀！”彼其加着急地叫道。

我用两只手往后面輕輕地一推，周围的一切突然都动了起来。烏鴉振了振翅膀飞走了，小姑娘吓得往后打了个倒退，彼其加仓皇地向門外冲，穿皮大衣的人紧跟在他后面追。在这一霎那間，我全明白了。但是已經晚了，我飞一般地落下来了。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飞行，从五公尺的高处不用降落伞垂直下来的。我不能說这次飞行很成功。我的胸脯撞在篱笆上，刚一爬起来又跌倒了。我最后看到的情景是彼其加連蹦帶跳地逃到了大街上去，砰地一声将篱笆門关上，险些兒碰着穿皮大衣的人的鼻子。

17 閑扯淡

既然我們什么錯誤也沒有犯而要逃跑，这自然是非常愚蠢的举动。我們自己並沒有投机倒把，只不过是奸商家里干活兒。所以他們不会把我們怎样，頂多过过堂就放了。但是現在后悔已經晚了。穿皮大衣的人将我的手牢牢地抓住，我們这是往哪兒去，大概是进監獄吧。我虽然被捉住，可是彼其加却逃掉了。現在就剩下了我孤孤单单一个人。太阳西沉，眼看已是傍晚了，寒鴉在沿斯特拉斯大道的树木上空緩緩飞翔……虽然我沒有哭，但看脸色大概很泄气，所以那个穿皮大衣的人把我仔細打量了一番之后，就将手松开了：他知道我不会逃跑。

他将我带到了尼基塔門一座大廈，走进六层楼上一間寬敞

而明亮的大厅里。这是人民教育委员会的收容所，我在这兒度过了最值得紀念的三天……

当我看到屋里这些冻成了紫紅色的脸孔时，我的心都沉下去了。有些人蹲在泥爐旁边玩牌，有些人正在从很高的窗戶上拆窗櫺木，拆下来立刻就投到火爐里去，还有几个人在睡覺，另有一些人却在用屋角上乱七八糟堆着的一些旧画框和旧画布搭房子。等到夜間，当收容所里比室外还冷时，这些房主就生着汽爐，收容那些願意进屋子里来的人；有的以两支烟卷作报酬，有的以一块面包为代价……在这間乱七八糟的房子中間，几个高高的台座上屹立着希腊神阿波罗，狄安娜，赫拉克勒斯的石膏象，他們用白色的盲人般的眼睛冷漠地凝視着。

只有这些希腊神的脸孔还象人脸。天亮以前，我冻醒了，牙齿不住地打战，我畏怯地不时瞧瞧神象。也許他們正在这样想：“傻瓜，唉，你这傻瓜！干嗎要从家里逃出来呢？你想想吧，住保育院春天就能回去，就可以帮帮家里老人們的忙，工作也能找到啊！可是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人了，你若是死了，誰也不会去想你的。只有彼其加踏遍莫斯科在找你，还有达莎阿姨沉重的叹息而已！老弟，还是請求发給衣服，快点飞回家去吧！”这时人民教育委员会里正在換衣服，把旧的烧掉，另发給衬褲和衬衣。許多流浪兒故意混进来，借机会把破烂的衣服換掉。

整整三天，我沒有說話。这对于一个才学会說話不久的兒童說来是一点也不困难的。而且去和誰說呢？每次送新的流浪兒进来时，我不由得就要看看其中有沒有我的彼其加。沒有。沒有也好！我坐在一旁，一句話也不說。

由于飢餓，寒冷和寂寞，我开始玩起泥人来了。在这間过去的繪画雕刻室里，有很多造型用的白色粘土。有一次，我拿了一

块来用开水泡开，放在手里捏来捏去。不知不觉忽然捏成了一只癞蛤蟆，我给它作了两个大鼻孔，和两只鼓出的眼睛。随后我又试着塑兔子。自然这个塑象作得还很不好。但当我猛然看到用这团不成形的粘土作成双叉的小兽头时，一个念头在我思想里闪了一下。我牢牢地记住了这一霎那：这时谁也没有看见我在玩泥，一个不知走了什么运才落到收容所里来的惯贼，正津津有味地讲他们怎样在车站上搞双人配合。我靠着窗子站着，屏住呼吸，看着这一小团翘起两个兔耳的泥块，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感到十分激动……

后来，我又塑成了一匹鬃毛很粗但梳得整整齐齐的马儿。“闲扯淡”！啊，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儿的马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闲扯淡”，不过这是用粘土而不是用木头作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新的发现使我高兴。我愉快地睡着了。我好像是期望着“闲扯淡”能拯救我，保佑我离开此地，帮助我找到彼其加，帮助我回到家里去，帮助他到土耳其斯坦。帮助在保育院里的妹妹，在火綫上的彼其加的叔叔，帮助那些夜晚还徘徊在飢寒交迫的莫斯科街头上的人们。我这样祈祷着，不是向上帝祈祷！不是！我是向用一张破报纸遮盖着放在窗台上晒干的癞蛤蟆，马和兔子祈祷。

要是换另外一个小孩，不是象我这样不信神的人，也许就会成为一个偶像崇拜者，永远信奉癞蛤蟆，马和兔子。因为它们帮助了我！

第二天，人民教育委员会的一个工作组到收容所里来了，于是收容所从此永远取消了。

盗犯被送进了监狱，无业游民送到了移民大队，乞丐就被遣散了。在绘画雕刻室这间宽敞的大厅里现在只留下阿波罗，狄

安娜，赫拉克勒斯几个希腊神象了。

“这是什么？”工作组的一个委员问道。这个委员大家简称他作舒拉，是一个头发乱蓬蓬的，鬍子也不刮的青年。“伊万·安德烈耶维奇，您看多好的塑象啊！”

伊万·安德烈耶维奇也是一个头发乱蓬蓬的，不刮鬍子的人，只不过年龄大一些。他戴上夹鼻眼镜，仔细研究起“閑扯淡”来了。

“典型的，谢尔吉耶夫镇的俄罗斯小玩意儿，”他说道，“有趣。这是谁作的？是你吗？”

“是我。”

“你姓什么？”

“格利高里耶夫·亚历山大。”

“想学习吗？”

我瞧着他没有回答。几个月来饥寒交迫的街头流浪生活大概把我折磨得够呛，所以这时我的脸孔突然歪歪扭扭的变了相，眼泪，鼻涕一齐都流出来了。

“他想学习，”舒拉委员说道，“我们把他往哪儿送呢？伊万·安德烈耶维奇。”

“我看，把他送给尼古拉·安东内奇吧，”那人回答道，一面小心翼翼地把我的兔子放回窗台上。

“对！尼古拉·安东内奇是重艺术的。喂，格利高里耶夫·亚历山大，你愿意去尼古拉·安东内奇那儿吗？”

“舒拉，他还不认识尼古拉·安东内奇啦。最好记下来。格利高里耶夫·亚历山大……你几岁了？”

“十一岁。”

我多说了半岁。

“十一岁。写上了嗎？送到塔塔林諾夫那兒，到第四学校公社去。”

18 尼古拉·安东內奇

人民教育委员会一位有点兒象达莎阿姨的胖姑娘，把我一个人留在一間半暗的走廊形的屋子里，說是一會兒就回来，便走开了。这是衣帽間。空空的衣架仿佛是一些头上生角的瘦子，停立在敞开的衣櫥中。順着墙全是一扇一扇的門。其中有一扇是玻璃門。自从离开恩斯克以后我还是第一次看見自己。竟然成了这样一副模样兒呀！一个脸色蒼白，圓脑袋上的头发剪得精光的小孩垂头丧气地望着我，他的个兒很小很小，比起我自己所想象的来瘦小得多。溜尖的鼻子，綳紧的嘴唇！在人民教育委员会的澡堂里，虽然他們用搓澡石給我擦洗过一次，但身上有些地方还留着斑斑点点的污垢。制服肥大得可以在我身上再繞一周，褲子长得拖到大皮靴下，每走一步路，脚都会滑到皮靴外面来。

胖姑娘回来了，我們便到尼古拉·安东內奇那兒去。这是一个脸色蒼白的胖子，秃头頂上几根稀疏的头发往后梳着。口里鑲有一顆金牙，閃閃发光，由于我的老毛病，所以一发现这顆金牙，就目不轉睛地对着它看起来。

我們等了相当久，因为尼古拉·安东內奇有事。他正在和一群十六岁上下的孩子談話，孩子們把他团团围住，爭先恐后地搶着說什么事。他一边听他們談話，一面活动着肥大的手指，我覺得这些手指很象一种毛虫——大概是卷心叶虫。他的样兒是那么不慌不忙，謙虛忠厚，神气十足……

“孩子們，安靜點，別一塊兒說，”尼古拉·安東內奇說道。
“喂，依果，你先說吧。”

他站起來，擁抱了一個戴眼鏡的黑皮膚的小孩，這個小孩長着鬚曲的頭髮，紅潤的臉龐，頰上和鼻子下面長着黑黑的汗毛。

“尼古拉·安東內奇，”依果的臉一紅，鄭重地說道。“我們向列多夫實科中學提出抗議。我們決定參加十三聯合社，同時提出抗議。要是伙食標準不變而成員卻增加，這還成一個什麼公社？柯拉布略夫說這次鬥爭是為了稀飯。但是，我們卻認為這是原則問題。如果我們代表公社，那麼，我們就應該自己決定是不是吸收新社員。列多夫實科中學我們不能吸收。與其這樣，那我們還不如吸收柏爾若佐夫斯卡雅女子中學。”

他說得那樣激昂慷慨，僅僅在大家哄笑時，他才略微停頓一會兒。

“總而言之，我們堅決抗議柯拉布略夫的誣蔑，並且要求把這個問題提到校務委員會上去。”

“那你們就會成為少數了，”尼古拉·安東內奇反對說，同時向我們點了點頭。

我們走上前去。

“流浪兒嗎？”

“不是。”

“人民教育委員會送來的，”胖姑娘解釋說，一邊將介紹信放在桌上。

“格利高里耶夫，你是從哪兒來的？”尼古拉·安東內奇一面看着介紹信，一面使人深為感動地問道。

“從恩斯克。”

“怎麼會到莫斯科，到這兒來了呢？”

“路过，”我回答說。

“原来如此，亲爱的！那么，你是去哪兒呢？”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什么話也沒有說。人們这样問过我已經不下一百次了：你是誰？往哪兒去？

“好吧，我們以后再談。”尼古拉·安东內奇在人民教育委員會給我的介紹信反面写了几个字。“你不会逃跑嗎？”

我相信，我一定要逃跑的。但是为了慎重起見，还是說：

“不会。”

我們走了出来。走到門口，我又回头看了看。依果一脸不耐煩的輕蔑的神情，在等待着我們談話結束，他很快地說着什么話，但是尼古拉·安东內奇沒有听他說話，只是若有所思地目送着我走出来。他在想什么呢？不过有一点可以相信：他万万沒有想到命运之神会附在这个滿头污垢，脚上穿着一双大得不着边兒的大皮靴，細瘦的脖子伸在制服外面的，面黃肌瘦的小孩身上；就在这一天，厄运降临到他头上来了。



第二部 應該好好想一想

1 听講故事

我什麼打算也沒有，一心只惦着：“等到春暖立刻就走”。待严寒的冬天过去便远走高飞，兒童教养院里从此休想再見到我的影兒了！但是結果却完全兩樣，我並沒有逃跑。讀書這事把我留住了……

我們每天早晨去面包房取面包，然後學習。雖然我們當中某些人按年齡來說已經該上六年級了，可是我們還算是一年級。

教我們的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女教師塞拉菲瑪·彼得羅芙娜。她到學校來時，肩上總是挂着一個背包……說老實話，我甚至很難說出她究竟教了我們些什麼東西。

記得有一課講水鴨，一下子就連上了三門課：地理，自然和

俄語。上自然課時，把水鴨當作一只鴨子來研究：它的翅膀什麼樣兒，蹼掌什麼樣，它怎樣晃水等。上地理課時，就把水鴨當作地球上的一種生物來研究：要在地圖上指出什麼地方出產水鴨，什麼地方不出產。上俄語課時，塞拉菲瑪·彼得羅芙娜就教我們寫“水鴨”，並且念了布列姆^①描寫水鴨的作品。她順便告訴我們水鴨在德語中怎樣說，在法語中又怎樣說。似乎當時這就叫做“綜合教學法”。總之，一切都是出於“順便”。很可能是塞拉菲瑪·彼得羅芙娜把這種方法搞錯了。她是一個有些上了年紀的人，胸前用別針別着一個珍珠壳小懷表，所以我們回答問題時總是看幾點鐘了。

可是每天晚上她都讀書給我們聽。從她那兒我第一次聽到伊萬和阿辽露絲加的故事^②。

烈日高照，
水井迢迢，
溽暑熏蒸，
汗如雨澆。
在那羊兒站立的地方，
湧現出清水湯湯。

使我特別惊奇的是阿利·巴巴和四十大盜的故事。“開門吧！蛇山！”許多年以後，我讀了“一千零一夜”的新譯本，發現原來“蛇山”應該讀作“西姆—西姆”，並且這是一種什麼植物，大概是芝麻吧。這時我感到很掃興。蛇山——這是一個絕妙的富有魔力的詞兒。在我知道了這只不過是什麼芝麻的時候，我簡直

① 布列姆(1829—1884)，德國動物學家和旅行家。——譯者注。

② 伊萬和阿辽露絲加是俄國童話中的兄妹，被妖怪作弄，阿辽露絲加因耐不住飢渴飲了水，而變成了一只小羊。——譯者注。

失望极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我当时被这些故事深深地感动。我这时惟一的希望就是学会象塞拉菲瑪·彼得罗芙娜讀得那样好。

一般说来，我还很喜欢兒童教养院。这里面很暖和，不受风吹雨打，既管吃飯，还教給念書，并且不寂寞，最低限度是不太寂寞。同學們待我都很好，——大概因为我个兒矮小的关系。

一来这兒，我就結識了两个小流氓，所以我們从沒有讓空閑的时间白白过去。

我的一个新朋友名叫羅馬什卡。他是一个干瘦的小孩，頂着一个大脑袋，脑袋上长着乱蓬蓬的野猫般的黄头发。他的鼻子是扁的，眼睛圓得极不自然，下顎是四方形，——这实在是一副十分可怕的，令人看了不起好感的嘴脸。我和他是由于猜字謎的关系交了朋友；我猜字謎很准，他对我这一点佩服得五体投地。

另外一个瓦爾加·朱可夫。这是一个計劃非常多，而人却很懶惰的小孩。他一会儿想到动物园去学习馴獅子的本領，一会儿又想去干消防队。到了面包房就想作面包师，从戏院里出来就坚决要当一个演員。尽管如此，但他也有一些很精彩的想法。

“那么，如果……”他沉思地說道。

“如果把地球凿穿，从那一边鑽出来，”羅馬什卡接上去挖苦他说。

“那么，如果……”

“如果把一个活老鼠一口吞下去……”

瓦爾加很喜欢狗。公園凱旋路一带的狗对他都很亲暱。

但是，瓦爾加終究只是瓦爾加，羅馬什卡只不过是羅馬什

卡，他們兩個人比起彼其加來都差得太遠了。

我無法說出不和彼其加在一起時，我感到多麼的寂寞。

我走遍了從前我們流浪過的地方。我向許多流浪兒打聽過他，我在收容所，兒童教養院里值過班，可總是沒有找着他。他是不是躲到國際列車的哪一個箱子里，跑到土耳其斯坦去了呢？他是不是離開了飢餓的莫斯科徒步回家去了呢？誰知道他呢？

只有在現在，從日復一日飄泊的生活中我才認識和愛上了莫斯科。它是神秘而龐大的，被積雪蓋復着，被飢餓和戰火籠罩着的一座都市。廣場上挂有一幀地圖，在庫爾斯克和哈爾可夫之間逼近莫斯科的地方，有一根系有小旗的絲綫從這裡通過。攤販市場是長長一排低矮的，塗得花花綠綠的木板房子。未來派的藝術家在這些木板房的牆上畫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宣传畫，畫的是綠臉的人和塌了頂的教堂，在提維爾大街高大的圍牆上也裝飾着這類宣传畫。商店的玻璃窗上挂着俄羅斯通訊社的標語：

你吃吃鳳梨，

嚼嚼松雞！

你的末日到了，

資產階級！

這是我自個兒讀完的第一首詩。

2 學 校

我在前面似乎已經提到過，照人民教育委員會的意見，我們的兒童教養院相當於一個培養少年天才的地方。人民教育委員會認為，我們在音樂，美術，文學方面的天才是超乎常人的。因

而我們在課后想作什么就可以作什么。这样就算是我們在自由地发展我們的天才。我們也的确是在发展自己的天才。有的人到莫斯科河上去帮助消防队员从冰窟窿里捕鱼。还有的人跑到苏哈里^① 闲逛，瞅见主人不注意，就顺手牵羊摸点东西。

可是我呆在家里的时候越来越多了。我們住在学校下面，比他們低一层楼。因此整个学校生活的演变我都亲眼看见了。这是一种难以理解，神秘而又复杂的生活。我伙在一伙高年级同学中间，听他們谈话。接触到的是新的关系，新的思想和新的人物。这一切与在恩斯克迥然不同，正好象恩斯克之不同于莫斯科一般。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什么也不明白，不加分析地对一切都感到惊异。下面就是第四劳动学校给我留下的印象。

柏斯托夫中学不久前还在公园凱旋路一所紅色的大楼里。校内附設一个小小的兒童教养院，这就是我們的兒童教养院。公元一九一九年冬，柏斯托夫中学与列多夫实科中学合并，可是到了春天，又和柏尔若佐夫斯卡雅女子中学合并了。

諸位讀者沒有在革命前的中学里上过学，因此，毫無疑問，已經不記得中学生和实科中学学生之間那种相互蔑視的情形了。我不知道这种仇視的根源何在，但是，当我在恩斯克时，就听到一些有趣的傳聞，比方什么冰場上的激烈械斗，中学生是高貴的勇士，以及卑鄙的实科中学学生用人道所不容許的“鉛彈”作战等等。現在，我在莫斯科就亲眼看見了这一切。

柏斯托夫中学的学生是全莫斯科最不堪救藥的淘气鬼，——无怪乎被別的中学开除的学生都可以免試进这个学校。相

① 苏哈里是当时莫斯科摊販市場所在的地方。——譯者注。

反的在列多夫实科中学里学习的学生主要是高級官員、工程师、教育家們的有教养的子弟。因此，这种仇恨不仅由于学校的性質，而且是带有社会性的。待到人民教育委员会明令公布在这两家世仇中間放上一个柏尔若佐夫斯卡雅女子中学以后，这种仇恨更是倍上加倍了。

有多少相互爭吵，共同密謀，彼此誹謗的借口啊！有多少會議上的发言，多少解释的信件，又有多少明爭与暗斗啊！我們兒童教养院站在局外，誰也不注意我們。但是不难猜到，誰是我們心目中的英雄，那就是柏斯托夫的学生！我們連戴帽子都竭力模仿他們——向右边歪戴着。

后来第四学校公社出了不少著名的，受人尊敬的人物。我自己在許多方面都得感謝这个公社。不过在一九一九年，这簡直是一鍋稀飯！說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真正的稀飯来了——有时是玉米粥，有时是小麦粥，当时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列多夫学校的，也决定着柏斯托夫学校的利益。稀飯盛在一口大鍋里，包裹得严严实密的象个老太婆似的放在雪橇上运来，然后就連雪橇一块兒抬到礼堂里。代表經濟委员会的瓦蓮阿姨，——大家都这样称呼这位扎着一条粗大的辮子，面色紅潤的胖姑娘，——手里拿着一把大勺子，在案台后面走来走去。大家排好队，不論穿什么制服，不論年齡和出身，每人領一勺异常甘美，冒着泡的热气騰騰的稀飯。

发稀飯是在大休息^①的时候。因为当时上不上課都可以，所以整个学习日就等于是一次大休息。

有一次，我碰上五年級同学在开会，討論要不要上課的問

① 指較長的課間休息。如一般每節課后休息五分鐘，兩、三堂課后可有一次大休息。——譯者注。

題。一个头发乱蓬蓬的柏斯托夫学生在发言，大家向他呼喊：“好哇，柯維奇加！”他正在发表議論，說在任何情況下也不上課。上学應該是自願的，分数應該用表決的方法來決定。

“好哇！柯維奇加！”

“對！”

“同學們，總而言之，問題在教員身上。對於那些只有極少數的人去上他們課的教員怎麼辦呢？我建議，規定以五人為標準。如果上課的人數少於五人，就不發給教員這天的口糧。”

“對！”

“傻瓜！”

“去他的吧！”

“好極！”

大概這番話不是指所有的教員，而是針對一個人說的，因為這時大家開始在東張西望，竊竊私語，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促起注意。原來門口站着一個高個子，年紀不算老，唇上留着毛茸茸的鬍子的人，他交叉着手，注意地聽演講者的發言。

“他是誰？”我問瓦蓮阿姨道。她手里拿着勺子在走廊上走來走去，等着送稀粥來。

“小弟弟，他嗎，就是鬍子。”瓦蓮阿姨答道。

“怎麼叫鬍子呢？”

“嘿，你還不知道啊！”

我很快就知道在第四學校里管誰叫“鬍子”了。

這是全校痛恨的地理教員柯拉布略夫。因為第一，他的來路不明，——既不是列多夫的，也不是柏爾若佐夫斯卡雅的，又不是柏斯托夫的教員，第二，根據大家的看法，他是個啥事不懂的大傻瓜，第三，他每天來上課，哪怕教室里只有三個人，他也一定坐

完規定的時間。显然这是最引起大伙兒憤慨的決定性原因……

“同學們，現在這樣吧，”柯維奇加繼續說道，他正說得忘其所以，企圖以大演說家的姿態伸手去扣大衣，但是衣服上連一個扣子都沒有。“在校務委員會里，五年級的代表只有我一個人，這是不對的。我一個人很難為五年級利益作鬥爭。人家把我們看成低年級生。可是大家看看第一百四十四校學生會的主席是誰吧？穆霍維羅夫。他是哪一年級的呢？五年級的。總之，如果真要那樣的話，就應該首先證明我們是低年級生，然後再講。我們應該象高年級那樣有兩個代表。我是一個，另外一個我提議由菲爾柯維奇擔任！”

“格拉基里奇科夫。”

“涅多達耶夫。”

“加拉雅。”

我看了看柯拉布略夫。大概是我的眼睛瞪得太大了，所以他突然摹仿我的樣子，瞪了我一眼，——不過不很惹人注意。我好象覺得他鬍子底下漏出一絲微笑。但是柯維其加又講開了。柯拉布略夫从我身上移开了他那狡黠的眼光，开始异常注意地听着他講。

3 恩斯克来的老太婆

这一天我記得特別清楚：出着太陽，不時有一陣春天的過雲雨。這天，我在庫德林廣場上遇見一位瘦小的老太婆，她穿着一件綠天鵝絨的舊式大衣，一只手提着滿滿一籃子各式各樣的蔬菜——土豆，酸模，洋蔥，另一只手拿着一把大傘。顯然，這只籃

子对她說来是够沉重的,可是她仍然精神十足地走着,有着滿腹心思的样子,不住地嘟嘟囔囔算着。我听到的是:半磅蘑菇——五百卢布;蓝靛——一百五;甜菜——一百五,牛奶一杯——一百五;祈祷費——七百六十卢布;三个鷄蛋——三百卢布;忏悔費——五百卢布。当时的錢就是这样不值錢。

最后她輕輕地叹了一口气,将籃子放在一块干燥的石头上歇息。

“老奶奶,讓我来帮你拿吧。”我对她說道。

“走开,騙子! 我知道你們! 第三个檸檬^① 我都拿不到家了。”

她向我恶狠狠地发了一陣凶,把籃子提了起来。

我走开了。但因为我們走的方向相同,所以过了不一会兒,我們又走在一起了。老太婆大概想要躲开我,但是提着这样一个籃子对她來說确是有些困难的。

“老奶奶,要是你認為我要偷你的东西,”我說道,“那只好請便,我帮助您并不要任何报酬;憑良心說,我实在是看到你那么吃力感到过意不去。”

老太婆大发起脾气来。她一只手抱紧籃子,一只手拿着伞,象驅赶蜜蜂似地对着我揮舞。

“可不是嗎,我就是相信了別人。第三个檸檬又被拿走了。我知道你!”

“随您的便吧。您的东西一定是被流浪兒拿走的,可是我是兒童教养院的。”

“兒童教养院的也一样是强盜。”

① 苏联革命前后,由于貨幣貶值,大家便用一些名詞来代替較大的錢数,檸檬是一万卢布的代称。——譯者注。

且74
她看看我，我也看看她。她的鼻子稍稍向上翘起，显得很果断的样子，人也是那么慈祥，果断。大概，因为我有点讨得她的喜欢了，所以她突然停止了挥伞，严厉地问道：

“你是誰家的？”

“誰家的也不是。”

“那么你是从哪兒来的呢？是莫斯科人嗎？”

我立刻就明白，如果我說是莫斯科人，她定会将我赶开。大概她以为是莫斯科人将她的檸檬扒走的。

“不，我是恩斯克人。”

原来她也是恩斯克人。她的一双眼睛开始发出光来，面貌也显得愈发慈祥了。

“你撒謊，小騙子。”她生气地說道。“有个人也对我这么說过，說他不是莫斯科人，可是等我一轉眼，檸檬就沒有了。要是你真是恩斯克人，那么你住在哪兒呢？”

“在沙河旁边，市場后面。”

“完全是撒謊。”

她已經看出我不是撒謊了。

“沙河可不止一条。別的地方也可能有这样一条河。我不記得你。”

“您大概早就离开了，我那时候还小哩。”

“不，并不早，不久以前才离开的。好吧，提着籃子的一只把手，我提这一只。可不要拽。”

我們提着籃子，一面閑談。我告訴她，說我和彼其加想跑到土耳其斯坦去，后来却在莫斯科留下了。她很感兴趣地听着。

“你这个小精灵鬼！要想跑江湖了！真是走南闖北呵！想得真妙！”

到了凱旋路，我把我們的學校指給她看。

“可不就是同鄉嗎，”老太婆莫名其妙地說道。

她住在特維爾·雅姆二路一所小巧的磚房里面。這是我熟悉的一所房子。

“我們的學監住在這兒，”我說道，“您也許知道他——尼古拉·安東內奇。”

“原來是這麼回事！”老太婆說道。“喂，他怎麼樣，是個好學監嗎？”

“再好不過了！”

我不明白她為什麼笑。我們走到二樓上，停在一扇潔淨的，用漆布裱糊過的門前。門上有一塊小牌，我沒有看清楚上面用花體字寫的這家人的姓氏。

老太婆嘴里嘟囔着，從大衣里掏出鑰匙來。我正想要走，她把我留住了。

“老奶奶，我這不過是幫忙，不要報酬。”

“你坐一會兒，這也不要報酬。”

不知道為什麼她要踮着腳尖走進小前廳里去，燈也沒有開，就去脫大衣。她脫下大衣，脫下絲綢的披肩，大坎肩，又脫下一條小一點兒的披肩，頭巾等等。然後撐開傘，再就沒影兒了。剛好這時有一個小姑娘打開廚房門，出現在門口。我還以為剛才的老太婆象個魔術師似的變成了一個小姑娘。但就在這個當兒，老太婆又出現了。原來她走到衣櫥後面去掛披肩和坎肩去了。

“她是卡杰琳娜·伊萬諾夫娜，”老太婆說道。

卡杰琳娜·伊萬諾夫娜約莫有十二歲，不會比我大。可是我們之間簡直是天淵之別！我見了人哪敢象她那樣驕傲地昂着

头，用烏黑而灵活的眼睛正視別人呢。她梳着小辮，头发卷成渦卷兒，額上的头发也是卷成了圈兒的。她的脸色紅暈，但是很严肃，象她姥姥一样也生着那么一个果断的鼻子。总而言之，她是一个十分漂亮，然而却非常傲慢的姑娘，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

“恭喜你，卡杰琳娜·伊万諾夫娜，”老太婆还在脫衣服，一面說，“檸檬又叫人給扒走了。”

“所以我說，應該放在大衣里，”卡杰琳娜·伊万諾夫娜埋怨道。

“唉！放在大衣里！就是从大衣里給扒走的。”

“姥姥，可見你又是只顧嘴里数算去了。”

“我哪里算什么来着。你瞧，还有一位小伙子給我保鏢哩。”

小姑娘看了看我，大概她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发觉我。

“是他替我把籃子提回来的。你媽媽怎样啦？”

“现在就量，”小姑娘沉靜地端詳着我，說道。

“哎呀，你真不得了！”老太婆突然惊慌地說道，“怎么搞到这样晚呢？医生不是囑咐在十二点量体温嗎。”

她急急忙忙走出去了，只留下我和小姑娘两个人。我們沉默了两三分鐘。然后她皺了皺眉头，很严厉地問道：

“你讀过‘叶林娜·魯滨孙’嗎？”

“沒有，”

“‘魯滨孙漂流記’呢？”

“也沒有。”

“为什么？”

我差一点兒沒說，我学会念書識字总共才不过半年哩。但

又馬上忍耐住了。

“我沒有書。”

“你在哪一班？”

“哪一班也不在。”

“他是旅行家，”老太婆剛好回來，說道。“三十七度二。他要徒步走到土耳其斯坦去。卡佳，你別欺負他。”

“怎么徒步？”

“就是这样甩手迈脚，开步走。”

前厅里鏡子下面摆着一张小桌。卡佳将一把椅子挪到桌前坐下，坐好后，一只手托着下巴，說道：

“喂，講講吧。”

我不願意对她講，她实在太驕傲了。如果我們真的到了土耳其斯坦，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因此我很客气地說道：

“沒有什么意思，懶得講。下一次講吧。”

老太婆把夾着果子醬的面包塞給我吃，我拒絕說：

“說過不要報酬，就是不要報酬。”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心緒很亂。我不仅沒有对卡佳講，并且向門外走去，卡佳臉都紅了，我这时甚至感到一陣痛快。

“得啦，別生氣，”老太婆送我出門時說道。“你叫什么？”

“格利高里耶夫，亞歷山大。”

“好吧，再見，亞歷山大·格利高里耶夫。謝謝你。”

我在門外的台階上站了好久。仔細辨認着門上小木牌上的姓。卡扎林諾夫——似乎又不是卡扎林諾夫……

“尼·安·塔塔林諾夫，——我突然念出來了。”

原來是这么回事！塔塔林諾夫，尼古拉·安東內奇。我們的學監。這就是他的住宅。

4 这可是要好好想一想的

我們在銀松林过了一个夏天，住在一所旧式的荒蕪的房子里。房子的楼梯走廊非常狹小，天花板上雕刻着花飾，走廊全被一堵一堵的死牆陡然隔斷。房子里的一切都吱吱軋軋地发出声响：門有門的声音，百叶窗有百叶窗的声音。有一間大屋子封閉得很严实。可是就在这里面也时常有什么东西发出吱吱軋軋，或者刷拉刷拉的声音，有时忽然又会象大鐘里的小銅錘敲在鈴边上，发出一陣很有节奏的当当声。頂楼上生长着小菌子。地上到处乱扔着一些脫了頁的，沒有封面的外文書。

革命前，这所房子是一个老茨岡伯爵夫人的。茨岡伯爵夫人！这可真够神秘的。据傳說她在临死前將財宝埋藏起来了。羅馬什卡整个夏天都在寻找这批財宝，他拖着一个虛弱的身子，頂着一顆大脑袋，拿着一根棍子，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面敲，一面听。他甚至夜間也敲，非等到年紀大些的人来揍他一頓，他是不停止的。这时他才十三岁，可就下定决心要发橫財。每当他談到金錢时，他那沒有血色的耳朵就烧得通紅。这是一个天生的探宝者——一个极端迷信，貪婪的人。

頹塌的小亭子周围茂密地长滿了波斯紫丁香花。綠蔭小径的两旁立着許多雕象。这些雕象和希腊神象全然不同。希腊神是冷漠的，眼睛惨白，象瞎子一样。而这些雕象却是和我們一样的人。

有一座雕象唇上生着胡子，很象柯拉布略夫，另外有一座是个十岁左右的普通的小女孩。她穿一件长到脚跟的內衣，伸着

懶腰，在用拳头揉眼睛，好象是刚才起床。

我试图将她塑下来，然而一点也不象。塑成的只是象卡杰琳娜·伊万諾芙娜那个翘鼻子姑娘的卷圈兒头发的辮子和卷曲的額发，大概鼻子也很象。但是塑人象毕竟不象塑癞蛤蟆，兔子那么简单。

只有夏初我們刚到銀松林时的一段时间有这样美好的生活。后来生活差了，伙食也几乎停止供給了。兒童教养院改为“自給自养”。我們每天下河摸魚，捉虾，开运动会时就到运动場上去卖紫丁香花，有时趁人不防备，也順手摸点东西。傍晚我們經常在花园里架起劈柴生着篝火来，将这一天猎获的东西烧着吃。

有这么一个晚上，——其实所有的晚上都是一样。

我們围坐在篝火旁边，又疲乏，又飢餓，又恼火。木架，挂在架上的軍用水罐，以及我們的臉和手都被烟熏得烏黑。我們仿佛是那些准备要吃掉船长庫克^①的印第安人，一声不响地看着烈火。火苗驟然爆发，四外迸射，深紅色的黑烟象一个旋轉着的帽子扣在火焰上。

我們是一个“公社”。全兒童教养院分为若干“公社”。单枪匹马是很难找到“給养”的。每一个“公社”有自己的主席，自己的火堆，自己的存粮，——这指的是因某种緣故当天沒有吃完，留到第二天吃的东西。

我們的主席斯乔普加·伊万諾夫，是一个十五岁，面貌頗为丰潤的少年，也是大家所畏惧的一个貪饞鬼，无賴……

“玩阿什契卡^②嗎？”斯乔巴懶洋洋地說道。

① 庫克(1728—1779)，英国航海家，完成过三次环球航行。——譯者注。

② 是一种用羊拐投擲的游戏。——譯者注。

大家都不吭气。誰也不想玩“阿什契卡”。斯乔巴自己吃飽了，所以想玩。

“好吧，斯乔巴，不过天已經黑了，”羅馬什卡說道。

“你知道哪兒黑了嗎？站起来！”

我們的主席頂愛玩“阿什契卡”。誰都知道他的骰子有鬼。可是除了我和瓦尔加之外，別的人，特別是羅馬什卡，都奉迎他。羅馬什卡为了不至于受斯乔普加欺負，甚至故意輸給他。

諸位不要以为我們是用劈柴火烧什么甘美的野味。在那只經過一番战斗，才从厨房里夺来的軍用水罐里面經常煮着一鍋湯。这是真正的“灌腸棍子湯”，和去年冬天塞拉菲瑪·彼得罗芙娜給我們講的那个故事里面的一样。它們的區別，大概只是在于那是用老鼠尾巴煮的湯，而我們的湯里，却应有尽有，——有时甚至把青蛙的脚掌也放进湯里。

这时我們房門开了，一个戴寬边帽的矮胖子走到露台上來。

“彼佳大叔，到我們这兒來！”

“这兒來，彼佳大叔！”

这是我們的炊事員彼得·安得烈維奇·洛普霍夫。他走路搖搖晃晃的，——不是因为喝水太多的关系，——低声哼着歌剧的插曲，巡視各个“公社”。在每个鍋里尝一尝，一边啐唾沫，嫌惡地說道：

“啊！有毒。”

他是个音乐迷，也就是說是一个音乐和唱歌的爱好者。所有的歌剧他都能背出来。对于他來說，沒有比表演“叶甫盖尼·奥涅金”或是“黑桃皇后”中的一个場面更为愜意的了，至于我們，也沒有比一面听他表演，一面贊美更为愉快的了。

“太好了！真不亚于夏里亚平！彼佳大叔，你为什么不去作

演員呢！”

“我害怕。”

“怕什么，彼佳大叔？”

“陷进去就拔不出来了。”

他停在我們的篝火旁边，尝了尝，又吐出来，就滔滔不絕地講起过去，很久很久以前，百年甚至二百年以前的人怎样吃东西的故事来。他不仅是个音乐迷，而且是个历史家，是个通晓古代肴饌，兔子汁和鹿排的行家。

“柯罗烈夫煎鷄蛋，”他神秘地低声說道，“取十八个鷄蛋，只要蛋黃，同餅干粉攪拌在一起，加上苦杏仁，奶皮，白糖，然后用油那么一煎。吃过嗎？”

我們齐声回答：

“沒有吃过！”

“罗罗！糖烧苹果。将苹果削去皮，掏出核，填上葡萄干，滚上一层所謂酥皮，放在爐子里烘烤，然后塗上蜜汁。吃过嗎？”

“沒有吃过！”

“罗罗。”

可是在所有这些菜餚之中，他自己却只喜欢一种叫作“喝伏特卡酒”的菜。在一九二一年夏天，他是我們惟一的領導人。塞拉菲瑪·彼得罗芙娜这时早已张皇失措，自顧不暇，所以誰也沒有去注意她。教养院里还有一些教养員在鬼混，他們和这位大司务是針鋒相对的，不知道为什么大司务发給我們干粮会对他們不利。总之一句話，要是沒有这位大司务，我們兴許早就跑光了。

就这样，他站在我們的篝火旁边，叙述着古时候的人怎样吃东西。有时他打断了自己的話，插上几句有关医藥方面的說



明。

“梭魚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补品。它能使胃扩张。”或者说：

“鯉魚順气和血。这是一种很补养的魚。”

他取下我們的水罐，聞着冒出的蒸气。有时他聞了一聞以后不說“有毒”，而說“死尸坑”，就把一鍋湯泼入矮树丛中。这一回他要說什么呢？他聞了聞，抬起眼睛来看着天，默不作声……

“有毒！”

于是七顆脑袋一齐伸到罐子上面，七把湯匙挨次探到湯里去。我們一个劲兒的大吃！

只靠吃这种口粮，很难說我們的身体到秋天就能够养好。除去斯乔巴象只駝鳥似的，任憑什么东西都能消化而外，我們都瘦了，都染上了病，感到身体很不舒服。

然而这毕竟是一个美好的夏天。我永远不会忘記它，这倒不是因为我們吃得特別坏的关系。若說是不习惯吧，但在这以前，我生来就沒有吃过什么好东西。不是的，这个夏天給我留下了很深印象的完全是另外的原因，就是我开始尊重自己了。

这件事发生在八月底我們回城以前不久，恰好也是在篝火旁边我們做晚飯的时候。斯乔巴突然宣布吃东西的新办法。在这之前，我們是輪流吃的，你一匙，我一匙。斯乔巴是主席，由他开始，然后是羅馬什卡，就这样順次吃下去。現在他却要大伙兒趁湯沒有冷的时候一拥而上，看誰搶得快。

誰也不喜欢这个新办法。当然罗！同这样的主席在一起准吃亏。他只要三下，就可以将一罐湯喝光。

“这可不行！”瓦尔加坚决地說。

我們齐声噪噪起来贊成瓦尔加。斯乔巴慢騰騰地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照准瓦尔加脸上打了一下。他这一下打得太狠了，瓦尔加顿时满脸流血，大概血流到眼睛里去了，所以象瞎子一般地揮起手来。

“哼，”斯乔巴慢声慢气地說道，“誰还想討打？”

我是我們公社里最小的一个，他一只手就能将我按倒，但是我不顧一切，还是打了斯乔巴。斯乔巴突然踉跄了几步坐倒在地上。我不知道打中了他的什么地方，他翻着白眼露出一副发楞的样子呆坐在地上。固然他很快就清醒了，便一头向我扑来，但这一回我的小伙伴们并没有讓我吃亏。斯乔巴象落水狗一般被大伙兒打倒了。趁他躺在火堆旁边哀号时，我們連忙另选了一个新主席，这就是我。自然，斯乔巴沒有参加选举。但是不管怎样吧，他只是少数，因为大家一致通过了我。

我可以先說在这里，我是一个不算坏的主席。飢餓的时期度过了，我們冬天参加了少年先鋒队。我們这个“公社”成了全校最好的一个小队。第一个英勇战斗的“恰巴耶夫小队”。

多么奇怪。这次打架居然成了我的第一次社会活动。我风聞同伴們这样議論我：“他虽然身体很弱，可是很勇敢。”哈，我是勇敢的人！总之，我是怎样一个人呢？这可是要好好想一想的。

5 雪里有没有盐？

在这一年当中，我們学校里什么变化也沒有发生。过去列多夫学校的学生和过去柏斯托夫学校的学生照样地爭吵。稀飯

还是照样包裹着象一个老太婆似的放在雪橇上运来。柯拉布略夫每天早晨照旧是十点鐘到校。

他总是穿着一件长长的秋大衣，戴着一頂大緣帽，进了校門后，先对着鏡子不慌不忙地梳鬚子，然后去上課。

不过現在已不能象去年柯維奇加提議的那樣断絕他的口粮了，因为現在上他的課的人数已不止五个人。他既不抽問誰，也不留堂下作业。他只是單純地講，要不就是讀。原来他还是一个周游世界的旅行家。他曾經在印度看見过变魔术的僧徒；他們埋在地里整整一年，过后又苏醒过来，象常人一样，若无其事。他在中国吃过最鮮美的中国菜——松花蛋。在波斯他曾亲眼看見人們怎样过沙赫西·瓦赫西——伊斯兰教的歃血节。

几年后我才知道，其实他連俄罗斯的国土从来也沒出过。他所說的一切全是憑空瞎謔的，不过，这終究是十分有趣啊！虽然現在还有很多人一口咬定說他是傻瓜，但已經不能說他啥也不知道了……

我們的学监尼古拉·安东內奇仍旧是第四中学的头号人物。什么事情都得由他决定，什么事他都干預，什么會議他都参加。高年級同学常常到他家里去“搞清关系”。列多夫和柏斯托夫两校学生之間发生糾紛，他只消十分鐘就能解决，就連最調皮的学生也是毫无异議地表示唯命是从。从一年級到毕业班，任何一个学生都可以到他那兒談談个人的私事。“我要告訴尼古拉·安东內奇”，“这是尼古拉·安东內奇吩咐我的”，“尼古拉·安东內奇派我来的”，——在我們学校里常常听到这类的話。

最后我居然也說起这样的話来了。

在我作学生的头一天，兒童教养院举行了“甄別試驗”，我被

編入二年級。我心里正思索着應該怎样对待这件大事，——是不是要跑到莫斯科河或者麻雀山去一趟，——我正在礼堂里徘徊思索。这时教員休息室的門开了，尼古拉·安东內奇用一个手指头招呼我过去。

“格利高里耶夫，”他稍微思索了一下說（他因能叫出全校学生的姓名而博得大家的贊仰），“你知道我住的地方嗎？”

我回答說知道。

“你知道什么叫做測乳器嗎？”

我回答說不知道。

“这是一种标示牛奶里含水量多少的仪表。”尼古拉·安东內奇伸出一个指头来，“大家都知道卖牛奶的人在牛奶里摻水，但是把測乳器放到摻水的牛奶里，就可以看出含牛奶多少，含水多少。明白嗎？”

“明白了。”

“那么你就去給我拿来吧。”

他写了一张便条。

“你可要注意別打碎了。这是玻璃作的。”

“不会打碎的。”我热心地回答道。

他囑咐我把便条交給尼娜·卡比丹諾芙娜。

我沒有料到这就是恩斯克的那位老太婆。不过給我开門的却不是老太婆，而是一位不認識的，穿着黑連衣裙的纖瘦的中年妇人。

“孩子，你有什么事嗎？”

“尼古拉·安东內奇派我来的。”

这位中年妇女显然是卡佳的媽媽，老太婆的女兒。她們三个人都有着同样果断的鼻子，同样烏黑而灵活的眼睛。只是外

祖母和外孙女的神情看起来比较愉快些，而女儿却是愁容满面，心事重重的样子。

“测乳器？”她看完了便条，迷惑不解地说道。“啊，是了。”

她走进厨房里去，随后就拿着测乳器回来了。我不禁大为失望。原来这只不过是一个稍微大一点儿的温度计罢了。

“不会打碎吗？”

“您这是怎么说的，”我带着轻蔑的神气说道，“我还会打破……”

我记得很清楚，在那位我所推测的卡佳的妈妈关好门以后大约两分钟，我脑子里就产生了试验雪里有没有盐的这个大胆的念头。

我把仪表紧紧握在手里，把手放在口袋里，刚走下楼梯，就站住了。雪里有盐还是彼其加说的。测乳器能不能测出所含的盐份呢，是不是彼其加撒谎？这倒是个问题。应该试验一下。

我选定仓房后面靠污水坑的一个僻静地方，在行人踩实的雪地上有一个用砖垒起来的小屋子，从里面伸出一根黑线，拴在一些小木棍上，一直拉到仓房后面；我心里想：“这准是孩子们玩野外电话搞的玩意儿。”我没来由地对着测乳器呵了一口气，心里砰砰地剧跳着，把它插在小屋旁边的地里。过了一会，我拔出测乳器，发现上面什么变化也没有，于是又把它插进去，这次是头朝下。诸位可以想见我的脑子当时糊涂成什么样子了。

附近有人哦哟尖叫了一声。我回过头去看。

“快跑，看把你炸死！”仓房里有人嚷道。

这一切发生在两秒钟以内。一个穿着大衣敞着怀的小姑娘从仓房里飞奔出来，气急败坏地冲着我跑来。我当时心里在想：

“嘿，原来是卡佳这丫头”，同时为防万一起见，又伸手去取仪表。可是卡其加抓住我的一只手，拖着就跑。我极力挣扎不肯走开，我们都跌倒在雪地上。轟隆！砖头碎片飞到空中，身后的雪花象白雾似的升起，洒落在我们身上。

我曾经碰到过一次打枪，那是给母亲送葬的时候。不过这次却可怕得多！在污水坑旁边，什么东西经久不息地轟隆轟隆响着，连续地爆炸，我每次抬起头来，卡其加就震颤一下，问我道：“厉害吧？嗯？”

我终于蹦了起来。

“我的测乳器呀！”我号叫着，拼命向着污水坑那边跑去。“它在哪兒呀？”

原来插着我的测乳器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一个深坑。

“炸毁了！”

卡其加还坐在雪地上。她脸色苍白，眼睛闪闪地发着光。

“傻瓜，这是爆破瓦斯，”她轻蔑地说道。“你现在最好走开，因为马上警察就要来，他已经来过一次了，他会把你抓起来的。我反正能跑掉。”

“测乳器，”我又拼命地喊了一声，感觉到嘴唇也不听话了，脸上的肌肉也开始抖动起来。“这是尼古拉·安东内奇派我来取的，我把它放在雪里了。它在哪兒呀？”

卡其加站了起来。院子里很冷，她没有戴帽子，乌黑的头发从正中分开，一条辫子塞在嘴里。当时我并没有去看她，这都是以后想起来的。

“我救了你的命，”她沉思地翕动了一下鼻子，说道。“要不然你也許死了，也許背上受了重伤。你应当感激我救了你的性命。你在我的爆破瓦斯旁边搞什么名堂？”

我什么也沒有回答。我气得說不上話来了。

“不过,你要知道,”卡其加郑重其事地补充說,“如果刚才是一只小猫跑到我的爆破瓦斯旁边,我也一样会救它。我对誰都是一視同仁的。”

我一句話也沒有說,便离开了院子。但是到哪兒去呢?現在很明显,回学校是不行的

卡其加在大門口追上了我。

“喂,你去找尼古拉·安东內奇!”她喊道,“到哪兒去?告状去嗎?”

我轉过身来。啊!我照着她的脖頸多么痛快地打了一下!为了这一切,为了已經牺牲了的測乳器,为她那翘起的鼻子,为了我不能够回到学校里去,为了誰也沒有求她,她却来救我——为了凑在一起的这种种原因我打了她。

不过,她也不客气。她倒退了一步,照准我的腰眼打来。我只得揪住她的辮子,把她的脸按在雪里。她一蹦又跳了起来。

“你不應該用絆子腿,”她很不服气地說道。“要不是用絆子腿,我剛才一定狠狠地收拾你一頓。我們班里所有的男孩子都打不过我。你在几年級?帮助姥姥提籃子的是你嗎?在二年級嗎?”

“二年級,”我非常煩惱地答道。

她看了看我。

“溫度計打碎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她輕蔑的說道。“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就說是我打碎的。我沒有关系。等一等。”

她跑开了,过了几分鐘又回来了,这时她戴上了帽子,辮子上扎着发带,态度矜持,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姑娘。

“我告訴姥姥說你来过了。她正在睡覺。她問你为什么不去,她說測乳器打碎了也好,要不然,每次都要把它放在牛奶里,

实在是麻煩。反正它也測不准。这都是尼古拉·安东內奇出的鬼名堂，而姥姥只要尝尝味道，就知道牛奶好不好……”

我們走得离学校愈近，卡其加便愈摆起架子来。她昂着头走上楼梯，毫不在乎地眯縫眼睛。

尼古拉·安东內奇还在教員休息室里刚才和我談話的地方。

“你不要說，讓我自己來說。”我低声对卡其加道。

她輕蔑地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她的一条辮子弯弯地翘在帽子外面。

我在下一节里要叙述的那些令人猜測不透的事情就是从这次談話以后开始的。

事情是这样。这位我們已經习惯認為是第四学校的絕對統治者的尼古拉·安东內奇，那位架子十足，貌似寬厚的尼古拉·安东內奇在卡其加一跨进門时便立刻不知消失到哪兒去了。另一个尼古拉·安东內奇在强作欢笑地和她談話，站在桌子那边哈着腰，睜着眼，揚着眉，就好象卡其加談的是不知有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一般。难道他怕她嗎？

“尼古拉·安东內奇，是您派他去拿測乳器的嗎？”卡其加滿不在意地用眼光望着我，問道。

“是我派他去的。卡秋莎。”

“对。可是我把它打碎了。”

尼古拉·安东內奇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她撒謊，”我哭喪着臉說道，“是炸坏的。”

“我一点也不明白。格利高里耶夫，你少說話。卡秋莎，你講一下，是怎么一回事。”

“沒有什么事，”卡其加傲慢地仰着头，答道，“我打坏了測乳

器，事情就是这样。”

“唔，唔，唔。不过，好象我是派这个小孩子去取的，对吗？”

“因为我把它打碎了，所以他没取来。”

“撒谎，”我又说道。

卡其加严厉地瞪了我一眼。

“好的，卡秋莎，就算是这样吧。”尼古拉·安东内奇温和地闭起了嘴唇。“不过，你看，牛奶送到学校里来了，我压着早饭暂时不开，想确定一下这种产品的质量，再根据它的质量决定我们今后是否要买我们货主的牛奶。这么一来，我是白等了。更重要的是：这么一来，一件贵重的仪器竟打碎了，加之原因尚且不明。现在，格利高里耶夫，你谈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真是无聊！那我走了，尼古拉·安东内奇！”卡其加说道。

尼古拉·安东内奇看了看她。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时感到，他心里很恨她。

“好吧，卡秋莎，你走吧。”他和藹地說道。“我和这个小孩再谈谈。”

“那么我也等一会儿。”

她坐下来，我们谈话时，她一直很不耐烦地咬着辫子。要是她真走了的话，很可能谈话不会这样和平地结束。测乳器的事情得到了宽恕。尼古拉·安东内奇甚至还提起，我是被当作未来的雕塑家送到他的学校里来的。卡其加很感兴趣地听着。

从这天以后，我就和她成了朋友。她很喜欢我既没有让她担当这次事件的过失，而在我叙述的时候，又巧妙地使自己摆脱了事件的责任，并且关于爆破瓦斯的事一个字也没有提起。

“你以为我这下子会闯祸，是吧？”当我们从学校里出来的时候，她这样问道。

“可不是。”

“不見得。你到我們家來吧，姥姥叫你的。”

6 作客去

我一早醒來時就想，去呢還是不去？有兩件事使我很難為情：褲子和尼古拉·安東內奇的問題。褲子的確不象話，說長不長，說短不短，膝蓋上都打着補釘。至於尼古拉·安東內奇的問題，那誰都知道，他是我們的學監，也就是說，是一個相當令人生畏的人物。他萬一問起我為什麼，干什么來的，那怎麼辦呢？但是不管怎樣吧，下課後，我還是把靴子刷得干干淨淨，頭髮上弄了點兒水梳成分頭。作客去！

我感到自己是多么不自然，多么拘束啊！該死的頭髮老是直挺挺地豎着，沒法子，只得用唾沫將它粘住。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正對我和卡佳講一件什麼事情，突然厲聲命令我道：

“把嘴閉上。”

原來是我看她看得出了神，忘記了閉嘴。

卡佳把全部住房指給我看。一間是她自己和媽媽住着，另外一間是尼古拉·安東內奇住着，還有一間是吃飯的地方。尼古拉·安東內奇的書桌上放着一套文具，卡佳對我說，這是用勇士伊里亞·穆羅美茨^①的“身體”作的。的確，墨水瓶是個長着鬍鬚，戴着鋼盔的人頭，煙灰盒是一付交叉着迭在一起的古俄羅斯手套，還有其它一些別的東西。頭盔下面盛着墨水，尼古

① 伊里亞·穆羅美茨是俄國傳說中的一個英雄，他象徵着偉大俄國人民的勇敢，剛毅，純朴等優秀品質。——譯者注。

拉·安东内奇要蘸墨水就得将钢笔尖伸到勇士的头顱中去。我觉得这实在是古怪。

在两个窗戶中間摆着一个書架；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多的書放在一起。書架上挂着一个航海者的半身相片，寬大的前額，紧縮着的下巴，灼灼生光的，灵活的灰色眼睛。

我发现在餐厅里也有这样一幅象，只是略微小一点兒。另外还有一幅更小的，挂在卡佳屋里的小床上面。

“这是我父亲，”卡佳皺着眉看了看我，說明道。

我原先还以为尼古拉·安东内奇是她的父亲。不过她不会連教名父名一起称呼自己的亲生父亲的。“繼父”，我轉念一想，但立刻断定，不是。我尝过繼父的滋味。不，不象！

后来，卡佳又指給我看航海罗經，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东西，是个带架的銅箍，中間搖搖擺擺地有个小杯，在杯子的玻璃罩下面有一根指針。不論你将小杯轉到什么方向，哪怕底朝上翻过来，指針上带錨的一端摆来摆去，最后总是指着北方。

“有了这样的罗經，无论碰見什么样的风暴都不在乎。”

“你从哪兒弄来的？”

“父亲給我的。”

“他在哪兒？”

卡佳脸上显出很难过的样子。

“不知道。”

“是抛下母亲离婚了，”我立刻这样断定。我知道有这样的事。

我发现这所住宅里有許多画片，照我的眼光看来，都是很好的。其中有一张特別妙：画的是花园里一条寬闊笔直的道路，和阳光照耀着的松树。

“这是列維坦^①，”卡佳仿佛大人似的随便說道。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列維坦是一位画家的姓，以为这是画上画的那地方的名称哩。

后来，老太婆将我們叫去喝糖精茶。

“亚历山大·格利高里耶夫，看你，”她說道，“把測乳器也打碎了。”

她要我講講恩斯克的情形，甚至还問到信件的事。

“你說說，信件是怎么回事？”

后来因为我不知道有这么一家姓布宾其可夫的人家，她发开了脾气。

“犹太教会旁边的花园！你怎么就沒听見過呢！可是你呀，大概都去偷过几百次苹果了吧。”

她叹了一口气。

“我們离开那兒很久了。我本来不想搬家。真是不想搬！都是我們那位尼古拉·安东內奇。他到我們那兒去說，現在你們等不等他反正都是一样。只要我們留下地址，有人要找的話，也会找到我們的。东西全卖光了，余下的就是这一丁点兒，都搬到莫斯科来了。”

“姥姥！”卡佳厉声說道。

“姥姥怎么啦？”

“你又要干嗎？”

“不說了。算了！我們在这兒也挺好。”

我一点不明白，她們說等誰，为什么現在反正都是一样。可是問題很清楚，我不能再追問下去，更何況尼娜·卡比丹諾夫娜

① 列維坦(1861—1900)，俄国杰出的画家。——譯者注。

自己也把話題轉到別的事情上去了呢……

我就这样在特維爾·雅姆二路我們學監的住宅中把時間消磨过去了。

分別的時候，我从卡佳那兒借了一册“叶林娜·罗宾逊”，答应她，保証不将封面折坏，不把書弄脏。

7 塔塔林諾夫一家

塔塔林諾夫家里沒有女佣人，因此尼娜·卡比丹諾芙娜，特別是在她这样的年紀，实在是够劳累的。我經常幫助她。我們一块兒生爐子，劈柴，甚至刷洗食具。她是蠹虫最可怕的敌人，往往无缘无故地突然将东西都挂到院子里去曝晒，而这件工作沒有我也不行。我从附近荒地上搬了一些砖头来，把餐厅里漏烟的爐子修好。总之一句話，老太婆招待我吃的几頓鱒魚和小米稀飯，我都用加倍的工作偿还了她。其实，我又何尝需要吃她的飯呢！我只是因为在她們家里感到好玩。对我說来，这所屋子仿佛是阿利·巴巴的宝窟一般，里面有珍宝，有无数的危險和难解的謎。对我來說老太婆就是珍宝，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就是难解的謎，而尼古拉·安东內奇就代表危險和煩惱。

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是个寡妇，也許又不是寡妇，因为有一次，我听見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提到她时唉声叹气地說：“既不是寡妇，又不是有丈夫的妻子”。更奇怪的是，她因思念丈夫而感到极度的痛苦。她象修道女似的总是穿着黑色連衣裙。她在医学院里学习。当时我觉得这件事非常奇怪，因为根据我的理解，作母亲的人是不應該上学的。她有时会突然停止和别人交

談，哪兒也不去，既不到學校里去，也不上班工作（她也在工作），只是盤着腿坐在躺椅上拼命地抽煙。這時，卡佳就說：“媽媽很煩惱”，於是全家互相嗔怪生氣，悶悶不樂。

我很快就弄清楚了，尼古拉·安東內奇根本就不是她的丈夫，而且也沒有結過婚，雖然他已經四十五歲了。

“他是你的什麼人？”我有一次問卡佳道。

“什麼人也不是。”

自然，她是在撒謊，因為她和她媽媽與尼古拉·安東內奇同一個姓。他應當是卡佳的伯伯，不過不是親的，是遠房的。

不管怎樣吧，他究竟是位遠房伯伯，可是他們對待他却不太客氣。更叫人納悶的是相反地他對每一個人都非常關切，甚至有些過分。

老太婆喜歡看电影，从不漏過一部片子，尼古拉·安東內奇經常陪她去，甚至預先就買好電影票。晚飯時，她津津有味地敘述着影片的內容（這時的她簡直和卡佳相象極了）。尼古拉·安東內奇雖然剛同她從電影院里回來，却也不厭其煩地听着。

不過，她仿佛也很可憐他。有一次，我看見他耷拉着頭，坐在那兒用紙牌算命，心事重重地用指頭敲着桌子，她用憐憫的眼光瞧着他。

對他毫不憐憫的人是誰呢？這就是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尼古拉·安東內奇對她真是無微不至。常常把戲票送給她，自己卻留在家裡。又常向她贈送鮮花。我聽見他怎樣請求她保重自己，把工作辭掉。他對待她的客人同樣也十分關切。只要一有人來拜訪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他就立刻出場應酬，作出十分高興和愉快的樣子，尋找話題和客人長時間地攀談，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卻往往坐在躺椅上，悶悶不樂地皺着眉抽煙。

在柯拉布略夫来时，他显得特别殷勤。无疑問的，他認為“大鬍子”是他的客人，所以馬上就把他拉到自己房中，或是到餐厅里去，不讓他談正經事情。总之，柯拉布略夫一来，大家都活跃起来，特别是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她穿着一件白領的新連衣裙，亲自摆餐桌，张罗着，变得越发漂亮了。有时候，她看到柯拉布略夫在鏡子前梳完鬍子，开始說說笑笑逗老太婆欢喜，她也禁不住要笑起来。尼古拉·安东內奇似乎也在笑，但脸色变得蒼白。他有这么一种怪毛病，一笑脸就发白。

他不喜欢我，我很久都沒有觉察到这一点。起初，他碰見我时只表示很惊奇，后来就皺起眉来，好象很不舒服地用鼻子往里吸气。再以后就开始教訓我了：

“你刚才是怎么說的，‘謝謝’？”他有一次听見我因什么事向老太婆道謝。“你知道什么叫做‘謝謝’嗎？你要記住，根据你是否知道这一点，是否明白这一点，就可以决定你一生是走这条道路，还是走另外一条道路。我們生活在人类社会中，推动这个社会的动力之一就是感恩戴德的心情。也許你已經知道，我过去有一个堂弟。在他的一生中，我曾經不止一次地在精神上和物質上帮助过他，而他却是一个忘恩負义的人。結果怎样呢？他的命运遭到了可怕的报应。”

一听他談这些話，我就象看見了自己褲子上的补釘。的确，我脚上穿的是質量很坏的皮靴，我又小又脏，而且太穷。我屬于一类人，他們塔塔林諾夫家又是一种人。他們有錢，我却是个穷鬼。他們都是聪明而有學問的人，我却是个傻瓜。這個問題是應該好好想一想的。

順便說一下吧，尼古拉·安东內奇不仅是和我談他的堂弟。这是他喜欢的話題。他強調說，从他堂弟在亚速海岸的盖尼切

斯克童年时代开始，他就关心他。堂弟出身于一个贫寒的渔民家庭，要不是尼古拉·安东内奇，那他仍旧要象他父亲，象他爷爷，象他祖宗八代那样作一个臭渔夫。尼古拉·安东内奇“发觉这个小孩才能出众，酷爱读书”，就将他从盖尼切斯克带到顿河的罗斯托夫去，为他奔走，让他考进了航海学校。冬天的时候，他每月给他“补助费”，夏天的时候，他介绍他到往来于巴士姆和新俄罗斯之间的船上作水手。在尼古拉的直接参与之下，堂弟作了海军志愿兵，并且考上了旗手。后来尼古拉·安东内奇又费了很大的力气，帮他解决投考海军学校的问题，当堂弟在海军学校毕业需要订制新制服时，他又资助他金钱。总而言之，他为堂弟作的事太多了，所以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回忆他。他讲得非常慢，非常仔细，妇女们都带着一种聚精会神的尊敬态度听着他讲。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此时她们仿佛感到自己对他欠了一笔债，一笔因为他为堂弟作了很多事而无法偿付的债。

不过，她们也确实欠了一笔债，也确实是无法偿付的债。因为这位被尼古拉·安东内奇时而称为“已故的”时而称为“失踪的”堂弟是玛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的丈夫，所以也就是卡佳的父亲。这所房子里所有的东西过去是属于他，现在都成了玛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和卡佳的了。还有一些画，照老太婆的话来说，是“特列嘉柯夫绘画陈列馆^①会给大价钱的画”，此外，还有一张值八千卢布的巴黎银行的“保险单”。

对于大人的这些复杂的事情和关系，最不感兴趣的只有卡佳一个人。她有自己的更重要的事情。她正在和两个留在恩斯克的女朋友通信。她的信件丢得到处都是，所以只要不偷懒的人，

① 苏联最大的造型艺术陈列馆，在莫斯科。系莫斯科的艺术收藏家特列嘉柯夫(1832—1898)所创立。——译者注。

甚至客人都可以看到她的信。她写给女朋友的信和她们写给她的信完全一样。比如女朋友信上写道：她作了一个梦，似乎丢了小皮包，突然米什加·庫普錯夫（你还記得嗎，我写信告訴过你的）从对面走来，小皮包恰好就在他的手里。于是卡佳給女朋友的回信也是作了一个梦，她仿佛也丢了东西，不过不是小皮包，而是一支鋼笔杆或者一条縑带，可是舒尔卡·戈卢宾采夫（你还記得嗎，我写信告訴过你的）檢到拿来了。女朋友写信說看过电影。卡佳即使是呆在家里，也回信說看过电影。我后来猜想，她的女朋友年龄大概比她大，所以她就处处摹仿她們。

但是，她对待同班的同学却相当厉害。特别是她常常命令一个自称为琪玲的小姑娘，——塔塔林諾夫家的人也都这么称呼她。卡佳因为琪玲不喜欢讀書很生气。

“琪尔加，你讀过‘杜布罗夫斯基’^①嗎？”

“讀过。”

“撒謊！”

“撒謊你啐我。”

“那么你說，为什么瑪莎沒有嫁給杜布罗夫斯基呢？”

“嫁給他啦。”

“好說！”

“我讀过的，她嫁給他了。”

当我把“叶林娜·罗宾逊”还給她时，她也要同样考查我。可是这次就大不一样了！随便挑哪个地方我都可以接下去背誦出来。她平常不喜欢表現驚訝的神情，因此只是說：

“你这是和八哥兒一样，死記的。”

① “杜布罗夫斯基”是普希金写的一部小說。——譯者注。

可以这样来推断，她以为自己并不亚于叶林娜·罗宾逊，她自信在那种絕望的情况下，她能同样的勇敢。不过照我的看法，一个人如果准备碰上那种非同寻常的命运，就不該老是站在鏡子跟前照来照去，尤其是在荒島上，根本就不可能有鏡子。可是卡其加却老是离不开鏡子。

在我开始到塔塔林諾夫家串門的那个冬天，卡佳正热中于爆炸的玩意兒。她的手指經常是烏黑烏黑的，带着烧伤的疮疤，她的身上和彼其加有个时期一样，經常发散出弹葯的气味。她借給我的書本的折縫里，常夹着氨酸鉀粉末。后来卡佳突然不玩炸葯了。她埋头讀起“百年来的新发现”。

这是一本很好的書，是十五，十六世紀的著名航海家和征服者克里斯多芬·哥倫布，費迪南多·科尔特斯^①等人的传记。

这本书是怀着对伟大人物衷心庆賀的心情写成的。我仿佛現在还看見他們那以远方快帆为背景的橢圓相片。

在一个地球仪的前面画着亚美利哥·維斯普其^②的象，美洲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拿着圓規，放在一本攤开的書上，他生着滿脸鬍鬚，样子愉快而机灵。瓦斯柯·努尼叶斯·巴里波^③穿着鎧甲，戴着头盔，盔上插着羽毛翎，站在沒膝的水中。我好象覺得这就是我們俄国那位到过太平洋的瓦西加。不用說卡佳，就連我也被这本书迷住了！她讀这本书讀得簡直发了狂。她老是迷里迷糊的，就是清醒的时候，也好象只是为了向人們报导“科尔特斯带着特拉克斯卡兰人的祝福走上征途，日內即将到

① 費迪南多·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人，曾征服南美，占領墨西哥，对当地印第安人大肆屠杀。——譯者注。

② 亚美利哥·維斯普其(1451—1512)，意大利航海家。——譯者注。

③ 瓦斯柯·努尼叶斯·巴里波(1475—1517)，西班牙航海家和殖民者。——譯者注。

达人烟稠密的云基族的首都”。

在她讀了“百年来的新发现”以后，把以前叫做瓦西娜的小猫也改名为墨西哥的一个山峰名称依普达克丘胡阿特尔了。

她还想給尼娜·卡比丹諾芙娜也取一个山峰的名字，叫波波卡捷別特尔，但是沒有成功。除了称呼“姥姥”之外，尼娜·卡比丹諾芙娜一概不答应。

总而言之，如果卡佳真对什么事有过遺憾的話，那么她所遺憾的无疑問只是因为墨西哥不是她夺取来的，因为秘魯不是她发现，不是她征服的。但是一切还有待于将来，我知道她向往的是什麼。她想作一个船长。

8 学校剧团

表面看来，我和他們認識似乎除了好处之外該不会有別的吧？然而还不到半年，我就被人赶出来了……

这件事是因学校剧团引起来的，而学校剧团的事又是因有一天柯拉布略夫来上班，宣布即将要在大礼堂演剧引起来的。

柯維奇加在五年級班会上提議抵制可恶的“大鬍子”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我們地理教員的长腿，他的精細，甚至連他那尽人皆知的“爱管閑事”的脾气也不再惹人发火了。一方面，因为他在印度看見过活的行者，另一方面，还因为他在中國吃过松花蛋而原諒了他。現在他又想出了一件新鮮的玩意兒，組織学校剧团。

剧团需要导演，演員，美术設計，道具，服装，現在却突然发现，原来这些行道的代表人物都在我們学校里学习。甚至还找到一位詩人兼剧作家，就是娜司嘉·謝卡柴娃。

很可惜，我已經不太記得我們劇團首屆演出的悲劇“時間到了”的劇情。大意好象是一位沒有子女的男爵夫人收了一個養子，但不知道他是猶太人。可是保姆——反派角色，一個慣于訛詐的家伙，却知道這件事，她想借此索取錢財，於是威脅說，她要把這件丑事宣揚出去讓大家都知道。這時養子已經成年，正打算結婚。悲劇就這樣開始了。

多少有點兒令人納悶的是：伊萬·巴甫雷奇（柯拉布略夫的名字和父名）將戲中所有較好的角色全分配給了那些早已沒人答理的同学。“時間到了”中養子这个角色——善良的主角，正面人物——由格里什卡·法伯爾擔任。他過去是教員的死對頭，第一號會出調皮主意的家伙。他演得很好，只是嗓門太高。觀眾一連叫他謝了十一次幕。他站在後台上，渾身都濕透了，象只老鼠似的興奮得發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觀眾一次又一次地叫好。他成名了。後來這位成了名的演員變得異常傲慢，但卻不再調皮了。

總之，這個劇團在第四學校中產生了出人意料的影響。柯拉布略夫說過，這些到學校里來的孩子，“與其說是來念書，還不如說是來吃飯”，這時他們却突然結成了一種“勞動關係”。

我想順便說一下，也不是特別吹噓這個劇團，這的確是一個優秀的劇團。我們甚至还到其他的學校去巡迴演出過。我們每天到柯拉布略夫家（他住在領子街）去聽我們的演員排演。只要有格里什卡·法伯爾參加排演，滿可以不必進屋，在院子里聽就行了。總之，這回事實上是有趣極了。起初我作張貼戲報的工作，後來就逐漸畫起戲報來了，其中有一張畫着綠鸚鵡的，畫得十分成功，甚至柯拉布略夫還要了去留作紀念。

全莫斯科都開始談論第四學校，而在學校里就談論柯拉布

略夫。他是总导演，同时又是总化装，还是道具兼布景。现在，高年级的女同学居然发现柯拉布略夫也很漂亮了。不是漂亮，而是潇洒！这有什么呢！他也很的确是很潇洒，特别是穿着那套灰色新服装，身材削瘦匀称，口里衔着一个长烟嘴，笑嘻嘻地用一个手指摸弄着鬍子的时候。

我不知道别的教员是不是喜欢我们的剧团。尼古拉·安东内奇却是在每次初演的时候都坐在头排，鼓掌时比别人鼓得都要响。大概他是喜欢的。但是他对于柯拉布略夫的名字现在在学校里这么吃得开，心里似乎不太舒坦，例如人们常说“我要告诉伊万·巴甫雷奇”，“伊万·巴甫雷奇派我来的”等等。也许言者无意，但老是有人对着尼古拉·安东内奇谈柯拉布略夫，说他原来是一个好人。

尼古拉·安东内奇津津有味地听着，掰动着手指头，一面笑着，脸色逐渐变白了。

这时突然一幕惨剧发生了。

9 柯拉布略夫求婚。 教育的责任

这是个星期日，午前，塔塔林诺夫家等待着客人。卡佳在画“百年来的新发现”中的“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初次会见”的插图，我则被尼娜·卡比丹诺芙娜弄到厨房里去工作。她有点心神不安的样子，老是在倾听什么，并且不时对我说：

“嘘，嘘，门铃响了。”

“这是街上的响声，尼娜·卡比丹诺芙娜。”

但是她仍旧在侧耳倾听。

最后她到餐厅里去了，终于响了听門鈴。我把門打开。进門来的是柯拉布略夫，他穿着一件浅色的单大衣，戴着浅色的礼帽。我还是头一次看见他穿着得这样整齐。

他問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是不是在家的時候，声音微微有些发抖。我回答說：“在”，他还呆呆地站了几秒鐘，沒有馬上脫掉大衣。后来，他就走到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那兒去了。我看見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輕手輕脚地从餐厅里回来。为什么她要踮着脚尖走路呢？为什么她显得那么激动，那么神秘呢？

从这會兒开始，我們的事兒糟糕透了。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削着馬鈴薯皮，刀子却从她手里掉了下来。她跑到餐厅里去似乎是要拿什么东西，可是回来时却仍然空着两只手。她每次回来，都另外拿一个馬鈴薯来削，因此現在籃子里已經有相当多的只削了半边的馬鈴薯。当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撿了一个这样的馬鈴薯切成小块，滿臉心事的样子將馬鈴薯放到湯里去的時候，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她一定有什么心事。可是有什么心事呢？很快我就知道了；她不是个善于保守秘密的人。

起先她回来时一句話也不說，只作着各种莫名其妙的手势，这些手势大致可以理解为：“天哪，我的上帝啊，会出什么事呢？”

后来她就自言自語嘟囔起来，再后，她叹了口气，就唠叨开了。原来是件惊人的新聞。柯拉布略夫是来向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求婚的。什么叫做“求婚”，這個問題自然我是知道的。他想和她結婚，因此来問她是不是同意。

她究竟同意不同意呢？假若我不在厨房里，尼娜·卡比丹諾芙娜也同样会和她那些鍋兒罐子开討論会的。她是不能够保持沉默的人。

“他說，我的一切，我的全部生命都交付給你，”不記得是第

三次还是第四次她从餐厅里回来时，传着說道，“我不惜一切。”

我謹慎地說道：

“真的嗎？”

“我不惜一切，”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又郑重地說了一遍。“我看到了您的生活，您的生活是不好的，看見您这样我感到很痛苦。”

她正要拿馬鈴薯，但是立刻又出去了，回来时眼睛是湿润的。

“他說，他一直在向往着有一个家，”她传达他的話說，“我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除了您，我什么人也不需要。我早已把您的痛苦当成了自己的痛苦。他說的大都是这一类的話。”

“大都是这一类的話”是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自己加上的。过了約摸十分鐘，她又出去了，回来时帶着一种很作难的样子。

“我和这些人纏够了。”她眼睛一眨一眨地說道。“他們妨碍我工作。您知道我这是指的誰。請相信我，他是个可怕的人。”

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叹了一口气，坐下了。

“不，她不会嫁給他。她已經沒有这种心緒了，他也上了年紀了。”

我不知道該怎样回答，还是謹慎地說道：

“真的嗎？”

“請相信我，他是个可怕的人，”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沉思地又說了一遍。“或許是——天哪，可怜可怜吧！也許是！”

我規規矩矩地坐着。午飯也沒有按时开。白色的水珠兒在爐板上滚动，煮着馬鈴薯的水不断地沸騰……

老太婆又出去了，这次在餐厅里呆了十五分鐘左右。回来

后，眯縫着眼睛，拍了一下手說道：

“不嫁了，已經拒絕了。天哪，可怜可怜吧！多么好的一个男人。”

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拒絕了柯拉布略夫，她大概自己也不知道應該喜欢还是难过。

我說道：

“可惜。”

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惊异地看了看我。

“为什么呢，也可以改嫁嘛，”我又加了一句說。“她还很年輕。”

“別胡說……”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气忿忿地剛要說下去。

突然她作出庄重矜持的样子，一搖一摆地走出厨房，在門厅里会見了柯拉布略夫。他的脸色惨白，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站在門边，默默地看着他穿衣服。从她的眼睛上可以看出她刚哭过。

“可怜的人，可怜的人。”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好象是在自言自语地說。

柯拉布略夫吻了吻她的手，她吻了吻他的前額；为此她不得不踮起脚尖来，他也不得不弯下腰去。

“伊万·巴甫洛維奇，您是我的朋友，也是我們的朋友。”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庄重地說道，“您要知道，您在我們这兒永远象在亲人的家里一样。我知道您是瑪莎最好的朋友。这一点瑪莎也知道。”

柯拉布略夫默默地行了个礼。我很可怜他。我簡直不能理解，为什么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要拒絕他。照我的眼光看来，

他們實在是很相稱的一對。

老太婆大概等待着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叫她，把柯拉布略夫怎樣求婚，她是怎樣拒絕的經過告訴她。可是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並沒叫她，相反地，却把自己反鎖在房間里，可以聽見她在里面從一角到那一角來回走動的聲音。

卡佳畫完了“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初次會見”的圖畫，想給她看看，但是她連門也沒有開，只是在門里回答說：“等一會兒，好孩子。”

總而言之，柯拉布略夫走后，家里就變得沉悶起來，等到興致勃勃的尼古拉·安東內奇回來，並且宣稱要來吃午飯的還不止他所計算的三個客人，而是六個客人以後，家里就更加沉悶了。

願意也吧，不願意也吧，尼娜·卡比丹諾芙娜這時也只好認真地干起活兒來。連卡佳也被請來用杯子將面切成作面片湯用的小圓片兒。她很起勁地動手做起來，臉都脹得通紅通紅的，面粉弄得滿身都是，鼻子上，頭髮上都是。但是不大一回兒她就作厭煩了，於是決定不用杯子，改用舊墨水瓶來切，這樣好切出一個一個的小星星來，不再是一些小圓片兒了。

“姥姥，這樣更好看，”她懇求地对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說道。

後來她又把這些小星星揉和到一起，說是她要自己單獨烤餡餅。總而言之，她實在幫不了什麼忙。

六個客人！都是誰呢？我從厨房里向外張望，一面數着。

第一個來的是教務主任魯席切克，綽號叫“高尚的法德捷”。我不知這綽號是從哪兒來的，誰都知道他究竟有多麼高尚！繼他而來的是教員李和，這是個禿頭胖子，頭長得可笑。在他來

后又到了一个什么人，都是教育工作者。后来那个德国女人来了，她同时又是法国人，因为她教德語和法語。我們的教員，胸前挂着小表的塞拉菲瑪也来了。令人意想不到，最后进来的是八年級学生沃茲契可夫。这位沃茲契可夫是个典型的“列多夫学生”。他穿戴整洁，甚至还扎着扣上有 MPYJI 字样的皮带，意思就是“莫斯科列多夫实科中学”。他是高年級学生在校务会中的代表。

总之，整个校务会的人差不多都在这里了。請校务会所有的人来吃飯，这是頗为奇怪的事。

我坐在厨房里，听他們談些什么。門敞着。先是李和談“食品”問題，說現在快要出新鈔票了。今天一磅奶油值一千四百万，明天就要同战前一样只要二十戈比。今天賞看門的人一千万，明天只要給十戈比，“他还会向你点头哈腰，感激不尽哩”。

“嘿，我多么傻，刚刚把桌布卖了二亿三千万，”塞拉菲瑪·彼得罗芙娜叹了一口气，說道。

后来他們就談起柯拉布略夫来了。唉呀！原来他是个討好苏維埃政权的人。他为了“造成个人势力”，真是煞費苦心，連胡子都染紅了。他搞剧团这种为害匪浅的玩意兒，只不过是為了“贏得个人声望”。他以前結过婚，老婆被他断送了性命。开会时，他流的原来是“鰐魚式的眼泪”。

我不知道什么叫做“鰐魚式的眼泪”，但是在听見这句话时，我脑中浮现出了柯拉布略夫从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屋子里走出来的神情：他的脸色惨白，胡子往下垂悬着，象是粘上去的。于是我明白了，剧团的事也好，妻子的事也好，“鰐魚式的眼泪”（不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好，他們說的全是謊話。他們是他的仇敌，这些人正是他今天刚刚对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所說的那

些人：“我和这些人纏够了，他們妨碍我工作”。

在說“鰐魚式的眼泪”之前，还有一番談話。但这时我听见尼古拉·安东內奇的声音，我明白了，这不是談話，而是密謀。他們想把柯拉布略夫赶出学校去。

尼古拉·安东內奇拐弯抹角地开始說道：

“教育工作必須注意方式方法……”

然后他把話題轉到柯拉布略夫身上，并且首先“对他的才能給予应有的估价”。至于“他妻子死的原因”和我們並沒有絲毫关系。我們感到重要的只是“他影响兒童的办法和影响的程度”。使我們感到不安的是伊万·巴甫洛維奇把学校推向一个有害的方向。因此我們必須按照教育者的天职，“忠誠的苏維埃公民的天职”給我們指出的那样来对待这件事。

这时，因为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把空盘子弄得嘩啦嘩啦的响起来，所以我沒有听清楚尼古拉·安东內奇所說的教育者的天职給他指出的是什麼。等到尼娜·卡比丹諾夫娜将第二道菜送到餐厅里去以后，我才从整个談話中了解到了他們想干什么。

第一，在下次校务會議上，准备建議柯拉布略夫“講地理时，不能超出提綱的范围”。第二，他的活动将被認為是把“劳动教育的思想庸俗化”。第三，解散学校剧团。还有第四，第五等等。这么一来，柯拉布略夫一定会負气走掉。象高尙的法德捷所說的那样——“揚长而去”。

这的确是一个卑鄙的計劃，我奇怪尼娜·卡比丹諾芙娜竟能忍耐住，不插一句嘴。但是很快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大概从上第二道菜开始，她就在惋惜瑪丽亞·瓦西里耶芙娜拒絕了柯拉布略夫。她別的什麼事也沒有想，所以什麼話也沒有听

見。她嘴里嘟囔着，不时地聳着肩膀，有一次甚至大聲說：

“看吧！現在作母親的人算得了什麼呀？”

她准是在抱怨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為什麼在拒絕柯拉布略夫以前沒有和她商量。

客人都散了，而我還不能決定應該怎麼辦？

這真是太不走運了，柯拉布略夫恰好就在這一天跑來求婚。他要是呆在家里就好多了。那我就可以把我所聽來的全盤告訴給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可是現在就不合適了，甚至不可能：因為她沒有出來吃飯，反鎖着門，誰也不讓進去。卡佳坐下來準備功課，尼娜·卡比丹諾芙娜突然說她腳都站不住了，想睡覺，說完便立刻躺下睡着了。我嘆了一口氣，便告辭回去了。

10 “復信謝絕”

兒童教養院的值班員，跛子雅飛已經來過兩次，探視我們是在睡覺還是在吵鬧，是不是都躺下了。

走廊上的過夜燈亮了。瓦爾加·朱可夫睡着的時候，眼皮不住地哆嗦，象狗的眼皮一樣；他是不是真的夢見他的狗了？羅馬什卡呼嚕呼嚕地鼾聲大作。只有我沒有睡，仍然在想事情。

想法一個比一個精彩。我這時仿佛是在全校大會上發言反對尼古拉·安東內奇，並且當眾揭露他們要把柯拉布略夫趕出學校去的卑鄙計劃。我這就寫信給柯拉布略夫……我開始擬信稿，隨後就睡着了……

很奇怪，我剛一醒來（比旁人都早），就恰巧從昨天晚上終止的那個地方繼續向下擬信稿。這時，彼其加的尺牘大全總該

对我有些用处了吧！我于是回忆起我們念过的那些信。“复信謝絕”：“辱承垂爱，实深感激……”这不合适！“答友人盛情款待書”和“請偿付債務書”，同样不合适。“鰥夫致淑女書”我又忘了。而且这也不相当，因为我既不是鰥夫，柯拉布略夫也并非淑女。

最后我打定了主意。

这时天色还早，才八点鐘，外面如同夜間一般漆黑。当然，这是阻止不了我的，跛子雅飞想要拦住我，但是我掙脫开身，从后門跑掉了。

柯拉布略夫住在領子巷的一所带百叶窗和門廊的木房里，很象是在住別墅。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当时深信他沒有睡覺。很清楚，一个昨天遭到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謝絕”的人是睡不着的。他的确沒有睡。屋子里点着灯，他站在窗前，凝視着外面，——是那样聚精会神，真是天知道，好象外面发生了什么稀奇的事情一般。那样聚精会神，以至我在窗根底下对他作手势，他也半天沒有发现我。

“伊万·巴甫雷奇。”

但伊万·巴甫雷奇眯縫眯縫了眼，搖了搖頭，便走开了。

“伊万·巴甫雷奇，請开門，是我呀！”

过了一会兒功夫，他披上大衣回来，走到門廊上。

“是我，格利高里耶夫，”我怕他忘了我，所以又重复說道。他有点奇怪地看着我。“我来找您，告訴您一件事。他們想解散剧团，想把你……”我似乎沒有說“赶走”。也許是說了，因为这时他突然清醒了过来。

“进来！”他簡短地說了一声。

他家里一向是很整洁的，書放在書架上，床上鋪着洁白的被

单，枕头上盖着罩布。一切都有条不紊。今天不整洁的恐怕只有主人自己。他的眼睛一会儿眯缝着，一会儿瞪得挺大，仿佛他眼前的一切都在向四处扩散。没有疑问，他这一夜都没有睡。以前我还没有看见他这样的疲倦过。

“哦，萨尼亚，”他恍惚地说道，“怎么回事？”

“伊万·巴甫雷奇，我本来想写信给你的，”我热心地回答说，“一句话，问题就在学校剧团身上。他们说你的妻子是被你折磨死的。”

“慢着！”他笑了笑说。“谁说我把妻子折磨死了？”

“大家都说。‘他妻子死的原因和我们并没有丝毫关系。思想的庸俗化，这是使我们最为愤慨的’。”

“我一点也不明白，”柯拉布略夫严肃地说道。

“是的，庸俗化，”我肯定地重复了一遍。

从昨天开始，我就反复地念着这几个字：“庸俗化”，“声望”和“忠诚天职”。现在“庸俗化”已经说了，还剩下“声望”和“忠诚的天职”了。

“‘开会时，他流的是鳄鱼式的眼泪’。”我急促地继续说道。“‘他搞这种为害匪浅的玩意儿，不过为了赢得个人声望’。不错，是‘声望’。‘他是个讨好苏维埃政权的人’，‘我们应该尽到我们忠诚的天职’。”

有些话也许被我搞乱了。但是把我昨天听到的话照样背一遍，对我来说，究竟比用自己的话讲要容易一些。不管怎样吧，柯拉布略夫总算听懂了我的意思，他很清楚地理解我了。他的眼睛突然消失了方才那种迷惘的神气，两颊微微红了起来，疾速地在屋里走了一转。

“这很有趣，”他低声自言自语地说道。虽然实际上他一点

也不感覺有趣。“那麼意思是說，同學們不願意劇團解散麼？”

“很清楚，大家是不願意的。”

“那麼，你是因為劇團的事來的？”

我沉默了一會兒。也許是因為劇團的事，也許是因為沒有柯拉布略夫，學校里會變得消沉起來，也許是不喜歡他們那麼卑鄙地暗中商量把他趕出學校……

“啊！這些世界上最無聊的混蛋！”他突如其來地說道。

他緊緊地握了握我的手，又開始沉思地從這一個角落到那一個角落來回地踱着。他這樣走着走着就走到外面去了，大概是到廚房里去了，一會兒提了開水來，泡上茶，從壁廚里取出茶杯。

“我本來想走的，可是現在決定留下了，”他聲言道，“我們將進行鬥爭，對嗎，薩尼亞？暫且讓我們來喝一杯茶吧。”

我不知道校務會議究竟舉行了沒有，在這個會議上，柯拉布略夫是應當因“將勞動教育的思想庸俗化”而受到嚴厲清算的。顯然，這個會沒有開，因為他沒有被清算。每天早上“鬍子”若無其事地在鏡子前梳他的鬍子，然後去上課……

過了幾天，劇團宣布了新劇目：“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格里什卡·法伯爾扮演智者。照原角色，他應該在二十五歲上下。但他卻寧願扮一個禿頭，鑲金牙的中年人。同尼古拉·安東內奇一樣，他老用指頭敲桌子，總之，要是他不那麼拼命地喊叫的話，可以說是演得很好的。

從共青团區委會來了兩個黑色鬚髮的少年，倡議在我們學校里組織團支部。瓦爾加立即問道，兒童教養院的可不可以報名，他們回答說可以，不過由十四歲開始。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几

岁。依我算該快滿十三岁了。为防万一起見，我还是說自己十四岁。不过，大家总是不相信。大概因为当时我的个兒太矮小了。

教員中参加这个会的只有柯拉布略夫和尼古拉·安东內奇。柯拉布略夫講的話相当严肃，他先簡略地祝賀我們团支部的成立，接着就因为我們不好好学习，調皮搗蛋，把我們訓了好久。尼古拉·安东內奇也講了話，講得滿漂亮，他先向区委会的代表，年輕的一代致敬，最后还朗誦了一段涅克拉索夫的詩“綠色的树林在喧囂”。奇怪的只是他在講話时突然把手指捏得喀巴喀巴的响，好象是要把手折断了似的。这时他的臉色显得很快乐，甚至还微笑。

散会后，我在走廊上碰見他，說：“您好，尼古拉·安东內奇！”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不答理我。

总而言之，一切都很好。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先是打算去塔塔林諾夫家，后来突然又决定不去了，最好等明天在街上遇見卡佳时，就在街上把馬鞭和粘土給她，这是她向我要的东西。还没有过半个小时，我的想法又变了。

給我開門的是老太婆，我正想进去，不知道为什么她却握住門鍊，好象是在考虑讓不讓我进去。后来她把門敞開，在我耳边迅速地低声說：“到厨房里去”，同时輕輕地在我背上推了一下。

我迟疑了一下，只是感到納悶。就在这一瞬間，尼古拉·安东內奇走进了門厅，看見了我，便把灯打开了。

“啊……啊！”他用一种从喉嚨里挤出来的声音說。“你来啦。”

他使劲抓住我的肩膀。

“忘恩負义的告密鬼，无賴，奸細！今后，你的脚再也不要踏到这兒来！听見了嗎？”

他恶狠狠地咧了一下嘴，我看見了他嘴里的金牙閃閃发光，这就是我在塔塔林諾夫家最后看見的东西。尼古拉·安东內奇一手开門，一手把我象小猫似的扔在楼梯上。

11 出 走

兒童教养院空了，学校里也冷清清的。今天是星期日，大家都出去了。只有羅馬什卡在那些空无一人的屋子里轉来轉去，不断地在計算着，大概是在計算他未来的財產。炊事員在厨房里一面做飯，一面唱歌。我在爐灶后面找了一个較暖和的角落思索起来。

这准是柯拉布略夫干的。我原来想帮助他，可是他却这么卑鄙地对我恩将仇报。他到尼古拉·安东內奇那兒去把我出卖了。

他們原来是正确的。不論尼古拉·安东內奇，还是德法两个国籍的女人，还是說柯拉布略夫在开会时流“鰐魚式眼泪”的李和，都是正确的。他是个卑鄙的小人。而我反而因为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拒絕了他而对他表同情哩。

“彼佳大叔·什么叫做‘鰐魚式的眼泪’？”

彼佳大叔从鍋里捞出了一块热气騰騰的白菜来。

“大概是一种酱油。”

不，这不是酱油……我正想說，这不是酱油，但这时彼佳大叔突然拿着他为了知道菜湯是否煮好而用牙齿尝过的白菜，围

着我慢慢地，一搖一晃地兜了一圈兒。我的头感到一陣发暈，叹了口气，就到寢室里去了。

羅馬什卡在寢室里的窗子旁边坐着，口里正在計算着。

“現在十万将来只等于一戈比了，”他向我說道。“如果把廢币收集起来，到一个大家还不知道币值改革的地方去全买了东西，回来卖成新币。我算了一下，一个金卢布可以賺四万倍。”

“再見吧，羅馬什卡，”我回答他說，“我要走了。”

“哪兒去？”

“土耳其斯坦，”我說，虽然一分鐘之前，我还没有想到土耳其斯坦。

“瞎說！”

我一声不响地从枕头上取下枕头套，把我的全部家当——衬衣，褲子，第四学校全体同学合演“馬拉”^①的戏报，和医生伊万·伊万內奇留給我的黑皮管都塞在里面。所有的蛤蟆，兔子都被我摔碎，扔到垃圾箱里去了。連那个前額上的头发卷曲着有点象卡其加的泥女孩也扔进去了。

羅馬什卡很感兴趣地注視着我。他还是在低声数着，不过沒有刚才那么帶勁兒了。

如果一个卢布能賺四万，那么一百卢布……

再見吧，学校！我再也不念書了。干嗎还要学习呢？已經学会了写字，讀書，演算，这就行了，这样就够好的了。我走了以后誰也不会怀念我。也許瓦尔加会回忆一次半次的，不过将来也要忘記的。

① 讓·保羅·馬拉(1743—1793)，十八世紀法国杰出的資產階級革命家，雅各宾党人的領袖之一。——譯者注。

“那么一百卢布就能赚四十万，”罗马什卡嘟嘟囔囔说，“一百卢布是百分之四十万的利。”

不过我还要回来。到那时候，我还要去找尼娜·卡比丹诺芙娜，把钱扔给她，并且说：“把我在你们家吃的东西的钱都拿回去吧。”还有那位柯拉布略夫，到那时候，人家已经把他赶出学校了，他跑来向我诉苦，恳求我原谅他。哼，决不原谅！

忽然，我回想到他站在窗前的情景。在我到他那兒去的时候，他非常忧伤，稍有几分醉意的样子，聚精会神地望着外面。得了吧，这会是他干的吗？他干吗要出卖我呢？相反他应该不露声色，假装一点儿也不知道这次秘密会议的样子。我不应当骂他。这不是他，那么又是谁呢？

“啊！瓦尔加！”我突然对自己说道，“从塔塔林诺夫家回来后，我不是将一切都告诉了他吗。这是瓦尔加！”

但是记得那时瓦尔加连话都没听完，就呼呼睡着了。而且瓦尔加决不会作出这种事情来的。

也许是罗马什卡？我瞟他一眼。他的面色苍白，耳朵通红，坐在窗前老是乘来乘去的计算着。我仿佛觉得他象一只鸟儿似的，他用一只滚圆扁平的眼睛偷偷地监视着我。不过他并不知道啊……

现在，我肯定了这事不是柯拉布略夫干的时，似乎是可以留下来了。不过我那时头痛得很厉害，耳朵里老是嗡嗡的响，并且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既然我已经告诉了罗马什卡要走，那么就不能再留下来了。我心里感到一阵凄凉，最后一次向周围看了看。那是白色的灯泡，在熄灯后的黑暗中我常常长久地注视着它，那是有放衣服格子的墙壁，那是我的衣服格子，旁边是瓦尔加的。再就是床，床……

我叹了一口气，提起包裹，向羅馬什卡点了点头，就走出来了。大概我那时烧得很厉害，因此走到外面时，我还奇怪为什么外面那样冷。但尽管这样，我走到学校的大门口时还是把制服上身脱掉，把大衣穿在衬衣的外面。制服上身决定卖掉，照我的估计，可以卖一千五百万左右。

虽然我在苏哈里摊贩市场上转了整整一天，但因为头痛发烧，所以记不十分清楚在那儿作了些什么。我只记得曾经站在一家小卖店门口，从门里发出阵阵炒葱的香味，我拿着制服上身，声音微弱地叫卖着：

“誰买……”

记得当时我还因为自己的声音这般微弱而感到奇怪。记得当时在人丛中还发现一个身材高大，穿着两件皮大衣的男子，一件穿在身上，另一件（要卖的）披在肩上。非常奇怪，无论我带着我的货物走到什么地方，总是撞见这个人。他呆呆地站着，身材高大，长着满脸鬍子，穿着两件皮大衣，对于那些弄弄衣襟，摸摸领子的买主们连看也不看一眼，阴沉地说着价钱。

记得在市场上游荡了整整一天，我拿衬衣换了一块胡萝卜馅饼，但只咬了一口就不想吃了。

我找了一个地方取暖，虽然身上已经不感觉到寒冷了，可是却发现指头仍然发青。我把馅饼藏到枕头套里去，记得当时我总是不断地去看馅饼挤碎了没有。大概我已经觉得自己是生病了，很想喝点水。我几次决定拉倒不卖了，要是再过半小时还卖不掉，就到茶馆里去换一杯热茶喝。但是这时我似乎又觉得买主就要出现，于是我又决定站半小时。

记得当时聊以自慰的是，那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同样也是怎样也卖不掉他那件皮大衣……

要是抓点雪吃下去也许能好些，但苏哈里摊贩市场地下的雪太脏，到马路上去罢，路又太远。然而我终究还是去吃了。很奇怪，我觉得雪挺暖和。大概我是呕吐了，也许并没有。只记得我坐在雪地上，有人扶住我的肩膀，因为我跌倒了。最后他们不再扶我了，我又躺下去，舒舒服服地把两条腿伸开。有人在我跟前说话，似乎是说：“癫痫病，癫痫病……”后来他们想把我的枕头套拿去，我听见他们劝我说：“真是个怪物，给你枕在头下呀”，但是我紧紧抓住枕头套不放。穿两件皮大衣的男子慢吞吞地从我身边走过，突然抛下一件皮大衣来盖在我身上。但这些都是烧得太厉害时的胡思乱想，我很明白，自己是烧糊涂了……有人还拉了一下我的枕头套。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

“包裹他是不肯给的。”

接着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连小包裹一起放上去就是了。”

后来又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这显然是恶性流行性感冒。”

迷迷糊糊，什么事也不知道了……

就是现在，我只要稍微有点发烧，就会立刻迷糊起来。烧到三十八度我就要说胡话，把亲戚朋友们吓得要死。但是象这次害恶性流行性感冒那么舒舒服服的发迷糊却还是第一次。我象是在一间宽敞，明亮的房间里，眼前现出一幅瀑布的景色。流水从险峻的峭壁上飞泻而下，流到一条狭窄的乱石河床上。好极了！水波在阳光下闪耀，河底的绿石真有说不出的美妙！

我象是坐在卧榻上到什么地方去，身上盖着老羊皮。天渐渐黑下来，但是我还能看见雪在卧榻下两条粗壮的滑木之间飞速

地倒退。仿佛我们是停着不动，而是雪在奔跑；只是从垂悬在臥榻旁的盖着膝盖的毡子划出的黑迹才能看出我们是在不断地前进。我感到那样的舒适，那样的暖和，似乎再也不需要什么了，只要这样坐着雪橇在冬天里走一生就行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美好的幻觉。我当时是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上，我曾经两次被当作不治的病人把我用屏风和别的病人隔离开来。我生的是萎黄病，患这种病的人必死无疑，除了一个医生之外，别的医生都对我摇头，他们只是每天早晨惊奇地问道：

“怎么，他还活着？”

这一切都是在我苏醒过来以后才知道的……

不管怎样吧，我总算没有死。相反地，我恢复健康了。有一次，我睁开眼睛，还以为是在儿童教养院，正想从床上跳起来……一个人的手把我按住了。一个已经忘记了，但却又非常熟悉的面孔贴近我。诸位爱信不信，这原来是伊万·伊万内奇医生。

“医生，”我叫了一声，由于高兴和虚弱禁不住流下泪来，“医生。暴风雪！”

他瞪着眼睛直看着我，大概以为我还是在说胡话哩。

“马鞍，箱子，暴风雪，喝酒，阿布拉木，”我一口气地说道，同时感觉到眼泪顺着脸一直流到口里。“是我呀，医生。我是萨尼卡。大夫，您还记得在乡下吗？我们掩护过您。您教过我。”

他又把我端详了一下，然后鼓起腮帮，大声吐了一口气。

“啊呀！”他说，并且笑了起来，“怎么能不记得呢？你妹妹在哪兒？你怎么成了这付样兒？那时候你只会说‘耳朵’，而且还是

干嚎呀。学会說話了，是吧？怎么跑到莫斯科来的？怎么忽然想起来要寻死呢？”

我本来想說，我根本沒有打算死，而且恰恰相反，但他突然用手堵住了我的嘴，另一只手赶忙掏出手絹，把我的脸和鼻子擦干净。

“小老弟，躺着別动，”他說道。“你还不能說話。哑吧就哑吧两天吧。鬼晓得，你已經死过去多少次了，現在究竟怎样还不知道呢，如果突然說太多的話，那可就妥了！那可真是再也見不到你了。”

12 严肃的談話

諸位也許会以为既然我曾有一次苏醒过来，那么就会漸漸复原了吧？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恶性流行性感冒刚好，我又患了脑膜炎。伊万·伊万內奇这回同样不肯甘心說我的外命已經交代了。

他常常接連几小时地坐在我的病床旁边，研究我的手和眼睛所作的种种奇怪的动作。最后，我終于又活过来了，虽然还白眼朝天地躺了很久，可是已經脫离危险了。就如同伊万·伊万內奇所說的那样：

“脫离了死亡的危險，然而还没有脫离終生成为白痴的威胁。”

我总算幸运，沒有成为白痴，而且病好了以后，甚至感到比从前还聪明了些。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不过这和生病没有关系。

不管怎样吧，我在医院里还是住了半年多。在这个时期中，我经常，大约每隔一天，就同伊万·伊万内奇见一次面。但这些会面并没有什么意思。当我日渐恢复健康时，他差不多已经不常到医院里来了。不久他就离开了莫斯科。到哪儿去了，去干什么，等下面我再讲。

奇怪的是他在这几年里变化很少。他仍旧和从前一样爱哼两首诗。有一次，他听诊完了以后，我听见他用不很满意的声音低低地吟唱：

男爵格材瓦里都斯先生，
这位英勇的豪杰，
仍保持着原来的姿势，
巍然坐在石基上。

有些大学生常常到我们病房里来，这时候他首先用他那明亮，灵活的眼睛把他们打量一下，就牵住一个人的袖子讲起课来，他一会儿把这人的袖子放下，一会儿又牵起来。我和他都回想起了“旧时代”。他感到十分惊奇的是，我还记得他用面包的软心及其它一些别的东西作小猫和小老鼠的事，以及猫捕老鼠，咪呜咪呜地叫着，象真的一般。

“伊万·伊万内奇，自从你走了以后，”我说道，“我和妹妹整整一冬都用小木签叉着马铃薯烤着吃。”

他笑了，随后又陷入沉思中。

“小弟弟，这是我被罚作苦役的时候学会的。”

原来他过去是被流放的犯人。一九一四年，他因为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被流放作苦役，后来又判处终身流放。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逃跑的，不过他流放的地点却是在很远很远，在巴伦支海附近。

“从那兒，”他笑着說道，“就一直跑到你們村子里了，我差一点兒冻死在路上。”

这时，一切真相大白，知道他那时为什么夜間总不睡覺。黑皮管——听診器——原来是他留給我和妹妹作紀念的。話逼到嘴上，我不得不把我是什麼時間，因为什麼緣故逃出兒童教養院的一字不漏地告訴他。

他很注意地听着，不知为什么总是对着我的嘴看。

“真是太好了，”他沉思地說道，“簡直是稀罕事兒。”

我以为他想的是从兒童教養院里逃跑这件事是稀罕事兒，正打算辯解說这一点兒也不稀罕，但是他又說道：

“不聾，能听话的哑吧，也就是不聾的哑吧，Stummheit ohne Taubheit^①。起初連‘媽媽’都不会說，可是現在呢，說实在的，簡直成了个大演說家了！”

他把我的情况对其他的医生講了。

我有点兒失望，关于迫使我从兒童教養院里逃跑的事，医生連一个字也沒有提，甚至好象故意装作沒有听見的样子。但是我想錯了，因为后来，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我們病室的門开了，一个护士进来說道：

“格利高里耶夫，有客人找。”

柯拉布略夫进来了。

“你好，薩尼亚！”

“您好，伊万·巴甫雷奇！”

全病室的人都好奇地望着我們。大概因为这个緣故，他开始只談我的健康状况。但是等到大家忙起自己的事情来了以后，他

① 德語。即不聾的哑吧。——譯者注。

就开始罵起我来了。嗨呀！他把我罵得真够受！他好像是照着写好的稿子一般，把我过去对他的想法都講了出来，并且声言，如果我認為他是一个卑鄙的小人，当时就應該去找他，向他說：“伊万·巴甫雷奇，您是一个卑鄙的小人。”而我沒这样作，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后来他和緩了一些，因为我很沉痛地問他：

“伊万·巴甫雷奇，什么叫作个人主义者？”

总之，他罵我一直罵到会客時間終了才罢休。然而在分別的时候，他却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說他以后还要来。

“什么时候？”

“最近几天。我还要同你作一次認真的談話，現在你可以先考虑一下。”

可惜他沒有說要我考虑什么，所以我只好想到哪里就算哪里。我回忆起恩斯克，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达莎阿姨，并且决定病一好，就馬上写封信到恩斯克去。彼其加回去了嗎？我常常想到彼其加。我們这間病房的窗戶向着花园，因此可以看見被风吹着搖搖摆摆的树梢。晚間大家都入睡了的时候，我听着树木颯颯的喧嚣声，仿佛觉得彼其加也和我一样躺在什么地方白色病床上，一面想着，一面傾听着树木颯颯的喧嚣声。現在他在哪兒呢？也許他不喜歡土耳其斯坦，又跑到秘魯什么地方去了吧？彼其加会忽然到了秘魯。象瓦斯柯·努尼叶斯·巴里波那样，身披鎧甲，手持宝剑，屹立在太平洋之滨。他不見得能够这样。不过，当我这个寶貝在兒童教养院的期間，究竟誰知道他到过什么地方呢？

在下一次会客的日子，瓦尔加·朱可夫来了，把他的刺猬对我大談了一通。他不知在什么地方弄到一只刺猬，在自己的床底

下給刺猬盖了一間小屋。一般的刺猬到了冬天都要冬眠，可是这只刺猬却不知为什么不睡覺。总而言之，这是一只奇特的刺猬，連它怎样搔痒瓦尔加都很感兴趣。

“它跟狗一样！”他兴奋地說道。“甚至会象狗那样用爪子敲地板。”

总而言之，整整两个鐘头，瓦尔加都在談他的刺猬。只是在临別时，他才忽然想起說柯拉布略夫向我問好，他日內就要来。

我立刻明白，这也就是要有一次認真的談話。真有意思！我当时深信，我又要挨一頓教訓了。果然沒猜錯。

談話开始时，柯拉布略夫問我将来想作什么。

“不知道，”我答道。“也許作艺术家。”

他皺起两道眉毛，駁斥道：

“你干不了。”

說实話，我还没考虑过将来要作什么。在我內心的深处，我願作一个象瓦斯柯·努尼叶斯·巴里波之流的人物。但是伊万·巴甫雷奇却那么有把握地說：“你干不了”，我感到非常憤懣。

“为什么？”

“有很多原因，”柯拉布略夫断然說道。“首先，因为你意志軟弱。”

我大吃了一惊。我脑子里还没有想到过自己的意志軟弱。

“沒有的事，”我垂头丧气地反駁道。“是坚强的。”

“不对，是軟弱的。假使一个人不知道一小时以后他将作什么事，这能算什么意志呢？如果你的意志很坚强，那么你就應該学习得很好。可是你学习得不好。”

“伊万·巴甫雷奇，”我着急地说道，“我只有一門‘不及格’呀。”

“是的，很不好。其实你是能够学得很好的。”

他等了一会儿，看我还要说什么。但是我一声也没有响。

“你的自负多于你的理解。”

他又等了一会儿。

“总之，你现在应该好好想一下，你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活在世界上！你刚才说想作一个艺术家。亲爱的朋友，如果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应该完全成为另一个人。”

13 我在想

说起来容易：你应该完全成为另一个人。但是怎样去作呢？我不同意说我学习很坏。也无非是算术一門“不及格”罢了，而且这还是因为有一次我擦了靴子，鲁席切克把我叫了去说道：

“格利高里耶夫，你用什么油擦靴子？用臭鸡蛋拌煤油吗？”

我答话得罪了他，自此以后，他就再不给我“及格”分数了。不过我总觉得柯拉布略夫的话还是对的，我应该完全成为另一个人。要是我的意志真是软弱怎么办呢？应该加以检验。应该决定作一件事情，而且一定要完成它。开始我决定读“猎人笔记”，这本书我去年曾经读过一些，后来，因为我觉得它非常枯燥，便半途而废了。

真奇怪！我这回从医院图书馆里借来“猎人笔记”才读了四、五页，就感到这本书比过去读时还要加倍的枯燥。我这时在世

界上唯一的希望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决定就好了。但是我对自己已经许下了诺言，甚至在被窝里还念叨过，既是诺言就应该遵守。

我读完了“猎人笔记”，断定柯拉布略夫是瞎说。我的意志很坚强。

自然，最好是再检验自己一次，假定说吧，每天清早作完早操后，用冷水冲洗身体，或者是在这一年之中保证算术得“优秀”。但所有这一切我都把它推延到回校以后再说，目前只是想，不断地想。

“你的自负多于你的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也许是因为我夸过塑造的本事？这实在太冤枉人了。卡其加才是自负的人呢！要不就是柯拉布略夫对这个字的理解不一样？要是他再来，我一定问问他。但是他没有来，过了一两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字并不只是“自负”^①的意思。

“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什么活在世界上？”我一面读报纸，一面想着这个问题。进医院后，我开始读报了。真有趣。要是没有这么多的外来语就更好了！我在这些字眼里也找到了“庸俗化”和“鳄鱼式的眼泪”。

伊万·伊万内奇终于最后一次诊察了我的病，并且叫我出院。这一天天气非常好。我们告别了，他给我留下了地址，叫我到他家里去。

“不过，你注意，要在二十号以前来，”他很愉快地说道。“要不然，小老弟，你就要找不到我了……”

我拿着小包裹走出医院，才走过一个区，便坐到路旁一块石墩上休息。唉，还是这么虚弱。但是眼前的一切多么好啊！莫

^① 俄文 *воображать* 有“幻想”和“自负”两种意思。这里薩尼亚把“幻想”误写成“自负”了。——译者注。

斯科多大呀！我都快把它忘掉了。街道上多么熱鬧啊！我感到头晕起来，不过我知道現在不会再倒下去了。我身体很好，一定能活下去。我的病已經好了。別了，医院！你好，学校！

学校里的人对我这次归来竟然那么冷淡，說实話，这真使我有點兒扫兴。只有羅馬什卡問道：

“好了嗎？”

他那付神情仿佛是因为我沒有死掉，而感到有些遺憾。

瓦尔加是真的感到高兴，不过他这时沒心思顧我，因为他的刺猬丢了，他疑心尼古拉·安东內奇吩咐炊事員把刺猬扔到污水坑里去了。

“早知如此，我还不不如把它卖了的好，”瓦尔加伤心地說道：“有人出二十五戈比。嘿，我真是個傻瓜，沒有卖。”

在我住院期間，新币——銀币和金币——发行了。

兒童教养院里一切照旧，只是塞拉菲瑪·彼德罗芙娜調升到高年級去了，代替她的是一个男教养員苏特金。瓦尔加說他是一个拍馬屁的家伙。他拍尼古拉·安东內奇的馬屁，拍德国人的馬屁，拍魯席切克的馬屁，还拍同學們的馬屁。

不过在这半年中，学校里也发生了一些較大的变动。第一，学校縮小了一半，一部份高年級同学轉到別的学校去了。

第二，学校大事油漆粉刷了一番，簡直認不出这就是从前的那些窗戶阴暗，天花板漆黑的肮脏房間了。

第三，大家都在談論共青团支部。現在的支部書記是瓦蓮阿姨，就是經濟委員會的那位姑娘，她在一九二〇年时，手里还拿着大杓子煞有介事地在走廊上走来走去。大概她是一位很好的書記，因为我回来以后发现共青团支部那間小屋成了我校最有趣的地方。

我那时还不是共青团員，但是从医院里回来后的第三天，我就接受了瓦蓮阿姨交給我的一項任务，画一架在云端里飞翔的飞机，并且在飞机的上面題上：“青年們，参加空軍友协去！”

我的指头这时好象还不是我自己的，然而我还是抱着极大的热忱去作这件工作。

总而言之，学校里比从前好玩了千百倍，我立刻参加到各种小組活动里去，并且对于集体讀报感到极大兴趣，完全忘記了伊万·伊万內奇医生，也忘記了他請我在五月二十号以前到他那兒去的这回兒事。

14 一枚五十戈比的銀币

在我終于决定到他家去的那一天，我們那兒一大清早就乱糟糟地吵成了一团，瓦尔加的刺猬找到了。原来它爬到頂楼上去了，后来不知怎么又掉到旧白菜桶里。

也許是它想起自己冬天沒有睡覺，也許是因为在桶里悶坐了两个礼拜以后身体虛弱了，所以它的神色不怎么好。无论怎样吧，應該設法赶快把它卖掉，因为它那付样子好象就要咽气了。触动它的鼻子时，它也不再藏起嘴巴，卷縮成一团了。它嘴巴周围紅褐色的鬍鬚萎靡地垂了下来。总而言之，这只刺猬完全不行了，只有把它送到大学里去，因为大学里有一个實驗室收买刺猬。瓦尔加用一条旧褲子把它包好便去了。过了一个小时，他一脸凄伤的走回来，坐到床上。

“他們要解剖它，”他对我說，为了不致哭出来，他的脸抽搐得很难看。

“怎么解剖？”

“很简单，就是切开肚子，在里面捣腾。真可怜。”

我們之間发生了一点兒爭論，是不是所有的刺猬的內脏都在一个地方。

“算了吧，管他呢，”我說。“另外再买一只。給了你多少錢？”

瓦尔加一声不响地松开了拳头。因为刺猬已經奄奄一息，所以只卖了二十戈比。

“我有三十戈比，”我說，“我們湊起来买一条折叠式的魚竿吧。”

我故意用折叠式的魚竿来安慰他。折叠式的魚竿是一种在小輪子上纏着长釣綫的，可以折叠起来的魚竿，因此可以把釣餌投到距岸四十公尺的地方。我还是在恩斯克看見过这玩意兒的，恩斯克的警察署长曾用折叠式魚竿釣过魚。

我們把錢湊起来，甚至还把我們所有的十戈比和五戈比的銀币拿去換了一块新的，五十戈比的銀币。我还没有見過五十戈比的銀币，不知道为什么，这种銀币很难碰到。

由瓦尔加的刺猬而引起来的这些事耽擱了我不少時間，当我脫开身去医生那兒时，天已經黑下来了。他住在牙齿大街，离我們很远，加之現在坐电車要付錢，不象一九二〇年那样了，但我还是白坐到了那里。

在牙齿大街花园深处的一座带圓柱的白色大楼里，只有一个窗口还有亮光，我断定这是医生房間里的灯光。可是我猜錯了。原来医生住在三楼，有灯光的是在二楼。八号房間，就是这間。房間号碼下面用粉笔写着粗大的字：

“此处住的是巴甫洛夫，不是列温松”。

巴甫洛夫就是伊万·伊万内奇医生的姓。

給我開門的是一个抱着小孩的女人，她不时嘯嘯的，怕我大聲講話，問我干什么。我說明了來意。她仍舊嘯嘯不絕地說，醫生在家，不過似乎已經睡了。

“你最好還是去敲一敲門，”她低聲說道。“大概還沒有睡。”

“我沒有睡！”醫生從什么地方喊道。“誰呀？”

“一個小孩。”

“讓他進來。”

我是第一次到醫生這兒來，屋子里那麼雜亂，使我感到十分驚異。在地板上，皮手套，古怪而漂亮的毛皮靴，茶葉包和煙草亂放在一起，敞開蓋子的皮箱和背包堆滿了一屋子。伊万·伊万内奇醫生手里拿着一個三角架，站在這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中間。

“啊，薩尼亞！”他愉快地說道。“你來啦。喂，怎麼樣？還活着？”

“活着。”

“好極啦！咳嗽嗎？”

“不。”

“你真行！老弟，我把你的事情寫了一篇文章。”

我心里想，他是在開玩笑。

“啞吧中少有的現象。”他說道。“你可以自己看看‘醫學報’第十七期，患者格某。老弟，那就是你。這下子你算是出名了。當然，暫時還只是以患者的資格而出名。但是一切還在將來哩。”

他唱起了：“一切在將來！一切在將來！”——忽然，他扑到

最大的一只箱子上去，砰的一声盖上箱盖，坐在上面，使箱子盖得紧一点。

医生大概是打算离开莫斯科。我本想問他到哪儿去，但是又一轉念，便决定先了解一下，为什么他的門上写着此处住的是他，不是列温松。

“伊万·伊万內奇，为什么您的門上写着住在这兒的是您，不是列温松呢？”

医生笑了起来。

“因为这兒住的是我，”他說。“列温松是住在隔壁房子里的。他的房間號碼是八号，我的也是八号。可是大門是公用的。明白了嗎？”

“明白了。”

医生这天談了許多話。我从沒有看見过他这样的高兴。忽然，他决定要送我点东西，就把一付皮手套送給了我，手套虽旧，但是还很好，腕口上扣着小皮带。我說不要，可是他不容分辯地把手套硬塞給我，說道：

“留下，不要声张。”

本来我應該謝謝他送我手套的，但是我沒有道謝，却說：

“您准备到哪儿去？离开这兒嗎？”

“离开这兒。”医生說道，“到最北边去，北极圈外。听說過嗎？”

我模模糊糊地想起了远洋航海长的信。

“听說過。”

“好的。老弟，我的未婚妻在那兒哩。你知道什么叫做未婚妻嗎？”

“知道。”

“撒謊。就算是知道，你也不明白。”

我开始仔細觀察他要帶走的一些五花八門的奇怪的东西：后档上縫着三角皮子的毛皮褲，有皮帶的金屬鞋底，等等。医生一面整理东西，一面不停地談話。有只箱子怎么也盖不起来，他把箱子盖揭开，把东西都倒在床舖上，这时，一张大相片掉在我的脚旁。这是一张相当旧的，发了黃的相片，好几个地方已經折坏了。相片的反面用粗大的渾圓的字体写着：“圣·瑪丽亚全船人員合影”。我仔細觀看这张相片，使我吃惊的是卡佳的父亲也在上面。一点兒不錯，就是他！他坐在正中間，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和在塔塔林諾夫家餐厅里挂的那张相片一模一样。可是在这张照片上我却沒有找到医生，因此便問为什么照片上沒有他。

“老弟，因为我沒有在‘圣·瑪丽亚’号帆船上航行过，”医生呼赤呼赤喘着粗气，一面扣着箱子上的皮帶，答道。

他从我手上把相片拿过去，斟酌了一下，考虑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好。

“这是別人留下作紀念的。”

我想問这个人是谁，是不是卡佳的父亲，可是，这时他已經把相片夹到書里，書又收到背包里去了。

“喂，薩尼亚，”他說道，“我該走了。你以后写信来，告訴我你都作些什么，感覺怎么样。老弟，你要記住，你是一个有趣的标本！”

我記下他的地址，我們就分別了。

我步行回家，途中繞道到提維尔大街去听广播。这是莫斯科的第一个扩音机。这台扩音机非常有趣，只是声音太响，不禁使我想起了演悲剧“時間到了”的格里什卡·法伯尔。

当我走到兒童教养院时，已經快十一点鐘了。我有点惴惴不安，怕大門关了。結果却不然！大門还开着，所有的窗戶里都有灯光，是出了什么事嗎？

我象枪弹一般飞奔到宿舍里去。空空的！床舖都已經舖好，大概是准备睡覺了。

“彼佳大叔！”我看到炊事員便喊道，这时他穿了一身新衣服，手里拿着帽子，正从厨房里出来。“出了什么事嗎？”

“請我去开会。”他很神秘地小声說道。

“什么会？在哪兒？”

“全体教职學員大会，”炊事員还是那样神秘地說道。

他大概已經喝得烂醉了，所以每說一个字，就閉起眼睛歇很久。等他刚开始向我解释，說既然他被邀請去开会，那么就應該穿戴得象个人样的时候，我已經跑上楼，回学校了。

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还有很多同学站在門口，站在走廊上。但我还是挤进去了，挤到紧靠舞台前的第一排坐下，不过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地上……

这是瓦蓮阿姨主持的一次庄严的大会。她的脸兒漲得緋紅，坐在主席团里，手里拿着一枝鉛笔，不断地將掉到脸上的一綫头发掠到耳后去。她是第一次在这样的大会上担任主席，因此很可以理解，为什么她会那样紧张。支部里的其他同学坐在她的两旁，用心地在写着什么东西。在他們头上，在主席团桌子上方，在整个礼堂上面，挂着我的宣传画。我惊喜得气都喘不上来了。这是我的宣传画——翱翔在云端里的飞机，并且在飞机上面題着：“青年們，参加空軍友协去！”可是把我的宣传画挂在这兒有什么作用这一点，我很久都沒有弄明白，因为发言的人都是講什么最后通牒的事。等到柯拉布略夫一講話，这才什么都

明白了。

“同學們，”他的聲音並不大，但卻很清晰。“蘇維埃政府收到了最後通牒，一般說來，大家對這份外交文件的意義估計很正確。根據大家的看法，這份文件的作者就是地道的帝國主義分子。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如果以為他們自己並不知道這一點，或者認為從你們口中才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那就完全錯了。不，我們應該用另外一種辦法來回答這個最後通牒！我們應該在我們學校里建立空軍友協分會！”

大家熱烈地鼓掌，後來柯拉布略夫每說一句話，大家都要鼓掌。並且，最後他還指了一下我的宣傳畫。我感到很光榮，全校的人都看着我畫的翱翔在雲端里的飛機，都念着上面的題字：“青年們，參加空軍友協去！”

隨後尼古拉·安東內奇也講了話，講得也很漂亮。後來瓦蓮阿姨宣布共青团支部全體加入空軍友協。願意參加者可以在明天早上十點至晚上十點到她那兒去報名。她臨時倡議為蘇維埃空軍募捐，把募得的款項寄給“真理報”社。

我這時大概很激動，因為離我不遠，大約隔三個人的地方，也坐在地上的瓦爾加帶着驚奇的神氣看着我。我掏出那個五十戈比的銀幣給他看了看。他明白了。他正想問什麼話，大概是想問折疊式漁竿的事，可是立刻又忍住不說了，只是點了點頭。

我跳上舞台，把銀幣交給了瓦蓮阿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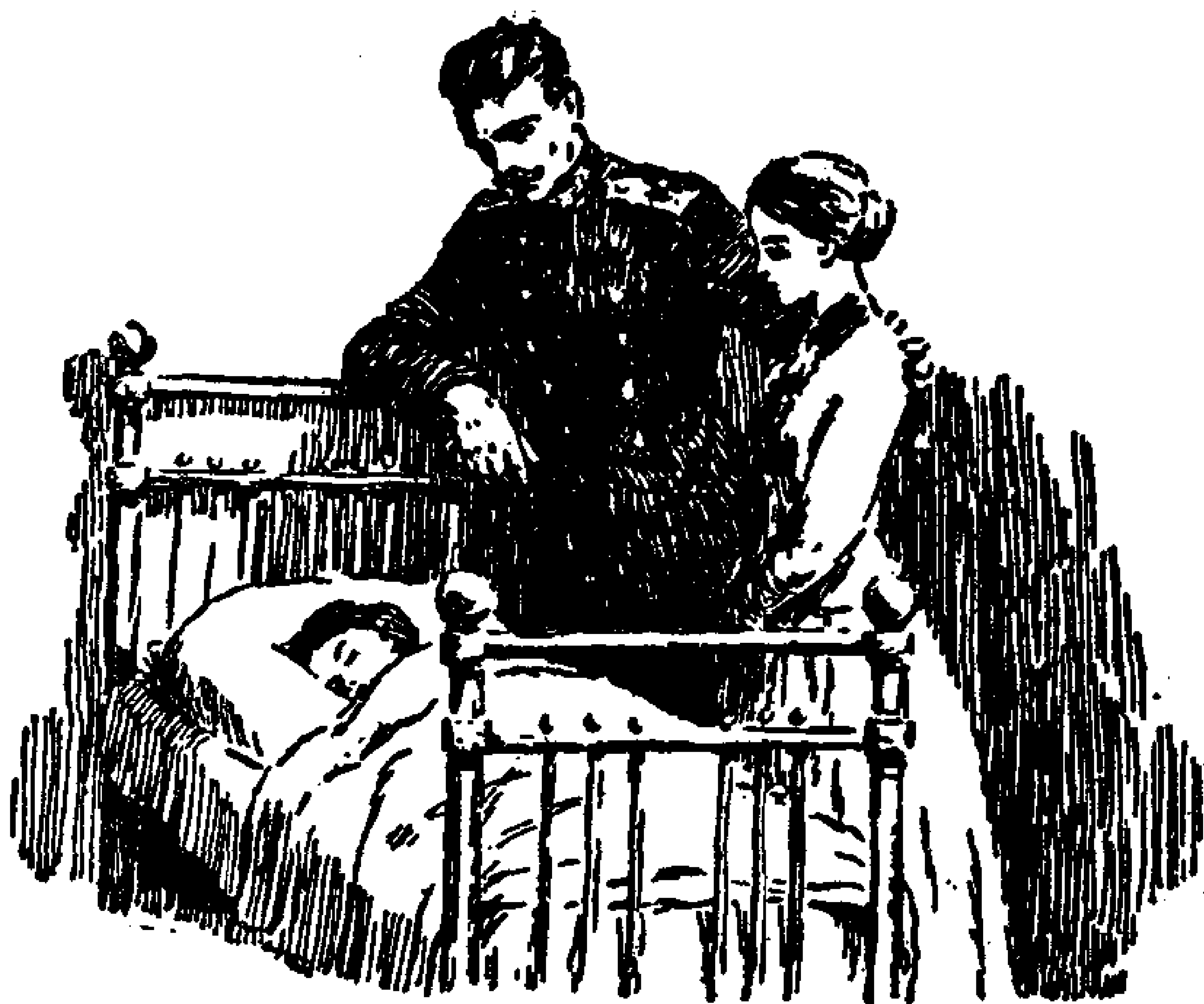
“伊萬·巴甫雷奇，”我問柯拉布略夫道，他正站在走廊上，用一根挺老長的煙嘴吸着煙，“考飛行員要幾歲才行？”

他一本正經地看了看我。

“不知道，薩尼亞。不過象你這樣兒，大概還不行吧……”

不行？我想起了和彼其加在教堂花園里互相許下的誓言：

“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过我并没说出声来，反正柯拉布略夫也不懂得这句话。



第三部 旧 信

1 四年間

我象是在看一場无声电影，脑海里想象着一座大时鐘，不过这座时鐘的长針指示的是年。轉了整整一圈兒——我看見自己在三年級了，和羅馬什卡坐一张書桌，柯拉布略夫正在上課。我和羅馬什卡打賭，讓他用小刀割我的手指，我絕不嚷痛，也不縮手。这是意志的考驗。根据“意志鍛炼規則”，我應該学会“不暴露自己的感情”。每天晚上我都要复习这些規則。終于有了这个好机会，我可以考驗一下自己了。

虽然今天的課很有趣：講楚克奇人的风俗习惯。可是全班誰也沒有听柯拉布略夫講課，大家都在注視着我們。

“割吧，”我对羅馬什卡說道。

这个坏蛋就用小刀狠心地割我的手指。我一声都没有叫。可是不由得缩了缩手，因此就算我输了。

有人吓得惊叫起来，窃窃私语声传遍了每一张书桌。鲜血不断地向外流，我故意纵声大笑，表示我一点也不痛。突然，柯拉布略夫要将我赶出教室去。我把手插在裤袋里，向外走。

“你可以不必回来了。”

但是我回来了。这一课很有意思，我坐在门边地板上听课。

意志锻炼规则！我整整锻炼了一年。我不仅试验着“隐藏自己的感情”，并且“不理睬你所轻视的人的意见”。我不记得这两条规则中哪一条最困难。也许是第一条，因为那时我有什么样的感情和思想，脸上就一定有什么样的表现。

“睡眠应尽可能减少，因为睡眠时不能控制意志”，——对于象我这样的人，这一条也不是太困难的问题。由此我体会到“一日之计在于晨”，我一生始终遵守这条规则。

至于最主要的规则“记住自己生存的目的”这一条，我并不需要经常复习，因为生存的目的在那时我就已经很清楚了……

大时钟的长针又转了整整一圈儿——这是一九二五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比谁都醒得早，但还躺在那儿，不知道是在睡呢，还是已经真醒了。我好象是在梦中，眼前出现了我们的恩斯克：碉堡的围墙，浮桥，倾斜的河岸上的房屋，卡耶尔·库里，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儿，带着训诫的神气在读别人书信的达莎阿姨，我——又矮又小，头发剪得短短的，穿着一条肥大的裤子。得啦，这难道是我吗？

我似睡非睡地躺着在想。恩斯克连同别人的那些书信，卡耶尔以及达莎阿姨一起逐渐隐退了。我想到塔塔林诺夫一家

人……我已經兩年沒有到他們家里去了。尼古拉·安東內奇始終忌恨我。我的姓不帶囉音，可是，他念我的姓時却帶着囉音。尼娜·卡比丹諾芙娜仍舊很喜欢我，不久以前，她还托柯拉布略夫向我“致意問好”。也不知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怎样了？还是坐在沙发上抽烟嗎？卡佳呢？

我看看鐘，快到七点了。該起床了，因为我对自己許下了諾言，要在起床鈴以前起来。我蹣着脚跑到盥洗室里，站在敞开的窗子前面作早操。天气很冷，雪花飘进窗子里来，旋卷飞舞，落在肩膀上便融化了。我把上身擦洗一番，便开始讀書，讀一本絕妙的書——阿姆生^①著的“南极”。我这已經是讀第四遍了。

南生^②完成有名的航行時，阿姆生才十七岁，作者叙述了自己欢迎南生归来時的心情，他这一整天都在裝飾着彩旗的街道上，在欢呼着的人群中走着，热血在太阳穴里冲击，青年人的理想在內心里激起了极大的波动。

寒气透过我的肩膀，我的脊背，我的腿，甚至連肚皮上也起了一层鷄皮疙瘩。我繼續讀着，生怕漏掉一个字。厨房里传来喧嘩声，姑娘們一面談笑，一面端着食具到飯厅里去，可是我还是在讀。我的脸发烧，热血在太阳穴里冲击，但我仍然怀着激动和兴奋的心情讀着。我知道，我永远也会記着这一刹那……

大时鐘的长針又轉了整整一圈兒——我看見自己在一間早就熟悉的小房間里，这三年来差不多每一个黃昏都是在这兒消磨的。我受共青团支部的委托，第一次領導了集体讀报小組。第一次——这太可怕了。我知道“目前形势”，“民族政策”，“国际問題”。然而，我更知道得清楚的是飞行高度，續航力，航程的世

① 卢阿尔·阿姆生(1872—1928)，挪威极地旅行和探險家。——譯者注。

② 弗里蒂奧夫·南生(1861—1930)，挪威海洋学家，北极探險家。——譯者注。

界紀錄。可是万一有人問起減價的事情就糟了！不過，一切都
很稱心。有一個小姑娘請我講講列寧的生平；說到列寧的生平，
那我可太熟悉了。

共青團支部會場里的人愈來愈多。柯拉布略夫站在門口，
聚精會神地聽我講。他用手指拈着鬍子，太好了，這表示他很滿
意。快樂和驕傲的感覺充滿了我的全身。我一面講，一面驚訝
地想：“啊，我講得多好哇！”

如果不算在篝火旁邊推翻斯喬巴·伊萬諾夫的領導那一次
的話，這是我第一次公開演講。這次演講大概是成功的。第二
天，政治教員把我叫了去，要我重講一遍列寧的生平，並且說：
“如果我生病，就由薩尼亞·格利高里耶夫代替我。”

大時鐘又轉了整整一圈兒——我這時十七歲了。全校的人
都聚集在禮堂里。一張大紅桌子後面坐着法庭的審判員。左手
是辯護人席，右手是公訴人席，被告席上坐着一名被告。

“被告，你叫什么名字？”審判長問道。

“葉夫根尼。”

“姓什麼？”

“奧涅金。”

這是值得紀念的一天。

2 葉夫根尼·奧涅金的審判

起初，學校里對演戲這玩意兒誰也不感興趣，但等到我們劇
團里的一位演員建議將“葉夫根尼·奧涅金的審判”改編成話劇
化裝演出以後，這事很快就傳遍了全校。

主角是专门邀请在戏剧学校已经学习了一年的格里什卡·法伯尔来担任的。他由于念旧的关系，偶尔也来看看我们初次上演的戏。公证人由我们自己的演员扮演，只是拉林娜家保姆的衣服没有找到，所以只好解释，说普希金时代保姆穿的衣服和我们现在的一样。辩护工作分给瓦尔加担任，公诉人由我们的教员苏特金扮演，审判长由我担任……

犯人戴着假发，穿着青色燕尾服，打着蝴蝶结的便鞋，长及膝盖的高筒袜，坐在被告席上，用一只断头铅笔漫不经心地剔着手指甲。他傲慢地，同时又有些迷惘地不时看看观众和审判员。照他看来，大概叶夫根尼·奥涅金在那种情况下是这样的。

老太婆拉林娜同她的几个女儿和保姆坐在证人室(过去的教员休息室)里。她们反而很紧张，特别是保姆，以她的年龄而论，她显得太年轻，太漂亮了一点。辩护人也很有紧张，不知为什么，他一刻不离地老拿着一个沉甸甸的文件夹。物证——两只旧式手枪，放在我面前桌子上。在我背后可以听到导演轻微而急促的提词声……

“你承认自己犯了罪吗？”我问格里什卡道。

“什么罪？”

“以决斗的方式进行谋杀。”导演悄声说道。

“以决斗的方式进行谋杀，”我说完后，看了看公诉状，又补充道，“谋杀十八岁的诗人符拉基米尔·连斯基。”

“永远也不承认！”格里什卡傲慢地答道。“你们应该分清楚，决斗不等于谋杀。”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开始讯问证人，”我宣布道。“女公民拉林娜，关于这件事您有什么可供的？”

在排演时，这一段很生动，可是到这时，大家不由得感觉到

要演不好。只有格里什卡如魚得水一般，他一会儿掏出小梳子来梳弄他的鬚鬚，一回兒用一种責难的眼光看着审判員，一会儿傲然仰着头，蔑視地微笑。当証人拉林娜老太婆說奥涅金在她們家里就同亲人一般时，格里什卡用一只手遮住眼睛，另一只手放在心口上，表示他是多么难过。他演得妙极了，我发现女証人，特别是达吉雅娜和奥尔加簡直是目不轉睛地瞧着他的。达吉雅娜倒还没有什么，因为根据故事，她是爱上了他。可是奥尔加呢，她就跟角色完全不符合了。观众也同样只是看格里什卡，我們是不被人注意的。

我叫女証人拉林娜老太婆退席，喚达吉雅娜出庭。哎呀，她放連珠炮似地都說了些什么呀！如果不是她的名字也叫达吉雅娜，以及她那鬆曲的鬚发披到了肩上，那么她和普希金的达吉雅娜就沒有絲毫相同之处了。在我問她是否認為奥涅金犯了謀杀罪时，她駢唇不对馬嘴地回答說奥涅金是个利己主义者。

我讓辯护人发言。从这会兒开始，一切都弄得顛三倒四了，一方面因为辯护人胡說白道乱講了一通，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看到了卡佳。

四年来她的变化自然是很大的。不过搭在胸前的辮子仍然卷成許多小圈圈兒，額上的头发同样也是鬆鬆曲曲的。她仍然带着那种凜然不可侵犯的神情眯縫着眼睛，鼻子还是那样的果断，就是再过一百年，大概我也能从这个鼻子上認出她来。

她聚精会神地听瓦尔加辯护。把辯护工作分配瓦尔加担任，这是最大的錯誤，因为他在世界上所感兴趣的只有动物。他一开始便极荒謬地断定：动物界也有决斗，可是沒有人認為那是謀杀。然后他又講到齧齿动物，講得那么津津有味，簡直不能想象他怎样才能回到为叶夫根尼·奥涅金辯护的本題上去。可是卡

佳却津津有味地在听。根据前几年的經驗，我知道她咬辮子就是表示感兴趣。女孩子当中，只有她絲毫也不去注意格里什卡。

瓦尔加突然結束了辯护，下面由公訴人发言。这可真是乏味极了。公訴人整整講了一小时，証明連斯基虽然是被十九世紀初叶的地主官僚社会杀死的，但叶夫根尼·奥涅金总應該負这次謀杀的全部責任，“因为任何决斗都是杀人，只不过是帶有預謀性罢了”。

总而言之，公訴人認為叶夫根尼·奥涅金应判处十年徒刑，并沒收其財產。

誰也沒有料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建議，因此引起了一陣哄堂大笑。格里什卡傲慢地蹦起来……我准許他发言。

据說演員能感受到观众的情緒，格里什卡这时大概是感受到了大家的情緒，所以他一开口便拚命地嚷。后来他解釋說这样做是为了“鼓舞会場”。然而他当时并沒能真正“鼓舞会場”。他的講話有一个缺点，就是使人无法了解他是代表自己，还是代表叶夫根尼·奥涅金在講話。叶夫根尼·奥涅金大概不致于說什么“連斯基自高自大”，或者“就是現在，为了刺中符拉基米尔·連斯基的心脏，他的手也不会发抖”。

总而言之，当他十分自得地擦着前額坐下的时候，大家才輕松地舒了口气。

“法庭变成討論会了。”

“快一点，小伙子們！”

“真沒有意思。”

“拖得太久了。”

这些話說得都很对，我們也不約而同地決定赶快把会开完。使我感到十分驚訝的是大多数审判員都同意公訴人的意

見，十年徒刑并沒收其財產。很明显，这不是因为叶夫根尼·奥涅金的关系。十年徒刑是大家准备給格里什卡判的，因为除了达吉雅娜和奥尔加两个女証人外，大家都討厭他了。但是我說，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格里什卡毕竟还是演得很好，要不是他，那更是一点兒意思也沒有了。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判处他五年徒刑。

“起立！判決开始！”

大家站起来，我宣讀了判決書。

“不对！”

“應該宣告无罪！”

“滾开！”

“好吧，同學們，”我很喪氣地說道。“我也認為不对。我認為叶夫根尼·奥涅金應該宣告无罪，对格里什卡应表示感謝，誰贊成？”

大伙兒哈哈大笑，一齐举手贊成。

“一致通过。會議到此宣告結束……”

我心里非常懊喪，我答应担任这个角色是吃力不討好。也許当时應該将审判這場戏变成开玩笑。不过應該怎么办呢？我覺得这次大家都看出了我是多么不善于随机应变，多么迟鈍。

我怀着这种郁郁不乐的心情往更衣室走去，刚好碰見卡佳。她刚取出大衣，正往出口附近人少的地方挤。

“你好！”她微微笑了笑，說道。“帮我拿一下大衣。你們这算什么审判！”

她說这話的样子，就好象我們昨天晚上还見過面似的。

“你好！”我沒精打彩地答道。

她很有兴趣地看了看我。

“瞧你变成什么样了！”

“什么样？”

“骄傲样呗。喂，去把大衣拿着，我们一块儿走！”

“到哪兒去？”

“哼，见鬼，到哪兒去！到街上拐角的地方也行。真不懂事。”

我没穿大衣，陪她往外走，可是走到楼梯口，她就让我回去。

“天太冷，风也很大……”

我在提维尔大街和公园凯旋路口的地方赶上了她，我永远也忘不掉她当时的样子。

她戴着灰色的遮耳帽，没有系上耳遮，等我跑回学校一趟，她额上的卷发已挂上了一层霜。风吹开了她的衣襟，她身子微微向前倾，站在那儿，一只手抓住大衣。她的身材不高不矮，非常匀称，也许还很漂亮吧。我所以说“也许”，那是因为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点。当然，在我们学校里没有哪个女孩子敢这样命令说：“去把大衣拿着，我们一块儿走！”

但是要知道，这可是我揪住辫子，将鼻子向雪里按的卡其加。她到底是卡其加呀！

她在我們那兒呆了两个钟头，对我们学校的一切事情就都知道了。她很惋惜大家所敬爱的图画教员布罗特曼去世了。她知道大家都打趣那个德国女人，笑她上了年纪还把头发剪得短短的，而且抹口红。她对我讲了我們即将出版的一期壁报的内容。原来这一期是“叶夫根尼·奥涅金的审判”特刊。有一幅漫画已经被大家传遍了。画上画的是瓦尔加，他口里喊着“动物界中也有决斗”，一面忙着劝解几只打架的狗。画上的格里什卡·法伯尔手里拿着小梳子，懒洋洋地注视着証人达吉雅娜和奥尔加。

“喂，为什么大家叫你船长呢？你想进航海学校，是吧？”

“暂时还不知道，”我说，虽然我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知道自己要进航空学校，而不是进航海学校。

我一直送她到我所熟悉的那座房子门前，她请我进去坐坐。

“不方便。”

“为什么？你和尼古拉·安东内奇关系不好与我有什么相干。姥姥常常想到你。进去吧，好吗？”

“不，不方便。”

卡佳冷冷地耸了耸肩膀。

“好，随你的便吧！”

我在院子里追上了她。

“卡其加，你这个傻瓜。我跟你說——这样不方便嘛。咱们最好还是一块兒到别的地方去，好吗？到冰場去怎么样？”

卡佳看了看我，突然把鼻子一翘，这是她童年时代常有的动作。

“让我想想看，”她很神气地说。“明天四点鐘左右挂一个电话给我。嘿，好冷，連牙齿都結冰了。”

3 在冰場上

还在我崇拜阿姆生入了迷的那几年，我脑子里便有一个幼稚的想法：要是阿姆生是坐飞机去南极，那一定要快很多倍。他日复一日地在茫茫无边的冰天雪地中前进实在是太艰难了！他跟着狗走了两个月，到最后这些狗都互相残食了。他如果坐飞机，只要一昼夜就能到达南极。假如要用他的朋友和熟人的名

字来給这次飞行中所能发现的山峰、冰川和高原命名的話，那么他們的名字就会大大地不够用了。

我每天都要从北极旅行記中摘录很多材料。我把报纸上关于早期在北极飞行的消息剪下来貼在一本旧帐簿上。这本帐簿的第一頁上写着阿姆生的船名“前进”。他給它取名“前进”，自己也的确是在努力前进，这是南生对阿姆生的評論。因此，前进就成了我当时的座右銘。我想象自己坐着飞机，跟着司考特，雪克尔頓，罗伯特·比利等人飞行，飞遍了每一条航綫。既然有飞机供我駕駛，那么，也应该学学它的构造。

按照我的第三条規則，——“决定了就作”，我念完了“飞机制造原理”。唉呀，这真是活受罪！不过，凡是不明白的地方，为防将来万一用着起見，我都把它們死背下来了。

我每天都要拆卸我想象中的飞机。研究它的发动机和螺旋桨。我用最新式的仪表来装备它。我对它了如指掌。現在只有一件事我还不知道，就是怎样駕駛着它飞行。但这也正是我想要学会的。

我这个决心对任何人，甚至对柯拉布略夫，都是严守秘密的。在学校里大家都認為我的精力太分散，可是我不願意別人說我学飞行是“新的兴趣”。这不是兴趣。我还在恩斯克时，有一天我和彼其加躺在教堂公园里，把手摊成十字，想要在白昼看見月亮和星星，有一架灰色的，象飞魚般的飞机輕巧地繞过浮云，消失在沙滩湾那边，从那时起我就决定作一个飛行員了。当然，这只是我覺得而已。不过，这架飞机能給我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总不是偶然的。大概我当时的确已經开始考虑現在占据了我全部思想的这个問題了。

就这样，我对所有的人一直保守着自己的秘密。可是有一

次，我突然把这个秘密泄露了。向誰泄露了呢？向卡佳。

这一天，我們約定一早就去冰場，可是总有一些事情来妨碍我們。不是卡佳耽擱了，就是我有事。最后好歹收拾妥当去了，可是，滑冰也不順利。第一：冰場被积雪封住了，冰場上正在扫雪，所以只好在严寒中等候了半个鐘头。第二：滑第一圈时，卡佳的冰鞋后跟就脫落了，只好用我带着的那根备不时之需的皮带将冰刀綁上。但倒霉的还不止此。我的那条皮带老松开，所以只好回到存衣室，把皮带交給那位怒气冲冲的紅脸修理匠，他正在一块肮脏的圓磨石上軋軋刺耳地磨着冰刀。他刚把扣带修好，皮带又断了。这是一条猪皮带，諸位不妨試試在严寒中将冻得曲扭了的猪皮带扎扎看，就知道要扎好是多么困难了！最后一切都弄好了，但雪又下起来了。我們手牵手地，一步左，一步右地滑了很久的大半圓圈兒。这种花样叫做荷兰步法。

下雪对优秀的滑冰家是有妨碍的，可是，看見冰場上忽然下起雪来也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事！在冰場上，雪花从来不会平平稳稳地落下来。因为人在冰上旋轉而带起一陣陣的风，所以雪花便不停地旋轉，并且，当它們还没有落在洁白的冰面之前，总是忽上忽下浮沉飘舞。这种景色非常美丽，使我感到世界上一切都很可爱。我知道，虽然那条硬得象生鉄般的猪皮带甚至已經磨破了卡佳的脚，可是她也感到世界上一切都很可爱，并且因为下雪，因为我和她在滑着瀟洒的荷兰式步法而感到快乐。

后来，我站在花样溜冰場的界繩旁边，看卡佳滑双八字的花样。起初，她总滑不好，生气說这完全是鞋跟不好的关系，后来突然滑好了，滑得非常出色，使得旁边一个正在努力滑圓圈的胖子也不禁哇哇叫起来，对她喊道：

“好啊！”

我听见她向他埋怨说鞋跟坏了。

的确是好！我冻得象条狗一样，于是我向卡佳挥了挥手，跑了两大圈暖和一下身子。

后来我们又溜荷兰式步法，然后坐到乐池前，卡佳突然把她那兴奋得热烘烘的，长着一双灵活的黑眼睛的绯红的脸凑近我。我以为她想对着我的耳朵说什么话，所以便大声问道：

“什么？”

她噗嗤笑了一笑。

“没什么，就这样。热得很。”

“卡其加，”我说道。“你知道吗？……你不会告诉别人吧。”

“谁也不告诉。”

“我要进航空学校。”

她眨了眨眼睛，接着便默不作声地~~盯着我~~。

“决定了么？”

“嗯。”

“完全决定了？”

我点了点头。

乐队突然奏起音乐来，她一面挥着~~连衣裙上的雪花~~，一面说话，我没有听清楚她说了些什么。

“我听不见！”

她拉住我的手，我们跑到冰场的另一边，靠儿童冰场的地方去。这儿漆黑漆黑的，一点声音也没有，冰场上积满了雪。滑坡两旁栽植着松树，冰场四周也是些小松树，我们仿佛置身在郊外树林里。

“能考上么？”

“是航空学校么？”

“是呀。”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問題。我每天早上都按照安諾亨法作柔軟体操，按照謬勒尔法洗冷水浴。我摸着自己的肌肉，想：“万一考不上怎么办？”我检查过眼睛、耳朵、心脏。校医說我很健康。可是健康程度也不一样呀，而且，他并不知道我是准备进航空学校的。万一我的神經有毛病，万一还有什么别的毛病怎么办？还有体高！最該死的是体高！这一年，我只长了一公分半。

“一定会考上，”我肯定地答道。

卡佳好象很敬佩地看了看我……

我們离开了冰場，这时已經熄灯了，穿毡靴的冰場看守人尖声吹起口哨，拿着一把扫帚向我們走来。他走在冰面上的样子显得很古怪，虽然是用平常的步子走着，可是移动得非常緩慢。

我們在空无一人的存衣室里脫下了冰鞋。小食店已經打烊了。可是卡佳走到女售貨員跟前，叫了她一声“姆媽”，那位售貨員便心軟了，卖給了我們每人一个面包，一杯凉茶。我們一边吃着，一边談。

“你多么幸福，已經决定了，”卡佳輕声叹了一口气，說道，“我还不知道将来怎么样哩。”

在我說了要进航空学校以后，我們談的全是一些正經事，主要的是談文学。她很喜歡革拉特柯夫的“水泥”，我因为还没有讀过这本书，挨了她一頓批評。总而言之，卡佳比我讀的書多得多，特别是文艺方面的書。

后来，我們又談到爱情，并且一致認為恋爱是瞎胡鬧。起初我还不大相信这种論調，可是卡佳很决断地說：“当然是瞎胡鬧”，

并且还举了革拉特柯夫書里的一个例子。于是我就同意了。

我們順着夜間漆黑的小胡同回家，这些小胡同是那樣的黑暗，神秘和幽靜，仿佛我們走的不是桌布胡同和刀兒胡同，而是在月亮上，走在异乎尋常的月光路上。

4 变 化

我和卡佳沒有談到她家庭里的事。我只是問了問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怎么样，她回答說：

“謝謝，沒有什麼。”

“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呢？”

“謝謝，沒有什麼。”

也許真是“沒有什麼”吧，不過，我想事情是不好的。否則卡佳也不必考慮是去冰場，還是去坐電車了。問題還不只是在於金錢上。我還記得很清楚，在恩斯克當卡耶爾·庫里成為我們家的全權主人，我和妹妹必須稱呼他“爸爸”的時候，我也是不願意回家的。照我看來，卡佳現在也有類似的感覺。到了一定要回家時，她的臉便立刻沉下來。她們家里是不和睦的。不久我遇見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更是徹底証實了這一點。

我們是在劇院里看“屠蘭多公主”時遇見的。卡佳買了三張票，有一張是給尼娜·卡比丹諾芙娜的。可是，尼娜·卡比丹諾芙娜不知為什麼沒有去，所以這張票就給了我。

我常到劇院去看劇。但文娛活動是一碼事，今天，有了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和卡佳又是一碼事。我向瓦爾加借來小翻領的襯衫，向羅馬什卡借了領帶，這個壞蛋還要了押金。

“万一你丢了昵？”

我只好留下一个卢布作押金。

我們不是从一个地方去的，卡佳几乎迟到。当收票員正要关门时，她才飞也似地跑来。

“媽媽呢？”

媽媽已經坐在剧院里。我們在黑暗中摸索我們的座位时，不小心踩了誰的脚，她招呼了我們一声……

在我們学校里，关于“屠兰多公主”大家談得很多，甚至还打算排演这个戏。格里什卡·法伯尔認為这个戏里所有的男角好象都是專門为他写的。第一場我沒有功夫去細看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我只覺得她仍然和从前一样非常漂亮，甚或比从前更加漂亮了。她換了一种发式，因此整个高大白淨的前額看得非常清楚。她笔直地坐着，目不轉睛地看着舞台。

但是在休息时，我可将她仔細看了看，頓時心里不禁感到很难过。她瘦了，老了。她的两只眼睛变得特別大，并且特別阴沉。我想，誰若是第一次看到她，一定为她这阴沉的眼光吓一跳。

我們談到“屠兰多公主”，卡佳表示她并不怎么喜欢这个剧。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喜欢还是不喜欢，所以也同意了卡佳的意見。可是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却說这个剧美妙极了。

“你和卡佳还是小孩，根本不懂。”

她問起我关于柯拉布略夫的情形，他的生活怎么样，我說：

“似乎很好。”

我发现在我說了这句话以后，她的脸有点兒紅。

实际上，柯拉布略夫生活得并不怎样好。刚交冬时，他大病了一场。我認為在刚才的情况下，即使柯拉布略夫感到自己很不舒服，他也同样会回答她說“很好”。当然罗，他並沒有忘記，

她曾經拒絕過他的求婚。

可能現在她也有點後悔了，否則關於他的事，她決不會問得這麼詳細。他教哪些班次？大家對他的態度怎麼樣？她對這些事情都感到興趣。

我總是簡單地回答，最後她生氣了：

“哼，薩尼亞，多一個字從你口裡都問不出來。總是‘是’和‘不是’，就象把舌頭咽下去了似的，”她憤憤地說道。

沒有經過任何話的引介，她突然談起了尼古拉·安東內奇來。真是奇怪。她說她認為尼古拉是一個非常好的人。我一句話也沒有說。

休息終了，我們進去看第二幕。但在第二次休息時，她又談起了尼古拉·安東內奇，我看到卡佳緊蹙着眉。她的嘴唇抖了抖，想說什麼話，可是又抑制住了。

我們在劇院休息室繞着圈兒來回地走着，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不斷地談着尼古拉·安東內奇。這真叫人難以忍受。同時使我驚訝和納悶的是，我想起了她以前對他那種態度。

居然滿不是這麼一回事！他原來是一個少有的慈善而高尚的人。他這一生都關心着他的堂弟（我第一次聽見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稱呼她已故的丈夫為萬尼亞），而且，那時他自己手頭也很拮据。為了供應他最後一次不幸的探險旅行，他犧牲了自己全部財產。

她熱情地說，尼古拉·安東內奇相信他。

所有這些事情，我從尼古拉·安東內奇本人口中都聽到過，而且也是同樣的說法。從前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是不講他說過的話的。这里面有些蹊蹺。尤其是她講這些話 雖然是自願，甚至很熱情，可是我總好象覺得這是她想使自己相信，事情的確

是如此：尼古拉·安东内奇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她已故的丈夫应该感激他。

整个第三场中，我都在想着这件事。我决定向卡佳问清楚她父亲的事。在我的想象中突然出现了这位海员的形象，宽大的前额，紧缩的下巴，和一双明亮灵活的眼睛。他没能带回来的那个探险队是一个什么探险队呢？……

散场以后，我们停留在半明半暗的剧场里，等候存衣室里的人稍微散一散。

“萨尼亚，你怎么总是不到我们家去呢？”玛丽亚·瓦西里耶芙娜问道。

我含含糊糊地应付了两句。

“我想尼古拉·安东内奇早已忘记了那次的糊涂行为了，”玛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继续认真地说道，“要是你愿意的话，我去和他谈谈。”

我根本不希望她去请求尼古拉·安东内奇允许我到她们家里去，我差一点没有对她说：“谢谢，不必要”。

可是，这时卡佳却说，这跟尼古拉·安东内奇没有丝毫关系，因为我是去找她，并不是去找他的。

“不，不！”玛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吃惊地说道。

“这是为什么呢？也来看我，也来看姥姥嘛。”

5 卡佳的父亲

它是一个什么探险队呢？卡佳的父亲是一个什么人呢？我只知道他是一个航海家，并且已经去世了。他真死了吗？卡佳

从来没有称她的父亲是“去世的”。总而言之，除了尼古拉·安东内奇特别爱用这个词以外，塔塔林诺夫家里的人平常很少提到他。每一个房间里都挂着他的象片，可是大家说起他的时候并不特别多。

我最后也懒得去揣测了，况且这问题可以直接了当地问问卡佳：她父亲在哪儿？是活着还是死了？于是我问了。

下面就是她讲给我听的。

那时她才三岁，但是却很清楚地记得父亲动身的那一天。他身材很魁梧，穿着蓝制服，两只手很粗大。一天大清早，当她还在睡梦中的时候，他走进房间，到她床前弯下腰，轻轻摸了摸她，说了两句什么话，大概是说：“玛莎，你瞧她一点血色也没有。答应我，以后让她多到室外去活动活动，好吗？”卡其加这时微微睁开眼睛，看见妈妈正在啜泣。但是她没有显露出自己已经醒了，她觉得假装睡着了是很快活的事。后来他们坐在敞亮的大厅里的一张长桌前，长桌上餐巾堆得象白色的小山一般。卡其加只顧出神地看起这些餐巾来，没有注意到妈妈已经离开了她，在妈妈的座位上现在坐着姥姥。姥姥不断地叹息，而且说着“主啊”。妈妈却穿了一件从没见她穿过的新奇的衣服，肩上挂着小珠子，和父亲并排坐在一起，远远地向卡其加挤眼。

餐桌上显得非常愉快，人很多，大家高声地在谈笑。但是等到父亲举着一杯葡萄酒站起来时，大家立刻安静下来。卡佳没有听懂他讲的什么话，但记得他讲完后，大家都鼓掌欢呼“乌拉”。姥姥又低声说：“主啊”，并且叹了一口气。大家同父亲及其他的海员道别。在分别的时候，他把卡其加高高地向上抛起，然后用他那两只慈爱的大手把她接住。

“喂，玛申加，”他向妈妈说。他们两个人便来回地吻起

来……

这是在恩斯克車站举行餞別晚餐和欢送塔塔林諾夫船长的情形。一九一二年五月，他回到恩斯克和家人辞別，这年六月中旬，他就自彼得堡乘“圣·瑪丽亚”号帆船启程赴海参崴……

起初一段時間仍和从前一样。只是在生活中出現了一件十分新鮮的事，这就是爸爸的来信，“等着吧，爸爸的信就要来了”。信果然来了。偶尔一两个礼拜也会沒有信，不过后来終究还是来了。最后一封信是从尤戈爾·沙尔来的。真的，这是最后一封信，不过媽媽并不怎么特別忧虑，甚至还說，这是應該的，因为“圣·瑪丽亚”号所走的地方沒有邮局，甚至除了冰块和积雪以外什么也沒有。

这是應該的。爸爸自己也这样說过，以后不再有信了。但这毕竟是令人很愁悶的，媽媽一天一天变得更沉默，更忧郁了。

“爸爸的信”——这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东西了。譬如說吧，爸爸来信后，姥姥总要烘点心。可是現在呢，代替这使得大家快乐的再好不过的东西，就是生活中出現了老是說來說去的令人煩悶的話：“这是應該的”，或者“暂时还不会出什么事”。

这些话每天反复地說着，特别是在傍晚，当卡其加已經躺下睡觉的时候，媽媽和姥姥还說了又說。卡其加就在一旁听着。她老早就想說：“大概是狼把他吃掉了。”可是她知道，这样媽媽一定会发怒，所以便沒有說。

爸爸老是在“过冬天”。恩斯克早已是夏天了，他还是在“过冬天”。这实在是令人納悶，但是卡其加什么也沒有問过。有一次她听見姥姥对隔壁的女人說：“我們总是說他在过冬，可是他是不是还活在人世呢，这真是天知道。”

后来媽媽写了一份“上陞下書”。这时卡其加已經长大了，

所以書的內容她記得特別清楚。塔塔林諾夫船長的妻子請求裝備一支救生隊，去援救她不幸的丈夫。她指出，“探險的主要動機，無疑是為了全民的驕傲和國家的榮譽”。她期待着“最仁慈的陛下”不要讓這位英勇的，隨時準備獻出自己生命為民爭光的探險家陷於孤立無援的絕境……

卡其加當時以為“陛下”是一種類似宗教行列的東西：前面走着戴紫紅色帽子的主教，後面跟着許多人。後來才知道這就是沙皇。沙皇很久沒有答復，所以姥姥每天晚上都要罵他。後來從他的侍從室來了一封信。侍從室很委婉地建議媽媽去找海軍大臣。但是找海軍大臣是不會有什麼效果的。這事已向海軍大臣報告過，他却說：“可惜塔塔林諾夫船長沒有回來。否則，他這樣輕率地對待國家財產，我要馬上把他送法院法辦。”

後來，尼古拉·安東內奇到恩斯克來了，於是家裡便出現了新的說法：“毫無希望”。他把這話悄悄地告訴了姥姥。可是不知怎麼還是被姥姥的親戚布賓其可夫家和卡其加的女朋友們知道了。除了媽媽以外，大家都知道了。

毫無希望。他再也不會回來了，再也不會講什麼逗樂的話了，再也不會同姥姥爭辯說：“飯前喝一杯伏特卡酒很有益處，即使無益，至少也無害，如果無害，那就痛快了。”他再也不能因為上劇院去看戲時媽媽穿衣服的時間太久而打趣媽媽了。誰也聽不到他每天早上穿衣服時唱的“我們的生命是什麼？生命如兒戲！”的歌聲了。

毫無希望！他留在遙遠的地方，留在北極的邊沿，留在冰天雪地里，他的探險隊中一個人也沒有回來。

尼古拉·安東內奇說這是爸爸自己的錯誤。因為探險隊的準備非常充足。僅面粉一項，就多达五千公斤，澳大利亞肉罐頭

一千六百八十八公斤，火腿二十只，斯柯利科夫^①湯粉七十公斤，还有那么多的面包乾，通心粉，咖啡！有一間大艙房被隔成了两半，乾面包便裝了半間。甚至还帶了四十公斤龙鬚菜。还有果醬、乾果。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花尼古拉·安东內奇的錢买的。另外还挑选了八十只頂好的狗，以备遇險时用它們駕着雪橇回来。

归根結蒂，如果爸爸罹難了，那么毫無疑問，这是因为他自己的錯誤。很容易想象这样的情形，譬如說，在某个地方應該等一等，而他却着急赶路。照尼古拉·安东內奇的看法，他这个人总是急急忙忙的。不管怎样吧，他是留在北极了。誰也不知道他是活着还是已經死了，因为探險队三十个人中一个人也沒有回来。

然而在他們家里，在大家的心中，他还活了很久。說不定，忽然間門一开他走进来了呢！他仍旧和最后在恩斯克車站那天一样：穿着蓝制服褂，洁白的硬衬領，敞着口。这种样式現在已經不时兴了。他还是那么快乐的样子，两只手还是那么粗大。

家里还有好多事情和他有着連系。媽媽抽烟，大家都知道，她是在他失踪后才抽起烟来的；姥姥总是攆卡佳到室外去，这也是因为他吩咐要卡佳多到室外活动；窄狹的玻璃櫥里放着許多名称古怪的書，这些書誰也不讓讀，因为这是他的書。

后来，他們搬到莫斯科尼古拉·安东內奇的风子里来住，因此一切都改变了。現在誰也不再盼望房門会突然敞开，他会突然走进来的事了。因为这是別人的房子，他从来也沒有在这兒住过。

① 斯柯利科夫是俄国的名廚师。——譯者注。

6 更多的变化

若不是卡佳答应把船长的書和地图給我看，大概我是不会去塔塔林諾夫家的。我看了一下航綫，原来这就是摸索了三百多年的，有名的“东北通道”。最后，在一八七一年，一个瑞典的探险家諾登塞尔特^①穿过了这条通道。沒有疑問，这件事并不是那么簡單，因为一直过了二十五年，才有第二位探险家維尔基茨基重走这条航路，所不同的只是他由相反的方向走的。总之，这一切都非常有趣，于是我决定去了……

塔塔林諾夫家的房子里并沒有有什么改变，只是东西显著少了。

同时，那张我曾經非常喜欢，画着花园里一条笔直寬闊的道路和太阳光照耀着的松树的列維坦的名画也不見了。我問卡佳这幅画到哪兒去了。

“送人了，”卡佳簡短地答道。

我沒有作声。

“送給尼古拉·安东內奇了，”卡佳突然带点諷刺的口吻补充說，“他崇拜列維坦。”

大概送給尼古拉·安东內奇的还不只是列維坦的画，因为餐厅里好象完全空了。不过那只航海用的罗經还依然如故地放在原来的地方，指針仍旧指着北方。

誰也不在家，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不在，老太婆也不在。

^① 諾登塞尔特（1832—1901），瑞典人，北极探险家，在一八七八年第一个經由东北通道从大西洋到达太平洋。——譯者注。

后来老太婆回来了。我听见她在门厅里脱衣服，一边向卡佳抱怨说什么东西都涨价了：白菜十六戈比，小牛肉三十戈比，祈祷费四十戈比，鸡蛋一卢布二十戈比。

我笑了起来，走到门厅里去。

“尼娜·卡比丹诺芙娜，檸檬呢？”

她莫名其妙地转过身来。

“野孩子没把檸檬扒去吗？”

“薩尼亚！”尼娜·卡比丹诺芙娜把手一拍，惊喜地说道。

她把我拉到窗户跟前，前后左右仔细打量了一番，显出不满意的神气来。

“还是不高，”她惋惜地说道。“你怎么不长个兒呢。”

她跑到厨房里，把牛奶放在打汽爐上，过了一会，又回来了。

“你又想起檸檬的事来了，”她说完也笑了。“这又能怎么样呢！现在还不是要扒！”

她显得十分苍老，背也驼了，人也瘦了。那件我熟悉的綠天鹅絨大坎肩披在她的身上，两只瘦肩膀高高地耸着。不过她的精神仍然和从前一样健旺，样子看来，总是在想什么心事，但却显得較以前愉快了。我真没有想到她会那么喜欢我。

“人家說应该吃生荞麦，”她很有把握地说，“吃生荞麦就能长个兒，从前在我们恩斯克有一个小牧师，就那么一点兒高！他成天吃生荞麦。”

“长高了没有呢？”卡佳很正經地问道。

“没有长高，可是他的声音变粗了些。以前他說起話来是尖声尖气的。”

她笑了，突然想起了牛奶来。

“哎呀！牛奶跑出来了！”

她自己也跑出去了。

我和卡佳把船长的書和地图看了很久。这兒有南生写的“在冰雪和黑夜的国度里”及“喀拉海的水路图紀”等等。总之，書虽不多，可是每一本都很有趣，我很想借几本来讀，但我十分明白，这显然是很不好意思开口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卡佳突然对我說：

“你想看嗎？拿几本去吧。”我不免感到十分惊讶。

“可以嗎？”

“可以，”卡佳連看也不看我地回答道。

我没有浪费时间去寻思，为什么独独对我这样信任，便立刻着手选择書籍。我已不得把所有的書都借了去，但这样作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便挑选了五、六本。其中也有一本船长自己写的小册子：“格里尔探险队罹难的原因”。

我故意躲避着尼古拉·安东內奇，所以这次是在通常开教务会议的时间来到塔塔林諾夫家。可是，这次会议大概是更改了时间，所以他回来了。我和卡佳談得那么热烈，連門鈴声都沒有听见，就突然听见隔壁房間里的脚步声和威严的咳嗽声。卡佳皱起眉头，砰地一声把門关上。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門又开了，尼古拉·安东內奇出现在門边。

“卡秋莎，我跟你說了几千次，你不要把門弄得这么响，”他說道。“你現在也到了应该改掉这些习惯的时候了。”

当然，他立刻就看到了我，但是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微微地眯縫起眼睛来，点了一下头。我也点了点头。

“我們生活在人类社会中，”尼古拉·安东內奇繼續温和地說道。“推进这个社会的动力之一就是互相尊重的精神。你本

来也知道，卡秋莎，我忍受不了猛烈的关门声。我只能认为你是故意这样作的，不过我不愿意这样想，是的，不愿意……”

诸如此类的话他还说了许多。

我立刻明白了，他罗罗嗦嗦地说这一篇鬼话，不过是为了激怒卡佳。可是我想到从前他根本就不敢和她这样谈话呀。

他终于走开了，但我们已经没有兴致再看船长的书了。并且，在尼古拉·安东内奇讲话的时候，卡佳始终背向着放书的桌子站着。他什么也没有发觉。不过我倒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是不便让他知道她让我拿这些书！

总而言之，兴味被破坏了，我于是准备回家。可惜我没有立刻就走！我和卡佳辞别时，稍微迟延了一会儿，结果尼古拉·安东内奇又转回来了。

“卡秋莎，你可能是生气了。”他重又开始说道。“这样可没有道理！毫无疑问你很清楚，不论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或者从一个教育者的身份来说，我都是希望你好的。”

他向我瞥了一眼，把眉头一皱，很厌恶地用鼻子吸了吸气。

“假使你和我的关系完全是路人，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可是你是我死去的亲爱的堂弟的女儿。你是我为他牺牲了一切，不只是全部家财，也可说连自己生命的人的女儿。”

我想，尼古拉·安东内奇为他死去的堂弟所牺牲的东西怎么一年比一年多了。过去还只是说“精神上 and 物质上的”援助，现在他竟然连自己的生命都交给他了。

“所以，”尼古拉·安东内奇继续说道，“卡秋莎！什么事情我都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对你说。我经过一天劳动之后已经够累了，有权利要求休息，可是，你看，现在还要我来同你说话，尽力开导你。其实，从你的年龄或是从你的发育上来看，这些道理

你都应该自己领会到了。”

卡佳一声不响。

我看出她是多么难受！但是她的意志是很坚强的。

他没有讲完以前，我是不便走开的。况且，要走就只好不帶書走。所以我就坐下来。我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侮辱他，只不过是因为我站累了。可是他却恼怒起来。

“卡秋莎，我提醒你，”他用一种平静，柔和的腔调继续说道，“有一句有名的罗马俗话说：‘观其友而知其人’。假如你认为可以和这种人交朋友，他脑子里从来没有想过在坐下时要請师长先坐，那么……”

尼古拉·安东内奇作出一付无可奈何的神情将手一摊。

正是因为我这样作时，根本没有想到要侮辱他，因此我感到很难为情。可是这时卡佳却再也忍不住了。

“我爱和誰交朋友这是我个人的事！”卡佳迅速地頂撞了一句，脸都气紅了。

可以这样说，尼娜·卡比丹諾芙娜一定就在近处，甚至就在門外边。因为卡佳刚說完这话，她馬上就走了进来，张罗着打圓場：牛奶开了，問尼古拉·安东内奇要不要咖啡？其实她刚才从市場上回来，而且这时距午飯時間还早……好象她已經不是头一次来打断这类爭吵了！卡佳固执地低着头听她講。尼古拉·安东内奇显出很有礼貌，但似乎很迁就的样子……

我等到他們全都走了以后，才和卡佳道別。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去了。我很可怜她們，可怜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可怜老太婆和卡佳。塔塔林諾夫家的这些变化太不合我的心意了。

7 批語。 瓦尔加的齟齬動物。 老相識

這是在學校里最後的一年，老實說，這時本來應該加緊學習，不應該上冰場或者去串門了。有幾門功課，譬如數學和地理，我學得還不錯。可是，另外幾門，譬如文學，卻相當差。

教我們文學課的是李和，他是一個笨頭笨腦的人，全校都稱他為李和驢。他總是戴着一頂庫班帽子，於是我們就在黑板上畫一頂這樣的帽子，帽子里用投影画法畫着驢耳朵。李和不喜歡我有這樣一些原因。第一，有一次在默寫時他把“抽象地”說成了“袖象地”。我給他糾正了，我們爭吵起來，我提議去問科學院，因此傷了他的感情。

第二，大多數的同學作文都是抄書本和抄別人的文章，念過一篇評論就抄下來，可是我不高興這樣作。我是先作文再讀評論。這也正是李和所不喜歡的！他批道：“標新立議。極劣！”顯然，他是想說“立異”的。誰能標新立議呢？總之，我害怕這一年的文學課要得“劣等”了。

最後的“畢業”作文，李和給我們出了幾個題目，我覺得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十月革命後文學中之農民”。我懷着很大的熱情開始寫這個題目，可是這種熱情不久就涼了下來，這可能是由於卡佳給我的這些書的關係。讀了這些書之後，我開始感到自己的作文太乏味了。

這些書豈止有趣！而且這是卡佳父親的書，是和弗蘭克林，安德萊等人一樣在冰天雪地里失蹤的北極船長的書！

我一生從來沒有這麼慢地讀過書。這些書上幾乎每一頁都

有批注，有些行的下面画了綫。空白处画着問号和惊叹号。有时船长“完全同意”，有时“完全不同意”。他居然和南生爭辯，这使我很惊讶。他責备南生，說他只差那么四百公里沒能到达北极，就回到大陆了。在南生書中所附的地图上，南生航路最北的一点用紅色鉛笔圈着。看起来这个問題是船长非常关心的。所以在其它書里的空白处，他不止一次地提到这最北的一点。有一頁書上順写着：“冰原本身会解决这个問題”。我翻过这一頁，突然一张发了黃的紙片从書里掉出来。这张紙片上也用同前面一样的笔迹写滿了字。下面就是这张紙片上所写的：“在这个問題上，人类用去了多少聪明才智，尽管以往大多数探险家在北极找到的只是残酷的坟墓，但解决这个問題已成了国际間热烈的竞赛了。在这一竞赛中，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人参加，只是沒有俄罗斯人。其实，远在罗蒙諾索夫时代，俄罗斯人已經兴起开发北极的热潮，而且这热潮直到今天仍然沒有减退。阿姆生希望無論如何要为挪威保持开拓北极的荣誉，可是我們今年也决定要去，并且要向全世界証明，俄罗斯人是能够建立这种功勛的”。

这大概是篇报告書中的一段，因为反面写着“航务总局局长鈞启”，日期是“一九一一年四月十七日”。

可見，这就是卡佳的父亲希图去的地方！他想效法南生，随着漂流的冰块尽可能地向北走，然后駕着狗拖的雪橇到达北极。我照自己的老习惯計算了一下，他要是坐飞机飞到北极可以快多少倍。

只有一个問題不明白：一九一二年夏天，“圣·瑪丽亚”号帆船是从彼得堡揚帆去海参崴的，可是这兒却干嗎提到北极呢？

第二天，还在开早飯前，我就跑到門房里去挂電話給卡佳：

“卡其加，难道你父亲是去北极的吗？”

她大概没料到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听见一种惊奇的，好象还在睡梦中似的哼哼的回答声。后来她才说：

“不一不是，怎么啦？”

“没有什么，他想从南生到过的最北点，用狗拖着雪橇到达北极。唉，你呀！”

“什么‘唉，你呀’？”

“连自己父亲的这些事都不知道。你今天有空吗？”

“同琪尔加去动物园。”

呃，去动物园！瓦尔加很早以前就邀我到动物园去看看他的齙齿动物，真糟糕，我直到现在还没有去！

我告诉卡佳说我在门口等她。

琪尔加就是以前读过“杜布洛夫斯基”，并且证明“玛莎嫁给了杜布洛夫斯基”的琪玲。她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缠着金色的发辫的大姑娘了。她还和从前一样老是呆呆地看着卡佳的嘴，倾听着卡佳说的每一个字，只不过偶尔用哈哈大笑来代替反驳。她笑得那么突然，那么响亮，大家不禁为之毛骨悚然。这时卡佳使用她那习惯了的表示忍耐的动作将耳朵堵住。

我和瓦尔加约定，要他在门口接我们，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来。既然他夸口说可以免票带我们进去，如果现在又去买票，那就未免太傻了。

后来他终于来了，当我介绍他同姑娘们认识时，他的脸都臊红了。他嘟嘟囔囔地说，恐怕“你们对齙齿动物不感兴趣”。卡佳很有礼貌地不同意说，如果根据他替叶夫根尼·奥涅金作的辩护词来推测齙齿动物的话，相反的这倒是很有趣的。于是我们规规矩矩地走过看守人身旁。瓦尔加对看守人连说了三遍，说

他是动物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这些人都是来“看他”的。

那时的动物园和现在不一样。许多馆都封闭着，此外就是最普通的，披复着白雪的露天平地。瓦尔加说这上面住着北极狐，它们还有洞穴等等。可是我们除了白雪之外，什么北极狐也没有看见，甚至根本什么也没有。所以只好姑且相信瓦尔加说的话。

他急切想让我们看他的啮齿动物，所以连老虎、大象等别的有趣的动物也不许我们多瞧，就带着我们穿过全动物园，走到一间十分污秽的屋子。在这间屋子里养着瓦尔加的啮齿动物。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是怎样理解这个名词的，但等我们看了之后，便都装作似乎早就明白，原来啮齿动物就是普通的老鼠。

瓦尔加带着得意的神气向我们说明，老鼠非常之多，而且都被感染了某种病。他说，他管理的啮齿动物之中还有蝙蝠，并且他用手喂它们虫子吃。一般说来，虽然屋子里臭得厉害，但这还是相当有趣的。瓦尔加讲来讲去老也讲不完。

我们带着钦佩的神情听他讲，特别是琪玲。后来她突然打了一个冷战，说她讨厌老鼠。

“傻瓜，”卡佳轻声对她说道。

琪玲笑了起来。

“真的，脏得要死。”她说道。

瓦尔加也笑了。我看出他因为自己的老鼠挨了骂而感到伤心。我们谢过他，又向前走了。

“多没意思！哪怕看看猴子也好哇，”琪玲这样建议。

于是我们便去看猴子。

那兒这么臭哟？！就连瓦尔加的啮齿动物还没有这么难闻

哩！琪玲說她簡直不能呼吸了。

“唉呀，瞧你！這兒的看守人該怎麼辦呢？”卡佳說道。

我們都瞅了瞅看守人，那人傻里傻氣裝模作樣地站在鐵籠旁邊。

這是卡耶爾·庫里！乍見之下，我還不敢相信，因為我已經十多年沒有見着他了。然而這時他走上前來，用他那低洩討厭的聲音說：

“狐猴……”

是他！

我盯着他看了看，但他已不認識我了。他已經老了，鼻子長得象個鴨嘴似的。鬚髮也不似從前那樣，而是變得稀疏，骯髒，斑白了。過去那個雄糾糾的卡耶爾·庫里，現在只剩下臉上的卷圈兒胡子和粉刺了。

“在這種動物的胸部和腹部，”卡耶爾帶着那種我極為熟悉的威嚇人的教訓神氣繼續說道，“諸位可以看到它們的乳頭，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奶它們小孩的器官。”

是他，是他！我感到好笑。卡佳問我笑什麼。我湊近她的耳邊低聲說：

“你瞧他。”

她看了看他。

“你知道，他是誰嗎？”

“你說吧。”

“我的繼父。”

“瞎說！”

“實話。”

她不相信地揚了揚眉毛，然後眨了眨眼睛，又繼續聽下去。

“在下一个籠子里，諸位可以看見一种类人的长臂猿。这种长臂猿和人类极其相似。这种长臂猿有时也会感到煩悶。这时，他就象发疯似地在籠子里乱窜。”

可怜的长臂猿啊！我想起从前，当这个坏蛋打开他那无休止的話匣子时，我是多么“煩悶”。

我向卡佳和琪玲瞥了一眼。她們一定以为我是发了神經病！如果我要放过今天这样的机会，那可是連我自己也要瞧不起自己了。

“笔划必須吹直，”我声音不高地說道。

他斜着眼看了看我，但我装作正在用心看长臂猿的样子。

“在下一个籠子里，”他繼續講道，“諸位可以看到直布罗陀出产的无尾猿。她的发育很象小孩。它口里有一个肉袋，通常用来儲藏食物中甘美的东西。”

“好啦，明白了，”我說。“每一个人都想捞到一块肥肉，可是在他得到这样一块肥肉以后，能不能就說是滿足了呢，这还是一个問題。”

我自己都沒有料到还能把这些鬼話背出来。琪尔加噗嗤一声笑了。卡耶尔不再說下去了，他用一种傻里傻气但是疑虑的神情把我打量了一下。大概一种蒙朧的回忆在他那猪头里閃了一下……不过他还没有認出是我来。一定的！

“我們保管它們吃飽，”他換了另外一种低沉的一本正經的腔調說道。“它們每天狼吞虎咽地吃个不停。若是換成人的話，决不可能象这种畜牲吃得那么多。”

他忽然察覺話扯得太远，便收住了口。

“諸位看看它們的臀部，”他繼續說道，“就可以看見它們这一部分紅得很不正常。这并不是肉皮，而是一种类似茧子的硬

皮。”

“請你告訴我，”我很正經地問道。“有沒有會說話的猴子呢？”

琪玲不禁笑了起來。

“沒有聽說過，”卡耶爾不敢肯定地說道。他不知道，我是在逗樂還是說正經話。

“有人同我講過一個猴子，它以前在輪船碼頭上工作，”我接着說道，“後來被開除了，這個猴子就開始來教育小孩子。”

卡耶爾勉強笑了笑。

“誰的小孩子呢？”

“別人的。這個猴子用腳踏板打他們，”我繼續說着，感到舊日的回憶使我的心劇烈地跳起來，“特別是打小女孩，因為它怕男孩會照樣對付它。”

我的聲音愈說愈高。卡耶爾張大着嘴在聽。他突然驚駭地將嘴閉上，眼睛不住地震着。

“孩子們吃過飯還得向這個猴子謝謝，”我掙開了慌慌張張拉住我手腕的琪爾加。“這個卑賤的猴子雖然不工作，可是還依賴別人生活下去，只是從早到晚擦它那雙該死的皮靴。後來它參加了敢死隊，因此得了二百盧布和一套新制服。它還發表過談話哩！”我這時大概恨得咬起牙來了。“這支敢死隊被打垮了以後，猴子逃出了城，並且把這個家里所有的東西都席卷一空。”

大概當時我的聲音嚷得很高，所以卡佳突然站到了我和卡耶爾的中間。

卡耶爾嘴里囁嚅着不知說了些什么，把身子靠在鐵籠上。他認出是我來了。他的嘴唇也在歪來歪去的。

“薩尼亞！”卡佳用命令的口吻說道。

“別急，”我推开她。“这只猴子跑掉了，总算是它的运气。要不然我一定把它……”

“薩尼亞！”

記得当时使我惊奇的是他突然尖叫了一声，双手把头抱住。我冷靜了下来，很不好意思地强笑着看了看卡佳。因为我自己这样大声叫嚷不免感到慚愧。

“走吧，”她简单地說道。

我們在动物园里走着，大家都不作声。我看到琪尔加惊駭地眨着眼睛，而且总是离我远远的。卡佳在她耳边低声地說了些什麼話。

“坏蛋，”我嘟囔着說。

我一直不能够鎮靜下来。

“今天就通过瓦尔加轉告动物园，問他們为什么收留这样一个坏蛋？他是一个白匪。”

“我現在实在怕你，”卡佳說道。“你原来是个疯子。你瞧，嘴唇都气白了。”

“因为我想杀死他，”我說道。“算了，去他媽的！讓我們来談談別的事吧。你們喜欢长臂猿嗎？”

8 舞 会

我們学校附設了一个木工厂，我每天晚上在厂里作工，正好在这个时候我們收到了大批訂貨，是給农村小学校作教具，因此可以好好地掙几个錢。

“十月革命后文学中之农民”已經写完，是我一气之下花了一夜的功夫将它写完的。不过我还欠了一些債要还，例如我不喜欢的德文。所以，在学期末尾，我和卡佳只去过一次溜冰場，而且还没有溜冰。冰場被划損得太厉害了：冰球队从一早就在冰場上練習。我們仅在小食店里喝了点茶。

卡佳問我关于繼父的事写了报告沒有。

“沒有，还没有写。不过瓦尔加說他反正已經不在了。”

“那他在哪兒呢？”

“鬼知道他。逃跑了唄。”

我看出卡佳想問我为什么那么恨他，可是我很不願意回忆这个坏蛋，所以沒有作声。她終究还是問了。我只好簡簡單單地講了一遍：我們怎样在恩斯克居住，父亲怎样死在監獄里，母亲怎样嫁給卡耶尔。卡佳听說我还有个妹妹后感到很惊讶。

“她叫什么名字？”

“也叫薩尼亚。”

当她知道我自从离开恩斯克以后，还没有写过一封信給妹妹时，她更加感到惊讶。

“她几岁了？”

“十六岁了。”

卡佳气憤地看了看我。

“猪仔！”

这的确太不象話了，我发誓說一定写封信到恩斯克去。

“等毕业后就写。現在有什么可写的呢！？我已經写过好几次了，还不是你好，我好……真沒有意思。”

这是寒假前我們最后一次的会見。随后又是学习，学习，讀

書，讀書。我早上六點鐘起床，接着便讀“飛機製造學”，晚上在木工廠工作，有時一直工作到深夜……

這個學期終於完了。放十一天假！我所作的第一件事是打電話給卡佳，請她到我們學校里來參加化妝舞會。布告上寫着晚會的性質是破除迷信。可是同學們對這種意圖都不關心。只有兩三個人的衣服符合破除迷信的主題。如舒拉·柯乞涅夫。大家愛同他這樣逗唱：

午夜十二點

白菜頭^①從寢室里走出來，

他今天化裝成個波蘭天主教神甫，樣兒非常帶勁！黑法衣和寬邊帽正適合他那頗長的身子。他帶着一副凶惡的樣子走來走去，使得大家都感到恐懼。他扮演得很逼真，所以逗得大家都好笑。還有一些同學拖着法衣哈哈大笑。

卡佳來得相當晚，我都想掛電話去叫她了。她凍得臉兒通紅，象個糖蘿卜似的。一迈进存衣室里，當我給她去存大衣和套鞋時，她就趕忙跑到火爐旁邊去烤火。

“真是冷啊，”她說道，將臉湊近火爐，“零下二百度！”

她穿着一件青色天鵝絨連衣裙，花邊領子，辮子上打着藍色大蝴蝶結。

這個蝴蝶結和青色連衣裙，還有頸上的一條細珊瑚項鏈，配在她身上多么調和！她是那么丰满，健康，同時又是多么窈窕，勻稱。礼堂里舞會已經開始，我剛和她走進去，我們學校里跳得最好的舞迷們都撇下自己的女伴向她跑來。我有生以來這還是第一次悔恨自己不會跳舞。但是沒有法子！我假裝一點也

① 柯乞涅夫這個姓是白菜頭這個名詞轉化來的。——譯者注。

不在乎的样子，走到后台化妆室里去看演員。他們正在准备出場，姑娘們把我轟了出来。我又回到礼堂里去。正好这时华尔茲舞完了。我把卡佳招呼过来，我們坐下聊天。

“那是誰？”她突然惊惧地問我道。

我看了看。

“在哪兒？”

“那不是嗎，紅头发的。”

没什么希奇的，这原来是羅馬什卡！他穿得很漂亮，系着那条我曾經用押金借过的領帶。在我的眼光中，他今天并不怎么难看。可是卡佳却厌恶地看着他。

“你怎么不覺得——他实在可怕，”她說。“你已經习惯了，所以覺不出来。他就象尤利亚·希普^①。”

“象誰？”

“象尤利亚·希普。”

我装作知道烏里亚·吉浦是什么人，意味深长地說：

“哦——哦。”

但是，要想騙过卡佳并不那么簡單！

“唉，你連狄更斯的書都沒有讀过，”她說道。“你还算是知識渊博的人哩！”

“誰說我是知識渊博的人？”

“大家。我有一次同你們学校里的一个女孩子講話，她就說‘格利高里耶夫是最杰出的人材’。哼，就是这样的人材！連狄更斯的作品都沒有讀过。”

我想对她解释，狄更斯的書确实是讀过，只是沒有讀到过

① 英国作家狄更斯作的“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坏蛋。——譯者注。

关于烏里亚·吉浦的。可是这时音乐又演奏起来了，我們大家都簡称他为哥沙的体育教員請卡佳伴舞，于是又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这一次我被人請到演員那兒去了，并且还分配了我工作：給一个女孩子化妆犹太教的神甫。这个任务可不輕松。我整整替她弄了一个半鐘头，当我回到礼堂时，卡佳还在跳舞，現在是和瓦尔加跳。

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場面：瓦尔加目不轉睛地看着自己的脚，鬼知道，就好象这双脚是多么有趣的东西似的。卡其加帶着他，很生气地一边跳一边教他。但不知为什么我感到非常寂寞。

有人在我鈕扣上挂了一个号碼作传信的游戏，我象个囚犯似的胸前挂着号碼坐在那兒发悶。突然一下子送来了两封信：一封上面写道：“不要再装蒜了。坦白地說吧，您喜欢誰？回信交一四〇号。”“坦白”写成了“旦白”。另外一封信沒头沒尾地写道：“格利高里耶夫是杰出的人材，連狄更斯的書都沒有讀过。”我向卡佳作了恫吓的样子。她笑了起来，撇下瓦尔加到我身边坐下。

“你們这兒很快乐，”她說道。“只是太热。怎么样，現在要学跳舞嗎？”

我回答說不想学，我和她到我們的教室里去了。这兒布置成一个休息室的样子；周围房角上放着演悲剧“時間到了”时用的道具——靠背椅，灯泡用紅、蓝紙包扎着。我們坐在我的書桌上——右边一排最后一张。不記得我們当时談些什么，談的很正經的事，——似乎是談有声电影。卡佳对这玩意兒很怀疑，我給她举出了声和光的相对速度的一些实例作証明。

我們头上是一盞蓝色的灯，照得她全身都是蓝的，大概正因

为如此我才那么大胆。我早就有心吻她了，当她刚进来，脸蛋儿冻得红红的，将腮靠近炉子烤火时，我就想吻她一下。不过那时是不可能的。可是现在，在蓝色的灯光下，这就可能了。我说了半句话就沉默了下来，闭上眼睛，在她的脸颊上吻了一下。

哦哟，她发了好大的脾气呀！

“这是什么意思？”她厉声问道。

我没吭气，我的心怦怦地跳着，我恐怕她要说“我们根本不认识”，或者这一类的话。

“真不应该！”她愤怒地说道。

“不，这不是不应该，”我不知所措地辩解道。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后来卡佳请我弄点水来。我把水拿回来以后，她就对我讲了一大篇道理。她象二加二等于四一样地证明，说我对她是漠不关心的，“只不过是我不这样感觉”。同时，假如刚才别的女孩子在她的地位的话，我也会吻她的。

“你不过是在竭力想使自己相信这一点，”她确定不移地说，“可是，事实上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后来她同意了我并不是想欺负她，——本来也是如此。不过我毕竟不应该这样作，因为我只是欺骗自己，事实上什么感觉也没有……

“一点爱情的味儿也没有，”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我感觉到她的脸红了。

我握着她的手来代替回答，用她的手抚摸我的脸，我的眼睛。她没有把手缩回去，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在昏暗的教室里，在我的书桌上坐了一会儿。在这个教室里，教员曾经抽问我，我胡乱地回答过，我曾站在黑板前证明过几何定理，在这张书桌里面，还放着瓦尔加考试时揉皱的夹带。这一切多么奇怪；但又多

么美妙啊！我簡直不能形容出这当兒我心里是多么舒服……

后来我发现墙角有人在大声喘气。我回过头去看，原来是羅馬什卡。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样大声喘气。他的样子异常卑鄙。自然他立刻就知道我們已經发现他了。他自言自語嘟囔着，强装着笑脸向我們走过来。

“格利高里耶夫，你怎么不給我介紹介紹呀？”

我站了起来。大概我当时的表情特別不客气，所以他畏惧地眨眨眼，一溜烟走了。这的确好笑，他一下子就怕成那付样子。我們俩忍不住放声笑起来，卡佳說他不只是象烏里亚·吉浦，而且还象只猫头鷹，紅头发，鈎鼻子，圓眼睛。她算是猜对了，在我們班里，大家有时开羅馬什卡的玩笑，就叫他“猫头鷹”。我們又回到了礼堂里去。

舒拉·柯乞涅夫在門口遇着我們，很幽默地表示大吃一惊的样子。我把他介紹給卡佳，他象一个真正神甫一般向她祝福，甚至还把抖动的手放到唇边。

跳舞已經完了，接着游艺节目开始。我們剧团演出“欽差大臣”中的一段。

我和卡佳坐在第三排，可是我們什么也沒有听。至少我是沒听。我想她也是如此。我附在她的耳边低声对她说：

“回头我們再談一談好嗎？”

她很严肃地看了看我，点了点头。

9 初次幽会。 失眠

这在我說来已不是第一次了，生活原来順着一條道路前进；

假定說吧，是順着直綫前进，突然一个大轉弯，便开始“橫滾”和“英麦曼”^①。

当我还是一个八岁小孩的时候，我把小刀丢在浮桥上被害的看守人身边时的那一次是这样。在人民教育委员会收容所里，因为无聊而塑起“閑扯淡”的那一次也是这样。我成了反对柯拉布略夫阴谋事件的偶然見証人，后来忍辱被赶出了塔塔林諾夫家的那一次是这样。現在我又被赶出来的这一次也是这样，——这次是永远被赶出来了。

这次轉折是这么开始的。我和卡佳約定在兵工街白鉄厂前面会面，但她沒有来。

在这失意的一天，甚么事都不順利！我沒上第六堂課就偷跑出来了，这一著实在是不高明，因为李和說过課后发堂下作文。我想把要和卡佳談話的内容思索一番。可是在外面哪兒还顧得上思索問題呢。过了不一会兒我就冻得象条狗一样，唯一能作的只是拚命跺脚，把耳朵和鼻子一起捂住。

然而毕竟是太有意思了！从昨天开始，一切变化多大呀！例如，昨天我可以說：卡其加是个傻瓜！可是今天就不会說了。昨天我会因为她迟到而罵她，今天就不会了。然而一想到她就是以前問我念过“叶林娜·罗滨逊”沒有，她就是因弄炸了測乳器而挨了我一耳光的卡加时，就觉得更加有意思。这真是她嗎？

“是她！”我愉快地想道。

不过現在她已經不是那个她，我也并非旧日的我了。

这时已經过了整整一个鐘头。胡同里非常寂靜，只有一个

① 一种高級飞行特技。——原書注。

小矮个兒，大鼻子的白鐵工人从作坊里出来了好几次，带着畏縮狐疑的神情看我。我轉过身去背向着他，这大概只有更增加他的怀疑。我走到街那边去，可是他依然站在門口一团一团的蒸气中，好象恩斯克大教堂天花板上的圣象一样。我只好順路往下走到提維尔大街去……

我回到学校的时候，午飯已經开过了。我走到厨房里去烤火，挨了厨子一頓申斥，但却得到一盘热土豆。我默默地吃完了土豆就去找瓦尔加。可是瓦尔加到动物园去了。李和把我的作文发給了羅馬什卡。

我心緒非常乱，所以沒有注意羅馬什卡碰見我时那付紧张的神色。我走进我們习惯在那里备課的圖書館时，他更是坐立不安了。

他无缘无故地笑了好几次，急急忙忙地把作文給了我。

“李和驢真是李和驢。”他討人欢心地說道。“要是你的話，我一定要告他。”

我掀开作文一看，每一頁都划上一条大紅杠子。最后批着：“唯心主义。极劣。”

我滿不在乎地說了一声：“笨蛋”，閤上作文本便走出来了。羅馬什卡跟着我跑了出来。他跑到我的前面，看我的脸色。奇怪，他今天怎么这么討好！他大概是因为我的作文不及格在幸灾乐祸。这时我脑中根本沒有想到他这种行为的真正原因。

“这个李和驢，”他老是反来复去地說着。“舒拉·柯乞涅夫把他形容得好：‘他的脑瓜象个椰子，外表硬，里面稀。’”

他令人憎厌地笑了起来，又跑到前面去。

“去你媽的，”我咬着牙說道。

最后他落在后面了……

同学们出去参加文娱活动还没有回来，我就已经鑽到被窝里了。不过，也许我不该这么早躺下。我刚閤上眼，翻了一下身，睡意便完全消失了。

这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我静静地躺着想心事。想什么呢？大概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想过了！

想到柯拉布略夫，我明天要把作文交给他请他看看。想到那个把我当作小偷的白铁工人。想到卡佳父亲的書“格里尔探险队罹难的原因”。

然而不论我想什么，到头来总要想到她！我开始打瞌睡了，但突然又那么甜蜜地想起她来，甚至呼吸都感到困难，心房跳动得緩慢了，跳的声音也大了。我仿佛看見了她，比起她在我身边时看得还要清楚。我感觉到她的手就在我的眼前。

“得啦，——恋爱就恋爱唄。老兄，暂时还是先睡觉吧，”我对自己說道。

现在虽然有点兒想睡，可是心里那么甜滋滋的，睡觉未免可惜。直到快天亮，彼佳大叔在厨房里吆喝我們的小猫瑪赫美特的时候，我才睡着了。

10 不愉快的事

第一次的幽会和第一次的失眠，这终究还属于以往的美好的生活的范畴。但是到第二天，不愉快的事便发生了。

早饭后我挂电话給卡佳。真倒楣，接电话的是尼古拉·安东内奇。

“誰找她？”

“她的朋友。”

“哪一位？”

我沒有吭氣。

“喂，誰呀？”

我挂上了听筒……

十一点的时候我呆在蔬菜舖里，从这儿可以看見整个提維尔—雅木斯大街。这次誰也不把我当作小偷了。我假装打电话，买蜜餞苹果，若无其事地站在門边。其实我是在等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根据前几年的經驗，我知道她什么時間从市場上回来。她終於出現了：瘦小的身軀，弯着腰，穿着她原来那件綠色天鵝絨旧式大衣，在这样的大冷天手里还打着一把伞！带着她那一时也离不了手的小口袋。

“尼娜·卡比丹諾芙娜！”

她严峻地看了我一眼，一句話沒有說，便朝前走去了。我感到十分惊异。

“尼娜·卡比丹諾芙娜！”

她将口袋放在地上，直起腰来，憤怒地看了看我。

“原来是这样，我的小乖乖，”她很严厉地說道。“我看在过去的情份上，不生你的气。不过以后再也不希望看到你，听到你說話了。”

她微微搖动着头。

“你要是走这边，我們就走那边！不要再写信，不要再打电话来了！我真沒有想到！看来是我錯了！”

她提起口袋，砰地一声，小便門就在我的鼻尖前閉上了。

我张大了口，目送着她进去。我們俩到底是誰发疯了呢？

是我还是她？……

这是第一次不愉快的谈话。接着是第二次，第二次以后又
来了第三次。

我回到家里去的时候，在大门口碰见了李和，这时实在不是
去和他谈我的作文的时候！

我和他一起走上楼梯；他象往常一样昂着头，傻里傻气
地抚弄着鼻子，这时我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想用脚踢他的欲
望。

“李和同志，我已经领到作文了，”我突然说道。“您批着：
‘唯心主义’。这根本不是分数，这是批评，首先要有证据。”

“我们以后再谈。”

“不，我们现在就谈。”我反对道，“我是一个共青团员，可是
您竟批评我唯心主义。您什么也不懂。”

“你说什么？”他问道，立刻皱起眉头来。

“您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唯心主义，”我继续说道，我很高兴地
发现，随着我说的每一个字，他的脸色愈来愈难看了。“您不过
是因为不知道怎样给我扣帽子，所以写上个‘唯心主义’。难怪
大家说您……”

我稍微停顿了一下，感觉到马上就要说出最粗野的话来。
后来还是脱口说出来了：

“说您的脑瓜象个椰子：外表硬，里面稀。”

这事发生得那么出乎意料，我们两个人都不禁一怔。后来
他鼓起鼻孔，恶狠狠地简短地说：

“啊！？”

便迅速走开了。

这次谈话以后，正好过了一个钟头，我被叫到柯拉布略夫那

兒去了。這是一個不祥的預兆：柯拉布略夫很少把人叫到他那兒去的。

我很久沒看見他發這樣大的脾氣了。他低著頭，在房間里踱來踱去，當我走進門時，他帶著厭惡的神氣閃到一邊。

“哼！”他的鬍子突然凶狠地抖了一下。“你干下的好事！我倒很樂意聽一聽！”

“依萬·巴甫雷奇，我現在就向您說明這一切，”我竭力鎮靜地申辯道。“我不喜歡批評，這是實話。但这也說不上什麼唯心主義呀！其他的同學都抄襲批評家的話，這是他所喜歡的。讓他先證明我是唯心主義者。他應該知道，這對我是一種侮辱。”

我把作文本遞給柯拉布略夫，但他連看也不看一下。

“你應該到教務會議上去解釋你自己的行為。”

“可以！……伊萬·巴甫雷奇。”我突然問道，“您很久沒有到塔塔林諾夫家去了嗎？”

“什麼事？”

“沒有什麼。”

柯拉布略夫盯著我的臉看了看。

“喂，老弟，”他很平靜地說道。“我看你是有意挖苦李和的。坐下來談談吧。喂，只是不准撒謊。”

即便是我的親生母親，我也不會對她說我愛卡佳，並且想了她整整一夜的事。這是不可能的。不過我很早便想把塔塔林諾夫家的變化，那些我非常看不慣的變化告訴柯拉布略夫。

他一面聽著我講，一面從房子的這一角走到那一角來回地踱著。他不時站下來，帶著淒傷的神情向周圍看一看。總而言

之，我的叙述大概使他很伤心。他有一次甚至用手抓头皮，不过立刻就发觉这样不对，便连忙装作用手去摸前额的样子。

“好吧，”当我请他给塔塔林诺夫家挂电话，了解一下是什么缘故时，他说道。“我一定这么办。你一个钟头以后再来。”

“伊万·巴甫雷奇，过半个钟头以后吧！”

他忧伤而和蔼地微微一笑……

我在礼堂里消磨了这半个钟头。礼堂里的拼花地板是用椴木砌成的，当我从窗子跟前向礼堂门口走去时，暗的木条好像是亮的，亮的又好像是暗的，阳光尽情地照耀着，宽大的窗子跟前细小的尘埃缓缓地飞舞着。这一切是多么美好，但又是多么不好啊！

等我回来时，柯拉布略夫坐在沙发上抽烟，肩上披着在他心情不舒服时常穿的绿毛绒的制服上身，敞着衬衣软领。

“喂，老弟，你求我挂电话可算是上当了，”他说道。“现在你的秘密我都知道了。”

“什么秘密？”

他看了看我，好象初次见我似的。

“有秘密就应该会保守，”他继续说道。“可是你却不会。譬如说，你今天追求一个姑娘，明天就搞得全校都知道了。而且，如果只是全校那还算好的哩。”

大概我当时的样子很愚蠢，所以柯拉布略夫不由得微微一笑，不过几乎看不出来。这时至少有二十种想法立刻在我脑中闪过。“这是谁干的？罗马什卡！我要揍死他！原来因为这样卡佳才没有来！因为这样老太婆才赶我走！”

“伊万·巴甫雷奇，我爱她。”我坚决地说道。

他把双手一摊。

“我不在乎，讓全校去議論这件事好了！”

“嘿，全校，那倒也就算了，”柯拉布略夫說道，“但这是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和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說的，你可就不能不在乎了吧，是不是？”

“不，也不在乎！”我激情地說道。

“且慢。但是好象你曾經被人从家里轟出来过？”

“从誰的家里？那不是她的家。她只等毕业就离开这个家哩。”

“且慢，且慢，这是什么意思？你打算結婚嗎？”

我稍为冷靜了一点。

“这和旁人无关！”

“当然罗，”柯拉布略夫赶忙說道。“可是你要明白，我怕不那么簡單吧！总还得問問卡佳。也許她还不打算出嫁。不管怎样吧，只好等她从恩斯克回来再說了。”

“啊，”我很鎮靜地說道，“他們把她送到恩斯克去了？太好了。”

柯拉布略夫又看了看我，这次却帶着毫不掩飾的好奇的神情。

“她的姨媽病了，她去看望姨媽的病，”他說道。“她去几天，开学前就回来，为了这样一点事似乎还不值得着急吧！”

“我沒有着急，伊万·巴甫雷奇。可是关于李和的事，如果您願意的話，我就向他道歉。不过也請他收回他那种認為我是唯心主义者的說法。”

好象什么事也沒有发生过，好象卡佳沒有被送到恩斯克去，好象我沒有决定要打死羅馬什卡，我們心平气和地討論我的作

文，討論了約摸有十五分鐘。然后我告辞說如果可以的話我明天再来，便走了。

11 到恩斯克去

揍死羅馬什卡！我毫不怀疑，事情是他干的。不是他还有誰呢！因为我吻卡佳时，他正坐在休息室里，所以看見了。

我在宿舍里憤恨地不时看看他的床和小桌子。等了他半个小时，后来我写了一张条子，要他解释，并且威胁他說，不然的話，我就当着全校的人叫他下流坯。后来我又把这张条子撕了，便到动物园去找瓦尔加。

当然，他总是在他那群齙齿动物那兒！他穿着一件肮脏的褂子，耳朵上夹着鉛笔，腋下夹着一本很大的筆記簿，站在籠子旁边，用手喂那些飞鼠。他一面喂它們小虫子吃，一面十分得意地輕輕吹着口哨。

我叫了他一声。他犹犹疑疑地回过头来，很生气地摆了摆手說道：

“等一会兒！”

“瓦里亚！一分鐘！”

“別忙，你把我攪乱了。八，九，十……”

他在数虫子。

“真是个好吃的家伙！十七，十八，二十……”

“瓦尔加！”我恳求道。

“我把你赶出去！”瓦尔加急速地說道。

我十分憎恶地看了看蝙蝠。它們头朝下悬着，寬大的耳朵，

一张古怪的，差不多象人一般的脸。讨厌鬼！毫无办法，我只好等它們吃饱了再說。

好歹算是完事了！可是瓦尔加一面用肮脏的手指摸弄自己的鼻子，又在学习本上写了半个鐘头，我这份罪才算受完了。

“見你的鬼去吧！”我对他說道。“你的心思都用在这些畜牲身上去了。你有錢嗎？”

“有二十七个卢布。”瓦尔加很神气地回答道。

“都給我。”

这实在残酷。我知道瓦尔加积蓄这些錢是准备买一种蛇的。可是有什么法子呢？我只有十七个卢布，而票价正好两倍于这个数字。

瓦尔加輕輕地眨起眼来，然后很严肃地看了看我，便把錢掏了出来。

“我要走了。”

“到哪兒去？”

“到恩斯克去。”

“干什么？”

“等回来的时候再告訴你。現在暫且告訴你一件事：羅馬什卡是个下流坯子。你和他要好，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他是一个多么下流的东西。如果你知道这点还和他要好，那么你自己也是个下流坯子。話就說到这里。再見。”

我一只脚已經迈出門去了，这时瓦尔加又喊了我一声。他的声音那么奇怪，因此我立刻轉回来了。

“薩尼亚，”他訕訕地說道，“我並沒有和他要好。总之……”

他沉默了一会兒，又开始摸弄起他的鼻子来。

“是我錯了，”他堅決地聲稱，“我本想早告訴你的。你記得柯拉布略夫的那件事吧？”

“我怎麼會忘記了呢！”

“那好！就是他干的。”

“是他？”

“他把所有的事都對尼古拉·安東內奇談了。”

“你胡說！”

我立刻回想起那天晚上，從塔塔林諾夫家回來以後，我把他們反對柯拉布略夫的陰謀都告訴瓦爾加了。

“慢着，但我只對你一個人說過呀。”

“不錯，可是羅馬什卡偷聽去了。”

“那你為什麼不吭氣呢？”

瓦爾加低下了頭。

“他要我人格擔保，”瓦爾加喃喃地說道。“並且還恐嚇我，說他在夜里要盯住我看。你知道如果有人夜里盯着我，我簡直受不了。現在我明白了，這完全是瞎扯。這是因為有一次我睡醒了，發現他在盯着我的緣故。”

“你簡直是個傻瓜，原來這樣。”

“他記在小本子上，然後去向尼古拉·安東內奇密告，”瓦爾加很難過地繼續說道。“他故意刺激我。他密告了以後還講給我聽。我把耳朵堵住，他還是講。”

三年以前，學校里傳說過羅馬什卡睡覺時總是睜着眼睛。這是真的。我有一次親眼看到他睡覺，他的上下眼皮中間清清楚楚露出一綫眼珠來，白不白，藍不藍，的確有點怕人……這種似睡非睡的樣子，令人看了很不舒服的！羅馬什卡說他從來不睡覺，這顯然是吹牛，其實是因為他的眼皮太短。然而偏有那么一

些同学相信他。他们因为他能不“睡觉”而尊敬他，也有点害怕他。大约瓦尔加的恐惧心理也是这样产生的，因为他和罗马什卡已经床靠床并排着睡了五年。

所有这一切在我脑中乱纷纷地闪过。“傻家伙，”我心里想道。“你还算自然科学家呢！”

“唉，你这个饭桶！”我说道。“我现在没功夫和你多谈，不过照我看，关于他往小本上记东西这件事你应该写份材料交给团支部。老实说，我没有想到他把你拴得这么紧。你给了他多少次‘人格’担保？”

“不记得了，”瓦尔加喃喃地答道。

“算一下吧。”

他伤心地看了看我……

我从动物园出来就上车站去买票，再从车站回到学校里。我有一套很好的制图仪器，我决定带着它，万一手头不方便时，可以把它卖掉。

就在我干这些傻事情当中，又加了一样傻事情，而且后来我为这一件事付出了加倍的代价。

当我走进寝室时，里面已有十来个人，我们班的女同学丹娘·薇莉琪珂也在。

大家都有事，有的读书，有的谈话。

舒拉·柯乞涅夫在摹仿我们新来的数学教员。他举起两只手奔到假想的黑板前面，然后慢慢地派头十足地坐下。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总之，谁也没注意到罗马什卡跪在我的床前翻弄我的箱子。

这又一次的卑鄙行为使我大为吃惊。我感到一股热血冲到头上，但我仍旧以平静的步伐走到他跟前，以平静的声调问

他道：

“你找什么？羅馬什卡。”

他惊惧地抬起眼睛望着我，虽然我已經十分激动，但我还是注意到他这时非常象一只猫头鷹。他的脸色白得出奇，一双大耳朵烧得通紅。

“找卡佳的信嗎？”我繼續說道。“你想把信交給尼古拉·安东內奇嗎？这兒就是。拿去吧！”

我照着他的脸狠狠地踢了一脚。

我剛才的話說得都很輕，所以誰也沒意料到我会踢他。大概我还踹了他两三步。要不是丹娘·薇莉琪珂在場，我一定把他踢死了。当时男孩子們都张大了嘴站在一旁，只有她勇敢地冲到我們两个人中間，拉住我，把我推开，她使出那么大的勁兒，我不由得坐到了床上。

“你发疯了！”

我象是透过一层烟霧看到了她的脸，她流露出憎恶的神情在看着我。我立刻清醒了过来。

“同學們，我把一切事情都向你們解釋清楚。”我心虛地說道。

但是他們沉默着不說話。羅馬什卡揚着头躺在地板上，也不吭氣。他的頰上有一塊青色的瘀傷。我提起小箱子便走出來了……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在車站上徘徊了三個多鐘頭。我在極不愉快和灰煩的心情下讀報紙，研究行車時間表，在三等車的小賣店里喝茶。我想吃點東西，可是又覺得茶既沒味，夾心面包也難以下咽，口里的那種滋味，就好象是吞了瓦爾加喂給蝙蝠吃的蟲子一般難受。經過這一幕之後，我感到心里非常窩囊。唉，

不該回學校去的。什麼制圖儀器！它對我有什麼鬼用？難道我在達莎阿姨那兒還不能弄點回來的車票錢嗎？

12 故鄉的家

這次沿着我和彼其加·司考伏羅得尼可夫曾經流浪，偷竊，討飯度日的地方旅行，給了我一種異常自在的印象。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買票坐火車。我可以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可以和鄰座的人閑談，如果我會抽煙的話，我也可以抽煙。查票員來時我也大可不必鑽到座位底下去，可以滿不在意地繼續談着話，把車票遞給他。這是一種極不平凡的感覺，雖然車廂里相當擁擠，可是心里還感覺到非常松快。這種感覺使我心情舒暢，忘記了羅馬什卡的事，開始想起恩斯克，想到妹妹，想到達莎阿姨，想到我要象雪花落在頭上一樣，突然落到他們身邊，而且他們將會不認識我了。

我這樣想着便睡着了，我睡了那麼久，使得鄰座的人都擔心起來，以為我可別是死了吧？然而諸位知道，我並沒有死。

回到闊別了八年的故鄉，這是多么令人興奮的事啊！什麼都熟悉，又似乎什麼都不熟悉。難道這就是省長公署嗎？從前我曾經覺得它是十分高大的。難道這就是城牆根嗎？怎麼會這樣狹窄彎曲？難道這就是洛普亨林蔭大道嗎？不過這條大道還給了我些安慰：在菩提樹後面，沿着那條主要的林蔭路，新修了一片華麗的大廈。蒼黛色的菩提樹宛如畫在一片雪白的背景上。菩提樹的黑影斜斜地落在白色雪地上，真是太美了！

我迅速地走着，每走一步，我不是辨認旧的景物，便是惊奇新的变化。这是达莎阿姨曾經打算把我和妹妹送去的保育院；它已經塗成綠色，牆上有一块极大的刻着金字的大理石板，上面写着：“公元一八二四年亚历山大·謝尔盖耶維奇·普希金曾寓于此”。我看了以后有点兒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見鬼！普希金曾經在这所房子里住过！要是保育院的人知道这件事，他們一定会把鼻子翘得高高的驕傲起来呢。

这是“法庭”，就是我和媽媽递过呈子的地方！現在这兒已經毫无“法庭”的气味了，窗上古老低矮的鉄栏杆已經拆掉，門旁挂着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文化宮”。

这不是碉堡的围墙嗎，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一条花岗石的河堤呈現在我的眼前，我簡直难以認出这就是我們从前那条寒傴的歪歪斜斜的河堤。使我更加感到惊异的，就是从前我們住的地方已經开辟成了一个小花园，一些保姆象圣象一般抱着裹得严严实实的嬰兒坐在椅子上。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在碉堡围牆上站了好久，暗自惊讶地望着小花园，望着花岗石河堤和那条我們曾經在旁边玩过击柱戏的林蔭大道。在过去一排排杂货店后面的荒地上，現在巍然屹立着一座灰色大楼，楼門前一个穿皮大衣的卫兵来回踱着。我走到他的跟前，指着楼房問他这是什么机关。

“这是恩斯克发电厂。”他很神气地答道。

“您可知道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家在哪兒嗎？”

“法官嗎？”

“不是。”

“那不知道。我們这兒只有一个司考伏罗得尼可夫，他是法官。”

我走开了几步。也許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兒真作了法官？我回过头去，又看了看那所修建在原来是我們破房子的地方的华丽大厦，于是我断定，这是可能的。

“这位法官什么样子？身材高大嗎？”

“很高大。”

“有鬍子嗎？”

“不，沒有鬍子，”卫兵好象是在替司考伏罗得尼可夫抱屈，連忙分辯道。

唔……沒有鬍子。希望不大。

“这位法官住在什么地方？”

“果戈理大街，从前馬尔庫茲的房子。”

我知道这所房子是全城最好的房子之一，門口两旁各有一个獅子象。听他这一說，我更蒙头了。可是又沒有別的办法，我只好向果戈理大街走去，不过对于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会刮去鬍子，成为大法官，而且住在那么富丽堂皇的大厦里这一点，却是抱着很小的希望的。

半个小时以后，我已走到果戈理大街馬尔庫茲的房子跟前了。这八年来獅子的相貌也衰老了，然而还是那么雄糾糾，气昂昂的样子。我迟疑不决地站在上面有很寬的屋檐的大門前。按不按門鈴呢？还是問問人民警察問事处在什么地方吧？

窗戶上露着达莎阿姨所喜爱的細紗窗帘，我突然决定按一下門鈴。

給我開門的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她穿着一件蓝色法兰絨連衣裙，头发从中分开，梳得很光亮，皮肤黑亮亮的。这一点可把我哄住了。

“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家住在这兒嗎？”

“是的。”

“那么……达里亚·嘉芙里洛芙娜在家嗎？”

“她很快就回来，”姑娘含笑答道，一面好奇地打量着我。她微笑的样子和薩尼亚完全一样。可是薩尼亚的皮肤是白皙的，辮子是弯曲的，眼睛是天蓝色的。不对，她不是薩尼亚。

“可以在这兒等一等嗎？”

“請吧。”

我把我的小箱子放在前厅里，脫下大衣，她領我走进一間十分明亮軒敞的房間，房間里收拾得非常潔淨，甚至可以說擺設得很华丽。房間里最显著的地方放着一架大鋼琴——这可就不象达莎阿姨的地方了。但是在那两只浅蓝色的玻璃花瓶中間的相片，那张以雪山为背景，坐在藤椅子上的英雄的相片，就等于說明达莎阿姨本久在这里一样了。

我这时那付东张西望的表情可以說是有些傻里傻气的，同时又是喜不自禁的，所以这位姑娘瞪着眼睛望着我。忽然她把头微微一低，眉梢向上一揚，簡直和母亲一模一样。我明白了，这一定是薩尼亚。

“薩尼亚？”我不很自信地喊道。

她吃了一惊。

“嗯。”

“等等，你以前不是很白的嗎？”我帶着顫抖的声音繼續說道。“怎么回事？我們以前在乡下住的时候，你是非常白的。可是現在却变得这么黑了。”

她发呆了，連嘴都张大了。

“在什么乡下？”

“父亲死的时候，”我說道，并且笑了起来，“嗨，你忘了。全忘了！連我都記不得了！”

大概是由于欢喜过度，我連話也說不清楚了。我本来就很爱她，八年沒見，她竟长得这么象母亲了。

“薩尼亚？”她終于說道。“天哪！我們还以为你早就死了。”她把我拥抱了起来。

“薩尼亚，薩尼亚！真是你嗎？可惜达莎阿姨不在。快坐下吧，站着干嗎？你从哪兒来？什么时候到的？”

我們并排坐下，但她馬上又跳起来，跑到前厅里去取我的箱子。

“等一会儿吧！你跑到哪兒去？先講講你的生活怎样，达莎阿姨的生活怎样。”

“你自己怎样呢？为什么連一封信也不写？我們整天在打听你，还在报上登过啓事呢。”

“沒有看到报，”我很懊悔地說。

現在我才充分認識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可耻；居然忘掉我还有这么一个好妹妹，一个好到絕頂的达莎阿姨，就象剛才薩尼亚說的那樣，甚至不能把我回来了的消息告訴她，否則她会欢喜死的。

“还有彼加也找过你，”她接着說道。“不久前他还写过一封信到塔什干去。他还以为你住在塔什干哩。”

“彼其加？”

“是呀。”

“司考伏罗得尼可夫？”

“除了他还有誰！”

“他在哪兒？”

“在莫斯科，”薩尼亞答道。

我感到十分惊奇。

“很久了嗎？”

“从你們跑了以后。”

彼其加在莫斯科！我惊奇得好半天想不过来。

“薩尼亞，我也在莫斯科。”

“是嗎？”

“真的。他怎么样？作什么？”

“没有什么，很好。他今年毕业。”

“嘿，見鬼！我也是一样！你有他的象片嗎？”

我发觉在問她相片时，她有点兒不好意思。她說了一声“就来”便出去了。她回来得那么快，就好象彼其加的相片是从口袋里掏出来的。

“喂，你看他多漂亮，”我說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还是紅头发？”

“紅头发。”

“嘿，見鬼，太好了！老头兒呢？老头兒怎么样？难道是真的？”

“什么真的？”

“当了大法官！”

“咳！他已經作了五年法官了。”

我們什么都問，不时打断对方的談話，然后又問。后来薩尼亞跑到厨房里去了，我也跟了去，并且說我不能沒有她。这是神圣的真理；沒有她，我立刻感到寂寞。

我們烧起了茶炊，生好爐子。随后就听到前厅里响起了低哑的門鈴声。

“达莎阿姨！”

“你留在这兒，”薩尼亞附在我耳边小声說道，“我去給她作点思想准备工作。真的，她的心脏不很好……”

她出去了，我听见隔壁房間里响起了下面这样一番對話。

“达莎阿姨，請你不要兴奋。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所以你不要太兴奋，相反地，要冷靜。”

“好的，講吧，毛丫頭。”

“达莎阿姨，你今天不是打算不烤点心了嗎，可是現在却不能不烤了。”

“彼加回来了嗎？”

“彼加是彼加，但是你还没有完全猜中。达莎阿姨，你不会兴奋吧？”

“不会。”

“說的是实話嗎？”

“看你！怎么不是实話呢。”

“你看这是誰回来了！”薩尼亞把廚房門推开。

妙极啦。达莎阿姨一眼就認出我来了。

“薩尼亞，”她悄声地說道。

她一把抱住我。然后坐下，閉起眼睛来。我握住她的手。

“我的宝贝兒！真是你嗎？”

“是我，达莎阿姨。”

“我不是在作梦吧？”

“不是的，达莎阿姨。”

看样子达莎阿姨还不相信我，所以她重又閉起眼睛来，好象真是睡着了一般。

“我的宝贝兒！你还活着？你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来着？我

們把全世界都找遍了。”

“我知道，达莎阿姨。我錯了。”

“錯了！天呀！人回来了，还說錯了，我的亲爱的！你长成一条多大的汉子了。多么漂亮的一个小伙子啊！”

在达莎阿姨眼里，我总是漂亮的……

达莎阿姨沒說了半句話便跳起来，一脸惊慌的样子附在薩尼亚的耳边低声問道：“給他吃过飯了沒有？”我看見飯桌上摆滿了各式各样的食品，但听到她們說这只不过是“飯前小吃”，便不禁捧腹大笑起来。除此而外，还有什么要回忆的呢？关于这一次永远忘不掉的聚会还有什么可講的呢？

从这一会兒开始，大概我所作的事就只是吃东西。我一面講，一面吃。后来达莎阿姨說我身上太脏，所以我只好到澡盆里去洗了一个澡。白天就这样过去了。

傍晚我洗得干干净净，吃得飽飽的坐在餐厅里，薩尼亚和达莎阿姨分坐在我的左右兩側，那么亲切地看着我，使我感到真是于心有愧；这是良心話！后来大法官回来了。

那个卫兵沒有撒謊，这老头兒的确把鬍子刮掉了。他好象年輕了十来岁，現在已經难以想象他曾經熬过什么牛皮胶，并且对这种胶寄托了那么大的希望。

他已經知道我回来了，薩尼亚打电话告訴了他。

“嘿！浪子回家了，”他說完便把我拥抱了起来，“你——不怕我把你的脑袋揪下来嗎？你呀，真是個不守本份的人！”

我能用什么話来为自己辯护呢？我只有懊悔和唉声叹气的份兒。

夜深了，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老头兒希望知道我离开恩斯克以后作了些什么，生活怎样。他真的象法官一样，毫不放松地

盤問我關於學校的和私人的一切事情。

我說我想作一個飛行員，他沉默了半晌，一雙眼睛從又長又粗的濃眉下邊注視着我看了很久。

“空軍的飛行員嗎？”

“北極飛行員。必要的話，也作空軍飛行員。”

他半晌沒有說話。

“很危險，但也是一件很好的，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說道。

只有一件事我沒有告訴他。我沒有說自己是追隨着卡佳回恩斯克來的。我簡直對他說不出口來。若不是因為卡佳，也許我還要再過相當的時間才會回到故鄉，回到自己的家園來。

13 旧 信

有人微微推開了通餐廳的門，輕聲說道：“他還在睡。”這時我就醒了。隔壁湯匙碰着杯子輕輕地發出响声，我明白這是薩尼亞怕把我惊醒，在廚房里吃早飯。我決定立刻起床，也仿佛是起來了。然而不知道又過了多長時間，我並沒有起床，還是睡着，而只是在夢中責罵自己為什麼不起來。

總而言之，我一直睡到十一點。薩尼亞早已上學校去，老头兒也上班了。達莎阿姨象她告訴我的那樣，已經“開始做午飯了”。

用茶點時，她看見我不吃什麼東西，感到十分惊奇。

“你們能吃到什麼，”達莎阿姨憤慨地說道。“就連茨岡人的馬也比你們吃的好一些，可結果有的還是死了。”

“达莎阿姨，我昨天吃得太飽了！說良心話，肚子到現在還痛。达莎阿姨，我還到那個老地方去找過你們，房子拆掉了嗎？”

“拆掉了。”达莎阿姨嘆了一口氣，說道。

我們又談到鄰居的情形。原來從前那個引起我許多幻想的明卡，現在已成了“屠格涅夫”號——過去的“海神”號的船長了。搬運工會的工頭，米沙大叔在去年死了。他的兒子現在是本城蘇維埃主席。我把卡耶爾·庫里的事情告訴了达莎阿姨。她連連地感嘆驚異不置。

“达莎阿姨，你知道布冥其可夫家嗎？”

布冥其可夫是尼娜·卡比丹諾芙娜的親戚，所以我毫不懷疑卡佳是到她們那兒去的。

“開除出教的那家人嗎？誰不知道她們！”

“為什麼開除出教？”

“神甫開除了她們。”达莎阿姨說道。“她們驅逐過神甫。所以神甫就把他們開除出教了。這是很早很早，還是革命前的事了。你那时候還小哩。你問這個干嗎？”

“莫斯科有人托我向她們問好，”我信口撒謊說。

达莎阿姨將信將疑地搖了搖頭。

“哦，既然是問好……”

我知道地點：猶太教堂旁邊的一座私人住宅。不過現在教堂已經沒有了，而且城里什麼都變了，所以要找布冥其可夫家是相當困難的。最後我在一道四門緊閉的高圍牆前停住了腳步。牆上挂着一塊小牌子，上面寫着：“拉普金胡同八號，布冥其可娃·瑪·葛、勒·葛、歐·葛寓所”。

便門關着，我輕輕地將它推開，便進到一座寬廣的花園里。

花园的深处有一幢旧式的小房子，木头圓柱門檐上雕着花飾。从門口到里面只有一条很普通的，新近压过的小径；一只山羊在这条小径上走来走去。我以輕松的心情順着小径向那幢小房子走去。

这一切就是如此，也就是这样簡單吧。我还記得我走进花园时，曾因花园里竟然那么美丽而感到惊奇；整个的花园盖复着一层白雪，被太阳光照耀得閃耀刺目。我走进了花园，就沿着小径向山羊走去。山羊“咩咩”地叫了起来。突然，好象在神話中一般，一切都变了。什么地方的房門砰地响了一声。我听見有人叫喊。接着便看見一个拿着手杖的老太婆从房子里跑出来。她拿的也可能不是手杖而是一根拨火棍。

“瑪申卡，瑪申卡！”她喊道。“是自己人，自己人！”

听見別人說我是自己人心里真舒服。然而高兴得未免太早了一点兒。从房子里又走了出来了一个老太婆，微微吡着牙朝我跑来。她手里拿着一个带轆轤的地毯刷子。毫無疑問，她是想用这个刷子来打我。

“瑪申卡！”第一个老太婆喊道。“是自己人！”

但山羊大約是不相信她，所以声音愈叫愈高。我想向布冥其可娃作一番自我介紹，甚至把第一句話都准备好了，但在眼前这样的局面下，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我稍微捱延了一会兒，为了保持尊严，便慢慢回身向門口走去。

滿脸瘟气的老太婆恶狠狠地嘟囔着，尾随我走了几步才折回去了。

这事兒真窝囊！回到街上时我觉得好笑，大概連她們也听見我笑了。这真出奇，她們甚至也不問問我是誰，要干什么。大概她們以为我是誤入她們的花园里的。同样奇怪的是外面吵吵

鬧鬧搞了這麼一陣，卡佳竟沒有出來。總之，一切都是那麼奇怪！

達莎阿姨看到我回來得這麼快，非常驚奇。

“達莎阿姨，薩尼亞回來了沒有？”

“她三點鐘才回來。今天她有六堂課。”

我向達莎阿姨要來了信封和信紙，開始寫信，寫封信給卡佳，由薩尼亞送去。她們也許不會那麼冷酷地接待她。

我寫上了“卡佳”兩個字之後，就尋思起來。通常在這樣的時候，我總是自然而然地想起彼其加的尺牘文選來：“余傷喪偶之痛已久，而今得遇賢卿備具亡妻之一切美德，竊以為與卿永結絲羅之好，且為兒女輩謀一良母，此實敝人應盡之天職也。”

我突然哈哈大笑起來，把達莎阿姨吓了一跳。

“卡佳，”我寫道，“我曾打算找你，但因為遇見山羊和兩個老太婆這道突不破的障礙，所以只好退回來了。現在我在恩斯克，很想看見你。請你四點鐘到教堂花園來。這張便條由——你猜猜是誰？——我的妹妹交給你。亞·格利高里耶夫。”

“達莎阿姨，過去彼其加不是有好些有趣的書嗎？這些書在哪兒？你們的書一般都放在哪兒？”

彼其加的書是在薩尼亞的書架上找到的。這些書大概並不特別受尊重，所以才在書架的最下一層和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放在一起。當我取下“恐怖之夜——頓河哥薩克高加索山地奇遇記”時，不禁觸景傷情，鬼曉得我那时候是一個多么弱小，多么不幸的孩子啊！

我勁頭十足地把書搬出來，專心一意地尋找那本尺牘文選，這時，一個用發了黃的褪色舊報紙包着的小包落到地板上。這

是那些旧信！我一下子便認出来了。这就是装在邮袋里被大水冲到我們家院子里来的信。我想起达莎阿姨朗诵这些信时的漫长的冬夜，深夜讀信給我的感觉多么美妙，多么奇异啊！

这是別人的信！誰知道这些写信的人現在在哪兒呢？就拿这个发了黄的厚信封里的信來說吧，也許还有人长夜不眠，一直在盼望着它哩。

我无意識地打开信念了几行：

敬爱的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

首先我要告訴您的，就是伊万·李沃維奇現在一切都好。我是四个月以前遵照他的指示，帶領一支十三个人的队伍离开帆船的……

我讀着，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那封我曾經背得烂熟的，航海长写的信，这封信我曾經在由恩斯克去莫斯科的火車上背誦过！然而使我大吃一惊的还是另外的一件事。

“‘圣·瑪丽亚’号，”我往下讀道，“还在喀拉海上就被冻住，自一九一三年十月，便随着北极的冰山不停地向北移动。”哈，“圣·瑪丽亚”号！塔塔林諾夫船长的帆船不正是这个名字嗎。我翻过信来，又从头念道：

“敬爱的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首先我要告訴您的，就是伊万·李沃維奇”——伊万·李沃維奇！卡佳不是叫卡杰林娜·伊万諾芙娜嗎！

达莎阿姨認為我神經失常了，因为我突然短促地惊叫了一声，便开始以惊人的速度翻弄起那些旧信来。

不过我自己心里可是明白自己在干什么；达莎阿姨还給我讀过另外一封信，信里叙述他們在冰上的生活，講到一个水手怎样摔死的，講到他們怎样在船艙里砍冰块。

“达莎阿姨，所有的信都在这兒嗎？”

“天哪！出了什么事啦？”

“没有什么，达莎阿姨！这里面还应该有那么一封东西。”

我再没听见自己说些什么话了。下面就是这封信：

亲爱的瑪申卡，我的亲人，我的朋友：

自从上次在尤戈尔·沙尔通过电讯队给你发了一信，到现在转眼已经两年了。我实在无法告诉你两年来经过了多少变化。我们开始沿着预定的航线顺利前进，可是从一九一三年十月，我们便随着北极的冰山徐徐向北移动。这么一来，也说不上愿不愿意了，我们只好放弃了最初沿西伯利亚海岸到达海参崴的打算。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现在我的脑子里完全是另外一种想法了。我希望你不致象我的某些同伴那样，把这种想法认为“幼稚”或是“轻率”……

第一页到此为止。我将它翻过来，可是反面被涂抹更改得仅仅残留着几个毫不连贯的字，除此而外，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第二页从形容船上的情形开始：

……进入一些相当深的地方。在一块这样的冰原中间停泊着我们的“圣·玛丽亚”号，冰雪一直堆到船沿上。冰霜结成花环不时脱离绳索，带着轻微沙沙声撒落下来。瑪申卡，你看，我现在倒因为痛苦而成诗人了。不过我们这儿也有真正的诗人，就是我们的炊事员柯尔巴可夫。他真是一个从不泄气的好汉！他整天唱着自己创作的诗。我现在写四行给你留作纪念：

在俄罗斯母亲的旗帜下，
我们跟随船长踏上征途。
乘着我们美丽的长舟，
要绕过西伯利亚的海岸。

我一面写，一面反复读我这封写不完的信，然后又写，并且发现，

我簡直是在和你瞎嘮叨了，不過還有許多重要的事情需要和你談。我托克里莫夫寄了一個小包交水道測量局局長。這是我的觀測記錄，公事信件和彙報，彙報中詳述了我們航行的經過。為防不測起見，我也把我們的新發現告訴給你：自泰麥爾半島往北，在地圖上沒有標識出任何陸地。然而在緯度 $79^{\circ}35'$ 子午綫八十六和八十七之間格里尼奇以東，我們發現了一條刺目的銀白色長帶微微冒出地平綫。四月三日，這一條長帶變成了一塊和月亮顏色差不多的，朦朦朧朧的盾狀的東西，第二天，我們看見一些奇形怪狀的浮雲，宛如籠罩着遠山的霧氣，我斷定這是陸地。可惜我不能為了去勘探這塊陸地，把處在極其艱苦情況下的帆船丟下不顧。不過一切還有待於將來。暫時我把這塊陸地冠以你的名字，這樣你在任何一張地圖上都将找到這種最親切的問候，它是你的……

到此第二頁的反面也完了。我放下第二張拿起第三張。頭几行給水沖掉了。下面是：

……一切本來都可以完全不至於這樣的，想到這裡我便感到十分沉痛。我知道他會辯解，也許還會使你相信一切都是我一個人的過錯。我懇求你一點：不要相信這個人。可以大膽這樣說，我們的一切失敗都應歸咎於他。舉這樣一件事實就足夠說明的了，他在阿爾汗格爾斯克賣給我們的六十條狗，其中大部分在新地島就不得不射殺掉。他這種親屬的幫助使我們付出了多大的代價！不只是我，全探險隊的人都在咒罵他。我們這次去冒險，知道一定會遇到危險。但是我們並沒料到會有這樣的打擊。現在只好盡我們的力量去作了。關於我們探險的情形，我可以對你談的實在太多了！這些故事足夠給卡秋什卡講一個冬天。但是天哪！這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我不願意使你想到的我們的處境已經沒有希望了。不過你們也不要過份期待……

好象一道閃電倏然照射着森林裡的一角。模糊的景象驟然

改变了，你甚至可以看见树梢的绿叶，这些树木在一分钟以前叫人看到还不知是野兽还是巨人哩。这次我读了这些信的感觉也是如此，我突然一切都明白了；连那些好象永被忘记了的细节，我也记起来了。

我现在明白了尼古拉·安东内奇在谈到他死去的堂弟时的虚伪面貌。我明白了尼古拉·安东内奇脸上那种伪善的，含意深长的表情，当他谈到他的堂弟时，总是严肃地皱起眉来，好象是说，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你们也有几分错误。我明白了这个假装高尚而骄傲的人，明白了他的卑鄙行为的全部底细。信里虽然没有指出他的名字来，但这一定是他！我丝毫也不怀疑这一点。

我激动得喉咙都干了，我那么大声地自己对自己讲话——不是开玩笑，倒真把达莎阿姨吓坏了。

“萨尼亚，你怎么啦？”

“不怎么，达莎阿姨。哪儿还有这些旧信？”

“全都在这儿了！”

“不会的！你还记得你曾经读过这封信给我听吧！这封信很长，一共有八页。”

“不记得了，乖乖。”

纸包里再多一张也没有找到，八张中只剩了三张。不过就是这几张也够了！

我把写给卡佳的便条上的“四点钟来”改为“三点钟来”。后来又改为“两点钟来”。然而这时已经两点钟了，因此我又改为三点。

14 教堂花园相会。不要相信这个人

作孩子的时候，我到教堂花园来过千百次，但那时候我脑子里从没有想到过花园里这样美丽！花园高处在沙河与静河合流处的一座山上，四周有碉堡围墙，保存得很好。可是炮楼却较上次我和彼其加在这兒“歃血盟誓”的时候小了一些。

积雪很厚，可是我还是攀登上了馬尔登长老那个炮楼的最高一层，应该好好看一看依林洛夫斯克草原，尼古拉学校和皮革厂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一切都还在原来的地方，只是遍地皆雪，一直綿延到地平綫的尽头……

卡佳和薩尼亚终于来了。我看见薩尼亚穿着她那件黄皮袄，活象个老祖母，她把手一撇，仿佛說：“这就是教堂花园”，接着用一种很神秘的表情点点头，立刻就告辞走了。

“卡佳！”我喊了她一声。

她吓了一跳，看见我便笑了……

我們互相埋怨了半个鐘头：我埋怨她没有把她要走的消息告訴我，她埋怨我没有等到她的信就来了。后来我們俩猛然想起还没有把最重要的事情告訴对方。原来尼古拉·安东內奇和卡佳进行过談話。他用“亡弟的名义”禁止卡佳和我見面。他声泪俱下地講了一大套話。

“薩尼亚，”卡佳很严肃地說道，“你也許不相信我，可是我憑良心說，的确是亲眼看見他哭的。”

“是啊！”我把一只手放在胸部說道。

塔塔林諾夫船长的信用一张向达莎阿姨要来的油紙包着，放在胸前一边的口袋里。

“卡佳，你听我說，”我毅然說道，“我想給你講一个故事。大致是这样：假定你是住在河边，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河岸上发现了一个信袋。当然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被大水冲来的。邮递員淹死了！这些信件就落在一个爱好閱讀的女人手里。在她的邻居中有一个八岁的小孩子，非常喜欢听故事。有一次她給他讀了这样一封信：‘敬爱的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

卡佳突然打了一下哆嗦，惊愕地看了看我。

“……首先我要告訴您的，就是伊万·李沃維奇現在一切都好，”我迅速地接着背下去。“我是四个月以前遵照他的指示……”

我一口气把航海长的信背完了。虽然卡佳有好几次那么惊讶地拽我的袖子，我也沒有停住。

“你看过这封信嗎？”她脸色蒼白地問道。“写的是父亲的事嗎？”她又問我道，仿佛这里头还有什么值得怀疑似的。

“是的，不过这还不算完！”

我告訴她，达莎阿姨有一次还发现了一封信，信里講到这只被冰冻結，徐徐向北移动的船上的生活情形。

“‘亲爱的瑪申加，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开始背誦，但又停住了。

我背上起了一层鷄皮疙瘩，喉嚨也梗住了。宛如是在作梦，在我眼前突然出現了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愁苦蒼老的面容，和額下那双忧郁的眼睛。当他給她写这封信的时候，她和現在的卡佳差不多，而那时的卡佳还是一个只会等“爸爸来信”的小毛

了头。现在她总算是等到了！

“总而言之，就是这样，”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封用油纸包着的信，“你坐下来看吧，我走了，等你读完我再回来。”

自然我哪儿也没有去。在她读信的时候，我一直站在马尔登长老炮楼下面望着她。我很同情她，当我想到她时，心里便愈来愈感到温暖；然而当我想到她读到这些信会感到多么可怕的时候，我心里又打起寒战来了。我看到她怎样用一种毫无意识的动作去理弄妨碍她读信的头发，以及好象是为了辨认那些难认的字从长凳上站起来。我过去还不知道收到这样的一封信是痛苦还是快乐！但现在看见她，我就明白这是极其痛苦的！我明白了，她从来没有失去希望！十三年前，她的父亲在北极的冰原上失踪了，在北极没有比死于饥饿和寒冷更容易的事了。但是对于她来说，只是到现在他方才死去！

当我回来时，卡佳的眼圈儿红红的，她坐在长凳上，手里捏着信，两手放在膝盖上。

“冻坏了吧？”我问道，我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谈起。

“有几个字我看不清楚……你看，这几个：‘我恳求你……’”

“啊！这几个字！这兒写的是：‘我恳求你，不要相信这个人……’”

这天晚上卡佳在我们家里作客，但是我们丝毫没有提到那些旧信，这是预先说好了的。只有达莎阿姨由不得讲了一些投递员被淹死的事。原来他不是偶然淹死的，照她的解释，他是由于“失恋”而投水自杀的。他爱过一个姑娘，可是这个姑娘嫁给别人了。

“哪怕把这些信送到也好啊！”达莎阿姨惋惜地说道。

卡佳这天晚上闷闷不乐。大家都格外照料她，特别是萨尼

亞很快和她親熱了起來，只有她們姑娘們才能夠作到這樣。後來我和薩尼亞一直把她送到那只山羊跟前，山羊仍舊站在小徑上，不過這次它沒那麼歇斯底里地吡吡叫，只是氣虎虎地擺擺着鬍鬚。

我們回來時老人家們還沒有睡。法官有點放馬后炮似的在責備達莎阿姨，怪她沒有將這些即便是稍稍可以識辨出地址來的信發送出去，說她只能這樣解釋，那就是以為這是十年前的老事了。達莎阿姨又談起卡佳，照她的看法，我的姻緣已經定了。

“還不錯，挺討人喜歡的，”她嘆了一口氣說道。“長得可真漂亮，就是有點兒愁眉不展的樣子。身體也滿健康。”

我向薩尼亞要了張北極地圖，指出塔塔林諾夫船長自列寧格勒出發到海參崴應走的路綫。這時我才想起了塔塔林諾夫的新發現。泰麥爾半島北邊是一塊什麼陸地呢？

“等等，”薩尼亞說道。“那不是北地島嗎！”

“見鬼！這是一九一三年維爾基茨基中尉在八十六和八十七子午綫之間，緯度 $79^{\circ}35'$ 所發現的北地島。太奇怪了！”

“不對，同志們，”我這時大概臉有點發白了，所以達莎阿姨驚懼地看着我。“我全明白了！起初，這是冒出地平綫的一條銀白色長帶，四月三日這條長帶變成了一塊朦朦朧朧的盾狀的東西。四月三日！”

“薩尼亞……”達莎阿姨驚慮不安地剛要開口說話。

“不對，同志們！四月三日。可是維爾基茨基是在秋天，我不記得是哪一月哪一天，但是，是在秋天，九月或者十月才發現北地島的。在秋天，那已經晚了半年了！在秋天，這等於說他

什么也没有发现，因为这块陆地早已被人先发现了。”

“薩尼亚！”法官也忍不住叫道。

“先被人发现了，并且已命名为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我将手指牢牢地指在北地島上，仿佛害怕还会有什么錯誤似的繼續說道。“为了紀念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这块陆地已被命名为瑪丽亚地或瑪丽亚什么島了。現在請大家坐下，我把这一切情形說給大家听！……”

經過了这样的一天之后怎么能睡得着呢？我不断地喝水，翻来复去地看地图。餐厅里挂着恩斯克的一些写生画，我对着这些画看了很久，这时我还不知道是薩尼亚画的，不知道她在学繪画，并且渴望将来进美术学院。我重又翻开地图来看。我想起这些島屿还是不久前才开始称为北地島的，維尔基茨基过去把它們叫作“尼古拉二世洲”。

卡佳的父亲真可怜！他也太不幸了。沒有一本地理書上提到过他，世界上誰也不知道他所作的事。

深切的同情和过分的喜悅使我感到身上一陣发冷，这时是清晨六点鐘，街上已經有人在刷啦——刷啦地扫街了，我便躺下去睡。但还是睡不着。船长信中断断续續的一些話使我痛苦不安，我仿佛听見达莎阿姨讀信的声音，仿佛看見她戴着眼鏡，一面叹气，一面結結巴巴讀信的样子。在我想象中曾經出現过的一幅景象——搭在雪地上的白帐篷，駕着雪橇的一群狗，一个穿着长筒毛皮靴，戴着高毡帽的巨人，——重又回到了我的脑海里来。我很希望这一切都发生在我身上；是我在这只船上，随着漂流的冰山，冒着死亡的危險慢慢地向前移动，我就是写这封与妻子訣別書的船长，千言万語，总也写不完。“我把这块陆地冠以你的名字，这样你在任何一张地图上都将找到这种最亲切

的問候，它是你的……”

這句話會怎么結尾呢？……忽然有一絲兒印象緩慢地，非常緩慢地，就好象是極不情願似地在我腦中掠過，我趕忙在床上坐起來，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已，覺得我馬上就要發瘋了——馬上就要發瘋了，因為我想起來了：

“你的鷹爪蒙哥其瑪獻給你的，你曾經這樣稱呼過我。天哪，這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可是我並不想訴苦……可是我並不想訴苦，”我繼續思索，一面嘟囔着，顛來倒去地，又想起了一個字，又一個字，下面呢——忘記了，想不起來了。“我並不想訴苦。我們會再見面的，到那時一切都好了。不過，有一種思想，有一種思想始終使我非常苦惱！”

我一下跳起來，開了燈，連忙奔到放着鉛筆和地圖的桌子跟前。

“這是很痛苦的，”我這時在地圖上寫着，“現在認識到一切本來可以不致于搞成這樣，這是很痛苦的。我們接二連三地碰到一些倒楣的事，最倒楣的就是我錯把探險隊的給養裝備工作委托了尼古拉。現在不得不每小時，每分鐘為此付出極大的代價。”

尼古拉？真的嗎？對，是尼古拉！

我停下了，因為再往下想，思路就象是到了一個懸崖斷壁，再也接續不起來了，可是再往後的事我又記得很清楚——是講一個掉到冰縫里跌死的水手司卡其可夫。但這些已經完全是另一碼事了。這只是信的內容，而不是原文，除了幾個零星的字句外，關於信的原文我再也想不起什麼來了。

這樣我一直沒有睡着。法官在七點多鐘起床時，看見我只穿了一件內衣坐在北極地圖前面，感到非常驚訝。在這張地圖

上，我已經能够道出“圣·瑪丽亚”号帆船遇难的一切細節，如果塔塔林諾夫船长能回来的話，也会为此吃惊的。

昨天晚上我們約好去參觀市博物館，因为薩尼亚想帶我們去看看这座全城引以为荣的博物館。博物館設在过去一个商人巴甘肯的府邸中。彼其加·司考伏罗得尼可夫从前說，在这座大厦里堆滿了金子，巴甘肯本人就隱居在这大厦的地窖里，誰要是到地窖里去，他就立刻把誰掐死。的确，窖門紧紧地封閉着，門上挂着一把大概是十二世紀的大鎖。但窗戶却是开着的，脚夫們就从窗口里把木柴投到地窖里去。

三樓上是薩尼亚的老师，画家图夫的作品展覽室，她首先把我們帶去看这些画。在这些画里就有画家自己的相：小矮个兒，穿着一件托尔斯泰式的絲絨短外衣，笑咪咪的，一头蓬松的黑发，黑发中間摻杂着几絲閃閃发光的白发。他的作品倒不坏，只是太单調了一些，画的尽是恩斯克：白天和夜晚的，月下和阳光照耀下的，古代的和現在的恩斯克的景物。不过我們还是一味地贊美这些作品，因为这位图夫画家实在太可亲了，薩尼亚望着他时的神情真是虔誠崇敬到了极点！

她大概猜到我和卡佳要个别談談，所以我找了一个无所謂的借口，向我們告罪，便一个人留在展覽室里了。于是我們下楼走进一間大厅，大厅里摆着許多古代的武士象，这些武士穿着护胸鎧，鎧下露出鎖子甲，好象衬衣露在背心外面一般。

問題很明白，我这时是急于想把昨夜的新发现告訴卡佳。但是話从哪兒开头呢？倒是她自己先开口了。

“薩尼亚，”她說道，我們在一座样兒有点象柯拉布略夫的，斯杰方·巴托里时代的战士塑象前停住了脚，“我考虑过他說的‘不要相信这个人’所指的是誰。”

“你說呢？”

“我断定，這……不是指的他。”

我們沉默了好大一會兒。她不轉眼地望着戰士象。

“不對，是指的他，”我很不高興地反駁道。“還有，你的父親發現了北地島。就是你父親，而不是什麼維爾基茨基。這個問題我已經查明白了。”

但是，這個若干年後會使全世界地理學家為之震驚的消息，這時卻並沒有在卡佳身上發生什麼特別的影響。

“為什麼你認為，”她有點兒吃力地繼續說道。“這指的是他……尼古拉·安東內奇呢？信上並沒有什麼地方明指出來啊。”

“明指出來的地方有的是。”我感到生起氣來了。“第一，關於狗的問題，是誰經常吹噓說他給探險隊買了最好的狗？其次……”

這時薩尼亞走了來，我們便住口了。我們一竅不通地看“古俄羅斯貴族生活方式”，看“資本主義制度下恩斯克農民沒有煙囪的茅屋”，薩尼亞為我們講解，可是我們並沒有聽，至少卡佳沒有聽。她一臉心神錯亂的樣子不時地瞧瞧我，仿佛是在問我：“你相信是這樣嗎？”我也是在默默地回答：“我絕對相信。”

後來薩尼亞告辭走了，我們在恩斯克博物館陰暗的大廳里又逛了很久。

“其次呢？”

其次，昨天晚上我又想起了信里面的一段。是這樣的。

我便從“鷹爪蒙哥其瑪”開始把這一段讀了一遍，我象朗誦詩歌一般，讀得那麼清晰宏亮，卡佳睜大了眼睛，嚴肅得象一座石膏象似的聽着我讀。突然，一種冷淡的神情在她眼睛里閃了

一下，我覺得她不相信我。

“你相信我嗎？”

她臉色變得蒼白，輕聲答道。

“相信。”

關於這件事，以後我們就再沒有提了。我只問過她是否知道“鷹爪蒙哥其瑪”這句話從哪兒來的，她說不記得了，——大概是从古斯达夫·爱瑪尔^①的書中來的。後來她說我不會了解這個消息對媽媽有多么可怕。“一切比你想象的要複雜得多，”她完全象另一個成人似的，很傷感地說道。“媽媽現在的生活已經够沉重了，至於她內心的痛苦，那就更不用說了！可是尼古拉·安東內奇……”

卡佳說了半句就不說了。但是後來，她還是對我說明白了這件事情的究竟。這也是一個新發現，也許比起塔塔林諾夫船長發現北地島這件事來還顯得突然。原來尼古拉·安東內奇早就愛上了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去年在她患病的時候，他接連幾個晝夜衣不解帶地看護她，甚至还請了一個護士，雖然當時根本用不着這樣小題大作。病好了以後，他親自護送她到索奇城；雖然住療養所要便宜得多，可是他却讓她住在李維叶拉旅館里。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說這“簡直是發了瘋”。春天他去列寧格勒，給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帶回來一件十分昂貴的帶飛翼式袖子的皮上衣。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不在家時，他從不先睡。他勸她不要讀大學，因為她又工作又讀書是很困難的。然而最令人驚異的一件事是發生在這年冬天，瑪麗亞·瓦西里

① 古斯达夫·爱瑪尔 (1818—1883)，法國作家，曾游南、北美，非洲及高加索等地，寫過許多游記和印第安人反抗白種侵略者的小說。——譯者注。

外
3
八
考古学家从一块残存的銘文中可以推断一个民族的历史和风俗习惯。我也是这样，从旧日恩斯克残存下来的某些角落，可以回想起我們昔日的生活来向卡佳叙述。

不过，現在我自己也需要对这个美丽的城市加以重新估价。小孩子的时候，我并没有去留心这些座落在山上的花园，傾斜的街道，从“鉄栏杆”（沙河和靜河汇流的地方，現在还是这样叫法）开始分开的两道高陡的河岸，这些风景究竟美妙在什么地方。

我只有一天沒有和卡佳在一块兒。这天我到墓地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覺得經過这些年，母亲的坟墓恐怕連个影兒也沒有了。但我最后还是找着了。坟墓周围圈着傾頹的木栏杆，歪倒了的十字架上还可以隱約辨認出上面的題字：“主啊……不要忘記你的奴隶的灵魂。”这时是冬天，当然所有的坟墓都盖着雪，但总还可以看出母亲的这座坟墓是荒蕪着沒有人照管的。

我在小路上来回走了許久，想起母亲的一切，不禁悲从中来。她現在該有多少岁了呢？四十岁，这还很年輕嘛。她本来現在也可以象达莎阿姨一样幸福地生活着，我想到这里便不覺心如刀絞。我想起她那疲憊迟鈍的眼光，想起她那双給人洗衣服弄裂了口的手，想起她因过度的疲劳，晚飯都吃不下的情形，这种过度的疲劳几乎和死亡毫无差別。她本来多么聪明！就是那个坏蛋卡耶尔·庫里蠱惑了她，而且害死了她！

我回到墓前，仿佛是和她訣別。后来我找着看墓人，他正在一个半倒塌的小礼拜堂里震天价响地砍木柴。

“老大爷，”我对他說道，“你們这兒有位阿克西尼亚·格利高里耶娃的坟墓。就在这条路上，拐角旁边第二个墓。”

他装作似乎知道我說的是哪一个坟墓的样子。

“能不能将它收拾一下？我可以付錢。”

看墓人到路上去看了看就回来了。

“这个墓有人管，”他說道。“现在是冬天，看不出来。别的坟才是沒有人管的，不是十字架拔出来了，就是什么东西坏了。这座坟可是有人管。”

我給了他三个卢布便走了。

归途中我想着卡耶尔·庫里，想着媽媽。她怎么会爱上这样一个人？我不由得又想起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来，我認為我一輩子也不能理解女人的心理……

我和卡佳每天見面，但直到要走的前一天，我才得空問了問她关于布宾其可夫家几个老太婆的事，問她們是不是真的被开除出教的？卡佳感到十分驚訝。

“真的嗎？我还不知道呐，”她說道，“不过这也很可能，因为她們都是无神論者和虛无主义者。你讀过‘父与子’嗎？”

“讀过。”

“你記得那里面有一个虛无主义者巴扎洛夫嗎？”

“記得。”

“那好，她們就是和他一样的虛无主义者。”

“算了吧，算了吧！要知道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她們都是老年人。山羊不过是有點神經質。她們喝山羊奶，还劝我喝，我可不喝。山羊发神經的时候出的奶也不好。”

“你簡直是在拿我开心，”我沉吟了一会兒，說道。

“不，这是实話。”卡佳急忙分辯道。

一只神經質的山羊，三个虛无主义者伺候着它。真是活見鬼，無論如何这总是一件十分怪誕的事！

最后分別的一天終於来到了！达莎阿姨从早晨六点鐘就在

烤点心，我刚睡醒，便聞到蕃紅花的香气，和一种噴香甘甜的面团的味。后来她走进我睡觉的餐厅，样兒很忧愁，戴着眼鏡，身上沾滿了面粉，一手捏着彼其加来信的一角。

“應該把薩尼亚叫醒，”她严肃地說道。“彼其加来信了。”

彼其加来的信，果然象法官所說的那樣，虽然簡短，可是很“适当”。他首先解释为什么不回来过寒假，因为他到列宁格勒參觀去了。其次，他奇怪我会在恩斯克出現，因此表示衷心的喜悅。接着他就狠狠地罵我既不写信又不找他，就如同“一匹沒有良心的馬一样”。最后，信封里还附了一封給薩尼亚的信，她很自然地笑起来，說道：“这个傻瓜，写在一起不就得了。”可是显然他是不能将两封信写在一起的，薩尼亚拿了信就跑到自己房間里一气讀了三个多鐘头，直到后来我闖进她房間里，她才不讀了，我要她赶快去阻止达莎阿姨，因为她想烤个长寬足有一公尺那么大的点心給我在路上吃。

拉普金胡同八号的房子里大約也和我家一样，所以卡佳这天沒有能够出来。就仿佛她是去北极一般，她們不仅給了她許多吃东西，而且还給她装备了許多衣服：三位虛无主义者从未使用过的旧式嫁妝——土耳其花边，帶褶肩的条紋天鵝絨上衣，帶衬里的沉甸甸的連衣裙。

最妙的是薩尼亚順便到布冥其可夫家去了一趟，回来时誤了午飯。她的神情有些兒困惑，說那兒太有意思了。三个老太婆都在一个勁兒地縫，縫了一件很漂亮的連衣裙。卡佳穿着很合身，她穿着却不好看。不过帽子給她戴着正好，她也一定要作一頂那样的帽子。

“总而言之，我們什么都量过了，”薩尼亚笑道。“头都攪昏了。”

法官从机关里回来，陪我吃最后的一餐饭。他带回来一瓶葡萄酒，我们把它喝光了，然后他讲了一番话。这次讲得很好，比起那次在祝贺卡耶尔参加敢死营的宴会上讲的话好多了。他将我和彼其加比作山鹰，并且希望我们以后能常常回到老巢里来。他虽然很愿意以自己能培养出这样的下一代而夸耀一番，但不能这样说，因为是我们的国家没有让我们堕落，把我们培养成了人。他的话说得这样动人，达莎阿姨听到这里，不禁潸然落下泪来，好象是想重提旧事，说她自己愿意担负教育我们的责任，并不想仰仗别人的帮助……

我站起来谢谢法官。我不记得讲了些什么话，但也讲得很好，大致是说暂时我们还没作出什么值得夸耀的事。

这一顿饭吃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们差一点误了车。我们坐着马车到车站去。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阔气地走路：坐在马车上，脚前搁着小提篮。要不是达莎阿姨这天老是当着我的面往篮里装点心，我敢说自已根本还不知道这个小提篮是打哪兒来的哩（我是空着两手回恩斯克来的）。

我们到车站时，卡佳已经站在车厢的扶梯上了，布宾其可夫家的三个老太婆你一句我一句地争着嘱咐她，要她在路上别受凉，不要叫人把东西拐了去，半路上不要下车到站台上乱跑，到了家就赶快拍电报来，代她们问好，多写信。

我不知道，也许她们真是虚无主义者吧，但在我眼里看来，她们只不过是几个紧裹着狐皮大衣，带着用细绳系着的，又大又可笑的暖手筒的老太婆罢了。

我的座位是在另一个车厢里，所以我们只好远远地向卡佳和布宾其可夫家的老太婆们打招呼，卡佳对我挥了挥手，老太婆们却高傲地对我們点了点头。

第二遍鈴响了！我擁抱了薩尼亞和達莎阿姨。法官請我去看看彼其加，我答应到达后第二天就去看他。我邀薩尼亞到莫斯科来，她答应春假一定来，原来她和彼其加早已約好了。

第三遍鈴响了！我已經进了車廂。薩尼亞在空中写了几个什么字，我胡乱写了“好吧！”两个字答复她；達莎阿姨低声地抽泣起来，最后我看到薩尼亞从她手中将手絹拿过来，笑嘻嘻地替她擦眼泪。火車慢慢地移动，可爱的恩斯克車站向后倒退着。車愈走愈快！那几个虛无主义者从我身边閃过去了！一分鐘以后，月台走尽了。再見吧！恩斯克。

車到下一站时，我和一位可敬的先生交換了座位，他占了我的下舖，我就搬到卡佳的車廂里，一来这兒比較亮一些，二来这是卡佳的車廂。

她在这兒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小桌上舖着洁淨的桌布，窗上挂着窗帘，好象她在这兒已居住了一百年似的。

我們俩都刚吃过飯，不过还是想看看究竟老人家們給我們提籃里装了些什么东西。

一般說来，卡佳的提籃比我的还略胜一筹。籃里有苹果——自家果园里长的特別鮮美的冬苹果！我們一人吃了一个。又招待邻坐一个小矮个兒，沒有刮脸，肤色青黑，戴着眼鏡的男子吃了一个。他一味地在揣測我們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兄妹吧，样兒不象！是夫妻吧，未免过早！

已經两点多了，沒有刮脸的伙伴将一只捏得紧紧的小拳头放在鼻子下面，一夜鼾声不絕。我和卡佳一直站在过道里談話。我們在結了霜花的玻璃上用手指写字，起初写的是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后来又写一些單詞的第一个字母。

“跟‘安娜·卡列尼娜’書里描写的一样，”卡佳說道。

可是我覺得，這和“安娜·卡列尼娜”一点也不相似，總之 and 什么也不相似。

卡佳和我并肩站着，她仿佛变成了一个新人。她的头发梳得和成人一般从中笔直分开，在她那可爱的黑发下面露着“新”的耳朵。当她笑的时候，露出来的牙齿也是“新”的。从我和她認識以来，她的头还没象现在这样灵活，同时又十分矜持地转动过，就象一个真正的美妇人一般。她的一切都是新的，簡直成了另外一个人了。我感到我在狂热地爱着她，胜过爱世間的一切！

突然，窗外一起一伏的電綫可以看清了，复盖着积雪的黑鴉的田野逐渐开朗起来。我不知道我們是用多大的速度在行駛，大概每小时不会超过四十公里，可是我覺得我們仿佛在神話中那样騰云駕霧一般地疾馳，一切都在将来！我不知道将来什么在等待着我。可是我肯定地知道一点：我們的关系将是永远的，卡佳永远是我的，我也永远是她的。

16 在莫斯科什么等待着我

諸位請設想一下，当你回到曾經度过了半生光阴的老地方，而大家却突然惊异地望着你，好象你是走錯了地方似的那幅情景吧。当我从恩斯克回到学校以后，就體驗到了这种感觉。

还在更衣室里，我碰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羅馬什卡。他看到了我以后，作了个鬼脸，繼而微微一笑，幸灾乐祸地說道：

“欢迎你回来！啊嚏！祝你健康！”

这个坏蛋有点得意的样子。

因为这是开学前最后一天，一个同学也不在。于是我便

走到厨房里去，想問候問候彼佳大叔。彼佳大叔对待我的态度也非常怪。

“没有关系，老弟，免不了有这样的事，”他低声說道。

“彼佳大叔，发生什么事了？”

他就象沒有听见我的话似的，往鍋子里撒了一把盐，一声不响地站在那兒。他在聞鍋里冒出来的热气。

柯拉布略夫在走廊里閃了一下，我連忙向他跑去。

“您好，伊万·巴甫雷奇！”

“啊！是你？”他很严肃地答道。“到我那兒来一趟。我要和你談一談。”

柯拉布略夫桌上放着一个年輕女人的相片，我一时沒有認出这是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来，实在长得太漂亮了！我近前仔細一看：她的頸上也有一条珍珠項鏈，正是卡佳到我們学校参加晚会时所戴的那条項鏈。我看到这条項鏈感到更加高兴，就象卡佳在向我問好……

柯拉布略夫来后，我們就开始談話了。

“伊万·巴甫雷奇，是怎么回事兒？”

“是这么一回事兒，”柯拉布略夫不慌不忙地說道，“打算把你开除出校。”

“为什么？”

“你还不知道嗎？”

“不知道。”

柯拉布略夫严厉地看了看我。

“我就是不喜欢这样。”

“伊万·巴甫雷奇！这是实在話！”

“因为你擅自离校十天，”柯拉布略夫屈指一款一款地数着

說道，“因为你侮辱师长李和，因为你打架。”

“啊！原来这样！太好了，”我很鎮定地申辯道。“不过在沒有开除以前，請您听听我的解释。”

“你講吧。”

“伊万·巴甫雷奇，”我郑重其事地开始說道。“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要踢羅馬什卡的狗脸嗎？”

“不要說‘狗脸’，”柯拉布略夫說道。

“好，就不說‘狗脸’。我踢了他的狗脸，因为他是一个坏蛋。第一，他把我和卡佳的事向塔塔林諾夫家講了。第二，他偷听同學們議論尼古拉·安东內奇的話，再向他密报。第三，他未經許可，乱翻我的箱子。这等于是一种搜查。同學們都看見我是當場抓住他的，一点不錯，我打了他。我承認这是不对的，特别是用脚踢，但我也是人，不是石头。我心里忍受不了。任何一个人都会这样干的。”

“唔，还有呢？”

“关于李和的事，您早已經知道了。請他首先証明我是唯心主义者。您看了我的作文吧？”

“看了。不好。”

“就算不好吧，可是文章里面並沒有潜藏什么唯心主义，这点我可以担保。”

“就算是这样吧。繼續講下去。”

“下面还有什么呢？都講完了。”

“不，還沒講完。你知道我們通过人民警察局寻找你的事嗎？”

“伊万·巴甫雷奇……，这是实在的。我真的对瓦尔加說过。好吧，就假定这也不算数。但我是在假期中离校，到哪兒去

呢？到我八年沒有回去過的故鄉去了，難道因為這件事就要把我開除出校嗎？”

當柯拉布略夫提到人民警察局時，我就知道這一回不大發一場“雷霆”是過不去的。果然，我猜得不錯。

在四年級時，柯拉布略夫曾經喝斥過我一次。那是因為依西卡·格魯曼洗澡時腳碰在石頭上碰破了，我便用日光浴替他治療，後來不得不把兩個腳趾頭割掉。那一次的“雷霆”可真怕人。這次他又發作了。他的眼睛鼓得象要爆出來似的，對着我喊叫，我只是偶爾畏縮地說：

“伊萬·巴甫雷奇！”

“你給我住嘴！”

他自己也沉默了一會兒，這只不過是為了換一口氣……

這麼一來，我漸漸認識到了自己確有好些不對的地方。但難道真要把我開除嗎？那麼世界上的一切都完了！航空學校也完了！生活也完了！

柯拉布略夫終於靜了下來。

“簡直糟糕透了！”他說道。

“伊萬·巴甫雷奇，”我感到有點發抖，更確切一點說，是聲音在打抖，“雖然您說的好多地方都不是實情，但是我現在不打算和您辯駁。怎麼都成。不過您不也是不願意他們把我開除嗎？”

柯拉布略夫沉默着。

“姑且假定這樣吧。”

“那麼，請您告訴我，我現在應該怎麼辦。”

“你應該向李和道歉。”

“好吧，只要他先……”

“我已經和他講過了！”柯拉布略夫惱怒地斥責道。“他已經把‘唯心主義’勾掉了。不過分數還是照舊。”

“就算分數照舊吧。不過把我的作文評為‘極劣’總是不對的。這樣的分數根本就沒有，劣還帶負號，這算是什么？”

“第二，”柯拉布略夫繼續說道，“你應該向羅馬什卡道歉。”

“這可絕對辦不到！”

“這是你自己說的：‘我承認這是不對的’。”

“是我說過。但我寧可被開除，也不向他道歉。”

“薩尼亞，你聽我說。”柯拉布略夫很嚴肅地說道，“我費了很大勁才爭取到讓你出席教務會議。現在我倒後悔自己為這件事瞎操心了。要是你出席會議時說：‘絕對辦不到，我寧可被開除！’無疑你是會被開除的，你完全可以相信這點。”

從他說這些話時臉上那種特殊的表情，我立刻就明白他暗中指的是誰。尼古拉·安東內奇那張彬彬有禮，一絲不苟的胖臉忽然閃現在我的面前。原來是他在想盡一切辦法要開除我呀！

“我覺得你沒有權利為了一點兒自尊心就拿自己的前途冒險。”

“這不是什麼一點兒自尊心，這是名譽。伊萬·巴甫雷奇！”我激憤地繼續說道。“您想要我怎麼樣呢？要我把羅馬什卡的事敷衍過去嗎？因為這事干系着尼古拉·安東內奇，干系着那個決定開除我或不開除我的人。您想讓我去作那麼卑鄙的事嗎？決不！我現在明白了，他為什麼堅持要開除我！他想除掉我，讓我離開，以後再也看不見卡佳。問題不就是這樣嗎！我要在教務會議上把這些事全都說出來。我要說羅馬什卡是個下流的家

伙，只有下流胚子才会向他道歉。”

柯拉布略夫沉思了一会兒。

“等一等，”他說道。“你剛才說羅馬紹夫偷听同學們关于尼古拉·安东內奇的議論，然后向他密报，关于这一点你有什么証据？”

“我有証明人瓦尔加。”

“哪个瓦尔加？”

“朱可夫。他一五一十地对我說过：‘羅馬什卡用小本子記，然后向尼古拉·安东內奇密报，說有人在背后議論他。密报了以后，还講給我听。我把耳朵堵住，他还是講。’我这也是一五一十地轉告給您。”

“哼！有意思，”柯拉布略夫神气活現地說道，“那么瓦尔加为什么不吭声呢？他不还是你的好朋友嗎？”

“伊万·巴甫雷奇，他受着羅馬什卡的轄制。瓦尔加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羅馬什卡夜間盯着他看。并且关于这些事也不是随便講給他听的，而是先要他起誓人格担保。当然，瓦尔加是个傻瓜，答应了他人格担保，可是既然人格担保了，他当然就不應該吭声啊！对嗎？”

柯拉布略夫站起来，走了一轉，掏出梳子，先梳起鬍子来，梳了鬍子梳眉毛，梳了眉毛梳鬍子。他在思索。我的心怦怦地跳着，但我再也沒有說什么話。讓他去想吧！我甚至連呼吸也尽量放輕了些，害怕妨碍了他。

“好，就这样吧，薩尼亚，反正你是不会耍滑头的，”柯拉布略夫終于說道。“那么在教务會議上，你就把現在和我說的話一五一十完全講出来好了。不过，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伊万·巴甫雷奇？”

“不能激动。比如你刚才說，尼古拉·安东內奇要开除你是因为卡佳的关系。这一点在大会上就不应当說。”

“伊万·巴甫雷奇！难道这点我还不明白嗎？”

“你明白是明白，不过你太容易激动……这样吧，薩尼亚，我們約好。我把手这样放在桌上，手心向下，你就放心地講下去，同时要时时看着我的手。如果我用手輕拍桌子，那就是說你太激动了。如果不动，就是沒有激动。”

“好吧，伊万·巴甫雷奇。謝謝您。什么时候开教务会呢？”

“今天三点。不过，叫你出席的时候要晚一些。”

他要我把瓦尔加叫到他这兒来一趟，于是我們就分別了。

17 瓦尔加

我竭力使自己不要太激动，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准备万一被开除，可以立刻就走。后来我讀了牆报，关于我的事上面一个字也沒有提，这样看来，我的問題还没提到校团委，要不然就是寒假期中一次团的會議也沒开过。

想到他們不仅要把我开除出校，还会开除我的团籍，这真可怕极了。真会这样嗎！同學們关于这件事知道些什么呢？为什么我撞入寢室，把羅馬什卡飽打了一頓之后，沒有告訴任何人就到恩斯克去了呢？当然我玷污了共青团員这个称号。我当时應該解释一下自己的行为。唉，晚了！

整整一天我都忧悶地想着这些事。共青团支委办公室关着

門。支委中只有林加·謝涅曼在家。我不喜欢她，也不想和她談這樣的事情。我認為她是个傻瓜。

我等待着瓦尔加，時間一分一分的过去，可是他还没有回来，不用說又是在动物园！我怕半路上錯過，給他留下了一张字条表示悵然，随后我就乘車到普列斯姬街去了。

这次我没有能很快地找到他。

“朱可夫在教授那兒，”一个年紀十五岁左右的小孩告訴我說。他和瓦尔加有些相似，也长着那么一张善良的，多少帶点兒神經質的脸孔。

“教授在哪兒？”

“在巡視。”

我又問了一遍。

“在公园里巡視！”

在这以前我以为只有在医院里教授才巡視病人。可是这个小孩很耐心地对我解释，不仅是在医院里，在动物园里也同样，这兒教授所巡視的自然不是病人，而是野兽。

“不过动物有时也会害病。”他想了想以后，又說道。“当然，比起人来要少些。”

这就是瓦尔加整天說的那位有名的尔教授。我立刻就知道是他，因为他也象瓦尔加，不过是象老瓦尔加：生着一个大鼻子，架着一付大眼鏡，穿着一件长皮大衣，戴着一頂高高的羔皮帽。

教授站在猴子栏旁边，周围聚集着相当多的人，他們在大衣外面都套了白罩衫。所有这些人好象都想和他接近，每个人都想和他說什么話。可是，他只听瓦尔加一个人說話，为了听这位瓦尔加說話，他甚至把他那滿是皺紋的大耳朵从皮帽里掏了出来。

我远远地止住了步。可以看出，瓦尔加非常兴奋，眼睛一眨一眨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暗自想：“小家伙真行。”

他講得相当长久，教授一直在听着，眼睛也开始一眨一眨的，聚精会神地抽吸着鼻子。有一次他张开口，大概想要反駁，可是瓦尔加果断地，气冲冲地搶到他面前，于是老教授又順从地閤上了嘴。

最后瓦尔加說完了，老教授遮好耳朵，开始沉思起来。他突然喜出望外地拍了拍瓦尔加的肩膀，声音完全象馬似的嘶叫起来；所有的人都高声交談着走开了。只剩下瓦尔加一个人，带着一付喜不自胜的神气呆呆地站在那兒。这时我才喊了他一声：

“瓦尔加！”

“啊，是你！”

我还从来沒有见过他这样的兴奋。他的眼睛里甚至滚着泪珠兒。他不知所措地微笑着。

“你怎么啦？”

“什么？”

“你哭了嗎？”

“你胡說什么！”瓦尔加回答道。

他用拳头将眼泪擦乾，快乐地深深喘了一口气。

“瓦尔加，出什么事了？”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我最近在研究蛇，我成功地証明了一件有趣的事。”

“什么事？”

“毒蛇的血液是随着年齡变化的。”

我不禁非常惊讶地看了看他。是因为蛇的血液随着年齡的变化高兴得流泪了嗎？这实在使我无法理解。

“祝賀你，”我說道。“我要和你談談，怎麼樣，行嗎？”

“行。”

我們走到老鼠那邊去。

“你知道他們想把我開除出校嗎？”

瓦爾加大概已經知道這個消息，不過他完全忘了這回事，因為他先是大睜着眼睛，然後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額說道：

“是啊！我知道！”

“校團委討論過沒有？”

這時我的聲音也有點兒啞了。瓦爾加點了點頭，說道：

“決定等你回來以後再說。”

我這才放了心。

“關於羅馬什卡的事你給支部寫了報告沒有？”

瓦爾加把眼光移開。

“你看，”他嘟嘟囔囔地說道，“我還沒有寫，我只告訴他，如果他還要糾纏，我就寫。他說再也不了。”

“原來這樣哇！那麼你對於要開除我學籍這事是毫不在乎的了！”

“為什麼？”瓦爾加驚恐地問道。

“因為只有你可以證明我不只是為了私人的緣故打他。可是你是個膽小鬼，你這種膽小的行為可能變成卑鄙的行為。你是怕替我說公道話！”

對瓦爾加說這樣的話是過火了些。可是我實在太恨他了。我說羅馬什卡是害群之馬的典型，誰都應該和這種人鬥爭。

“我今兒晚上就交上去，”瓦爾加放低聲音說道。

“好吧！”我冷冷地答道，“不過你要明白，我不是祈求你這樣作。我只是認為作為共青團員，這是你應盡的責任。柯拉布略

夫現在要你到他那兒去一趟。”

“什麼時候去？”

“馬上就去。”

他懇求我稍稍等一會兒，哪怕一刻鐘也好，讓他喂一下他的什麼花斑蛤蟆。我沒有理會他，給他披上大衣，就帶着他到柯拉布略夫那兒去了……

過了半個小時以後，他氣呼呼地走過來，用一個手指摸弄着鼻子，哼哧哼哧喘了一陣子氣，原來柯拉布略夫問他是不是真不喜歡夜里有人盯着他看。這使他大為驚異。

“我不明白他是從哪兒知道的！是你這個畜牲告訴他的吧？”

“不，不是我。”我撒謊道。

“更主要的是，他問我：‘要是有人用充滿愛情的眼睛看着你呢？’”

“你怎么說的？”

“我說，‘那我可不知道了……’”

五點半的時候，一個校工來找我。

“格利高里耶夫，請您出席教務會議，”他很有禮貌地說道。

18 破釜沉舟

這是在我們窄狹的教員休息室里開的一次最普通的會議。會議桌上鋪着總子破舊了的藍絨台布。我覺得大家都帶着一種神秘莫測的表情望着我。塞拉菲瑪今天穿着套鞋，使我恍惚覺

得这这也是一个謎。当我走进去的时候，柯拉布略夫在笑，我也認為这是“故意的”！

“喂，格利高里耶夫，”尼古拉·安东內奇温和地开始說道。“你当然知道，我們为什么把你叫到教务会上来。你使我們很痛心。不只我們，可以說是我們全校。你使我們痛心的是你那为人类社会所不齿的野蛮行为，我們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就應該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和可能来推进它的发展。”

我說道：

“有什么問題請直接提出来吧！”

“尼古拉·安东內奇，請允許我先說两句，”柯拉布略夫赶忙插嘴說道。“格利高里耶夫，請你說一說你从学校里偷跑以后的这几天都是在哪儿过的？”

“我不是偷跑，是去恩斯克了。”我沉着地回答。“那兒有我八年沒見面的妹妹。司考伏罗得尼可夫法官可以作証，我住在他家里，——果戈理街十三号，从前馬尔庫茲的房子。”

如果我直截了当地說这九天是和卡佳·塔塔林諾娃一块兒过的，她被送到恩斯克去是有人存心不讓我們見面，至少在寒假期間不能見面，那么我的話对尼古拉·安东內奇就不会发生这样大的影响了！他的脸色立刻刷白，眼睛开始一眨一眨的，温和地将头偏到一边。

“为什么你离开时不告訴誰一下呢？”柯拉布略夫問道。

我回答說我承認自己的錯誤，违犯了校規，并保證今后決不再犯。

“太好了，格利高里耶夫，”尼古拉·安东內奇說道，“这样的回答太好了。只希望你能同样令人滿意地解释你的另外几件行为。”

他和藹地看着我。他有惊人的自制力。

“現在把你和伊万·維塔里耶維奇·李和之間发生的事情告訴我們吧。

直到現在我还不明白，为什么当时我叙述关于李和問題的經過时沒有提起“唯心主义”的事。大概我以为李和既然收回了他的批評，那么关于唯心主义的事也就没什么可談的了。这是一个极大的錯誤。同时还不應該提到我的作文不需要“批評”。这点使得大家都不高兴；柯拉布略夫紧皺眉头，将手放在桌子上。

“这么說来，你不喜欢批評？”尼古拉·安东內奇温和地說道，“你对伊万·維塔里耶維奇說的什么話？照样重說一遍。”

当着教务會議上的全体人員要我把对李和說的話再重复一遍！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李和不是一个傻瓜的話，他自己就会把這個問題岔开了。然而他只是神气十足的望着我。

“往下說吧！”尼古拉·安东內奇庄严地宣告。

“尼古拉·安东內奇，讓我說一句，”柯拉布略夫不同意，說道，“他对伊万·維塔里耶維奇說的話我們都已經知道了。現在想知道的就是格利高里耶夫对自己的行为怎么解释。”

“对不起，对不起。”李和說道。“我要求他重說一遍！我就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校发育不健全的兒童口中也沒有听見過这样的脏話。”

我一声不响。如果我会遙測別人的思想，那么，这时从柯拉布略夫的眼中我一定能猜出：“薩尼亚，說呀，說你是因为‘唯心主义’的批語受了委屈。”可是我不会遙測別人的思想。

“說吧！”尼古拉·安东內奇寬容地重复道。

“不記得了，”我喃喃地說。

这样回答真是蠢到了极点，因为大家立刻就明白我是撒谎。李和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说道：

“今天他可以因为我打分太少而辱骂我，明天兴许就要害我哩，简直是十足的流氓行为！”

同那次在楼梯上一样，我这时又想用脚踢他，自然我当时还是忍耐住了。我咬紧牙关，一声不响地看着柯拉布略夫的手。他抬起一只手，轻轻地拍了拍桌子，又静静地放回原地方去。

“当然，作文是不好，”我尽力使自己不要太激动，并且愤恨地盘算着应该怎样使自己摆脱这种尴尬的处境。“但还不至于‘极劣’吧，因为根本没有这样的分数，不过，我认为这也没有什么。要是教务会议决定要我道歉，好，我就道歉。”

显然，这话也说得太愚蠢，弄得全场哗然，好象我说了什么莫名其妙的话，所以柯拉布略夫带着毫不掩饰的失望的神情看了我一眼。

“好吧，格利高里耶夫，”尼古拉·安东内奇不自然地微笑着说道。“可见你是准备着如果教务会议根据这件事作出了决定，你才向伊万·维塔里耶维奇道歉，换句话说，你并不承认你自己犯了错误。那有什么法子呢！我们保留这一情况作为参考，现在我们来谈另一个问题。”

“……为了一点儿自尊心就拿自己的前途去冒险，”我又想起了这句话。

“请您原谅我，”我转脸向着李和很不自然地说道。

可是尼古拉·安东内奇又开始说话了，李和也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

“你说，格利高里耶夫，你为什么要野蛮地殴打罗马绍夫，用脚踢他的脸，使他受了重伤，显然影响了你的同志罗马绍夫的

健康。你对于在我们学校里这种前所未闻的行为又作何解释呢？”

我觉得，我这时最痛恨的便是他这种转弯抹角，冗长的谈话。不过这时柯拉布略夫的手举在桌面上，示意很明显，于是我止住了激动。

“第一，我不承认罗马绍夫是我的同志。这样的同志对我简直是一种耻辱！第二，我只打了他一次。第三，暂时还没有什么迹象可以看出他的健康受到了损害。”

大家激愤得喧嚷起来。只有柯拉布略夫略微点了一下头。

“我的行为可以这样来解释，”我愈来愈沉着地继续说。“我认为罗马绍夫是一个最卑鄙的家伙，在任何时候，我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是不应该打他，应该组织公审，并且召集全校的人旁听。”

尼古拉·安东内奇想阻止我，可是我沒有理他。

“罗马绍夫是一个典型的投机份子，他口里讲的只是金钱，心里想的也只有一件事：怎样可以发财！是谁一天到晚搞抵押贷款的勾当？罗马绍夫。是谁卖扑粉和口红给姑娘们？——罗马绍夫！他买来一盒扑粉，再一撮一撮地卖出去赚钱，这是典型的害群之马，他败坏了我们全校的名誉。”

我一直用这种方式讲下去，就好象我真是在法庭上以公诉人的身份在发言。我讲话中个别句子和以前卡耶尔·库里讲的相似，但是我当时也没有时间来考虑这些相似的地方了。

“但是还不仅如此！我肯定地说，罗马绍夫还从心理上影响着一些比他软弱的同学，把他们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需要举例的话——对不起！瓦里亚·朱可夫便是一个。罗马绍夫利用瓦里亚的神经衰弱，胡言乱语地吓唬他。他怎样对待瓦里亚呢？

首先，他要他人格担保，然后把自己的卑鄙的，见不得人的事告诉他。当我知道了这件事以后，简直惊讶万分。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员，竟随便答应别人人格担保，决不告诉任何人。告诉什么事呢？连他自己在答应以前都不知道！这叫做什么呢？问题还不仅是这些！”

柯拉布略夫早已用手心轻轻地拍起桌子来了。可是我已经不再考虑自己激动不激动了。我觉得自己丝毫都没有激动。

“问题还不仅是这些！我请问诸位，”我大声说道，并且转过身去向着尼古拉·安东内奇。“如果罗马绍夫没有后台老板的话，他这样的人能在我们学校站住脚吗？不能！因此他是有后台老板的！至少我知道有一个，这就是尼古拉·安东内奇！”

这句话讲得相当厉害！我自己也没有料到，我能讲得这样大胆痛快！大家都不吭气了，整个教务会议上鸦雀无声，都在等待什么事就要发生。尼古拉·安东内奇勉强笑了笑，脸色顿时变白了。不过，他笑的时候，脸色总是有点儿白的。

“怎样证明这一点呢？很简单。尼古拉·安东内奇一向很‘关心’我们学校大家对他的议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不过为了这个目的，他豢养了罗马绍夫却是事实。我之所以说‘豢养’，是因为罗马绍夫从来不作无代价的事。罗马绍夫受他的豢养，所以才偷听学校里大家对他的议论，向他密报。可是后来他要朱可夫人格担保，把自己密报的事情讲给他听。诸位也许会问我：那么你为什么不早说呢？这是因为我在临行前一天才知道，并且，朱可夫当时已答应把这件事写成书面材料交给团支部，但他拖延到今天才把这件事作了。”

我住口不说了。柯拉布略夫把手从桌子上拿下来，很有兴

趣地轉臉望着尼古拉·安東內奇。不過只有他一個人能夠這樣泰然自若。別的教員都好象有點忸怩不安。

“格利高里耶夫，你解釋完了嗎？”尼古拉·安東內奇儼然無事的样子，仍舊用那麼平淡的聲調說道。

“是的，講完了。”

“也許，還有什麼問題吧？”

“尼古拉·安東內奇，”柯拉布略夫很客气地說道。“我認為可以讓格利高里耶夫走了，現在是不是可以叫朱可夫或者羅馬紹夫來。”

尼古拉·安東內奇解開了背心上面的一個鈕扣，將一只手插在懷里。他的臉色愈來愈白，梳到腦後的稀疏的頭髮突然掉下來垂在額前，他往椅背上一仰，閉起了眼睛。大家連忙跑到他的跟前。會議就這樣結束了。

19 老朋友

全校都在談論我在教務會議上的發言，使我忙得不可開交起來。要說我覺得自己這下子成了英雄，那未免有些誇張。但附近幾個班的姑娘們總是跑來瞧我，聲音相當大地議論我的外表。我的矮个子有生以來第一次受到別人的原諒。弄來弄去，甚至說我有点象查禮·卓別林了。一向受到全校愛戴的丹娘·薇莉琪珂走來對我說，她在假期中曾經不斷地發言攻擊我，可是現在也認為我踢了羅馬紹夫的狗臉是對的。

“不過你當時先說明他是典型的害群之馬就好了，”她很有道理地說道。

总归一句话，使我感到极为扫兴和惊讶的是，团支部在我名声大震的时候，却给了我严重警告处分。由于尼古拉·安东内奇生了病，所以教务会议没有再举行，不过柯拉布略夫告诉我，可能要我转学。

这是令人不很愉快的事，更主要的是有些不公平！团支部的决定我是同意的。可是要我转学！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我指出罗马绍夫是个卑鄙的小人吗？是因为我揭穿了尼古拉·安东内奇庇护罗马绍夫吗？我怀着极不愉快的心情坐在图书馆里，这时门口有人声音并不低地悄声问道：

“哪一个？”

我看见门边站着一个长着火红色头发的高个子青年，以询问的眼光看着我。

红头发的人都喜欢留发，但是这位青年的头发，就象地理教科书里原始人长的头发那么不顺驯。真有趣，我脑子里起初只想着他的头发，后来才恍然大悟，他是彼其加——彼其加·司考伏罗得尼可夫的大驾站在我们图书馆的门口，带着惊诧的神气看着我。我跳起来，撞翻了椅子，向他扑过去。

“彼加！”

我们彼此握了握手，后来想了一想，才立刻拥抱在一起。

“彼加！你怎么样？身体好吗？我们怎么一次也没有碰见过呢！”

“这得怨你的不是，傻小鬼！”彼加回答说。“我找遍了全世界。原来你却藏在这儿！”

他非常象萨尼亚给我看的那张相片，只不过相片上的头发梳得很整齐。我多么高兴呀！就好象和自己的亲兄弟会面一样，我没有丝毫拘束不安的感觉。

“彼其加！真見鬼！你真行，竟然找來了！我這兒有你的信！”

我把信交給了他。

“你怎么找着我的？是恩斯克写来的信吧？”

“嗯！我早就等着你来了。心里想：这个混蛋还不来。家里老人怎么样？”

“老人家都很好。”我回答說。

他笑了。

“我还以为你住在土耳其斯坦呢。你怎么搞的？到底沒有走到哇。”

“你呢？”

“我到过了，”彼其加說道，“我不喜欢那地方。你知道，那兒热极了，总是想喝水，我被关到監獄里去了，我悶得发慌，就回来了。要是你准会死在那兒。”

我帶他到寢室里去，同學們把我們团团围住，直看着我們，因此我們突然覺得，在我們校里簡直沒有談話的地方。

“到外面去吧，”彼其加建議道。“天气很好，为什么不蹣跚蹣跚呢？要不然就到我那兒去？”

“你一个人住嗎？”

他伸出两个手指来表示两个人。

“你結婚了嗎？”

他举起拳头来，象要打我的样子。

“和一个同学。”

我們每人拿了一大块恩斯克餡餅，边吃边穿衣服，口里填得滿滿的，談着話走下楼来。就在这当兒发生了一件奇遇。

在一楼楼梯口歇脚的地方，靠近地理研究室，站着一个穿白領子皮大衣的妇女。她站在栏杆边望着下面，望着楼梯把手的

空隙。——起初我还以为她打算跳楼呢，她紧闭着眼睛，在栏杆旁边摇摇晃晃。大概因为我们惊动了她，她才迟疑不决地向门口走去。这是玛丽亚·瓦西里耶芙娜；虽然她的样子有些儿和往常不一样，可是我一眼就认出是她来了。如果当时就是我一个人的话，她很可能要和我谈话的。但是，我和彼其加走在一起，再加上我这时正在吃饼，所以当我很不好意思地向她打招呼时，她只默默地点了点头，便转身走了……

她比我上一次看见她的时候更加清瘦了，脸上毫无表情，阴沉沉的……我一边想着这件事，一边往外走，和彼其加去散步了；又是我们俩，又是冬天，在莫斯科久别重逢了！

令人惊奇的是彼其加的遭遇和我的极为相似！我怀着感伤的心情听他叙述，象是在回忆一本童年时代曾经熬着极大的痛苦和不安读过的书。真奇怪！我似乎觉得那时我们更有经验，更老练些……我们好象是两个小老头儿。

彼其加在塔什干是出名的鸭子国王，——当然不是指的野鸭子，而是家鸭子。他把鸭子赶上岸来，然后活生生的拧断脖颈，就在儿童教养院的花园里架起火烤着吃。他终于因此被抓进监牢里去了，在那儿不论早饭，午饭，或晚饭都吃杏子，所以经过这次以后，他终生对杏子都极端憎恶。后来他被释放了，回莫斯科时，在喀山车站又遭逮捕。他进学校比我晚一年，直到去年跳了一级，才赶上了我。

“你还记得：‘呀呸！呀呸！你们怎么敢这样作！’吧？”

“对了！你还记得：‘谁若违背誓言，他将永远不能得到宽恕，除非等他数清了森林里有多少树木，天上落下多少……’吧？”

我把誓词一口气背到底。

“太好了！”彼其加高兴地說道。“真是好誓詞！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还記得嗎？……”

“你还記得，我們是怎样寻找你叔叔的嗎？”我打断了他的話头說，“那么他現在在哪兒？你找到他了嗎？”

原来叔叔在前綫患斑疹伤寒死了。

“你还記得嗎？……”

我們就这样不断地說着“你还記得嗎……”，我們也不知道为什么走得那么快。空中飘舞着雪花，林蔭道上有許多小孩在那兒玩，一位年輕的保姆看了看我們，忍不住笑了。

“等一会兒，我們干嗎这样跑？”彼其加問道，于是我們放慢了脚步。

“彼加，我有个建議。”當我們走够了，坐在提維尔大街一家咖啡店里的時候，我說道。

“說吧！”

“我去挂一个電話，你先在这兒坐一会兒，好好喝咖啡，什么話也不要說。”

他笑了笑說道：

“可笑！”

我发现他非常喜欢說“可笑”和“傻小鬼”。

電話离我們的座位很远，在一进門的地方，因此我故意高声說話。

“卡佳，我很想介紹你認識一个人。你来吧，好嗎？你在作什么？还有，我需要和你談談。”

“我也是这样。但是我們家里的人都病了，要不我就来了。”

她的声音显得很忧伤，因此我突然迫切地想看見她。

怎么会都病了呢？我刚才还看见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的。

“在哪儿？”

“她到柯拉布略夫那儿去过。”

“哦！哦！”卡佳用一种奇怪的声调说道：“不是，姥姥病了。”

“她怎么啦？”

“从凳子上摔下来了，”卡佳懊丧地说道，“她不知爬到书桌上去找什么，咕咚一声滚下来了，现在腰还疼！她真是倒霉！一分钟也不肯躺着……萨尼亚，我把那些信交给她们了，”卡佳突然压低了声音说道。我不由得把听筒往耳朵上贴得更紧一些。“我说你在恩斯克和我在一块儿，随后我就把信交给她们了。”

“结果呢？”我也同样低声问道。

“事情很不好。我以后再告诉你，很不好。”

她不说话了，我从电话里听到了她轻微的呼吸声。

我们说完再见以后，我怀着一种似乎很对不起她的感觉回到桌边。我心里感到惆怅，并且有点惶惶不安，彼其加好象一眼就看明白了。他故意用别的话打岔说：

“喂！关于进航校的事你和我父亲商量过吗？”

“商量过了。”

“他怎样表示的？”

“赞同。”

彼其加沉默下来。他伸出两条长腿坐着，沉思地用手指抚摸着自已脸上按年岁说来已经是应该长胡鬚的地方。

“我也需要和他谈谈，”他吞吞吐吐地说道。“你知道，我去年想进美术学院。”

“真的嗎？”

“可是今年又不想了。”

“為什麼？”

“万一沒有天才怎麼辦呢。”

我不禁笑了起來。但他却是一本正經，滿腹心思的樣子。

“總而言之，要是真的那樣，你進了美術學院，那才奇怪呢。我總覺得，你應該成為一個旅行家，或者是一個船長！”

“當然，這更有趣一些，”彼其加猶豫不定地說道。“可是如果我有天才又怎麼辦呢？”

“你的作品給別人看過嗎？”

“給……夫看過。”

他說了一位名畫家的姓，我沒聽清楚。

“他說怎麼樣？”

“他說還好。”

“那就得啦唄！應當學下去！老兄，如果你在這方面有天才，還去上什麼航空學校，那真是傻瓜！你這樣說不定會把未來的列賓^①給葬送掉。”

“說哪兒的話，不見得。”

“萬一呢？”

“傻小鬼——你在開我的玩笑，”彼其加惱怒地說道。“這是正經問題！”

我們付了賬走出來，在提維爾大街上來回蹣跚了半個鐘頭，亂談了一陣，從恩斯克談到當時剛被國民革命軍攻占的上海。又從上海談到莫斯科，談到我的學校，再從我的學校談到彼其

① 列賓(1844—1930)，俄羅斯名畫家。——譯者注。

加的学校。我們彼此都竭力想向对方証明，我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那么平凡的，而是有一定的目标。

“阿尔斯”电影院正在上演“罗曼諾夫王朝顛复記”。我們停下来，看了看电影画片，那些侍从武官都很象沙皇。沙皇坐在一輛大得可笑的汽車上，笑容可掬的样子，这輛汽車很象敞篷的雙人馬車。

“見他媽的鬼，”彼其加叹了一口气，說，“事情真难办！”

“讓我亲眼看看你是不是有这份天才。”

“你懂得什么！”

“我当然懂得啦！”

于是我們就到他住的地方去了。

去年以前，彼其加和我一样住在兒童教养院里。后来他走了运，結識了一位工农专科学校的学生，那人在跑狗場有一間房子，他們便搬在一起住，这位工农专科学校学生姓赫費茨，當我們到他家时，他已經睡了。

“看吧，”彼其加取下挂在床头上的电灯，房間里的牆壁十分污脏，滿牆挂着画，彼其加把灯照着其中的一张。我起初沒有憑借地用眼睛看，然后眯縫起眼来从拳头縫里看。

这是一张画像，我立刻就猜出了是誰的象：彼其加的朋友赫費茨。他这时恰好为移动的灯光照醒了，他睜开眼叹了一口气，用手遮住脸又睡了。这张象画得很入神：一双眼睛充滿了沉思和稚气，果断的前額上生着两道笔直的，几乎連成了一条綫的眉毛。

“用墨画的嗎？”

“墨汁稀得差不多成水啦。”彼其加抑郁地說道。

这张画像是用淡墨画的，但黑白对照，叫人感到十分自

然！

“真不錯，”我不由得表示欽佩。“喂，还有什么，再給看一看！”

其余的画都是画的我妹妹薩尼亚。薩尼亚在一叶輕舟上，薩尼亚在爐边，穿烏克蘭花衣的薩尼亚，象个老祖母似的穿着她那件黃皮袄的薩尼亚。

我不由得想起当我問薩尼亚有沒有彼其加的相片时她那副怪不好意思的神情，她很快就把相片拿来了，准是一跨出門便从口袋里掏出来的。这有什么呢！正象法官所說的，他們是很相当的一对兒。难怪薩尼亚也打算进美术学院哩。

應該給彼其加一个公正的評價——他并没有把薩尼亚画得比她本来的样子更好。但是却画出了她脸部所具有的那种蒙古人的特征：細細的眼睛，寬大顴骨，东方式的，韃靼人的眼神。这也許就是她在某些画面上那么特別象母亲的原因吧。

有几张画薩尼亚的画比起画赫費茨的差一些。不过那张“薩尼亚在爐边”的画实在太妙了。特別是爐子：爐板上罐子里煮的东西仿佛都煮沸了，白色的小团子正在翻滾沸騰。

“喂，老兄，毫无办法！”

“怎么？”

“是有天才呀！”

彼其加叹了一口气。

“算个什么画家！”他說道。“我坦白地告訴你，我甚至并不喜欢繪画。过去喜好过，可是現在一点也不喜欢了。”

“傻家伙，这真是怪事！”

“怎么是怪事？”彼其加生气地反駁道，“你那么想作飛行員是因为你有兴趣。可是我觉得繪画沒有意思。”

“輕点兒，你要把他吵醒了。”

“哼！吵醒他，”彼其加怒气冲冲地看着工农专科学校的学生說道。

“你同他商量过嗎？”

“他說我是病号。”

我笑了起来。

“可是也有这样的事呀，”彼其加說道。“例如契訶夫。他是医生又是作家。”

“有是有的。要我处在你的情况，你猜我怎么办？”

“怎么办？”

“先去作飛行員，飞它二十来年。然后再从事繪画。”

“那就再也拾不起来了，全忘了。”

我在彼其加那兒坐到深夜，赫費茨一直也沒有醒。我們打算叫醒他，可是他只是象小孩子一般，在睡梦中笑笑，翻一下身又睡着了。

20 本来可以不至于弄成这样

过去，如果我們在十点鐘以后回校，就不得不提心吊胆地从严厉的雅飞身傍繞过。他穿着一件寬大的皮大衣，坐在校門口的小凳上打着瞌睡——假如他是睡着的，那敢情好了。現在，这样的时期已經过去，我已經毕业了，我們願意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回去。

不过，这天我回去得还不算太晚——将近十二点鐘。同學們还在乱吵嚷。瓦里亚蜷着腿坐在床上写东西。看見我便說

道：

“薩尼亞，伊万·巴甫雷奇說，如果你十二點鐘以前回來，就請你去一趟。現在幾點了？”

“十二點半。”

“快去吧！”

我披上外套，向柯拉布略夫那兒跑去……

這是一次很不平凡的，我永遠也忘不掉的談話，——我應該很冷靜地把談話的內容寫出來。我不應該激動，特別是現在，已經過了這許多年了。顯然，一切本來都可以不至于這樣，假使我當時知道我的每一個字對於她有着多大的意義，假使我能預料到在我們談話之後會發生什麼事……然而這些“假使”是沒有止境的。我倒不是為自己開脫，我不需要辯白，我也毫無過錯。下面就是這次談話的情形。

我到柯拉布略夫那兒時，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正在他家裡。她在他那兒坐了一個晚上。但她並不是來找他，而是來找我的，的確是找我的，所以她一開口就對我講明了這種意思。

她伸直了腰坐着，板着面孔，不時用她那瘦削的手去理一理頭髮。桌上放着葡萄酒和點心。柯拉布略夫不斷給她和自己斟酒，可是她只是輕輕地抿一口，所以那杯酒始終也沒有喝盡。她不斷地抽煙，到處撒着煙灰，連膝蓋上都是。她頸上戴着那條為我熟悉的珊瑚項鍊，她幾次將它輕輕地松一松，仿佛項鍊窒息着她似的。當時的情景就是這樣。

“那個航海長寫道他不敢冒險將這封信從郵局里寄。”她說道，“可是這兩封信却在一個郵袋里，你對這個問題怎麼解釋呢？”

我回答說不知道，如果航海长还活着的話，这应当去問他本人。

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搖了搖頭。

“如果他还活着那就好了！”

“也許他的亲人知道。”我突然灵机一动，說道。“还有，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航海长是被塞多夫中尉的探险队救起来的。那他一定能知道。我相信，航海长把所有的事都告訴他了。”

“唔，也許是的。”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答道。

“还有，这个小包是送交水道測量局的。如果航海长是經邮局把信发出去的，他大概也会把小包經邮局寄走。應該了解一下。”

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又說道：

“对的。”

我住嘴不說了。老是我一人在說，柯拉布略夫还没有参加談話。我說不出他是用怎样的表情看着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他突然从桌子后面站起来，把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踮起脚尖，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他这天晚上的神情显得很奇怪——象是长了翅膀似的，有些飘飘然，給人那种感觉，好象他的鬍子馬上就要随风吹散了。我不喜欢他这个样子。不过我了解他：他为尼古拉·安东内奇原来是那么一个坏蛋而感到高兴，他为自己早就預言过这种情况而感到驕傲；他有点畏惧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同时他也因为她的痛苦而痛苦。不过，主要的他还是在高兴，我不知为什么非常厌恶这一点。

“你在恩斯克都作了些什么？”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突然問我道。“你在那兒有亲戚嗎？”

我回答說是有亲戚，妹妹在那兒。

“我很喜欢恩斯克，”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对柯拉布略夫說道，“那兒太美了。多么好的花园！自从离开恩斯克以后，我就再沒有到花园里去过。”

她突然談起恩斯克来了。不知怎么講到她有三个姨媽住在那兒，她們都不信上帝，并且以此自傲，其中有一个曾在盖德尔柏尔格大学哲学系毕业。她过去从来不象今天这样健談。她臉上毫无血色，但却非常漂亮，一双眸子晶瑩发光，坐在那兒不断地抽烟。

“卡佳說，你还記得那封信里的一些話，”她突然象是忘掉了姨媽，忘掉了恩斯克似的說道。“可是，我从她口里怎么也問不出是几句什么話。”

“是的，記得一些。”

我等着她会立刻要求我把這些話告訴她。可是她一声不响，仿佛是駭怕听我說出這些話来似的。

“喂！薩尼亚，說吧，”柯拉布略夫用一种假装振作的腔調說道。

于是我就說了：

“那封信是在‘它是你的……’地方結尾的，对吧？”

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点了点头。

“下面是这样：‘你的鷹爪蒙哥其瑪……’”

“蒙哥其瑪？”柯拉布略夫詫异地又問了一遍。

“是呀，蒙哥其瑪。”我毫不犹豫地重复說。

“‘鷹爪蒙其哥瑪’，”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改正道，她的声音开始微微发起抖来。“我曾經这样称呼过他。”

将塔塔林諾夫船长称作“鷹爪蒙其哥瑪”，現在看来也許不

免可笑。特別是我感到可笑，因為關於他的事，我比地球上誰都知道得多。但是，當時卻一點也不感到可笑，因為她一直保持着的平靜的聲音突然發起抖來。

這個名字原來並不是我和卡佳所想的那樣，是什麼古斯達夫·愛瑪兒的著作里來的，而是從契訶夫的书里來的。契訶夫有一篇短篇小說，這篇小說里有一個紅頭髮的小孩，他一直把自己稱作鷹爪蒙其哥瑪。

“好吧，蒙其哥瑪，”我說道。不過我好象記得“是蒙哥其瑪……‘你曾經這樣稱呼过我。天哪，這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可是我並不想訴苦。我們會再見面的，到那時一切都好了。不過，有一種思想，有一種思想始終使我非常苦惱’。‘有一種思想’重複了兩次，這不是我在重複，原信上就是如此——重複了兩次。”

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又點了點頭。

“這是很痛苦的，”我帶表情地繼續背道，“現在認識到一切本來可以不致於搞成這樣，這是很痛苦的。我們接二連三地碰到一些倒楣的事，最倒楣的就是我錯把探險隊的給養裝備工作委托了尼古拉。現在不得不每小時，每分鐘為此付出極大的代價。”

也許，我不應當把尼古拉這個詞讀得那麼重。因為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臉色本來就够蒼白的，這時越發蒼白了。可以說已不是蒼白，而是一種慘白了，她坐在我們面前，不斷地吸煙。後來她說了一些非常奇怪的話——只是在這個時候我才第一次想到她有點神經失常。可是我對於這件事並沒怎麼重視，因為我覺得柯拉布路夫這天晚上也有點神經失常。其實他，唯有他應當了解在她身上所發生的變化呀！可是他這時已完全失掉了理智。他大概還在作夢，以為明天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

就会嫁给他呢。

“那次会议以后，尼古拉·安东内奇就病倒了，”她对柯拉布略夫说道，“我劝他请医生看看，他也不肯。”关于这些信的事，我没有对他谈过。况且他现在心绪十分乱。暂时还不必提，对吗？”

她竭力抑制着自己，忍受着内心的哀痛，可是我仍然什么也不明白。

“啊，怎么不必呢，”我反对道。“那么好，我自己来干。我抄一份信给他。让他看看。”

“萨尼亚！”柯拉布略夫仿佛猛然醒悟过来似地喊道。

“不，伊万·巴甫雷奇，我一定要讲，”我继续说道。“因为这件事使我愤慨。探险队由于他而罹难这是事实。这是历史事实。人们要控告他这种严重的罪行。我认为如果玛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真是塔塔林诺夫船长的妻子的话，那她就应该亲自对他提起控诉。”

其实她这时已不再是塔塔林诺夫船长的妻子，而是他的寡妇了。她已成了尼古拉·安东内奇的妻子。这样一来，她就必须控诉自己的丈夫了。但是这点我并没有想到。

“萨尼亚！”柯拉布略夫又怒声喊叫道。

但我已经不说话了。我已经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我们的谈话虽然还在继续，可是再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我仅仅说，信中所提到的大陆就是北地岛，所以北地岛应该说是塔塔林诺夫船长发现的。不过在这个地方，在这间屋子里，在这个时候说什么“经度，纬度”这些地理名词，令人听起来未免刺耳。柯拉布略夫仍然在屋子里不安地踱来踱去，玛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继续不断地在抽烟，在她面前的烟灰缸里，象一座小山似的堆满了

染有口紅的烟蒂。她呆呆地，沉靜地坐着，只是偶尔將頸上的珊瑚項鍊輕輕地松一松，好象这条寬大的項鍊使她窒息。北地島与她現在的思想之間实在相距太远了！

談話的全部經過就是这样。我在告別的候時又嘮叨了几句話，柯拉布略夫苦喪着脸直冲着我走来，因此我不知怎么的就已經站在門外了。

21 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

使我最惊奇的是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关于卡佳的事只字未提。我和卡佳在恩斯克盤桓了九天，可是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对于这件事竟一句話也沒有說。

她这种沉默很令人費解，我夜里沒有睡着，早晨出早操的时候，上社会科学課，特别是在上文学課的时候，我都在想这件事。

在上文学課的时候，本来我應該多想一些有关果戈理和他的不朽史詩“死魂灵”之类的事情（当时我們正在講“死魂灵”）才对。我應該当心一点兒，特别是因为在上次教务會議以后，李和总是想尽办法向全校証明，我即便不是唯心主义者，但知道的东西，无论如何絕不比“极劣”的評語应得的更多。

不过这次我不知为什么沒有料到他会叫我。当他高声喊我的名字时，我甚至吓了一跳。

“听說某些高談闊論的人竟敢侮辱有功德的人士，”他說道。“我們倒要看看，究竟他們有沒有这种权利。”

他接着問我，讀过果戈理的“外套”沒有；好象这样就可以解

答刚才这个问题似的。

虽然“外套”是我们在初小学的，但这也并没有什么。可是当现在讲“死魂灵”的时候却偏要问“外套”，这真是蛮不讲理。不过我还是心平气和地回答他。

“读过。”

“那很好。应该怎么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我们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中出来的’这句名言呢？”

我解释说，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说，但是事实上，不可能真有东西从“外套”里出来的。不过后来在文学中，在社会上又出现了完全另一新派。“外套”是对现实的妥协，而文学，例如，列夫·托尔斯泰，却是和现实作斗争。

“你是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李和鄙夷地冷笑着问道。

我回答说是的，我反对，可是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并不等于唯心主义。

全班哄然大笑起来，李和的脸顿时涨成了猪肝色，看样子他是想马上给我打个“不及格”。他甚至气得双手打战，可是到底这样作还有些不便，为了面子起见，他又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讲一讲果戈理写的人物中，哪些人可以算作只空谈不作事的典型？”

我回答说，果戈理所写的人物，除了塔拉斯·布里巴这个人物总算还按着自己的理想作了一些事之外，其它全是只空谈不作事的典型。但这并不能归咎于果戈理，因为当时的生活就是这样。

李和擦了擦汗，给我打上了个“不及格”。

“伊万·维塔里耶维奇，我要求科学院考问我，”我坐下的时候说道。“我们的文学观点有分歧。”

李和哇啦哇啦刚想說話，下課鈴就响了。

同學們認為我这次答得完全正确，李和沒有权利因为我不贊成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因为我認為果戈理所写的人物都是些只空談不作事的人，而給我“不及格”。瓦里亚指出果戈理自己焚毀的“死魂灵”下卷中，还有一个正面的典型人物——地主科斯坦若格罗，不过，我反对这种說法，既然果戈理自己将它焚毀了，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談的了。并且，地主就不可能是正面人物。在这当兒我突然看見彼其加来了。

这真想不到在——在大休時間，彼其加到我們学校里来了！

“彼加，你干什么？”

“我有点事，”彼其加微微一笑，說道。

“什么事？”

“各种各样的事。正想和你談談。”

“談什么？”

“关于列宾的事。你昨天講了一番鬼話。列宾不能不繪画，而且如果你敢再向他建議进航空學校的話，你知道，他会把你送到哪兒去嗎？”

我睜大了眼睛望着他。

“看，你果然是这样！”

“是怎么样？”

“是一个病号。”

彼其加苦喪起臉来。

“不，”他很懊惱地說道。“我是很正經地問你。”

“我也是很正經地問你：你为什么不到学校里去上課？”

“我今天是逛大街，”彼其加迅速地說道。“我需要很好地想一想，学校里不能够想事情，总有人打擾。”

大休息結束了，但他說在“紅角”等我下課；我們今天只有四堂課。

他真的沒有走。他把頭仰着靠在椅背上，雙手插在口袋裡，閉着眼睛。

“你說當飛行員，”他說。一個鐘頭以後，當我回來的時候，發現他還是原來那副姿勢坐在原來的位子上。“可是也許你根本沒有絲毫可以作飛行員的條件呢？你可記得一生中哪怕有一件可以說明你能够成為飛行員的行為嗎？”

我想起了自己到恩斯克追卡佳時那種堅定的、當機立斷的決心。

“有的。”

“能舉例說明嗎？”

“那麼我就告訴你吧。”

“就算是有吧。可是你這種選擇是合乎邏輯的，還是一時衝動？”

“很清楚，是合乎邏輯的。”

“是出於理智呢，還是出於愛好？”彼其加的脸微微有些發紅地問道。

“不，是出於愛好。”

“撒謊。譬如說，有的人想當飛行員，就一天到晚搞模型啦，作滑翔機啦。”

“這算得了什麼呢。我還知道飛行原理呀。”

我本來還可以這樣來反駁他，說我每年都努力想在我們學校裡組織滑翔小組。但是因為同學們對演劇特別感覺興趣，所以這些小組都垮台了。除了我和瓦里亞以外，大家都想作演員。並且有許多人已經成為演員了，例如格里沙·法伯爾就是其中的

一个。

“可是我認為，”彼其加沉默了一會兒，說道，“你知道，一個人應該選擇什麼職業嗎？應該選擇一種你自己覺得能夠發揮全部精力的職業。這句話是從書上看來的，但是說得很對。我就相信，作一個畫家我會發揮全部精力。那麼說來你是有這種自信的羅？”

“我相信。”

“那算你有福氣。”

到吃午飯的時候了，但這一次談話很有趣，我決定把彼其加送回家。

“你要知道，照我看來，你也不能不繪畫，”我說，這時我們已走出學校，站在領子胡同拐角的地方了。“不信試上一兩年，你定要留戀，还想再搞下去。總而言之，照我看來，你以為自己干什么也不成，這樣想還是好的。”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種‘懷疑’。”

“怎麼‘懷疑’。”

“很簡單。真正的藝術家應當有所懷疑。他或者對這一點不滿意，或者對那一點不滿意。很好，你也在懷疑，”我熱心地說道。“不，彼其加，問題很清楚：你應該進美術學院。”

他嘆了一口氣，搖了搖頭。但看樣子我的“懷疑”論投合了他的心意。

我們就這樣在領子胡同邊談邊走。記得我們在戲報前面停下來一次，我一面听着彼其加談話，一面无意識地讀着戲劇名稱，這時，從拐角後面突然跑出一位少女，迅速地穿過街去了。

這樣的大冷天，她不戴帽子，穿一件短袖的連衣裙在街上

跑！大概因为如此，所以我沒有立刻認出是她来。

“卡佳！”

她回头看了一下，沒有停住脚步，只是揮了揮手。我追上了她。

“卡佳，你怎么沒有穿大衣？发生了什么事？”

她想說話，可是牙齿打起哆嗦来，她必需咬紧牙齿，克制自己，然后才說出话来：

“薩尼亚！我找大夫去，媽媽情况很不好。”

“她怎么啦？”

“不知道。我想她是服毒了……”

常有这样的時候，这时生活突然改变了速度——一切都开始飞奔，飞奔，变化之快，簡直使你来不及去观察。

当我听见：“我想她是服毒了”这句话以后，一切都变化的快得来不及观察了，因此这句话有时在我心灵的深处可怕地重复着。

彼其加什么也不知道，可是什麼也沒有問，他和我們一块兒跑到比明諾夫斯基胡同一个医生家里，后来又另外一位住在从前汉若可夫电影院樓上的医生家里，我們三个人一块兒闖入他那宁靜的，收拾得很整齐的寓所，寓所里家具都蒙着罩布，还有一个很不討人喜欢的老太婆也仿佛是蒙在蓝色的罩布里。

她听我們說明了来意，不以为然地搖着头走开了。她順便还从桌子上拿走了一些东西，怕被我們偷去。

过了几分鐘，医生出来了。他是一个矮个子，紅脸膛的人，头发已經斑白，留着平头，口里銜着一支雪茄烟。

“怎么啦，年輕人？”

在他穿衣服的时候，我們一直站在門厅里，一动也不敢动，

蒙着罩布的老太婆也站在那兒，虽然門厅里已經实在沒有什么东西可以拿走了，但她还是不断地瞧我們。后来她把拖布拿来，擦抹我們的脚印，其实只有彼其加的套鞋淌下了一滩水，其它什么脚印也沒有。虽然卡佳的脸色那样着急，使我几次想和她說話又都不敢，可是医生还在慢騰騰地穿衣服。后来，彼其加只好留下来督促这位总是在穿衣服的医生快穿。彼其卡留下后，我們便先走了。

走到街上，我一句話沒說便将大衣披在卡佳的身上。她的头发散乱了，她一面走着，一面把头发綰住。可是一只辮子又掉了下来，她赌气把它塞到大衣下面。

急救車停在門前，我們不禁吓得止住了脚步。护士用担架抬着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从楼梯上走下来。

她躺在担架上，脸露在外面，脸色同昨晚在柯拉布略夫那兒时一样的蒼白，不过現在更象是用象牙雕刻的那样沒有人色了。

我紧貼着楼梯栏杆，讓担架过去。卡佳凄惨地叫了一声“媽媽”，便跟着担架走了。但是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并没有睜开眼睛，也沒有动弹一下。看她那死人一般的樣子，我就明白她是准死无疑了。

我怀着极为悲痛的心情站在院子里，看着担架被放进急救車里去，老太婆用两只顫抖的手将她的脚盖好，一个和大家同样口里冒着热气的护士从什么地方掏出一个本小本，請尼古拉·安东內奇签字，尼古拉好象生了病的樣子，从眼鏡底下瞧着在本子上签了字。

“不是这兒，”护士恼怒地一甩手，然后将小本子放进工作服的大口袋里去。

卡佳跑到屋里穿上自己的大衣，把我的大衣留在厨房里就

回来了。她也坐上了急救車。这时車門关上了，里面躺着可怕的，已經变了样的，脸色惨白的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急救車猛地一起动，就象一輛最普通的卡車一般往医院的急診部駛去了。

院子里就剩下尼古拉·安东內奇和老太婆两个人。他們一声不响地佇立了許久。后来尼古拉·安东內奇轉过身去，机械地迈脚步，象是怕摔倒似的，首先走回屋子里去。我从来还没有看見过他这个样子。

老太婆請我去迎一迎医生，告訴他不要来了。我連忙跑去，在凱旋广场一个香烟摊旁边碰見了医生和彼其加。医生正在买火柴。

“死了嗎？”医生問道。

我回答說沒有死，用急救車送到医院里去了，并且又說，如果需要出診費的話，我可以代付。

“不用，不用。”医生嫌恶地說道。

我答应彼其加明天把所有的事都告訴他，便和他分別了。当我再回到提維尔·雅姆路时，老太婆正坐在厨房里啜泣。尼古拉·安东內奇已經不見了，他到医院里去了。

“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我問道，“也許你需要我給你作点什么事吧？”

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了好久。我始終站在一旁等着。最后她請我帮她穿好衣服，我們便乘电車到急診部去了。

22 夜 里

夜里，黑暗中我虽然躺在自己的床上，但仍然感覺到那种耳

畔呼呼作响的疾驰的速度，仍然在往什么地方飞奔。我恍然大悟，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昨天晚上还在柯拉布略夫家里时，就已经决定自杀了。

問題显然已经决定了，所以她才能那样鎮靜，那样猛烈地抽烟，和說那么一些极为奇怪的事。她有她自己那令人揣摸不透的思想过程，关于她的这个思想过程我們昨天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她所談的一切都和 she 所采取的决定有关。她并不是在問我，而是問她自己，然后又回答自己。

也許，她曾經希望是我記錯了，信里面談的是另外一个人。也許，她还指望我想起的那几句话，也是卡佳有意不告訴她的。那几句话对她不至于那么可怕。也許，她还期待着那个为她死去的丈夫作了許多事，因而只能改嫁給他的尼古拉·安东內奇不至于有那么大的罪过，或者說不至于那么卑鄙无耻。

可是我这方面呢？我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我感到一陣热，一陣冷，接着又是一陣热，于是我把被子掀开，开始深深地呼吸，以便定下心来冷靜地思索。我把这次談話在脑海里重新加以分析。我現在才懂了它的意思了！每一个字仿佛都在我的眼前緩緩地轉过，我又从另一面，秘密的一面看到了它們。

“我喜欢恩斯克，那兒太美了！多么好的花园！”她在这个时候去回忆回忆自己的青春年华，心中是甜蜜的。她仿佛是想和恩斯克訣别，因为現在一切都已經决定了。

“鷹爪蒙其哥瑪，我曾經这样称呼过他。”她的声音顫抖着，因为誰也不知道她曾經这样称呼过他，同时这也是无可置辯的証据，証明我沒有把話記錯。

“关于这些信的事，我沒有对他談过。况且他現在心緒十分

乱。暂时还不必提，对吗？”这些话我昨天听来还觉得奇怪，可是现在它们的意思又多么清楚啊！他是她的丈夫，也许是她在这世界上最亲近的人。她实在不愿意使他苦恼，她知道，今后他的悲哀还多得很哩。

我早已忘记深深地呼吸了，我赤着脚老是坐在床上想来想去。她也想和柯拉布略夫诀别——原来如此！因为他爱过她，甚至也许比所有的人更爱她。她想和那种他们之间虽未达到，但她大概曾想望过的生活诀别。我一向认为她对柯拉布略夫是抱有幻想的。

早就该睡觉了，何况明天还有一次重要的测验，何况想起在这不幸的一天中所发生的事又十分不愉快呢。

我仿佛是睡着了，但只是一会儿功夫。突然有人在我身旁低声地说道：“她死了。”我急忙睁开眼睛，可是什人也没有；大概是我自己说的，不过没有说出声来，是在心里说的。

这一来，我的脑子又不听话了，又回忆起了我和尼娜·卡比丹诺芙娜到急诊部去的情形。我极力想睡，但我对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只好回忆下去。

……我们坐在门旁的一张白色长凳上，我当时并没有料到玛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的担架就在隔壁屋子里，离我们那么近。

这时有一位中年护士走出来问道：

“你们是来看塔塔林诺娃的吗？不要入门证可以进去。”

她匆匆忙忙亲自给老太婆穿上白罩衫，并且系好了扣。

我心里打了一个寒噤，立刻就明白了，假如入门证都不要了，那就是说她的情况很不好，——接着心里又打了一个寒噤，因为那位中年的护士走到一位正在登记病号的年轻些的护士身边，年轻的护士问了她一些什么话，中年护士回答说：

“恐怕不行了。好歹才抬到这里来。”

随后我就等起来了。我向着白色的房門里张望，似乎瞧見他們——尼古拉·安东內奇，老太婆和卡佳都围在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的担架周围。后来里面走出来了一个人，房門敞开了一会儿，我才看見滿不是那么回事，里面什么担架也沒有，只看見一个黑头的白东西躺在一张矮沙发床上，在这个黑头的白东西前面有一个也穿着白衣裳的人跪在那兒。我还看見一只裸露的手臂从沙发床上垂下来。这时門砰的一声关上了。随后传出了一声嘶哑的尖叫；正在登記病号的护士停下笔来，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便又开始登記和对人解释。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样理解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的，不过我知道刚才是尼古拉·安东內奇在叫。他的声音会那么尖？尖得象小孩子的声音一样？

中年护士从門里走出来，帶着一种做作的忙碌的样子和一个手里搓揉着帽子的青年談起話来。她向我看了一眼（因为我是和尼娜·卡比丹諾芙娜一块兒来的），但赶忙就将目光移开了。于是我明白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已經咽气了。

后来我又听见护士同一个人說：“真可惜，多么漂亮的一个女人。”不过这时候已經完全象是在作梦，也可能說这話的不是她，而是卡佳和老太婆从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去世的那間屋子里走出来时，另外一个人說的。

23 恢复旧規。 不是他

这是非常令人伤心的几天，所以我不願意詳細地去記述它，虽然每一次談話，每一次会面，甚而差不多每一个念头我都記得

很清楚。这些忧伤的日子象是一个巨大的阴影籠罩着我的生活。

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殯葬以后，我便立刻埋头到工作中去了。我感到自己在頑强地工作和学习时，便能产生一种自我克制的力量，能使自己什么也不去想。假如这时彼其加再問我，在我的生活中，有沒有一件行为可以断定我能够成为飛行員时，我仍旧会回答他說“有”——而且这一次更有根据了。

这些事的确叫人不好受，特别是想到在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出殯的时候，我走到卡佳跟前，她却轉过身去不理睬我。

直到現在，想起这一点还不免激动。諸位可以設想我当时的感觉，所受的刺激和不安的心情。

事情的經過是这样。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出殯时，出乎意料地来了許多人——她的同事和她在医学院的同学。她生前似乎一直是有点孤僻，但是結果情况却并不是这样，很多人都認識她，喜欢她。棺材总不見抬出来，一群陌生的人低声交談着，对着大門望了許久，在这些人中間站着柯拉布略夫，他的眼睛显露出疲憊不堪的样子，浓密的鬍子在又瘦又老的脸上显得格外的多。

我很久以前就注意到，亲人总是陪伴棺材一块兒出来的，站在門口照料殯仪的都是一些外人。但这次却不一样，大概是因为亲人中沒有可以抬灵的。

尼古拉·东安內奇低着头站在一旁，尼娜·卡比丹諾夫娜牵着他的手。虽然他站得挺直，但使人感到她是在扶着他。布宾其可夫家的三个老太婆也在場，她們穿着旧式的拖着长后襟的黑衫，很象是几个修女。

卡佳站在她們旁边，两眼执拗地望着大門。她的辮子大約沒有綰好，所以帽子有时滑到前額上。从她理弄帽子时那种不耐煩的动作，也能看出她內心的悲痛。但是不管她多么悲痛，她的

脸还是紅潤紅潤的。

大家已經等候了半小时，棺材还没有抬出来。这时我突然决定走到她跟前去。

我并不知道在这种时候走到她跟前去可能是很不恰当的。可是我当时实在希望同她談話，哪怕是談一句話也好。

“卡佳。”

她看了我一眼，就把脸扭过去了……

我整天埋头在書本中。我又恢复了自己的旧規：每天六点起床，用冷水洗澡，在敞开的窗子前面作早操，按日程表工作。我从前制定的“意志鍛炼規則”現在又用上了，特别是“隱藏自己的感情，至少要不暴露感情”这一条。虽然我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但是我沒有暴露出来。我上面說过的那个巨大的暗影仿佛更加向我逼近，起初我是远远地看到它，后来便越来越近了。

这是我在学校里的最后半年了，我希望各科都能“及格”。这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特别是文学課。

有一次，虽然李和还是唉声叹气，躊躇再三，但終究还是給我評了个“及格”。毕业作文我倒不害怕，只消大笔一揮，便可立即写成一篇作文，并且完全符合这个笨蛋的要求。我知道，他为了自己的面子起見，也会給我最高分数的。

我这时在全班中已經名列前茅，只有瓦尔加在我前面。不过他是因为有突出的才能，此外，还比我聪明得多。

暗影越发逼近了。柯拉布略夫碰見我时那付勉强的样子，好象他看見我就很难受似的。尼古拉·安东內奇不到学校里来了，虽然已經沒有人再提我們在教务會議上冲突的事，可是大家却时时以一种責难的眼光看我。仿佛他在教务會議上感到不舒适而暈倒和这次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的逝世这两件事，已經

将他完全洗乾淨了似的。

所有的人見着我就露出难过的样兒。我从沒有这样的孤独过。

不过这时我还不知道一个打击在等待着我。

有一次，在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死后两星期，我到柯拉布略夫那兒去，想請他同我們一块兒去地質博物館（我那时担任少先队輔導員，同學們請我帶他們去參觀这个博物館）。我們在低年級時曾經同柯拉布略夫去过一次，我記得那是很好玩的。

可是他出来見我时样兒显得异常激动，并且請我改日来。

“甚么时候呢，伊万·巴甫雷奇？”

“不知道，以后再說吧。”

前厅里挂着皮大衣和皮帽子，小桌上放着褐色的毛織围巾，这条围巾老太婆以前曾經当着我的面織过。这是尼古拉·安东內奇到柯拉布略夫家里来了。

我走了，无精打采地拿起“空軍的回顧与前瞻”这本书来——我記得当时正在讀这本书。但讀不下去——心不知飞到哪兒去了，因此每讀一頁，都得按照“意志鍛炼規則”提醒自己一次。尼古拉·安东內奇到他这兒来干什么？他已經快四年沒有到柯拉布略夫家来过了。柯拉布略夫为什么这样激动呢？

当我回到他那兒时，尼古拉·安东內奇已經不在了。我現在还記得，当时爐子里升着火，柯拉布略夫穿着带口袋的寬大的絨衣，这件衣服常常是他在微醉或者身体不适时穿的，他坐在爐边，望着爐火。我走进屋子里时，他抬起头來說道：

“你搞些什么呀，薩尼亚！我的上帝，你搞些什么呀！”

“伊万·巴甫雷奇！”

“我的上帝，你搞些什么呀！”柯拉布略夫拼命地重复道。

“这本来不是他，不是他呀！他有憑有据，无可爭辯地証明了这并不是他。”

“我不明白，伊万·巴甫雷奇。您說的是誰？”

柯拉布略夫站起来，又坐下，繼而又站起来。

“尼古拉·安东內奇来过我这兒。他向我証明，說船长信里面所指的不是他。是另外一个尼古拉。一个工厂主維什米尔斯基爵士。”

我感到非常驚訝。

“伊万·巴甫雷奇，这是謊話，他完全是撒謊。”

“不，这是实情。”柯拉布略夫說道。“这是一件大事情，詳情我們一点也不知道。其中涉及到許多人，有商人，有供应人員，船长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些事情。他知道探险队的装备很差，所以曾經写信告訴尼古拉·安东內奇，我亲眼看見了这些信。”

我听着他說这些話时，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知为什么，我过去一直認為我在恩斯克找到的信是惟一的信。因此，一听说船长还有一些信被保存着的消息，我感到极为驚訝。

“其中有許多倒楣的事，”柯拉布略夫繼續說道。“在临出海前，有个船主把船員都撤走了，費了好大勁兒弄到手一部无綫电报机，又因为找不到电报員，所以又不得不把它丢下。还有其它的一些事，这何尝都是尼古拉·安东內奇的錯誤呢？問題本来很清楚，我的上帝！可是我……我曾想到这点……可是我……”

他还没有說完，我突然看見他在哭泣。

“伊万·巴甫雷奇，”我竭力不去看这幅难以令人置信的情景——柯拉布略夫在哭鼻子。“那么，这就是說他没有錯，而是一

位什么‘爵士’在里面搞的鬼。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尼古拉·安东内奇过去总是一口咬定，说这件事是他领导的呢？请您问问他，探险队带了多少肉羹粉，多少通心粉，面包干和咖啡。为什么以前他从没有提到过这位‘爵士’呢？”

柯拉布略夫用手绢擦干了眼睛和鬍子。从壁厨里取出伏特加酒，手颤抖着斟了半杯，又倒回去了一点。他一口将酒喝尽，便坐了下来。

“算了，现在横竖都是一样了。”他把手一甩。“我简直是瞎了眼睛，瞎得太厉害了！”突然他绝望地说道。“我当时应该开导开导她，说明这是不可能的，不可置信的，纵令真是尼古拉·安东内奇，那么也不能把这么大的一件事业的失败归咎于一个人。我本来可以告诉她，说你坚持认为是他，那是因为你恨他。”

我一声不响地听他说。我过去一直很爱他，养成了尊敬他的习惯，所以看到他这副可怜相感到很不愉快。他象个婆娘一般哭鼻子，头发和鬍子也弄得乱蓬蓬的。

“关于我是不是恨他，”我很镇定地说道。“这一点与问题本身没有丝毫关系。我不明白，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说我是故意坚持，那也就是说我是出于一种卑鄙的私人的动机罗？”

柯拉布略夫没有作声。

“伊万·巴甫雷奇！”

他仍然没有作声。

“伊万·巴甫雷奇！”我怒声喊道。“你以为我有意搅到这件事情里面来是为了报复尼古拉·安东内奇。所以您才说即使真是他，而不是某一位‘爵士’，反正也不能把这么大的一件事业的失败归咎于一个人。您认为全是我的错？您说呀！是吗？您是这

样看法嗎？”

柯拉布略夫一声不吭。我眼前一陣发黑，听见我的心剧烈而迟缓的跳动声。

“伊万·巴甫雷奇，”我声音颤动着，但是很坚决地说道。“现在我即使是死，也要证实我是对的。我一定要证明这一点，我今天就去找尼古拉·安东内奇，请他把这些文件和书信给我看看。他能说服您，使您相信信里说的不是他，而是某一位‘爵士’。那么让他也把我说服吧。”

“随你的便吧，你愿意怎样就怎样好了。”柯拉布略夫垂头丧气地说道。

我走了。他一动也没有动，疲惫地坐在炉边，陷于极端绝望之中。我们两个人都感觉到悲观失望，但是我除了悲观着急之外还有一种抑制着的愤怒，而他却处在绝望的疲惫中，孤零零的一个老人留在空虚、冷清的寓所里。

24 誹 謗

話說起来是容易的：我去找他，请他把这些信给我看看。我甚至想着这件事都觉得讨厌。他真会同我谈话！他要是把我从楼梯上赶下来，那就一切都完了。我是不会和他打架的。他终究是个病号，而且是个上了岁数的人。

我本来不想去了。可是有一种思想使我不能不去，这就是卡佳的问题。

当我想到她送殓时扭头不理我的那种冷酷的样子时，脑袋就痛起来。现在我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作。原来尼古拉·安东

內奇使她相信了这一切的錯誤都在我身上。

我想象着他和她談話的情形，心不住地跳动。他一定这样說：“哼！你那个朋友的記憶力真不錯。为什么他去恩斯克以前一次也沒有想到过这些信呢？”

其实我怎么会忘記了这些信呢？我这个从小就被这些信所深深感动的人能忘記嗎？我这个曾經在恩斯克到莫斯科的火車上背誦过这些信的人能忘記嗎？怎么能忘記这些仿佛是从遙远的星星上落到我們小城里来的信呢？

我只有一个解釋，請諸位自己判断一下这个解釋是不是正确。

当卡佳对我講起她父亲时，当我从那些旧相片上仔細端詳穿着白制服上衣，佩着肩章，戴着海軍帽，帽上套着后面翹起的白帽套的他父亲的相貌时，当我讀他的書时，我总觉得这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至少是在我离开恩斯克以前多少年的事了。可是这些信件却是我小时候的事，也就是說，完全是另一个时期的事。我根本就沒有想到，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会前后貫穿在一起。这不是記憶的錯誤，而完全是另一种錯誤。

我把那位“爵士”想了千百次。那么塔塔林諾夫船长写的：“全探险队都在咒罵他”这句话是指的他罗。那么“我們的这一切失敗都应归咎于他”的这句话也是指的他罗。可是柯拉布略夫却說什么，这么件大事业的失敗不能够归咎于一个人。可見船长并不是这样想的。

“他这种亲屬的帮助使我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那么这也是說的他罗。可是老实說，这位某“爵士”憑什么要对塔塔林諾夫船长这样帮助呢？能够对他这样帮助的是他这位闊气的堂兄，我听他說过多少次关于这样帮助的事，他并不是无缘无故才說的。

总之一句话，一直到二月二日晚上，当我穿了一件讲究的青色夹克，来到塔塔林诺夫家，对我开门的一个陌生的女郎说，我想见尼古拉·安东内奇时我还没有一个行动计划。

从敞开的门中，可以看到餐厅里正在用茶。尼娜·卡比丹诺芙娜在低声说话，我看见她围着一块条花披肩坐在茶炊旁边。

不知道尼古拉·安东内奇走到门口看见我以后脑子里都想了一些什么。他打了一个寒战，稍微往后退了退。

“你要干什么？”

“我想和您谈一谈。”

他沉吟了一下。

“进来。”

我想到他的书房里去，但是他说道：

“不，到这兒来。”

事后我才猜到他这是有意这样作的：他把我诱到餐厅里去，为的是当着众人的面整我。

我随着他走进餐厅时，大家都有些吃惊。我根本没料到会在这兒看见布宾其可夫家的三个老太婆，她们同时跳起来。在恩斯克赶过我的那个老太婆把茶匙掉到了桌子上。卡佳正好从另一边走进餐厅里来，一下子便在门口呆住了。

我含含糊糊地低声说道：

“也许这兒不太方便吧？”

“不，这兒很方便。”

本来在一进门时，我就应该先向大家问好，可是现在已经晚了，也许就用不着了。不过我还是鞠了一躬。谁也没答礼，只有尼娜·卡比丹诺芙娜隐隐约约地点了点头。

“要談什么？”

“您对伊万·巴甫雷奇說，塔塔林諾夫船长曾写信給您談过一位維什米爾斯基爵士。我需要知道這個問題，否則，好象我只是为了使您下不了台，才故意要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相信我的話的。比如說，柯拉布略夫，还有另外一些人就是这样認為的。总之一句話，我請您把这些信給我看，因为您想利用这些信来証明探险队的罹难是一位維什米爾斯基爵士的錯誤，而……（我把这个名字咽下去了）的死，以及其他的一切都是我的錯誤。”

这是一番相当长的話，不过因为我事先有准备，所以很流利地說完了。只是在說到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的死，以及后来說到“另外一些人”时，因为想到卡佳才有点兒結巴。卡佳仍然屏着呼吸直挺挺地站在門口。

在講这番話的时候，我才发现尼古拉·安东內奇变得很老了。他象一只长着鈎鼻子的老鳥，两腮深深地陷下去，就是連以前那顆使得他滿面生光的金牙也黯然失色了。

他喘着粗气听着我說話，似乎不知道該怎样回答我才好。但正在这时，布賓其可娃第二驚訝地問他道：

“他是誰？”

他換了一口气才說起話来。

“他是誰？”他从牙縫里低声重复了一次問話。“这就是我和你們常常談到的那个卑鄙的，造謠生事的家伙。”

“尼古拉·安东內奇，假使您想罵街……”

“这就是杀死了她的那个家伙，”尼古拉·安东內奇又重說了一遍。他的脸抖动起来，并且开始扭手指，“这就是那个憑空捏造出最可怕的謠言来誹謗我的家伙。可是我还活着！”

“誰也沒有認為你死了。”我正想这样告訴他。但他又咆哮起来：

“我还活着！”

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拽住他的手。他掙脫开。

“我本来可以依法控告他，讓法院审判他的一切……审判他为陷害我而干的一切勾当。不过还有另外一种法律，另外一个法庭，依据这种法律，終有一天他会了解到自己所干的一切的。他害死了她，”尼古拉·安东內奇說到这里，眼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她因为他才死的。讓他苟活下去吧，只要他能够……”

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推开椅子，架着他，仿佛害怕他馬上就会摔倒似的。他恍恍惚惚地看了看她。这是我对自己过去的看法是否正确这一点也动搖了的一分鐘。不过仅仅只是一分鐘。

“由于誰？我的上帝！由于誰？”尼古拉·安东內奇繼續說道。“由于这个下流的乳臭小鬼，他居然这么无耻，还敢回到她去世的这个屋子里来。由于这个血液不純的小鬼……”

我不知道，他說这話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的血液就一定比我的純洁。不过这也沒有关系！我一声不响地听着他說。卡佳站在墙边，身子挺得笔直。

“……还敢回到我曾經把他象毒蛇一样扔出去的屋子里来。这是什么命运，我的上帝！我整个生命都交給了她，凡是一个人为自己所爱的人能作到的我都为她作了，可是她却因为这个卑鄙无耻的毒蛇断送了性命，因为这条毒蛇对她說，我，其实并不是我，一直在欺騙她，說我害死了她的丈夫，害死了我自己的堂弟。”

他那样不顧一切，全然忘記了自己的說白使我深深驚訝。我感到我的臉白得厉害。不过这也沒有关系！我知道該怎样回

答他。

“尼古拉·安东内奇，”我竭力使自己不要激动，然而却发觉我的舌头不很听话。“我不打算回答您的这些形容词，因为我了解你现在的心情。您的确把我赶出来过，但是我又来了，并且将来还要来，直到证明在玛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服毒的这个问题上，我丝毫没有错误才算完事。如果有人错了，那无论如何也不是我，而是另外的什么人。不错，您掌握着已故船长塔塔林诺夫的一些信，您利用这些信使柯拉布略夫相信，显然也使所有的人相信，是我诬蔑了您。请您把这些信给我看看，好让大家都能相信，我的确就是您刚才所说的那条卑鄙的毒蛇。”

这一番话掀起了一阵极大的骚动。布宾其可夫家的三个老太婆还是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争先恐后地乱嚷：

“他是谁？！”

但是谁也没向她们解释我是谁，她们越嚷声音越高。尼娜·卡比丹诺芙娜也对着我喊叫，要我出去。只有卡佳一句话也不说。她站在墙边，一会儿看看尼古拉·安东内奇，一会儿看看我。

突然大家都静了下来。尼古拉·安东内奇推开老太婆，跑到了自己的屋子里去。过了一分钟，他手里抱了一大包信回来。不是两三封，而是一大包——约摸四十来封。我并不认为这些都是塔塔林诺夫船长写的信，确切一点说，是各类不同的人写的各种不同的信——有关探险队的书信或材料。他把这些信对着我的脸掷过来，继而又对着我的脸啐了一口，然后倒在安乐椅上。几个老太婆蜂拥到他的跟前去。

假使他这口唾沫真的啐到我的脸上，那我很可能会揍他，甚至打死他；从来还没人敢啐过我，我可以不顾自己的一切意志

煉規則为这件事情打死人。不过他沒睡上，信也沒有擲到。

很明显，我是不会去拾这些信的，虽然有一刹那，我差点兒撿起其中一封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圣·瑪丽亚”火漆印的信来。我没有去撿它們。我是最后一次到这家人家了。卡佳紧咬着牙齿，按着胸口，靠着安乐椅站在我們中間，安乐椅上面躺着尼古拉·安东內奇。我正对着她的眼睛，看了看她，因为这是最后一次看她了。

“算啦，”我說。“我不想看这些您朝我脸擲来的信。我想別的办法。我不相信探险队会无影无形地失踪，我一定要找到探险队，到那时候再来看看，我們两个究竟誰对。”

我本来还想和卡佳道別，并且告訴她，我永远也不会忘記她母亲出殯时，她轉过脸去不理我的事。可是，这时尼古拉·安东內奇突然从安乐椅上站起来，于是又掀起一陣可怕的騷动。布宾其可夫家几个老太婆全向我拥过来，抓起什么东西朝我的背上打，打得我的脊背生痛生痛的。我把手一甩便走了。

25 最后一次约会

我从来沒象这样孤独过。我更加頑强地鑽到書本中去了。我变得好象完全不会思索了。这样也很好，最好能不思索。

我突然想到自己可能会因为健康条件不合格考不上航空学校，因此，便开始作体操，各种跳跃运动，燕式平衡，“桥”式动作，倒立。我每天早上都要摸摸肌肉，检查检查牙齿。特別使我揣揣不安的是这該死的身高。我觉得由于許多不如意的事，使我的身材好象最近又变矮了一些。

然而在三月底，我还是把証件准备好，寄到了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去。我在証件上附了一个要求——希望能送我到列宁格勒空地勤航空学校去。

关于我为什么想离开莫斯科的问题大概不需要再解释了。

彼其加也打算去列宁格勒。他已经最后决定进美术学院。萨尼亚也抱着同样的目的。

我曾经捏塑过男爵克洛德的马儿，所以我对列宁格勒的概念也和桥上的那些奇妙的马有着联系。我以为在列宁格勒是一步一个纪念塔，一步一座大理石建筑物。彼其加建议我读读“青铜骑士”，所以我更加渴望能瞻仰一下这座美丽的城市。不过，他们当然也可能将我留在莫斯科，也可能把我送到塞瓦斯托波尔去。

我和彼其加在春假期间回恩斯克去了一趟，而且仍然没有买票，因为我们想把钱攒起来到“出校后”使用。

不过这一趟旅行完全非同昔比，同时我自己在这半年里也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达莎阿姨看见我不禁哎哟一声叫了起来，法官却说这样一副模样儿应当依法受审，并且他“将采取一切措施，弄清‘被告’之所以精神失常的原因”。

不过关于这些原因“被告”一点也没有告诉他。被告满怀抑郁在教堂花园，在铁栏杆一带的河岸上，在他不久前曾经指给那个梳着辮子，戴着没有放下遮耳的灰色绒帽的“原告”看过的地方往返徘徊。

关于这件事我只告诉过彼其加，而且还很简单，只讲了同柯拉布略夫的谈话，讲了尼古拉·安东内奇如何对待我。然而彼其加却从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他听完了我的叙述以后，用鼓励的口气说：

“听我說，万一你会突然找到呢！”

“找到什么？”

“探险队。”

“我会突然找到的，”我暗暗地想道。

好象有一些小虫子从我脸上爬过，我感到又是喜欢，又是恐怖。“我会突然找到的”。好象在遥远的童年时代，曾經在我脑子里想象过的那一幅幻灯画又呈现在我的眼前：白色的帐篷搭在白茫茫的雪地上，一群狗喘吁吁地拖着雪橇。一个身材魁梧的巨人，穿着长筒毛皮靴迎着雪橇走来，我也穿着长筒皮靴，戴着大皮帽子，衔着烟斗，站在帐篷的門口。

彼其加在恩斯科的举动可以說是很奇怪的。他的情緒总是很好，难怪法官在每次午餐时都对我挤眉弄眼，并且把談話引到早婚的益处上。薩尼亚这时脸羞得緋紅，彼其加則是一脸迷迷糊糊的样子听着他講，不停地吃着……看到他那副样兒，我便推測到自己在寒假时大概也是这样的：吃得很多，对于別人跟我說的話，总是了解得迟鈍一些。不过我現在却感到他們的关系也没什么大了不起的。

我在恩斯科无时无刻不想念着卡佳。我在薩尼亚的書里找到一本“牛虻”，我讀着这本优秀的小說，发现主人公“牛虻”的经历和我的非常相似。我現在也和“牛虻”一样遭到了誣蔑；他心爱的姑娘离开了他，同样我心爱的姑娘也离开了我。我想象着我們經過了十四年以后重逢的情形，她那时已經不認識我了。我要象牛虻那样，指着自已的相片問她：

“我可以冒昧請問这是誰嗎？”

“这就是我告訴过您的那个朋友童年的照片。”

“就是您害死的那个人嗎？”

她打了一个寒噤，認出是我。于是我将把証明我是正确的一切証据擲在她的面前，拒絕同她和好。但是这样的会面希望太小了！我內心里深信自己是正确的。不过有时，特别是当想到那位可詛咒的某“爵士”时，我心里就打寒战。在我到恩斯克以前不久，柯拉布略夫告訴过我，尼古拉·安东內奇曾經把塔塔林諾夫船长讓尼古拉·伊万內奇·維什米爾斯基爵士办理探险队一切事务的委托書給他看过。

“你錯了，”他簡截了当，毫不顧情面地說道……

我一个人回到莫斯科去，彼其加因为感冒了，所以留在恩斯克多住几天。我有这么一个印象，觉得他是故意感冒，无论怎样吧，至少他是滿意这场病的。

我在恩斯克非常寂寞，我有一个感觉，好象只要回到莫斯科，拿起書本来，我就会沒時間感到寂寞了。然而時間总是有的。寂寞的时间依然有。我整日沉默寡言，滿腹怨气經常在校园里蹣跚……

就在这些日子里，我和同班的瑪尔登諾娃打了一架。我因为她作賊打了她一記耳光；她偷了丹娘·薇莉琪珂的自来水笔，后来还企图誣賴瓦尔加，另外，多多少少也因为她是个毛丫头。

第二天，团支部把我叫去問是怎么一回事兒。我們和毛丫头是同志关系，然而和她們打架，特别是在最高班，这总是說不过去的。我說因为瑪尔登諾娃是个卑鄙的家伙，至于她是个毛丫头这一层并不重要。如果我打了毛小子一記耳光，支部会不会把我叫来呢？

同學們想了想，就同意說不会的。

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在校門口邮递員給我們放信件的桌子上发现有一封用邮箋写的信：“九班亞·格利高里耶夫收”。

我把信拆开，上面写道：

“薩尼亞，我希望和你談談，如果你有功夫，請在今天七点半到凱旋路街心花园来。”

回想起来真是可笑；我刚一看完了这封信，好象一切頓時都改变了。我在楼梯上碰見李和时，給他敬了个礼，中飯时我把我的古里耶夫粥^①全給了瓦尔加，甚至瑪尔登諾娃也不再使我感到那么下賤了——或許不該打她一耳光，何況她毕竟是个毛丫頭呀。

已經六点鐘了。六点半。七点。七点鐘我就到了街心花园。七点一刻。七点半。天色漸漸黑下来，路灯還沒亮。各种各样可笑的想法在我脑子里盘旋着：“要是路灯不亮，我就認不出她来……要是灯亮了，而她不来呢……路灯不亮，她也認不出我来……”

路灯豁然亮了，眼前是我所熟悉的花园，我和彼其加曾經打算到这兒来卖香烟，春天里我曾經千百次地在这兒啃过書。花园里这样嘈杂，只有十七岁的年輕人才能够在这兒啃書。这是一座古老的花园，我們的学校，还有第一三四和第二八两个学校的人常常在这兒幽会。这个花园仿佛在逐漸改变，变成了一座剧院。我們就要会面了。那不是她嗎！

我們互相問过好就沉默下来了。这天是四月二日，天气很暖和，但一会兒忽然飘起雪来了，仿佛是有意要使我終生記住这一天。

“卡佳，你来了我很高兴。我也是早就想和你談談。那天在你們家里我什么話也不能說，因为尼古拉·安东內奇大吵大

① 古里耶夫是苏联城市名。古里耶夫粥是一种加上切碎的水果和糖煮成的粥。——譯者注。

我掙扎在絕望和恐怖中。

“現在他還可以嘮叨十五年，說你有過錯，使你最後也象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那樣相信他。你難道不懂得這是一樁把柄嗎？如果你承認有過錯，那麼他就會抓到可靠的把柄來要挾你，他要你作什麼，你就得作什麼。”

“我要離開這兒。”

“到哪兒去？”

“還不知道。我決定申請到地質勘探隊去，畢業後就走。”

“到那時候你哪兒也去不成了。現在也許你還能走，可是四年以後……我擔保，你哪兒也去不成了……他會把你說得團團轉。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不是相信他是一個慈善而高尚的人，並且，最主要的是相信自己受他的百般關懷而對他負了債嗎。他為什麼又來纏你呢！他不是說過一切都是我的錯嗎。”

“他說你簡直是個凶手。”

“唔。”

“說把你槍斃了，他也覺得沒有什麼。”

“好哇，除了他以外別人都有錯兒。不過我告訴你，他是最卑鄙的人。世界上居然有這種人，想起來都覺得可怕。”

“不要再說這件事了……”

“好吧。現在你談談，在這些胡說白道之中你相信他哪點吧？”

卡佳沉默了許久。我又挨着她並肩坐下。我怕得很，不過還是握住她的手，她沒有避開，也沒有把手縮回去。

“我相信你並不是故意說那是他。因為你的確認為是他。”

“現在還這樣認為。”

“不過你不應該勸我也相信，更不該勸說媽媽。”

“但那是他呀……”

卡佳把身子挪开一点兒，想把手縮回去。

“不要再說这件事了吧。”

“好吧，不說了。总有一天我会証明是他，哪怕我会为这件事費去一生的光阴。”

“不是他。如果你不想要我离开这兒，那就不要再說这件事了。”

“好吧，不說了……”

我們再也沒談这件事。她問我过春假的情形，問我在恩斯克怎样度过的，問我薩尼亚和老人家的生活怎么样。我轉告她說老人家和薩尼亚向她問好。可是我一点兒也沒有告訴她自己在恩斯克沒有她是多么寂寞，特別是一个人在我們共同到过的地方徘徊的时候；我沒有告訴她彼其加吃得特別多，而且总是非常兴奋；也沒有告訴她說我覺得他們的关系也沒有什么大了不起的。我現在不知道她是否还爱我，虽然我时刻想問她，但在这个当兒，却不能問。現在當我們脸色蒼白，很严肃地坐着談話的时候，当卡佳那么酷象她母亲的时候，甚至連說一句这样的话也是不行的。我只是回忆上次我們从恩斯克回来时，我們怎样用手指在結冰的玻璃窗上写字，窗外怎样突然展現出一片盖滿了雪的昏暗的原野。从那时候起一切都变了。我們現在已經不能象过去那样互相对待了。但是我多么想知道她現在是爱我，还是决定以后不再爱我了。

“卡佳，”我鼓足了勇气，突然問道，“你还爱我嗎？”

她打了一个寒噤，詫异地看了看我。后来她的脸突然一紅，把我拥抱住了。她拥抱了我，我們閉着眼睛互相吻着——至少我的眼睛是閉着的，不过大概她也是閉着眼睛的，因为后来我們

是同时睜开的眼睛。我們在凱旋路的街心花园里，在莫斯科的中心接吻，在这个街心花园里有三个学校——我們的学校，一四三和二八学校可以看見我們。但这是辛酸的一吻，这是別离的一吻。虽然分別时我們約定了以后再見面，但我感觉到，这一吻是永別的一吻了。

卡佳走了以后，我还独自留在花园里，怀着忧伤的心情久久地徘徊在园中小径上，坐在这张椅子上，走了又回来。我摘下帽子，我的头象火烧一样，心里十分痛楚，十分煩悶。我不忍离去……

我回到家里时，床前小桌上放着一个大信封，上面盖着国防航空化学建設后援会的关防，信封上又粗又大地写着我的姓，名字和父名。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受到別人这样連名和父名一起称呼我。我用发顫的手撕开信封。国防航空化学建設后援会通知我，說我的材料已經审查合格，应在五月二日到航空学校体格检查委员会去参加入校检查。



第四部 北方

1 航空学校

一九二八年夏天。我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裹出现在列宁格勒街头。包裹里放着“出校补助品”。儿童教养院的学生在毕业后都可以领到一份“出校补助品”，包括一把汤匙，一个茶缸，两套内衣和“初出校住宿必需品”。我和彼加住在我校的一位老校友，当时在电力厂当钳工的西玛·金斯布尔格家里。西玛的母亲很怕房屋管理员，因此我每天早上把“初出校住宿必需品”拿走，到晚上再搬回来，装作是刚来的样子。我们在食堂里吃饭；每逢双日花十五个戈比买第一道菜吃，逢单日花二十个戈比买第二道菜吃。我们常常在这个宽阔，舒畅的城市里，沿着宽阔的涅瓦河河岸漫步，彼加在列宁格勒觉得自己象是回到了家里一

样痛快，他給我講“青銅騎士”的故事，可是我心里却在想“能不能考上？”的問題。

先后要通过三个委员会——体格检查委员会，資格审查委员会和学科考試委员会。心脏，肺，耳朵，又是心脏！我的名字叫什么？生在哪兒？曾在什么学校上学？为什么想作駕駛員？

我是不是真有十九岁？是不是虛报了年齡——看样子似乎是小一些！为什么在区委委员会的介紹信上签字的也是格利高里耶夫？这人究竟是誰？是我的哥哥，还是同姓？

决定命运的一天终于来到了！我站在航空博物館前，我們就是在这兒进行考試。这是座落在罗沙里大街上的一幢大楼，門前摆着石獅子。彼加說这些石獅子就是“青銅騎士”書中所描写过的，叶夫根尼仿佛就是騎在这些獅子身上脫离水灾的，——直到現在，我还不知道这話是不是真的。我这时已經沒心思去研究什么普希金了。獅子瞧着我，那副神气就好象也要問我：叫什么名字？生在哪兒？是不是真有十九岁？

然而真正可怕的时刻还是在我走上二楼，在黑暗的櫥窗中找那张航校录取名单的时候。

我念着：“符拉索夫，沃罗諾夫，戈洛布，格里布柯夫，杰尼夏克……”我眼前一陣发黑：我沒有考上！我重又念道：“符拉索夫，沃罗諾夫，戈洛布，格里布柯夫，杰尼夏克……”我沒考上！我鼓足了劲兒尽量吸了一大口气，以便能够沉着地讀完名单：“伏拉索夫，沃罗諾夫，戈洛布，格里布柯夫，杰尼夏克……”我看着这张名单；这张名单上仿佛除了沒有我的姓，全世界所有的姓都有了，我不禁感到如同不想再活下去时那样的苦恼。

我冒着傾盆大雨回到家中。“符拉索夫，沃罗諾夫，戈洛布……”幸福的戈洛布啊！

当我念着这个姓时，眼前出现了瓦斯柯·努尼叶斯·巴里波的形象，一个宽肩膀，粗面皮的大汉。当然嘛！我怎么能行呢！这个该死的身高！

彼加给我开了门，看见我浑身淋得透湿，脸色惨白，不禁吓了一跳。

“你怎么啦？”

“彼加，榜上没有我。”

“你骗人！”

西玛的母亲飞也似跑到厨房里来，问我碰见管理员了没有。我没有答话。我坐在厨房里的一把椅子上，彼加低着头，忧伤地站在我面前。

第二天早上，我们两个人一道去航空博物馆，在榜上找到了我的姓。原来是在另一栏里，这一栏里也还有几个姓是“格”字起头的，甚至格利高里耶夫就有两个——一个是伊万，一个是亚历山大。彼加认为我昨天没找着名字是因为太紧张了的原故……

时间飞也似的前进，转眼间，我已在我们举行考试的那个航空博物馆阅览室里了。经过资格审查委员会和体格检查委员会选拔出来的十三个人站好了队伍，校长，一个大个子，褐红色头发，性情愉快的人走出来对我们说道：

“飞行学员同志们注意！”

嗨！飞行学员同志们！我是飞行学员！我的背上不禁一阵发凉，好象是先被人抛到滚水里，然后又抛到冷水里一般。我是飞行学员！我将要飞行！我再也听不进校长在讲些什么了……

时间飞也似地前进。我们从工厂下了班直接就到课堂里听课；西玛·金斯布尔格为我在电力厂找到了一个钳工助手的工作。

我們每天听构造，航空原理，发动机等課程。在工厂里干了八个小时的活以后实在想睡觉，可是我們还要听构造，航空原理，还有发动机，只有米沙·戈洛布（他和我一样也是一个小子）有时倚着我的背，輕輕地呼嚕呼嚕打起鼾来。随后越喘声音越大，于是我就按着他的头很小心地往桌子上碰……

虽然說我們是在航空学校学习，然而那时的航校哪里能和現在所称的航校相比呢！我們既沒有发动机，又沒有飞机；既沒有校舍，也沒有錢。不錯，在航空博物館里放着几架残缺不全的老飞机，你要是願意的話，当然也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哈維兰”偵察机的飛行員，或者是飞內战时期使用过的“紐波兒”歼击机的飛行員。不过，要用这种功德圓滿的“棺材”来学飞行那可是学不成的。

我們东拼西凑地装配发动机。根据国防航空化学建設后援会的一紙堂皇命令，我們有充分的权力从別人墙上取走飞机的任何机件。我們走遍了列宁格勒的“紅角”。有时候，这些机件不是挂在“紅角”的墙上，而是放在房产管理委員會一个航空爱好者某某會計的案头。我們便把这些机件沒收带回飞机場去。这个工作有时很順利，有时却不免費些口舌。我和机械师到縫紉工人俱乐部跑过三趟，向俱乐部主任反复說明，放在他們走廊上的那部旧发动机根本沒有宣传意义。

当这些生了锈的破烂机件終于落到我們手里的时候，我們費了多大的勁兒去摆弄它們啊！我們洗了又洗，擦了又擦。最初半年，我們的工作差不多就只是擦洗和拼凑发动机。我們这兒几乎尽是鉗工和司机，所以我作这项工作比起其他的人来更加感到困难。但我故意选最难的活兒干。我一生永远也忘不了我們用来学习飞行的那架“Y-1”式飞机的左机翼。这是飞机上

最脏的地方，发动机里的滑油就从左机翼下面喷出来。我和别人打赌，我每天擦这个地方，直到毕业为止。我躺在地上，先用木片刮净那些脏东西，然后用刷子刷，再用抹布擦，脏水流得满身都是，蓖麻油的臭味真使人恶心……

显然，我们这副模样儿并不太象未来的驾驶员，尤其是每天深夜我们从机场回家，全电车的人都要搜索这股恶臭气味的来源，以嫌恶的神情瞧我们。不过我们并不因此感到难堪。米沙打趣说：

“哪儿发出来的这股蓖麻油臭味呀？呸！”

于是故意把鼻子堵起来。

我们的工作日开始得很早，从早上七点开始。十点以前，我们装配发动机，轮流给万尼亚·格里布柯夫讲解什么是天地线。当时，我们有这么一位万尼亚·格里布柯夫，全校的人都给他讲什么是天地线。以后飞行教官来了，大家便开始飞行。

我的教官，他同时是校长，兼机务主任和事务主任，是国内战争时期的老飞行员。这是个大个子，性情愉快的人，一个奇闻轶事的爱好者，他能一连几小时讲述这些故事。他爱发脾气，但并不记恨人，十分勇敢但又颇为迷信。他对自己的教官职责理解得非常简单：就是骂我，离地面越高，骂得越凶。终于有一次不骂了，这是半年来第一次！……这简直太体面了！我怀着一种洋洋得意的心情飞行了约摸十分钟。他今天不骂我，我是怎么啦，大概是驾驶得太好了吧！尽管发动机声十分嘈杂，但我却感到仿佛是在万籁俱寂的太空中飞行——这可是反常的情况呀！

不过我很快便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原来是机内通话器脱了线，话筒悬在座舱外打秋千。我拾起通话筒，马上听到了最

后一句罵人的話：

“笨蛋！您最好还是不要飞行，到卫生車上去干活吧！”

我的教官罵得最凶的时候，总是用最有礼貌的称呼“您”。

当我回忆起在列宁格勒的第一年时，我的眼前又出現了另外一个人的形象，他就是每天到可尔布斯机場上来的契同志。他在这兒有一点兒簡單工作，就是用一架破旧的，摔过不止一次的飞机带旅客飞着玩。我們都了解他是怎样的一個人，远在我們全國知道他，热爱他之前，我們就已經知道他，愛戴他了。我們都知道飛行員們集会在航空博物館时經常談論的人是誰。那几年航空博物館就和我們現在的俱樂部差不多。校长总是用平靜的男低音把應該讀成“阿”音的“奧”仍拖长讀成“奧”說道：“喂，怎么样？大坡度盘旋飞好了嗎？但是絕對不准撒謊！嗯！”我們知道他这是摹仿的誰。

在这个人作完惊人的飛行特技返回机場时，我們都拼命地向他跑去，我們这些愛好高級特技的，嫩得象剛冒出土的青草似的飛行學員对他差不多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沒有戴風鏡，坐在座艙里看着我們，这是一位山鷹托生的，感覺銳敏的飛行員。

我無論到哪里，总是隨身攜帶着伊万·伊万內奇医生留給我作紀念的听診器和這位飛行員的相片。他這張相片不是在列宁格勒我作學員的時候送給我的，而是后来很久，若干年后在莫斯科時送給我的。在這張照片上有他的親筆題字：“永遠作一個出類拔萃的人”。這是他的誓言……

在列宁格勒艰苦而又美好的一年就这样过去了。这一年是艰苦的，因為我們的工作超过我們的力量，我們每月領四十六个卢布的助学金，飯是哪兒碰上就在哪兒吃，有时兴許根本吃不上。我們名义上虽然是在学习飞行，但是四分之三的时间花費

在擦洗和拼凑旧发动机的工作上。然而这也是最美好的一年，因为这是充满了幻想的一年，它仿佛是一条虚线勾画出了我未来的生活，因为这一年我感觉到我能够把自己的生活造就成所希望的那种样子。

尽管这时我几乎没有一分钟的空闲时间，但我还是写一种类似日记的东西——思想和印象杂记。可惜这本东西没有保存下来。不过我还记得在第一页上摘引了克劳塞维茨^①的一段话：“小步比大步容易。但是要跨过一条宽阔的壕沟，我们却不能先跳半步，跳到沟里去。”

这就是我在列宁格勒时的主导思想：永远前进，不作半步的跳跃。

时间飞也似的前进，只是在一九三〇年八月底的一天停下来了。这天我坐在一张富丽堂皇的大桌子前，这是一张用几十张形状高矮各不相同的桌子拼凑拢来的大桌子。高大的窗户，玻璃的屋顶。这是摄影艺术家别列什金的摄影室，我的妹妹萨尼亚就在他家租了一间屋子。

2 萨尼亚的婚礼

每逢假日我都到萨尼亚那儿去，我老实说（虽然这样说自己妹妹未免有点奇怪），我是愈来愈喜欢她了。她是那样天真快乐，灵敏活泼，同时又十分精明能干。

^① 克劳塞维茨(1780—1831)，普鲁士的将军，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译者注。

她入美术学院后，就在兒童出版社找到一个工作。她租了一間很精致的房間，摄影家一家人簡直把她宠爱得不得了，当然她也为他們作了一些事。她經常关心彼加和我的事情，并且按时代我們給家里老人写信。这时她在学校的工作很多，虽然她沒有彼加那种雄劲豪迈的气概，但画得还是很好。她喜爱工笔画，現在，我們的艺术家們几乎已不大从事这种繪画了，象她那么細致地描繪人物的面部和服装实在是不多見的。她还和小时候一样喜欢談話，当什么問題涉及到她或者引起她的兴趣时，她就象放連珠炮似的那么快地說起来，竟至使我听到末了还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总而言之，这实在是一个再好也沒有的妹妹，現在她就要出嫁了。

不难猜到她是和誰結婚，虽然这天晚上聚集在摄影家摄影室里的青年朋友当中，彼加是最不象新郎的一个。他沉思地坐在一个尖鼻子的青年旁边默不作声，这位青年不停地对他攻击，似乎想用自己的尖鼻子把他鑽个洞似的。我低声問薩尼亚尖鼻子是誰，她肃然起敬地回答道：

“伊茲亚。”

但不知为什么，我却不喜歡这个伊茲亚。

总之，这是一次奇怪的婚礼。来宾們为了一条乳牛爭吵了一晚上——画家菲里波夫画一条乳牛是不是真的花了两年半的时间。他仿佛是将一条牛分成許多小方块，然后再一块一块分开来画。我正想說这簡直是病态，然而这时伊茲亚已經从这条牛身上演繹出来了一大套理論，甚至还把他这套理論加上了“主义”两个字。至于新郎新娘，倒沒有人去注意。

我怀着欢庆的心情去参加薩尼亚的婚礼。自己的亲妹妹出嫁，不管怎样說吧，这究竟不是常有的事！这天早晨，我們收到

了达莎阿姨和法官拍到两个不同地址的长电报：一封給新郎新娘，一封給我。我花了一个月的時間，为他們俩安装了一个小收音机。可是这些艺术家却什么也不介意。他們这一夜都在爭辯牛的問題。

不过新郎新娘看样子还是很高兴的，特别是彼加，他口里不时說着“可笑！”而且带着很满意的神色四处觀望。薩尼亚非常忙碌，因为盘子不够，客人只好分两批吃。

她的臉脹得通紅，到处张罗着，好不容易才坐下来呆一会儿，她穿着一件綉花边的連衣裙，不知道为什么，这件衣服使我想起了恩斯克和达莎阿姨。我趁这个机会站了起来。

“大家注意，有人敬酒！”伊茲亚好奇地看了看我招呼道。

大家頓時安靜下来。

“同志們，首先，我建議为新娘干一杯，”我說道，“虽然她是我的妹妹，不过，既然来宾中誰也沒有想到无论如何总應該为新娘干一杯，所以就只好由我来动議了。”

大家一齐欢呼“烏啦！”和薩尼亚碰杯。

“其次，我建議为新郎干杯，”我繼續說道，“虽然按道理說，他應該先为我干杯。为什么呢？因为是我証明了他不應該作飛行員，而應該成为一个艺术家。可能我这是泄露了他的秘密，不过他曾經想当飛行員这是事实。关于這個問題，有一次我和他爭吵了整整一天，他要我相信他根本不喜欢繪画。他担心他作画家不能把內在的力量全部發揮出来。”

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我用湯匙敲了敲杯子。

“为什么我那时就断定他應該作一个画家呢？很简单：因为他把他的画給我看過。我可以作証，那时使他感到兴趣的題材只有一个。这个題材就是刚才我們为她干杯的姑娘。”

这时我指了指薩尼亚。

“憑良心說，他完全是撒謊，”彼加嘟嘟囔囔地說道。

“这个題材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現出来：蕩舟，拥爐，坐在門口小凳上，坐在花园里的小凳上，穿大衣的，沒有穿大衣的，穿烏克蘭小褂的，穿天蓝色罩衫的。在那个时候就使人不难預測到：第一，彼加将会成为画家，第二，总有一天我們會聚集在一张桌子前面，為我們的新郎新娘干杯，因此我現在建議干杯。”

我和薩尼亚，彼加碰过杯，便把酒一飲而尽。

然后他們为我干杯，然后又为伊茲亚干杯，这一着实在是失策，因为伊茲亚在致答辞时，发表了一大篇議論，用一些只有他一个人发笑的俏皮話，大肆攻击画家菲里波夫。彼其加很滿意的听他講，不断地說：“可笑！”可是后来突然脸胀得发紫，說伊茲亚是“典型的俄罗斯革命艺术家协会的庸人”。他想了想又加上了一句說：“并且是一个毫无才能的庸人。”

伊茲亚不同意說他是个毫无才能的庸人。这时若不是薩尼亚的教授来了，我真不知道这场爭論将会怎样結束。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留着黑色美髯的教授。大家都跑去迎接他，爭論就此打断了。

实在說来，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看見真正的教授。我很喜欢他。他一气喝了个够，对我說，还在一九一四年战争时期，他就一直想作一个飛行員。他抱住薩尼亚吻了好久，以这样一位有着一把可敬的美髯的教授而言，吻得未免过份久了一点。后来他就躺倒在沙发上呼呼睡着了。

总而言之，在薩尼亚的婚礼上，大家都很高兴，然而在我的心灵深处却感到一种自己不願意承認的凄凉。

我总觉得艺术家有点与众不同。但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我有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种兴趣的圈子。同时他们也和我一样，似乎也是这样想的，——我在致辞时已经感觉到了这点。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我伤感。这个原因被薩尼亚猜到了。此时教授已经醒来，在大声疾呼地宣布说，他禁止薩尼亚在进行毕业答辩以前结婚。大家正围着他哈哈大笑，薩尼亚悄悄地向我招了招手，我们便溜到厨房里去了。

“有人向你问好……你知道是誰嗎？”

我立刻就明白是誰了，但我故作鎮靜地說道：

“不知道。”

“卡佳。”

“真的嗎？謝謝。”

薩尼亚不高兴地看着我，她甚至恼得脸都有点兒发白，她生我的气了，——她看得很清楚，我是在装蒜。

“一点兒不說实話，”她急速地說道。“你瞧，好一个查尔德·哈洛德！^①不許对我撒謊，特别是今天我結婚的时候。我要写信告訴她，說你向我求了一天，要这封信，可是我沒給你。”

“我甚么也沒向你要。”

“你心里在要。”薩尼亚肯定地說道，“表面上却装作滿不在乎的样子。总之，我可以把这封信給你看看，不过最后的一张你不要看，好嗎？”

她把信塞到我手里就跑了。当然，我把信都看了，而且最后一頁还看了三遍，因为这一頁上提到了我。卡佳根本沒有請她

① 查尔德·哈洛德是英国詩人拜倫写的“查尔德·哈洛德游記”中的主人翁，他鄙弃資產階級貴族社会的庸俗和愚蠢，对人生抱消极悲觀态度，后来，他的名字，就成了性格孤僻，情緒消极，不滿現實的典型人物。——譯者注。

向我問好，只是簡單問了問我的情況，問我什麼時候畢業。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封很普通的信，實際上却是一封非常抑郁的信。譬如，里面写得有这样的地方：

現在才四點鐘，我們這兒已經黑天了，我突然睡着了，醒來時簡直自己都不明白何以遇到了這樣的好事情。原來是我夢見了恩斯克，仿佛姨媽她們在幫我穿衣服，備准上路……

我把這個地方念了好幾遍，一生也忘不掉的、我們離開恩斯克時的情形又浮現在我的眼前。我回想到姨媽們怎樣緊跟着離站的火車大聲囑咐，回想到後來我怎樣搬到了卡佳的車廂里去，以及我們看老人家放在我們提籃里的東西時的情景。一位沒有刮臉的小矮個兒总在揣測我們究竟是什麼關係，卡佳却偎依着我站在走道里。她偎依在我的身邊，我看着她和她談話。現在，當她是這麼遠不可及的時候，這些事兒是多麼難以想象啊！

薩尼亞回來我都沒有聽見。

“看完了嗎？”

“薩尼亞，請你寫信告訴她，說一切都很好，我在十月間畢業，至于以後……還不知道到哪兒去。我準備申請去北方。”

“你現在就坐下來，自己寫封信把這些事情告訴她！”

“不，我不寫。”

“不寫，我就不放你走！”

“薩尼亞！”

“我馬上就把彼其加叫來，”薩尼亞聲音很嚴肅地說道，“把所有的人都叫來，我們給你下跪，勸你寫這封信，因為我們認為你作得太不近人情了。”

“薩尼亞，去你的吧！你真是喝醉啦！喂，我走了。”

“你到哪兒去？你發瘋啦？”

“沒有，我走了。已經很晚了。明天還要早起。總而言之……”

我沒有說“總而言之”怎麼樣，不過她已經明白了，分別時她很表同情地吻了吻我的臉頰。

3 給伊萬·伊萬諾維奇醫生寫信

我生了卡佳的气。我在離開莫斯科之前，想和她辭別，寫了封信給她。可是她既沒有回信，也沒有來，雖然她明明知道我這一去時間很久，而且可能再也見不到面了。自然，我就再也沒有給她寫信了。不用說，大概尼古拉·安東內奇已經說得她相信了我“用最可怕的，人類想象不到的謠言誹謗了他”，我是一個“血液不純的小鬼”，而她的母親就是由於我這個血液不純的小鬼而喪命的。

算了，一切有待於今後啦！當我想到這一幕情景時，覺得頭都暈了。

可是，象現在我在列寧格勒這樣，每天從八點鐘到五點鐘在工廠里干活兒，又從五點鐘到夜間一點鐘在航校里學習，——在這種情況下，又能作什麼呢？

這年冬季，外場飛行以前，我們都在航空博物館的閱覽室里上課。有一次，我問博物館館長知不知道有關塔塔林諾夫船長的一些材料，圖書館里有沒有這類的書，或者船長自己著的書“格利里探險隊罹難的原因”。

我不知道为什么館长对这个問題感到极大的兴趣。順便說一下，館长还是我們航校的組織人之一，所以飞行學員們經常去跟他談一些個人的問題。

“塔塔林諾夫船长？”他驚訝地又問了一遍。“哦！太有意思了！你为什么对这件事感觉兴趣呢？”

要認真回答這個問題，就只有把諸位前面已經讀过的那些事重新向他叙述一遍，所以我回答得很簡短：

“我一向喜欢讀关于探險方面的書籍。”

“不过真不湊巧，关于这次探險的情况一点也不清楚，”館长說道，“来，我們到圖書館里去看看吧！”

当然，要是沒有他，我什么也找不到，因为这都是报章杂志上的一些零星論文，書呢，只有一本二十五頁的小冊子，書名叫做“海上妇女”。原来塔塔林諾夫不仅写过有关格利里探險队的書。

这是一本怎样的書呢？我讀了它两遍，認為这是一本很有趣兒的書。特别是回想到这是一位海軍軍官写的。那是什么时候！是一九一〇年沙皇时代。

這本書論証妇女可以作海員，并且引証了亚速海漁民生活中的一些事例。妇女在惊險的情况下，表現得并不亚于男子，甚至更勇敢些。船长深信，和流传的迷信刚好相反，“不讓妇女航海”，只是給那些被迫把家屬留在岸上，过着长期分居生活的海員們带来許多不幸。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在海船上看見“女輪机員，女航海員，女船长”了。

当我讀这本小冊子的时候，不禁想起船长对南生探險所作的边注和他在一九一一年去北极探險的报告摘要。我这才第一次認識到，他不仅是一个勇敢的航海家，同时，是一个头脑非常

清晰，对生活看法开闊，思想进步的人。

不过有些論文的作者显然是抱着另外一种看法。譬如“彼得堡日报”一位記者根据国务會議“否決塔塔林諾夫船长关于調拨必需經費的申請”这件事来反对这次的探险。这篇文章还是用这样的文体写成的：“……据有关官署証明，实现該探险事业之各种条件均缺乏根据，同时，塔塔林諾夫船长筹画之探险队亦欠周密考虑，国务會議認為，政府应通过海运部門之代表駁回此一建議。”

在另一家报纸上，我发見了一幀引人注意的照片：一条美丽的白色的海船。我觉得它很象“百年来的新发现”書中所画的西班牙快船。这就是“圣·瑪丽亚”号帆船。这条船看起来十分小巧玲瓏，要从彼得堡出发，沿西伯利亚海岸去海参崴未免过于小巧玲瓏了。

在同一家报纸的下一期刊登了一张更引人注意的照片：全船人員合影。自然在这张照片上很难辨認出什么来；不过，人象的位置，和坐在中間，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的船长，——这一切对我說来还是很熟悉的。我在什么地方看見过这张相片呢？沒問題，是在塔塔林諾夫家，在卡佳給我看的那些老相片里面。但我繼而又一想，不对，不是在塔塔林諾夫家！而是在伊万·伊万內奇医生那兒。不錯，我正是在那兒看見过这张相片的！

这是一九二三年我出院后，到他家去告别的那一次。他刚好要出发到北方去，在装箱子的时候，把这张相片抖落出来了。我拾起来仔細地看了看，并且問他为什么在全体船員当中沒有他，他回答說：“因为我沒有在‘圣·瑪丽亚’号帆船上航行过。”然后他就把相片拿过去，补充說道：

“这是一个人留给我作纪念的……”

这人究竟是谁呢？

一个单纯的，同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想法突然在我脑子里閃了一下。这个想法只有伊万·伊万内奇医生能够证实它是否正确。我当时就决定写封信给他。虽然他离开莫斯科已经将近七年了，可是我不知为什么完全相信他还健在，并且还是那样爱朗诵柯兹玛·普鲁特可夫的诗歌，还是那样一面和人谈话，一面就顺手从桌子上抓件东西，象魔术师似的一抛一接的。

下面就是我写给他的信：

敬爱的伊万·伊万内奇：

这封信是您过去治好的一个有趣的患者写给您的。您曾经诊断这个人患的是“哑而不聋”症。您还记得我吗？您临去北方的时候，曾经嘱咐我把自己作的事和自己的感觉写信告诉您。现在，经过了七年以后，我终于来履行诺言了。我觉得自己身体很好。现在，我已经是一个飞行学员，在国防航空化学后援会办的航空学校里学习，希望有一天能坐飞机来看您。此外，我写这封信给您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在莫斯科到您那儿去的那一次，看见您有一张“圣·玛丽亚”号帆船全体船员合照的相片，船长是塔塔林诺夫，这只船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从彼得堡起航，一九一三年秋在喀拉海上失踪。您还记得吗？您曾经对我说过，这张相片是一个人留给您作纪念的，可是您并没说这人究竟是谁。知道这个人是谁，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您有权利问我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感到兴趣。我简单地回答道：凡是有关塔塔林诺夫船长的事，我都感到兴趣。因为我认识他的家属，把他生和死的真情实况提供给他家属，这对我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您能够回信，我将感谢不尽。

回信交：罗沙里大街十二号航空博物馆，国防航空化学后援会航

空学校。致

敬礼！

亚历山大·格利高里耶夫

我能指望收到回信嗎？也許医生早已回莫斯科去了？也許他迁移到更遙远的北方去了？或者乾脆已經忘記了我，因此現在看到这封信时，也不会明白什么相片，哪一个格利高里耶夫。

4 收到回信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我們学完理論課，便全部搬到柯尔布斯机場去了……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五日，这是机場上一个“重大的日子”。直到現在，當我們回忆起这一天时，还是这样称呼它。这一天和往常一样，早晨七点鐘，我們已經坐在我們那一堆“可以利用的废物”前面。有的人正在試探着使米沙·戈洛布感到“吃惊”，因为他对任何事情从来都不覺得惊奇。万尼亚·格里布柯夫又在向別人請教什么叫做天地綫了。

“就在那兒，在天和地相联的地方。明白了嗎？”

“那么，为什么在我飞行的时候，就不銜接了呢？”

最后，万尼亚·格里布柯夫終於明白什么叫做天地綫了。但是，他所找到的天地綫却总在那一个地方——在普吉罗維茨后面的海湾的上空。他就老向那兒飞，剛一起飞，便“往天地綫迫近”，就这样一直“迫近”到降为机械兵为止。

九点鐘的时候教官来了，于是发生了下面几件事：第一，教

官带来了一位穿斜領衬衣，戴金边眼鏡，威风凜凜的大叔，大家很快就知道了，这是区委書記。書記看了看飞机，又看了我們用装飞机的大箱子改建的修理厂，說道：

“喂，我的亲爱的。我們首先應該整頓一下保卫工作。这簡直不象話，机場上总是不断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蕩来蕩去。”

“哪兒？”教官問道。“啊，这些人嗎？他們是我們的飞行學員。”

第二，我們刚打发走了客人，教官就冲着我們发作起来了，說我們洒了汽油。他的臉脹成了猪肝色，和他那头发的顏色十分相似。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所以，我們心里想，讓他喊叫一陣也算了。

可是他却蹲下来，用一个手指往汽油桶旁的几个小坑里掏来掏去。坑里本来是水，但他却說是汽油。

“不，是水！”戈洛布反駁道。

“我說是汽油！”

“水！”

“汽油！”

“好——好——好，就算汽油吧，”戈洛布同意道。

教官用手指往另一个小坑里插了一下，聞了聞便站起来了。他恶狠狠地皺起眉头，又聞了一次。

“是水，”他低声自言自語說道，因此我們都笑得前仰后合，坐到地上了……

第三，……說到第三件发生的事，那就得講得詳細一点兒。

这一天，我和教官飞了好几次，他老是注視着我，但和往常

相反，沒有罵我。

“來，”他終於說道。“現在你一個人飛吧。”

這時我的樣子大概很緊張，所以他用一種懇切的，善意的表情看了我一會兒，然後檢查了儀表是否正常，並且將空了的前座艙里的皮帶扣好。

“作一個正常的圓圈飛行。離陸後，爬高。一百五十公尺以下不許轉彎。轉彎，四方航綫，然後著陸。”

我將飛機滑到起飛綫，舉起一隻手，請求准許飛行。當時我感覺好象不是我，而是別人在作這些事情。起飛信號員揚起白旗，表示可以起飛。我加大油門，飛機就順著機場滑跑了……

當我第一次升到空中，嘗到飛行滋味原不過如此時，不免產生了一種幼稚的失望的感覺；現在，這種感覺早已不記得了。以前我總覺得自己將來飛行時會象鳥兒那樣飛，可是我現在坐在座艙椅上卻覺得完全同在地面上一樣。我坐在椅子上沒有功夫考慮地面或者空中的事，只是到第十次或者第十一次單飛時，才注意到地面的形狀和地圖完全一樣，我們生活在一個幾何形狀十分精確的世界上。我很喜歡那些疏疏落落投布在地面上的浮雲的影子，總之，我領會到世界是異常美麗的……

我就這樣第一次單獨一個人飛行著。教官座艙里空空的。第一個轉彎。教官座艙里空空的，可是飛機在飛行。第二個轉彎。我懷著自由自在的美妙的感覺單獨一個人飛行著。第三個轉彎。應該進入著陸了。第四個轉彎。注意！我開始收油門。地面愈來愈近，眼看就在飛機下面了。我慢慢地帶桿，滑跑，停車。

這些動作作得似乎還不壞，所以連我們那位愛發脾氣的教官也不禁贊許地點了點頭，米沙·戈洛布站在他背後，伸出一個

大拇指来对我比了比。

“薩尼卡！你真行。”当我們在小山坡上坐下来抽烟时，他說道，“我說的是实在話！这兒还有你一封信。我今天到航空博物館去了一趟，看門的人說：‘您可以把格利高里耶夫的一封信轉交給他嗎？’”

他递給我一封信。“这是伊万·伊万內奇医生写的。

亲爱的薩尼亚！知道你的身体很好，我心里很高兴。不过，你說我治好了你的“哑而不聋”症是不恰当的。老弟，这样的一种病根本没有。說“不聋的哑吧”这就对了。我等着你駕着你的飞机来，要不然我們只得老是坐狗拉的车。至于相片的事是这样的。这张照片是“圣·瑪丽亚”号航海长伊万·德米特里耶維奇·克里莫夫送給我的。一九一四年他被送到阿尔汗格尔斯克，两条腿已經完全冻坏了，后来因为患敗血症死在市立医院里。他死后，遺留下两本筆記簿和一些信件，这些信相当的多，据我估計，約摸有二十来封。显然，这是他从船上帶來的信件，也可能有几封是在路上写的，因为他是被塞多夫中尉的探险队中途收容下来的。他死后，院方将这些信件都按地址发走了，可是筆記簿和相片却留在我这兒。既然你認識塔塔林諾夫船长的家屬，并且打算“把他的（当然不是家屬的，而是船长的）生和死的真情实况”提供出来，当然会对这两本筆記簿感到兴趣的。这是两本最普通的小学生用的草稿本，里面写滿了鉛筆字，可惜，写得太了草，我曾多次試探着去讀，但結果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我所知道的大概就是这些。这是一九一四年底，世界大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所以塔塔林諾夫船长探险的事誰也不感兴趣。筆記簿和相片現在还保存在我这兒。你来吧，噢，对了，應該說，你飞来吧，只要你有耐心，你就来讀吧。我的地址是：北地城，基洛夫大街二十四号。

希望你写信来，有趣的患者。

你的医生伊·巴甫洛夫

……妹妹近况如何？你们还用木签烤土豆吃吗？

我也是这么想！相片是航海长留下的。医生亲眼看见过这位航海长！就是那个署名“尊敬您的，远洋航海长伊·克里莫夫！”的人，就是那个用了“纬度”，“帆船”，“弗兰姆”一些奇异的字眼儿和“首先我要告诉您……”“相信不久就会见到您”等一些非常客气的话，而使我一生都感到惊讶的人。就是那个航海长，我从他的信里才知道 экспедиция ① 不仅是发送邮件的肮脏的地下室，而且还有远程航行，船长，漂流的冰山等内容。

我决定等航校毕业后立即到北地城去读他的笔记簿。医生“放弃了这个念头”。要是他希望在这两本笔记簿里哪怕找到一个字证明他是正确的，要是有人对着他的脸啐过唾沫，要是卡佳认为他杀害了她的母亲，那么医生就不会放弃这个念头了。

大概我把话说出声来了，所以坐在小山坡上的米沙·戈洛布流露出那种神色，仿佛他终于也要吃惊了似的。

“米什加，”我问他，“航校毕业后，到北方去吧。”

“去吧。可是为什么呢？”

“需要。”

“如果需要，那就去吧！”

“那么决定了？”

“决定了。”

其实，这是早就决定了的。不过我真正到北方还是在三年以后。

① экспедиция 的意思很多，如收发室、探险、传达室等等。——译者注。

5 三 年

少年时代不是在哪一天结束的，而且这一天也不可能在日历上标志出来：“今天我底少年时代结束了”。它是不知不觉地，甚至使你来不及和它道别便逝去了。昨天你还是年轻漂亮的小伙子，可是转眼间，在电车上已经有少年先锋队队员称呼你“叔叔”了。你往模模糊糊的电车玻璃窗上照一下，自己也不禁诧异地想道：“真的呀，是小叔叔了！”少年时代结束了，可是，是在什么时候，在哪一天，在哪一小时？却并不知道。

我的少年时代就是这样结束的。不过有这么一天，从这一天起，我明白了自己已经开始在用完全另一种眼光来看过去一切的憧憬和希望。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

我由列宁格勒被派到巴拉绍夫，刚从一个航校毕业，又转到另一个航校去学习，不过这一次是向名符其实的教官学习，是在真正的飞机上学习。

我不记得在我的生活里还有什么别的时期这样勤奋的工作过。

“你知道你飞得怎么样吗？”还在列宁格勒时，校长对我说道，“笨得像一只木箱子。但是北极需要头等的驾驶技术。”

当暮色刚一降临到起飞线的时候，我便开始学习夜间飞行，爬高时的那种感觉，就仿佛是在漆黑的甬道上摸索行进。下面机场上T形的着陆信号鲜明地放射着亮光，黑色的大地被点点鲜明的红灯画上了两条整整齐齐的虚线。铁路岔道上隐隐约约闪

爍着信号灯,这些岔道在夜間是那么异常整齐的排列着,和在白昼多么的不相同啊。漆黑的太空,看不见的大地。远处忽然现出一片火光,又过了几分钟,才发现这并非火光,而是一座城市,正是万家灯火,五光十色的,各式各样的……多么美妙的一幅幻景啊!

我学会了盲目操纵飞机,当周围的一切都被白色的迷雾笼罩起来的时候,你就好像飞过了几百万年往另一个地质时期飞去。你仿佛不是坐在飞机上,而是坐在时间的飞轮上不断地向前疾驰。

我认识到一个飞行员应该象优秀的水手熟悉水性一般了解大气的特性,了解它的一切倾向和脾气……

在这以前,北极圈仿佛还是那么遥远,仿佛是誰也不需要的一大片冰山雪地,可是这几年来,它开始被我們注意了。初期的几次伟大的飞行就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

我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飞行员的理想,我們争执不休,証明阿同志比列同志飞得好,而契同志又比他們两个人都强。一个被自己左手压坏了心脏的美軍上校平·艾尔逊的遗体用国旗裹着刚由飞行员斯同志运回美国。不知为什么,这一次飞行激起了我們許多幻想。不,这个时候还是少年时期!

报纸上每天都出现一些关于北极探险队的文章——海上的和空中的,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讀着这些文章,整个的心都馳往北方去了。

有一天,我要作一次很困难的考試飞行。我已經坐在飞机上了,但一看见教官手里的报纸,看见报上的消息,便忍不住脫下飞行帽,取下风鏡,从飞机上跳了下来。

“向順利完成北冰洋直航任务的探险队员致以热烈的敬礼

和祝賀”——这是用大号字登在第一版中央的消息。

我顧不得去听教官惊异不置地对我講話，又向这頁报瞥了一眼，想一眼将它讀完。“伟大的北方航路开辟了”——这是一篇文章的标题！“‘西伯利亚人’一号在白令海峡”——这是另一篇文章的标题！“向胜利者致敬”——这是第三篇文章的标题。全是关于“西伯利亚人”这次有历史意义的远征的消息，自有航海史以来，这是第一条用一个航行期通过北方海路的船，这条海路也就是塔塔林諾夫船长打算乘“圣·瑪丽亚”号帆船通过的航路。

“你怎么啦？病了嗎？”

“沒有，教官同志。”

“高度二千二百公尺。大坡度盘旋，两个向左，两个向右。四个下滑倒轉……”

“是，教官同志。”

我当时激动得那样厉害，几乎想請求改期飞行了……

这一天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卡佳，想着去世的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想着船长，想着他的一生是多么奇怪地和我的生活交織在一起。不过現在我对他們的想法和从前不一样，現在我是更加心平气和地来看待我所受的委屈了。自然，我什么事都沒有忘記。我沒有忘記和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最后一次的談話；在她的談話中，每一个字都有着神秘的涵义——和青春，和生命訣別。我沒有忘記第二天我和老太婆坐在急診部里的情景：門开了，我看見一个黑头的白色东西，还有一只裸露的手臂从沙发床上垂下来。我沒有忘記出殯时卡佳把脸扭过去不理我的情形，也沒忘記我的幻想——若干年后，再遇見她，把証明我是正确的憑据扔給她。我沒有忘記，尼古拉·安东內奇曾

經朝我臉上吐過唾沫。

我突然感到所有這一切就好象是一出戲，直到現在為止，戲中的主角還只是在談話中涉及到，他要在最后一幕才出場。大家都在談論這個人，他的相片挂在牆上——是一張航海家的相片，寬大的前額，緊縮的下巴，兩只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窩里。

不錯，他就是這故事的主角。如果說我的少年時期在這個故事中顯得那麼重要，這也只不過是因為最有趣的念頭是在血氣方剛的十八歲少年的腦子裡產生的。他是一個偉大的探險家，但為世所埋沒。他的事跡遠遠超出了私人或者家庭關係的範圍。他的事跡就是開拓偉大的北方航路。他的意向就是用一個航行期內直航北冰洋。他所景仰的就是那些解決了擺在人類面前已經有四百年的問題的人。他和他們的地位是完全等同的。

而我的幻想，我的希望，我的心願又怎能和他的一切相提并論呢！我想望的是什麼？我為什麼要作一個飛行員呢？我為什麼爭取到北方去呢？

就象我所想象的那出戲一般，這一切突然各按自己的位置擺布開來：一方面是我腦子裡產生的關於將來和事業的單純的想法，而另一方面則是我所知識的許多關於北極飛行員艱苦的生活。於是我想象着種種情形：北極圈外綿綿半年的長夜；一連好幾星期疲憊不堪地等待着天氣；在白雪皚皚的叢山峻嶺上空飛行，眼睛總是不由自主地到處尋找可以迫降的地方；在連自己的機翼都看不清楚的暴風雪中飛行；在零下五十度的天氣苦惱地忙碌着起動發動機。我想起了一位北極飛行員對北極飛行所立的公式：“什麼叫作北極飛行？那就是暴風雪的摧殘加上

烧热水。”我想起了关于北极暴风雪的可怕的故事，人只要离开房屋两公尺，就有被暴风雪埋葬的危险。

但是，难道“西伯利亚人”号的船員就被这些困难和危险吓唬住了嗎？沒有，他們的破冰船虽然失掉了螺旋桨，但仍张上帆駛到了白令海。

还是彼加說得对，应该选择一种你能够发挥全部精力的职业。我爭取到北方去，希望作一个北极飛行員，因为这个职业要求我最大的忍耐，果敢和对祖国，对自己事业的热爱。

誰能知道，說不定我也有那么一天被人們列入那些可以和塔塔林諾夫船长等同地位的人中去呢？

我把脑子里产生这一思想的一天牢牢記在心里，这是一九三二年十月三日。

在巴拉紹夫航校毕业的前一月，我就写报告申請把我派到北方去。可是学校沒有放我走。我又留在巴拉紹夫整整作了一年教官。我不敢說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教官，不过，我能教人飞行，同时我一点兒也不想动不动就罵人。我很了解自己的學員。比如說，我完全清楚为什么一个學員刚下飞机，就忙着要抽烟，而另外一个在着陆时却假装着高兴的样兒。不过我天生就不是一个作教員的人，我对于千百次地向別人講解自己早已知道的东西感到非常乏味。

一九三三年八月，我得到一次休假便到莫斯科去了。我的免費乘車証是經列宁格勒到恩斯科的。在列宁格勒和在恩斯科都有人等待我。但我还是决定到莫斯科去，虽然那兒并沒有人在我等我。

我到莫斯科有事。第一，我要去北极航务总局談談把我調到北方工作的事；第二，我想見見瓦里亚·朱可夫和柯拉布略

夫。总之，我有許多事，我很快就給自己找到了理由，我必須去莫斯科一趟……

当然，我本来根本沒有打算給卡佳挂电话，特别是这三年来我仅仅从薩尼亚信中得到她一次問候，一切都早已結束和忘却了。一切都結束和忘却了这样长的時間，以致我又决定打电话給她时，为了妥善起見，我还預先想好了第一句无所謂的客气話。可是当我拿起听筒时，我的手不知为什么发起抖来，我意外地要了另一个號碼，柯拉布略夫的电话號碼。

我沒有找到他，他休假去了，一个陌生的女人的声音告訴我，說他要到下一学年开学时才能回来。

“他的学生向他問好，”我說道。“請您轉告他，是飛行員格利高里耶夫給他来的电话。”

我放下听筒。这是在旅館里，所以要先接通市內电话，然后再要你所需要的號碼。我悶悶地看着电话机，沒有拨动它，我不住地在思索。我对她說什么呢？我不能象对一个陌生人那样同她談話。

我决定先挂电话到动物园給瓦里亚。

可是瓦里亚也不在莫斯科。对方很有礼貌地告訴我說，朱可夫助教現在在北极，半年內不見得能回到莫斯科来。

“請問您是誰？”

“請您向他問好，”我說道。“我是飛行員格利高里耶夫。”

我在莫斯科再沒什麼人可以打电话的了，除非給民用航空局秘書挂个电话。可是我現在沒有心情找秘書。我取下听筒說道：

“接市里。”

市內电话局答話了，我要了號碼。

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接的電話，我一下就听出了是她那和藹，果斷的聲音。

“可以找卡佳嗎？”

“卡佳？”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詫异地反問了一句。“她不在。”

“是不在家嗎？”

“不在家，也不在城里。誰找她？”

“格利高里耶夫，”我回答道。“您可不可以把她的地址告訴我。”

尼娜·卡比丹諾芙娜略為沉吟了一會兒。毫無疑問，她並沒有辨別出是我的聲音。世界上姓格利高里耶夫的人多著哩！

“她實習去了。地址是：特羅伊茨克城，莫斯科大学地質調查隊。”

我謝了謝她，便挂上了听筒。

我再也不能冷清清地一個人呆在這愁悶的房間里了，但是距北極航務总局秘書接見我的時間兩點鐘還早得很。我走出旅館，漫無目的地在莫斯科蹣跚起來。

任何時候也別獨自去逛那曾經是你倆去過的地方。莫斯科市中心一個普通的街心花園，也好象成了世界上最令人傷心的地方。一條不太熱鬧，在莫斯科隨處可見的，相當骯髒的街道都會使你觸景傷情，使你不禁感到自己年紀大了許多，而且精明得多了。

我仿佛是在心平氣和地回顧自己的內心世界，對往事加以估價：在處理許多與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人心緊緊關聯着的問題上，我表現得過份急躁，而在有些問題上又缺乏自信，這或許是因為我小時候不會說話，世界對我說來又是無法解釋的

那么复杂，所以，这种对自身不信任的感觉就开始纠缠着我了。现在我好象觉得在自己身上还残留着一些哑吧的迹象。譬如说我在爱情上不善于充分表白自己的感情，甚至连最关紧要的话也没有说。我感到，我的爱情没有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极端复杂的情况从四面八方把它紧紧包围住了，这和从前我还是一个茫然不知所措的哑吧孩子时，面对着复杂问题时的情形完全一样。

不，现在我心里的一切都起了变化，我感觉到了这一点！我再也不是个一时也等不得，巴不得立即证明自己是对的急性的小孩了。我现在才知道，我最需要的是冷静的头脑和坚毅不拔的精神。

我怀着悲伤和怜悯自己的感觉想着我少年时代和学童时期的爱情。少年时代已告结束，爱情也不是那样的爱情了。不过和从前一样，一切有待于将来，我怀着比以前更大的希望注视着将来。

我在莫斯科没有逗留多久。北极航务总局和民航局对我都很客气。可是，他们对我说，除非是巴拉绍夫航校肯放我走，否则，去北方工作的事趁早休想。

仅只过了半年，我就得到去北方工作的委任了，不过这是一个极其偶然的機會。我在列宁格勒认识了一位老北极飞行员，他很想回内地工作，因为他的年龄已不适合于北方那种艰苦的飞行。我们互相调换了一下。他到我的工作岗位上工作，我则被任命为北方某一条长途航线上的副駕駛。

6 在医生家里

……要找这所房子并不困难，因为整条街就只有一座房子，其它的房子还只存在在北地城建筑家們的构思中。

我敲医生家的門时，已經黑天了，窗戶正好开着，只見一个人影在思索着从窗帘后面走过去。很久沒有人来給我开门，于是我便自己輕輕地推开沉重的門，走进一間洁淨寬敞的門厅中。

“主人在家嗎？”

沒有应声。屋角上放着一把扫帚，我用它扫了扫毡靴，因为外面的雪一直沒到了膝盖。

“有人在家嗎？”

一个人也沒有。只有一只棕黃色的小猫从衣架下面跳出来，惊惧地瞧了瞧我便跑掉了。随后医生在門口出現了。

从医学的观点看来，也許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他在这几年中，非但沒有变老，反而更加年輕了，又同那个在乡下教我和妹妹用木签叉着土豆烤的，高个子的，滿脸鬍鬚的，快乐的医生一模一样了。

“您是找我的嗎？”

“医生，我想請您去看一个病人，”我急速地說道。“一个很有趣的病例：不聾的哑吧。这个人什么都听得見，但是連‘媽媽’也不会說。”

医生慢騰騰地把眼鏡推到了額角上。

“很抱歉……”

“我說有一个很有趣的病例。”我一本正經地繼續說道。“这

个人只会說六个詞：母鷄，馬鞍，箱子，暴风雪，喝酒，阿布拉木。
患者格某。杂志上曾經刊載过。”

医生走到我跟前来，他的那副神气就好象是又要夹住我的舌头，察看我的耳朵一般。但他只是簡短地叫了一声：

“薩尼亚！”

我們互相擁抱了起来。

“終于飞来了！”

“飞来了。”

“真能干！成了飛行員？真能干！真能干！”

他摟着我的肩膀，引我到餐厅里去。餐厅里有一个約摸十二岁的男孩子，面貌很象医生。他向我伸出手来，把“奧”音讀得特別浊重地自我介紹道：“沃洛嘉”。

这兒比門厅里更加明亮，于是医生又把我渾身上下仔細打量了一番，这一次，似乎他費了很大的勁兒才忍耐住沒有真的察看我的耳朵。

“咳，真能干，”他又重复說了許多次。“妹妹呢？她在哪兒？也会飞嗎？”

“妹妹衷心地問候您，”我說道。“她現在是画家，已經出嫁了，住在列宁格勒。”

“已經出嫁了？帶着小辮子嗎？”

我笑了起来，原来薩尼亚小时候是留着辮子的。

“啊，我已經是老頭兒了，”医生叹息道。“想不到从前那个又瘦又小，穿一条肥大的破褲子的男孩子，現在竟然当了飛行員。那个留着两条小辮子的小姑娘居然成了画家，出了嫁，住在列宁格勒。”

“伊万·伊万內奇，說实在話，您沒有变样兒。真叫人惊奇。

甚至还年轻了一些！”

他笑了。他听我这样说，心里很高兴，因此这一晚上我不断地重复说他年轻了一些，或是说他至少没有变样儿。

我们坐下来喝茶，这时医生的妻子安娜·斯切潘诺芙娜来了。她是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穿着北方民族习惯穿的翻毛上衣，长统毡靴，我觉得她象个北极神。她脱去皮上衣，换下长统毡靴，仍然是那么高大，就连高个子的医生比上去也显不出怎么高来，更不用说我了。她的面貌很年轻，和这所洁净的木房子，黄色的地板以及乡下地毯都很相称。在她身上有着一一种古俄罗斯的情调，就如同在北地城中存在着的情调一样，虽然这完全是一座新城市，建设起来只不过五六年的光景。后来我才知道她是白海一带的人。

我们谈论起北地城来，我这才知道这座人行道用木板作成，桥也用木板作成，总之，一切都是木头建筑的，甚至地基都是用木屑填起来的奇异的城市的历史。

“只要雨一停，就好象在屋子里走路一样。”安娜·斯切潘诺芙娜说道，“到处都是地板，地板。连公路都是木头筑的。”

原来医生是搭乘第一只船到北地城来的，他亲眼看着整个城市修建了起来。

“一九二八年这儿还是原始森林地带，”他说道。“就在现在我们坐着喝茶的地方，曾经打过野兔。”

“可是现在却修起了一座房子，”安娜·斯切潘诺芙娜说道，“这条街一直准备要修，但总也不动工。”

“可是，你能说戏院不好吗？”

“戏院是不错哇。”

“去年莫斯科艺术剧团到我们这儿来过，”沃洛嘉说，他的

臉都脹紅了。“我們獻花歡迎他們，他們感到很奇怪，不知道我們從哪兒弄來的花，其實，我們這兒的花要多少有多少。”

大家都看看他，他的臉愈發紅了。

“沃洛嘉喜欢看戲，”安娜·斯切潘諾芙娜說道，“他還喜歡……”

“媽媽！”

醫生笑了。

“媽媽！請你出來一下行嗎？”沃洛嘉用威脅的口吻說道，說完就出去了。

安娜·斯切潘諾芙娜也笑了，跟着他走出去。

“他在寫詩，”醫生低聲說道。“是哇，現在要是回想起來，的確也很有意思，”他又接着說道。“這真是了不起！在興建第一個木材廠的時候，報紙的日期都不印了，都印成距木材廠投入生產還剩多少天。二十天。十九天。最後，只有一天了！第一批飛機到來了！它們受到多么熱烈的歡迎啊！您呢？”醫生忽然想起來了，說道。“您怎麼樣？打算幹什麼？”

“打算飛行。”

“飛哪兒？”

“還不知道。計畫很龐大，不過暫時往紅雅爾斯克運毛皮。”

“那麼計畫是新航綫羅？”

“是的……伊萬·伊萬內奇，”當桌上的東西都已吃光，我們開始喝起一種十分可口的自制的黃莓酒時，我說道，“您還記得我在列寧格勒時我們來往的信嗎？”

“記得。”

“關於那位航海長的事你寫了一封很有意思的信給我，”我繼續說道。“我首先想知道他的稿本還保存着沒有。”

“保存着。”

“那太好了。現在請您听我說。这件事情說来話长，但我仍然要把它告訴給您。大家都知道，我是您教会說話的。我應該报答您。”

于是我便从达莎阿姨念給我听的那些別人的信开始談起，把所有的事都講給他听了。关于卡佳的事我仅仅說了几个字——用的是报导的方式。可是医生偏偏在这个地方不知为什么笑了笑，但立即作出毫不在意的样子。

“……这是一个过于劳累的人，”他的意思是指那个航海长，“实际上，他并不是因坏血病死的，而是因疲劳过度死的。他为了逃避死亡，耗費了过多的力气，因此沒有給自己留下活下去的力量。他給人的印象就是如此。”

“您和他談过話嗎？”

“談过。”

“談的什么呢？”

“我总觉得他是在談南方某个城市，”医生說道，“談的不是苏胡姆，就是巴庫。这是他当时的一种执拗不变的思想。那时候，大家都在議論战争，因为战争刚刚开始。可是他談的却是苏胡姆，說那兒多么美好，多么暖和。大概他是生长在那地方的人。”

“伊万·伊万內奇，这些日記都在您这兒嗎？在这个房子里嗎？”

“在这兒。”

“請您拿来看看吧。”

我把这儿本日記想得太多了，最后給我形成了一种感觉，以为它們一定是几本厚厚的，黑色油漆布面的本子。但是医生去

了几分鐘之后，拿回来的却是两本窄窄的小練習簿，很象学生用的外文生詞本。我随便翻开一本来看时，不由得深深激动起来。

航海长伊·德·克里莫夫：

根据您和下列諸位的意願，我建議您和他們一同离船去寻找有人烟的大陆……

“医生，他的笔迹不是很清楚嗎！我讀起来毫不費力呀！”

“不，这很清楚的笔迹是我的，”医生說道，“你讀的一段是我已辨認清楚了的，在有些地方，我把認清了的字写成紙条夹在中間。至于其它的那些——你自己看看吧！”

于是他打开練習本的第一頁。

我也曾看見过一些不易辨認的笔迹，例如瓦里亚·朱可夫写的字；他的字使得教員很久都疑心他是故意捉弄人的。可是象这样的笔迹，我还是初次看見。这不是字，簡直是一些杂乱无章布满在紙上的大小和針头差不多的釣魚鈎。

前面几頁已經被油浸透了，在黃色透明的紙上勉强可以看出鉛笔的笔迹。下面是写几个字又被抹掉的乱七八糟的一团，再往下画着一幅地图草稿，以下又是乱七八糟的一团，任何一个大書法家也无法辨認出来。

医生滿意地看了看我。

“祝你成功，”他誠懇地說道。

当我在他家里閑談的时候，外面刮起暴风雪来了。在北地城如果遇見暴风雪是不应当出門的，同时这时天也黑了，所以我便留在他家里住宿。安娜·斯切潘諾芙娜用行軍床在沃洛嘉

的房間里为我搭了一个鋪。临睡前，我对沃洛嘉端詳了好久，他側身躺着，两只手叠着摆得一般齐放在腮下面。沃洛嘉在熟睡中的模样簡直就是一个小医生，只不过沒有鬚鬚。我坐在行軍床上正打算脫皮靴，突然这张床咯吱咯吱大声响起来。他睜开了两只淡蓝色的大眼睛眨了眨，睡梦中不知嘟囔了些什么。

7 讀日記

我并不承認自己是一个沒有耐心的人。不过要讀完这两本日記，大概只有最耐心的圣人才行！这些日記毫無疑問是在歇息的时候写的，是在昏暗的海豹油灯下，在零下四十五度用那冻僵了的，疲憊的手写成的。在有些地方，还可以看出笔迹脫开原字滑到下面，划成一条长长的，无可奈何的，沒有意义的直綫。

但是我一定要把它們讀完！

我又搞起这种苦恼的工作来了。每天晚上(在不飞行的空閑日子就从早上开始)，我手里拿着放大鏡，坐在桌前，便搞起这种把釣魚鈎变成人类文字的紧张而迟緩的工作来，这些字有时悲觀失望，有时又充滿希望。最初我只是盲目地硬干——坐下来就讀。但后来找到了一个窍门，我就不象过去那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去讀，而是整頁整頁地讀下去。

在翻閱这些日記时，我发现有几頁写得比較清楚，譬如医生眷写过的一个命令就是如此。根据这些地方我把所有的字母从“阿”到“雅”抄写下来，編排成“航海长字母表”，同时把他的各式

各样的笔迹丝毫不差地描摹下来。这样靠了这本字母表，工作进行起来就快得多了。只要依据这本字母表准确地猜出一两个字母，那么别的字母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来辨認这些日記。

远洋航海长伊·德·克里莫夫的日記。

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启程較晚，六小时內仅走了四維尔斯特。今天是我们离船一月的紀念日。我們算了一下，离船后共走了一百維尔斯特。当然，一个月走这么一点兒路并不算怎么多，但道路却意想不到的坏。我們很隆重地庆祝了我們的周月紀念日：用干黑莓煮了一鍋湯，为使湯味甜美，又加了两罐炼乳。

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五。

假若我們能够到达海岸，就讓这些人——我不想举出他們的姓名来——永远記住五月二十九日吧。这是我們从死神手中逃出来的一天，讓他們年年紀念这个日子吧！不过人虽然是救出来了，但双銃枪和养育着我們的厨房用具全沉到水中去了。因此昨天我們只好吃生肉，喝凉水冲的牛奶。唉！但願上帝能把我們这群天涯浪子平安送抵岸边！

五月三十一日，星期日。

下面就是正式文件，根据这份文件我必须率領一支队伍出发。

航海长伊·德·克里莫夫：

根据您和下列諸位的意願，我建議您和他們一同离船去寻找有人烟的大陆。本計劃于本年四月十日开始执行，并应携带雪橇，上载皮筏和足供两月食用的粮食。离船后，应向南前进，直到看見陆地为止。发现陆地后，可根据客观情况适当行动，不过最好能爭取到达佛兰茲·約瑟夫群島間的不列顛运河。因为这是极有名的地方，沿着运

河可以到达弗罗拉海岬，我認為在这个地方可以設法找到給养和房屋。之后，如果時間和条件允許，应取道去斯匹次卑尔根^①。到达斯匹次卑尔根以后，摆在你們面前的一个最艰巨的任务——就是找到当地居民，因為我們現在还不知道他們居留的地帶。但我希望您在該島南部即使找不到岸上的居民，也能找到一条商船。自願与你同行者共十三人。

“圣·瑪丽亚”号船长伊万·塔塔林洛夫

一九一四年四月十日于北冰洋

上天明鉴，把他留在艰苦的，几乎是絕望的环境中，我却离开，这是多么难过啊！

六月二日，星期二。

离船前，輪机員柯尔涅夫为我們作了四付眼鏡，不过这些眼鏡并不頂用。玻璃片是用“杜松子”酒瓶作的。穿着雪橇走在前面的是我們的幸运兒“睜眼人”，跟在他們后面拖拖拉拉往前走的是閉眼的“瞎子”，他們只是偶尔透过睫毛看一下道路。眼睛被那使人痛苦难受的光綫刺得疼不可当。我永远也不会忘記我們的行路图：我們很整齐地合着脚步，同时又东倒西歪地向前走，用胸膛压着纜繩，一只手抓着皮筏的側舷。我們紧閉着眼向前走。右手里的滑雪杖象机械那样准确地滑到前面，偏往右方，又慢慢地落到后面去了。滑雪杖尖端下面的积雪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多么清脆，多么单調啊！使你情不自禁地就要去傾听这种嘎吱嘎吱的声音，并且仿佛清晰地听見說：“远啊，远——远啊。”我們仿佛是在失掉了知觉的状态下行进，机械地迈脚步，用胸膛压着纜繩……今天我觉得自己好象是在炎热的夏天在高楼大厦的蔭影里沿着海滨行进。在这些高楼大厦里儲藏着亚洲水果，大門敞着，可以聞到新鮮水果和干果芬芳郁馥的香气。橘柑，桃子，苹果干和丁香熏人欲醉。波斯商人正在向晒軟了的瀝青人行道上洒水，我隱約听見他們說話的那种平靜的喉音。

^① 挪威北部的一个島屿。——譯者注。

天啊，多么浓郁的香气，多么沁人心脾的凉爽啊！……这时我被自己的雪杖絆了一下，神志立刻清醒了，我抓住皮筏吃惊的停住脚——原来眼前是雪，雪，目之所及尽是白茫茫的雪。太阳依然耀眼地照射在雪地上，眼睛依然被刺得疼不可当。

六月四日，星期四。

今天，跟在杜那耶夫后面行走时，我看到他在吐血。检查牙床——是坏血病。最近几天来，他一直在抱怨脚不听使唤。

六月五日，星期五。

伊万·李沃維奇的影子始终离不开我的脑子：当他送别我们，向我们致辞的时候，突然不说话了，紧咬着牙关，带着无可奈何的惨笑向周围看了看。他还在生病，我把刚从病床上起来的他丢下了。我的上帝，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可是现在已经不能再回去了！

六月六日，星期六。

莫列夫从三号起就一直纠缠着我，说他从冰山頂上看见了一片仿佛“平川”的地方，也就是说他看见了一块向南伸展很远的十分平坦的冰原。“航海长先生，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平川光滑得连兽蹄都站不住”。今天早上，他就不在帐篷里了。他没有穿滑雪板就走了，在薄而坚硬的雪层上隐约可以看出他的毡靴的印迹。我们呼喊，打口哨，鸣枪，整整寻找了他一天。他要是听见了，总该会回答我们，因为他随身带着连发步枪和十二、三颗子弹。可是一点声音也没有听见。

六月七日，星期日。

用皮筏，滑雪板，滑雪杖结成一根高约五沙繩①的旗竿，绑了两面旗子，将竿子立在小丘上。如果他还活着，他一定会看见我们的信号。

六月九日，星期二。

又走上征途。只剩下十三个人了，这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究

① 沙繩，俄国长度单位，一沙繩合2.134公尺。——译者注。

竟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大陆，哪怕是一块荒漠的不毛之地也好，只要它能留在原地不动，只要我們在上面不致时时刻刻担心它載着我們向北漂去！

六月十日，星期三。

今天傍晚，又产生了一次幻觉，恍若看見了南国的城市，海滨，和夜咖啡店，店里坐着戴白色巴拿馬草帽的人們。是苏胡姆嗎？又聞到了新鮮水果浓郁芬芳的香气，又产生了一些痛苦的想法：“我为什么要到这酷寒的海上来航行呢？假如在南方航行多舒服！那兒气候温和，只消穿一件单衣就行了，甚至还可以光着脚，可以吃到許多橘子，葡萄，苹果。”真奇怪，为什么我过去会不喜欢吃水果？不过巧克力糖也是好东西，就着黑面包干一起吃，就象我們現在午休时的吃法也很好。只可惜我們領的巧克力糖太少，一块巧克力分成許多小块，每次只領得一小块。要是有一盘烘烤的黑面包干摆在面前，手里拿着整块的巧克力糖，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該有多好啊！可是距离这样的可能还有多少維爾斯特，多少小时，多少天，多少个星期呢？！

六月十一日，星期四。

道路极坏，雪很深，雪下面到处是水。时有冰渊挡住我們的去路。今天走了不到三維爾斯特。整天看見的都是浓霧和那刺得眼睛剧痛的朦朧的白光。我現在仿佛是透过一层薄紗在看这本筆記簿，热泪順着腮帮直往下流。明天到特罗伊察。今天要是在“那兒”，在南方某个地方該多好啊！但是在这兒，在这靠近北緯82°，到处被冰山和冰渊分割开的浮冰上又是多么不舒服呀！在你眼前，冰原每分鐘都在挪动，一条冰渊消失了，另一条又露出来，就好象两个巨人在一张大棋盘上走象棋一般。

六月十四日，星期日。

这是一个新的发现，关于这件事我对同伴們什么也沒說：我們正从陆地旁边漂过。我們今天已經到达佛兰茲·約瑟夫島所在的緯度，而且还在繼續向南移动，可是連島屿的影子也沒有看到。我們正

从陆地旁边漂过。不論是根据我那毫无用处的天文鐘，不論是根据恒风向，或者根据投入水中的繩子的方向，我都看到了这一点。

六月十五日，星期一。

我把他这个病人丢下，使他陷于悲觀絕望的境地，这种悲觀絕望的心情只有他才能够隱藏着不表露出来。想到这些事，我就失掉了能够得救的信念。

六月十六日，星期二。

索提金也病了，他的牙床肿胀，冒血。現在我帶領的人当中患坏血病的已經有两个了。我的治疗法就是派他們穿上滑雪板去找路，晚上給他們一片奎宁吃。也許这个治疗方法很残酷，不过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完全失掉精神力量之前，这也是惟一的治疗法。最严重的一种坏血病我还是在伊万·李沃維奇身上看見的，他患这种病将近半年，只是用了一种非人力所能及的毅力才使自己痊愈了，也就是干脆不讓自己死掉。可是現在，一个有着这种毅力，这种渊博的、广闊的智慧，这种飽滿的銳气的人終于遭到了不可避免的灭亡。

六月十八日，星期四。

緯度81°，向南漂流之快，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

六月十九日，星期五。

四点左右，在我們宿营地东南方向，我看見了一点东西。这是紧挨在天地綫上的两片粉紅色的浮云，它們的形状一直没有改变，直到浓霧將它們遮住。我們好象从来还没有象現在被这么多的碎冰包围过。数不尽的鈴鴨和尖声鳴叫的白鷗在飞翔。啊，这些該死的海鷗！夜里它們常常不讓我成眠，圍繞着扔在冰上的死海豹的內脏忙碌，爭吵。它們好象一些惡魔在嘲弄我們，它們瘋狂地哈哈大笑，吱吱地尖叫，淒厉地呼嘯，它們等于是正在咒罵我們。我将永久地記住这“雪白的海鷗的叫声”，这些在帳幕里的不眠之夜，还有那照透了帳幕帆布的不落的太阳！

六月二十日，星期六。

在駐營的一星期中，我們隨着冰塊向南漂流了整整一度。

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傍晚，我按照慣例爬到一塊小冰山上去，眺望地平綫。這次我在東方看見了一樣東西，使我激動得在冰山頂上坐下來，匆匆忙忙地揉眼睛和擦抹望遠鏡。這是一條細小的光帶，好象是誰用毛筆在天藍色的原野上整整齐齐地抹上了一筆。起初我認爲是月亮，可是不知爲什麼這個月亮左邊的半個弧逐漸晦暗，右邊的半個弧却愈來愈明顯了。夜里我出來了五、六次，用望遠鏡眺望，每一次都在原來那個地方找到這一小塊月亮。我驚訝的是我的伙伴們竟然什麼也沒有看見。我費了好大的勁兒才忍耐住不走進帳幕去，不大聲喊叫說：“你們為什麼象稻草人一樣呆在這兒，你們怎麼還在睡？難道你們沒有看見我們正在向大陸漂去嗎？”但是我不知為什麼要保持沉默。有人認爲也許這就是海市蜃樓。我不是曾經發生過錯覺，看見自己在南國的都市里，在海濱上，在炎熱的夏天，在高樓大廈的陰影里嗎？

第一本寫到這一句就結束了。第二本從七月十一日開始。）

七月十一日，星期六。

打死了一隻海豹，從它身上積了兩湯盆血。用這些血和鈴鴨作成了甘美的羹湯。在烹茶或是煮湯時，我們一般不喜歡開玩笑。今天早上，我們吃了一桶羹湯，喝了一桶茶；午飯，吃了一桶羹湯，一桶茶；現在晚飯的時候，我們每人吃了一磅多肉，正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我們的茶快些兒煮沸。可是我們的桶很大，形狀象一個截頭圓錐體。要是能夠再煮一桶羹湯，痛快地吃它一頓，大家倒也並不反對，不過我們不好意思了，因為應該“節約”。我們的胃口已經不能拿狼來形容，而是比狼的還要大得多；這有點兒不正常，有點兒病態。

現在我們終於坐在一個島上了，在我們身子下面不再是兩年來形影不離的冰塊，而是泥土和苔蘚了。一切都好，就是有一種思想仍然使我不安：船長為什麼不和我們一塊兒走？他不願意丟下船，他不

能“空着两只手”回去。——“如果我空着两只手回去，他們会把我当落水狗打的。”还有那个幼稚的，輕率的想法：“要是絕望的环境迫使我丢开船，那么我就到我們发现的陆地上去。”我觉得最近一段时期，他想我們一九一三年四月发现的那块陆地想得有点发狂了。

七月十三日，星期一。

在东南东方向，海洋直到天边都没有結冰。啊！“圣·瑪丽亚”，亲爱的，你若是在这儿就好了！你在这儿可以連机器都不要，就能一帆风顺地迅速駛去！

七月十四日，星期二。

今天索特金和卡洛里可夫走到海島的尽头时，发现了一件非常可貴的东西。他們在离海不远的地方看見了一个不大的石头堆。石头堆的端端正正的形状使他們感到惊异。他們走近一看，发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英国啤酒瓶子，瓶口上盖着带专利字样的有螺絲口的瓶盖。两个伙伴立刻扒开石头堆，很快就在石块下面找到了一个鉄罐。鉄罐里有一面保存得很好的英国国旗，旗下也有同样的一个瓶子。瓶上貼着一张紙条，写着几个人的名字，瓶里是一张英文写的字条。在我和尼利斯共同努力之下，好歹才弄清楚，原来是英国北极探险队在杰克逊率領下，于公元一八九七年八月由弗罗拉海峡来到麦利·哈尔姆斯渥尔特海峡，将这面旗子及字条留在此地。末尾說在“温德渥尔德”号船上一切都很平安。

我的一切疑問都意想不到地解决了，原来我們是在麦利·哈尔姆斯渥尔特海峡。这是亚历山大島的西南端。預計明天我們可以轉到島的南岸，然后向弗罗拉海峡前进，到大名鼎鼎的英国人杰克逊的領地去。

七月十五日，星期三。

离开了营地。摆在我們面前有两条道路須要选择：是大伙兒在一起，带着行囊，順冰河而下呢，还是分作两队，其中一队穿滑雪板沿冰河前进，另一队的五个人乘皮筏順冰河航行。我們选择了后一种

前进的办法。

七月十六日，星期四。

馬克西姆和尼利斯一早就將皮筏划到距我們營地較近的地方，尼利斯被激流冲开很远，只好派两个人去搭救他。我用望眼鏡看見尼利斯怎样把桨收起来，一籌莫展地望着那只前去搭救他的皮筏。尼利斯病得很厉害，不然我是无法解释他这种行动的。总之，他最近变得有些古怪：走路不稳，常常独自坐在一旁。今天吃晚飯我們燉了两只鈴鴨，一只綿鳧。

七月十七日，星期五。

天气恶劣。繼續在格兰塔海峡等候从岸上行进的那一队人。夜里天色轉晴朗。前方，在西北西方向似乎不太远的地方，在綿延不断的冰原后面，可以看見乱石嶙峋的島屿。难道这就是弗罗拉海峡所在的諾尔德布魯克嗎？現在已經到了弄清我这样急急忙忙向这个海峡赶路是否正确的时候了。二十年——这是个漫长的时期。經過这段时间，杰克逊在那兒的建筑物也許連点痕迹也沒有留下呢？但是又有什么別的办法呢？繞一个大湾嗎？那么我的这些衣衫襤褸，渾身是油垢和虱子，身患重病的不幸的同伴們还能支持得了嗎？

七月十八日，星期六。

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話，我們就繼續前进。不能再等待了。尼利斯勉强能走，卡洛里可夫也比他好不了多少。杜那耶夫虽然也在訴苦說腿不好，但是在他身上还看不出象尼利斯和卡洛里可夫那样使我惊惧的冷漠的神情和体力衰弱的表現。什么事情使步行的人耽誤了時間呢？我不知道，不过要在这兒再呆下去，那就必死无疑了。

七月二十日，星期一。

柏尔島。當我們从皮筏里走出时，便相信尼利斯已經不能再走路了；他跌倒了下去，努力用手脚爬着走。我們作了一个类似摊床的东西，把尼利斯抬了进去，用我們仅有的一条被子把他盖起来。他

老想往什么地方爬，但后来就安静了。尼利斯是丹麦人，在“圣·瑪丽亚”号船上服务的两年中，他的俄国話已經学得很好了。可是从昨天开始，他便忘了俄国話。最使我吃惊的是他那双茫茫然充滿了恐怖的眼睛，这是失掉理智的人的眼睛。我們燉好了肉湯，給了他半碗。他喝完以后便躺下了。失掉这样一个非常聪明勤奋的优秀水手真可惜。大家都躺下睡了，我帶了一支步枪，到一块峭岩上去眺望弗罗拉海峡。

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二。

尼利斯在夜里死了。連我們給他盖的被子也沒有掀掉。他的遺容很安詳，並沒有因为临死前的痛苦而变得难看。两小时以后，我們將这位长眠的同志抬出来，放到雪橇上。地面冻得十分坚硬，所以墓穴并不深。我們誰也沒有为这远方的孤坟洒下一滴眼泪。这个人的死亡并沒使我們感到特別惊奇，仿佛是发生了一件最普通的事情似的。当然，这并不是冷酷无情。这是面对着那降临到我們每一个人头上的死亡而产生的一种变态的迟钝。我們現在好象又怀着敌意地看了看下一个“候选人”——杜那耶夫，我們心里暗暗猜測：“他是不是在走到以前就要离开我們呢。”一个同伴甚至仿佛恶意地吆喝他道：“喂，你干嗎坐着？你这个落湯鷄！你是想跟尼利斯一块兒去嗎？走，找浮木去，活动活动吧！”杜那耶夫順从地走了以后，有人还在追着他喊道：“看你跌跌撞撞的，快走！”他們这样作不是怨恨杜那耶夫，何况現在，浮木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們是怨恨那攫走我們同志生命的疾病，是号召我們和死亡斗争到底。当腿象是麻痹了要弯下来的时候，那就是顛躓病的明显症候。随后就是舌头开始不听使喚了。病人努力想說几句话，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怎样努力也不成，好象是惊慌失措，說不上話来的样子。

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三。

三点鐘出发到弗罗拉海峡。又想起伊万·李沃維奇。我再也不怀疑，他為我們所发现的那块陆地弄得有点兒发狂了。最近他經常

2

責備自己沒有派一隊人到這塊陸地上去勘察。他在送別辭中也提到過這塊陸地。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次的別離，不會忘記他那張振奋人心的蒼白的臉和他的眼光的遠大。這和過去那個紅光滿面活力充沛的人，會編笑話和滑稽故事的人，我們全隊的偶像，對任何一件最艱巨的工作都是處之以談諧的人還有什麼共同之點呢？他講完話以後，誰也沒有離開。他閉着眼睛站着，聚精會神地仿佛準備說兩句送別詞。然而，送別詞還沒有說出，卻迸出了一聲微弱的嘆息，眼角上涌出了閃閃的淚珠兒。他說話時起初斷斷續續地不連貫，隨後便愈來愈平靜了，說道：“在送別兩年來在鬥爭和工作中朝夕相處的朋友時，我們每一個人都很難過。可是我們應該記住，雖然我們探險的主要任務沒有完成，但我們总算作出了不少的成績。俄羅斯人的勞動已在北極探險史上占了最重要的篇幅——俄羅斯可以因此而驕傲。我們擔負着重大的責任，就是要不愧為俄羅斯北極探險家的後繼者。如果我們犧牲了，我們的發現卻不應隨着犧牲。讓我們的朋友回去轉告世人：我們這個探險隊用自己的勞動給俄羅斯增添了一片廣闊的陸地，我們已把這塊陸地命名為‘瑪麗亞島’。”——他沉默了片刻，然後擁抱了我們每一個人，並且說：“我想對你們說的不是‘別了’而是‘再見’。”

七月三十日，星期四。

現在我們僅僅剩下八個人了：四個人坐在皮筏上，四個人坐在亞歷山大島上某個地方。

八月一日，星期六。

今天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我們距弗羅拉海峽只有兩三哩時，劇烈的西北風刮起來了，風勢迅速增強，半小時後，就象從管子里吹出來的一樣猛，掀起了險惡的巨浪。在彌天大霧中，載着杜那耶夫和卡洛里可夫的第二只皮筏不知不覺地看不見了。在這樣的巨浪中要和狂風，激流對抗簡直是不可能的，我們連忙背着風向一座較大的冰山靠岸，我們爬上冰山，把皮筏也拉了上去。我們登上冰塊以後，便在

山頂上豎起一根杆子，升了一面旗子，希望杜那耶夫看到后能猜到我們的意思，也爬到一座冰上去。这时天气十分寒冷。我們都疲乏了，便决定躺下睡覺。我們穿上皮衣，脚对着脚地躺在冰山頂上，馬克西姆的脚伸到我的皮衣里貼着我的背，我的脚伸到馬克西姆的皮衣里貼着他的背。我們就这样安靜地睡了七八个鐘头。我們醒来时是一个极其恐怖的場面。我們被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惊醒了，感觉得身子飞一般的往下沉，頃刻間双人睡眠袋就灌滿了水，我們正在向水里沉沒。我們互相用腿蹬，用脚踢，絕望地掙扎，想从这出卖了我們的睡眠袋里鑽出去。我們好象是被人投入水中要把我們淹死的猫一般。不知道这次掙扎繼續了几秒鐘，不过我感到持續了很久。在我脑子里，随着得救与死亡的思想而俱来的，是我們旅途中的各种情景：莫列夫，尼利斯和四个步行者的死亡。現在輪到我們了，無論是誰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切的。就在这一瞬間，我的脚碰到馬克西姆的脚，彼此一蹬，便退出了睡眠袋，又一会儿功夫，我們渾身湿淋淋的站在陷入了水中的冰山“山麓”下，沒命地将漂浮在周围水中的皮靴，帽子，被子，手套往冰上扔。皮袄变得异常沉重，我們两个人合力才能捞起一件来，被子終于沒有抓住，沉到水里去了。現在我們怎么办呢？我絞尽了脑汁也沒有用处。我們豈不要冻僵了嗎！仿佛是回答我們的問題似的，我們的皮筏从冰山頂上跌落到了水中，也許是风吹下来的，也許是象我們身下的冰一样，皮筏下面的冰也碎了。現在我們知道該怎么办了！我們擰干自己的袜子，短外衣，再把它穿上，把剩下的东西全部扔到皮筏上，坐进去就开始搖槳！我的天哪！我們是怎样拼死命地在划船！我認為正是这样剧烈的运动我們才得幸免于难。六个来鐘头以后，我們就到达弗罗拉海峡了……”

在航海长刚离船后所写的筆記中，我找到了一张有趣的地图。地图的式样很旧，因此我觉得它和附在南生乘“佛兰姆”号探险記上的地图很相象。

但是使我大吃一惊的还是发现它是“圣·玛丽亚”号自一九一二年十月至一九一四年四月的漂流线路图。这次漂流的地点正好在所谓彼得曼岛。现在谁不知道这块陆地根本不存在呢？但是谁又知道这件事实却是塔塔林诺夫船长乘“圣·玛丽亚”号第一个证明的呢？

这位在任何一本地理书上都没有提到的船长究竟作了什么呢？他发现了北地岛，他证明了彼得曼岛实际不存在。他校正了北极地图，但还始终认为他的探险队是失败了……

不过最主要的，就是这本日记我已照我的抄本反复读了五遍，六遍，七遍了（因为阅读过程不再使我感觉困难了），我对于船长如何对待自己的发现的一段很注意。笔记上说：

最近他经常责备自己没有派一队人到这块陆地（即北地岛）上去勘察。

……如果我们牺牲了，我们的发现却不应随着牺牲。让我们的朋友回去转告世人：我们这个探险队用自己的劳动给俄罗斯增添了一片广阔的陆地，我们已把这块陆地命名为“玛丽亚岛”。

要是绝望的环境迫使我丢开船，那么我就到我们发现的陆地上去。

航海长居然还说这种思想是幼稚的，轻率的。

幼稚和轻率！达莎阿姨曾经把船长的最后一封信读给我听过，在那封信里就有这两个字眼儿。

也谈不上愿不愿意了，我们只好放弃最初沿西伯利亚海岸到达海参崴的打算。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现在我的脑子里完全是另外一种想法了。我希望你不致象我的某些同志那样，认为这种想法是“幼稚”或者“轻率”……

这一页写到这两个词结束，下面的一张却没有有了。现在我

知道这个想法是什么了：他想离开船到这块陆地上去。探险——他生活的主要目的——沒有成功。他不能“空着两只手”回去，他迫切地希望到自己所发现的陆地上去。所以我很了解，如果說他的探险队的遗迹还在什么地方保留着的话，那么就得到这块陆地上去寻找。不过，这一点也许只有我才了解吧？也许我之所以能了解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認識一个女人，这块陆地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我曾看着她怎样死去。我急于想找到这个探险队的遗迹，更想向卡佳証明我爱她，并且永远也不会不爱她。

一九三五年三月的一个深夜，我抄完了这本日記的最后一页，我所能識辨出来的最后一页。

在我当时所住的区执行委员会那座宏大的双层楼房里，所有的人都早已入睡了，只有我的窗戶里透出一絲灯光，落在路旁盖着一层白雪的孱弱的小树上。我的头，眼睛都有点兒疼痛。我穿上衣服走了出来。

这时，万籟俱寂，寒气逼人，可是并不太黑！滿天星斗，同时在西方还有一点兒微弱的北极光。过去我在巴拉紹夫机場所体验过的那种令人怀念的感觉又涌上了我的心头。

仿佛在剧院里突然开了电灯，我看見和我并排坐着的人正是刚才在舞台上的人！难道这是真的嗎？似乎在一分鐘以前还不能說他們是否是一些真人，或者只是在演戏。这出戏在现实思想的亮光照耀下就要黯然失色以至消匿无踪，但是灯亮了，却什么也沒有消失。相反地，我异常清晰地看見了在我周围的这些带着恐怖和疾病，悲觀絕望，充滿了幻覺和抱着极大希望的活生生的人們。当他們离开船的时候，船停在距海岸一百七十公里的地方，可是他們在荒涼的冰天雪地中却跋涉了将近两千公里，因为他們从陆地旁边漂过去了。虽然船长不在他們这群人

当中，可是在这本惊心动魄的日記里却处处提到他，到处有他說的話，充滿了对他的热爱，和大家对他的生命的担忧！送別辞是用鉛笔写的，鉛笔深深地划到了紙里面去，所以这是全部日記中最容易識辨的地方。“然而，送別詞还没有說出，却迸出了一声微弱的叹息，眼角上涌出了閃閃的泪珠兒。……”

仿佛是船长在托付我，要我說明他的生活經歷和牺牲經過，我能完成这个委托，知道他的生死事迹嗎？他是放弃船去研究他所发现的陆地了呢？还是同他的伙伴們一起由于飢餓而牺牲了呢？还有那冻结在雅馬尔岸边冰块中的帆船“圣·瑪丽亚”号，这些年来，它是不是載着死去的船員沿南生到格陵兰的路綫漂去了呢？或者是在一个既沒有星星，也沒有月亮，更沒有北极光的暴风雪的奇寒的夜里被冰块挤碎了呢？那时檣桅，帆桁随着一声轟然巨响飞速地倒下来，打碎了甲板上所有的东西，砸死了人，船身在临毀前的痙攣中喀嚓一声碎裂了。两小时以后，狂风卷着大雪盖住了出事地点。

或許在北极某一个人烟絕迹的小島上还住着“圣·瑪丽亚”号的人員呢？他們一定能够說出这只船的命运，叙述船长的命运。以前不是也有过六个俄罗斯水手在斯匹次卑尔根島上一个荒凉的角落里住了几年嗎？他們打死熊和海豹，吃它們的肉，穿它們的皮，把兽皮鋪在他們用冰雪砌成的窝棚的地面上。

不，哪兒会有这样的事呢！說丟开船到瑪丽亚島这一思想是“幼稚的”，“輕率的”这句话到現在已經过了二十年了。他們是不是去这个島了？走到了沒有？

8 医生的家

整整一个冬季我都在辨認这些日記，不过我在北地城的生活还是按部就班的。我按时把供給木材厂用的工具运到紅雅尔斯克，最后还将这一条航綫的飞行時間縮短到八小时半。我把勘察队运送到諾里尔斯克，把許多教員，医生，党的工作人員运送到偏僻的涅涅茨民族区。我曾經同一位著名的飛行員姆同志到过迪克逊。我曾經沿着叶尼塞河的支流——庫列依卡河和下通古斯河飞行过。

但是我每次回到北地城总是馬上到医生家里去，自然是理了发和洗了澡之后才去。

我对医生和他的家庭很留恋，所以他們似乎也很喜欢我。說来实在可笑，医生对我的态度就象是对待自己的作品一般；他有时甚至眯縫着一只眼睛，仿佛总不太相信我就是那个穿着一条肥大的褲子，瘦弱不堪的黑头发小孩，有一个时期这个小孩只会反来复去地說“母鷄，馬鞍，箱子”。当然，現在我覺得他已不象在我童年时代，在乡下那么神秘莫測了。不过，就是現在也絕叫人猜不到他下一分鐘会作什么。比方說，在談話的时候他会突然把自己的椅子拋給你，而你一定要将它接住再扔回去。經過几分鐘这样的体操之后，医生又仿佛若无其事地坐在这把椅子上繼續談起話来了。他喜欢給涅涅茨人朗誦柯茲瑪·普魯特可夫的作品，他在涅涅茨人中有許多好朋友。

他們常常到他家里来，黑皮肤，黑头发，寬臉膛，穿着玻璃珠綉花鹿的皮袄。他們坐下来談个不休，套在高大的雪橇上的灰

鹿睜着哀怨的眼睛，久久立在台阶前。

医生会說涅涅茨話，涅涅茨人常来找他商量事情——有时是商量很重要的事情。他們生活在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并不是对所有的事物都清楚的，他們还不太信任一个什么瓦斯加主席，冻土带苏維埃公認的集体农庄問題的首席专家。譬如，有一次他們来征求医生的意見，問他應該怎样处理盜匪：由他們自己打死呢？还是解交給政府？又有一次他們来了解医生对汽爐子的看法，問这种机器在家庭中是否适用。

医生用了很長的时间來說明：盜匪應該解交給政府，汽爐子在家庭中是适用的。涅涅茨人带着严肃而天真的表情默默地傾听着。不久以后，我也遇上一次机会对涅涅茨人作了一大篇关于汽爐子的演說，詳細情形后面再談。

不管怎样吧，这是一种很巩固的友誼。医生告訴我說，这种友誼是他在哈巴罗沃屯成立“寄生虫驅虫站”之后才开始的。这是医学上一件真正的大事。医生被大家称为“驅虫大师”，他的声名因此传遍了冻土带……

在他的家里有許多动物：大公猫費尔卡，烏龟，刺猬，猫头鷹。猫头鷹住在桌子下面，每当大家坐下吃飯时，它就“啊！啊！啊！！”地叫个不停。所有这些都是沃洛嘉的家当，——还有两条叫卜西卡和托加的狗。他在教練这两条狗拉車；涅涅茨人送給他一付用猛犸皮装璜得十分美丽的套头。我很喜欢沃洛嘉不夸耀自己写的詩。这是他的秘密，在整个冬天，我只有一次听見過他朗誦詩。他起先噤哩咕嚕地低声念了很久，并不知道我在隔壁房間里，并且全都能听見。后来他就带着表情，高声念起来了：

通古斯小孩乔加尔放学回家，

微笑象月牙兒閃耀在他那小眼中。

他迅速地跳下雪橇，歡歡喜喜地揮着手，——

孩子的活潑和快樂流進了窩棚……

後來他又開始低聲地咕嚕了。

我對他敘述了塔塔林諾夫船長的事跡，並且向他講解了已去世的克里莫夫的日記對於這件事情有什麼意義。所以，每次當我又辨認出一頁日記，來到醫生這兒的時候，沃洛嘉隨着也就出現了。他聽着我們談話，臉色那樣激動，醫生就不禁要同我交換一下眼色，然後愛撫地擁抱他的肩膀。毫無疑問，他為了這支探險隊不止寫過一首詩，這麼一來，塔塔林諾夫船長的一生就不仅仅是被描寫在散文中了。

醫生對航海長所寫的病狀很感興趣，首先是腿腳失靈，然後是發音不清，最後是原因不明的暴死。於是沃洛嘉聯想到司各特船長的伙伴歐文斯就是患這種病死的。

“司各特寫道，這種病能使最強壯的人喪命，”沃洛嘉紅了紅臉，說道。“他想這是一種神經病。”

不過特別使他驚奇的還是我的推測：這條帆船載着已經死去的船員，還可能停在某一個荒島附近的冰雪中。他剛想問什麼話，可是又不說了，只是孩子氣地張着嘴，臉上，頰上甚至脖子上都興奮得起了一層雞皮疙瘩……

這家的主要人物自然還是安娜·斯切潘諾芙娜。大家都聽她的話，就是連什麼人的話也不聽，見着醫生總是帶着責備的神情叫喊“啊，啊，啊”的貓頭鷹也聽她的話。難怪涅涅茨人對醫生說：“啊，有那么個大婆娘真好。”她能令人肅然起敬。不仅仅是在家里，就是全城的人都聽她的話。

她出身於一個有名的航海家庭。她的父親，叔叔，幾個兄弟

都在海船或是江船上作船长。有时在喀拉季——北地城称八九月为喀拉季，因为到这个时期，我們的破冰船就要引导苏联和外國的輪船通过喀拉海，——这些兄弟和叔叔們就到他們家里来。他們也都和安娜·斯切潘諾芙娜一样，身材高大，結实，大脸，大鼻子，滿脸鬍子。

安娜·斯切潘諾芙娜对于塔塔林諾夫船长的事件是从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来看的。

“女人真是不幸！”虽然談話中并没有关于妇女的事，可是她却說道。“今年盼，明年盼，也許他早就死了，連一点痕迹也沒有留下，可是她們还是在等待着，在期望着：也許会回来的！这些夜晚都是睡不着覺的！还有孩子噢！怎么对孩子們說呢？然而这些痴情都是沒有指望的，倒不如自己死了的好。不，你們甬对我說了，”安娜·斯切潘諾芙娜使劲說道，“这些事我都亲眼見過。这样的人假若回来了，当然是英雄罗，还有什么好說的。那么她呢，当然也就成了女英雄了！”

9 “我們仿佛見過面……”

沃洛嘉在早上七点鐘駕着雪橇来接我，睡梦中听見他在下面喝斥他的两只拉前套的狗卜西卡和托加。昨天晚上我和他約好一起去国营动物农場，他突然建議坐狗拉的雪橇去。

“它們只是还不会轉弯，”他一本正經地說道，“拉是拉得很好的。到了轉弯的时候，我自己下来轉弯。”

我起先反对，認為毕竟穿滑雪板更好一些，可是沃洛嘉却为自己的狗对我見怪了，我也就只好同意。

“媽媽可以作証，”他很严肃地說道，“走直路时，它們拉得很好。”

我們坐上了雪橇后，他象个道地的涅涅茨人一般，精神勃勃地吆喝了一声“海斯！”——狗就狂奔起来。哦呀，碎雪直往脸上打，眼睛刺得生痛，气也喘不过来了！雪橇在雪堆上顛簸起来，我一把抓住沃洛嘉，但他詫异地回头看了看。我只好放开他，便开始在几根小皮带上一起一落地跳起来；这几根皮带在我看来，实在是勒得太松了。

我心里想，最好是走慢一些，但这哪能行！根本沒有考虑的余地！沃洛嘉威胁地举起木棒，大声地吆喝着他的狗，因此它們奔跑得愈来愈快了。当然，我完全可以招呼沃洛嘉，讓他稍微把狗勒一勒，不过这样作等于是他要他永远瞧不起。也許我还是喊他一声的好吧——这該死的雪橇在雪堆上顛簸得实在太凶了！但就在这当兒，沃洛嘉回头看了看我，他的脸那么紅潤，幸福，大耳帽雄糾糾地歪在一边，于是我決定把身子趴下去，任他摆布了。

突然！狗就象被釘住了似的站下了，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会在雪橇上坐得那么稳沒有摔下来。什么事兒也沒有发生！原来是到該轉弯去普罗托卡的地方了，所以沃洛嘉勒住了狗，准备改变方向。

我記不起一路上发过多少次誓，以后再也不坐狗拉的雪橇了，——大概到国营养兽場那个島轉了多少个弯，我就发了多少次誓。可是沃洛嘉却高兴到了极点。

“真的，好极啦，是嗎？”

我只好承認“好极啦”。

普罗托卡終於到了！我們鑽过灌木丛，从岸上滑下去，一蹦

一跳地在冰上奔馳。現在我完全相信沃洛嘉的狗在走直路时的确拉得很好。它們每一分鐘都在适应着道路的情况，躲开冻实了的不平的冰块；沃洛嘉吆喝着，咒罵着，喉嚨几乎都要喊破了。幸而对面河岸很陡，所以狗自然也就跑得慢下来了。

但是經過普罗托卡时狗又加快了速度，开始汪汪地叫起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好象是在互相呼应，突然从樅树林后面传来一陣不協調的嚎叫声，这声音开始很远，后来便愈来愈近了。这是一种拖得很长的粗野杂乱的嚎叫声，听到这种声音，不禁心都要收縮起来。

“沃洛嘉，打哪兒来的这么多狗啊？”

“这不是狗！这是狐狸！”

“它們为什么也会叫呢？”

“它們同狗一模一样！”沃洛嘉回过头来，嚷道。“它們会叫！”

当然，我也曾見過玄色的狐狸，可是沃洛嘉却說这个养兽場养着銀黑色的，說这完全是另外一种。全世界上再沒有哪兒有这种狐狸了。一般認為白尾梢就很好看了，可是这个养兽場还在尽力培养連一根白毛都沒有的狐狸。

总而言之，他的話确实引起了我的兴趣，十五分鐘以后，我們到了养兽場門前，肩上荷枪的警卫員告訴我們說，养兽場不开放，因此，我感到十分懊喪。

“那么是干什么用的？”

“供科学研究工作用的。”警卫員开导說。

我差点兒沒有說我們就是来研究科学的，但我看了看沃洛嘉，就及时地忍住口不再往下說了。

“可以見場长嗎？”

“場长外出了。”

“誰代理他？”

“专家組长，”警卫員說話的那种神气，好象他自己就是专家組长一样。

“好极了，我們就是要找他！”

我把沃洛嘉留在門口，便自己进去找专家組长。

显然农場的人并不太多，所以在复盖着白雪的寬大的院子里，仅有一条狹窄的小径通到警卫員指給我看的那座房屋。从老远看見这座房屋，就使我想起了瓦里亚·朱可夫曾經把他的嚙齿动物指給我們看，想起了莫斯科动物园里那所肮脏的綠色实驗室，只不过那所实驗室比較大一些。这种相似的感觉是那么的强烈，我甚至覺得已經聞到那种令人作呕的老鼠气味了。我抖掉了毡靴上的雪，推开門，走进了一間大而低的屋子，这間屋子又通着一間更大的屋子。在那間更大的屋子里，有一个人坐在桌边。我甚至覺得这个人就是瓦尔加，——虽然在最初的一刹那間因为雪耀得眼睛发了花，还不能看清楚他，同时又因为他一看見我就背着窗戶站起来了。我覺得这个人看我时的那种神情和瓦尔加完全一样，也是那样善良和稍微有点兒神經質的样子，覺得他的額上也有象瓦尔加那样的黑絨毛，只不过更密更黑一些罢了。我并且覺得他馬上就要用瓦尔加的口吻問我：“您有什么事？”

“瓦尔加！”我叫道。“真是你嗎？瓦尔加？”

“什么？”他不知所措地問道，并且象瓦尔加一样把头歪在一边。

“瓦尔加，畜牲！”我說，我感覺到自己的心开始劇烈地跳起来。“你怎么啦！真的不認識我了嗎？”

他犹犹疑疑地笑了笑，把手伸給我。

“不，哪能，”他的声音有点做作，說道。“我們好象見過面。”

“好象！我們好象見過面！”

我拉着他的手，把他拖到窗戶跟前。

“好好看看！你这条牛！”

他看了看，犹疑不定地笑了。

“見鬼，难道你真認不出来了嗎？”我惊异地說道。“这是怎么回事呢？也許是我弄錯了？”

他眼睛一眨一眨的。随后，脸上那种疑惑不定的神气便消失了，这下子可真变成了瓦尔加，那个真正的瓦尔加了，决不能再把他和世界上別的人弄錯了。同时我大概也更变得象我了，所以他終于認出了我。

“薩尼亚，”他大喊了一声，气都喘不上来了。“是你嗎？”

我們接了吻，立即拥抱着走出来，走到門口，他又吻了我一下。

“原来是你？真見鬼！好小伙子！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不是来的，是住在这兒的。”

“是住在这兒？”

“很简单，我住在这兒已經半年了。”

“慢一点兒，这是怎么的？”瓦里亚喃喃說道。“对了，我很少进城，要不然也就会碰見你了。噢，半年！真有半年了嗎？”

他把我帶到另一个房間；这个房間和我們剛才所在的那个房間毫无区别，只是这个房間里有一张床，牆上还挂着猎枪。那

是办公室，这是寝室。附近还有一个实验室，关于这一点是不难从屋子里的那股气味猜到的。这种动物的气味和瓦里亚，和他那失神的眼睛，和他那蓬松的头发，和那颧上的绒毛这样调和，使我不禁感到好笑。瓦里亚的身上总有一股味儿。

在这一套有三个房间和一个厨房的大屋子里就住着他一个人。因为他是专家组长，照编制他应该有这么一套使他不知怎么办才好的空荡荡的大房子。

我忽然想起沃洛嘉还在大门口等着，瓦里亚派了个专家助理去找他。这位助理的年纪却比瓦里亚大了足有三十岁，是一个留着鬍子的，鼻子特大，气派十足的男子。不过他给沃洛嘉的印象显然很好，所以半小时后他们亲热地谈着走来，沃洛嘉说巴维尔·彼得罗维奇——这个男人的称呼——答应带他去看狐狸的厨房。

“喂的也是狐狸的饭，”巴维尔·彼得罗维奇说道。

“我们今天都有什么？”

“番茄和麦片粥。”

“带他去看看‘热带的丛林’，”瓦里亚说道。

沃洛嘉脸红了，他听见这句话以后，好象呼吸都停止了。当然啦！“热带的丛林”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地名哟！

“巴维尔·彼得罗维奇，我可以先到‘热带的丛林’去吗？”他低声问道。

“不，先到厨房去，要不然我们就会错过早餐了！”

他们走后，剩下我和瓦里亚两个人。他忙着款待我，沏了茶，又从厨房里端出点心来。

“这是我们食堂里作的！不坏吧？”

点心也带着一种野兽的气味，我尝了一口，便模仿过去我们

兒童教養院的炊事員彼佳大叔的口吻說道：

“啊！有毒！”

瓦里亞幸福地笑了。

“他們現在都在哪兒？丹卡·薇莉琪珂在哪兒？格里沙·法伯爾呢？伊萬·巴甫雷奇在哪兒？他怎麼樣？”

“伊萬·巴甫雷奇還不錯，”瓦里亞說道，“我曾經去過他那兒。他還打聽過你呢。”

“啊？”

“我說不知道。”

“是啊，你當然不知道羅！可是在莫斯科的時候誰給你挂電話來着？他們轉告你了嗎？”

“轉告我了。可是他們告訴我說是個飛行員，我那時候還不知道你是飛行員。”

“你盡撒謊！你怎么到這兒來了？”

“我嗎，——你是明白的，我想出了一種很有意思的東西，”瓦里亞說道，“用這種東西能使它們長得很快。”

“使誰？”

“狐狸。”

我不禁笑了起來。

“又是血液隨年齡而變化？”

“什麼？”

“毒蛇的血液隨年齡而變化唄，”我鄭重其事地又說了一遍，“這也是你想出來的玩意兒。見鬼，我見着你真是高興極了！”

我的確是很高興，從心眼兒里高興！我和瓦爾加向來很要好，可是我們那時並不知道，經過了若干年之後，當昔日的生活

似乎已忘掉了大半的时候，我们会突然意想不到地会面——这是多么快乐的事啊！

我们谈到了柯拉布略夫，但这时瓦里亚想起他应该去给小狐狸吃药了。

“你吩咐别人去吧！”

“不行，你是明白的，我得自己去，亲自去喂，”瓦里亚放心不下地說道，“这是一种软骨病，因佝偻病而引起来的，你等我一会儿好吗？我很快就回来。”

我不愿意和他分开，于是我们便一块儿去了。

10 晚 安！

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沃洛嘉才从“热带的丛林”回来，原来这是养兽场里划出来的一块森林区，野兽在这儿可以自由地生活。最使沃洛嘉惊奇的是狐狸居住的那些小房子。

“真了不起呀，”沃洛嘉说，竭力不显出他兴奋到了顶点的样子。“它们的生活完全和人一样。吃早饭，饭后休息，休息以后小家伙作游戏，大的就各处去串门子。”

瓦里亚劝我留在他那儿住宿，我们就挂电话告诉医生，让沃洛嘉一个人先回去……

北地城是个嘈杂的城市。城内交通虽然不算拥挤，只是偶尔有几辆汽车，鹿车，马车和狗拉的车同时在街上竞相奔驰，但总还是嘈杂的城市。声音最吵闹的是木材厂里的电锯。这种一声比一声紧的吼叫声日以继夜地萦绕在耳边，最后你就不去注意它了，然而脑子里总觉得远处有一个电锯不断的响着。

可是在国营养兽場这兒却非常幽靜。我們在林子里散步，遇見了巴維爾·彼得羅維奇；他正在安置捕鵲鶉的网子，我們便和他閑談起來，談到森林，談到喀拉季，談到天氣，談了很久。

“瓦連金·尼古拉耶維奇^①，您怎麼樣，今天夜里把唐·卡尔勞斯帶到您那兒去嗎？”他問道。這樣一位上了年紀的，可尊敬的大鼻子男人居然稱呼瓦里亞為瓦連金·尼古拉耶維奇，而且那麼恭謹地和他說話，就好象是同一位真正的專家組長談話一般，這實在很可笑，也很使我高興。唐·卡尔勞斯是一只小狐狸的名字，這小家伙很怕冷。

後來我們又回到瓦里亞的屋子里，每人喝了一小杯酒。他對我說，的確他這半年來差不多沒有出過養兽場一步。他有一項很有趣的工作：他正在解剖黑貂底胃囊，研究它們吃什麼。有幾個胃囊是他自己的黑貂身上的，另外二百來個是承某禁猎區的盛情供給他使用的。他發現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制作小型皮毛時，應該珍惜金花鼠，因為黑貂主要就是吃金花鼠的。

我一声不响地听他說。在這空蕩蕩的房子里就只我們兩個人。這個房間也是非常空，單身漢住着一個大而无當的房間。

“是呀，很有意思，”等瓦里亞說完了以後，我說道。“這是說，黑貂吃金花鼠。了不起！可是對你來說，你知道最需要什么嗎？你知道你迫切需要什麼嗎？結婚！”

瓦里亞眨了眨眼，接着笑了。

“你为什么这样想呢？”他猶豫不決地說道。

① 瓦連金·尼古拉耶維奇是瓦里亞的名字和父名在一起的稱呼。通常對年長，比較有威望的，或不太熟識的人才將父名連在一起稱呼。——譯者注。

“因为你这种生活，簡直同狗差不多。你知道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老婆嗎？應該是一个能够将夹肉面包給你送到實驗室里，同时并不十分要求你对她关心的女人。”

“看你說的，”瓦里亚低声說道，“这有什么呢！时候到了，我自然会結婚的。我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作好論文答辯，然后我就輕松自由了。我現在不是很快就要回莫斯科了嗎。可是你呢？”

“我怎么？”

“你为什么不結婚？”

我沉默了一会兒，然后回答道：

“唔，我是特殊的一类。我的生活情况不同。您想，象我这样的人，今天这兒，明天那兒，天南海北沒有一定归宿，我不能結婚。”

“不，你也需要結婚了，”瓦里亚反駁道。“喂，”瓦里亚突然兴奋地說道，“你記不記得，你們有一次到动物园来找我的时候，卡佳是和她的女朋友一块兒来的吧？她叫什么来着？那个身材高高的，留着两条辮子的姑娘。”

他的脸色显得那么善良，天真。我瞧了瞧他，不由得笑了起来。

“怎么能不記得呢！琪玲！很漂亮，是不是？”

“很漂亮，”瓦里亚說道。“很漂亮。”

他想讓我到他的床上睡，可是我沒有讓他这样作，就睡在地板上了。虽然这兒空床有的是，不过我向来就喜欢睡在地板上。高高的草褥子一响，我叫了一声：“啊哟”，瓦里亚立刻不安起来，以为我不舒服。其实我很舒服——从下面往上看可以看見天空，天空是那樣的幽靜，仿佛周围也是森林，也鋪滿了白雪。一

面仰視着天空，一面談話多么愜意，簡直不想睡覺了。

我們什么都談到了！我們甚至回憶起了瓦里亞那個以二十戈比賣給大學的刺猬。後來我們又回到柯拉布路夫身上。

“你知道，”瓦里亞突然說道，“當然，也可能是我錯了，我覺得他是有点爱上了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你認為怎麼樣？”

“也許。”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有一次我到他那兒去，看見桌上有一張她的相片。我是去問他一件事情的，因為剛好我準備第二天到塔塔林諾夫那兒去，所以他便突然談起她來了。後來他沉默下來了，但臉上的表情是那樣……我斷定这里面有點兒不妙。”

“瓦爾加，去你的吧！”我氣憤地說道，“說實話，我真不懂，你是住在天上，還是住在什麼地方。哼！他是有点爱上了她！他沒有她就活不下去！這事的全部經過不都是你眼看着發生的嗎？唉，也難怪，你那時正在研究毒蛇，這倒也是可以理解的。”

“你說什麼！原來他是一個可憐蟲！”

“不錯，他是一個可憐蟲。”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過後我問道：

“你常常到塔塔林諾夫家去嗎？”

“不常去。去過兩三次。”

“他們的生活怎麼樣？”

瓦里亞用手肘撐着抬起身來，似乎是想在黑暗中仔細看看我，雖然我說這話時聲調十分平靜。

“沒有什麼。尼古拉·安東內奇現在當教授了。”

“哦，这样！他教什么呢？”

“教育学，”瓦里亚說道。“請你相信我的話，他是一位很受尊敬的教授……总之……”

“总之什么？”

“据我看来，你把他看錯了。”

“真是这样嗎？”

“是的，是的，”瓦里亚深信不疑地說道，“你把他看錯了！比如說，你看看他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学生吧。他簡直准备为他們赴湯蹈火。羅馬什卡对我說，去年……”

“羅馬什卡？这家伙又从哪兒来的？”

“怎么哪兒来的？就是他带我到塔塔林諾夫家去的。”

“这么說，他也常常去塔塔林諾夫家去？”

“他？他是尼古拉·安东內奇的助教。他每天都到那兒去。总而言之，他是他們家里最亲近的人了。”

“慢着，你說什么？我不明白。是說羅馬什卡嗎？”

“是呀，”瓦里亚說道，“不过現在誰也不这样叫他了^①。并且照我看来，他打算和卡佳結婚。”

仿佛什么东西对着我的心口撞了一下，我盘着腿坐了起来。瓦里亚也从床上坐起来，瞅着我直发楞。

“什么事？”他問道。“唉！活見鬼！我完全忘了！”他嘟嘟囔囔地說道，然后张惶失措地向周围望了望，从床上爬了下来。

“并不是打算……”

“別这样，你最好还是把話說完，”我完全心平气和地說

① 因为羅馬什卡是羅馬紹夫的卑称。——譯者注。

道。

“怎么說完!?”瓦里亚嘟嘟囔囔地說,“我什么也沒有对你說。只不过这么想,但是我想的事多着呢!有时候,我脑子里产生的某些想法,連我自己都感到惊异。”

“瓦里亚!”

“我真不知道,”瓦里亚急的不得了的样子說道。“你糾纏我干嗎!我只不过是感觉,可是有时候,鬼才知道我感觉些什么。你可以不必相信我——这不就得啦!”

“你是感觉羅馬紹夫想和卡佳結婚?”

“不是,你这个鬼家伙!我对你說,不是!根本不是那么一回兒事!他現在穿戴講究起来了,不过就是这样罢了。”

“瓦里亚!”

“我向你发誓,再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和你談过嗎?”

“談是談过。譬如,他說过他从十三岁就开始攢錢,可是現在想不到半年以內都花光了——照你看来,这也有关系,是不是?”

我再也沒有听見他說些什么了。我躺在地板上,仰望着天空,我觉得我是躺在一个可怕的深渊里,全世界的人都在我头上喧嚷,交談,而我却一个人躺着,沒有人对我說一句話。天空仍然漆黑,星星还在眯着眼睛,不知从哪兒射来了一綫微弱的,遙远的亮光,我想,我們已經談了一夜,这下子总算談出个名堂来了!

“晚安!”

“晚安。”我机械地答道。

我真不如同沃洛嘉一起走了的好!一个什么东西堵塞住了

我的咽喉，我很想起来到外面去走一会儿，但我还是躺着，只翻了一下身，用手捧着脸趴着。啊，原来这样！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不过这件事已经是一分钟也叫我忘不了了。难以令人相信的只是罗马什卡这个人，我不能想象他和卡佳在一起的情形。可是为什么我会以为她直到现在还惦记着我呢？我们不是很多年没有见面了吗！

我躺着，脑子里想啊，想啊，什么都想到了，总之，不只是想这一件事。我想起瓦里亚不喜欢夜里有人盯着他，有一次，柯拉布略夫同他开玩笑，问他：“要是有人用充满爱情的眼睛看着你呢？”后来我才觉得，原来我又在想卡佳，我突然那么真切地回想起——不是回想起她，而是想到当我看见她时常常感受到的那种微妙的心情。这时，我在世界上最大的希望就是赶快睡着。可是我不但不能阖上眼，甚至不能把眼光从天空移开，眼巴巴望着天空慢慢地，但总算是开始放亮了。

瓦里亚睡着了，我要是出去的话，也许他会醒来。但是我不想再和他多谈话，因此我趴了好半天，然后又仰过来躺着，然后又用手捧着脸趴下。

后来，大概已是早上七点钟左右，电话铃响了，瓦里亚跳起来，睡意犹浓的样子，拖着被子，跑到隔壁房间里去了。

“喂，是我！”过了一会儿，他回来说道。“是找你的。”

“找我？”

我披上大衣，跑到电话机旁。

“萨尼亚，”这是医生在讲话，“你跑哪儿去了？我现在在州执委会。我现在让别人和你说话。”

“好的，我听着，”我说道。

“格利高里耶夫同志吗，”换了另一个人的声音，这是内务

部人民委员会駐北地城的全权代表。“有一件急要的事。請您馬上同巴甫洛夫医生飞到万龙坎屯去。你知道列德可夫嗎？”

誰不知道他呢！他是州执行委员会委員，是北方最受人景仰的一个人。誰都知道他。

“他受伤了，需要急救。您什么时候可以起飞？”

“一小时以后，”我回答說。

“医生，您呢？”

我沒听見医生是怎样回答的。

“工具都妥当嗎？那太好了，一小时以后，我在机場等您。”

11 飞 行

三月五日早晨，我們从北地城起飞，航向东北，乘飞机的人员是：样兒挺着急的医生，他戴着黑眼鏡，大大地变了样子；我的机械員卢利，他無論是在北地城，或在其他任何地方，只要呆上那么三、四天，就会成为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最后还有我。

这是我在北极的第五次飞行！但飞到从未見過飞机的地方去这还是第一次。万龙坎屯是皮亚辛河支流上的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不过医生到过皮亚辛河，他說要找万龙坎屯并不困难。

州执行委员会委員受了伤。这事是发生在打猎的时候，不过也可能不是在打猎的时候。总之內务部人民委员会全权代表請我們，也就是請我和医生，查明这件事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我們應該在三点鐘左右，即天亮的时候飞到万龙坎。为了防备不虞起見，我們携带着够三个人吃三十天的粮食，汽爐子，信号枪和信号弹，步枪及子弹，鏟子，帐篷，斧头。

关于天气情况方面，我只知道一点，就是北地城的天气很好。可是航綫上的天气怎样我就知道了。至于“詢問”天气的工作，現在既沒有時間，這兒也沒處可問。

就这样，一切都妥当了，我們从北地城起飞，航向东北。所謂一切都妥当了，是說我再沒有去想昨天晚上从瓦里亚那兒听到的事。下面是叶尼塞河——一条廣闊的銀白色的帶子夾在白色的河岸中間，沿岸森林綿延，时而向河岸逼近，时而又远远地离开。因为昨夜失眠，我的头稍微有点兒疼，有时还发生耳鳴。这种不正常的声音只是在耳朵里响，发动机工作还是好的。

后来我离开河流飞行，冻土帶便开始了——平坦无边，白茫茫的雪地上沒有一个黑点，沒有任何能吸引住視綫的东西……

我再沒去想这件事了，虽然我現在的思想里不住地想动弹，就如同作噩梦想醒过来的时候一样。为什么我这样自信，認為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呢？上次她請薩尼亚向我問好时，我就應該写封信給她。但在我尚未能証明我在她面前沒有任何錯誤的时候，我不願意对她表示任何讓步。然而一个人無論什么时候决不能过于自信，以为別人愛着你，以为別人無論怎么样都总是在愛你，甚至再过上五年或者十年，仍然會不變心地愛着你。

無論向哪里望去都是一片茫茫的白雪。前方有云，我連忙爬高，鑽入云层。在这无边无际的，淒涼的，白茫茫的，破坏了远景真实的背景上空與其說是飞行，还不如說是盲目飞行更好一些。

虽然我对羅馬什卡並沒有有什么特別的仇恨，不过，如果他現在在這兒的話，我还是會把他揍死的。我不特別地仇恨他，是因为我覺得，这样一个头上生着獺猫般蓬松的头发，通紅的耳朵，从十三岁起就想發財，攢錢，成天數算着金錢的人会和卡佳在

一起是不可能設想的！他这种妄想就如同他想要变成另外一个人——不是他自己，而是象卡佳那样正直和秀丽的人同样的荒謬。

我們穿过这块云层，飞进另外一块正在落雪的云里去，下面有一个地方在太阳照射下閃閃发光，但烏云遮住了太阳，使我們看不見它。

我的脚冻僵了，我后悔沒有穿那双較寬大的飞行靴，偏是穿了这双小的。

这么說，决定了，我要去莫斯科。不过須要事先通知她一下說我要去。我應該給她写封信，使她看了以后再也忘不了的那么一封信。

我們飞出了烏黑的云层，同平常飞出云层时一样，覺得太阳特別光耀刺目，——可是我始終不能决定怎样开始写这封信，开头只簡單地写“卡佳”呢，还是写“亲爱的卡佳”。

“我們很久沒有通信了，卡佳，当你看見这个签名时，大概会感到詫异。你生活好嗎？因为我想你还在生我的气，所以很久也沒有給你写信。当然，你沒有錯，我們很久沒有見面，这是我的不对。我从恩斯克回来就應該到莫斯科看你，不應該象我十八岁时那样在你家門前徘徊……”

忽而我又忘了写信的事。我那次應該乾脆把她帶走；因为我很清楚，她不應該留在那个充滿虛伪的不幸的家庭里，和她信任的那个可怕的伪君子尼古拉·安东內奇攪在一起。

前面是山！这些山突出在云层之上，享受着阳光的照耀，有的光秃秃的，有的复盖着刺目的白雪。我从鏡子里看見卢利举起一只手，好象是向它們問好，并对医生大声喊叫，医生无动于衷地点了点头。他的样子很可笑，仿佛是一个滾圓滾圓，十分滑稽

的大动物。

在疏疏落落透过云层的光綫照耀下，可以看見地面的峽谷，长长的，蜿蜒在地面的峽谷真是美丽极了，我无意中想到，要是在这兒迫降那可是准死无疑的。后来又开始思索写信的事，一直考虑到我不得不去作另外的，更急要的事情时为止。

当最初几块庞大的，带雪的乌云离开了山峰，翻滾着愈升愈高的时候，仿佛还没有什么风意。

驀然間，鏡子——我刚刚在里面看見医生和卢利的鏡子变暗了，結上了冰。又过了十来分鐘，情况就变得不可想象了，很难想象我們的头上刚才还是太阳和晴空，現在却既看不見地面，也看不見太阳，又看不見天空了。一切都变了。狂风追上了我們，起先是从左面扑来，然后又迎面扑来，然后又从左面扑来，所以我們一下子就被抛到了一边。这兒也有大霧，同时还下着碎小而坚硬的雪花，打在脸上十分疼痛，雪花很快就粘在衣服的折縫里。接着天就黑了，我再看那面鏡子时，里面什么也沒有了。周围什么也看不見，我在无底的黑暗中駕駛着飞机飞行了一些時間，疾风从四面八方吹来，风助雪威，形成了一堵一堵真正的雪墙，我就象是在往这些风雪构成的墙壁上硬撞。有时我穿过它們，有时避开它們，有时我又穿过它們，有时又落到它們下面很远的地方。飞机突然那么向下猛落一、二百公尺。这是十分可怕的事，因为我不知道这些山究竟有多么高，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地图上沒有这些山的标高。我現在唯一所能作的，就是来一个一百八十度轉弯，飞回叶尼塞河去。一看見河岸，就沿着陡高的河岸飞，这样我們就可以繞过暴风雪，或者迫不得已时返回北地城。

轉弯！說起来倒容易。当我蹬左舵的时候，飞机竟无缘无

故地突然震动起来，于是我們又被抛到了一边去，不过我还是繼續轉湾。似乎我还对飞机說了几句什么話。就在这个时候，我感觉出发动机有点不妙，不幸的是下面正巧就是已經远远落到我們后面去了的，刚才还引起过我的戒心的那种峡谷。它們一閃就不見了，后来又一閃，这下子可就綿綿不断，使人感到毫无希望了。如果我們摔在这里，誰也不会找到我們，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應該赶快离开这些峡谷，飞机在空中忽兒被掂起来（該死的暴风雪仿佛在考虑怎样捉弄我們，）忽兒又随心所欲地晃蕩着乱飞一通。我終于飞离了峡谷，但发动机的情况还是有点不妙，所以不得不降落。着陆的时候必須尽量的慢，随时注意轉弯傾斜仪，不可带有任何傾斜，随时考虑下面的陆地；因为陆地虽說是在下面，但并不清楚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样子。这些注意事項象个鐘表似的不断地在我脑子里敲着，我大声和自己，和飞机說話。但我这时并不害怕。我只記得，当一大块什么东西紧挨着在飞机旁边掠过去的刹那間，我急出了一身大汗，我連忙閃到一旁躲过了它，机翼差一点儿擦到地面上。

12 暴风雪

我不准备叙述我們在离皮亚辛河岸不远的冻土带度过的那三昼夜了。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回忆之一，而且最主要的是，这是一种千篇一律的回忆。这一个鐘头和另一个鐘头相似，另一个鐘头又和第三个鐘头相似；所沒有重复的只是最初几分鐘，因为这个时候我們必需想办法把飞机固定起来，不然它就会被暴风雪卷跑。

諸位不妨也試一試在沒有一草一木的冻土地帶，風力達到十級的時候把飛機固定起來的滋味吧！我們沒有關閉發動機，使機尾向着風。也許我們能夠把飛機埋起來吧，可是只要鏟子一動，雪就立刻被風卷走了。飛機繼續猛烈地搖晃着，風勢愈來愈猛，應該趕快想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來，否則再過半小時就晚了。這時我們就作了桩很簡單的工作（建議北極飛行員作參考）：我們把繩子拴在機翼上，然後再把滑雪板，皮箱，裝着東西的箱子，甚至漏斗——總而言之，所有能使雪迅速堆積起來的東西拴在繩子的另一端。十五分鐘以後，在這些東西周圍就積成了雪堆，而在機身下面其它的地方，雪依然被風不斷地卷走。

現在我們除了等待之外，就再沒有別的事兒了。等待是件很不愉快的事，然而這是留給我們唯一可作的事。等待，等待，可是等多久呢，誰也不知道！

我上面已經提到過，所有供強迫着陸後需用東西我們都帶得有。可是，如果就連從座艙里爬出來一下都那麼困難和痛苦，一天只能出來一次，而且只是因為一天里不得不爬出座艙一次的緣故，那麼你還想作什麼其它的，比如說搭帳篷之类的事那怎麼成呢。

蒙布上的繩子還沒能解開，手指已經凍疼了，因此只好分三回來解它。風刮得使人一步也邁不動，因此，我們只好創造出一種特殊的走路方法——作四十五度的彎腰，頂着風走。

第一天這樣過去了。身上的熱量減少了一些。我們更想睡覺了，为了不致于睡着，我想盡各種辦法消磨了許多時間。不過這些辦法作用都不大。例如，我試着點汽爐子，又命令盧利點噴燈。這些任務真是够困難的！當你每一分鐘都感到自己從頭到腳渾身的皮膚似乎都暴露在外面的時候，當你的耳朵深处也突

然寒冷起来，鼓膜似乎要冻僵了的时候，当雪花轉瞬間就扑滿了脸，很快就結成一个冰面罩的时候，要点起汽爐子来实在是困难。卢利想講点笑話，可是在零下五十度連笑話也結冰了，他沒有别的办法，只好把自己会在任何場合，任何时候說笑話的本領拿来当作笑柄了。

第一夜这样过完了。热量又减少了一些，更加想要睡覺了。雪仍然从我們身旁扫过，最后甚至令人觉得，仿佛全地球的雪都从我們身旁飞过去……

在我們所謂“蟄居”于皮亚辛河畔的这些日子里，我对医生有了进一步的認識。

感到自己完全无能为力，意識到逃出絕望的境地已經毫无可能，这是最可哀的事了！如果我的身体不是那么健康和結实，心情似乎还会輕松一些。这些感想同另一种不愉快的想法——沒有完成这次責任重大的任务的想法掺杂在一起，再加上和第三种与誰也不发生关系的感情——自尊心受了侮辱和委曲的感情攪合在一起，这就是我当时的情緒。在这样的心情下，吃东西也沒滋味了，老实說，就是冻死也不是那么可怕的事了。

这些情况医生都明白，也都看出来了！我有生以来不曾受到过这样精細的照料。他对我的每一种想法和感情都能对症下药，甚至对于那种和誰也不发生关系的感情似乎也有药方。

第三天。很想睡覺。热量愈来愈少。皮袄愈发潮湿了，你只要一想到这种潮气可能冻冰，立刻就神經过敏地感觉有种寒冷直透骨髓。

我們不得不时常将皮袄里面的冰敲掉，这样也許倒好一些，因为只是那么枯坐着，胡思乱想，沒止境地胡思乱想实在太苦悶了。后来身上的热量愈来愈少（毫无办法，冷风不断地吹去热

气)，我于是把飞行手套穿在脚上，然后再套上飞行靴。最主要的是坚持不要睡觉。最主要的是别讓空勤机械員睡着，他在我們当中样子最壮健，但实际上却是个草包。医生不时地拍一拍他，讓他振作振作。后来医生自己也打起瞌睡来了，現在只好由我不时很客气地，但毫不放松地推一推他，讓他振作振作。

“薩尼亚，沒有的事兒，我根本不想睡，”他用力睜开眼睛，喃喃地說道。

不过我却是再也不想睡了。风吹着雪在耳边呼啸，有时又是片刻的寂靜，而这种顫动的寂靜似乎比那阴慘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空嚎更为响亮。在遙远的地方，迪克逊，北地城的无綫电报务員正在談論着我們：

“他們在哪兒？飞过某地了沒有？”

“他們沒有飞过。”

枯坐靜候，等待這場暴风雪結束，这是非常无聊的。最后，我想起我还有一本書。我把皮袄捆在膝盖稍上一点兒，連头帶手一起鑽了进去。這間“小屋”实在太狹窄了，不过，如果左手拿着手电筒举到耳根以上，右手拿着書，还是可以讀的！我的手电筒是帶小发电机的，要它发亮就需用手指不断地工作；不过手指不断地工作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一松手，立刻就冷清起来，一切仍然恢复原状，我又开始感到雪花透过座艙縫隙吹在我的身上。

若干年后，当我讀了斯梯芬逊著的“好客的北极”之后，我才明白这么久不睡觉是錯誤的。不过那时我还是个沒經驗的北极飛行員，所以会以为在那种情况下睡觉就等于送死。

我大概終究还是睡着了，或者是沒有睡着产生的一种幻覺。我覺得自己是在一个十分狹小的箱子里，在地下很深的地方，因为我清晰地听到了上面街市的嘈杂声，电車的鈴声和轟隆轟隆

的声音。这些幻觉并不很可怕，但我总感到很懊恼，因为我現在躺在这兒，手脚都不能动弹，然而我連一分鐘的空閑時間也沒有，須要赶紧飞到某个地方去。后来我又糊里糊塗地到了街上，站在灯光輝煌的一家商店的窗前，看見卡佳在商店里迈着均匀安詳的步子来回走着，可是她竟連看也不看我一眼。毫無疑問，这是她。虽然我有点害怕不是她，或者虽然是她，但却有人来妨碍我和她說話。于是我赶忙向商店里跑去，但是剎那間什么都沒有了，黑洞洞的，只見玻璃門上写着“閉店”两个字。

我睜开眼睛，但是因为覺得剛才看到的事情那么甜蜜，所以又忙把眼睛閉上了。这时暴风雪已經平息。雪靜靜地躺在大地上，也不再使我們头昏目眩了。在白皚皚的雪地的上空是太阳和蓝天，天空如此辽阔，只有在海洋上和冻土带才能看到。在这万里晴空和茫茫雪地上，距离飞机二百步左右站着一个人。他手里拿着一条赶鹿用的长竿子，背后，站着几头套在雪橇上的牡鹿。远处可以看見两座陡峭的小雪山，仿佛是用笔勾画成的，但并不十分明显。毫無疑問，那是涅涅茨人的窝棚，就是在着陆时吓了我一跳的那一大块黑东西。現在这些窝棚都被积雪埋起来了，只有上面开着口的錐頂黑糊糊的露在外面。窝棚周围站着一些人，大人小孩都有，他們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兒看着我們的飞机。

13 什么叫汽爐子

我从来沒有想到在爐灶旁边烤一烤冻僵了的腿也是一种幸福。然而这是真正的，什么也比不了的幸福！你能够感觉到暖

气怎样顺着身体上升，愈升愈高，终于不知不觉地，缓缓地温暖了你的心。

我再也没有感觉到什么，再也不想什么。医生在我的背后念叨了些什么，可是我沒有听，他嘱咐我用酒精擦腿，我根本没有理会。

爐灶上繚繞着冻土带特产的灌木的烟气，好象燃着的湿松枝冒出来的烟；我讨厌这种刺鼻的烟味，不过只要暖和就行。我会感到暖和，这几乎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

涅涅茨人盘着腿围坐在火旁，瞧着我們。他們脸上的表情很严肃。医生用涅涅茨話向他們解释什么事情。他們专注地听着，仿佛很懂的样子不断地点头。后来才知道，其实他們什么也沒有明白，医生恼恨地把手一甩，开始模仿一个受伤的人和一架前去救他的飞机。这情景实在是很好玩的，如果我能哪怕再支持一分鐘不睡就好了。他一会儿捧着肚子躺下，一会儿又举起双手，蹦起来向前猛扑。突然他回过头来很詫异地对我說道：

“怎么样！他們居然全知道。他們甚至知道列德可夫伤在哪儿。这是謀杀事件。他被人打了黑枪。”

他又講起涅涅茨話来了，我在睡梦中听到他是在問涅涅茨人知不知道刺杀列德可夫的人是誰。

“他們說：开枪的人跑回家去了。回家想去了。想一天，想两天，不过总是会回来的。”

現在不睡覺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眼前的一切忽然浮动起来，我感到好笑，因为我欣喜自己终于睡着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帐篷上的皮子被人掀开了一块，从这个亮得刺眼的三角洞往外看去，可以看見医生在一个地

方站着，涅涅茨人蹲在他的周围。再远一些还有一架飞机，这一切結合在一起使我想起一个熟悉的电影镜头，我甚至恐怕这个镜头会一闪而过。但这不是电影镜头。这是医生，他在問涅涅茨人万龙坎在什么地方。

“是那兒嗎？”医生一手指着南方，着急地問道。

“在那兒——在那兒，”涅涅茨人随声附和着說道。

“是在那兒嗎？”他指着东方。

“在那兒。”

后来涅涅茨人一致地指着东方，医生便在雪地上画了一幅巨大的北冰洋沿岸地图。但这也无济于事，因为涅涅茨人对于看地图就象看艺术作品似的一窍不通。他們之中有一个很年輕的人，为了表示他也会繪画，便在地图旁边画了一只鹿。……

首先应该作的一件事就是把飞机从雪里刨出来。要不是涅涅茨人帮助我们，我們永远也不能胜任这件工作。我生来还没有见过这样不象雪的雪！我們用斧头，鏟子去砍，用刀去剥。终于把最后一块雪砖剥碎了，抛到一边去，我推荐给北极飞行員的固定工事土崩瓦解了。所有的鍋子和水壶里都烧上了水，好用来起动发动机。那个在雪地上画鹿的年輕人現在被請来作我們的领航員，指引我們到万龙坎去的道路。他正在和哭得十分伤心的妻子告别，这位年輕的妻子也穿着鹿皮褲子，和男人不同的只是辮子上多了点花絨布条，这倒是很有趣兒的事。太阳从高絮云层中鑽了出来，这是好天气的征兆。医生正在給人点眼藥，我告訴他該“完事”了。这时卢利跑来告訴我說我們不能飞了。

起落架的一个支柱折断了。无疑問是在着陆时，我为了躲避窝棚猛然閃到一边去时弄断的。起落架这部份是由涅涅茨人从雪里刨出来的，所以我和卢利事先沒有发现。

从北地城起飞已经整整四昼夜了。不用说，大家已经在寻找我们；虽然暴风雪把我们刮到预定航线以外，可是最后他们还是会找到我们的。不过，谁又敢说他们一定能找到我们呢？说不定现在飞到万龙坎去已经迟了，或者飞去也只是运尸首了吧？

这是我在北极的第一次“战斗洗礼”。我突然恐慌起来，怕自己完不成任务，空着两只手回去。或者要象个无依无靠的小狗似的，被人在冻土带一架孤立无援的飞机旁边找到，那就更加可怕了。怎么办呢？

我招呼医生，请他把涅涅茨人都集合起来……

这是在窝棚里的一次难忘的盛会，大家围着火，更确切一点说，是围着烟坐着，这烟从我们头上的一个圆洞里冒出去。简直不能理解，在一个窝棚里怎么能够容纳下这么多的人！涅涅茨人为了欢迎我们特别宰了一头牡鹿。他们生着吃；把肉衔在嘴里用一只手拉着，然后极其熟练地将肉切断。怎么他们用刀子就不会把鼻子尖削掉呢！

我并不是一个有洁癖的人，不过总还是尽量不去看他们把生肉条在盛着血的碗里蘸一蘸，津津有味地咂着，送到嘴里去的样子……

“事情很糟糕，”我这样开始说道，“我们要去救一个受了伤的人，大家爱戴的人，可是我们在这儿已经蹲了四天了，我们丝毫也不能帮助他。伊万·伊万内奇，请译吧！”

医生译完了。

“不过更糟糕的是现在时间过了这么久，而我们距万龙坎还很远，甚至不能肯定应该向哪儿飞——向北还是向南，向东还是向西。”

医生譯完了。

“还有更糟糕的是我們的飞机坏了。飞机坏了，沒有你們的帮助，我們就沒法把它修复。”

涅涅茨人立刻齐声講起話来，但医生举起一只手，他們便鴉雀无声了。我在白天就发现他們对医生非常尊敬。

“要是沒有你們，我們是很糟糕的，”我繼續說道。“沒有你們，我們兴許已經冻死了，沒有你們，我們就会对付不了埋起来的飞机。伊万·伊万內奇，請譯吧。”

医生譯完了。

“不过我們还有一个請求。我們需要一块不大的，但很結实的，長約一公尺的木头。这样我們就能修复飞机，繼續向前飞，去搭救那位可尊敬的人。”

我竭力把話說得就象是先在脑子里从涅涅茨語譯成俄語那样簡單。

“当然，我也明白，木头在这兒是非常稀有而又貴重的东西。我本想为这块一公尺長的，結实的木头付給你們許多錢。但是現在我沒有錢。不过我可以向諸位推荐一个汽爐子。”

卢利立刻从皮袄里掏出汽爐子来，把它高高地举在头頂上。——这是我們預先約好的。

“当然，諸位知道汽爐子是什么东西。这是一种可以烧水，煮肉，熬茶的机器。生一次劈柴火要多少時間呢？半小时。可是汽爐子只要一分鐘就能点着了。在汽爐子上甚至可以烤点心，总而言之这是一件极好的东西，住家过日子有很大的用处。”

卢利加足了煤油，用火柴一点，火焰轟地一下冒起来，差点兒冲到棚頂上。可是該死的汽爐子好象故意过不去似地老是点不着，我們只好装作似乎應該这样来点火，不一下子把它点着。

不过这个花招兒也不容易耍好，因为我刚才說过生汽爐子毫不費力的。

“送我們一块一公尺长的結实的木头，我們就送給你們这个汽爐子。”

我有点担心涅涅茨人会因礼物菲薄而見怪，但他們並沒有見怪。他們默默地，認真地看着这个汽爐子。卢利不停地打汽，爐心烧得通紅，紅色的火苗在爐心上窜来窜去。說实話，在这一刹那間，在这荒凉遥远的冻土带，在涅涅茨人的这座窝棚里，我甚至也觉得这个汽爐子忽然成了一个有生命的，燃烧着的，呼呼响着的宝贝了！大家怀着真摯的敬意默默地看着它。

后来有一个老头兒，衔着长烟袋，系着一条女人头巾，虽然如此，但絲毫也不影响他保持着异常尊严的态度。他站起来用涅涅茨話說了一通，我覺得他講的是一句长而又长的句子。他虽然是向着医生講，但却是在回答我的話，伊万·伊万內奇把他的話翻譯了出来，原来是：

“对付烟的办法有三种：堵住迎风那面的烟孔，火势就会更加旺起来；可以把当作房門用的兽皮掀开；也可以在門的上方再作一个孔，以便出烟。不过，在我們这兒接待客人的办法只有一个：他想要什么就給他什么。現在我們就要吃鹿肉，睡覺。随后我們把窝棚里能找到的木头都給你送来。至于这个名貴的汽爐子，那么你願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4 旧黃銅矛鈎

刚把一只生鹿連头、带耳朵和眼睛一起吃光，涅涅茨人就把

他們所有的木头东西都給我們拉来了。木头凿的盘子，吊鍋子用的挂鈎，紡織机上的一个配件——兩側有圓洞的木板，雪橇的滑木，滑雪板。

“不合用嗎？”

他們很驚訝。

“不过木头是很結实的，一百年也用不坏。”

上帝才知道怎么落到这冻土大地上来的一张椅背也被他們拉来了。我們未来的領航員拖来一个神象——一个披戴着各种顏色絨布条的真正木偶，尖脑瓜，在常人肚臍的地方釘了一顆釘子。

“不合用嗎？不过木头是很結实的，一百年也用不坏。”

應該承認，当我看見这位惺惺忪忪人很严厉地向他那可怜的，哭哭啼啼的妻子說了几句什么話之后，搬出来了一个包着洋鉄叶子的木箱子，这无疑是他們窩棚里唯一的裝飾品，这时我真是为自己的汽爐子感到慚愧。他很滿意地走到我面前，把木箱子放在雪地上。

“把木箱子拿去吧，”医生翻譯道。“有四块很結实的木板。我是共青团員，什么也不需要。你的汽爐子对我沒个屁用。”

我不知道他是真这样說呢，还是医生把最后一句話譯走了样。但無論怎样說吧，这是很动人的場面，因此我誠心誠意地握了握这位共青团員的手。

不知你們有过这样的感觉沒有，当你滿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甚至奇怪世界上居然还有別的願望和想法的时候，突然間那些別的願望和想法象暴风驟雨似的闖进了你的生活，使你在一剎那間忘記了刚才你还全心所追求的东西。

当我看见一条黄铜的旧矛钩毫不出奇地放在雪地上几根搭窝棚用的竿子中间的时候，我这时的感觉正是这样。

当然，今天什么事都不同于往常。从一开始，在我大谈汽炉子时，涅涅茨人一本正经地在听着，而我们之间却象在梦境中一般，相隔着一条笔直的，仿佛是灰色长链作成的迷蒙的烟柱，这样的情景可说是罕见的。

飞机周围的雪地上摆着一些居家用的木头物件也可说是一件怪事。使我感到奇怪的还有一个六岁的涅涅茨孩子，他居然嘴里衔着烟斗，并且以命令的口吻对一个给我们拿来一块海象骨头的老太婆说话。

不过，最叫人奇怪的还是这条矛钩。大概全世界上再没有比它更奇怪的东西了。

这时卢利从座舱里向外探望了一眼，喊了我一声，我从极远的地方，从这条矛钩突然把我带去的那个遥远的世界里回答了他一声。

这究竟是一条什么矛钩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条旧黄铜矛钩。不过在这年深日久的，生了绿锈的黄铜上非常清晰地镌着：“‘圣·玛丽亚’号帆船”的字样。

我向周围看了看：卢利还在座舱里往外张望，他毫无疑问就是留着大鬍子的卢利，我天天都要嘲笑他这把大鬍子。他留鬍子是为了摹仿一位有名的北极飞行员弗同志的，不过他的鬍子和他那年轻活泼的面孔却极不相称。

医生伊万·伊万内奇被许多涅涅茨人围着，站在远处地头上的一个窝棚旁边。

一切都在原地没动，同一分钟以前丝毫不差。但在我的面前摆着一条刻着“‘圣·玛丽亚’号帆船”字样的矛钩。

“卢利，”我很鎮定地叫道，“到這兒來。”

“合用嗎？”卢利在坐艙里喊道。

他跳出座艙，走到我跟前，困惑不解地凝視着矛鈎。

“念念上面的字！”

卢利念了一遍。

“是一只什么船上的，”他說道。“是‘圣·瑪丽亚’号帆船上的。”

“不可能是！不可能是，卢利！”

我撿起矛鈎，象抱小孩似地双手捧着它，卢利大概以为我神經失常了，他嘟囔了几句，便撒开腿跑去找医生。医生走来用他那微微发顫的手不安地摸了摸我的头，对着我的眼睛看了好久。

“同志們，你們真是見鬼！”我气憤地說道，“你們以为我神經失常了嗎？沒有的事！医生，这是‘圣·瑪丽亚’号船上的矛鈎！”

医生摘下眼鏡，开始研究这条矛鈎。

“显然这是涅涅茨人在北地島上找着的，”我激动地繼續說道。“或者不，当然不是在北地島上，而是在岸边的什么地方。医生，您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嗎？”

涅涅茨人早已聚集在我們周围，他們那付神情，就仿佛是已經不下一千次地看見过我这样激动，这样大声叫嚷把矛鈎指給医生看的样子。

医生問这是誰的矛鈎，这时一个涅涅茨老人走了出来，他脸上的表情滯板，皺紋很深，仿佛木头雕的一般，他用涅涅茨語說了几句話。

“医生，他說什么？他的矛鈎是从哪兒来的？”

“你的矛鈎哪兒来的？”医生用涅涅茨話問道。

涅涅茨人作了回答。医生譯道：

“他說——撿来的。”

“在哪兒撿的？”

“在小船上，”医生譯道。

“怎么在小船上？他在什么地方找到这只小船的？”

“在岸边，”医生譯道。

“哪兒的岸边？”

“泰麦尔。”

“医生，泰麦尔呀！”我这一声喊叫，声音那么大，使他不禁又耽心地看了看我。“泰麦尔！这是距北地島最近的海岸！小船在哪兒呢？”

“小船沒有了，”医生譯道，“碎片还有。”

“什么碎片？”

“小船的碎片。”

“拿来看看！”

当老人去取小船碎片的时候，卢利把医生拉到一旁，他們悄声地議論了一番。卢利似乎还不甘心，認為我真是神經失常了。

过了几分鐘，涅涅茨人拿了一块防水帆布来，他在泰麦尔找到的小船显然是用防水帆布作成的。

“这是不卖的，”医生譯道。

“伊万·伊万內奇，請您問問他，小船上还有沒有別的东西？如果有的話，那么都是些什么，到哪兒去了？”

“还有东西，”医生譯道，“我不知道哪兒去了。事情很久了。大約已經十年了。有一次我去打猎，看見有一輛雪橇。雪橇上放着一只小船，小船里放着一些东西。有一支猎枪很不好，已經

不能发射了，子弹沒有。滑雪板也很不好。还有一个人。”

“人？！”

“等一等，——也許是我說走了嘴，”医生連忙說道，他用惺惺忪忪話又問了一遍。

“是的，一个人，”他重复說道。“当然，是死人，臉被熊啃了，也躺在船里。完了。”

“怎么完了？”

“再什么也沒有了。”

“伊万·伊万內奇，請您問問他搜过这个人身上沒有，口袋里有沒有什么东西？也許有什么紙片，文件。”

“有。”

“在哪兒？”

惺惺忪忪人一声不响地聳了聳肩膀。大概在他看来，這個問題問得真是糊塗。

“难道就剩下这么一条矛鉤嗎？这个人不是穿得有衣服嗎？衣服哪兒去了呢？”

“衣服沒有了。”

“怎么沒有了？”

“很简单，”医生这时也发起火来了，“你大概是認為他應該預知十年以后，你和你的飞机会落到他头上，而特意給你把衣服保存着嗎？十年！何況那人还可能在这之前十年就已經死了哩！”

“亲爱的伊万·伊万內奇，您別生气。一切都清楚了！現在只要把这件事情記載下来——記載下来，并且請您加以証明，您是亲耳听見他說的。請您問問他叫什么名字？”

“您叫什么名字？”医生用惺惺忪忪話問他道。

“維尔加·伊万。”

“多大年紀了？”

“一百岁，”涅涅茨人回答道。

我們怔得哑口无言，卢利竟捧腹大笑起来。

“多少？”医生重又問道。

“一百岁。”涅涅茨人又說了一遍。

医生无可如何地向周围看了看。

“鬼才知道涅涅茨話的一百是怎样說的，”医生噤哩咕嚕地說道。“也許是我錯了？”

“一百岁，”伊万·維尔加用地道的俄語固执地重复道。

當我們在窩棚里記載他所叙述的故事时，他还三番五次說自己是一百岁。他的岁数可能要小一些，至少表面上看来要小一些。不过我愈是仔細端詳他那张象木头雕刻的面孔和那毫无表情的目光，就愈加相信他确实是很老了。一百岁——这是他的驕傲，所以他才三番五次地去說它，直說到我們在記錄中写上：“百岁猎人伊万·維尔加”为止。

15 万 龙 坎

說实話，我到現在还不知道作起落架支柱的那块木头，涅涅茨人是从哪兒弄来的。他們夜里穿上滑雪板到什么地方去了一趟，大約是到邻近的一个游牧地，等到早上，當我們从窩棚里爬出来的时候，这一块雪松木就摆在我們門旁了。

我在窩棚里度过的一夜不是很安静的。只有伊万·伊万內奇在篝火旁边睡着了。他的两片帽扇扎在头頂上，象兔子耳朵似

的可笑地翘在皮袄外面。卢利翻来复去不住地咳嗽。我没有睡着。一个惺惺艾女人坐在摇篮旁边，我很久都在听她那仿佛是毫无感情，同时又象是自我陶醉地哼唱一首单调的曲子。有几个字不断地重复过来，重复过去，最后我甚至觉得这支歌就是由两三个字编成的。婴儿早已睡着了，可是她还在唱。当潮湿的柳木燃烧正旺的时候，她那浑圆的脸孔不时被火光照耀得发亮，这时我才看见她是闭着眼睛在唱的。到了早上，医生把这支歌译给我听，她唱的是：

冬天里。

我举目四望，

我的爱儿啊，

到处是白茫茫的原野，

我的爱儿啊。

我望湖上——

只有寒冰发着青光，

我的爱儿啊，

我望高山——

只见山石黑色苍苍，

我的爱儿啊。

可爱的冻土带，

白色的原野，

我的爱儿啊。

我的小快腿，

你的小耳朵多么可爱，

我的爱儿啊。

你的小眼睛多么可爱，

我的爱兒啊。
你的小鼻子多么可爱，
我的爱兒啊。
我望天空——
流云朵朵泛白，
可爱的冻土带。

和瓦里亚談話时體驗到的那种感情又回到我的心上，它是那样的强烈，使我真想爬起来走出窝棚去，不听这个閉着眼睛的涅涅茨女人唱的这首令人厌倦的歌子也是好的。但我終究沒有起来。她愈唱愈慢，愈唱愈低，随后便沒有了声音，她睡着了。除了我以外，整个世界都在熟睡中；只有我一人躺在黑暗里，心兒由于孤独和委曲在哀泣。假如一切都已完結，假如我們之間已經沒有，也不会再有任何关系，而他日相逢时将形同路人，那么干嗎又发现这根矛盾呢？我极力想克制着心头的煩惱，但是压制不住，我不断地努力，最后終于睡着了。

到中午的时候我們就把起落架修好了。我們把这块圓木头旋了几个孔眼，安装在飞机上代替支柱。我們用繩子把夹具纏起来，使它更結实一些。現在飞机象是被打伤了的样子，显得很可怜。我和卢利走开了几步，从一旁冷眼估量了一下这番工作。

“怎么样？”

卢利厌恶地揮了一下手。

沒有有什么关系，姑且認為一切都很好吧。需要烧些热水，把发动机起动起来。

我們把大小鉄桶里填滿了雪，把鉄桶放在汽爐子上。可真是糟践人的事兒！我們的汽爐子，这个“住家不可缺少的，呱呱叫的机器”燃烧得很不好。

一切都妥当了，发动机也热了。开始启动了，涅涅茨人拉紧了起动绳^①。

“注意！”

“是，注意。”

“一，二，三一拉！”

起动绳脱了，涅涅茨人摔倒在雪地上。

于是，又从头干起：

“注意！”

“是，注意”

“一，二，三一拉！”

这样重复了四次。发动机抖动着，契卡契卡地响着，转了二十来下又停住了。后来终于发动了起来。分别的时间到了！涅涅茨人围聚在飞机跟前，我紧紧地和他们握手，谢谢他们的帮助，祝他们打猎吉利。他们笑嘻嘻的，样儿非常满意。我们的领航员腼腆地笑着，往飞机里爬。我不知道他和他的妻子分别时说了些什么话，不过她很愉快地站在飞机旁边，穿着一件用杂色绒布镶边的皮大衣，系着一条宽腰带，戴着一顶宽毛边的风帽，显得满面生辉的样子。

她那高有半公尺的风帽，上面挂有一些叮铃铛的小物件，风帽底下是一张圆圆的小脸——这就是我在分别时所见到的一切。

我习惯地举起手来，象是请求涅涅茨人准许我们起飞。

“再见吧，同志们！”

我们起飞了！……

① 旧式的飞机在起动时，需要用绳子套在螺旋桨上向它旋转的方向拉动，就象卡车的摇把似的。——译者注。

我不准备叙述我們是怎样飞到万龙坎，我們的領航員辨認地形的能力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看那毫无二致的盖着雪の平川就象看地图一样熟悉。在一个游牧点的上空，他請我把飞机稍停一会儿；等他知道飞机不可能停一会儿的时候，甚至感到很扫兴。

我不准备叙述我們在万龙坎是怎样着陆的。試飞飛行員都很熟悉这种特殊的，职业性的感觉，这是由冒险，責任心和侥幸加在一起产生的一种容易燃烧起来的复杂的感觉。我們終于坐在一架起落架支柱是用木棒作成的，新式飞机上飞行了，这簡直是飞机制造界的奇聞！我大概将飞机全部重量恰好落在了那个完好的起落架上，所以还没等飞机停住，卢利就从座艙里跳出来，对我伸出一个大拇指表示贊許。

我不准备叙述在万龙坎人們怎样欢迎我們。有三家人的茶炊都烧得开了焊口；又有一家的小孩从搖籃里摔出来，弄得医生不得不立刻予以治疗。我不准备叙述他們怎样用鮭魚和餡兒餅来款待我們，我怎样組織了一个飞机模型小組，并且还帶少先队的兒童們坐飞机，万龙坎的居民怎样确凿地告訴我說，就在我們飞来的那一天，那一个时候，在村子上空还有两架飞机在盘旋，——后来我終于猜到了原来就是我們那架飞机，因为在着陆前，我們的飞机轉了三圈兒。

但有一件事我却不能不加以叙述，那就是伊万·伊万內奇在万龙坎的情形。

列德可夫的病情很不好。过去，在會議上我不止見過他一次，并且有一次还从紅雅爾斯克把他送到了伊加尔卡。他的文艺知識使我十分惊佩。原来他是列宁格勒教育学院毕业的，总而言之是一个學識淵博的人，他不仅讀过列夫·托尔斯泰的作

品，同时还讀过伏尔泰^①的著作。他二十三岁以前，在冻土带当过牧童，无怪乎涅涅茨人談到他的时候都怀着驕傲和热爱的心情。

可是这位杰出的，聪明的人物，出色的政治活动家現在却被一个坏蛋打伤了，躺在这里，我刚一走进門的时候，都沒有認出是他，因为他的相貌完全变了。

甚至不能說他是在躺着。他坐在床上，痛得咬着牙。陣陣的剧痛常常使他猛地蹦起多高：他站起来，抓住床背，一下跳到椅子上。看見疼痛折磨着这高大，强壮的身体是十分可怕的。有时疼痛停止几分鐘，他的脸才有了人的脸相。可是过后便又是那种可怕的样子了！他咬着上嘴唇，眼睛——这位无力克制自己的壮士的恐怖的眼睛——也歪斜了。突然他用那只健康的腿站起来，又一个斤斗栽倒在床上。但就是在床上他也是时刻不停地滾来滾去。是不是因为子弹打中了某处的神經系統，或者还是伤口化脓疼痛难忍，这我并不知道。可是我有生以来，还从沒有見過比这更恐怖的景象！看着他那样子实在可怜，当他滿床翻来复去，痛苦不堪地努力想坐起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禁为之失色。突然，他又竭尽全力一下子蹦到椅子上。

看見这样的病人往往会使人失掉理智的！可是伊万·伊万內奇却沒有，而且完全相反！他突然变得年輕了，他鼓起嘴唇，象一个誰都怕他的青年軍医。他很快就把病人房里的人都轟了出来，連那位不知为什么一定要参加診視列德可夫病情的区执委会主席也不例外。当本地医助，一个戴眼鏡的瘦癯的老太太战战兢兢地在他面前出現时，他很客气地問她道：

① 伏尔泰 (1694—1778)，法国哲学家，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启蒙学者。著有哲学通信，哲学辞典等書。——譯者注。

“您参加过截肢手术嗎？”

他以灵巧自然的动作，一会儿便将屋子里的家具重新摆設了一番，把多余的一张桌子搬出去，把准备用来施行手术的一张桌子搬到屋子中間的吊灯下面。

他吩咐把全鎮的灯都拿来，但是“不要冒黑烟的”，他把灯分散挂在牆上，于是这间屋子立刻被万龙坎从来未曾有过的灯光照得通亮。

他刚把眉毛一揚，瘦癯的医助便連忙拿着那条他認為不很洁淨的毛巾从屋里跑出来，我听见她在厨房里用医生那样凶狠而又和藹的声音說道。

“我的乖乖，你們存心把我送进棺材里去嗎？”

但是并没有人存心把她送进棺材里去。大家都躡着脚来回地跑，称医生为“他”。

医生用肥皂，刷子洗了不下半小时的手，一面这一句，那一句但又很客气地吩咐着別人。后来他手也沒有擦乾就走进病人房間里去了，他停下脚步，叉开腿，摊开手，評判式地周围打量了一番。后来門砰地一声閉上了。雪亮的房間，躺在雪白的抬子上的病人和穿着雪白罩衫的人，——这幅在万龙坎看来十分希奇的景象就隱沒不見了。

我們的伊万·伊万內奇在万龙坎的举动就是这样。四十分钟之后，他从手术室里走出来。手术的經過一定是良好的，所以他一面脫罩衫，一面用拉丁語对我說了几句話，然后又引用柯茲瑪·普魯特可夫的話說道：

“假如你想作一个幸福的人，那就作吧！”

我們一早从万龙坎起飞，三个半小时后，沒有遇到任何险情就在北地城降落了。

关于这次的事情——即医生在当时那种困难的条件下能作出这样漂亮的手术，总起来说，也就是关于我们这次飞行的情况，后来在“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短讯。这篇短讯的结尾说“病人的健康在迅速恢复中”。的确，病人很快就痊愈了。

我和卢利受到了表扬，医生则得到了涅涅茨民族区的一张奖状。

那条旧黄铜矛钩现在挂在我屋里墙上一张大地图的旁边，地图上标着“圣·玛丽亚”号帆船的漂流路线。

* * *

我六月初去莫斯科。可惜时间很少，只批准了十天假，在这十天以内，我不仅要办理自己的私事，而且还要办理我那位船长的私事和公事。

一路上我想了许多事情，想到自己，想到我和卡佳的关系，于是关于她父亲的问题又压倒一切地出现在我脑子里了，仿佛是在要求特殊的关照和尊重。在我生活的每个环节中，我都有意无意地会碰到他，我能以收集起来的关于他的事迹的断片终于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这条旧黄铜矛钩就是这幅证据画中最后的，富有逻辑性的一笔。其中最复杂的问题也因为得到这件东西而解决了。

说真的，我在读完了航海长的日记以后曾经问过自己：“我将来能否知道塔塔林诺夫船长的结局呢？他是抛弃了船去研究他所发现的陆地了呢？还是同其它的人一起饿死在帆船上，被浮冰携带着，年复一年地向格陵兰岸边飘去了呢？”

“是的，”现在我可以回答了。“他抛弃了船。我们暂时还不知道这是在什么情况下：是因一部份船员罹难了呢，还是因为船被冰挤碎了。但是他却把自己那种‘幼稚，轻率’的想法付诸实

現了。”

我曾問過自己：“他走到北地島了沒有？”

“是的，”現在我可以回答了。“他走到北地島了。否則獵人伊萬·維爾加几年前所找到的雪橇和帆布船哪能在這一帶海岸上出現呢？”

我曾問過自己：“應該到哪兒去找這支探險隊的遺迹？值不值得去找？”

“是的，”現在我可以回答了。“這些遺迹是值得找的，因為，如果合理地加以判斷之後，這個搜索區的位置可以精確地肯定，偏差不超過半度。這件工作的科學意義是毋庸置疑的。”

這仿佛是在法庭上的對話，全是一些問題和回答。但是在這些枯燥無味的談話背後，我似乎覺得還有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的對話，我看見我朝思暮想的卡佳了。

“你忘記我了嗎？是不是？”

“沒有，”她回答道。“可是我們十七、八歲以前的那段生活卻結束了；我不知道你到哪兒去了，所以以為我們的愛情也隨着那段生活而結束了。”

“生活根本沒有結束，”我告訴她說。“關於你的父親，我現在比你，比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知道得詳細。你瞧，我給你帶來了些什么：這是他全部的生活史。我將他的生平事迹收集了起來，並且證明這些東西是屬於一個偉大人物的生平。你知道，我為什麼要作這件事嗎？因為我愛你。”

於是她問道：

“這麼說來，你還沒有忘記我？對嗎？……”

於是我要答復她。

“即使你不再愛我了，我也會不會忘了你。”

这是我在途中編出来的一场精彩的对话。可是，也不能說它和那即将在我同卡佳之間进行的一次真的談話完全不同。这次談話既相似又不相似，就好象梦境和真实的生活是既相似又不完全相似一样。



第五部 为了良心

1 会见卡佳

要拆散一桩婚事，促成另一桩婚事，十天的时间并不算太多。何况我在莫斯科还有许多别的事情。我准备在地理学会作关于“一个被遗忘的北极探险队”的报告，而当时报告底稿还没有写好；此外，我需要向北极航务总局提出关于搜索“圣·玛丽亚”号的问题。

瓦里亚代我作了一些准备工作：例如他把我作报告的事同地理学会接洽妥了。不过这份报告他当然是不能代写的。

我本来打算在柯拉布略夫家里借住，但后来经过反复考虑，还是跑到两年前我从巴拉紹夫航校路过此地时所住的那家旅馆住下了。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我不喜欢旅馆，虽然对一个漂泊者

來說，這是很奇怪的。住在旅館里，我的心情總是十分郁悶。

我給卡佳打電話，正好是她接的。

“喂，您是誰？”

“我是薩尼亞。”

她沉默了半晌，然後用極平常的聲調說：

“薩尼亞？”

“是我。”

她又沉默了一會兒。

“要在莫斯科呆很久嗎？”

“不，只呆幾天，我回答道。我也竭力保持着很平常的聲調，就好象沒有覺得自己現在看見她仍舊戴着那頂沒有系上遮耳的帽子，穿着我們最後一次在凱旋路見面時穿的那件被雪打濕了的大衣。

“來休假嗎？”

“既要休假，又要辦事。”

要費很大的力氣才不至于問她：“我聽說，你常和羅馬什卡會面？”我作了這種努力，所以沒有問她。

“薩尼亞怎麼樣？”她突然問起我的妹妹來。“我和她通過一個時期的信，後來就中斷了。”

我們談起薩尼亞的情形來，卡佳告訴我說，前幾天有一個列寧格勒的劇團到莫斯科來過一次，上演高爾基的“母親”，在節目表里印着“藝術設計——彼·司考伏羅得尼可夫。”

“真的嗎？”

“布景很好，挺有氣魄，同時也很朴素。”

我覺得她有好幾次故意迴避稱呼我的名字，有次雖然稱呼了也是壓低了聲音說的，好象不願意讓家里人知道她在跟誰談

話。她一次也沒有稱呼我為“你”。我們一直用很平常的聲調談這談那，直談到我突然恐懼地感覺到：一切就要結束了，也就是說，我們用這樣平常的聲調談話以後就會分散了，以後連再挂電話給她的借口也沒有了。

“卡佳，我們應該見一次面，你什麼時候方便？”

我說的是：“你什麼時候方便？”這麼一來就把問題拉开了，如果我還稱呼她為“您”，那真是太傻了。

“正好我今天晚上有工夫。”

“九點好嗎？”

我希望她邀我到她家里去，可是她沒有邀我，於是我們就商議究竟在什麼地方會面。

“或者就在凱旋路街心花園吧？”

“這個花園現在已經沒有了，”卡佳冷冷地說道。

於是我們約定在大劇院門前的石柱間見面。

我們在電話里談話的全部內容就是如此，並不值得回味，但我在莫斯科度過的漫長的的第一天里，還是逐字逐句地在咀嚼我們的談話。

我先到民用航空局，然後去動物學院找瓦里亞。大概我當時有些心不在焉的樣子，所以瓦里亞反復對我說了好幾次，明天是柯拉布略夫從事教育工作二十五周年紀念日，校內將舉行慶祝大會。

終於等到了晚上八點鐘，我直奔大劇院而去。

她還是從前的那個卡佳，是每回我思念她時所想到的那個把辮子盤在頭上，前額上留鬚發的卡佳，只是她的臉色變得蒼白了些，身材也長高了。當然，現在的她已經不是從前在凱旋路街心花園里吻過我的那個小姑娘了。她的眼光變得十分矜持，聲

調也变得矜持了。不过她总还是卡佳，长得一点也不象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不知为什么，我过去总是害怕她会象她媽媽。相反的，昔日卡佳的輪廓似乎更加定形，她現在比从前更多卡佳的味兒了。她穿着一件短袖白綢衫，胸前領口間別着一个蓝色白点兒的蝴蝶結。在我們談話的时候，当我竭力想看一看她的脸时，她的表情馬上变得严肃起来。

这次談話給我的感觉就仿佛我們是分隔在两个房間里，隔着一堵墙壁，只是在房門偶尔微微敞开时，卡佳才向外面瞧一瞧，想看一看究竟是不是我。我們徘徊在莫斯科，度过了凄伤的一天，我滔滔不絕地說着，我想不起什么时候說过这么多的話。然而这些都不是我想要对她說的話。我談到“航海长的字母表”是怎样編成的，要看完他的日記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我談到那条上面鑄着“‘圣·瑪丽亚’号帆船”的旧黃銅矛鈎是怎样发見的。

但是一句話也沒有提到我为什么要作这些事！一句話也沒有。似乎过去的問題早已死去，而且其中也並沒有充滿着委屈，爱情，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的死，对羅馬什卡的妒忌，和在我同卡佳身上跃动着的全部热血……

这一年莫斯科开始修地下鉄道，在許多最熟識的地方，拦路架着木栅栏，因此不得不順着栅栏在弯弯曲曲的木板上行走，因为栅栏尽头常常是一个大坑，所以又不得不掉过头来。昨天这兒还没有坑，可是今天就能听見里面的人声和地下工作嘈杂的声音了。

我們的談話也和这差不多，在那些我們最熟悉的地方，从作小孩和讀書的时候起就熟悉的地方繞着路走，折回来走，到处碰到木栅栏。特别是每当我们走近那叫做“尼古拉·安东內奇”的

危險地方時，我們總要碰到木柵欄。

我問卡佳收到我的信沒有——一封是從列寧格勒發的，一封是從巴拉紹夫航校發的。當她說沒有的時候，我又暗示說，這些信是不是落到外人手里去了。

“我們家里沒有什麼外人，”她直截了當地說道。

我們又回到了劇院廣場上。這時天色已經很晚，不過小舖里還在賣花。到過北地城之後，看到這兒能有這麼多的東西，人，汽車，房屋和數不清的晃動着的電燈，都不免使我感到稀奇。

我們坐在一張長凳上，她用一隻手支著頭，聽著我講話。我這時想起她一向就喜歡把位子安排好，為的是聽起話來更舒服一些。現在，我才了解到在她身上有了某種變化，這就是她的眼睛。眼睛變得憂郁了。

這是仅有的美好的一剎那。後來，我問她是不是還記得我們在凱旋路街心花園里最後一次的談話，可是她什麼也沒有說。對於我說來，這是最可怕的回答，是從前的那個回答——“我們不要再說這件事了吧”。

如果我能好好地看看她的眼睛，也許我能明白許多事情。但是，她始終把頭偏往一旁，因此我也就沒有再作這種打算了。

我只覺得她一分鐘比一分鐘變得更加冷淡。我對她說：

“我將永遠關心你的一切，”她只是點了點頭。

當我請她去聽我的報告時，她很客氣地謝了謝我。

“謝謝，我一定來。”

“那我高興極了。”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

“薩尼亞，我想告訴你，你的這種態度使我很感動。我還以

为你早已忘掉这件事了。”

“沒有忘記，你現在不是看到了嗎！”

“假使我把我們談話的內容告訴尼古拉·安東內奇，你不會反對吧？”

“恰恰相反！尼古拉·安東內奇知道我有這些發現將會很感興趣的。因為這些發現和他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比他所能想象的還要密切得多的多。”

其實這些發現和他並沒有那麼密切的關係，我也沒有什麼根據去暗示我話裡面的意思。不過我當時非常惱火。

卡佳留心地看着我，稍微考慮了一下。大概她還想問我些什麼事情，但又遲疑未決。我們分別了。我心神錯亂，憤恨而疲倦地走了，在旅館里，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頭痛。

2 柯拉布略夫的慶祝會

把一個中學教員的慶祝會定在假期，這簡直是一種古怪的想法，因為這時學生們都已离校，學校也停止工作了。我甚至對瓦里亞說，據我看一個人都不會來。

結果完全不是這樣！學校里擠滿了人。同學們正在用白樺樹和楓樹的樹枝裝飾樓梯。衣帽間地板上放着一堆樹枝，準備作會場的禮堂入口上面搖搖晃晃挂着一個巨大的25字。姑娘們捧着花圈往什麼地方走去，大家都是一臉認真，關心的樣子。由於這種忙碌和興奮的氣氛，而更主要的還是因為我回到了母校的感覺，使我突然感到非常愉快。

可是同學們並沒有讓我沉醉在回憶里很久。當時我穿着制

服，他們一下子就把我包围住了。哈，来了一个飛行員！我簡直来不及回答大家的問題了。

后来有一个高年級的姑娘，那么肥胖，紅潤，使我想起了从前“經濟委员会”的瓦蓮阿姨，她走过来，微微一紅脸，說伊万·巴甫雷奇在等我。

他坐在教員休息室里，样兒显得蒼老了一些，背稍微有点兒駝，滿头白发（已經白了！）。他現在象誰呢？象馬克·吐溫！当然他变老了，但我覺得他比我們最后一次見面的时候更結实了一些。鬍子虽然也有点兒白了，但长得更浓密，很有精神地向上翹着，在松寬柔軟的領子上面露着健康紅潤的脖子。

“亲爱的伊万·巴甫雷奇，祝賀您！”我說，我們互相擁抱，亲吻了好久。“祝賀您！”我一面吻着他說道，“希望您的学生都象我这样的感激您。”

“謝謝，薩尼其卡。”

他又紧紧地擁抱了我一次。他非常激动，因而嘴唇稍稍有点兒发抖。

一小时之后，他就坐在我們以前审判叶夫根尼·奧涅金的礼堂的講台上，我們以貴賓的身份坐在主人兩側，組成主席团。“我們”包括：瓦里亚——他为这天的盛会特意系了一条鮮綠色的領帶；丹娘·薇莉琪珂建筑工程师，她現在长成一个高大丰滿的少妇了，簡直令人难以相信她就是从前那个纖瘦，原則性很强的丹娘；此外还有伊万·巴甫雷奇的几个学生，我們在校的时候他們还是低年級的小孩子，我們那时甚至根本沒有把他們当作人。在这一代人中間有很多軍校學員，我十分高兴地認出有三个人是那时少年先鋒队我那一中队的隊員。

然后来了一位豪华大方，穿着白长統袜，粗毛綫背心的人，

他就是莫斯科剧院的演員格里沙·法伯尔。这个人真是一点兒也沒有变！他的那副神气，就好象礼堂里发生的一切事情只是和他有关系。他很講究地吻了吻主人的两頰，就翘起脚来坐下了。他在主席团里立即占了很大的一块地方，使人感到这好象不是柯拉布略夫的庆祝会，而是为他举行的庆祝会。他用一种迷迷糊糊的样子看了看与会的人，然后掏出小梳子来梳头。我写了一张紙条給他：“格里什卡，坏家伙，你好哇！”他看完了以后，客气地笑着，对我招招手。

这是一次精彩的晚会，它之所以好，就是因为每一个发言的人講的都是实在話。誰也沒說假話，毫無疑問，因为講柯拉布略夫的老实话并不困难，同时，他向来对自己的学生除了要求他們作个老老实实的人之外，再沒有其它的要求。

但願工作二十五年以后，大家談到我的时候也能象今天晚上談論柯拉布略夫这样就好了。

学生家长，一九三一年毕业的同学，家具工厂的工人，区苏維埃，市人民教育局，都送来了花籃，一个比一个大。这时主席却宣布說：“現在請格利高里·伊斯拉伊列維奇·法伯尔代表我校毕业的演員致詞。”接着有两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抬出一个使得大伙兒都惊叹不置的花籃，会場內立刻发出了嘖嘖咂舌声。

格里什卡站了起来。他象往常一样講得很漂亮，只是喊叫得过分了一点兒。我很奇怪剧团里還沒有教会他說話时声音應該低一些。他称呼伊万·巴甫雷奇为“艺术生活的导师”，并附帶說，这对他个人起了很大的作用。然后他又吻了柯拉布略夫一次，便洋洋自得地坐下了。

台上的鮮花愈来愈多，伊万·巴甫雷奇坐在那兒，紅光滿面，不知如何是好地捋弄他的鬍子。他大概是因为自己太幸福

有点不好意思了，当别人颂扬他的时候，他的眼睛显出不十分好受的样子。

后来一位陆军中尉致词。我们在校时，他在五年级学习。他说，既然法伯尔同志代表演员，那么他也冒昧地代表从我校出去的工农红军学员和指挥员来致贺词。

“亲爱的伊万·巴甫雷奇，”当主席请我发言时，我说道，“请允许我代表飞行员说几句话，因为在我們伟大的苏维埃国家领空也有很多您的学生在飞行，他们无疑问是会赞同我说的每一句话的。人们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您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譬如有一次，我一早醒来，发现我的邻床伙伴正目不转睛全神贯注地看着天花板，竟连我的问话都没功夫回答。我随着他的视线看见天花板上画着一个有半卢布银币大小的黑圆圈。第二天又复如此。我的邻床伙伴每天早上看这黑圈看了两个月。诸位想一想，他这样作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他自己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现在就坐在这张桌前，也是我的邻座。”瓦里亚难为情地笑了笑，随后主席团和大家都笑了。“好，我来替他回答：他是在锻炼眼光的威力。谁的眼光使得他这么钦佩呢？是伊万·巴甫雷奇·柯拉布略夫出名的眼光。亲爱的伊万·巴甫雷奇！我现在可以坦白的向您承认：我们经不住您的眼光照射。有时想搞点鬼，或是打算撒谎，可是遇到了您，或是一想起了您，便由不得要说实话了。我认为这也就是学校应该教导我们的主要东西。”

我讲完了话以后，便过去和伊万·巴甫雷奇接吻。瓦尔加从另一边也探过头来吻他，所以我们的头互撞了一下。

在这以前掌声十分稀落，可是等我们撞了头以后，立刻响起了轰雷般的掌声。

在我后面講話的是丹娘·薇莉琪珂，不过我沒有去听她講，因为这时尼古拉·安东內奇来了。

他走进了礼堂——肥胖的身体，威严敦厚的仪表，穿着那么一条肥大的褲子，微微向前拱着身子，在人群里挤来挤去向着主席团走来。我看見从前用綜合教学法教我們“水鴨”的那位老态龙鍾的，可怜的塞拉菲瑪跑在他的前面，給他开路，可是他連看也不看她，脸上連一絲笑容也沒有，径直往前走。

自从上次他对我咆哮，折手指节，繼而吐唾沫那丑恶的一幕之后，我再也沒有見過他，我現在发觉他比那时候变了很多。在他的后面还有一个人，也相当胖，也些微向前拱着身子，也是綑着一张脸。

如果这时不是瓦里亚低声告訴我說“他就是羅馬什卡”，那么毫无疑問，我絕不会猜到他是誰。

怎么，他是羅馬什卡？他能是这么一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神气十足，脸面又大，又白，十分端正，身穿一套极其講究的灰色西装的人？他那黃色的癩猫一般的乱蓬蓬白头发到哪兒去了？他那双反常的圓眼睛，猫头鷹的眼睛，夜間都不合上的眼睛到哪兒去了？

一切都那么利落，整洁，柔和到极点，甚至連那呆板的方下巴現在也不很方，宁可以說是十分飽滿，而且还十分体面了。即使讓羅馬什卡按照自己的心願捏塑一张新面孔，怕也不可能塑得比这更好了。如果一个不了解他的人初次遇見他，兴許还会对他产生一种好印象哩。

尼古拉·安东內奇走上主席台，他也跟着走上来，不管尼古拉·安东內奇作什么，羅馬什卡总是跟着他作。尼古拉·安东內奇勉强地，不过总也还热情地向柯拉布略夫祝賀，沒有吻他，

只是把手伸了出来。羅馬什卡也只是把手伸了出来。尼古拉·安东内奇向主席团扫了一眼，首先和市人民教育局局长问好，羅馬什卡也跟着向他问好。看起来也许很奇怪，但羅馬什卡的动作反倒显得更坚决，更勇敢一些。

尼古拉·安东内奇没有理会我，也就是说他装作我不在这儿似的。可是羅馬什卡走到我面前时，立住了脚，微微把手一摊，似乎很惊讶——这是不是我？就好象我从来也没有用脚踢过他的狗脸似的。

“你好，羅馬什卡，”我冷淡地说道。

他抽搐了一下脸，但马上装出仿佛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彼此间就应该称呼“薩尼卡，羅馬什卡”似的。他坐到我旁边，开始谈起话来，我不屑地没有答理他，把身子转过去，作出似乎是听丹娘讲话的样子。

我并没有听丹娘讲话！我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只是靠着坚强的毅力，才保持住原来平静的神色。

庆祝会的仪式结束了。客人们纷纷被邀入席。羅馬什卡在走廊上追上了我。

“伊万·巴甫雷奇的庆祝会开得真不错，对不对？”

他的声调甚至也变得柔和圆滑了一些。

“是的，很好。”

“真是遗憾，我们见面的机会太少了。到底是老同学嘛。你在哪儿工作？”

“在民用航空局。”

“这个我知道，”他说完便笑了。“不，‘在哪儿’是另外一个意思，是地理上的意义。”

“在北极。”

“对啦！見鬼！我完全忘了！卡佳不是对我說过嗎！在北地城！”

卡佳！卡佳对他說过。我頓時身上象火烧一般，不过还是很鎮定地回答道：

“是的，在北地城！”

他沉默一会。然后很謹慎地試探道：

“呆很久嗎……是到我們这兒来的？”

“暂时还不知道……”我也很謹慎地答道。“这要看許多客觀情况而定。”

我能这样鎮定謹慎地回答，不免暗自高兴。从这一会兒之后，我的激动都冰消瓦解了。我变得象蛇一般冷酷，客气和狡猾。

“卡佳說你准备作一次报告，好象是在‘学者之家’吧？”

“不，是在地理学会。”

羅馬什卡很高兴地看了看我，——他好象是因为我并不是在“学者之家”，而只是在地理学会作报告而感到滿意。事实也确是如此，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

“是什么报告？”

“你来听好啦，”我淡然說道，“你会感到兴趣的。”

他的脸又抽搐了一下，这次是很明显的。

“好，”他說道，“应该記下来，免得错过机会。”于是他在笔记本上很整齐地記了几个字。“报告的題目是什么？”

“一个被遺忘的北极探险队。”

“等一会兒！是关于伊万·李沃維奇的探险队嗎？”

“是关于塔塔林諾夫船长的探险队。”我毫不客气地反駁說道。

不过他把我的更正当作了耳边风。

“根据新的材料嗎？”

一个瞒不了人的、愚钝的詭計在他眼睛里閃了一下，我立刻猜到这是怎么回事了。

“啊哈，你这个坏蛋，”我很冷靜的思索道，“是尼古拉·安东內奇派遣来的。讓你来探听我是不是打算証明探险队的遇难純粹是他的錯誤，而不是什么維什米爾斯基爵士的錯誤。”

“是的，新材料。”

羅馬什卡留心地看着我。这一刹那間，他又变成从前那个羅馬什卡了，他在盘算着如果我透露了这是些什么材料，他将会得到多少油水。

“关于这个探险队，”他說道。“尼古拉·安东內奇正好也有一些材料。他有很多信件，有些是很关重要的，他有一次給我看過。你最好找他談談！”

“啊哈，明白了，”我又想了一想，“尼古拉·安东內奇委托你来給我們拉綫，好商量商量这件事。他怕我，但是还想讓我先开头。沒有那么好的事！”

“不必了，”我冷冷回答道，“实际上他知道得很少。說来虽然奇怪，但关于他参加探险队工作的事，我比他本人知道得还多。”

这是一記估計得十分准确的打击，尽管羅馬什卡現在大大地学乖了，但究竟还是个笨蛋；他突然把口一张，显然很窘的样子看了看我。

“唉！卡佳，卡佳，”我心里想道，为了她和我所受的屈辱，我感到自己心都在收縮。

“是，”他拖长声說道。“是这么一回兒事。——是的，是这么

一回事。”

4 我們走到桌前，談話便終止了。我勉強支持到晚會結束，只是為了免得伊萬·巴甫雷奇見怪。我的心情很不好，很想痛飲一番，但是我只喝了一杯酒，為主人干了一杯。

這一次酒是羅馬什卡敬的。他站起來，很體面地等了許久，一直等到全桌都靜下來。他有一句話說得特別流暢，這時臉上掠過一種自鳴得意的神氣。他談的是“友誼把我們親愛的主人的學生結合在一起”。這時他轉身向我舉起酒杯來，表示也是為我干杯。我也很禮貌地把杯子微微舉了舉。大概我這時臉上不是一付和顏悅色的樣子，所以伊萬·巴甫雷奇先留心地看着看他，然後又看了看我，突然把一隻手放在桌子上，用眼睛看着它示意，我一下子沒有想起這是什麼意思。這隻手抬起來，拍拍桌子，又靜靜地放了下去。原來這是我們從前的老暗號——不要激動！我們倆不約而同地笑了起來，我這時也感到心里比較高興了一點兒。

3 无 題

這天我約定和“真理報”的一位工作人員會面，因為我想把自己的發現告訴他。他已經推延過兩次了，總是說有事，最後終於挂電話約我，於是我就到“真理報”社去了。

這位老兄是一個高個子，辦事很熱心的人，戴着一付近視眼鏡，眼睛有點兒斜視，使人總覺得他是瞧着一旁在想自己的心事。他說自己“對飛行員還有點兒了解”。他似乎是真的對我的敘述感到興趣，至少從我講第二個字開始，他就在筆記本上記錄

起来。他讓我把遇到暴风雪时如何固定飞机的办法画出图样，并且說我應該寄一篇报导这种方法的的文章到“民航”杂志去。他当时就給“民航”出版社挂了一个电话，接洽好把这篇材料交給誰，在什么时候交去。我覺得他非常了解“圣·瑪丽亚”号探险队的意义，并且說，現在社会人士对北极感到极大的兴趣，所以这是一个很需要的，应时的題目。

“不过，已經有一篇文章写过这个問題了，”他說道，“仿佛是在‘苏維埃北极报’上面。”

“在‘苏維埃北极报’上？”

“是的，去年的。”

这可是一件新鮮事兒！去年的“苏維埃北极报”上登載过关于塔塔林諾夫船长的文章？

“我沒有讀过这篇文章，”我說道。“不管怎样吧，这篇文章的作者并不知道我所掌握的材料。我研究了航海长的日記，他是到达陆地的唯一的一个探险队成員。”

就在这时候，我才認識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記者。他的眼睛突然放射出光芒，迅速地記錄着，甚至把鉛心都写断了。显然，这是一件聳人听聞的大事。他也这样說：

“这真是一件聳人听聞的大事！”

后来他鎖上自己的办公室，如同他在走廊上說的那樣，把我带到了“首长”那兒去。

我在“首长”那兒簡短地重复了一遍我的故事，于是我們約定：

- 1.我明天把日記送到編輯委员会去。
- 2.真理报社派一个工作人員去听我的报告。
- 3.把我的发现写成文章，到那时候“我們再看看，把它排在

什么地方”。

这次本来应该把请求寻找探险队的问题和“真理报”谈一谈，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却认为这是一个和新闻界没有关系的特殊问题。真是可惜，否则记者们也许会告诉我到北极航务局应该找谁联系，甚至还会挂一个电话帮忙哩。

我在会客室里坐了两小时，等候着谒见总局的一位秘书。最后终于等到了。我被引进办公室，我在这儿又候了半小时。这位秘书一点闲不得，水兵，飞行员，无线电员，工程师，木工，农业家，艺术家络绎不绝地来到他的办公室，所以他总得作出好象对航空，农业，绘画，无线电都很内行的样子。最后他找我谈话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倒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我好歹把我的故事讲完以后，他说道。“不过我们现在有一些更现实的任务。”

我辩解，我很了解北极航务局的任务绝没有包括搜索失踪的探险队的事。不过因为今年有一支北极探险队将出发到北地岛去，那么也不妨给它一个附带的任务——勘查塔塔林诺夫船长殉难的地区。

“塔塔林诺夫，塔塔林诺夫，”秘书一面寻思着说道。

“关于这件事他已经写过文章了吧？”

我分辩，他不可能写这些事，因为探险队是在距今约二十年前离开彼得堡的，而且最后一次收到的消息是在一九一四年。

“好吧，那么是哪一位塔塔林诺夫写过这个问题的呢？”

“塔塔林诺夫是船长，”我耐心地解释说。“他在公元一九一二年秋乘‘圣·玛丽亚’号帆船出航，目的是想通过北海航线，

也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北极航务总局的航綫。探險工作雖說是失敗了，可是塔塔林諾夫却順便完成了一個地理學上的重大發現。譬如，現在就有足夠的根據，証明北地島並不是維爾基茨基發見，而是他發現的。”

“是的，很對，”秘書說。“關於這支探險隊已經有過一篇文章了，而且我還讀過。”

“誰的文章？”

“我記得也是塔塔林諾夫的。塔塔林諾夫的探險隊，塔塔林諾夫的文章。那麼您的建議究竟是什麼呢？”

我又把自己的建議重說了一遍。

“好吧，您寫一份報告書來，”他說話時的那種語氣，就仿佛是因為我不得不寫這份報告，而後這份報告就不得不永遠躺在他的抽屜里而感到遺憾似的……

我走了出來。

這不可能是一種偶合！我到高爾基路一家書店里翻遍了去年各期“蘇維埃北極報”。這篇文章的題目是“一個被遺忘的北極探險隊。”——這不是我的報告的題目嗎！——署名是尼·塔塔林諾夫。原來這篇文章是尼古拉·安東內奇寫的。

這是用回憶方式，同時又是以學術性的語氣写成的一篇洋洋大作。文章從一九一二年夏季，停在彼得堡尼古拉橋下的“聖·瑪麗亞”號帆船開始。“船內艙板和天花板上白色的油漆猶新，家具的紅木擦磨得象一面鏡子似的閃閃發亮，客艙里的地板上鋪設着地毯。庫房和貨艙里堆滿了各種各樣的儲備品。真是應有盡有！干果，糖，巧克力，各式水果罐頭，菠蘿，成箱的果子醬，點心，糕餅以及其他許多東西，一直到最主要的東西，諸如肉罐頭和成堆的米面。”

看到尼古拉·安东内奇从食物写起不免感到可笑，可是对我来说，这只不过是多余的证据了。不过再往后，他写得就比较聪明一些。说探险队是合資装备起来的，他很谦逊地暗示说，他是首先想到“循着諾登塞尔特的足迹航行”的人，他很沉痛地指出反动报纸和海軍部对他的百般阻挠。他引用了海軍大臣在关于“圣·瑪丽亚”号失踪一事的报告上的批示：“可惜塔塔林諾夫船长沒有回来，否則他这样輕率地对待国家財產，我将馬上把他送交法院法办。”

他更沉痛地写道，他因病不得不暂时离开他的堂弟时，阿尔汗格尔斯克的工厂主如何欺騙了他的兄弟，把一些未經訓練的，几乎都是街头野孩子們以“二十戈比一对”出卖的劣狗，魚目混珠地交给了他，从而影响了整个工作的組織。他沒有指出工厂主的姓氏，問題还不明显嗎！他只用了“維”字来代表他們中某一个人。尼古拉·安东内奇之所以归咎維某的原因，是維某在供应肉类上获了暴利，而这些肉還沒等探险队走到尤戈尔·沙尔海峡就不得不扔进大海去了。

这篇文章中的这一部份写得很在行。尼古拉·安东内奇甚至还引用了阿姆生的話——“一个探险队的成敗完全取决于它的装备”，并且很出色地用他“亡弟”的探险队証明了这一看法的正确。他摘录了他“亡弟”信件中的一些片断，他的“亡弟”曾痛心地质責那些利用該船在阿尔汗格尔斯克停泊時間縮短和急于出海的机会进行搗鬼的那些生意人。

关于探险途中的情形，尼古拉·安东内奇几乎絲毫沒有写。他尽提到“圣·瑪丽亚”号在尤戈尔·沙尔海峡遇到了几艘抛錨等候堵塞在喀拉海南部的冰块破裂后再走的商船。据其中的一位船长談，“‘圣·瑪丽亚’号于九月十七日黎明勇敢地駛入喀

拉海，很快就在地平綫上，在綿綿不断的冰原綫上消失了”。“伊·李·塔塔林諾夫船长給自己提出的任务虽未完成。”尼古拉·安东內奇繼續向下写道，“但是却順便完成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就是被塔塔林諾夫船长命名为‘瑪丽亚島’的北地島的发现……”

我买下了这一期的“苏維埃北极报”，因为这篇文章中还引証了該作者所发表的关于这个問題的其他一些論文。然后便回到旅館里了。

很难說我回来时的心情很好！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既然这篇謊言已經刊登了，而且已經登出了这么久——一年多了，那就是說一切都完了！要駁斥也迟了，誰也不会听我的駁斥了。他已經搶先告訴大家了。他所写的虽是謊言，但却掺杂着一些真事。他是第一个指出“圣·瑪丽亚”号探险队的意义的人，他是第一个指出北地島是塔塔林諾夫船长在維尔基茨基看見这个島之前半年发现的。当然，这些情况是他从我交給卡佳的船长的信里看来的。他在所有的問題上都搶在我前面了。

我在自己的房間里踱来踱去，一面吹着口哨。

說真心話，我这时候唯一想的就是到車站去买一张从莫斯科到紅雅尔斯克的車票，再由那兒乘飞机到北地城去。但是我并沒去車站，相反的，我坐了下来写报告書。我写了一整天。当一个人整天工作时，各种不愉快的思想是无法在脑子里久留的，一个思想来了，另一个又去了；实在沒有办法，脑子里沒这么多的地盘呀。最后，它們只好全都回老家去了。

4 許多新聞

当我走进門时，伊万·巴甫雷奇正在蹲着生爐子。多么熟悉的一幅图画——伊万·巴甫雷奇穿着他那件厚厚的毛茸茸的旧軍服在生爐子。我甚至仿佛觉得这几年的時間都沒有过，自己仍是一个小学生，如同在九年級我回恩斯克去找卡佳那次一样，他現在就要“大发雷霆”了。但他轉过身来。“他可老多了”，我心里想道，轉眼間，一切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

“到底来了，”柯拉布略夫頗生气地說。“你为什么不到我这兒来呢？”

“謝謝，伊万·巴甫雷奇。”

“你不是写信說过要到我这兒来的嗎？”

“我怕会給您添一些麻煩。”

他看了看我，甚至閉起一只眼睛来仔仔細細地打量我。这是一种主人式的眼光——仿佛对待自己的事情似的。大概我总算还是使他滿意的，所以他高兴地梳了梳鬚子，就叫我坐下来。

“我昨天沒能好好地看看你，”他說道，“沒有功夫。”

他鋪好桌子，从壁櫥里取出一瓶酒，切好面包，然后又从窗后端出冻牛肉来，也把它切好。他仍和从前一样独居，不过这所潮湿的老住宅变得比較舒适了些，而且好象也不那么潮湿了。使我不大高兴的是在我還沒把事情叙述完的一会兒功夫，他就把一瓶酒喝得一干二淨，連一点东西几乎都沒有吃，——这真使我有点伤心。

我說現在只能對他講一些最主要的事。但是過了這麼多年，一旦碰見親人，難道你還能想起什麼是最主要的事，什麼是次要的事嗎？伊萬·巴甫雷奇詳盡地詢問起我北方的情形和飛行工作，總是不滿意我回答得那麼簡略。

“伊萬·巴甫雷奇，親愛的，讓我講什麼呢？因為我飛得還很少。啊，有一次我差點兒沒有凍死！您還記得我從學校里偷跑那次給我治病的醫生嗎？您還到醫院里來看過我哩。”

“記得。”

“他也住在北地城。我找到他了，這是我常去的唯一的一戶人家。可也真是，伊萬·巴甫雷奇，我感到自己一生總是依靠着別人的家庭。小的時候在司考伏羅得尼可夫家里，您還記得嗎？我對您談到過的。後來到塔塔林諾夫家里去。現在又到醫生家里去。”

“老弟，也該自己成家了，”柯拉布略夫很正經地說道。

“不，伊萬·巴甫雷奇。”

“為什麼不呢？”

“我在這個問題上很不順利。”

柯拉布略夫沉吟了一會兒。他給自己斟滿了酒，我們碰了杯，一飲而盡。他又斟了一杯，然後解開軍服上衣，準備發表一通長篇談話。

“薩尼亞，你聽我講，你在離開莫斯科的時候對我說的話還記得嗎？你說：‘現在我即使是死，也要証實我是對的。’怎麼樣？証實了嗎？”

這是一個突如其來的問題，因此我沒有立刻回答，當然，我還記得我們的談話。我還記得，柯拉布略夫喊叫着說：“你搞些什麼呀，薩尼亞！我的上帝！你搞些什麼呀！”我還記得他如何

一面哭，一面說，一切都是我的过失，因为我一口咬定船长信中指的是尼古拉·安东內奇，但結果却指的是一位維什米爾斯基爵士。

我若是处在柯拉布略夫的地位，决不会提起那次的談話。可是看样子，他却很希望我能回忆起那次的談話。他很严肃地看着我，并且好象因着什么事在暗自得意。

“我不知道有誰需要我来証实什么問題，”我愁眉不展地說道，“我看不出有什么人需要我这样作。”

“薩尼亚，这你就錯了，”柯拉布略夫說道。“这是十分需要的，無論对你自己，对于我，以及对于另外一个人說来都是十分需要的。何况你的确是对的。”

我瞪着眼睛看着他。我們那次談話之后已經过了五年。我現在所知道的关于塔塔林諾夫船长探险队的事情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多。我找到了航海长的日記，并且讀完了这些日記，这是我一生中最艰巨的工作。我很幸运地遇見了涅涅茨老人，他是亲眼看見探险队的雪橇的最后的一个人，这辆雪橇上的尸体很可能就是船长。可是我并沒找到一件可以說明我在这个問題上是正确的証据。

而現在，当我回到莫斯科，来到自己的老教員家里，滿以为他早就把这件事情忘記了的时候，他却对我說：“你的确是对的！”

“伊万·巴甫雷奇，”我声音不很坚决地說道，“有些事情您也不必太坚持了，假使您沒有……”

我正想說“沒有确凿的証据”时，可是他阻止了我。好象是門鈴响了。柯拉布略夫不安地咬了咬嘴唇，向周围看了看，按住我的肩膀說道：

“是这样，薩尼亚……我現在需要和一个人談談話。你就在

這兒先坐一會兒。”

他把我帶到隔壁的一間屋子裏去，這屋子有點象一個堆滿了書的大櫃子，房門口挂着一塊破得滿是窟窿的綠色門帘。

“讓你听听，对你也有好处。”

我還忘了說一說伊萬·巴甫雷奇的情形。他這天晚上一開始就使我感到有些奇怪。他幾次低聲地吹起口哨，用手抱着头來回踱着，最後竟把剔牙齒的梨梗也吞到肚裏去了。現在，他把我裝進了“櫃子”，就匆匆忙忙地收拾了桌上的伏特卡酒，從書桌抽屜裏取出什麼東西來吃了一點兒，又張大嘴喘息了一會兒。然後就去開門了。

諸位想一想，他是和誰从前廳裏走進來的？和尼娜·卡比丹諾芙娜！這是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她的脊背已經彎了，比从前更加瘦了，眼圈邊上有了上了年紀的人的跡象，披着她那件老是穿在身上的絨坎肩。

我沒听她說些什麼話，我只注意着伊萬·巴甫雷奇怎樣殷勤地讓客人坐下。他正要給她倒茶，但是她阻止說：

“不想喝，剛才喝了。喂，怎麼樣？”

“有點不舒服，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柯拉布略夫說道。
“脊梁痛。”

“真的嗎？老了啊！亂想些什麼呀！脊梁痛，擦點朋班格就好了。”

“什麼，您說什麼？朋班格？”

“朋班格。一種藥膏。您還喝酒嗎？”

“說良心話，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我不喝酒了，”柯拉布略夫說道。“完全戒掉了。偶爾飯前喝一小杯。這種喝法連醫生都贊成的。”

“不对，您还在喝。我年轻的时候住在村子里。我的父亲是个哥萨克。他有时回来的时候，脚都站不稳，还说：‘这没有关系，最要命的是每天午饭前喝一杯酒。’”

柯拉布略夫笑了，尼娜·卡比丹诺芙娜看了看他也笑了。

后来，她还讲了一个爱喝酒的伯爵夫人，她“早晨刚一睡醒，——咕嘟咕嘟就是一杯伏特卡酒！然后就出门。她也不戴头巾，一张脸又黄又肿。出去逛够了，回来又喝。上午她还很正常，等到吃午饭时走路就不稳了，可是一到晚上，又是宾客盈门。她穿戴得很华丽，坐在钢琴前面，边弹边唱。她是个善良的人！有事大家都来找她。动不动就是——到伯爵夫人家里去！人倒是个好人！就是爱喝酒！”

柯拉布略夫大概不很喜欢这个例子，所以他竭力想把谈话转移到别的题目上去。他问卡佳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尼娜·卡比丹诺芙娜悄悄地摆了摆手，叹息说：

“我和她老是吵嘴。她的自尊心很强。一件事情还没有成功又搞另一件事情。因此她总是那么急躁。”

“急躁？”

“急躁。还很自傲。总也不说话，”尼娜·卡比丹诺芙娜说道。“我碰到的这些不爱说话的人也够多了。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她老不说话。真不明白一个人干嘛不说话呢。有什么烦恼你就说一说嘛。可是她就偏不说。”

“您不妨问问她，尼娜·卡比丹诺芙娜。”

“她不会说的。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我多嘴也不说。”

“我有一次碰见她，觉得还没什么嘛，”柯拉布略夫说道。“她是到戏院里去，只她一个人，的确，我也觉得有点奇怪。不过看

来她还满高兴的，并且說地質学院答应給她一間屋子。”

“答应了。可是她沒有搬去。”

“为什么？”

“可怜他呀。”

“可怜他？”柯拉布略夫又問了一次。

“可怜他呀。她因为想念母亲，也就可怜他。他也是，一会儿不見她也不成——你瞧那付勁兒吧：一走进門，馬上就問：‘卡佳在哪兒？打电话回来了嗎？’”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是指的誰，他就是尼古拉·安东內奇。

“所以她沒有搬走。而且总是在等着一个什么人。”

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挪到另一张安乐椅上，坐得更近一些。

“我有一次看了她的信，”她鬼鬼祟祟地低声說道，并且向周围看了看，仿佛怕卡佳会看見她似的。“大約是假期里卡佳他們在恩斯克好起来的。他的妹妹写信來說：‘每一回来信他总是請求我告訴他：‘卡佳在哪兒？她怎么样？我願意牺牲一切，只要能看見她。’他沒有你便活不下去，我实在不了解你們这次沒来由的爭吵’”。

“对不起，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我不明白。您說的是誰的妹妹？”

“誰的？就是那个人的，您的学生的唄。”

柯拉布略夫不由得向我这边看了一眼，我从門帘上的窟窿里正好碰上了他的眼光。說我的妹妹？薩尼亚？

“这也是常有的事嘛，可能事实上就是这样的，”柯拉布略夫說道，“大概真是活不下去。問題很明显。”

“‘总是請求。’”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富有表情地重复說道。
“‘他沒有你便活不下去’。你瞧瞧！可是她沒有他才真活不下去哩。”

柯拉布略夫又向我这边瞟了一眼。

我覺得他的鬍子下面藏着微笑。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但她不是要嫁人了嗎？”

“她沒有这个打算。这不是她的主意。”她这样說道，“因为她不願意嫁給那个羅馬紹夫。我也不願意她嫁給他。这个小神甫。”

“什么小神甫？”

“他就是小神甫。还是个牛皮专家。不管对他說什么話，他馬上就添油加醋地講起来。我最恨这种人。并且还是个騙子。”

“得啦，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您怎么啦！”

“騙子。他借了我四十个卢布，就好象是我送他礼似的，一直沒有还給我。当然，我也沒有去提它。老是忙来忙去，无事忙。我的上帝！要不是我已經老了……”

她很痛心地把手一甩。

現在諸位可以想象我听到这番談話时的感情是怎样的！我从門帘的窟窿里看着老太婆，这个小窟窿就好象是一个鏡頭，我和卡佳之間发生的一切都映在这个镜头里，一时比一时明显，宛如落在了焦点上。过去的一切慢慢接近了，而且都恢复了原样。这一切是那么丰富，而且称心的事情又是那么多，以至于我的心都颤抖了起来，我明白自己激动得很厉害。只有一件事情完全不能理解：我从来也沒有向妹妹“总是”請求，而且从来也沒有写信对她說“我沒有卡佳就活不下去”呀。

“这是薩尼亚編造的，一定是这样，”我对自己解释道。“她一直在哄騙她。不过，这个情况倒是真实的。”

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还在講什么話，可是我再也听不下去了。我忘記了一切，竟至在自己的这間“柜子”里乱走动起来，直到听見柯拉布略夫严厉的咳嗽声，我才清醒了。

我坐在“柜子”里，一直等到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走了。我不知道她是来干什么的，也許只是为了散散心。在告别的时候，柯拉布略夫吻了吻她的手，她吻了吻他的額角。他們过去一向是这样告别的。

我正在想得出神，也沒听見他从前厅里回来的声音，突然我从两幅門帘的縫隙里，看見了他的鼻子和鬍子。

“还活着嗎？”

“活着，伊万·巴甫雷奇。”

“你想說什么？”

“我說，我是一个不可救藥的大傻瓜，”我抱着头答道。“我是怎样和她談話的！啊！我怎样和她談話的！我怎么会一点也不明白！我怎么什么話也沒有对她說，原来她在等我呀！她会怎样感觉呢，伊万·巴甫雷奇！她現在会怎样想我呢！”

“没有什么，改变想法了。”

“不，这是永远也不会的！您知道我对她說的什么話嗎？——‘我将永远关心你的一切’。”

柯拉布略夫噗哧笑了。

“伊万·巴甫雷奇！”

“你不是写信說沒有她便活不下去了嗎。”

“我沒有写过！”我极力分辯道。“这是薩尼亚編造的。不过这个情况是真实的！伊万·巴甫雷奇！这是绝对真实的。我沒

有她便不能活，而且我們之間的确是沒來由的爭吵，因為我以為她早就不愛我了。現在怎麼辦呢！怎麼辦！？”

“是這樣，薩尼亞，我九點鐘在一個戲院里還有一個約會，”他說道。“那麼你……”

“好吧，我現在就走。我現在就去找卡佳，可以嗎？”

“她會把你趕出來的，而且趕得完全對。”

“讓她趕吧，伊萬·巴甫雷奇，”我說罷突然吻了他一下。“鬼才曉得，我實在不知道現在該怎麼辦？您認為該怎麼樣，嗯？”

“我現在要換衣服了，”柯拉布略夫說罷便往“櫃子”里走去，“至於你，我認為你應該趕快清醒過來。”

我看着他脫下軍服上衣，拉起軟衬衣領，開始系領帶。

“伊萬·巴甫雷奇，”我突然大聲嚷道。“等一會兒！我還忘了，關於我們從前爭執的船長信里所指的是誰那個問題，您說我的確是對的！”

“是的！”

“伊萬·巴甫雷奇。”

柯拉布略夫頭髮梳得整整齐齐的從“櫃子”里走出來，他穿了一件灰色的新西服，樣兒顯得很年輕，很體面。

“現在我們先到戲院里去，”他很正經地說道，“等一會兒你就都會明白了。你的任務就是好好坐着，不准說話。只管聽。明白了嗎？”

“一點也不明白。走吧。”

5 在剧院里

莫斯科剧院！如果从格里沙·法伯尔的那付神气来推断，一定会以为这是一所规模庞大，真正了不起的戏院，里面的演员穿的都是漂亮的白色长袜套，谈吐优美，声音宏亮，就同莫斯科艺术剧院一般。哪知它却是在斯列琴克区一条胡同里的一个小戏院。

入口处的戏报栏前灯火辉煌，告诉人们正在上演“狼路”，我们很快就在演员表中找到格里沙的名字。他扮演一个医生：“医生——格·法伯尔”。不知为什么这个角色排列在最后。

格里沙和往常一样体面，在门厅里迎接我们，并且立刻就把我们请到他自己的化妆室里去。

“等第二幕开始时，我就叫他来，”他很神秘地对柯拉布略夫说。

“他”是谁？我看了看柯拉布略夫，他正在把一支烟卷往长烟嘴里按，并故意作出似乎没有注意到我在看他的样子。

在格里沙的化妆室里还坐着三位演员，那付神气就象是坐在自己的化妆室里一般。当格里沙招待我们坐下的时候，他们就很客气地退出去了，此时格里沙便因为房间问题抱歉地说：

“我自己的化妆室现在正在修理。”

我们谈起我们的学校剧团，回想起“时间到了”那幕悲剧，格里沙在这幕戏里扮演犹太人的养子。我说，我认为他演这个角色实在演得太好了。格里沙乐了起来，他的架子也顿时消失了。

“薩尼卡，我真不明白，你那时候不是很爱繪画嗎，”他說道。“怎么你却突然到天上飞起来了呢？到我們戏院里来吧，真見鬼！我們会把你培养成一个艺术家的。怎么样，不好嗎？”

我說同意。随后格里沙又請我們原諒，因为他快上場了，化妆师在等他，于是便出去了。这时只剩下了我們两个人了。

“伊万·巴甫雷奇，亲爱的，請您告訴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您把我带到这儿来干什么？‘他’是誰？您想介紹我和誰認識？”

“你不会作出什么傻事来吧？”

“伊万·巴甫雷奇！”

“你已經作了一件傻事了，”柯拉布略夫說道，“甚至是两件傻事。第一，你没有先到我这兒来一趟。第二，你对卡佳說‘我将永远关心你的一切’。”

“伊万·巴甫雷奇！可是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呀！您只简单地写道：‘到我这兒来。’我没料到事情这么重要。請您告訴我，我們在这兒等誰？这人是誰？为什么您想讓我見他？”

“好吧，”柯拉布略夫說道。“不过你得記住我們的約言：好好坐着，不准說一句話。他是維什米爾斯基爵士。”

諸位已經知道，我們当时是坐在莫斯科剧院格里沙的化妆室里。可是这时候，我仿佛覺得这一切不是发生在化妆室里，而是发生在舞台上，因为伊万·巴甫雷奇才一說完話，維什米爾斯基爵士就走进屋里来了，他拱着腰，怕把头碰在低矮的門框上。

我当时就明白了这是他，虽然在这以前，我脑子里从来没有想到人世間会真有这么一个人。我一向以为是尼古拉·安东內

奇捏造出了这么一个維什米爾斯基爵士，好把我的一切責難推卸到那人身上去。过去这只是一个名字，現在却突然成为现实，变成了一个細长干癯，腰都伸不直的黃白鬍子的老头兒。現在我們才明白，他只不过是維什米爾斯基，而不是什么爵士。他身上穿着亮晶晶的銅扣子制服，是一个看管衣帽的人！他前額上的头发已經斑白，下巴的皮肤皺成一道道很长很长的皺紋。

柯拉布略夫和他問好，他輕輕地，甚至十分恭敬地向他伸出手來。

“啊，原来是柯拉布略夫同志，我道是誰在等我呢，”他說道，“而且还不是一个人，还帶着公子。是令郎嗎？”他急速地問道，并且急速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又看了看柯拉布略夫，然后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柯拉布略夫。

“不，他不是我兒子，是我从前的学生。他現在是飛行員，想和您認識認識。”

“飛行員，还想和我認識認識，”維什米爾斯基不愉快地笑着說道，“飛行員对我个人感到什么兴趣呢？”

“您使他感兴趣的是在这方面，”柯拉布略夫說道，“您大概不知道，他在写塔塔林諾夫船长探险队的历史。大家都知道，您曾經积极地参加过这个探险队的工作。”

看样子維什米爾斯基不太喜欢这种說法。他又急速地瞥了我一眼，在他那老年人的泪水模糊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迅速地閃了一下——是恐怖，还是疑竇？我不知道。

不过他的劲头馬上就來了，象放連珠炮似的滔滔不絕地說了起來。他一句一个“柯拉布略夫同志”称呼着伊万·巴甫雷奇，自吹自擂得令人难以忍受。他說那是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探险队，說他“为了使一切好到极点”作了許許多多工作。——

这时他簡直一分鐘也坐不住了，一會兒站起來，作着各式各樣的手勢，揪住左面的鬍子，神經質地往下拽……

“不過，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最後他仿佛很感嘆地說道。

“却也不算太早，”柯拉布略夫辯駁道，“就在革命以前不久嘛。”

“是的，革命以前不久。我那時不在老殘互助組里工作。不過這是臨時的，是服務。因為我有很大的功勞。我們那時工作很多。都是些重要的勞動。”

我正想問他這些勞動具體是指的什麼，可是柯拉布略夫用一種很平靜的，仿佛絲毫也不表示什麼的眼光看了我一眼，於是我就乖乖地閉上了嘴。

“尼古拉·伊萬內奇，您曾經和我談過這個探險隊的事，”柯拉布略夫說道，“記得您還保存着一些文件和書信。我有一個請求：請您給這個年輕人再講一遍，您可以直接稱他為薩尼亞。請您指定一個日子和時間，同時給他留一個地址，讓他到您家去。”

“請來吧！我很歡迎！雖然事先我很抱歉寒舍簡陋，但還是請您到我家里去。過去我有一套十個房間的住宅，我並不隱瞞這點，相反的，我還要寫在調查表里面，因為我對人民有很多貢獻。為此我還申請過養老金，我想他們會批准的，因為我有很大的功勞。這次的探險那只不过是滄海一粟！我還修過橫跨伏爾加河的大橋。”

於是他又象決口的河水一般滔滔不絕地說了起來，他頭上長着一簇尖尖的，向前伸出來的灰白頭髮，很象一只衰老的飽經風霜的鳥兒。

后来格里沙化妆室里的电灯忽然熄了一下，——幕終了！——这个上一世紀的幽灵就象来的时候一样突然消失了。

这次全部談話只持續了五分鐘，但是我却覺得象是在夢中一般進行了很久。柯拉布略夫看了看我笑了，大約是因為我當時的樣子顯得很傻。

“伊萬·巴甫雷奇！”

“什麼，親愛的？”

“這是他嗎？”

“是他。”

“能有這樣的事嗎？”

“能。”

“就是這個人？”

“是這個人。”

“他對您講過些什麼？他認識尼古拉·安東內奇嗎？他常到他們那兒去嗎？”

“不的，”柯拉布略夫說道，“他正是不願意去。”

“為什麼呢？”

“因為他恨尼古拉·安東內奇。”

“為什麼？”

“為了種種事情。”

“他究竟對您講過些什麼？那份署名維什米爾斯基爵士的信托書究竟是从哪兒來的呢？您還記得曾經和我談過這份信托書嗎？”

“哦——哦！問題就在這裡！”柯拉布略夫說道，“就在信托書上！當我問起他這份信托書時，他簡直氣得發抖。”

“伊萬·巴甫雷奇，請您把這件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我！您

以为一直到最后一分鐘才告訴我他是維什米爾斯基这种作法好嗎？这只有使我惊惶失措，他大概还以为我是个白痴哩。”

“正相反，他很喜欢你哩，”柯拉布略夫一本正經地說道。“他有一个成了年的女兒，因此他对所有的年輕人都从一个角度去着眼：‘适不适合于作他的女婿？’你无疑是非常适合的：年輕，漂亮，还是飛行員。”

“伊万·巴甫雷奇，”我以責备的口吻說道，“說实話，我真不了解您。您变得太多了，实在太多了。您知道这件事对我多么重要，却还在打趣我。”

“好吧，薩尼亞，別生气，我全都告訴你，”柯拉布略夫說道。“不过，讓我們先从这兒溜走了再說，否則格里沙馬上就会捉住我們，把我們留在莫斯科剧院看戏……”

但是，我們还没有来得及溜走，电灯又閃了一下，格里沙急急忙忙地走进了化妆室。他戴着紅褐色的絡腮鬍，白色的长鼻子，与其說是象医生，还不如說是象一个杂技团里的小丑，不过是一个脸部表情英勇善良的小丑。我和伊万·巴甫雷奇一下子沒有認出他来，而且，糟糕的是“留在莫斯科剧院看戏”这最后一句話无疑問的是传进他耳朵里去了。但是，显然格里沙并没有发现这句话里有什么令人不愉快的意思，而且相反地，他以为我們迫切地希望赶快到劇場里去看戏，和看他扮演的医生。

“是这么一回事，我馬上就給你們找地方。”他說道。

他引我們走一条演員們走的內部通道，路上我問他为什么他这个医生化妆得这样古怪。想不到他却神气十足地回答道：

“这就是用意深刻微妙之处。”

我一时沒有想出怎样来反駁他。

伊万·巴甫雷奇对格里沙的才能大約估价不高。不过我却

是真心喜欢他，我发见他有天才。他在这出戏里只是个很小的配角，可是我認為他演得很出色。他离开病人走出来的时候，沉思了一会兒，在前台站了相当长的時間。这是“捉弄观众的情緒”，讓观众去揣測他将要說什么話。可惜由于角色的关系，只允許他說些同他的作功和脸部那种勇敢的表情完全不相称的話。他在开药方时那种斟酌再三的表情演得非常逼真，他在接錢时，手部的那种不自然的动作簡直和一个真正的医生完全一样。不过，他說話的声音能不那么高就更好了。总而言之，他这一个角色演得很好，我很正經地对伊万·巴甫雷奇說，我認為他将来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演員。

他接过錢走出来时，不小心撞到了椅子上，这一个动作也演得很自然。后来我和伊万·巴甫雷奇就再沒有去看台上了。

我总是想談一談关于維什米爾斯基的事，可是我刚一开口，包厢里立刻有人发出嘘嘘的声音制止，因此我就問了一句：

“您怎么找着他的呢？”

伊万·巴甫雷奇也刚来得及回答說：

“很簡單：他的兒子在我們学校里学习。”

6 又有許多新聞

我对支票这些事情向来是一窍不通，因为在我开始讀書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詞。什么叫“借据”？什么叫“票据”？什么叫“保险单”？“保险单”就是“保险单”，而不是北极，这是誰都知道的。什么叫“貼現”？“貼現”就是“貼現”^①，而不是高音。

当我在書本上碰到这些詞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使我

回想起恩斯科的“候审室”：在那半明半暗的高大走廊中的铁椅子，母亲向他低三下四求情的，坐在木栏杆后面一个看不见的官老爷。当维什米爾斯基对我叙述他的不幸的往事时，这种昔日的，早已被忘怀的生活，又逐渐地在我眼前复活了。

我們坐在一間狹小的地下室里，从地下室的窗戶望出去，不时可以看見扫帚和脚：大約是清道夫站在那里。这间屋子里的一切东西都很陈旧，椅子腿用繩子綁扎着，我刚把胳膊放到飯桌上，就連忙縮了回来，因为桌边上的木板眼看就要垮下来。到处都是肮脏的包袱布：窗戶上的窗帘，破烂的沙发套，連牆上挂着的衣服也是用这种布遮盖着的。这间屋子里的新东西只有維什米爾斯基的兒子——一个圓脸蛋兒，晒得黑黑的十二岁的小孩，在屋角他自己桌上摆弄着的小木板，綫軸和鉄絲卷兒。还有这个孩子也完全是新的，他距离我在听維什米爾斯基講故事，講他的那些“貼現”和“期票”时所隱隱約約能够回想到的那个世界是无限遙远的。

这是一个冗长的、錯綜复杂的故事，中間穿插着許許多多荒唐透頂的枝节。这个老头兒把他生平所作的一切事情都說成是功劳，因为“这些事都是为了人民，为了人民”。他特別着重地說自己担任伊西多尔大主教秘書职务的这件事，——他声称自己对神甫阶层的生活知道得很清楚，甚至还特別研究过，以期“对人民有利”。他随时都准备揭发这个大主教。

他竟把自己另外一个职务，給一个叫作什么海克爾特的海軍上将当差也算作是功劳。这位海軍上将有一个“神經病兒子”，維什米爾斯基就帶着他到各个餐厅里串，为的是不讓人猜

① 俄文中的保險單 полис 和北極 полюс 很相近，貼現 дисконт 和高音 дискант 很相似，都只差一个字母。——譯者注。

到他有神經病，因为“他們不讓人知道这件事”……

等他談起尼古拉·安东內奇来的时候，我就連忙豎起耳朵来听了！我从前以为尼古拉·安东內奇一向就是教育家。是一个典型的教育家！因为他甚至在家里也教导人，給人講道理，引用实际的例子。

“沒有的事，”維什米爾斯基恶狠狠地把眉头一皺反駁道。“这是他山穷水尽，不得已而走了末路。他从前有买卖。他一面跑交易所，一面还有买卖。是一个既跑交易所，又作买卖的闊佬。”

这是第一件新聞。跟着还有第二件。我問他，塔塔林諾夫船长的探险队和跑交易所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尼古拉·安东內奇要攬探险队的事呢？难道这也有利可图嗎？

“如果探险队完了蛋，那他搞起来兴致还更大哩，”維什米爾斯基說道。“他就是希望这样，非常的希望。結果正是如此。”

“我不明白。”

“他爱上了他的妻子，当时大家对这件事情議論紛紛，真是議論紛紛。这已經是大家传来传去的閑談資料了。但是船长一点也不疑心。他是个好人，可是心地很單純，真是一个热心能干的老好人，热心能干的老好人！”

我感到万分惊讶。

“爱上了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还是在那个时候？”

“对，对，对，”維什米爾斯基耐不住地重复說道。“这里面有很多私人的原因。您要懂得这是私人的。私人，私人，私人的原因。他为了把这位船长打发到阴間去，可以牺牲自己全部家財。結果真是打发去了。”

不过爱情終归是爱情。生意究竟是生意。尼古拉·安东內奇并没有牺牲他的财产，相反的，他的财产还打了一个滚。例如他接受了承包商的賄賂，就把霉烂了的衣服收下給了探险队。他收下了带煤油味的别庄的巧克力糖，也同样是因为受了賄賂。

“这是伤天害理，伤天害理的行为，”維什米爾斯基說道。“有計劃的！伤天害理的計劃！”

不过，維什米爾斯基过去对这个計劃的看法显然和現在不一样，因为他也参加了这个計劃，并且被尼古拉·安东內奇派到阿尔汗格爾斯克去，在那兒接探险队，并給探险队补充給养。

这时就出現了尼古拉·安东內奇給柯拉布略夫看的那份信托書。連同这张信托書一起汇給了維什米爾斯基一笔錢，有支票也有現款……

随后，老头兒气憤憤地哼哧着鼻子，从櫥柜里取出几张支票来。支票一般就是一张保証按規定日期归还款項的签字收据。但这种收据是用很結实的，上面有水印的国家的鈔票紙开的，样子很华丽，使人深信不疑。維什米爾斯基向我解釋說，当时这种支票可以代替現金流通的。不过支票又不完全等于鈔票，因为“签票人”可能突然宣布說他沒有錢。

这里面就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欺騙勾当，他之所以控告尼古拉·安东內奇，就是因为上了其中的一种当。

他控告尼古拉·安东內奇，是因为尼古拉·安东內奇連同信托書一起汇給他的那些支票是“无效的”，也就是說，尼古拉·安东內奇早就知道“签票人”已經破产，不能再兌現了。可是維什米爾斯基并不知道，就把支票当作現金收下了，因为“签票人”是各行各业的商人，和一些当时很有名望的人。只是到帆船出航后，留下一笔四万八千卢布的債務时，他才知道上了当。这时

自然誰也不會收這些“無效的”支票來抵償債務了。

這麼一來，維什米爾斯基就只好從自己口袋裡掏錢來償付債務。可是後來因為尼古拉·安東內奇又把他告到了法院，法院判決追還他去阿爾汗格爾斯克時尼古拉·安東內奇匯給他的全部款項，所以他又不得不再償付一次。

當然，這些事情我在这兒敘述得很簡略。老头兒一會站起來，一會坐下，整整對我講了兩個鐘頭。

“我一直告到最高法院，”最後他聲色俱厲地說道。“可是我敗訴了。”

他敗訴了，事情就結束了，因為他的財產都拍賣光了。他原先有所房子，房子也賣了。他只好搬到另外一所較小的房子里去住。接着他的老婆也憂愁死了，留下幾個未成年的孩子。後來革命了，他那所較小的房子最後就剩下了現在這麼一間勉強住得下的屋子。當然，“這是暫時的”，因為“政府很快就會重視他給人民立下的功勞”，不過暫時他還不得不住在這兒。可是他有一個已經成年的，掌握了兩種語言的女兒，就是因為這間屋子過於簡陋，害得她嫁不出去；丈夫無門可入呀。等到養老金批下來以後，他就搬家。

“哪兒都行，哪怕進老殘院也行，”他痛苦地把手一甩說道。

這位成了年的女兒顯然是急于出嫁，所以她總是在趕他。

“尼古拉·伊萬內奇，”我對他說道。“我可以向您提出一個問題嗎？您說他把這張信託書給您寄到阿爾汗格爾斯克，怎麼會又重新落到了他的手里了呢？”

維什米爾斯基站了起來，他的鼻孔鼓得老大，頭上翹着的那一簇斑白頭髮也因為憤慨而顫抖起來。

“我把这张信托書朝他脸上擲回去，”他說道。“他跑去弄水，可是我沒有喝。我出門走到街上就暈倒了。还有什么可說的呀！”

于是他又痛苦地把手一甩。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听着他講。在这个故事里有一种和这兒周围的一切不相上下的肮脏东西，因此我老是想洗一洗手。我原来以为这次談話将是証明我是正确的一件新証据，它新奇得就如同这个人物的突然出現一般。結果的确是如此。不过，我也感到很不舒服，因为在这些新的証据中染上了一块污秽的痕迹。

后来他又談到养老金：“他們一定会发給我养老金的，因为我已有四十五年的工龄。”已經有一位年輕人到他这兒来过，并且把文件都拿去了，同时他对尼古拉·安东內奇也很感兴趣，可是后来便再沒有来了。

“他答应給帮忙，帮忙，”維什米爾斯基說道，“可是后来便沒有来了。”

“对尼古拉·安东內奇感兴趣？”

“对，对，对！当然感兴趣啦，怎么会不感兴趣呢！”

“这人是誰呢？”

維什米爾斯基把手一摊。

“来过几次，”他說道。“您知道吧，我有一个待嫁的女兒。他們在这兒喝喝茶，聊聊天。認識認識！”

一絲淡淡的笑影从他脸上掠过：大約这种“認識”是和某种希望关連着的。

“是的，挺有意思，”我說道。“还把文件拿走了？”

“是的，为了养老金的事，为了养老金的事。便于帮忙。”

“还問过尼古拉·安东內奇的事嗎？”

“对，对。甚至还問我知不知道还有什么人知道，或者了解他干的事……这个家伙干的事！我讓他到一个人那兒去了。”

“真有意思。这个年輕人究竟是誰呢？”

“那么一个相貌堂堂的，”維什米爾斯基說道。“答应帮忙。他說要領养老金这些材料都是需要的，是个人的，不是別的！”

我問他这人姓什么，可是老头兒想不起来了。

“什么‘紹’，”他說道。

后来那位待嫁的女兒走来了，她确实是應該赶紧出嫁了。不过这个問題并不那么简单，这絕不是因为“丈夫无門可入”。問題在于这个大女兒长着一个其大无比的鼻子，而且总是用一种异常凶狠的样子抽吸着鼻子。我不知道这是因为她患了慢性伤风呢，还是因为一种坏习惯使她不断地做这个动作。但当我看見她那么凶恶地向着她父亲抽吸了一下鼻子的时候，我立刻就明白为什么老头兒那么急于想迁到老残院里去了。

我很有礼貌地向她問了好，她連忙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一趟，回来时就完全变成另外一付模样了：她原来穿一件阿拉伯式的带风帽的斗篷，可是这会儿却是穿着通常的連衣裙了。

我們閑談起来，先談柯拉布略夫，这是我們都認識的唯一的熟人，然后又談到他的那个学生，——他仍旧在屋角摆弄着他的綫軸，一点兒也不注意我們。要不是她的鼻子的那些动作，我們的談話甚至可以說是很愉快的。她說她不喜欢电影，因为电影里所有的人物都是“死人一般的蒼白”，但这时老头兒又拿起他的养老金問題插进来說話了。

“紐多其卡，那个年輕人姓什么来着？”老头兒懼怯地問道。

“哪一个年轻人呀？”

“那个答应帮忙办养老金的人。”

紐多其卡皺起了眉头。她的嘴唇顫动着，立时有好几种感情浮現在她的脸上，但其中主要是憤怒。

“不記得了，好象是羅馬紹夫，”她漫不經心地答道。

7 我們家里有客人

羅馬什卡！羅馬什卡到過他們家里！他答应帮老头兒搞养老金，他追求一个长着那样大鼻子的紐多其卡！最后，他拿走了一些文件，并且失踪了，甚至連老头兒也不能确切地想起都是些什么文件。起初我以为这是另外一个羅馬紹夫，是一个同姓的人。不，这是他。我詳細地形容了他的相貌，紐多其卡憤恨地說道：

“是他！”

問題很明显，他追求过她，后来他又不追她了，否則他也不致于象現在这样狠毒地罵他。他到老头这兒来打听尼古拉·安东內奇的事情，他搜集这些材料，这是为了什么呢？他把維什米爾斯基这兒的文件拿去又是为了什么呢？从这些材料里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結論，就是尼古拉·安东內奇在革命前并不是一个教育家，而是交易所的一个齷齪的投机家。

我从維什米爾斯基那兒回来，感到有些头晕。这兒只有两个答案：不是想把过去的一切毀痕灭迹，就是企图把尼古拉·安东內奇抓在自己手里。

把他抓在手里？这是为什么？他不是他最忠实，最可靠的学生嗎！他还在小学时期就一直是这样，偷听同學們关于尼古

拉·安东内奇的谈话，然后向他彙报。看来这是一件使命！尼古拉·安东内奇委托他了解維什米爾斯基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他暗派羅馬什卡把那些足以使一个苏維埃教育工作者身敗名裂的文件取走。

我走进咖啡店吃了一份冰淇淋。然后又喝了一些飲料。我感到很热，我总在不断地思索。毕业以后，我和羅馬什卡分別已經好些年了。那时候他的确是一个卑鄙，冷酷的动物。不过他对尼古拉·安东内奇却是忠心耿耿的，难道这能是我们的错觉嗎？現在我已經不了解他。也許他轉變了？也許他是瞞着尼古拉·安东内奇，出于对他的爱戴，想把这些可以給他师长，他的密友的美名投上一层暗影的文件毀掉？

但这种假想未免太荒唐了，只要一想起羅馬什卡和他那张蒼白的丑脸以及反常的圓眼睛，便可以恢复对他的现实的認識了。

我又吃了一份冰淇淋。当我要第三份时，給我端冰淇淋的女郎笑了起来。我吃了这么許多的冰淇淋大概很合她的意，所以她还走到鏡子跟前整了整发針。

不，仅只是出于对某个人的好感的話，他向来是什么也不干的。这里面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只是猜不透这个目的是什么，因为我只能从他和尼古拉·安东内奇的旧关系上来判断，而新的关系我又很不了解。

这可能是关系到提升职务之类的一种很单纯的目的。因为尼古拉·安东内奇是教授，羅馬什卡是他的助教。也可能是为了金錢，因为在学校里的時候，他一談到錢連耳根都烧紅了，这也是不无道理的。关系到薪金的問題吧，鬼才知道！

我挂电话給瓦里亚，想同他商議商議，因为最近几年他总还

是到塔塔林諾夫家中去过几次。可是他不在家。同往常一样，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不知在哪儿游蕩！

“不，不是为了薪金，也不是为了地位，”我繼續想道。“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他完全可以用其他較简单的办法，只要看看他这一个人就可以断定这点。”

到了應該回家的时候了，可是黃昏却刚刚来临，这是一个那么具有莫斯科情調的黃昏，和我在北地城所度过的那些黃昏是迥乎不同的。所以，虽然旅館距离很远，我仍然想步行回去。

我慢慢地走去，先向着高尔基大街走，然后順着領子胡同走。这是多么熟悉的地方啊！旅館已經被抛在一旁去了，我还是沿着領子胡同走，然后拐到我們学校旁边的公园凱旋路！大家都知道，从公园凱旋路到特維尔·亚姆二路是很近的，因此我就往二路走去。几分鐘以后我便站在一所熟識的房子門前。我向門里张望了一眼，看見一个熟悉的，洁淨的小院子，和那間熟悉的，我曾經在那兒劈过木柴，帮老奶奶工作过的石头庫房。这是楼梯，我曾經从上面倒栽下来，这是用黑漆布裱糊的房門和写着花体字姓名“尼·安·塔塔林諾夫”的小銅牌……

“卡佳，我来找你，不会赶我走嗎？”

后来卡佳告訴我說，她一見我，馬上便看出我“跟三号那天在大戏院門前完全不一样”。但有一件事她始終不了解：为什么我这次神色和上次完全不一样，出人意料地来到她家，口头上既然說是訪問她，而整个晚上，却目不轉睛地瞧着尼古拉·安东內奇和羅馬什卡呢。

当然，这样說未免有些夸大，不过我的确是老看着他們。这天晚上我用的脑筋就象考試的时候一样，想从片言只語中去猜測和了解問題。

我忘記說一件事，就是在咖啡店的時候我買了一束鮮花。我手里拿着鮮花向塔塔林諾夫家走去。這真有點兒難為情：自從我和彼其加在恩斯克花園里偷紫蘿蘭，散場后再以五個戈比一束賣給觀眾之后，我就沒有拿着鮮花在大街上走過。現在，我到了他們家里，理應把鮮花送給卡佳……但不知為什麼我却把花放在了小桌上帽子的旁邊。

大概我的神情很激動，所以說了兩句話以后，聲音便不由得高起來了。卡佳迅速對着我的臉看了看。

我們正要往她房間里走去，但這當兒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恰好從餐廳里走出來。我向她鞠了一躬。她驚訝地看了看我，很有禮貌地點了點頭。

“姥姥，這是薩尼亞·格利高里耶夫。你認不得了嗎？”

“薩尼亞！天哪，是真的嗎？”

她驚愕地把我打量了一下，這時餐廳的門開着，我看見尼古拉·安東內奇手里拿着報紙，坐在圈椅上。他在家！

“您好，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親愛的，”我說道。“您還記得我嗎？大概早已忘記了吧？”

“嘿！忘記了！我一點兒也沒有忘記，”老太婆回答道。

我們還在接吻，尼古拉·安東內奇從餐廳里走出來，站在門口。

這是我們重新估量對手的一分鐘。他滿可以象在柯拉布略夫的慶祝會上那樣裝作沒有看見我。也可以強調說我們素不相識。最後，雖然這樣作未免有點冒險，但他也仍可以指着門叫我滾出去。他既沒有採取第一種辦法和第二種辦法，更沒有採取第三種辦法。

“哦，年輕的山鷹，”他笑容可掬地說道。“終於飛到我們這

兒來了？早就該如此嘛。”

接着他很爽快地把手伸給我。

“您好，尼古拉·安東內奇。”

卡佳詫异地看着我們，老太婆不知如何是好地眨着眼睛，但我却非常高兴，現在居然也可以和尼古拉·安東內奇隨便談話了！

“是啊，真沒有什麼可說的，太好了。”尼古拉·安東內奇很正經地看着我。“不久前，還是個孩子，可是現在你瞧，已經是北極的飛行員了。要知道你選擇的是什麼樣的職業啊！真是好樣的！”

“這是很普通的職業，尼古拉·安東內奇，”我回答說。“和其他的職業一樣。”

“一樣？需不需要沉着？遇到危險時需不需要勇敢？還有紀律，不僅是執行勤務的紀律，而且是內心的紀律，就是所謂自覺的紀律！”

聽到他這些虛偽的裝腔作勢的話，心里照舊感到作嘔，不過我還是很注意地，很有禮貌地聽他講。我感覺他比在慶祝會那天衰老得多了，他臉上的神色顯得十分疲憊。當我們往餐廳里走的時候，他把卡佳的肩膀抱起來，微微可以看出她躲閃了一下。

餐廳里還坐着一位布賓其可夫家來的姨媽，不過我現在已經分辨不清她是那個想用刷子打我的呢，還是那個勸止山羊的姨媽。不管怎樣吧，她這次却是很殷勤地迎接我了。

“看，我們都在等你嘛！”尼古拉·安東內奇說道。這時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正怯生生地忙着招待我，替我倒茶，把桌上吃的東西都推到我的面前。“我們等您講北極的故事。講盲目

飞行，終年結冰的地帶，漂浮的冰山和雪原！”

“一切都很好，尼古拉·安东內奇，”我很高兴地說道。“冰山就是冰山，雪原仍是雪原。”

尼古拉·安东內奇笑了。

“有一次我遇見一位老朋友，現在在我們駐羅馬的商务代表团里工作，”他說道。“我問他：‘喂，羅馬怎么样？’他回答說：‘没有什么！羅馬就是羅馬嘛。’这和你說的很相似，对不对？”

他的声調很客气。卡佳垂下眼睛，听我們談話。應該設法把談話維持下去，于是我就真的講起涅涅茨人的故事，北极的风光，順便还講了我和医生怎样飞到万龙坎的事。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总是关心我飞的高不高，——这使我回想起在巴拉紹夫航校收到达莎阿姨的一封信。信里說：“既然你命中注定不同凡人那样在地面上行走，薩尼其卡，那么我請求你尽量飞低一点兒。”

我講到米沙·戈洛布偷走了我这封信，从此，我只要一戴上飞行帽，就听到机場上到处都在向我喊叫：

“薩尼亚，飞低一点兒！”

就是这个米沙在航校里办了一种幽默杂志，名称是“飞低一点兒”。杂志里开辟了一个专栏，叫做“飞行技术图解”，上面有这样的一首诗：

有了高度，才好側滑，
拉平与屋檐齐高真糟糕！
薩尼亚，別拿自己开玩笑，
阿姨求你飞低一点兒才好！

这个故事大概講得很成功，逗得大家都笑了，而且尼古拉·安东內奇比所有的人笑得声音都大。他一直笑个不停！同时脸都笑白了，他笑的时候向来脸都要发白的。

卡佳几乎沒有在桌边坐过，老是站着，一进厨房里就是好久不出来，我觉得她走开只是为了一个人好考虑考虑問題，因为她回来时的那种表情就是这样。有一次，当她从厨房里回来时，不知为什么手里拿着一个藤条編的盘子走到食橱前面，但看样子，她又忘了为什么要到食橱前面去。我正对着她的脸看了看她，她回答我的是一种忧虑不安的，困惑的眼光。

尼古拉·安东內奇大約发觉我們在交換眼光，脸上不由得罩上了一层暗影，于是他开始把話說得更緩慢，更圓滑了。

后来羅馬什卡来了。尼娜·卡比丹諾芙娜給他开了門，我听見她在前厅里又怯又恨地說道：

“我們家有客人哪。”

他在前厅里走来走去磨蹭了好半晌，——大概是修飾了一番，——然后才走了进来，并且看見我时装作絲毫不感觉惊奇。

“啊，原来是这位客人！”他假笑着說道。“真高兴，真高兴，非常高兴。非常高兴！”

一眼便可以看出他是否真高兴。不过我却是真的高兴！他刚一走进屋子，我就开始注意他的每一个动作。我的眼睛沒有离开过他。这是一个什么人呢？他現在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呢？他对尼古拉·安东內奇，对卡佳的态度怎样呢？他走到她的跟前，和她談起話来。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話对我說来都是一个小小的謎，不过我馬上就猜透了。我越来越紧张地，細心地注視着他，揣測他的言行。

現在，当我看見他們，看見他和卡佳在一起时，我甚至覺得好笑：他和她相形之下，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多么丑陋和渺小。他很自信地和卡佳攀談，我心里暗想：“你也未免太自信了。”他对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說了句什么玩笑話，可是誰也沒有笑，我心

里又暗自想道：“連尼古拉·安东內奇也沒有笑。”

但是他們立刻就談起了自己的本行——关于一篇學位論文
的答辯問題，尼古拉·安东內奇認為這篇論文不好，可是羅馬什
卡却認為很好。

当然这是故意做作出来給我看的，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強調
我在这兒對他們是無所謂的。不过这样我倒更高兴，因为我
可以一句話不說地坐在这兒，看着他們，听他們講話，考慮問
題。

“不，”我想，“他不是从前那个以絕對听从尼古拉·安东內
奇的命令为荣的羅馬什卡了。他以一种卑視的，几乎是无礼的
态度同他談話，而尼古拉·安东內奇則是皺着眉困倦地在回答
他，这是一种使尼古拉·安东內奇极不舒服的复杂关系。我的
看法是正确的。这不是使命。他从維什米爾斯基那兒拿走文件
不是想把它毀灭。他干这件事是为了把它們賣給尼古拉·安东
內奇，这才象他那号的人作的事！并且，大概获得了很高的价
錢。或者还没有賣，正在講價錢。”

卡佳問了我幾句話，我回答了她。羅馬什卡一面听尼古
拉·安东內奇講話，一面焦灼不安地看看我們。这时，一个想法
突然从其它的思想中緩緩地冒出来，在一旁停留下了，仿佛是等
待着我走到它的近前去。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想法，但是，对一
个从小就了解羅馬什卡的人說来，却完全是很实际的想法。但
現在我却不能停留在这种想法上，因为它实在太可怕了，現在
最好不要去想这件事。我仿佛只不过从远处瞥了它一眼。

后来尼古拉·安东內奇和羅馬什卡不知为什么事到書房里
去了，留下了我們俩和两个老太婆。一个老太婆什么也沒听见，
另一个却假装着什么也听不見。

“卡佳，”我声音不大地說道。“伊万·巴甫雷奇請你明天七点鐘去一趟。你去嗎？”

她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到你們家来沒有关系吧？我很想看見你。”

她又点了点头。

“請你忘掉三号那天晚上吧，总之一切都不是那样，不是那么一回兒事，就算我們还没有見過面吧。”

她默默地望着我，一点兒也不明白。

8 忠貞不渝

这究竟是个什么想法呢？我整个晚上都在考虑它，不知不觉便睡着了。早上醒来时，感觉好象根本没有睡，而且始終在考虑。

整整的这一天都是如此。我怀着这种思想到北极航务总局，到地理学会，到一个北极杂志的編輯部去。我偶尔忘記了它，不过就好象是把它留在大門外，等我出来的时候，又好象碰見老朋友似地碰見了它。

五点多鐘，我疲倦地，滿腹气悶地来到了柯拉布路夫家中。我来的时候他正在工作，批改練習簿。他身旁桌子上放着两大迭本子，他戴着眼鏡坐在那兒批閱，手里握着鋼笔，毫不留情地改正錯誤。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練習；这时正在假期里，学校沒有上課。他就是在假期里也能找工作干。

“伊万·巴甫雷奇，您工作吧，我坐一会兒，好嗎？我累了。”

我們在十分寂靜的氣氛中坐了些時間，只有鋼筆尖刷刷的聲音和柯拉布略夫嘟嘟囔囔發怒的聲音划破了這沉寂。從前我沒有發現他這麼生氣地抱怨過練習。

“喂，薩尼亞，事情怎麼樣了？”

“伊萬·巴甫雷奇，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問吧。”

“您知道羅馬紹夫最近去過維什米爾斯基家嗎？”

“知道。”

“您知道他為什麼到他家去呢？”

“知道。”

“伊萬·巴甫雷奇，”我以譴責的口吻說道。“說實話，我又不了解您了。您早就知道這件事，卻又一點也不告訴我。”

柯拉布略夫很嚴肅地看了看我。這天晚上他的神氣非常嚴肅，大概是因為在等着卡佳，所以有點緊張，而且還不願意讓我看出來。

“薩尼亞，我沒有告訴你的事多著哩，”他辯駁道。“因為你現在雖然已經是個駕駛員了，可是還說不定會突然用腳去踢別人的臉的。”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了啊！伊萬·巴甫雷奇。現在的問題是我腦子裡產生了一種想法。當然，也可能是我想錯了，假使是我想錯了，那倒更好一些。”

“你看，你又激動了。”柯拉布略夫說道。

“我沒有激動，伊萬·巴甫雷奇，您沒有想過嗎？羅馬什卡可能要挾他……他可能說如果尼古拉·安東內奇肯幫助他同卡佳結婚，那麼他就不對外宣揚。”

柯拉布略夫一句話也沒有回答。

“伊万·巴甫雷奇!”我大声喊道。

“你又激动了。”

“我没有激动。不过我有一件事不明白：~~为什么~~怎么能让他有这个念头呢？她是卡佳呀！”

柯拉布略夫沉思地在屋里踱来踱去。他摘下眼镜，脸色变得十分忧郁。我发现他对着玛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的相片瞥了好几次，就是颈上戴着珊瑚项链照的那张相片，现在照旧放在他的桌子上。

“是的，是卡佳，”他慢吞吞地说道。“你现在完全不了解她。”

这倒是件新鲜事。我不了解卡佳！

“你不了解她这几年是怎样生活的。可是我却知道，因为……我关心，”柯拉布略夫急速地说道。“尤其是好象有那么个人不怎么关心她嘛。”

他是在说我：

“她从母亲去世以后十分悲伤，”他继续说道。“可是在她身边还有另外一个人，也象她那样，甚至还比她更悲伤。你明白我说的是谁。”

他说的是尼古拉·安东内奇。

“他是一个很有经验，很阴险的人，”柯拉布略夫继续说道。“一个可怕的人。但他真是一生都爱着她的母亲，一生——这不是一个短时间。因此她的死大大地使他们的关系亲近了，——问题就在这里。”

他开始抽烟，划了一根火柴，手指微微抖动，然后轻轻把火柴放到烟灰碟里去。

“这时插进一个罗马绍夫来，”他继续说道。“我应该告诉

你，你現在連他也不了解了。這也是一個尼古拉·安東內奇，不過是另外一種類型的。第一，他的攻勢更猛。第二，他根本不講什麼道德，既沒有好的道德，也沒有壞的道德。第三，他善于採取斷然的手段，換句話說，也就是一個干實事兒的人。這位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干實事兒不擇手段的人有一天來到他的老師，也是他的朋友家里，對他說道：‘尼古拉·安東內奇，請您想一想吧，原來那個格利高里耶夫完全是对的。您在塔塔林諾夫船長的探險隊身上的確是撈了一把。除此之外，您還有好些事兒沒有在自傳里交代……’這次談話是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聽見的。但是她不懂這是什麼意思，便跑來找我。我當然是理解的。”

“原來是這麼回事，”我說道，“真有意思。”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

“那麼後來又怎樣了呢？”柯拉布略夫繼續說道。“可以根據結果來判斷。你也知道尼古拉·安東內奇的為人，他作事向來是不慌不忙的。起初這件事大概是半开玩笑式的，順便說說，後來却愈來愈認真，愈來愈經常了。”

“伊萬·巴甫雷奇，但他不是終究還沒有說動她嗎，是不是？”

“唉，薩尼亞，薩尼亞，你這人真是個怪物。如果他已經說動了她，我難道還會寫信叫你來嗎。可是誰敢打包票呢！也許他終有一天會達到自己的目的，就象他……”

我明白，他是想說“象他得到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作妻子一樣”。

我不知道是留下來好，還是走了的好，——已經七點鐘了，每一分鐘卡佳都有可能按門鈴。我簡直是下意識地感到難以離

开他。我一声不响地看着他低下斑白的头去，伸出两条长腿在抽烟的神情，我心里想，他是多么深厚地爱着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他是多么不幸，他对她是多么忠贞不渝，这就是他近几年为什么那么留心观察卡佳生活的原因。

后来他忽然想起来，說我最好是走开。

“你不在場，我同她談話更方便一些。”

他送我出来，我們告別說明天再見。

我走到街上的时候，天还很亮，太阳还没有落下去，花园路对面的窗子上反映着夕阳的余輝。

我站在門旁順着街往外瞧，卡佳應該从这个方向来。我大約已經等了相当久，街上的窗戶从左至右順次地暗下去了。后来我看見她了——根本不是从那个方向来的：她从兵工胡同走出来，站在人行道上等汽車过去。她今天仍是穿着那天来大剧院穿的那件連衣裙，当我看到她滿腹心思，愁眉不展地跨过街道时，不知为什么竟感到一陣恐怖。她現在离我很近，可是因为低着头走路，竟沒有看見我。同时我也不願意讓她看見我。我在心里默默地祝她鼓起勇气，把我这时所能够想到的最好的为她祝福，并且目送她到門口。她走进門去不見了，但我思想上还在跟随着她——我看到伊万·巴甫雷奇在迎接她。他很紧张，但竭力作出十分鎮靜的样子，我看見他在开始講話以前，神經質地把一支烟卷往长烟嘴里按了好久……

現在窗戶迅速地暗下去了，只有临着兵工胡同最头上的一幢樓房的最后两个窗戶还残留着淡紅色的余輝；在我讀書的时候，这所房子是莫斯科市苏維埃文化部。

这时才八点种，我还不想回家。我在一所住宅的小花园里坐了很久；从这个小花园里可以看到我們学校的大門。我几次

走进学校的院子里去，想看看柯拉布略夫屋里的灯亮了没有。然而他们是在暮色中谈话，柯拉布略夫在说，卡佳一声不响地听着。

望着这些昏暗的窗子时，我眼前又出现了另外一次谈话的情形。柯拉布略夫也是这样两手交叉着放在胸前，坐立不安地不时突然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玛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直着腰坐着，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偶尔用纤瘦的手理一理梳得很整齐的头发。“鹰爪蒙其哥玛，我曾经这样称呼过他。”她坐在我们面前不停地抽烟，烟灰落得到处都是，她的膝盖上也是。她的脸色已经不是苍白，而是惨白了。她沉静地一动也不动，只是偶尔轻轻地把颈上的珊瑚项链松一松，就好象这条项链窒息着她似的。她害怕真理，因为她经受不住真理的考验。可是卡佳并不害怕真理，要是她知道了真理，一切就都好了。

……灯早已亮了，我看见柯拉布略夫细长的黑影出现在窗帘上。随后卡佳出现在他的身旁，可是很快又走开了，仿佛仅仅说了一句很长的话。

现在室外已经完全黑下来了，这样倒是好一些，因为我在这个小花园里坐得太久了，而且隔不一会又走去看一看对面的窗子，最后自己也感到有些不妥当了。

突然，卡佳从门里走出来，慢慢地独自在花园路上走着。

无疑问她是要回家去。不过看样子，她并不十分急着回家，在回到家里以前，她还有好些事需要考虑。她一面走，一面想，我跟在她后面，这情景就好象在偌大一个城市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卡佳和跟在她后面的我，不过她没有看见我。电车震耳地响着向广场驶去，汽车停在红灯前面怒吼着。我觉得在这样闹哄哄的环境里是很难想什么事情的，更不用说要想通什么问题，

想通你需要想的問題了！这不是我，不是卡佳，不是船长（如果他还活着的話），也不是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如果她还活着的話），不是我們所有的生者和死者所需要想的。

9 她決定搬走

旅館的房間里早已大亮了，但是因为我昨夜忘了熄灯，所以鏡中的我显得有些蒼白。我感到很冷，背上一陣陣地跳起鷄皮疙瘩来。我取下了電話筒。对方很久沒有接。最后有人答話了，我听出是卡佳的声音。

“卡佳。是我，这样早沒有关系吧？”

虽然还刚刚打八点鐘，她却說沒有关系。

“打扰你睡覺了吧？”

“沒有。”

我这一夜都沒有入睡，我相信她也是一分鐘也沒有睡着。

“卡佳，我可以来嗎？”

她沉吟了一会兒。

“来吧。”

……一个完全不認識的，头上盘着金色发辮的胖姑娘給我开了門。“卡佳在家嗎？”当我問她时，她脸都胀紅了。

“在家。”

我魯莽地刚要闖进去，連自己也不知道往哪里去，总而言之找卡佳，但是这位女郎連忙把門关上，打趣地說道：

“您怎么啦，指揮官同志！別这么着急呀。”

随后她就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那么震耳，笑得那么突如其

来，这时再要認不出是她来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了。

“琪玲！”

我們跨過橫隔在中間的箱子向對方撲去，差一點兒沒有擁抱在一起，這時卡佳正好從餐廳里走出來，琪玲很不好意思地往後退了退，所以我只好握了握她的手。

“琪玲，真是您嗎？您從哪兒來？”

“就是我，”琪玲樂哈哈地笑着說道。“不過，請不要再叫我琪玲。我現在已不是那麼一個傻瓜了。”

我們重又熱烈地搖撼着對方的手。……她大約是在卡佳家里睡的，所以身上穿着卡佳的睡衣，當我們收拾東西的時候，這件衣服的扣子一連掉了好幾個。前廳里放着兩個打開蓋子的箱子，餐廳里也有箱子，我們把衣服，書，器具，——總而言之，這屋子里卡佳所有的東西，全部放到這幾個箱子里去。她要走了。到哪兒去呢？我沒有問。她要走了。一切都決定了，她要走了。

我沒有問，因為我不問也知道她和柯拉布略夫談話的每一個字，以及她回家後對尼古拉·安東內奇所說的每一個字。尼古拉·安東內奇不在市里，——他大約是在沃羅柯拉姆斯克的什麼地方。不過反正都是一樣，如果她從柯拉布略夫家里回來以後找着了她的話，我知道她要對他說過的每一個字。

她的樣子很堅決，臉色蒼白，走來走去，高聲地談着話，料理着事情。但這是一個人受了刺激之後的鎮靜，我覺得現在什麼也不需要和她談。我只是緊緊地握住她的手吻了吻，她默默地緊緊捏了捏我的手指表示回答。

真正着了慌的是老太婆。她碰到我時樣子很嚴峻，只是點了點頭，便傲然从我身旁走过去了。後來她突然回來，帶着賭氣的神氣往箱子里塞了一件薄紗短衫。

“这也很好。有什么法子呢？应该这样。”

她在餐厅里坐了很久，什么也不作，只是批评我们装箱子的工作。后来她突然走开了，仿佛什么事也没有似的跑到了厨房里去骂女佣人，因为她把什么东西买少了。

“我对她说了上千次：看见下水^①就买来。”她回来的时候对我说道，“看见好后肘就买来。‘那怎么行呢，你不在我不知道该买不该买呀’。这有什么要知道的呢？一点也拿不定主意。这样的人我看不惯。”

“姥姥，我什么也不要。”卡佳说道。

“不要？怎么能不要？一定要拿着。”

后来她撇开了这些生活琐事，开始叹起气来，并且偷偷地在食橱前服用月桂樱桃药水，有时又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劝自己不要激动。但这些自慰的话对她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于是又跑到食橱前，偷偷地服用月桂樱桃药水。

装检卡佳的东西用不了多少时间。她的东西很少，虽然她所要离开的这所房子是她差不多有生以来就住在里面的。这儿的一切都是属于尼古拉·安东内奇的。但是她自己的东西却也一点也没有留下——她不願意遗留下任何一点东西使她回忆起自己曾经在这所房子里居住过。

她和她的一切——带着她的童年，她的信，玛丽亚·瓦西里耶芙娜保存起来的她的最初的几张图画，还有我在三年级的时候向她借过的“叶林娜·罗宾逊”和“百年来的新发现”都要离开这儿了。

在九年级的时候，我还向她借过一些书，当我们收拾到这些

① 下水(或称下货)，是牛羊猪等的内脏部分的俗称。——译者注。

書籍時，她把我叫過去，並且把門稍微掩了掩。

“薩尼亞，我想把這些書送給你，”她的聲音微微發抖地說道，“這是爸爸的書，我一向十分珍惜它們。但是現在我想把這些書送給你。这里面有南生的書，還有各種航海指南以及他本人寫的書。”

後來她把我帶到尼古拉·安東內奇的書房里，從牆上取下船長的相片，一個前額寬大，下顎緊縮，目光炯炯有神的航海家的美麗照片。

“我不願意留給他，”她堅決地說道。於是我把相片拿到餐廳里去，妥善地把它和枕頭，被窩等放在一個包里。

這是卡佳帶走的，屬於尼古拉·安東內奇的惟一的一件東西。若是能夠的話，她還會把對船長的懷念也從這所骯髒的房子里帶走。

我雖然不知道那個曾經使我感到稀奇的小航海羅經是屬於誰的，但我也瞞着卡佳把它塞進了箱子里去。不管怎樣吧，這總是屬於船長的東西。

一切都完了。當我們收拾好了東西，拿起大衣，在前廳里和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告別的時候，這兒就成了世界上最空虛的地方了。尼娜·卡比丹諾芙娜留下來沒有走，但也不會留得很久，等卡佳搬進了學校給她的房子以後，她也要走的。

“不會留很久，”老太太鄭重地說，老淚縱橫地吻了吻卡佳。

琪拉在樓梯上絆了一跤，為了怕滾下去，就一屁股坐在箱子上哈哈大笑起來。卡佳生氣地說道：“琪爾加，傻瓜！”我跟在她們後面走着，我仿佛看見尼古拉·安東內奇怎樣走上這個樓梯，按門鈴，一言不發地聽着老太太對他講話。他用顫抖的手摸着光禿的頭頂，仿佛怕跌倒似的機械地邁着腳步走進書房里去。

在这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

当然他也猜想得到，卡佳是永远不会回去了。

10 西夫切夫·符拉什克胡同

以前这只不过是莫斯科的一条最普通的，曲曲弯弯的胡同，就象彼其加曾经居住过的义犬广场一样。可是当卡佳搬进了西夫切夫·符拉什克胡同，从此它就真的变了样。正因为它成了卡佳所居住的胡同，所以也就和莫斯科别的胡同迥然不同了。就连这个我过去总觉得可笑的胡同名称，现在也变得意味深长，和一切与卡佳有关的东西一样，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卡佳的味道……

我每天都到西夫切夫·符拉什克去，这时卡佳和琪拉还没有回家，每次都是琪拉的妈妈接待我，陪我谈话。她是一位顶好的妈妈，是一位朗诵演员，常在莫斯科各俱乐部朗诵古典作品。她身材矮小，头发已经斑白，富有幻想，和琪拉完全不一样。她谈什么事情都很热情，使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她喜好文学。这一点和琪拉也不大相象，特别是想起过去琪拉费了多大的劲才读完了“杜布罗夫斯基”，并且还错认为最后“玛莎嫁给杜布罗夫斯基了”。

和这位妈妈一起有时候能谈上两个钟头，可惜总是谈那么一个瓦尔瓦拉·拉宾诺维奇。这人也是一个朗诵家，不过她很有名气。琪玲的妈妈本来想向她请教的，可是因为这位瓦尔瓦拉“鼻孔朝天”地接见了她，所以她就赌气不去了。

过不一会，琪拉回来了，每次总是这样说：

“哎呀，呀，呀，又是你们俩坐在暗屋子里。真有意思，真

有意思……薩尼亞，我真替媽媽担心呀，”她悲劇式地說道。“她已經愛上你了。媽媽，你怎么啦？这么大年岁还搞这玩意兒！我怕不会有好結果啊。”

結果总是媽媽嘔气走到厨房里去，琪拉踩着脚跟在她后面一面解釋，一面親吻。

随后卡佳回来了。伊万·巴甫雷奇說得很对——我不了解她。問題決不在于我不了解她生活中的許多事情，譬如她的勘查队（她是队长）去年在南烏拉尔发现了一个蘊藏极富的金矿，或者是她的摄影作品在摄影爱好者展覽会上得了一等奖，而在于我不了解她內心的剛毅，她的率直，她对生活的公正而聰明的态度，也就是柯拉布略夫稱贊为“稳重，严肃的灵魂”的一切。我觉得她似乎比我懂事得多，特别是在她談到艺术的时候，这些年来，我在这一方面大大地落后了。不过有时候在她身上又会突然显露出昔日的那个卡佳，那个醉心于爆炸，和因为“費迪南多·科尔特斯怀带着特拉克斯卡兰人的祝福走上征途，日內即将到达火奴魯魯”而深为激动的卡佳。关于費迪南多·科尔特斯的事，我是在看到卡佳穿着男長褲和長統皮靴，肩上背着一枝馬枪，头上戴頂寬边帽騎在馬上所照的一张相片时才想起来的。她成了地質勘查家！船长要是看見这张相片，一定会非常滿意的。

就这样几天过去了，我們还没有談过上次見面后发生的事情，虽然发生的事情那么多，似乎足够談一辈子的。我們好象感觉到應該首先好好地彼此回忆一下，——关于尼古拉·安东內奇，关于羅馬紹夫，以及关于我对不住她的地方，可是我們一个字也沒有提。但是这样并不容易，因为老太太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西夫切夫·符拉什克来。

起初她来的时候样子总是那么庄重，那么客气。她穿着一件带皱折的连衣裙，尽是讲一些过去的事——这时尼古拉·安东内奇还没有回来。她讲了自己一个女朋友的故事。她嫁给了“剪掉头发的神甫”，这个神甫发了财，后来有一天，他走到讲坛上去说道：“公民们，我现在坚决地相信上帝是没有的。”我不知道她讲这故事的意思是什么，——大约是老太太发现这个神甫和尼古拉·安东内奇有些相似的地方。

但是有一次她慌慌张张地跑来，大声喊喊嚷嚷说道：“他回来啦！”

说完马上就把自己和卡佳关在房间里。她临走时气冲冲地说道：

“和别人一起生活，也应该通些世故。”

可是卡佳什么话也没有回答，在分别的时候只是默默地，若有所思地吻了吻她。

第二天，老太婆带着一把伞，哭得眼睛红红的，十分疲倦的走来，坐在前厅里。

“他病了，”她说道，“我请了同种疗法的医生来给他看，可是他却把医生赶走了。他说：‘我把整个的生命都献给了她，可是得到的报答却是如此。’”

她低声啜泣起来，说道：

“他说‘这是支持我活下去的最后的一个人。现在一切都完了’。尽是这一类的话。”

显然一切并没有完，因为尼古拉·安东内奇后来又恢复健康了，虽然严重的心脏病的确使他好几天没有起床。他叫卡佳去。可是她没有到他那儿去。我听见她对尼娜·卡比丹诺芙娜这样说道：

“姥姥，他生病也好，健康也好，活也好，死也好，我都不願意看見他。你明白了嗎？”

“明白了，”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回答道。“她老子過去也是這個樣子。”她臨走時對琪玲的媽媽訴苦道。“怎麼樣才能把這個脾氣改一改呢——哎，哎。哪怕你把她扔到火車底下去壓也不行！真是牛性子。”

但是尼古拉·安東內奇恢復健康了，老太婆也高興了。她現在有時一天要來兩次，因此我們經常可以聽到關於尼古拉·安東內奇和羅馬什卡的最新的消息。不過有一次卡佳也提到了羅馬什卡。

“他到辦公的地方去找我，”她簡略地說道，“但我請人轉告他，說我沒有時間，而且永遠也不會有時間。”

“……他們在寫信，”有一次老太婆告訴我們說。“總是說飛行員‘格’長，飛行員‘格’短。大概這次又要告密吧。那個小神甫簡直氣得快發瘋了。可是尼古拉·安東內奇一聲也不響。他全身都腫了，一聲不響地坐着。披着我的披肩坐着……”

瓦里亞到西夫切夫·符拉什克來過幾次，這時大家就都放下自己的事情，停止了談話來看他怎樣追求琪拉。他的確是非常正規地在追求琪拉，並且十分自信，認為誰也不應懷疑這一點。

他把鮮花插在花瓶里給琪拉送來，總是那幾種花，這麼一來，她的房間就變成了一座小小的月季花和櫻花的花園了。顯然，他看我和卡佳時是在一種半睡半醒的狀態中，只有看見琪拉，有時還有琪拉的媽媽時，他才是清醒的。他也贈送禮物給琪拉的媽媽，譬如有一次，他送給她一本一九一七年出版的“朗誦家”。

有時他振奮起來，便講一講跳鼠或者蝙蝠生活中的一些趣

事。

好在逗引琪拉高声大笑也并不費事……

在西夫切夫·符拉什克的那些个晚上就这样消磨过去了。这是我回到北方以前最后的几个晚上。

我有許多麻煩事情要作：我建議組織寻找塔塔林諾夫船长的探险队的事情还很难說已經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也許是我办事不力吧？

我写了几篇文章：給“民航杂志”写的是在暴风雪中固定飞机的方法，給“真理报”写的是关于航海长的日記，給北极航务总局写了一份报告書。过了几天，刚好在我离开的前一日，我需要到地理学会巡迴大会上作关于“圣·瑪丽亚”号漂流情况的报告，这是最主要的綜合报告。

有一次夜里十二点多鐘，我兴高彩烈地回到旅館，先到看門人那兒去要鑰匙，他說道：

“有您的信。”

随后就递給了我一封信和一份报纸。

这封信很簡短：地理学会秘書通知，因为我沒有按时把报告写成書面的东西交去，所以报告不能举行。我刚把报纸拿到手里，它自己就随着叠縫摊开了。上面有一篇文章，标题是“捍卫学者”。我便开始讀起来，一行行的字顿时在我眼前融合成了一片……

11 忙碌的一天

下面就是这篇文章的内容：

一、莫斯科有一位素享盛名的教育家兼社会活动家尼·安·塔塔林諾夫教授，他写过一系列有关征服与开拓北极的历史方面的文章。

二、有飛行員格某者現正奔走于各北极的业务机关，不惜用一切手段誣蔑这位受人尊敬的学者，硬說塔塔林諾夫教授窃取了自已的堂弟伊·李·塔塔林諾夫船长探险队的財物。

三、該飛行員格某竟然打算作一次有关报告，显然，他还認為自己这种誣蔑是科学上重大的成就。

四、北极航务总局应对此人严加注意，因为他的行为已玷辱了苏維埃北极工作者这一大家庭的名誉。

这篇文章的署名是“伊·克雷洛夫”，使我惊讶的是編輯部怎么好意思用这个伟人的名字署在这样一篇文章上。我毫不怀疑这篇文章是尼古拉·安东內奇自己写的，就是老太婆所說的那“一封信”。报纸是經邮局寄給我的。

“見鬼，要不是他呢？——这时已經夜里三点鐘了，我还不停地走来走去思索着。这封信是地理学会寄来的，毫无疑問，也是他干的。柯拉布略夫早就說过，尼古拉·安东內奇是这个学会的委員，并且責备我不應該把作报告的事告訴羅馬什卡。这篇文章也是他写的！他着慌了。卡佳一走，他就着慌了。”

于是我想象到他披着老太婆的披肩坐着，一声不响，羅馬什卡則放肆謾罵他的場面。这个情况是很可能发生的！

“……他們最不希望的就是北极航务总局叫我去，請我解释！而我現在所爭取的也正是要达到这个目的。”我躺到床上心里还在想这件事。“他的行为玷辱了……”，什么行为呢？关于他的事我沒有向任何人談过。他們希望着我会罢休，我会被吓唬住……

要沒有這篇文章，很可能我會什麼事也沒有替船長作成就離開了莫斯科。這篇文章對我起了很大的督促作用。現在我應該行動了，並且愈快愈好。

不要以為我那时候也象現在回憶這件事情似的這麼鎮定，我有好幾次突然發現自己在想一些極其野蠻的辦法，這些想法刑事調查局是了解得最清楚的。不過只要我一想到卡佳和她所說的話，——“他生病也好，健康也好，活也好，死也好，我都不願意看見他”，——便一切都釋然了。連我自己也對我在这忙忙碌碌的一天中說話，作事所表現出來的那種鎮定感到驚異。

天剛亮我就把計劃擬好了。計劃很簡單，不過从这个計劃中大概也可以看出我實在厭煩和那些文書、秘書之流打交道了。

一、去“真理報”社。反正我要到“真理報”社去一趟，我应当在動身以前把已經答應的一篇文章交了去。

二、到契同志那兒去。

到契同志那兒去，到昔日列寧格勒航校的英雄，後來又成了蘇聯英雄，全國都知道他，都熱愛他的，大名鼎鼎的契同志那兒去——我昨夜里就有了這個念頭，不過當時我覺得這想法太大膽了一點。給他掛個電話是不是妥當呢？他還記得我嗎？我還是飛行學員時，我們就分開了！

但現在我決定了。這有什麼了不起的，即使他已經不記得了，他也不會拒絕我的！

我不知道是誰接的電話，大概是他的妻子。

“我是飛行員格利高里耶夫。”

“唔。”

“我很想見見契同志，”我用他的名字和父名稱呼他。“我是從北地城來的，因此很想……”

“那么您来吧。”

“什么时间？”

“最好今天，他十点鐘从机场回来……”

我到了“真理报”社，这一次我等記者一直等了两个多鐘头。最后他来了。

“啊，飛行員格同志嗎？”他頗为客气地說道。“就是您誹謗了別的人嗎？”

“就是本人。”

“为什么要这样呢？”

“請允許我解释解释，”我很鎮靜地說道。

这是在責任編輯办公室里的一次很严肃的談話。在談話时，我将下列文件順次摆在桌子上：

一、船长最后的一封信。（抄本）

二、开头是“首先我要告訴您的，就是伊万·李沃維奇一切都好”的航海长的信。（抄本）

三、航海长的日記。

四、由医生签字作証的猎人伊万·維尔加的談話記錄。

五、由柯拉布略夫签字作証的維什米爾斯基的談話記錄。

六、鑄有“‘圣·瑪麗亞’号帆船”的黃銅矛鉤照片。

这次談話大概还很成功，因为有位样兒很严肃的同志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另外一位对我說，我那篇关于“圣·瑪麗亞”号漂流情况的文章将在最近几天的“真理报”上刊出……

从“真理报”社到契同志的寓所至少有六公里，可是我走了一半路才想起可以坐电車。我好象发了疯似地飞奔，心里想着我現在該怎样把在“真理报”社的談話告訴他。

不知不觉我已經順着楼梯，順着一座新房子的洁淨的楼梯

走上楼去了。我停在門前擦着脸，——太热了，——同时竭力使脑子慢慢地想点什么事情，这是制止兴奋最有效的办法。

門开了，我通告了姓名，就听见隔壁屋子里他那低沉的，“奥”音很重的声音。

“找我的嗎？”

于是这位为我们从小就热爱着，而且一年比一年更加热爱的人，这位我们未曾目睹，只是耳闻过他许多卓越飞行事迹，而越来越为我们热爱的人向我走来，伸出他那有力的手。

“契同志，”我称呼他的名字和父名，說道，“您大概不記得我了。我是格利高里耶夫。我們曾經在列宁格勒見過面，那时我还是飞行學員。”

他沒有作声。随后便很高兴地說道：

“怎么会不記得呢，真是一只山鷹呀！我記得！”

我們往他的書房里走去，我开始叙述自己的故事，原来他还記得我，这就使我更加激动了起来……

就是在这次和他会面的时候，他送給了我一张亲笔題字的相片：“永远作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說我是屬於那种“持有远程客票”的人。他听我講完了以后說道，关于我的計劃草案問題，他明天就給北极航务总局局长挂电话。

12 羅馬什卡

深夜十二点鐘，我辞別了契同志回到自己家中。这时来串門可說是太晚了，但是偏有客人在等着我，他也确实是一位不速之客，但不管怎样总是位客人。

看門人告訴我說：

“有人找您。”

接着羅馬什卡就迎着我站了起來。

可以這樣說，他這次不只是精神上，而且在肉体上也准备好了拜訪，因為我從來還沒看見他穿戴得這樣的華麗過。他穿的是一件寬大的鐵青色大衣，戴着禮帽，這頂帽子不是戴，而是頂在他那個不規則的大頭上。他的身上散發着香水的氣味。

“啊，羅馬什卡，”我很快樂地說道。“你好，貓頭鷹。”

這樣的歡迎大概使他吃了一驚。

“啊！是的，貓頭鷹，”他笑道。“我完全忘記了從前在學校里的時候大家這樣叫過我。不過真奇怪，你還記得這些學生時代的綽號啊！”

他也竭力作出泰然自若的神氣說道。

“我呀，老弟，什么都記得。你是找我的嗎？”

“假使你不忙的話……”

“一点也不忙，”我說道。“沒一點事。”

在電梯上他始終留心地看着我，大概是在估量我是否喝醉了，如果我喝醉了，他可以從中撈到什麼油水。可是我並沒有醉，只不過是為偉大的飛行員，也是我的老朋友的健康喝了一杯。

“你就住在這兒，”當我很客氣的把圈椅讓給他坐的時候，他說道。“房間挺不錯。”

“沒什麼。”

我等待着，以為他馬上就會問我花多少錢租的這個房間，但是他並沒有問。

“不管怎么样吧，这是个好旅館，”他說道，“不次于‘麦得洛波利大飯店’。”

“也許。”

他希望我先开始談。但是我架着腿坐在那兒，一面抽烟，一面专心一意地研究書桌上玻璃板底下压着的那张，“客人須知”。这时他十分坦白地叹了一口气，开口說道：

“薩尼亚，我們有許多事情需要談一談，”他一本正經地說道。“我們似乎都是很有文化的人，是可以和平的办法来商量和解决問題的。不是这样嗎？”

显然他還沒忘記，我曾經有一次解决“这些問題”用的不是很和平的办法。但他的声調随着每一句話愈来愈强硬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卡佳突然离开了家，但我有权利問一下：这些原因是否和你的出現有关系？”

“关于这个問題你最好去問卡佳，”我很平靜地答道。

他不吭气了。他的耳朵紅起来，眼睛突然变得发了狂的样子，前額也舒展开了。我很感兴趣地看着他……

“然而据我所知，”他又稍微压低了嗓門开始說道。“她是和你一块兒离开的。”

“一点兒不錯。我甚至还帮她收拾过东西哩。”

“是这样噢，”他嘶声嘶气地說道。这时他的一只眼睛差不多完全閤上了，另外一只眼睛却斜着吊起来——这付嘴脸真可怕极了。我还是第一次看見他这付样子。

“是这样噢，”他又重复了一次。

“唔，是这样。”

“是的。”

我們沉默了一会兒。

“喂，”他又开始說道。“我們上次在柯拉布略夫庆祝会上談的話还没有完。我应当对你說，关于‘圣·瑪丽亚’号探险队的問題，我多少也了解一些。我也和你一样，对这个探险队很关心，不过，我的观点或許和你的有些不同。”

我什么話也沒回答。我很了解他的观点。

“另外，你似乎很想知道尼古拉·安东內奇在这次探险工作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至少可以根据我們的談話这样来判断。”

他何止是可以根据我們的談話这样来判断呢。但我沒有駁斥他。因为我还不明白，他現在究竟往哪一边倒。

“我想，我在这个問題上能够帮你的大忙。”

“真的嗎？”

“真的。”

他突然冲我奔过来，我本能地跳起来避到圈椅的后面。

“你听我說，你听我說，”他低声低語地說道，“我知道他的老底兒！我知道他干的那些勾当！我有許多証据，只要事情干得漂亮，准会叫他栽个大觔斗。你以为他是什么人？你以为他是什么人？你以为他是什么人？”

这一句話他重复了三次，身子向前凑得几乎紧貼着我，以至于我不得不抓住他的肩膀，把他稍微往后推开一点兒。可是他并没有理会到这些。

“連他自己都忘記了的那樣一些勾当，”羅馬什卡繼續說道。“是有文件作証的。”

他所說的文件自然是指那些他从維什米爾斯基家弄来的材料。

“我知道你們为什么爭吵。你說他窃取了探险队的財物，他

便把你驅逐出來了。但這是事實。你原來是對的。”

我這是第二次聽到這種承認的話了，不過現在它給我的快樂並不大。我假裝驚訝地說道：

“你這是怎麼啦？”

“那是他！”羅馬什卡帶着一種下流的狂熱神情重複說道。
“我可以幫助你。我把這一切，把全部的證據都交給你。他會四腳朝天地從我們這兒滾開的。”

本來我這時應該沉默一會兒，可是我忍不住了，便問道：

“你要多少錢？”

“隨你的意，怎麼辦都好，”他定了定神，說道。“不過我只求你一件事：請你離開此地。”

“一個人？”

“是的。”

“不帶卡佳？”

“是的。”

“有意思。換句話說，也就是你要我放棄她了？”

“我愛她，”他几乎是傲慢地說道。

“噯，你愛她。這倒有意思。你還希望我們今後不再通信吧，對不對？”

他沒有吭聲。

“稍等一會兒，我馬上就回來。”我說完就出去了。

這層樓的女管理員坐在門口的小桌旁邊，我請她讓我使用一次電話。這時我一邊談話，一面向走廊里看着羅馬什卡走沒有走。他沒有，他恐怕想不到我在給誰打電話。

“您是尼古拉·安東內奇嗎？我是格利高里耶夫。”他反問了一遍，大概以為是聽錯了。“尼古拉·安東內奇，”我客客氣

气地说道，“很对不起，这么晚还来打搅您。事情是这样，我需要会见您。”

他没有作声。

“那么就请到我家来吧，”他终于说道。

“尼古拉·安东内奇！我们这次也不算是谁拜访谁。请您相信我，这个问题很重要，与其说是为我，还不如说是为了您自己。”

他没有作声，我听到他在粗声喘气。

“什么时间呢？总之今天我是不来了。”

“不行，就是要今天，马上就来。尼古拉·安东内奇，”我大声说道，“请您相信我，哪怕一生中就只这一次也行。您一定要来，”我把电话挂上了。

他没有问我住在几号房间。顺便说一下，从这一点也可以进一步证明登载着“保卫学者”那篇文章的报纸就是他寄来的。不过现在我也不管这些小事了，我回来守着罗马什卡。

我想不起还有什么时候，象尼古拉·安东内奇未来之前的二十分钟内这样撒谎和躲躲闪闪地谈问题。我假装对尼古拉·安东内奇以前是什么样的人丝毫不感兴趣，故意仔细打听这都是些什么文件，并且狡猾地用鼻音肯定地说道，我不带卡佳是不能离开的。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叩门了，我喊道：

“请进。”

尼古拉·安东内奇走了进来，没有问好，站在门旁边。

“您好，尼古拉·安东内奇，”我说道。

我没有去看罗马什卡。后来我看了一眼：他坐在椅子角上，把脑袋缩在肩膀里，惶恐不安地倾听着，真是一个十足的猫头鹰，不过比猫头鹰还要可怕。

“尼古拉·安东内奇，”我很鎮靜地繼續說道，“毫無疑問，您是認識這位公民的。這是羅馬紹夫君，您的得意門生和助教，假若我沒弄錯的話，只差幾分你們就要成親戚了。我請您來的目的是想把我和他談話的內容概略地轉告給您。”

尼古拉·安东内奇一直在門旁邊站着，身板直挺挺的，直得出奇，他穿着大衣，手里拿着禮帽。後來禮帽從他手里掉了下來。

“這位羅馬紹夫，”我繼續說道，“在一個半鐘頭以前到我這兒來，提出了下面的建議。他建議我利用某些證件，來證明：第一，您竊取了塔塔林諾夫船長探險隊的財物。第二，您過去還有一些見不得人的事沒有在自傳里交代。”

他的禮帽就是這個時候從手里掉下來的。

“我有這樣一種印象，”我繼續說道，“就是他作這項買賣已不是第一次了。不知道我這個看法對不對。”

“尼古拉·安东内奇，”羅馬什卡突然喊叫起來。“這全是胡說。不要相信他。他在撒謊。”

我稍等了一會兒，等他停止喊叫了再說話。

“當然，現在這件事已經沒什麼價值了，”我繼續說道，“現在的問題只是你們的關係。但您有意識地……”

我早就感到臉上有一根血管在跳動，這很不合我的心意，因為我囑咐過自己，和他們談話應該絕對鎮靜。

“但您有意識地要讓這個人成為卡佳的丈夫。您勸說她，——當然是出自一種卑鄙的思想，因為您怕他。可是現在他竟跑到我這兒來，大喊大叫地說‘他會四腳朝天地從我們這兒滾開的’。”

尼古拉·安东内奇仿佛是猛然醒悟了似地向前邁了一步，

凝視着羅馬什卡。

他看了他很久，久得甚至使我都感到難以忍受這種緊張的沉寂。

“尼古拉·安東內奇，”羅馬什卡又低聲下氣地乞憐道。

尼古拉·安東內奇還瞪着眼睛。後來他終於說話了，使我納罕的是，他的聲音顯得那樣的頹唐和衰老。

“您為什麼請我到這兒來？”他問道。“我正在生病，說話都困難。您想讓我相信他是一個壞蛋，這對我說來並不是一件新鮮事了。您還想來敗壞我嗎，但是您不可能比您以前已經作過的，也是無可挽救的事情作得更多了。”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我看到他的確說話很困難。

“讓她自己的良心裁判吧，”他的聲音仍然是那麼低，但已經換了一種凶惡的表情繼續說道。“因為她相信了那種卑鄙的，迫害了我一生的讒言，連一句話也沒有說就走了。”

我沒有說話。羅馬什卡用哆哆嗦嗦的手倒了一杯水端到他的面前。

“尼古拉·安東內奇，”他低聲低氣地說道，“您不能激動呀。”

但尼古拉·安東內奇用力把他的手推開，水潑到了地毯上。

“我不接受，”他突然摘下眼鏡，在手上捏來捏去，說道。“我既不接受責難，也不接受憐憫。至於她的事，那是她個人的命運。我惟一希望她的就是幸福。但我對舍弟的懷念是任何人也奪不了的。”他啞着嗓子說道，他那長着兩片厚嘴唇的面孔變得陰沉，腫脹了，“我倒是甘願受到這種折磨，哪怕一直到死，因為生命在我早已不需要了。不過，既然沒有這樣的事，那我就

坚决否認这种恐怖的、可耻的控告。如果認為一个証人不够，您就再举一千个伪造的証人也沒有关系，反正誰也不会相信是我害死了他，并且連他伟大的思想，他伟大的灵魂也是被我戕害的。”

我本想提醒尼古拉·安东內奇，他对自己的堂弟并不是一向就这样高看的，但是他沒有讓我講話。

“我只承認一个証人，”他繼續說道。“就是伊万他本人。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控告我，如果真是我錯了的話，那也只有他一个人有这种权利。”

尼古拉·安东內奇哭了起来，他的手指被眼鏡片划破了，掏手絹掏了好久。羅馬什卡跳过去帮助他，可是尼古拉·安东內奇又推开了他的手。

“就是死人到这种地步大概也要說話了，”他說道，一边虛弱地不断喘着气，伸手去取帽子。

“尼古拉·安东內奇，”我鎮靜地說道。“請您不要以为我打算牺牲生命来向人类証明您的錯誤。这件事我早就清楚，同时現在也不只是我清楚了。我請您来不是为了这样一場談話。我不过認為自己有責任当着您的面来揭露这个无耻之徒的真正嘴臉。我并不需要他对我报告您的事情，——何況这些事我早已知道了。您还想和他說什麼嗎？”

尼古拉·安东內奇一声不响。

“喂，那就滾蛋吧！”我对羅馬什卡喝道。

他扑到尼古拉·安东內奇跟前，向他嘰哩哇啦講起什麼話來。但是尼古拉·安东內奇象失掉知覺似地呆呆地站着，两眼直望着前面。只在这时我才发觉他这些日子以来老多了，他多么萎靡，多么可怜。但是我并不怜悯他——還沒有到去怜悯他的

地步。

“滾！”我又向羅馬什卡喝道。

他沒有走，還在嘟囔着，後來他挽着尼古拉·安東內奇的手，扶着他向門口走去。這倒有些出乎意外，因為我想趕的只是羅馬什卡，而不是我自己邀請來的尼古拉·安東內奇。我本來還想問他“保衛學者”那篇文章是誰寫的，伊·克雷洛夫是不是名寓言家的後代，但是我遲了一步，他們已經走出去了。

看樣子，我終究還是沒有把他們的关系拆散。他們挽着手慢慢地沿着長廊走去，只有那麼一會兒，尼古拉·安東內奇停下腳步搔弄起頭髮來。他的頭髮已經沒有了，他以一種痛苦驚訝的神情瞧着手指間留下的細毛。羅馬什卡攙着他的手，替他扑打淨了大衣，他們又穩重地往前走，直到拐角的地方才看不見了。

臨行的前一天，契同志挂電話告訴我，說他已經和北極航務總局局長談過，並親自把我的報告念給他听了。答复是肯定的。今年派遣探險隊已經來不及了，但是明年絕對可靠。計劃草案制訂得很有說服力量，很詳盡，不過航綫的一部份需要再具體一些。歷史的一部份很有意義。他們要召見我一次，通知後發。

這一整天我都在商店里消磨過去了，我想送點東西給卡佳，我們又要分離了。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送她茶壺套子嗎？但她連茶壺都沒有。送她衣服嗎？可是我一向是連紗和綢都分不清楚。送她萊卡照相機嗎？萊卡照相機她倒是很需要。可是要買萊卡照相機錢又不夠。

若不是在阿爾巴街碰到瓦里亞，恐怕就什麼也買不成了。他

正站在書店窗子前想心事兒，要是以前，我可以斷定他是在想野獸保准沒有錯。可是，現在却另有一個需要他動腦筋的對象了。

“瓦里亞，”我說道。“是這麼回事兒。你有錢嗎？”

“有。”

“多少？”

“五百盧布。”瓦里亞答道。

“都給我。”

他笑了起來。

“怎麼，你又打算到恩斯克去追卡佳嗎？”

我們去照相器材商店買了一架萊卡照相機……

對一般人說，我是在夜間一點鐘走的，但我和卡佳直到早晨才分手；我一會兒跑到她家里去，一會兒跑到她辦公室里去。我們這次分別的時間並不太久，她預計八月里到北地城去找我；可是我却期待着上級會在這之前召見我——也許會在七月里。不過我總有點害怕——千萬可不要再長期的別離了……

瓦里亞把登有我的文章的那份“真理報”送到車站，文章完全照我所寫的那樣刊登出來了，只是有一個地方的文字稍有修改。全文縮短了將近一半，不過日記摘錄部份却全部刊登了：“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次的別離，不會忘記他那張振奮人心的蒼白的臉和他的眼光的遠大。這和過去那個紅光滿面活力充沛的人，會編笑話和滑稽故事的人，我們全隊的偶像，對任何一件最艱巨的工作都是處之以談諧的人還有什麼共同之點呢？他講完話以後，誰也沒有離開。他閉着眼睛站着，聚精會神地仿佛準備說兩句送別詞。然而，送別詞還沒有說出，卻迸出了一聲微弱的嘆息，眼角上涌出了閃閃的淚珠兒……”

我和卡佳站在車廂的過道上讀着，我感覺到她的頭髮輕輕拂着我的臉，我還感覺到她竭力忍着眼淚不註它流下來。



下 册



第六部 青春常在

卡佳·塔塔林諾娃述

1 “你不了解他”

伊万·巴甫雷奇很知趣地走出車廂，可是瓦里亚仍然不住地唠叨，請求代他向国营养兽場的某一位巴維尔·彼得洛維奇問好：“嗨，真見鬼！还請你問候医生！差点兒把他忘記了！”这样一直捱延到琪拉回来，好歹拉着他的手把他带走才算完事。就剩下我們俩人了。啊，我多么舍不得薩尼亚离去呀！

他在这一会兒的样子多么好看，我不仅想把他那双我百看不厌的眼睛，并且想要把他的一切都牢牢記住：他沒有戴帽子，显得那么年輕；連我都說他現在結婚还早了一些。他穿制服时身材显得高一些，但总还是小个兒。大概正因为如此，他有时

会不自觉地踮起脚尖来——这会儿当我回过头去的时候，他也正踮着脚尖。他精神奕奕，整齐清洁，一撮头发朝前翘着，特别是在他笑的时候，这撮额发使他显得更加可爱。我们拥抱过后，我站在车厢的梯阶上，最后一次回过头去。他笑嘻嘻的，这付模样儿同当年使我爱上了他的那个果断的、黑黑的、可爱的萨尼亚相象极了。

这儿人很多，但是我什么人也没有看见，当我从车厢的梯阶上走下来时，差点没有摔倒。啊！我是多么舍不得他离开呀！

火车开动了，他挥舞起帽子来，我跟着车厢一面走，口里不断地说着：“好，好。”

“你写信来吗？”

“好，好！”

“每天都写？”

“好！”

“你来吗？”

“好，好。”

“你爱我吗？”

这句话他是压低了声音问的，可是我从他嘴唇的动作上猜出了他的意思。

“好，好！”

我们走出车站去送伊万·巴甫雷奇，一路上他老是谈着萨尼亚。

“最主要的是不要把他看得太复杂了，”他说道。“你的自尊心又很强，所以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你们会吵架的。卡佳，总之你几乎是不了解他。”

“看你说的！”

“你知道他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吗？他永远是个青年，是一个有自己理想的、热情洋溢的人……”

他严厉地看了看我，又重复说道：

“有自己理想的人……然而你是个骄傲的姑娘，不过，你也不必介意。”

我忍不住笑了。

“这有什么可笑的。就是骄傲嘛，你小时候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他也是个性情急躁的人。总而言之，卡佳，你多想想他吧。”

我回答说，现在想他就已经想得够多了，而且他也不是什么好得不得了的人，值得人一天到晚地想。

但是晚上我却真就是这样：一坐下来就开始想起萨尼亚。大家都走了，瓦里亚和琪拉去电影院了，亚历山大拉·德米特里耶芙娜到一个俱乐部里读高尔基“大灾星”的摘录去了，她很得意自己这回搞出的东西。我把自己的地图拿出来搞了好半天，后来便扔下它想起心事来了。

是的，伊万·巴甫雷奇说得对，我不了解他！我总是不自觉地认为他还是那个穿短褂的孩子。他曾经在凯旋路的街心花园里等候过我，总是不停地在徘徊，直到路灯亮了，直到我突然下定决心，穿过广场向他走去。他还是那个我曾经拥抱过的孩子。那时候我是不顾我们学校，第一四三和第二八中学这三个学校的人都能看见我们是怎样亲吻的！但那个孩子只是在我的想象中存在，新的萨尼亚和他是不相同的，就好象我们的第一次接吻和现在的接吻是不相同的一样。

不过我根本就沒有把他看得太复杂呀！我只不过是看到在我过去熟悉的那个思想和感情世界以外，在他的身上又产生了一个完整的，我对它一点儿认识也没有的世界。这就是他职业范

围内的世界——单调而危险的北极航线的世界，在驾驶员之家和熟识的飞行员不期而遇的世界，看见新飞机时那种孩子气的狂喜的世界。没有这个世界，他甚至连一个星期也活不下去。可是我在这个世界里暂时还没有位置。有一回，他在叙述一次惊险的飞行时，我突然发现自己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我觉得他讲的好象是另外的一个人。我无法设想是他遭遇上了暴风雪的袭击，在着陆的时候只是靠侥幸才没有摔死，后来又在飞机里坐了三天三夜，竭力支持着不睡觉，身体慢慢地都冻僵了。这是一句傻话，但我还是说了：

“那么你不能想法使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吗？”

他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于是打趣地说道：

“是！以后再不发生了。”

……当然，他自己满可以把他和维什米尔斯基的谈话内容告诉我。但他请求伊万·巴甫雷奇转告我。他觉得问题完全不在于他个人对不对。这可不是什么个人的真理问题，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应该从伊万·巴甫雷奇口中听到这个真理，因为他爱过我的妈妈，而且一直到现在还是独身一人非常不幸。那天晚上我知道萨尼亚在街上等我，所以当我看见他在领子胡同和花园路拐角的街心花园入口处的时候，我丝毫也没有感到惊奇。但他并没有走到近前来，虽然我知道他跟在我后面一直走到我的家门口。他了解我需要独自一个人静静地呆一会儿，尽管我这时离他很近，但思想上的距离却是异常遥远，因为他是对的，我是不对的，而且因为柯拉布略夫告诉了他一些事情使他受了屈辱……

萨尼亚在莫斯科的期间，我们在一起仅仅过了一个晚上。他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样子非常疲倦。亚历山大拉·德米特里耶

芙娜本来想对我们講一講在大庭广众之前演出的困难，以及演出时一定要感情，否則就不会有好的效果。可是她一看见他，立刻就走了。这时太阳还没有落下去，狭窄的西夫切夫·符拉什克胡同里充满了阳光，仿佛太阳已经搬下了其它地方，决定永远定居在这弯弯曲曲的小胡同里了。我给薩尼亚茶喝——他喜欢喝浓茶——一面不住地瞧着他，最后他一定要我也坐下来，同他一起喝茶。

后来他忽然回忆起我们滑冰的事来，并且信口說，有一次在冰场上吻了吻我的脸，还说这回事干得的确太生硬，毛毛草草，冷冰冰的。而我却想起了他审判叶夫根尼·奥涅金的情形。他总是垂头丧气地瞧着我，后来在总结发言时，竟把格里什卡·法伯尔称作“毛色好的人”^①。

“你还记得‘格利高里耶夫是最杰出的人材，連狄更斯的作品都沒有讀过’这句话嗎？”

“怎么能不記得呢！以后你讀过了沒有？”

“沒有，”薩尼亚很遺憾地說道，“总是沒功夫。讀过伏尔泰的書——‘奥尔良的貞女’。不知为什么，我們北地城的圖書館里藏有很多伏尔泰的書。”

在傍晚的暮色中，他的眼睛显得愈发黑亮了，我突然間覺得我看見的只是他的这一双眼睛，而周围的一切漸漸昏暗下去看不見了。我本来想說，在北地城居然有那么多伏尔泰的書真是可笑，但我們突然迅速地吻了很多次。这时电话鈴响了，我走出

① 俄文中 мастистый 是形容动物的毛色很好时常用的詞，而与此相似的詞 маститый 則有博学多才，德高望重等意思。这两个詞在讀音和写法上只差了一个字母，但意义却絕然不同。薩尼亚在发言时，大概是說格里什卡博学多才，因为心不在焉，說錯了一点，以致說成 мастистый 毛色很好的人，成为笑柄。——譯者注。

去在電話上和我的老教授談了整整半個小時。她总是叫我“娃娃”，并且对我的一切事情，諸如我現在在哪兒吃午飯，我买下“繆拉”公司那个漂亮灯罩了沒有等等，都要了解。等我回来的时候，薩尼亚已經睡着了。我喊了他一声，但立即有一种不忍心叫醒他的感覺，于是便蹲在他身旁，隔得近近地仔細端詳他。

在这天晚上，薩尼亚把航海长的日記和所有的文件，照片都交給了我。日記放在一个特制的上鎖的文件夹里。薩尼亚走后，我把这些邊緣揉碎了的紙張仔仔細細看了很久，每一张紙上都写滿了一行行密密麻麻歪歪扭扭的字。有时这些字忽然又疏疏落落微弱无力，仿佛那只写字的手已失去控制的力量，虽然在写，可是思想已經不知跑到哪兒去了。需要多么頑强，多大的毅力才能讀完这本日記啊！

鐫刻着“圣·瑪丽亚”字样的矛鈎留在北地城了，可是薩尼亚带来了它的照片；世界上大概还没有一条矛鈎照得这么清楚！

所有这些东西仿佛是一部伟大历史的許多碎片，散失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而薩尼亚又把这些碎片掇拾起来，写成了或者还在繼續写这部历史。可是我呢？我什么也沒有作。而且若不是薩尼亚的話，关于我的父亲，我所知道的也只是那一天在恩斯克車站分別的情景。那一天在恩斯克車站上，父亲把我抱在手里，最后一次把我高高地抛起，再用他那慈爱的大手把我接住，除此以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答应薩尼亚每天給他写信，但是每天写是沒有什么可写的。我仍旧住在琪拉家里，学习和工作都很忙，加上这兒很不方便，所有的資料都装在箱子里放在外厅，地图也只能鋪放在鋼琴上繪制。

那年夏天，我第一次沒有到野外去，因为一九三四年和三五

年的材料需要整理，所以我所在的巴什基里亚管理局批准我留在莫斯科过夏天。

姥姥每天都到我这儿来，总之，一切都很好，更加上瓦里亚和琪拉突然变得那么沉默，严肃起来，总是坐在厨房里，低声地谈话。除此他们再没有清静地方可去了，因为整个这所住房就是由一间旧式的大厨房改成的，这间厨房分成了“外厨房”和“内厨房”两部分。瓦里亚和琪拉坐在隔壁后面，也就是说坐在内厨房里。这么一来，亚历山大拉·德米特里耶芙娜现在就只好在外厨房里作晚饭了。

瓦里亚以后再没送过鲜花，显然是因为没有钱的关系。但有一次他却带来一只白色的河鼠，把琪拉吓得尖叫起来，跳到桌子上去了，这使他感到很扫兴。他对她解释了很久，说这是一种极好的标本——缺乏色素的河鼠，是稀有的东西！可是琪拉总是叫个不停，不肯从桌子上下来，所以他只好用手绢把缺乏色素的河鼠包起来放到前厅的小桌上。后来亚历山大拉·德米特里耶芙娜从演奏会回来了，又在小桌上发现了这只河鼠，立刻大喊大叫起来，于是瓦里亚只好把自己的礼物带走了。

每到夜间，我和琪拉尽兴地喁喁闲话之后，彼此轮流说“喂，睡觉吧！”她就突然睡着了，在睡梦中她脸上的表情显得十分有趣和幸福。这时剩下我一个人，烦恼终于爬上了心头。我开始想到他们的爱情是多么美满，这是人生最好的时光。然而他们的爱情和我们的爱情又是多不相象啊！他们经常在一起，每天都见面，可是我们却相隔那么遥远！

我仿佛是从火车的窗子里向外眺望，我看见田野和森林，接着又是原野，然后是原始森林和北方那一条条寒光惨淡的河流，以及那被积雪复盖着的平原，——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无边无际

的大地。

“我們当然是会見面，”我安慰着自己。“等我到他那兒去，一切就会好了。我已經两年沒有休假，現在我就請求休假到那兒去，要不然就等他來，也許他六月里能來。”

但是煩惱总在糾纏着我……

這張地圖很費力，因為以前的地圖上有許多地方都弄錯了，現在只好從頭作起。但是薩尼亞走後的這幾天，工作愈困難，我就愈加起勁兒地干。不管這些夜晚有多么苦惱，但我覺得仿佛一切痛苦、寂寞和不安都已經成為過去，而未來的只是新奇和有趣，我的心似乎因此停止了跳動，感到輕鬆愉快，甚至多少有些害怕。

2 在義犬廣場

薩尼亞在最后一天所到過的地方，無論北方航務總局也好，“真理報”社也好，到處都留下了我的電話號碼。當他把這件事告訴我，我不禁有點驚慌起來。

“我究竟算是什么人呢？他們要問起我是誰怎麼辦呢？”

“卡杰琳娜·伊萬諾芙娜·塔塔林諾娃-格利高里耶娃，”薩尼亞一本正經地回答道。

我以為他是開玩笑。但他走了以後還不到三天，就有人挂電話來找卡杰琳娜·伊萬諾芙娜·塔塔林諾娃-格利高里耶娃了。

“是我。”

“我是‘真理報’社。”

一位我在“真理報”上常常看見他的名字的記者說，薩尼亞

的文章引起了許多反应，甚至北极研究所也来打听关于作者的事。

“請您祝賀您丈夫的成就吧。”

我本想說他还不是我的丈夫，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沒有开口。

“听说您是塔塔林諾夫船长的女兒，对嗎？”

“是的。”

“您那兒还有沒有关于您父亲生活和工作方面的材料？”

我回答說有，可是很遺憾，沒有得到亚历山大·伊万諾維奇的允許，——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把薩尼亚的本名和父名連起来称呼——我不能处理这些材料。

“那么，我們写封信給他……”

“民用航空”杂志也打来电话，問登載着薩尼亚那篇在暴风雪中如何固定飞机的文章的一期杂志應該往哪兒寄——我还不知道他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哩。我要了两份——一份自己留下看。后来“文学报”又来电话問格利高里耶夫是誰，是不是作家？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和契同志的一次談話。我不知道薩尼亚对他談了我些什么，可是，他在电话里就象同一个老朋友談話似的立刻和我談起来了。

“領撫恤金了沒有？”

我沒有听明白。

“您父亲的。”

“沒有。”

“應該想办法申請。”

后来他笑了，說道，这回北方航务总局大吃一惊，因为北地島是我父亲发现的，而他們却記載着是另外一个什么人发现的。

“总而言之，我覺得有点不对劲兒……我不喜欢这些言論。”

“我还以为探险队的事已经决定了哩。”

“本来已经决定了，可是现在突然又说没决定。我对他们说主要的是你们让他跟‘巴赫图索夫’号去。可是他们却说那兒已经有驾驶员了。有就有罢！但您的那一位是个有主意的人。”

他就是这样说“您的那一位”，而且说的时候音调特别低沉，“奥”音说得特别清楚。

“好吧，我还在老地方……您到我们这儿来玩吧。”

我说我很高兴去，于是我们就告别了……

我每天都要收到罗马绍夫一封信，有时甚至是两封。信封上写着“巴什基里亚地质局第二勘探队”，仿佛真是发到哪个机关里去似的。的确也是这样，那几年我一个人就好像是个机关，否则我是无法定居在莫斯科工作的。但是用这个通讯地址简直是开玩笑，而且这个玩笑开得也很无聊，但他却每天都在重复它！

起初我还看一看这些信，后来就原封退回，再后来就看也不看，退也不退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怕把这些信烧掉，因此扔得到处都是，我有时无意中碰到它们，连忙又把手缩回来。

在碰到写这些信的人时，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过去他总说自己很忙，可是现在，无论我什么时候出门，总会在街上碰见他。因此我简直不能理解，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时间。我在商店里，在戏院里都常常碰见他。这实在是件非常难堪的事，因为他要同我打招呼问好，而我又不管理他，他作出要走过来的样子，我却转过身去避开他。

他到瓦里亚那兒哭鼻子，但当瓦里亚同他开玩笑，举了一个和他相似的，类人猿失恋的例子时，他又那样可怕地向他大叫大嚷起来。

总而言之，他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那么多的位置，以至于最后使我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感觉，我只要一闭上眼，他立刻就出现在我眼前。他穿着崭新的灰大衣，戴一顶呢子礼帽。他有一次对我说，他是特意为我戴这顶帽子的。

当然，到罗马绍夫那儿去把维什米尔斯基交给他的那些文件要回来，这是一种荒谬绝伦的想法。特别是在我把他送来的信和花全部退回去之后到他那儿去，这也是一种残酷的想法。可是我越想越喜欢这个想法。我设想自己怎样走进门，他怎样惊惶失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老是瞧着我，后来他怎样脸色变得苍白，顺着走廊跑去，打开了自己的房门，可是我冷冷地说道：

“米沙，我找您有点儿事。”

有趣得很，这件事情的经过和我设想的完全一样。

他穿着暖和的淡青色睡衣，大约是刚从浴室里出来，所以还没来得及梳头，湿漉漉的黄头发垂在额前。他脸色苍白，一声不响地站着，一直等到我脱下短外衣，然后才向我跑过来。

“卡佳！”

“米沙，我找您有点儿事，”我冷冷地说道。“您穿上衣服，把头发梳好。我在哪儿等您？”

“对，应该如此，请……”

他顺着走廊跑去，推开自己的房门。

“就到这儿来。请原谅……”

“哪里，倒要请您原谅。”

去年我们到他这儿来是三个人：尼古拉·安东内奇，姥姥和我。姥姥整个晚上都用话暗示他借了她四十个卢布，现在还没偿还。

我那一次就觉得他的房間很称心，当我这次进来时，就更加感到这个房間的漂亮。房間粉刷得給人一种非常爽快的感觉：牆壁是浅灰色的，房門和壁櫥的顏色更淡一些。家具都柔軟而舒适。总而言之，一切布置得十分舒适，十分美觀。窗外可以望見义犬广场，这是我在莫斯科所喜爱的地方。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就喜欢义犬广场，还有那小巧的义犬紀念碑，以及所有通向广场的胡同。

“米沙，”当他把头梳得整整齐齐，身上洒得香噴噴的，穿着一身新藏青色的西服回来的时候，我說道，“我特意来答复您所有的来信。您写些什么鬼話，說我若不嫁給您，将来一定要后悔！您何尝不知道我甚至連看都沒看那些信，可是您还要天天給我写，这真是太輕浮了。您很清楚，我从来就沒有打算要嫁給您，因此也談不到什么我欺騙您的問題。”

他脸上的变化实在有点兒可怕。他走进来的时候是一种急不可待、兴高彩烈的神情，仿佛充滿了希望，而又不敢相信自己，可是現在呢，随着我說的每一个字，他的希望在破灭，他变得呆呆的象死人一般，越来越难看。他轉过身去，眼睛望着地板。

“要說明我过去为什么允許您談这件事，这需要費很长的時間。这里面理由很多。但您也是个聪明人！您一直很清楚，我并不爱您。”

“但是你同他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

“您为什么和我說話用‘你’？”我冷冷地問道。“我馬上就走。”

“你同他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罗馬紹夫重复說道。

他的膝盖哆嗦着，好几次眯縫起眼睛来，样兒說不出有多么难看，因此使我想起了薩尼亚講他睜着眼睛睡覺的事。

“我要杀死你们，杀死我自己，”最后他喃喃地说道。

“如果您真要杀死自己，那可是太好了，”我非常镇静地说道。“我不打算跟您吵架。但是如果真要那样的话，那么我问您，您有什么权利讲这种话？您挖空心思地搞鬼，好象在我们这种时代里居然还可以靠这些鬼把戏同女孩子结婚似的！您是一个毫无品德的人，否则，您就不会象一条狗似的每天紧紧地钉着我。总而言之，您应该闭住嘴，好好听我说，因为您要说什么我完全知道。现在我问您：您从维什米尔斯基那儿拿走了些什么文件？”

“什么文件？”

“米沙，您不要装糊涂，您很清楚我指的是什么。就是您用来恫吓尼古拉·安东内奇，说他以前是交易所的经纪人，后来又用来向萨尼亚建议，要他放弃我并且离开这儿的那些文件。立刻把这些文件交出来，听见了吗！立刻交出来！”

他好几次闭上眼睛叹气，后来还想下跪。但我大声喝斥道：

“米沙，您敢！您听见了吗！”

他抑制住了自己，只是咬了咬牙，他脸上那一付绝望的神情，使我的心都不禁一阵子发紧。

这并不是我怜悯他！不过，我有一种感觉，觉得他之所以这样痛苦，甚至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似乎我也有些不是。如果他能把我的痛骂一顿，我也许能轻松一些。但是他自始至终一声不响。

“米沙，”我开始紧张起来，重又说道，“您要明白，这些文件现在对您说来已经完全用不着了。反正事情丝毫也不能改变了，只是我觉得很惭愧，当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关于我父亲的事

迹的时候，我却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这些文件是我需要，是我自己，而不是其他什么人需要。”

当我說到“我需要”时，我不知道他想到哪里去了，不过他的眼睛突然变得疯狂了，他把脑袋一仰，輕快地在屋里走了一圈。他想到薩尼亚身上去了。

“我什么也不給，”他蛮橫地說道。

“不，您要給！您要是不給，我就認為您写給我信里的話又是撒謊。”

他忽然跑了出去，留下我一个人。这时周围异常寂靜，只有小孩的声音和一两次汽車謹慎的鳴笛声从街上传来。他出去这么久还不回来，这实在叫人納悶。万一他真的給自己搞出点什么名堂来可怎么办！我心里打了一个寒战，赶忙到走廊上去听听动静。什么也沒有，只是什么地方有嘩啦嘩啦流水的声音。

“米沙！”

浴室的門开着一道縫，我往里瞧了一眼，看見他扒在浴盆上。我一时沒有弄清楚他出了什么事，——他沒有扭开电灯，屋子里看不十分真切。

“我馬上就来，”他头也不回，清清楚楚地說道。

他深深地躬着腰，把脑袋放在水龙头下面；水流到他的脸上和肩上，新衣服也完全淋湿了。

“您在干什么？您发疯啦！”

“去吧，我馬上就来，”他气忿忿地又說了一遍。

过了几分鐘，他果然来了，——衬領也沒有了，瞪着一双血紅的眼睛，——并且带来四本普通的蓝皮練習本。

“这些就是，”他說道，“我再沒什么文件了。拿去吧。”

可能这也是假話，我随便翻开了一个練習本，里面好象是印

的什么东西——象是撕下来的一頁書，——但現在已經不能再和他談什么了，因此我很客气地感謝他說：

“謝謝，米沙。”

我回到家里，把这些蓝皮筆記本翻开来讀了几个小时，閱讀到晚上很晚以后，才强使自己忘掉那张面孔，忘掉他回来时穿着淋湿的西服，脸上瘦了許多，就象一只受了伤的鳥兒似的樣子。

3 祝航行幸福和成功

在我面前摆着四本厚厚的蓝皮練習本：旧式的，也就是革命前的練習本，所以封面上滿处都印着“腓特烈·康”公司的字样。在头一本的第一頁上用带阴影的美术字写着“目击者札記”和一九一六年某月某日。这是一本回忆录！但后面只是一些旧报的剪貼，其中有些是我过去从未听見过的报纸如：“交易所公报”，“居民报”，“戈比报”。剪报按栏依次縱貼着，但有个別地方，例如：“塔塔林諾夫探险队”，“請买明信片！”这类地方是橫貼着的。

一、出发前的祷告。

二、“停泊中的‘圣·瑪丽亚’号”帆船。

我很快地看完一本，然后看第二本，第三本。我和伊万·巴甫雷奇談話时我所理解的那种“文件”一份也沒有，有的只是探险队从彼得堡沿西伯利亚海岸去海參崴的一些文章和短訊。

这都是些什么文章呢？我一开始閱讀就不能释手了。往日的生活展現在我的面前，我怀着不可挽回的，冤屈的痛苦心情

閱讀着。所以說這是不可挽回，是因為“聖·瑪麗亞”號在出海前就已經遇難；這一點是我讀了這些文章以後深信不疑的。所以說冤屈，那是因為我現在才知道他們是怎樣肆無忌憚地欺騙我父親，他那輕信人和坦白直率的性格是怎樣嚴重地害了他自己。

下面就是一位“目擊者”描寫的“聖·瑪麗亞”號出航的情形：

……即將远航的帆船船桅上慘淡地裝飾着旗子。出航的時刻臨近了。給“航行者和旅客”作完最後一次祈禱，說了最後的祝詞……“聖·瑪麗亞”號緩緩離岸，海岸越來越遠，房屋和人群融合成了一條斑駁的彩帶。這時刻是多麼莊嚴隆重！同大陸和家園最後的聯系斷絕了。但我們卻為這淒涼的送行，為那一張張充滿好奇的表情的冷漠的面孔而感到傷心和羞愧。暮靄降臨了，“聖·瑪麗亞”號停泊在德維納河口。送行的人飲了一杯香檳酒祝探險隊成功。又一次緊緊的握手，又一次擁抱，該換乘“天鵝”號返回城里去了。婦女們站在小火輪上不斷地揮手……她們擦乾眼淚，又揮手。從逐漸遠去的帆船上傳來陣陣神經質的大吠聲。船身愈來愈小，在愈漸黑暗下去的黃昏的地平綫上終於變成了一個小點兒……勇士們，是什麼樣的命運在前面等待着你們呢？

帆船就這樣出發远航了，阿爾汗格爾斯克的燈塔從後面向它發出送別的信號：“祝航行幸福和成功。”我的天！這下子岸上開始搞了些什么名堂呢？在供應帆船物資的商人之間發生了多麼骯髒的爭吵，打了多少官司，進行了怎樣的拍賣——一部份不得不留在岸上的裝備和給養被拍賣得一乾二淨。還有種種責難，對我父親的責難真是無所不有！帆船出航後不到一個星期，就有人責備他，說他既沒有給自己保險，也沒有為其他的人保險，說他出航的時間較北極航行條件所要求的遲了三個禮拜，說

他沒有等到无綫电报务員来就走了。还責难他輕举妄动，說他不善于挑选船員，所选的船員中“沒有一个会使用帆篷”。有人嘲笑他，断定說“这次荒謬的冒险，就象是一滴水珠，它反映出我們时下浮夸的，混乱的生活”。

“圣·瑪丽亚”号开走几天以后，喀拉海上发生了一次剧烈的风暴，于是，說探险队在新地島附近遇难的流言馬上就传开了。“是誰的錯誤？”，“‘圣·瑪丽亚’的命运”，“到哪兒去找塔塔林諾夫？”——这些文章喚起了我童年时期最早的恐怖印象：是在恩斯克，媽媽穿着她那件美妙的，刷刷响的黑連衣裙，手里拿着报纸，急忙忙地突然走进我的小房間，尽管我在对她說話，而且从小床上跳下来，赤着脚向她跑去，身上只穿一件衬衣，但她並沒有理睬我。地板冰凉冰凉的，可是她并没叫我回到小床上去，也不把我从地板上抱起来，手里拿着报纸老是在窗前呆呆地站着。我也竭力够着往窗子外面看，但我仅仅看到我們的小花园，整个小花园被一层湿漉漉的秋天的枫叶复盖着，再看到的就是潮湿的小径和水洼，最后的几滴大雨点还啪嗒啪嗒地落在上面。“媽媽，你瞧什么？”她沒有說話，我又問了一遍，而且想要她抱抱我，因为她总是不說話，可怕极了。“媽媽！”我大声哭起来，这时她才轉过身，弯下腰想把我抱起来，但是不知道她是怎么回兒事，一下子就坐在地板上了，随后又倒下去。她身子伸得直挺挺地，靜靜地躺在地板上，穿着她那件美妙的，刷刷响的黑連衣裙。这时突然一陣强烈的，莫明的恐怖包围了我，我喊叫着，耳朵里听見的也只是自己可怕的喊叫声，并且覺得我手打脚踢着什么东西，后来还听見媽媽惊駭的声音，于是我又大声叫喊起来，而且总也不停止。以后我睡着了，梦寐中听見姥姥和媽媽談話的声音。媽媽說：

“她被我吓坏了。”

但我沒有出声，并且假装睡着了，因为她究竟是媽媽，因为她說話和哭泣都象媽媽……

只有現在我讀了这些文章后，我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兒。

不过后来証明这些傳說是假的，而且塔塔林諾夫船长还通过尤戈尔·沙尔的电訊探险队向“捐款人和同情探险队事业的人致以衷心的敬礼和最好的願望”。

这封信是用手稿刊登的，信的上方还附有父亲一张我从沒見过的相片。他穿着海軍夏服，带着銀白色的肩章：一个瀟洒的軍官，留着旧式的向上翘起来的鬍子。

他向“所有的捐款人致以最好的願望”不是沒有緣故的：他希望“俄罗斯极地勘探委员会”能用这些捐款来接济船員的家屬。关于这件事，他在經尤戈尔电訊探险队寄回来的报告中曾經提到过，这份报告刊登在六月十六日的“新时代报”上：

我深信委员会决不会讓那些为民族共同事业献出了生命的人的家屬听天由命。

希望落空了！在六月二十七日的这家报纸上，我看到委员会的总结：“据委员会秘書尼·安·塔塔林諾夫彙报，最近一次認捐結果为数甚微。而其他办法，諸如举办娱乐活动等也同样未获得預期的利潤。因此，委员会原定以乐捐办法募集一千卢布救济船員家屬的計劃无法付諸实现。”

我讀到这些什么“乐捐”的时候，心里真是覺得荒謬怪誕到了极点……要是我和媽媽依靠这种“乐捐”办法募集起来的施舍来生活的話，那也許早已淪为乞丐了吧？

然而这一切仅仅在我脑子里閃了一下，我並沒有特別去咀

嚼这些几乎和我年龄一般大的旧恨。在这些旧报上有另一种言论引起了我的注意，并使我感到十分惊讶：他们异口同声地断定说“圣·玛丽亚”号帆船的遇难是不可避免的。有的人手里拿着铅笔算来算去，说它不一定能走到新地岛。另外一些人推测它将被最初的冰层封住，至于毁灭的时间，还会稍晚一点，那是在它成了“北冰洋的俘虏”通过佛罗兹·约瑟夫岛的时候。

不论它用一个航行期，或者两个航行期，或者三个航行期的时间，反正它不可能通过北海航路。这一点是没有一个人怀疑的。

只有一位诗人在阿尔汗格尔斯克报纸上发表过一首题目为“献给伊·李·塔塔林诺夫”的诗，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他持有另外一种看法：

他是多么健康！命运之神保护着他，
他那充沛的精力和冒险的行动
冲破了北极圈，
就是坚固的冰原也要让路。

我过去也知道一些情节。萨尼亚在恩斯克所找到的信件中，父亲这样写着：“六十条狗，其中大部份在新地岛就不得不射杀掉。”萨尼亚根据维什米尔斯基谈话所写成的记录中，提到过霉烂了的衣服和别庄的巧克力糖。我在“阿尔汗格尔斯克”报纸上读到商人叶·符·杰米多夫的一封信，他说“腌肉和成衣不是他的专长”，并且还说他当时只是一个生意人，同时他还有自己的大买卖要作，自然不可能注意到放进桶里去的每一块肉和每一条鱼是好是坏。塔塔林诺夫船长不断地拍来这样一些电报：‘请停止采购，因目下无款’。或者：‘请将已采购之物品卖出，目下无款’，以及诸如此类的話。既然没有钱，为什么还要装备探险

队呢？……如果这件紧急的事情中真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犯错误的人就不应该在当地的生意人中去找，而应该在上层中去找……”

但是我过去并不知道，萨尼亚也不知道，同时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妈妈从来没有谈过这件事。“在‘圣·玛丽亚’号出航前三天，它的前舱第二层甲板下面，在水线下面很深的外板的两侧都发现有足以造成航行危险的切口，从肋骨一直到外壳板，都有斧头和锯子的痕迹。这些缝眼儿经过测量，照象，最大的一个宽达十二吋，长二呎四吋，其它的稍微小一点。这些缝眼儿的由来很耐人寻味，不过也使人想起一件事，就是如果这条船遇难，它的新主人可以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保险金”。

当然，现在并不需要更多的新证据来证明父亲已经遇难，证明他永远也不会回来了。他不可能不遇难。他是被送到了一条绝对不可避免的，必死无疑的道路上去的，当然就遇难了。

4 我们为萨尼亚干杯

我已经说过，我那个夏天工作很多，同时还因为我的助手，一位大学三年级的女学生实在太笨，结果不仅要代她作所有的事，而且还要安慰她，因为她也因为自己太笨而感到非常伤心。很多问题我自己也不懂，所以每隔两、三天就要跑到我的老教授那儿去一趟，她总是叫我“娃娃”，总是替我担心，说我瘦了。的确，我瘦了许多，脸色也不好，因为我似乎从来还没有考虑过这么多的问题，感情也没有这样激动过。我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感情要激动；萨尼亚的信来晚了感情也激动；因为姥姥生我的气，

甚至有一个时期她根本不来了，我心里也激动。除此之外，还因为瓦里亚和琪拉的問題也使我心里激动。

他們一切都很好。照旧坐在自己的厨房里悄悄地說話，然后帶着一脸严肃、幸福、傻里傻气的表情喝茶。但是有一次，低声的談話突然中断了，跟着沉寂了一会兒，他們便互相叫嚷起来。我吃了一惊，也跟着叫起来。就在这时，瓦里亚出来了，他通紅着脸，一头撞在壁櫥上，显然他是把壁櫥錯認作房門了。我把帽子递給他，畏怯地問他怎么啦，但他回答說：

“怎么啦，去問您那位朋友吧。”

我不記得最后一次看見琪拉哭是什么时候了。好象是在五年級因为繪图“不及格”的那一次。現在她又哭了，用手揉擦着眼睛，哭得象个泪人兒似的。

“琪拉，怎么啦？”

“不怎么。我們決定去登記，可是他不願意搬家。就是这么一回事兒。”

“是由于我的关系嗎？因为太挤了吧？”

“根本不是因为你。他說我自己應該猜想得到。可是我，說实在話，簡直猜不透。他希望我搬到他那兒去。但是我不願意。我到他那兒去什么都需要准备，我哪兒有時間准备呢？总而言之，这兒什么都有，有碗碟，又有桌布，穿的盖的，什么都齐全。”

“还有媽媽。”

“是呀，还有媽媽。”

我們整整談了一晚上，夜里琪拉走來說她猜中了——无非是他不爱她了。我一再向她証明說瓦里亚是爱她的，如果不爱的話，決不会那样激动，我一直同她談到第二天早上七点鐘。不知道我到底把她說服了沒有，不过她突然說她很清楚，他是个好

人，倒是她自己不好，并且她要写封信给他，说她配不上他，说他不爱她，因为他认为她是个“傻瓜”。

“不过，你在发信前先给我看看好不好？”我用昏昏欲睡的声音说道。在瞌睡中，我所看见最后的情景是琪拉只穿件衬衫坐在桌前不停地写着……

第二天早上，我和她把她所写的那篇荒唐的东西撕掉，随后我就到瓦里亚那儿去了。他正在动物园里工作，使我不禁回想起和萨尼亚有一次到这儿来，他把他的啮齿动物给我们看的情形。现在那座房子已经没有了，换了一座漂亮洁白带圆柱的陈列馆，同时瓦里亚现在也不需要一再向看门人解释，请他相信他是生物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了。但在这座漂亮洁白的陈列馆里同样有着一股老鼠气味，瓦里亚也仍旧是那付老样子，只不过穿了一件白罩衫，鬍子也没刮。我觉得好笑，因为琪拉昨晚晚上说他现在留鬍子了。

他请我坐下，自己也垂头丧气地坐了下来。

“瓦里亚，首先告诉你，我是自己主动来的，”我很生气地说道。“所以请你不要以为是琪拉派我来的。”

他声音颤抖地说道：“是吗？”我不禁有些可怜他。但我还是继续严厉地说道：

“你们在西夫切夫胡同住当然要方便些，但如果你真有正当的理由，一定要留在自己这儿也是可以的。那你应该向她解释清楚，这不就得啦。而不应该要她自己去猜。”

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说道：

“你要知道，问题是……我不能搬到西夫切夫·符拉什克胡同去，虽然我也同意这样很好。在那儿可以布置象书房和卧室那样的房间，特别是如果把间壁挪动一下的话更好，至于现在

的貯藏室，那可以用来作一間小小的實驗室。但这是不可能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听我說，你不嫌她嘴碎嗎？”他突然用一种无可奈何的口气問道。

“誰呀？”

“琪拉的媽媽。”

我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是的，你觉得好笑，”瓦里亚說道，“当然罗，你觉得好笑。可是我不能忍受。我只觉得恶心，难受。有一次她反复地問我‘你的脸色为什么这样不好？’我差点兒对她說……总是叨叨那个瓦尔瓦拉·拉宾諾維奇，就算她真不好吧……不，我不搬。”

“原来是这样，瓦里亚，”我严肃地說道，“我可真不知道究竟你們誰嫌誰唠叨。不过无论如何，你对琪拉的态度太沒有道理了。她昨天一晚上都沒有睡覺，不停地哭，不管怎样吧，你應該馬上到她那兒去，把事情向她解释清楚。”

他脸上显得很难过，而且十分激动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我不去！”

“瓦里亚！”

他固执地一句話不說。“啊，想不到你还这么倔强！”我怀着敬意地暗自想道。

“那你以后再別来找我了，去你的吧！”我气忿忿地說完了就想走，可是他不放我走，于是我們又談了两小时，商量怎么才能使琪拉的媽媽不說那么多的話……

把这件事情的原委告訴琪拉实在不怎么合适，但我还是告

訴了她。她感到非常詫異，接着她就說她的媽媽每天都在抱怨，嫌瓦里亚唠叨，并且有一次在他走后，她甚至就躺下了，在額上放了一块湿毛巾，說再也不能够听那些关于玄狐混合种的話了，并且說如果琪拉嫁給这样的人簡直是发了疯，因为他不讓別人說話，可是自己就象个扩音器似的不停地講。

轉眼間她穿好衣服就跑到瓦里亚那兒去了，——尽管我說，假如我处在她的地位，决不先去找他。到了晚上，他們便又坐在內厨房里悄声談話了。他們决定不管怎样还是先試一試在西夫切夫·符拉什克胡同安家。

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晚上，是沒和薩尼亚在一起度过的最好的一个晚上。头一天我收到他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又长又好。在这封信里，他还提到他現在看了很多書，并且开始学习英文。我回想起当他知道我能相当自如地說英語时那付惊奇的神情。又有一次，大家当着他談論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的时候，結果发现他从来还没有听說过这个名字，这时，他的脸孔紅得多么厉害。总而言之，这是一封使我从心眼兒里感到愉快和安慰的絕妙好信。我和亚历山大拉·德米特里耶芙娜一起，瞞着这对“青年恋人”准备了一席丰盛的晚餐和一些葡萄酒。虽然瓦里亚爱吃的龙虾拌凉菜被我們把盐放重了，——我先放了一次，——后来亚历山大拉·德米特里耶芙娜又放了一次，——但还是吃得精光，原来瓦里亚从昨天起不仅沒有刮鬍子，而且也沒吃过一点东西。

我們为薩尼亚的健康干杯，然后又为他一切事业的成功而干杯。

“为他的伟大的事业干杯，”瓦里亚說道，“因为我相信，他这一生中必然会作出点伟大的事业来。”

后来，他又講起一九二五年他在共青团莫斯科市委会的少年自然科学家委员会工作时，有一次他怎样劝薩尼亚去銀松林游覽，以及薩尼亚怎样花了很长的時間，尽力想了解为什么这件事有趣，后来他突然引用了两句名言。大家对他那非凡的記憶感到十分惊讶。他引用的名言是：

奋斗吧！奋斗吧，当希望还没有破灭的时候，

生命中还有什么比奋斗这样的游戏更美妙的呢？——

并且还說，他不擅长捉田鼠。

亚历山大拉·德米特里耶芙娜也想說点什么話，我和琪拉都怕她又要談起瓦尔瓦拉·拉宾諾維奇来。不过这回还算好，她只給我們朗誦了几首詩，并且說她对詩也有非凡的記憶力。

我們就这样坐着喝酒。已經十二点了，这时有人按門鈴。亚历山大拉·德米特里耶芙娜正在給我們表演“假嗓子”，她說这是清扫工人倒垃圾来了。我連忙跑到厨房里去，一只手提着污水桶出去开门。然而来的并不是清扫工人，是羅馬紹夫。当我把門敞开的时候，他一声不响地迅速往后退了退，把帽子摘下来。

“我有一件紧急的事，而且因为这件事也关系到您，所以这样晚我还是决定来一趟。”

他說这話时很認真，所以我也就立即相信事情一定很紧急，而且和我有关系。我之所以相信，是因为他的神色非常鎮靜。

“請进吧。”

我們就这样面对面地站着，他拿着帽子，我手里提着污水桶。后来我突然发觉这样不对，便連忙把桶放到門后。

“我怕不太方便，”他很有礼貌地說道。“您这兒好象有客人？”

“沒有。”

“就在这兒，在樓梯上可以嗎？要不我們下楼到林蔭路上去。我需要通知您……”

“等一分鐘，”我急促地說道。

亚历山大拉·德米特里耶芙娜在喊我。我把門掩上，迎着她走去。

“誰？”

“亚历山大拉·德米特里耶芙娜，我一會兒就回来，”我急促地說道。“要不，这样吧……过一刻鐘讓瓦里亚下来找我。我就在林蔭道上。”

她还在說什么話，可是我已經跑出来，砰地一声把門关上了。

这天傍晚有点兒凉，我只穿了一件連衣裙，因此在樓梯上羅馬紹夫就說：“您这样要感冒的。”大概他想把自己的大衣給我穿，甚至已經把大衣脫下来拿在手里，但沒有敢这样作，后来我們坐下时，他把大衣放在了凳子上。其实我並沒有覺得冷。我因为喝了葡萄酒脸上发热，心里也很激动。我感觉到他这次来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林蔭道上靜悄悄的，从果戈理的紀念碑一直到柵栏尽头，只有一些老年人挂着手杖坐着——一张凳子上坐着一个——柵栏后面正在修建“苏維埃宮”車站。

“卡佳，我想对您說，”羅馬紹夫慎重地开始說道。“我知道成立探險队的事对您說来有多么重要，同时对于……”

他迟頓了一会兒，然后又很順暢地繼續說道：

“同时对于薩尼亚也一样。其实我并不認為这件事真的那么重要，也就是說会引起生活中什么变化，例如您的伯父，他就

非常怕这件事。不过事情既然关系到您，所以我也就不能等閑視之了。”

他这話說得很自然。

“我来是預先通知您。”

“通知什么？”

“探险队不成立了。”

“不对！他們在电话里告訴过我的。”

“这是刚决定的，他們認為不值得派遣一个探险队，”羅馬紹夫很鎮定地辯解道。

“誰决定的？您从哪兒知道的？”

他轉过身来，笑嘻嘻地看了看我。

“我不知道該怎么說。这回我又成了象您称呼我的那样一个卑鄙的坏蛋了。”

“怎么說都行。”

我怕他站起来走掉，但他是那样鎮定和自信，簡直不象从前的那个羅馬紹夫了。他沒有走。

“尼古拉·安东內奇告訴我，說北方航务总局副局长作了关于成立探险队的报告，但他自己却表示反对。認為寻找那些二十多年前就失踪了的船长并不是北方航务总局的工作。不过据我看来……”羅馬紹夫打了一个頓，他大概是感到悶热，所以把帽子摘下来放在膝盖上，“这并不是他的意見。”

“那么是誰的意見呢？”

“是尼古拉·安东內奇的，”羅馬紹夫急促地說道。“他和这位副局长有几分交誼，并且这位副局长把他看成是研究北极历史的大专家。再說，关于寻找塔塔林諾夫船长的事如果不和尼古拉·安东內奇商量又去和誰商量呢？探险队本来是他負責装

备的，后来他还写过一些关于探险队的文章。他是地理学会的委员，还是相当有威望的委员。”

我非常生气，在这顷刻间，我既没有考虑尼古拉·安东内奇为什么要这样千方百计把寻找的工作搞垮，也没有去想究竟什么原因使得罗马绍夫又一次地出卖了他。我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不仅因为我父亲，而且也因为萨尼亚的关系。

“他姓什么？”

“谁？”

“就是那个说不值得去寻找已经失踪的船长的人。”

罗马绍夫说出了他的姓。

“当然，我不准备去和尼古拉·安东内奇讲道理，”我继续说道，我觉得我的鼻孔都气胀了，我极力想平静下来，可是我觉得实在没有办法。——我跟他谈过一次话就够了。不过我要到北方航务总局把他的情况多少向人讲一点。萨尼亚上一次没有时间来跟他算清这笔帐，我不知道是不是可怜他……算了吧，这个消息真的吗？我看了罗马绍夫一眼，忽然这样问道，同时心想，说这话的人到底是他，因为他爱我，所以大概总是一心在梦想着如何才能更保险地陷害萨尼亚！

“我干吗要说假话呢？”罗马绍夫满不在乎地辩解道。“你就会知道的！他们也会通知您……当然，应该去解释个明白。不过您……可不要说这件事是从哪儿听来的。话又说回来了，您即便说了，我也无所谓，”他态度傲慢地又加了一句说，“顶多让尼古拉·安东内奇知道罢了，那么以后我就再也不能象今天这样瞞哄他了。”

瞞哄尼古拉·安东内奇是为了我——这就是他说这句话的意图。他瞧着我，等待着我表示意见。

“我并没有请求您瞞哄任何人，不过您这次决定（我差点兒說出“是有生第一次”）憑良心办事，并且帮助了我，我認为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慚愧的。我不知道您現在对尼古拉·安东內奇抱什么态度？”

“藐視的态度。”

“好吧，这是你們的事。”我站起身来，因为我覺得討厭。“不管怎样吧，應該謝謝你，米沙。再見……”

我在西夫切夫·符拉什克胡同附近碰見了他們三个人：亚历山大拉·德米特里耶芙娜，琪拉和瓦里亚。他們很着急的跑着，亚历山大拉·德米特里耶芙娜还在說：“天哪，我哪兒知道呢？她只是說如果十分鐘以后不回来的話……”

电車正好在我們中間停下，等它开走之后，他們三个人一起气势汹汹地向林蔭道上奔来。

“站住！”

“这不就是她！亚历山大拉·德米特里耶芙娜！她在这兒！卡佳，你是怎么一回事？”

“葡萄酒喝完了沒有？”我一本正經地問道。“要是喝完了，还應該再买一点兒……我还想为薩尼亚干一杯。”

5 这上面写着“圣·瑪丽亚”号

那时候，北方航务总局的局长是一位著名的北极活动家，在任何一张俄国北极的地图上都不难找到他的名字。去他那兒找他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經過契同志打了个电话之后，我当天就被接見了。当然，我还得先等候一会兒，不过这样倒也有

趣，因为在接待室里还坐了好些刚从北地城回来的海員和飛行員。有个人的面貌有点象薩尼亚，我不由得多瞥了他几眼，并且側耳听了听他在說什么話。可是他大概理解成另外一种意思了，所以便摆出一付精神十足的样子，傻里傻气地笑着。后来他們都走了，我又坐了很久，为了那时时刻刻袭上心头来的煩惱在生自己的气。

这次和北方航务总局局长的談話我記得很清楚，因为这天晚上我在給薩尼亚的信中，又一字一句地把他的話复述了一遍。

开始的时候，我有点不安，并且覺得自己神色不好，但一听到他用那种低微温和的口吻問我：“您有什么事嗎？”我所有的不安便立刻消失了。后来不安的心情又产生了，但这是另外一种不安，是兴奋的不安，这种不安可以使你忘却自己，感觉到又是寒冷，又是舒暢。

“有个姓格利高里耶夫的飛行員給您一份关于寻找探险队的計劃草案，”我开始說道，“本来已經决定成立这支探险队。可是昨天……”

他留心地听着我講。他本人同报纸和杂志上曾經登載过千百次的他的照片象极了，我不禁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我不是在同他本人，而是在同他的照片談話。

“不，”当我問他是不是也認為寻找已經失踪的船长是一件不值得的事情时，他分辯道，“不过我們仔細地考虑了所有‘贊成’和‘反对’的意見之后，断定这类的搜索工作早就注定要失敗。实际上也是如此：第一，草案中所指的地方在近年来已經或多或少地經過一些研究，可是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圣·瑪丽亚’探险队的任何遺迹；第二，从北地島到皮亚辛河口有一

千多公里，要在这样长的距离内组织搜索工作是非常复杂的；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对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区域内寻找您父亲的探险队这一点没有信心。”

“毫无疑问，正是要在这个地区，”我毫不犹豫地分辩道。

“为什么？”

“因为……”我这时突然把所有的证据都忘光了，虽然我在接待室里的时候曾重新默诵了一遍，甚至扳着指头数过。“因为……”

他看着我等我说话。他的眼睛非常明亮，鬍鬚烏黑，他冷静地看着我，等着我说话。这是非常可怕的一刹那。

“第一，这可以从航海长的日记里看出来，”我声音有点发抖地说道。“您还记得他引用过我父亲的话：‘要是绝望的环境迫使我丢开船，那么我就到我们发现的陆地上去。’第二，……”我从皮包里掏出萨尼亚给我留下的照片。“请您看一看……这上面写的是‘圣·玛丽亚’号。这条矛钩是在泰麦尔找到的。”

“就假定是这样吧。但为什么不可以认为这条矛钩是属于早两个月离开船的航海长他们那一队人的呢？”

“因为航海长……您的地图在哪儿？”虽然书桌上方就挂着一幅北极大地图，而且我一直都在望着它，但大概是由于我太激动的缘故，竟没有看见它。“他是顺着漂流的冰块走的，而且完全是另外一个方向。可以吗？”我取过指图竿，站到椅子上，因为我站在地板上够不到弗罗拉海峡。“您看，他是怎样走的。他是同塞多夫中尉的探险队一起回到阿尔汗格尔斯克来的。但是，我们再往下看，”我继续说道，同时感到浑身发冷，脸色也变白了，不过现在是由于过度兴奋而变白的。“您刚才说，从北地岛

到皮亚辛河口所有的地方都研究过了，而且奇怪的是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碰到过探险队的遗迹，即便是偶然的也好。可是魯薩諾夫^①呢？从他的残余装备被发现之后经过了多少年才找到他呢？而且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呢？不正是在那些有船只往来，人类常去的地方吗？还有阿姆生的那个水手，他不正是在离站台仅三公里的迪克逊被人找到的吗？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位水手（他的名字叫吉生）的坟墓就在码头食堂旁边，吃完饭到北极站去的人都要走这条吉生未曾走完的路，也就是他从生到死的路。

“不对，问题不在于这些地方都已经研究过，而在于大家从来就没有寻找过我的父亲。他的航线是这样的：从第八十六和第八十七子午线之间北纬的地方前往俄罗斯岛，诺登塞尔特群岛，然后，大概经过了一段长时期的漂泊，又从斯帖尔列果夫海峡前往皮亚辛河口。一位涇涇茨的老人就在这儿找到过一只放在雪橇上的小船。然后，他们又往叶尼塞河驶去，因为叶尼塞河是可以遇见人和得到帮助的唯一希望。”

我从椅子上跳下来。他捋着鬍子，满有兴味的样子瞧着我。

“您这么有把握？”

“是的，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究竟格利高里耶夫提出些什么建议呢？‘巴赫图索夫’号破冰船去北地岛是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这是一支水道测量探险队，对不对？”

① 魯薩諾夫（1875—1913），俄国有名的北极探险家，因参加革命运动曾多次被沙皇政府逮捕。——译者注。

“对。”

“那好极了。中途它可以在几个地方建立供两三个搜索队用的基地。格利高里耶夫认为只需要两个队，每队三个人。而我却觉得应该有三个队，或者用一艘小汽艇作为第三队。他们要沿着近海岛屿的外海岸前进，‘巴赫图索夫’号这时可以在这附近的地方工作，这样也就不致失掉了联系。”

我把话停下了，因为这时北方航务总局局长笑着站了起来。他从桌边绕过来，和我并排坐下。

“不错，您真是塔塔林诺夫船长的女儿，”他愉快地说道。“您是学地理的吗？”

“学地质的。”

“几年级了？”

我回答说，我早已大学毕业了，而且在巴什基里亚地质局工作都已经两年了。

“您有兄弟姊妹吗？”

“没有，就是我一入。”

“母亲呢？”

“去世了。”

他很体贴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回到萨尼亚的草案上来。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远不是那么简单的，”他沉思地说道。“但也不是不可能的……一艘小汽艇嘛，当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不过显然这个问题还应该找格利高里耶夫来一趟。他在什么地方？”

“在北地城。”

我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也不知为什么，我又说了一次：

“在北地城。”

他故意逗弄人的样子看了看我。

“我們真把他請来吧，”他帶着孩子般快乐的神情重复說道。这一来我就知道契同志已經把我和薩尼亚的关系对他講过了。“您認為怎么样，我們解决这个問題不正是需要他嗎？”

“我覺得是的，”我鼓起勇气來說道。

“就这样吧。我同您認識非常高兴，”他站起来，很認真地說道。“探险队成立也好，不成立也好，不过您能到我这兒来，而且講得这么起劲，这么热情，这实在太好了。”

6 在姥姥家

我已經說过，姥姥每天晚上都到我这兒来。她来的时候总是噘嘴鼓腮很不得了的样子，和琪拉的媽媽談話也很高傲。她很不高兴我放着自己家里“頂好的房間”不住，却住在“別人”家里。并且她怕一个叫做多拉·阿布拉莫芙娜的女人，說她已經“跑来嗅过”两次了。

“我的晚年到了，”她有一次眼泪汪汪地向我說道，“可是这么孤独的生活我還沒过过。”

但有一天姥姥却沒有来。第二天早上她挂電話來說她的心脏有点不舒服。当我問她尼古拉·安东內奇在不在家的时候，她竟大发起脾气来。

“真問得胡塗，”她厉声說道。“他能到哪兒去？都象你那样？老賴在別人家里嗎？”

后来她說他已經走了。我便赶快收拾了一下，上她那兒去了。

她盖着她的那件旧式的綠色皮袄躺在沙发上。月桂櫻桃水放在沙发旁边的小桌上——这是她認為唯一有效的藥。我問起她健康情况时，她只摆了摆手。

“她是一有点什么事就点头哈腰的人，”她气呼呼地說道。“現在滿可以看出她从前当过修道女，是个迷信宗教的人。可是我問她‘那你为什么还要干活呢？’就把她辞退了。”

她辞退了女佣人，这很不好，虽然女佣人信教，但却是个好人。过去姥姥甚至还因为她作过修女而感到喜欢哩。

“姥姥，你这是作的什么事？”我說道。“就剩下你一个病人，現在我可要把你帶我到那兒去了。”

“我不去。越来越不象話了！”

她坚决拒絕脫掉衣服睡到床上去，并且說她不是心脏的毛病，只不过因为昨天沒有作菜，吃了点素油蘿卜，因此她的病是蘿卜引起来的。

“你要是不睡下，我立刻就走。”

“哎呀！吓唬起人来了。”

后来她終究还是脫了衣服，唉声叹气地躺到床上，一会儿就睡着了……

母亲的房間里，不知道为什么一打开窗戶总是有穿堂风，我为了透透风便把通走廊的門敞开了。然后我又走到我自己的房間里去，尽管我覺得这个房間是那么不舒服，那么空虛，可是我曾經在这里度过了多少岁月啊！我走后，这个房間里的一切甚至变得更好了一些。床上鋪着姥姥古色古香的带花边的被单，窗帘浆洗得硬板板的，白得不能再白了，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甚至在我离开前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而看过的那卷百科全书也仍旧在原来那一頁上摊着。这兒的人在等待着我……

在窗台上放着的許多旧課本中間，我找到一本筆記本，里面抄写着一些从我喜爱的書上摘引下来的語句：“人心本是一个古怪的东西，而女人的心尤其古怪。”——萊蒙托夫。

这是一些玄妙而可笑的語句，我把它們从头到尾讀了一遍。我仿佛是在作梦，夢見自己在一個熟識的小姑娘家里作客，这位小姑娘把一切的事情都想象得那么美丽，整个世界在她眼里也是那么輝煌壮丽。

“世界是舞台，人就是演員。”——莎士比亚。

当我手拿着筆記本从房間里走出来的时候，我覺得似乎有人在走廊上急急忙忙地走了过去。

我这时当然不会想到是我那生病的姥姥穿着她那件綠色天鵝絨皮袄在走廊上跑。但的确有人在跑——而且正是穿着綠皮袄。結果真是姥姥，因为在我回来的时候，虽然她仍旧和刚才一样躺在在床上，但可以看出她是刚刚躺下去的，甚至連被子都沒有来得及盖好。

这是非常可笑的，她甚至眯縫着眼睛，竭力装出一直是在睡覺，根本就沒想要跑到走廊上去的样子。她刚才是在偷偷地观察我，說不定我会突然决定搬回家来呢？

“姥姥，医生来过嗎？”等她终于睜开眼睛，并且假装大声打了个呵欠时，我問她道。

医生沒有来过。她不願意找医生。她知道这是蘿卜引起来的。

“可是你打电话說是心脏不舒服。”

“心脏不舒服也是蘿卜引起来的。”

“真是瞎說！我立刻去請医生来。”

姥姥发起火来了，說要是我請了医生来，她馬上就穿起衣服

到一个叫瑪麗亞·尼基吉希娜的女邻居那兒去。

要給姥姥請医生，非先大吵一場不可，所以我也就不再坚持，同时姥姥也一分鐘比一分鐘地愈来愈感到輕松了。她終于覺得完全好了，因为她这时突然吃惊地聞了聞味，說了一声“烤焦了……”，便披上大衣跑到厨房里去了。

这是肉餡餅烤焦了，其实还不太焦。肉餡餅装在一个巧妙的烤爐里，放在煤汽爐上，散发着香噴噴的气味。姥姥还說，假如我不尝尝这个肉餡餅的話，她的病又要加重了。

所有这一切，这些計策，特别是她不惜放了很多的油作成的，我最爱吃的肉餡餅都和姥姥本人一个格調。作肉餅的目的是使我彻底信服在自己家里比在“別人”家里好。但是我吃了两块，然后吻了吻姥姥，只不过說作得很好吃罢了。

关于尼古拉·安东內奇的事暂时一句話也沒有談。但姥姥已經作出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于是我明白話就要开始了。姥姥先是从很远的地方扯起。

“我收到奥列琪加和拉拉一封信，”她严厉地說道。“她們劝我‘千万不要管那些家务事’，我現在管这些事太累了。”

奥列琪加和拉拉就是我的两个上了年紀的姨媽布冥其可娃，她們住在恩斯克。

“可是我怎么能不管呢，你責备她，她不吭声。你再說她几句，她还是不吭声。你都气得发火了——她仍然是不吭声。她是遵照神甫的計劃生活的，”姥姥多少有点兒兴奋地說道，“对自己的人滿不在乎，什么都是神甫。真是歇斯底里的女人。神甫給她写信說：‘沉默吧，忍耐和哭泣吧。’她就是乐意这样。她在衣柜里釘了几个釘子，挂上圣象，总是那么小声小气地說‘我听話’。我討厭这样的人。”

“姥姥，你已經把人家辞退了还說什么呢。”

姥姥沉默了一会兒。

“一家人都七零八落了，”她又叹了口气說道。“你抛弃了家，可是他又怎么样呢？他現在也变得对什么都无所谓了，有也行，沒有也行。有时吃一点，有时也不吃。”

“他”——这是指的尼古拉·安东內奇。

“总是在写，不停地写，”姥姥繼續說道。“白天黑夜，日以繼夜地写。早上一喝完茶，立刻就围上我的披肩坐到桌边去了，并且說：‘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这将是我一生的劳动。至于我有沒有錯这一点，現在讓我的朋友和敌人去公断吧。’他自己瘦多了，精神总是恍恍惚惚的，”姥姥悄声說道，“这几天竟戴着帽子来吃飯。他大概非发疯不可。”

这时大門輕輕响了一下，有人走进前厅站住了。我望了望姥姥，她恐惧地把眼光移开，于是我明白，这是尼古拉·安东內奇回来了。

“姥姥，我該走了。”

“不，还不到时候。肉餅還沒吃完呢。”

他輕輕地敲了敲門，沒等回答便走进来了。

我轉过身来，点了点头，——連我自己都觉得高兴，我能这样毫不在乎地，大胆地点头。

“工作怎么样，卡秋莎？”

“还好，謝謝。”

說来真是奇怪，現在他對我說来只不过是一个脸色蒼白，上了年紀，长着两只手指肥胖的短胳膊的人。他总是令人不愉快地神經質地掰他的手指，不停地往什么地方塞：一会兒伸到領子里，一会兒插在背心口袋里，仿佛要把它們藏起来似的。他变得

象一个衰老的演員。我和他認識的关系仿佛是几千年前的往事那么久远。現在不管他的脸色怎样蒼白，不管他的脖子瘦得多么可怜，在他伸手想挪动一下圈椅时，不管他的手是怎样发抖，我現在觉得这一切都是无所謂的。

最初难堪的一会儿过去了，他用开玩笑的口气問了我一些关于我的地图的事情，問我是不是把澤尔麦尔达格岩系和阿申斯格岩系互相混淆了——我在大学念書的时候，发生过这样一次事情。这时，我又告辞要走。

“再見吧，姥姥。”

“我可以出去，”尼古拉·安东內奇低声說道。

他坐在圈椅上，蜷縮着，带着真摯善良的神情注視着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們有时长談的时候，他就是这付样子。但現在對我說来这只不过是遙远的回忆罢了。

“假如你急着要走的話，我們改次再談吧。”

“姥姥，說实在話，有人在等我，”我对紧紧扯住我袖子的姥姥說道。

“不，沒有人等你。怎么能这样呢？好歹他是你的伯父啊。”

“得啦。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尼古拉·安东內奇善良地說道，“我是伯父也好，不是伯父也好，还不都一样。卡秋莎，显然你是不願意听我講完委？”

“不。”

“真任性，”姥姥憤恨地說道。

我笑了。

“我沒法跟你說，你連和我告別一下都不肯就走，使我多么难受，”尼古拉·安东內奇急促地，但仍然用那样真摯、善良的

声調繼續說道，“我也沒法跟你說，你們两个居然相信了一个不久前刚从精神病院出来的、不幸的老头子，而把自己引入了迷途。”

他从眼鏡上面瞅了瞅我。从精神病院出来的！这又是一次謊言。也許不是撒謊，不过这些事情現在對我說來已經無所謂了。只有一种思想輕輕地刺痛着我，就是这件事涉及到薩尼亞，或者他要不高興的。

“我的天哪！这样一个可怜的，混亂的脑袋瓜兒什么事想不出来呀！居然說我用什么支票把他弄得傾家蕩產，說我故意不好好地装备探險队，你想想看，这是为了什么，就是因为我想害死伊万嗎！”

尼古拉·安东內奇真心地放声大哭起来。

“出于忌妒！我的天哪！我爱你的母亲，由于嫉妒，所以想把伊万害死！”

他又哭了，但忽然摘下眼鏡，擦起眼泪来。

“是的，我爱过她，”他流着眼泪喃喃地說，“上天明鉴，一切本来都可以不至于这样。如果我真是錯了，那么除了她以外还有誰来惩罚我？受这样的惩罚真是从来也沒有想到过。”

我听着他講，象是在作梦一般，我开始觉得所有这些情景曾經在什么时候发生过。也是这个只有几根头发的发紅的秃头頂，也是用这种表情說这些話，也是因为看着一个上了岁数的男人哭鼻子而引起的那种不愉快的感觉。

“怎么样？”姥姥恶狠狠地問道。

“姥姥，肉餅好极了，再切一块吧，”我高高兴兴地說道。“尼古拉·安东內奇，您繼續講吧。”

“卡佳，卡佳！”

“你們知道，”我这时甚至感覺到有一种泄憤的快乐說道。“我已經不是小孩子，我已經二十四岁了，我似乎也可以作我願意作的事了。我不願意再在這兒住下去，明白了嗎？我要出嫁了。我很可能要我和我的丈夫住到北极去，因为他是个北极飛行員，他在这兒沒有什么事可作。至于尼古拉·安东內奇，我已經看見他哭过很多次了，同时，我也看够了。我只能这样說，如果他真是沒有錯的話，他恐怕也不会終生忙着去搞这件事。例如，他未必会到北方航务总局去奔走，設法搞垮薩尼亚的探险队。”

显然这时我已經不象刚才那样高兴了，所以姥姥才那么吃惊地看着我，似乎还偷偷地画了个十字。尼古拉·安东內奇脖子上的血管跳动着，默默地沒有吱声。

“讓我安靜安靜吧，”我发狂一般地說道，“永远，永远也别来打扰我！”

7 冬 天

十一月，我在近郊区靠莫斯科河的地方領到一間屋子。瓦里亚和琪拉都异口同声地說，他們的家庭生活中不能沒有我，亚历山大拉·德米特里耶芙娜也把我拉到一边，說她現在也要走了，因为我过去“总还起了一些防禦黑褐色狐狸的避雷針作用”，以后我不在这兒，瓦里亚会把她唠叨死的。但我最后还是搬走了。

我的屋子是在一栋新楼房里面。这座五层楼的房子孤零零地聳立在空曠的河岸上，还說不上特別美觀。工人們刚刚走，甚

至可以說還沒有走，還在院子里忙着收拾施工剩下的破磚碎片；樓梯上放着一些米黃色的槽子，到處都挂着被人遺忘了的裝着油漆的小桶。

過去到郊區一趟，乘坐電車需要磨蹭整整一個小時，而現在乘地下電車只消十分鐘就到了。過去符地非常荒涼，而現在却跟莫斯科一般熱鬧了。我們這座本來想用垣牆隔開來的不很雅觀的獨立大樓和那些用小柱頭，欄杆以及雕刻小玩意兒裝飾起來的頹老的別墅並排在一起顯得非常突出。

然而不僅樓房，就是自己的房間我也不敢夸奖。這個房間只有一個優點，就是朝莫斯科河的一面的景色非常優雅。即使在冬天，莫斯科河也是美麗的，特別是傍晚，淡淡的柔弱的陽光從遙遠的地方射來，而雪堆前出現一塊塊潔淨的橢圓形陰影，由此使我聯想到在北极圈外的一個小小的海港城，那兒牡鹿拖着雪橇在木街上奔馳。“不過，和牡鹿並排着競相奔走的，”薩尼亞在信中這樣寫道，“還有木材運輸車，大卡車，馬兒和拉車的狗。這樣一來，人類的全部歷史，從氏族制度直到社會主義的文明，便都展現在我們眼前了。現在我們正在修建一座新城，到處都是腳手架，滿街都是木屑，航空站已經遷入一棟新修的，華麗的，帶有‘候機室’的三層樓房里去了，每當夕陽西下的時候，我們就坐在这間候機室里閱讀伏爾泰的作品。真有意思，這位‘現代’作家在我們這兒居然這麼受人歡迎，許多牆報都引用他作品中的名言作點綴。我想念你的時候那麼多，甚至使我感到奇怪，怎麼還會有時間來作其他的事！這大概是因為在某種程度上說其它一切事也就是你，特別是在飛行中，當我想什麼問題的時候，或者輕聲地唱几句又想心事的時候，我腦子里想的總是你……”

那个冬季，我的經濟情况相当困难，因为巴什基里亚地質局在烏发，錢要从那兒寄給我，所以經常延誤。有时不得不拍电报去責問。除此之外，我还没有吃飯的地方，自己又懶得作。总而言之，我完全成野人了，有一次，我比量了一下节日穿的那件綢連衣裙，便气得坐下哭了起来。

我这个冬天第一次准备去剧院，去瓦赫坦戈夫看“人間喜劇”的首次演出，这才发现我那件带尾巴的連衣裙已經不时髦了，这种尾巴早几百年就沒人带了。后来我和琪拉把衣服改了一下，把它剪短縫起来。但是去参加晚会的兴致也因此敗坏了。

这是在符地度过的一个孤独的冬天，孤独得几乎只有羅馬紹夫是我唯一的常客。現在很难想象他就是那个曾經說要杀死我和杀死他自己的羅馬紹夫了。他每次来的时候都很有礼貌，很安靜，穿的总是那么漂亮，甚至可以說是很豪华，用着不高不低的，大概也就是他在专科学校講課时的那种声調和我談話。

有一次，他样子非常疲憊和飢餓的来了。我問他道：

“米沙，想喝点茶嗎？”

他冷淡地謝絕了。他显然是想表示除了事务关系之外并不急于向我要求其它关系。这里所說的事务就是指探险队和一切与探险队有关的事。

为什么他要操心探险队的事呢？当然是因为这件事情与我有关，那末“对他說来也就不能等閑視之了”。但是这中間也有一点驕傲，他仿佛想借此表示我拒絕他并沒引起他的怨恨。毫无疑问，他大概还有一个計劃，仍旧是那个老計劃；用一些愚蠢而复杂的阴謀达到和我結婚的目的。在他的身上，在他这种装腔

作势的态度上，在他那张翘着两只发育不全的耳朵的面孔上，就有了一种愚蠢同时又是复杂的东西，有时还会突然閃現出一种令人可怕的神情。难怪有一次伊万·巴甫洛維奇說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至少也是一个善于使自己的感情急轉直下的人。

不过他的感情与我并不相干。自然我也沒有把他常到我这兒来的事写信告訴薩尼亚。薩尼亚知道会气得发疯的，何况我現在写的信不知道为什么就已經够干巴巴，冷冰冰的了……

問題突然发生了，北方航务总局对于委托薩尼亚作这次的搜寻工作还很不放心。虽然他已經工作了許多年，可是究竟还很年輕，他在北极工作的時間也比較短。大家虽也知道他是一个优秀可靠的駕駛員，可是，他能否胜任这样一件要求有一定組織能力的复杂的工作呢？总而言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記得有一份杂志曾經指責过他誹謗別人，似乎是誹謗船长的堂兄，著名的北极活动家尼古拉·安东內奇·塔塔林諾夫。

因此我要求杂志的編輯部更正，我又說明組織一个六个人的搜索队并不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复杂事情，我要求把搜寻塔塔林諾夫船长的任务不要委托給旁人，應該委托給那从小就被这一思想鼓舞着的人。

羅馬紹夫是知道这些事情的。他究竟在想什么？期望些什么？我沒有問过他，同时他也沒有談起过。但是有一天我猜到了許多事。

假如探险队成立的話，我一定毫不犹疑地跟着薩尼亚到北地島去。我把这个意图写信告訴了北方航务总局的局长，并且表示願意去作地質工作。干部部門的答复很快就回来了，遺憾的是結果完全不是我所預期的那么一回事兒。他們建議我到北极的一个站（任我选择）去工作，并且約我到北方航务总局去談

一談。

我这天很晚才回家，每次进“城”都是如此，走到楼梯上，我才懊悔忘記了鎖門。这时正好有一个人在我房間里走来走去；我疑心是小偷。但結果却不是小偷，而是羅馬紹夫。我一進門，他就站住了，我立刻看出他样子很慌张。

“我看了这封信，”他連好也顧不得問，便說道。“您想去探險队，原来是这样！”

我看了看他，不禁回想起在学校时，大家嘲弄他是“猫头鷹”的事。他的眼睛滾圓，在这一瞬間，他特別象一只猫头鷹。不过是一只很大的猫头鷹，它喊叫了一声“原来是这样！”便吃力地喘息起来。

“您为什么要偷看別人的信？”我保持着相当和气的态度，問道。“这是不應該的，米沙。”

“您瞞着我！背着我找門路要走啊！”

“米沙，您怎么啦，发昏了嗎？难道要我向您請示不成！”

他突然怪腔怪調地发出一种嗚嗚咽咽的声音来，既不象笑，又不象是哭。

“如果您願意的話，”他高声說道，“讓我自己来办这件事。好，您走吧！”

我沒有作声。我不知道为什么不願意得罪他。

“您为什么不作声呢？”

“因为我不打算回答您的鬼話。”

“卡佳，卡佳！”

“您听我說，”我鎮定地說道，“您知道您需要什么嗎？需要休息。您累了。您根据哪一点說我一定要留在莫斯科呢？”

“是的，您要留下的。”

我正想笑，可是他向我跟前跨了一步，他的脸色变得那样，仿佛再有一秒鐘就要打我了。

“喂，这样吧，我的亲爱的，”我仍然心平气和地說，但已經不能象我想要作到的那样了，“您的大衣和帽子在哪兒？”

“卡佳！”他又絕望地呢喃說道。

“‘卡佳’又怎么样！我知道您打的是什么算盘，即便我留下来您又敢怎么样。您大概完全疯了，不过，您疯不疯跟我沒多大关系。怎么样？”

他一声不响地穿上大衣，戴好帽子，走出去了。

一九三五年秋，探险队的事终于决定了。著名的北极研究家符教授发表了一篇論文，認為根据克里莫夫航海长的日記来判断，“塔塔林諾夫探险队的材料如果能够找到的話，甚至对于近代的北极研究工作也有一定的价值”。他的这个見解在我看来也是很大胆的，可是竟出人意料地被接受了，这个新的情况推动了大家承認薩尼亚的方案的正确。原来符教授研究了“圣·瑪丽亚”号自一九一二年十月到一九一四年四月間的漂流图以后，作了一个推論，認為在緯度 $78^{\circ}02'$ 和經度 64° 的地方应当有一块尚未被人发现的陆地。后来，这块为符教授坐在办公室里发现的，假想的陆地终于在一九三五年的航行期內被发现了。固然，它并不是一块什么了不起的陆地，仅仅是隱沒在飘浮的冰山之間，景象极其荒凉的北极大陆的一小块地方。但不管怎么样，在苏維埃北极地图上又抹去了一个“空白点”，而且是靠“圣·瑪丽亚”号漂流图的帮助完成的。

我不知道这些新的論据对支持薩尼亚的方案是否需要。不过需要也罢，不需要也罢，“一支附属于研究北地島的高緯度探险队的搜索队”总算是列进下年度的航行計劃之內了。薩尼亚

應該在春天去列宁格勒，因此我們約定在我从未去过的列宁格勒会面。

8 列宁格勒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日早晨，我乘火車去列宁格勒。明天我就要和薩尼亚会面了！我的脑子里翻来复去地想了許多事情，什么都想到了。我大概是坐上了一节老旧的車箱，車箱一路上吱嘎吱嘎地响个不停，但我一夜都睡得很香甜，很安稳。我睡醒以后，就开始幻想起来。我感到幻想的滋味非常美妙，鉄輪单調的声音和邻床旅客梦中的呼息声仿佛是响在千里之外！我把生活中的事，不管能成的也好，或不能成的也好，都安排得多么如意！我覺得什么事情——甚至連我的父亲还活着，我們會找到他，一同回来，——都可以作到，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可是我这时的心情是那么舒暢，那么宁靜，所以也就放任自己这样想象了。我好象是暗自命令我們要找到他；他不是站在那兒嗎，白发蒼蒼，身板笔挺的，現在应当讓他睡着，要不然他会因为激动和幸福而神經失常的。

車廂搖晃着，吱吱軋軋地响，好象是一曲节奏均匀，声音宏亮，只有开头永无結尾的乐章。我一直在等待着，下面是什么呢？可是，这支乐曲又从头开始了。再想点什么呢？再命令自己作点什么呢？——要生活中最美好，最珍奇的。于是我想象着我們回来了，大家象欢迎一九三三年拯救了切留斯金号船員的那些飞行英雄一般在欢迎我們，当这些为众人所热爱，为众人所称道的英雄乘着复滿鮮花的汽車行进时，整个莫斯科都因鮮花，传

单和迎接英雄們的妇女所穿的洁白的服装而变成了白色。不过我这样希望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薩尼亚和父亲。只有現在，在朦朧中，在車厢里，在車輪发出的节奏均匀，声音单調，只有开头的音乐伴奏下，才可以放任自己設想那最不可能的事情。

“特別快車”到达列宁格勒的时间是十点二十分。邻舖的旅客們早已去过道抽烟了，他們大概是等我穿好衣服出去。可是我仍然躺着，仿佛害怕以后会很久都不可能重温現在这样美妙的，兒童般的心理状态。

我們約定要薩尼亚的妹妹（为了和我的薩尼亚有所区别，我在信里总是称她薩沙）到車站来接我。“如果我身体不舒服的話，”她信里写道，“就讓彼加去接您。”她不止一次隱約地提到自己身体不好，可是这些信里又充滿了快乐，还带着插图，所以我对于她所說的身体不舒服沒有給予任何重視。但我也有些兒怀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兒。有一封信里，画着彼加一手拿書，另一只手抱着一个嬰兒，真也奇怪，他們的模样兒竟十分相似。

大家已經穿好大衣，戴上帽子站起来了，邻座的客人帮我把箱子从欄架上取了下来。箱子很重，因为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带上了，甚至还带上了几块很有趣兒的岩石标本，仿佛我已經預感到长时期不会回到莫斯科去了似的。我心里很激动，列宁格勒到了！——在万头攢动中，突然看到站台了。我立刻开始找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家的人，可是等站台已經跑到后面去了，還沒看見他們，我失悔在电报里沒有把車厢号碼告訴他們。

搬運員把我的箱子搬了出来，我和他站在一起，一直等到人都走完了，还是沒有看見司考伏罗得尼可夫。

“也許在进口的地方吧？”搬運員說道。

我們走到入口處，又等了足足半個鐘頭，最後我終於斷定他們拆爛污了。哪裡有這樣邀請朋友的，連接都不來接一下，並且他們也知道我是第一次來列寧格勒。

我遲疑了一會兒，考慮是不是先去旅館，但總有點兒不放心，因為這事畢竟出奇，所以我還是到司考伏羅得尼可夫家去了。

實際說來我還不太認識他們。我和薩沙是多年前在恩斯克認識的，以後，恐怕也只不過見了不到三、四次面。不過我們經常通信，尤其是媽媽去世後，我孤孤單單的一個人住在莫斯科那幾年的沉痛的日子里，我們之間通信最多。她把薩尼亞信里的內容都告訴了我，甚至當他在巴拉紹夫，以及後來在北地城，他已經忘記了我的時候，她還是肯定地向我說他依然愛着我。

她是我過去的朋友，我毫不懷疑，等一會兒我們見了面的時候也會很親熱。她是我的朋友，何況她還是薩尼亞的妹妹。

我和彼加見面的次數也很少。在恩斯克的時候，他還是個細長條，頭髮亂蓬蓬的少年，經常作些出人意料的事；誰也沒有等他，他却突然來拜訪，然後又同樣突然站起身來走掉了。他跟列寧格勒的一個劇團到莫斯科來過幾次，經常跑來看望我，他除了稍微長大了些之外，依然還是那樣一個匆匆忙忙，頭髮亂蓬蓬的，出人意料的人。

薩沙在有一封信里曾經把從車站到她們住的那條街卡爾·李卜克內西大道去的路程詳細地講過，並且還畫了一個圖。但是我這回仍然暈頭轉向，我已經走到了涅瓦大街，還向一位彬彬有禮，戴夾鼻眼鏡的列寧格勒人打聽：

“請問，到涅瓦大街怎么走？”

这是一件丢人的事，我对誰也沒有談过。

后来我挤上了电車，唯一能看出的一点便是这兒的街道比起莫斯科冷清得多。我下了电車，提着箱子一拖一拖地走着，这条街道也同样很冷清。哦，这不就是七十九号，“摄影艺术家柏林什登”的寓所嗎。

是在这兒。

我站在三楼的楼梯台上，搓弄着被这只該死的箱子勒得麻木了的手指。这时楼下的門砰地响了一声，接着便有一个身穿雨衣，手里拿着帽子的細长身材的人，三步并作两步地跳上楼梯，从我身边冲过去了。

“彼加，是您嗎？”

这时他脑子里大概根本沒有想到我，所以他停住脚，瞥了我一眼，沒发现我身上有什么值得他注意的地方，便作出又要向前跑的样子。可是一个模糊的記憶終究还是使他停下步来。

“認不得了嗎？”

“看，您这是說的什么，当然認得罗！卡佳，我是从医院跑回来的，”他很着急地說道，“薩沙昨天晚上入医院了。”

“您說什么？”

“是的，入院了。先到我們家里去吧。所以我們也沒有能够去接您。”

“她究竟怎么啦？”

“难道她写信沒有告訴您嗎？”

“沒有。”

“好，走吧，我把一切都告訴您……”

摄影艺术家柏林什登一家人对薩沙和彼加的事显然也很关心，所以穿得很考究的小个兒女人在前厅里一碰見彼加，便着急

地問道：

“喂，怎么样啦？”

他回答說什么也不知道，他們不放他进去。可是这时又跑进来一位穿得很考究的小个兒女人，她也同样很紧张地問道：

“喂，怎么样啦？”

彼加只好又对她詳細講了一遍，說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們不放他进去。

薩沙要生孩子，这就是她住院的原因。

“彼加，您干嗎这样着急？我相信一切都会很好的。”

他的房間里現在只有我們兩人，他搭拉着头，聳着消瘦的肩膀，坐在我对面的圈椅上，一脸无精打彩，心神錯乱的样子，当我說一切都会很好的时候，他痛苦地咬了咬牙。

“您还不知道……她病得很厉害，她患流行性感冒，并且还咳嗽。她也說过一切都会很好的。”

他跳了起来。

“應該到加布里切夫斯基那兒去一趟。我已經打了电话，可是他說自己不太方便，因为他不在薩沙住的医院工作。薩沙是在雪列捷尔医院里。”

我这才知道加布里切夫斯基是平常給薩沙治病的医生。

“不，还是先到她那兒去吧。你想想看，流行性感冒！我相信一切都会平平安安过去的。”

他不知如何是好地看着我。

“怎么啦，彼加，清醒清醒吧！”我着恼地說道。

我一路都在責罵他，他这才慢慢地清醒了。当我向他描繪了一个可喜可賀的場面——薩沙怎样抱着一个女兒或者兒子回

到家里来时，他甚至出人意料地笑了。

“您当然是希望生一个兒子罗？”

“哎呀，只要能快点生下来，哪怕生个蛤蟆也行！”

我不知道这是一所什么医院——彼加說很好，不过我觉得很奇怪，这所医院里竟連一間接待室也沒有，大家就站在楼梯口，这兒放着一道木栅栏挡住楼梯。有几个同彼加一样的，心慌意乱的年輕的父亲坐在长凳上，或者垂头丧气地走来走去，互相碰撞着。彼加本来也想坐到长凳上去，可是我拉着他上了楼。一位挺討人喜欢的女护士告訴我們說，最好趁教授巡迴診斷完毕，从一科到另一科去的时候去走廊上找他。

我們終于截住了他，当彼加激动得連蹦带跳地扑到他跟前时，他只是眯縫起眼睛笑了笑。

他把我們領到自己的办公室。說来不免令人害臊，我們談了半个鐘头的話，我就覺得自己爱上了这个人。他长着一双善良的、天蓝色的眼睛，紧紧地握着彼加的手，向他解释什么样的情况應該担忧，什么样的情况不應該担忧。他特別易于使人发生好感。虽然他所講的并不都是些使人安心的話，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們听了却十分寬心。总而言之，教授是深信一切都会平安过去的，“虽然如此，但在这种情况下患流行性感冒，当然又添了一样病了”。在談到薩沙时，他說她真是个好样的，他还很少見過这样的人。

我們怀着极其愉快的心情回到家里，这时候彼加才想起我刚下火車，他連茶都還沒請我喝一口。房門响了一下，我听到有人在走廊里說：

“彼加，算了吧，我們壶里的水还热着哩。”

但他沒有把茶壶提回来，他拉开書桌的抽屜，拿了錢便跑出

去了，虽然我一再发誓说我路上吃的东西还剩得有，什么也不需要……

这可真是艺术家住的房间，给人第一眼的印象就是这样。甚至可以明显地看出，这儿住着两位艺术家，而且住得很挤。或许还可以猜出来谁在什么地方工作，另外一个又在什么地方工作，哪儿是他们相互妨碍的地区。

靠窗户的一张桌子是用制图桌改成的，虽然很朴素，可是洁白美观，毫无疑问这是萨沙的。另外一张桌子很脏，上面摆着一个模型，乱七八糟地扔着铅笔，水笔，纸卷，毫无疑问，这是彼加的桌子。

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出，他们过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和我根本不相同的生活。我突然感到我在莫斯科的生活，特别是最后一个时期的生活实在是太单调、太寂寞了。不过他们是艺术家，是有天才的人，而我什么天才也没有。当然，我这种想法纯粹是自寻苦恼，考虑这些事情也是白费力气。这时彼加回来了。

他很抱歉说房间没有收拾，因为想不到萨沙会突然住院。这一来，我倒感觉有些不好意思，因为自己刚才就象个傻瓜似的站在窗前，也没有趁这个时间把屋子整理一下……

“啊，我实在太饿了！我真是饿极了！”

于是，我们坐下来，一面吃茶点，一面谈论着萨沙。

我还忘了说一件事，就是我们去医院出来的时候，曾经和一位见习护士约定，请她每隔一个钟头把萨沙的情况用电话告诉我们一下。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彼加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她，——钱数大概相当可观，所以她脸上现出非常惊愕的神色，连忙把钱塞回来。现在是下午两点，她来电话了，说一切都很

正常。

“正常嗎？”彼加喊道。

“正常。”

“她自己覺得怎麼樣？”

“正常。”

過了一個鐘頭，她又掛電話來了，還是說正常。

“稍微有點兒呻吟，”她考慮了一下，又加了一句說。

我又聽見剛才要彼加用他開水壺的那個人的聲音，他惱怒地說道：

“彼加，不要發神經病。呻吟是什麼意思？您想想看，難道您沒呻吟過嗎？”

這樣繼續了整整一個白天。傍晚的時候，我怯生生地說，要是能出去走走，看看列寧格勒城那該多麼好。可是一看到他那付愁眉苦臉，恐怖的樣兒，我就留在家里了。

“我來給您解解悶兒，好嗎？”

於是他便把自己最近的作品——普希金一百周年紀念象的草圖拿出來給我看。畫面上的普希金在涅瓦河畔邁着大步，迎着風，身上穿的大衣為風卷起，臉上的表情固執而振奮。這是青年時代的充滿浪漫情調的普希金，他酷似一個黑人，正沉湎在冥想之中，隱隱地透露出一絲高興的樣兒。

“喜歡嗎？”

“很喜歡。我還不知道您在搞雕刻呢。”

他開始解釋自己是為什麼搞起雕刻來的。後來突然又把話題扯到在莫斯科舉行的，有拉斯克爾和卡巴布蘭卡兩人參加的象棋比賽會，然後又談到國際局勢。在這當兒他還是一直在傾聽電話鈴響了沒有。他無論講什麼事情，哪怕是談意阿戰爭，口

里都离不了薩沙，薩沙……

八點鐘的時候，見習護士不知為什麼沒有來電話，因此我們又跑到醫院去了一趟，又說了一番話，這次是和那位建議我們趁教授巡迴診斷之後去找的那位可愛的護士談的。總之一切都很好，至於見習護士沒有打電話的原因，只是因為她感到不好意思這樣頻繁地打擾我們。

我們回來後，彼加就介紹我和攝影藝術家的家庭，和他那矮小，文雅，鬢發斑白的妻子，以及同樣矮小，文雅，鬢發斑白的他妻子的妹妹認識。因為某種原因，主人經常住在莫斯科，不過她們把他的相片給我看，他原來是一個儀表堂堂的美發男子，穿着一件天鵝絨的短外衣，真是一位名符其實的攝影藝術家，甚至稱他為藝術家倒比攝影家也許更恰當些。

到夜半一點多鐘的時候，他們讓我到薩沙的床上去睡。彼加說他還不想睡，便拿了一本書在電話機旁安頓下來。見習護士的電話現在來得很準時，但每一次都要先告罪說打擾了。我听了這樣的一次談話之後便睡着了。好像睡了一會兒功夫，便听得有人急速而短促地敲着牆壁，我慌忙跳起來，不知道自己是在什麼地方，發生了什麼事。走廊上有亮光，從什麼地方傳來說話的聲音，好像是幾个人在爭先恐後地高聲講話。這時我由睡夢中醒來，看見彼加象一個細長的怪物似的跑進了房間，手舞足蹈地跳起舞來……

隨後他隔着桌子探過身去，想把什麼東西從牆上取下來。

“彼加，您到哪兒去啦？發生了什麼事？”

“男孩！”他嚷道。“男孩！”

所有的東西都擱到地板上了。原來他是想把牆上那張嵌在

笨重相框里的相片取下来，他起先跪在桌子上面，现在又在上边走来走去，极力想鑽到牆壁和相片中間去。

“薩沙呢？薩沙怎么样了？您发疯啦！您取这张相片干什么？”

“我答应过罗莎莉·納烏莫芙娜，如果一切都平安无事的話，我就把这张相片送給她。”

他从桌子上爬下来，吻了吻我，激动得流下了泪。

9 相 逢

一切經過比預期的要好出千百倍。第二天早上，我們就給薩沙送去了信、糖果和一籃鮮花，这是花店里所能找到的最大的一籃鮮花。當我們把这些东西送去的时候，服务员不禁惊讶地叫了一声：“哦哟！”还有值班护士也惊叹說：“哦哟！”

一切都平平安安过去了，可是被我昨天爱上的那位教授却似乎有点不滿意。不过这也可能只是我的感觉而已。不知道为什么，他們还没有把薩沙轉入病房。但最后还是当着我們面把她轉去了。我們托那位給我們打電話的見习护士去看她。这位見习护士捎回来了一张她写的便条。

亲爱的彼加，象你象极了，鼻子也是那么大大的。我不是說过一切都会很好嗎？卡佳，亲爱的，讓我吻你，吻你。謝謝你們送来美妙的鮮花。不需要送这么多的东西来。向柏林什登一家問好。你們的薩沙。

我讀了这张便条以后，甚至想痛快地哭一場。也許我真的哭了。这时有人在会客室里問現在是几点鐘，原来差一刻就十

点了。

于是，我告别了极不愿意离开这座房子的彼加，独自到车站去了，因为从穆尔曼斯克来的火车十点四十分鐘就要进站。

我发觉过去每次和薩尼亚久别重逢时，都会突然产生一种奇怪的失望的感觉。我把这次会面的情形想象了千百次，似乎再没有比我所感受到的更加甜蜜的了。在莫斯科的那一次，薩尼亚从北方来，我們在大剧院門旁见面时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在那一次，我觉得应该是发生什么不平常的事，发生天翻地复的大变化了。可是除了使我們俩后来都为这次会面而感到惋惜之外，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现在来到車站上，我驟然对这种感觉害怕起来了。其他人也和我一样，到这兒来接人，搬运員向列車跑去，一个鬍子花白，肮脏，相貌奇丑的列車主任为了点什么事情正在粗暴地罵一个乘务員。

但我知道这种感觉是会消失的，因为我們这次完全是另外一种会见……

列車到了，站台上刹时間騷动起来。接客的人并不多，但我还是离开大家远远的，好讓他一下子就能够发見我。我表面似乎很鎮靜，只是觉得这一切过得太慢——火車慢騰騰地接近月台，第一批旅客慢騰騰地从車扶梯上走下来，而且慢得出奇地向我走来。一批一批地走过去了，可是独独沒有薩尼亚。旅客还在走，因为沒有他，我的心都开始要滾出来了。他沒有来。

“卡佳！”

我轉身一看，他站在第一节車厢旁边。我連忙向他跑去，一面跑着，一面觉得我内心的一切都因为激动和幸福在顫抖着。

我們也同樣緩慢地沿着月台走，因為我們不時停住腳步，想多看對方一眼。我不記得在最初的一會兒我們都談了些什么話。薩尼亞很快地發問，我連听都沒有听清楚就回答。後來，我談到薩沙，我們又停了下來——這次停的地方很不好，所以一下子就被擠得東倒西歪，——我們談了很久關於薩沙的事。

“彼其加怎麼樣？他大概把全列寧格勒都鬧翻了。他真是個神經病。啊！我多久沒有看到他們了！”

薩尼亞說，他住在旅館里比較方便一些，所以我們就先到“阿斯多里亞”旅館，然後從旅館里打電話給彼加，先挂到家里，再挂到醫院。醫院里的人都知道他，說他買罌粟餅去了。

“什麼？”

“罌粟餅。”

“買罌粟餅去了，”我疑惑地說道，一面把電話筒挂上。

薩尼亞捧腹大笑起來。

“這是他想起了薩沙愛吃罌粟餅，”他解釋道。“她一向就喜歡吃罌粟餅。啊！真可笑！他還說‘傻小鬼’嗎？‘傻小鬼’和‘可笑’是他過去的口頭禪。你在看什麼？”

我在看他，因為我喜歡他，我實在太喜歡他了。我們又整整一年沒有見面了，但是很奇怪，我倒覺得我們比分別的時候更要親近了千百倍。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他在這一年中長高了一些，胸膛和肩膀也寬了。他的輪廓已經定型，面部，特別是下顎和嘴上的綫條變得更堅決，更有力了。他已經不再象一個孩子，現在似乎也不能再說他結婚還早這樣的話了。他雖然把頭髮梳得整整齐齐的，人也老成了些，但頭上還是和過去一樣，直挺挺的豎着一綹頭髮。

“我簡直都要忘記你这付漂亮的模樣兒了，”他說道。“很奇

怪，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那兒总感到不太好。”

“那么在这兒呢？”

他吻了吻我，我們又給彼加打电话。

这一次他在家里。当我告訴他說薩尼亞就站在我的旁边，現在正从我手里把話筒拿过去的时候，他便在电话里疯狂地吼叫起来。他們乱七八糟地嚷了很久：“喂，老家伙，怎样？哈！”互相罵“傻小鬼”。后来薩尼亞問他买到罌粟餅了沒有，一面笑得喘不上气来，用手势告訴我說他沒有买到。最后他們約定讓薩尼亞到医院去，一起去碰一碰运气，也許能見着薩沙。

“我呢？”

他又拥抱了我一次。

“我到哪兒去能沒有你呢？”他說道。“老兄，現在先結束吧。好啦，好啦！”

他又象那次我在火車上送他时那样悄悄地問我：

“你爱我嗎？”

“唔，唔。”

医院里当然还是不允許我們去看薩沙，但我們又递了一张便条給她，并且收到了回信。这一次她請我們把彼其加管束起来，因为他使所有的人都膩味他了。她还說，她想和我們一块兒散散步，最后又問我們吃过飯了沒有，如果還沒有，就把她的丈夫也帶去，因为“如果沒有人提醒他的話，他可以两天两夜都不吃飯”。

飯沒有吃成。薩尼亞要到北极研究所去，我就去送他；不仅因为我心里願意去送他，而且也因為我們需要抽个机会談談那促使我們能在列宁格勒会面的事情。我最后写的几封信他還沒有收到，所以他不知道“巴赫图索夫”要經過馬托奇金—沙尔，然

后繞过北地島，直往良霍夫斯基列島开去的消息，这是刚刚才决定的。

“这有什么呢，这样我們的时间就会更充裕，”薩尼亚說道。
“最使我耽心的就是时间問題。”

我們又談起搜索队的人选問題，他說他推荐了迪克逊的一位报务員，还有伊万·伊万諾維奇医生和他自己的机械員卢利。他从北地城写給我的信中常提到卢利。

“他是一个很好的报务員。你知道是誰嗎？”

“不知道。”

“柯尔津金，”薩尼亚郑重其事地說道。“就是他。”

我承認自己还是头一次听到过这个人，于是薩尼亚就解释说，柯尔津金是跟阿姆生到过南极的两个俄国人当中的一个，阿姆生在他所写的書中甚至还提到过他。

“好极了，对不对？第五个人是我。第六个人就是你。我是把你作为船长的‘女兒’推荐的。”

“真是这样嗎？不过我以为我有权利参加这次探险，不仅因为我是塔塔林諾夫船长的女兒。怎么你真是这样写的：职业是女兒嗎？”

薩尼亚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怎么啦？”他低声問道。“这有什么希奇。这件事作得不怎么高明，是不是？”

“很不高明。”

“不过要不这样的话，就好象我是为了自己的妻子在张罗似的。多么难为情。”

“薩尼亚，我根本没有求过你帮忙，”我平心静气地說道。“什么女兒，妻子的！我还是侄女兒，孙女兒哩！薩尼亚，我是一个

老地質工作者，因此我請求北方航務總局局長把我作為一個地質工作者，而不是作為你的妻子編在探險隊里的。何況我現在還不是你的妻子，如果你以後再有這種愚蠢舉動的話，那我就豁出來跟別人結婚。我們不是還沒有登記嗎？”

他急得眼睛一眨一眨的，很難為情地強笑着，然後又摘下軍帽用手擦了擦腦門，我這時甚至又有点可憐起他來了。

“卡佳，請你原諒，說良心話！”他嘟嘟囔囔地說道。

雖然這時我們已經站在院子里，站在北極研究所大樓的前面了，但我還是迅速地吻了吻他，然後說道：

“祝你成功。”

他答應六點鐘以前打電話給我，如果來得及的話，就到彼加那兒去一趟。

10 夜

他回來的時候不是六點，而是將近十一點了，到的地方也不是彼加那兒，而是“阿斯多里亞”旅館，並且要求我們立即到他那兒去吃晚飯，因為他連午飯都還沒有吃，餓得象個餓鬼似的，而一個人吃飯又覺得悶得慌。

可是彼加經過這樣緊張的一天之後已經累垮了，再加上他為了提神還喝了些俄羅斯酒，現在正躺在沙發上，瞪着一雙昏昏欲睡的眼睛，加上他那個蠻生生的鼻子和那付不相稱的手腳，活象一個彼得魯什加^①。

① 彼得魯什加是俄國民間木偶戲中的一個主要角色。——譯者注。

……我和薩尼亞每一次会面的日期我都記得，不仅是会面的日期，甚至通信的日期我都記得。在凱旋路花园里会面的那一天是四月二日，在大剧院門前会面的那一天是六月十三日。这次他从北极研究所回来后打电话給我，我到他那兒去的这个晚上我一生都記得，是五月二十一日。

我們是从童年时代就認識的，因此我总觉得我对他的了解似乎比他对他自己的了解还清楚一些。但是他这天晚上的神情我从来还没有看到过。当我们吃晚飯时，我甚至把这种感觉告訴了他。

方案已經全部通过了，在研究所里大家对他說了許多恭維話——这显然不是沒有根据的。他同那位根据“圣·瑪丽亚”号漂流路綫发现了一个島屿的符教授見了面，而且符教授待他非常好。他过去在列宁格勒这座美丽的大城市里住过，还在航校学习期間，他就爱上了这座城市。現在經過在北地城的一段宁靜的生活之后，他又回到列宁格勒来了！一切都順利，事事都如意。

在他的脸上，在他的一举一动之中，甚至在他吃飯的时候都可以看出这种幸福，看出这种得意的心情！他的眼睛閃閃发光，他的举止坦率而又自然。假如我过去沒有爱他的話，那么这天晚上我也会永远不变地爱上他了。

我們沒有止境地吃着东西，后来因为我說我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地看一看列宁格勒，薩尼亞就兴奋了起来，說他要“亲自带我去看这座城市”，于是我們就出去散步了。

这时已經两点多鐘，本該是夜間最黑的时候，可是当我们走出“阿斯多里亚”旅館时，天色是那样的明亮，我故意在果戈理大街上停下来讀一讀报纸。

多么美妙的白夜！但薩尼亞却說他对白夜并不感觉希奇，列宁格勒的白夜之所以美，就在于它延續的时间不超过半年。

我們从总参謀部的大拱門下走过，一个宏伟空曠的广场立刻展現在我們面前。这个广场也不是特別大，然而寬敞开朗，又很紧凑，不象莫斯科的一些广场那样大得沒有个遮拦。但遺憾的是我还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广场，薩尼亞只得簡短地給我上了一堂关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的俄国历史課。

然后我們沿着哈尔都林街——我是借一所房子的灯光看出这条街名的——走去，在列宁格勒博物館前一些用肩膀扛着大拱門的巨人象前站了許久。我不知道薩尼亞的感觉怎样，我却是怀着体貼的心情瞧着他們，仿佛他們都是活人，——他們显得那么吃力，不过样兒还是很好看的。

后来，我們走到河边。这兒才說得上是真正的白夜，既非白昼，又不是黑夜，既非黎明，也不是黃昏。軍医学院大楼的上空呈現着一片片深蓝色，淡蓝色，黄色，橙紅色，——仿佛世間所有的顏色这兒都应有尽有。而彼得罗巴甫洛夫城堡上空又全然是另外一种霧蒙蒙的鉛灰色。它們之間的顏色相差得那么远，簡直使人不能相信这是一个天空。我們先朝城堡和城堡上面的天空看了很久，然后，猛然轉过身来看軍医学院和学院的上空。这就好象是从一个国度倏然跨进了另一个国度一般；从一个静止不动的，灰色的国度跨入了一个美丽的，生气勃勃的，色彩瞬息万千的国度。

我穿得很单薄，感到有点冷，薩尼亞披了一件斗篷，于是我們俩一同蜷縮在里面，默默地拥抱着坐了許久。

我們坐在涅瓦河岸紧靠水面的坡道旁一张半圓形的花崗石椅子上，隱隱約約可以听見下面浪花拍打着石岸的声音。

我无法表达自己在这天晚上是多么幸福，心里感到多么舒服！我們终于在一块兒了，現在永远也不分离了。再也不需要向对方証明什么，也不需要象我們过去那样总是拌嘴了。我握着他的手，握着他坚硬的，寬大的，可爱的手吻了一下，他也吻了吻我的手。

我不記得在这天晚上我們还在哪些地方蹣跚过，只記得我們怎样也舍不得离开涅瓦河。那天蓝色圓屋頂和一高一矮的两个塔尖的清真寺总是聳立在我們前面，我們不停地向它走去，可是它象个幻影似的总是躲閃着我們。

清道工已經在打扫街道，悬挂在維波尔格斯克上空那巨大的，黄橙橙的太阳已經升得相当高了，尽管我們舍不得和这个夜晚分別，可是它已經逝去了。这时薩尼亚突然决定，應該立刻給彼加打电话。

“我們問問他，”他笑着說道，“問他这天晚上打算怎样过。”

但我劝他不要打电话，因为电话装在前厅，这样会把摄影艺术家柏林什登一家子吵醒的。

“这一家人很可爱，天不亮就把他們吵醒，这簡直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我們终于走到清真寺了，薩尼亚在清真寺旁叫了一輛出租汽車，我們忽然覺得坐在出租汽車里很舒适，因此薩尼亚又劝我先到島上去玩一趟，然后去彼加那兒。不过他今天还有很繁重的工作，所以我希望他先回去，哪怕是稍微睡一会兒也好……

于是我們就回到“阿斯多里亚”旅館，动手煮咖啡。薩尼亚总是把咖啡壺和酒精爐帶在身边——他是在北方开始嗜好起咖啡来的。

“生活居然这样美滿，真是太可怕了，对嗎？”他說罢便把我

拥抱住。“你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呀！我的心也是，你摸摸看。”

他拿起我的手贴在他的心口上。

“我们太激动了，真可笑，对吗？”

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话，由于激动，他的声音突然完全变了……

都快到下午一点钟了我们才去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家。矮小文雅的老太太给我们开了门，她说彼加不在家。

“他到医院去了。”

“这样早就去了？”

“是啊。”

她的脸上显出慌乱的样子。

“出了什么事吗？”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他给医院通了一次电话，他们告诉他亚历山大拉·伊万诺芙娜感到有点不舒服。”

11 妹 妹

一直到現在，每当我回忆起这几天，便有一种无能为力和抱恨終生的痛苦的感觉。我们每天到雪列捷尔医院去三次，在那挂着体温报告表的小玻璃公告栏前一站就是好久：“司考伏罗得尼可娃——37、37.3、38.2、39.9。”但这并不象我从前在学校里所患的那种简单的肺炎，第九天上一度有过危险，后来体温就下降了。就象教授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种可诅咒的“蔓延性”的炎症。有几天她的体温几乎完全正常了，这时我们总是兴高采烈地走回来，开始等待着薩沙回家。摄影艺术家的妻子罗莎莉·納烏

莫芙娜說她也患过肺炎，这种病比起她的姐姐貝尔塔所害的潰烂性肋膜炎来那真是微不足道的。彼加又談起了他的雕刻工作，有一次我甚而說動了他，讓他陪我一块兒去列宁格勒博物館。但第二天早上，我們又默默地站在小玻璃布告栏前，一遍又一遍地看……我发现彼加有一次閉起眼睛来，又迅速地睜开，就好象作孩子的时候，以为一睜眼就能看到完全另外的一种情形。可是他所看到的还是和我所看到的，也是我們希望不要再看到的一样：“司考伏罗得尼可娃——38.1，司考伏罗得尼可娃——39.3，司考伏罗得尼可娃——40。”

接連三天她的体温都保持着四十度，后来急剧下降，在几个鐘头之內，重又上升，这次一直升到40.5°。我相信这不是肺炎，就瞞着薩尼亚跑到教授寓所里去找他。但他确信診斷的結果——病症听得很清楚，不是一处，而是好几处，两边的肺上都有。他說这病不屬於他这部門治疗，薩沙已經由內科医生診視过了。

“到底怎么样？”

“流行性感冒轉肺炎而复杂化了。”

我知道他一天看視薩沙的次数不下一百次。总而言之，医院的人对她都很好，但我还是問他，是否需要再請一位內科医生来。

“或者就請加布里切夫斯基来罢？”

“当然可以，我亲自来給他打电话。”

但是薩沙經過加布里切夫斯基診視后，体温仍然沒有下降。

我在这些日子里几乎沒有看見过薩尼亚。他只是偶而在夜間来一次电话，再就是我到研究所一間为了装备搜索队而騰出来的小屋子里找过他一次。他坐在桌前，桌上堆滿了武器，照

相机，手套和皮袜子。一个穿着皮大衣，满面鬍鬚，样子很严肃的人在装配桌上的双筒枪，口里不住地罵着，說枪筒和枪托配不上。

“喂，她怎么样啦？你看見她了嗎？医生講了些什么？”

电话鈴不停地响，最后他拿下話筒来，憤憤地把它扔到桌子上。

“总是那一套。”

“体温呢？”

“今天早晨是四十度二。”

“見鬼！难道就什么办法也沒有了嗎？”

他这几天消瘦了許多，样兒十分焦灼，疲憊，总之，他已經不象他自己，特別是不象他第一天来时的样子了。

“看你瘦成什么样子了，沒有睡覺嗎？”他問道。“我不明白，究竟情况怎么样？”

“沒有直接的危險。”

“什么？”

“加布里切夫斯基說，沒有直接的危險。”

“去他們的吧！”薩尼亞怨恨地說道。“連人都治不好！我知道她本来是很健康的，她从来也沒害过什么病。”

我說現在大約要有好几天不能和他見面，因为他們已經答应讓我值班看护薩沙，从今天晚上起我就要搬到医院里去。他握住我的手，感激地看了看我。后来他把我送到門口，我們就分別了……

她躺在床上，眼睛望着天花板，間或舐一舐焦干的嘴唇。她沒有立刻認出是我来，也許是因为我戴着白帽罩，穿着白罩衣的

关系。但我認為她开始是把我当成了另外一个人了。

她显然已經很久沒有睡覺，對一切事情都錯亂了，早晚也分不清，對於她說來，時間仿佛也已經是不存在了。

她那黝黑的臉色現在變得蒼白了，兩只眼睛深深地陷下去，在她寬闊的臉龐上那種韃靼人的神色更加明顯了。她一向就有點兒輕微的斜視，過去，這對她說來甚至是很相稱，賦予她一種天然的，可愛的媚態。可是現在不知道為什麼，特別是在晚上，她那艰澀斜睨的目光往往會使我突然駭怕起來。她直著身子坐在床上，臉色又黑又白，兩條辮子搭拉在胸前，一句話也不說，我費盡力量也沒能把她勸得躺下去。有一次，薩尼亞也在場，她的樣子使他想起了母親，所以他發了半天呆，好久沒有恢復過來。

我幾乎從來沒有護理過病人，特別是象薩沙這樣病勢沉重的人，可是我現在學會了。這種工作是很困難的，因為薩沙差不多根本就不睡覺，或者睡不多一會兒，馬上又醒了，同時還需要經常注意她的呼吸狀況。

也有那麼幾天，生命以其無比的活力又回到她的身上。我記得有這樣一天，這是我搬到醫院後的第四天。她一夜都睡得很好，早上醒來說要吃東西。她喝了點牛奶茶，吃了一個雞蛋，當我們為了使病房透透風，嚴严实实地把她蓋起來的時候，她還突然說道：

“卡琴加，你一直陪着我嗎？夜里也是睡在這兒嗎？”

大概我這時臉上肌肉微微抖動了一下，她驚异地看了看我。

“你怎么啦？我病得很厲害嗎？是嗎？”

“薩申加，我們現在要開窗戶了，你好好地躺着，別說話，好嗎？你前些日子是在生病，不過現在漸漸復原了，一切都會很好的。”

她乖乖地不說話了，只是当我用香醋給她擦臉和手臂時，她抓住我的手握了一會兒。後來嬰兒送來了，我們仔細地觀看他吃奶的樣子，他睜大了眼睛，以一種認真的，莫名其妙的神情吃着。

“很象他，对不对？”薩沙戴着面罩，問道。

她很高兴嬰兒能象彼加。也的确是如此，虽然他生下来总共才不过十天，可是已經有个輪廓了，也給人一種細長的感覺。不过我覺得他象薩尼亞，——不是象他的母親，而是象我的薩尼亞；他吃奶的模樣兒就有一種不顧一切和堅決的勁頭！

“彼加怎麼樣？他很着急吧？我今天作了一個夢，夢見他來了，就坐在这儿，在這間屋子裡，可是他們却把他藏起來不讓我看見他。我明明看見他了，瑪麗亞·彼得洛夫娜却硬說他不在。”

瑪麗亞·彼得洛夫娜就是那位見習護士。

“他就坐在你現在坐的這個地方，一句話也不說。他沒法說話，因為他們把他藏起來不讓我看見他。天哪，我又忘記了，你還不太認識他嘛！”

“我覺得我已經和他認識很久了。”

“薩尼亞呢，你們什麼時候走？”

“大概兩個禮拜以後，我們的‘巴赫圖索夫’號還在修理。要到六月底才能出塢。”

“塢是什麼？”

“我不知道。”

薩沙笑了起來。

“你們真是幸福，美滿呀！”

我們談了大約整整一個鐘頭，順便還談到彼加的“普希金”。薩沙說她也覺得這件作品很好。

“他的精力很分散，”她愁悶地說道。“他現在在搞雕刻，起初我是不贊成的，但他在繪画方面也这样。”

她又回想起我們在恩斯克認識的情形，那次我去她們家作客，达莎阿姨評論我說：“還不錯，挺討人喜欢的。长得可真漂亮，就是有点愁眉不展的样子，身体也滿健康。”

“达莎阿姨在什么地方？”我問道。“她为什么沒有来。这是生头一个孙兒，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呀。”

“难道你还不知道嗎？她病得很厉害，她的心脏很不好，不久以前，医生还嘱咐要她休息半年。我和彼加常去恩斯克，差不多每个夏天都去。”

她說話还很費勁兒，常常停下来喘息。但無論如何，已經和昨天大不相同了！她已經好得多了。

“法官呢？”

“哪位法官？”

“看你，我們的法官唄！”

她對我說，司考伏罗得尼可夫法官——彼加的父亲——已經荣膺“光荣”勳章了。

“恩斯克那个地方很好，对不对？”她沉默了片刻說道。“你們能去嗎？”

“当然要去！”

等医生巡迴診斷以后，彼加就直叫我出去，我飞也似地跑去告訴他，說薩沙已經好多了。就在这当兒，接待室里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穿斜領衬衣，戴着鴨舌帽的青年和彼加一起在等候巡迴診斷的結果。因为每天早上他經常和我們同时到医院里来，所以我对他很面熟。我們知道他看望的病人姓阿列克塞耶娃，她的体温也很高，整个布告栏內只有她和薩沙的温度最高。当我

和彼加站在接待室里的时候，突然一位护士走出来，急促地向他說道：

“您是来看阿列克塞耶娃的吗？去吧，去吧。”

这时我們听见她低声对更衣室的值班女工說道：

“快点把罩衫拿来……也許，他还赶得上見一面。”

这真是可怕。他竭力克制住自己不看任何人，匆匆忙忙地穿罩衫，可是总也套不到袖子里去，到最后，护士乾脆就把罩衫象外套似的給他披在肩上了。

我們仍旧繼續談話，但彼加这时再也沒有听我談什么了。他臉色突然变得蒼白，我不由得抓住了他的手。

“您怎么啦？”

“沒有什么，沒有什么。”

我扶住他坐下来，便跑去找开水。他暈了。

这天我和內科教授談过話，他停止使用强心剂了，并且說“我們給薩沙服的藥太多了”。他临走的时候說，最近他看到一种治疗肺炎极为有效的新藥——二基曠胺，这是不久前一个科学家发现的。

到傍晚时，薩沙的病势又有点加重，但我并不十分慌张，因为她的病況到晚上一般总是要轉坏的。我拿着一本書紧靠在床头柜上的台灯閱讀着，我把头巾搭在灯罩上，不讓灯光影响病人的安宁。薩尼亚在前一天寄了几本書給我，現在我还記得当时讀的正是斯梯芬逊著的“好客的北极”。我参加探险队的事已經最后决定了，而且是以地質学家的身分参加的。符教授被任命为有关科学研究方面的領導人，再过几天，我就要去謁見他。当然，我并不隱瞞，暂时我对北方的知識还很有限。薩尼亚寄給我的都是些基础書籍，毫无疑問必須把它們从头到尾很好地讀一遍。

約摸在两点多鐘的时候，我站起来想听听薩沙的动静，我看见她睁着两个眼睛躺着。

“薩申加，你怎么啦？”

她沉默了一会兒。

“卡佳，我要死了，”她低声說道。

“你快要好了，今天就已經好多了。”

“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可怕，只是一想到孩子，就觉得可怕极了。”

她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她竭力想转动一下头，把眼泪擦在枕头上。

“他将来能进大学嗎？”

“薩申加，你别胡思乱想了，进什么大学？”

我替她擦乾眼睛，吻了吻她，她的前額烧得滚烫。

“他进了大学，那时我就要認不得他了。彼加怎么沒有来呢？他們为什么不讓他进来？他們有什么权力不讓他进来？他們以为我看不見他嗎？这不就是他，这兒！这兒！”

她想要坐起来，但我阻止了她。这时見习护士来了，我讓她去取氧气面罩……

从这天晚上起，恐怖的事便开始了，真叫人怎么說是好呢！

每一小时都給她注射一次樟脑，她不用氧气面罩能够呼吸的时间愈来愈短。体温逐漸下降，無論樟脑还是强心剂，对心脏都已不起作用了。她躺在那兒，指头发青，脸色变得象黃蜡一般。尽管如此，人們还是尽力地摆布着这可怜的，受尽折磨，遍体鳞伤的躯体。

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形繼續了多久，大概很久，因为这已經是又一天晚上，一个我过去从来未見過的新来的医生从病房里輕

手輕腳地走到走廊上向我們走來。我們——薩尼亞、彼加和我站在走廊上。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要把我們從病房里趕出來。這個醫生在門口站了一會兒，然後慢慢地朝我們走過來。

12 訣 別

人死而方為世人所知！在美術學院的追悼會上，我聽到大家的講話時，心中便暗暗想道，薩沙生前大家對她說的好話恐怕連死后說的一半也沒有。

靈柩放在台上，周圍堆滿了花，以至於她那蒼白的臉孔在鮮花堆中都快要看不見了。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稱她作“你”，說“她是一個優秀的藝術家”，“優秀的蘇維埃人”；說“突然降臨的死神橫蠻地攫去了她的生命”等等。這些辭句和死者這張莊嚴肅穆的臉相之間相距多麼遠啊！

我感到身上很不舒服，費了很大的勁才支持到追悼會結束。經過了這一番無時無刻不在緊張的工作，全心全意的工作，竭盡全力想挽救一個最親近的人的生命的生命的工作之後，我覺得再也沒有什麼事可作了。我現在是空閑了，我茫然若失地站在棺材旁。薩尼亞站在我的身邊，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看他一會兒清晰，一會兒模糊。他目不轉睛地望着妹妹，他的臉色顯得非常疲困，憤怒，仿佛因為她死了而在生氣。

他把所有的事都辦了——訂棺材，要汽車，料理事務，到民事登記處辦手續，去公墓，最後又送我回“阿斯多里亞”旅館，通宵陪伴着彼加。現在他和我並肩站着，把妹妹看了又看，仿佛要把她看個夠，以補償這一生似的。我問他彼加怎麼樣了；他沒有

作声，只是指了指站在棺材架旁的人。

彼加的样兒还好，不过他那苍白的，冷漠的面孔使我感到惊奇；他好象是在耐心等待着这一套冗长的仪式的最后结束，仿佛仪式结束后薩沙就会重新和他团聚，一切又会美满了。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爹是前一天赶来参加葬礼的。他站在彼加身后，眼泪扑簌簌地沿着两腮滚落在他那茂密整齐的花白鬍子上。后来我眼前又是一阵模糊，再就不记得这天的追悼会是怎样结束的了。

大概是薩沙殯葬之后的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爹准备回恩斯克去，特意来“阿斯多里亚”旅館告别。薩尼亚屋子里正好有客人，仿佛是负责送给养去阿尔汗格尔斯克的那位代理人，因此我们就到臥室里去了。屋子里到处堆放着棉衣，手套，背囊……探险队已经从北极研究所迁到薩尼亚住的旅館房間里来了。

我請老爹坐在床上，招待他喝咖啡。

“你們要走了吧？”他問道。

“是呀，現在快啦。”

我們沉默了一会兒。

“請原諒，我還不太認識您，”他說道，“不过关于您的情况我听到的很多，我一向把薩尼亚当作自己的亲生兒子看待，我从心眼兒里高兴他能和您結合。当然，这次薩沙的事情的确令人伤心……要不然也可以团聚一堂庆賀一番……但人生变幻莫测……”

他长叹了一口气，又重說了一遍：

“人生变幻莫测啊！……彼加对我說过，您很关心薩申加，我衷心地感謝您。”

我詢問达里亚·嘉芙里洛芙娜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問題也就在这里，她的身体不好。医生不讓她起床。气喘起来可怕极了。要是她身体好的話，我們也就馬上会把孩子帶回家去了。还有彼加，哪怕讓他到我們那兒住一些时候也好。可是現在不用說帶孩子——我甚至都不敢想象回去怎么交代。要是她知道薩申加的事，她准死无疑，她把整个生命都寄托在薩申加和彼加身上了。”

他手里摆弄着一个用枪弹筒改制成的很旧的銅打火机，——大概是內战时期的紀念品，——我知道他这时心里在想什么問題。我在送殯后回彼得格勒街时自己也曾經考虑过这件事。

……白淨的，未曾油漆过的桌子空閑起来了，小巧的画笔和薩沙临死前未完成的一幅风格古老的工笔裝飾画放在桌上，現在誰也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可怕，只是一想到孩子，就觉得可怕极了。”她好象是要把小兒子托付給我。如果她临死那一刻还清醒的話，她也一定会恳求我作这件事。

13 小 彼 加

我們決定在六月中旬出发，我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两个星期了。对于一个生下来总共才两星期的嬰兒說来，这个时间也不算太少。我現在想起来都好笑，当我和彼加到医院抱他时，我不仅不敢把他抱在手里，甚至連輕輕碰他一下都害怕。当护士講解應該怎样照料嬰兒，并且用手把他高高举起时，我不禁吓得惊叫起来。她用一只手把他托在空中，嬰兒呱呱地大声哭起来，可是她却冷靜地說道：

“可以增大肺活量。”

奶瓶要用滾水煮，每隔三小时喂一次奶，隔一天洗一次澡，她的这許多規章条令攪得我的头都暈了！最后，不管这件事有多么可怕，我还是把嬰兒包裹好，抱到手里了。我的动作大約是过份小心了，所以护士笑道：

“大胆一点兒，大胆一点兒。”

我白天黑夜地忙：一会兒要換垫布，一会兒要喂奶，一会兒要洗澡，一早一晚我还得去医院取母乳，总之一句話，麻煩的事情非常之多。但說也奇怪，我却愈来愈难以設想，不久以后，晚上就不能給嬰兒洗澡了，——他很喜欢洗澡，躺在澡盆里时那付神气十足的样子活象个小皇帝，——不久以后，再也不会因为应不应该給孩子橡皮奶头吮的問題而和罗莎莉·納烏莫芙娜爭吵不休了。

自然其他的事情什么也沒有改变。巴什基里亞地質局給我寄来了出差証，准許我在北极研究所工作一年，符教授也召見了我，我們詳尽地討論了高緯探險队的地質工作任务，因为我那时对北极的地質情况还一点兒也不了解，所以对有些問題感到很棘手。

“好客的北极”一書我已經讀完了。困难是很多的，因为我是在每天夜里，时而睡去，时而醒来的条件下閱讀的。还记得当时我怎样也不懂为什么說北极好客，据我看来它并不怎么好客。

每当我拿起書本的时候，孩子就“呱呱”地哭。仿佛他也預感到我就要走了似的。

早就該考虑考虑我走后如何安排孩子的問題，我不止一次地和彼加談起这件事，可是他总是低着头，默不作声地听我講，

一句話也不回答，样兒十分頹唐，这次可悲的事情把他完全毀了。

“要保姆干什么？”他有一次这样問道。我当时就明白，他看到这間屋子里有一个生人心里会很难过的。

不管我怎么劝他，他还是一点东西也不吃。不知道他把便帽丢到哪兒去了，大概是丢在街上，但总是在家里找来找去。他对嬰兒連看也不看一眼，这种态度使我感到特別地惊异！但有一次天快亮的时候，我正抱着書打瞌睡，突然一陣子悉悉索索的声音和嘟嘟囔囔的声音惊醒了我。我听见有人在說：“可怜的，亲爱的小乖乖。”

彼加只穿了一件內衣，胸口裸露着，样兒瘦得可怕，站在小床前。他大睜着眼睛，帶着一种病态的困惑神情注視着熟睡的嬰兒。当我問他：

“彼加，你怎么啦？”

他吓了一跳，慌忙离开了小床。他的眼眶里滿含着泪水，嘴唇顫抖着……

薩尼亚几乎每天都来，我总是一眼就能看出他的工作进行得是否順利，滿意不滿意。我們先談一会兒話，然后他就到走廊上去抽烟，为了免得他寂寞起見，我也陪同他一起出去。

有一次，孩子哭了，我把他从小床上抱起来，在房間里来回走动，一面搖着嬰兒，一面輕声哼唱，这时他对我說道：

“瞧你……”

“怎么啦？”

“不怎么，没有什么。真象个当媽媽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听了这話会脸紅。他笑嘻嘻地把我連孩子一齐抱住亲吻……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次，他满脸困倦，忧虑的对我说道，“尽管我多方奔走，可是批下来的钱还是很少。钱少，所以时间也少。”

“这和時間有什么关系呢？”

“鸡毛蒜皮的东西买不买也要考虑几个鐘头。什么事兒都得通过會計室，真是活見鬼！”

他一碰到心里煩躁的时候就咬嘴唇，这已經成了一种习惯。現在他又在咬嘴唇，他的眼睛黑溜溜，怒冲冲的。

“你不能帮帮我嗎？”他迟疑不决地繼續說道。“我知道你很忙。但是你要知道，現在哪怕把帳目整理一下也好。說良心話，我怕等不到出发就要被送进監牢了。”

第二天，我給罗莎莉·納烏莫芙娜留下了上千条注意事項，写下了每小时的工作——什么时候喂孩子，什么时候取奶等等，然后便到“阿斯多里亚”旅館薩尼亚那兒去了。我在他那兒呆了一天一夜，因为沒有我，他的确应付不了工作，甚至連离开一下房間都不行，平均每隔五分鐘就要来一次电话。

14 深夜的客人

契同志一次和我談話时，用了“患北极症”这样一个詞兒，只是現在，当我协助薩尼亚为搜索队搞給养工作时，我才完全理解到他这話的涵义。每天都有一些害这种不治之症的人来找薩尼亚。普君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位老艺术家，是塞多夫的摯友和伙伴。当薩尼亚的文章在“真理报”上发表后，他曾經热情地响应过，并且发表了一篇回忆录，叙述“圣·福嘉”号向大地島返航时，

在弗罗拉海岬碰見航海长克里莫夫的情形。

来客之中有一些是什么經驗也沒有的年輕小伙子，他們跑来恳求薩尼亚把他們安插在“巴赫图索夫”船上作司爐，当伙夫，总之干什么都行。

来客中有的的是沽名釣誉的人，他們想找一条获得荣誉和光荣的捷径；有的是不为私利的幻想家，在他們看来，北极是一个充滿奇迹和象神話一般变幻莫测的天堂。

現在，当一切皆已改变，当往日的激情和忧虑仿佛是那样微不足道，甚而令人觉得可笑的时候，回想起当初这些来客，我总不免要想起一个只露了一次面的人。他象是深夜梦中的幻象，閃露了一下便消失了，我甚至过了很久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薩尼亚在什么地方同他認識的。但就在这一刹那間，在我的脑海里突然涌現出一付将来的，而且也許还是最近的将来的情景。我好象洞悉了几年以后的事，我的心在收縮，我的心在发抖……

我沒有等到薩尼亚回来就把腿蜷在圈椅上睡着了，等我夜里醒来时，看見屋子里有一位陌生的人，这人是个海軍，不知道他是什么軍銜。薩尼亚半坐在桌子上画着蔷薇花，他却在屋子里来回不停地走着。这个人生气勃勃，动作敏捷，留着哥薩克式的头发，生着一双墨黑的，嘲弄人的眼睛。

他們正在談一个很重要的問題，我連忙合上眼睛，假装睡覺。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一面听人談話，一面打瞌睡，或者假装着是在打瞌睡，这样就可以免去介紹，梳头，換衣裳的麻煩。

“寻找塔塔林諾夫船长的事和北方航务总局的基本任务沒有絲毫相同之点，再沒有比这更容易証明的了。只消回想一下

寻找弗兰克林的情形就行了，沒有問題，这实在是一件荒唐的事。总而言之，人当然應該找，这样也可以把地图更正一下。不过，我要談的是另一回事。”

“另一回事”——这是指战争，是指在北极，巴倫支海和喀拉海沿岸的战争說的。我听着他的談話心里想，这可是一件新鮮事兒！

他手里拿着鉛笔，一面計算着在科拉半島上的矿藏数量，——这已經关系到我的工作。这位深夜的客人把所有的和平的矿物都算作未来战争中所必需的“战略原料”，我心里立刻就对他的意見加以反駁，因为我深信战争是不会有有的。

“……請您相信，”海軍同志急急忙忙地說道，“塔塔林諾夫船长非常了解，軍事意义应当是每一支北极探险工作队的基础。”

“显然他是了解的，”我心里立即說道，但自己仍旧处在那种可笑的假寐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下，既能思想，又能說話，正如同既不思想，又不說話一样。“不过战争是不会有有的！”

“……早就應該在我們商船队行駛的航路沿綫修建一些防御性的軍事基地……比方說在新地島吧，我看到那些十全十美的远射程炮連陣地心里就高兴……”

“算了吧！”我心里馬上就駁斥了他。“这是和誰打仗呢？和白熊嗎？”

但他仍然不停地講着。剎那間，我仿佛是从旅館这个夜深人靜的房間，也就是我蜷着腿半睡半醒地躺在圈椅上的房間，也就是薩尼亞用桌布的一角遮住了灯光，以免光綫照在我眼上的这个房間里轉移到了一个奇异的，被战火焚烧殆尽的城市。这兒一片寂靜，不过这是令人毛骨悚然，心神紧张的寂靜。大家都

象是在等待着什么似的悄声交談着，应当在黑暗中摸索，沿着潮湿的墙壁到地下室里去。我没有去。我站在一所黑洞洞的空无一人的木房子的台阶上，在我的头顶上是一望无际的晴朗而神秘的天空。现在他在什么地方呢？在那可怕的，星辰满布的太空中有一架飞机在飞翔，发动机吃力地喘息着，每一瞬间，结冰的机翼都在加重。这幅情景就会来临的，丝毫也不能变更的。发动机颤振的声音愈来愈瘖哑，飞机抖动着，再也听不到远方电台传来的信号了……

“不错，这是一个老问题，”海军同志突然大声说道，于是我醒来了，快乐地叹了一口气，因为这一切实在太荒谬了。我们日内就要一同到北方去，他不是好好地站在我的面前吗？我的萨尼亚，我所热爱的，累坏了的，聪明可爱的萨尼亚，现在我和他永远也不分离了。

“但是北方航务总局的人对历史却不感到兴趣。这些魔鬼，哪怕读一读苏联大百科全书上的文章也好哇！那上面正好引用了门德列也夫的一段很重要的名言。我把它抄下来了，您听着，真是一段精彩的名言。”

于是，他象个发音不清的小孩似的朗诵了门德列也夫的名言，这几句话我在父亲的遗稿中也看见过：“假如我们把在对马海峡所损失的十分之一用来开拓北极的话，我们的舰队也许就能经日耳曼海和对马海峡到达海参崴了……”

萨尼亚曾经告诉过我，说达莎阿姨总喜欢这样问他：

“喂，萨尼其卡，你生命的旅行怎样了？”

当我盘着腿坐在椅子上假装睡觉，懒洋洋地眯缝着眼睛细细瞧着我们这位夜间的不速之客，这位热情洋溢，说起话来象孩子一般口齿不清的，留着令人可笑的哥萨克式的头发的客人时，

我怎能想象到几年之后，我的“生命的旅行”竟会把薩尼亚带到这个人的家中呢？要是有人对我說，将来有那么一天，在他忧郁地思念着我，受尽了千辛万苦，年紀老大起来的时候，将要在这座寓所的空房間里来回徘徊，那么我一定会从心坎里大声笑出来的。

不过我們最好还是不要去窺探未来的事情吧。假如我們真能預知自己“生命的旅行”的話，那么活着就太沒有意思了。

15 青春常在

我們終于物色到一个保姆，这是一位受人推崇的很好的女人，她生得胖胖的，很爱干淨，已經有四十年的工龄了。柏林什登一家子兴奋地告訴我道：“她不是保姆，是位教授。”她剛一到，扫院子的清洁工人紧跟着就拖进一只旧式的大箱子。保姆从箱子里取出白围裙，白罩帽和一张古老的相片。相片上面隱隱可以看出保姆的父母和一个面部表情呆板的七岁的小姑娘，‘这就是她。

她穿上围裙，戴好罩帽，把相片挂在彼加为了紀念兒子的誕生送給罗莎莉·納烏莫芙娜一张画像原来挂的地方。从这一会儿开始，大家便都明白誰是这家屋里最主要的人物了。她向我說道，根据科学要求，嬰兒必須有自己的食具，自己的家具（尽可能用白色的）以及自己的固定医生。至于她自己，謝天謝地，沒有用白色的家具，医生和自己的食具也把孩子拉扯大了。柏林什登一家人都帶着欽佩的神情听着她講，并且似乎还有点害怕，不过我并不怕。說实在的，她是一位善良、真

誠的老太太，她深信自己的职业比地球上其它任何职业都重要。

我們決定在秋季回到這兒來，然后把小彼加和達麗亞·季摩菲耶芙娜（保姆的名字）一齊帶到莫斯科去。至於大彼加的問題則稍為複雜一些。有一次薩尼亞把他領進自己屋子裡，把我趕出來，然後鎖上門，兩個人在一起過了整整一個晚上。我不知道他們都談了些什么，不過深夜一點多鐘當我回來的時候，看見他們倆眼睛都紅紅的——大概是煙熏的；滿屋子裡都是煙，可是窗戶却毫無道理地關著。

“老傢伙，也得活下去呀，”當我邁進門時，薩尼亞聲音不大地說道。“你兒子都有了。”

彼加嘆了口氣。

“我盡量努力吧，”他說道。“沒有什麼，很快就會過去的。朋友們，你們別耽心。你說得對，事情既然已經發生，就再也挽回不過來了……”

探險隊的基本隊伍因為裝備問題延誤了，而我們的裝備卻已準備齊全，甚至打好包發往阿爾汗格爾斯克去了。這樣一來，我便突然有了幾天閑暇的時間，為什麼只說我有呢？因為薩尼亞依然是從早到晚在北極研究所裡盤桓。因此，我決定就利用這兩三天的空閑時間，哪怕走馬觀花地看一看列寧格勒也好。

當我看到一群兒童在“青銅騎士”的台座上爬來爬去，騎在大鱗身上嬉戲時，我就想到，如果我出生在列寧格勒的話，我的童年一定會完全兩樣。那將是富有海洋色彩的童年，充滿了波羅的海情調的童年。說實在的，當初我應該把“百年來的新發現”拿到這兒來讀，那才真夠味哩！

我參觀了普希金的住宅，到了彼得大帝的荷蘭式小屋，游覽了夏園。

涅瓦河上停泊着軍艦，有一次我在參議院附近看到水兵們上岸。信號員站在圍牆上打旗語。從軍艦上，透過大氣，透過太陽光和涅瓦河上的水汽交溶的輝光有人用旗語在回答他，所有這一切都令人感到是那麼愉快，那麼舒暢，我的眼淚不由得奪眶而出了。

的確，我在列寧格勒的時候常常想痛哭一場，——悲痛和歡樂交織在心頭，我心神恍惚，如醉如迷地在這美妙開闊的城市里漫步，竭力不去想在列寧格勒的這些幸福而又悲傷的日子即將結束。

薩尼亞當然也看出了我思想上發生了問題，有一次因為給他送飯的姑娘的事情，我竟至吃起醋來了。不過，他對我這種瘋癲癲失常的樣子似乎還很喜欢。

我腦子里常常產生一些突如其來的可怕的想法，有時候我剛走出門，便又急忙返回家里去。當我走上“阿斯多里亞”旅館的台階時，心里總要猜想，薩尼亞在不在家呢，其實，滿可以不必猜測，只要問一問看門人就知道了。

當然這都是些傻事，可是我對自己實在是沒有辦法。什麼事都想要有一個圓滿的結果，僅憑我熱烈的主觀願望似乎是不夠的，還需要一種超自然的，神奇的力量才行。

……我一生都記得臨行前的那一夜。當天晚上我到彼得格勒大街上去跑了一趟。小彼加剛洗完澡在睡覺，保姆戴着罩頭，穿着很高級的圍裙坐在箱子上織絨綫。

“我們撫養的是一位爵爺，”她驕傲地答复我最後的要求和囑咐說道。

我忽然害怕起來，這樣一位學究式的保姆會不會作出許多莫名其妙的事情來，但我瞧了瞧孩子便放心了。他干干淨淨，

白白嫩嫩的躺着，以至于使得周围的一切也都发着洁净的光彩。

大彼加和柏林什登家准备送我們到車站。

我回来的时候，薩尼亚已經睡着了，地毯上到处扔着錢，我把錢撿起来后，便去看薩尼亚留待明天作的一紙长长的工作計劃。

这时已是深夜，可是房間里还很亮，原来薩尼亚沒有把窗帘拉上。我脫下連衣裙，洗完脸，穿上了睡衣。我的臉頰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发烧，而且一点兒睡意也沒有，反而希望薩尼亚也醒来。

電話鈴响了，我取下話筒。

“他睡了。”

“睡很久了嗎？”

“剛睡着。”

“好吧，那就不用叫醒他了。”

那还用說，我当然不会把他叫醒的！我从說話的声音辨出是符教授来的電話。大概是有很重要的事，否則他不会在深夜挂電話来。不管怎样吧，我总算沒有叫醒薩尼亚。他衣服也沒有脫，在沙发上睡得那么熟，大概在梦里还着急呢，他的脸上掠过一絲暗影，嘴唇紧紧地閉着。

啊，我多么希望他醒来呀！在房間里我来回地走着，撫摸着滾燙的双頰。这兒不是自己的房間，明天这兒将会有另外的人来住。这个房間和其它千百个房間一样，摆設着罩天蓝色絲絨套的沙发，挂着小絲球鑲边的窗帘，摆着上面放了一块玻璃板的小書桌。可是不管怎样吧，目前这終究是我們的第一个家，我要永远地記住它。

隔壁有人在拉小提琴。他已經拉了很久了，可是我現在才開始注意它。拉提琴的人是一個細瘦身材，紅頭髮的男孩子，是別人隔着門厅指給我看的，他是一個很出名的小提琴家。我知道他就住在我們旁邊。

他演奏的東西完全不是我心裡所想的。他在音樂中所描述的不是因為薩尼亞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而產生的那種微妙的幸福的感覺。他是在追述我們昔日的，童年時期的會見，仿佛他曾經在第四中學的舞會上看見過我們，就在那一天薩尼亞第一次吻了我……

“青春常在，”這個我認為長得很丑陋的赤髮少年演奏道。“苦盡甘來，久別又重逢。你記得你曾經許下心願，你們一定要找到他，看吧，他就站在你的眼前，白髮蒼蒼，挺著胸膛，激動和幸福真足以使人發狂。明天就要啟程，一切都會象你所決定的那樣。一切都會美滿如意，因為我們所相信的神話還存在在這世界上。”

我躺在地毯上，緊按著鬢角傾聽著，一面哭泣，一面責備自己干嗎淌這些無謂的眼淚。我已經很久沒有哭過了，而且總是假裝著我從來不哭，甚至不會哭似的。……

我照薩尼亞的要求在七點多鐘的時候把他叫醒了，並且告訴他，說夜里符教授打電話來了。

“你生氣嗎？”

“為什麼？”

他睡眼惺忪的坐在沙發上，一會兒用右眼看著我，一會兒用左眼看著我。

“因為我沒有叫醒你？”

“生氣了，”他說完笑了起來。“你變得年輕了。昨天符教授

問我你多少岁，我告訴他說你十八岁了。”

他吻了吻我，跑进洗澡間，然后穿着一条褲衩跳出来作柔軟操。他要我也作柔軟操，但我作了几次就不作了。他却很有規律，每天两次，早晚各一次。

他身上还是湿淋淋的。尽管我說現在給符教授打電話还太早，可是他还是一面用松軟的毛巾擦抹着胸膛，一面走到電話跟前，取下了話筒。我这时正在作什么事情，大概是点酒精灯煮咖啡。薩尼亚用符教授的名字和父名称呼他。后来他用一种奇怪的声調反問道：“什么？”我轉过身去，看見毛巾从他的肩上滑落了下来，他也沒有去撿它，直挺挺地站在那兒，臉上的血色馬上消退了。

“好的，我馬上就办，”他說完就把電話筒挂上了。

“出了什么事？”

“真是扯淡，”薩尼亚撿起毛巾，慢慢吞吞地說道。“符教授昨天夜里接到了一封电报，搜索队的事有了变化。上面命令我立即到莫斯科民航局去接受新任务。”

16 “我看見你手里抱着嬰兒”

薩尼亚有一次曾經說過，他的生活总是这样：起初一切事情都很順利，然后突然来个急轉弯，跟着就开始“橫滾”和“英麦曼”。至于这次，簡直可以說是进入螺旋了。

現在，当旧的欢乐和悲伤已被种种新的感情所掩盖，而新的感情又比过去我們所經受的欢乐和悲伤强烈千百倍时，回想这次不如意的事情竟然給予薩尼亚那样大的影响，自然会覺得很

奇怪似的。这个影响甚至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对人生的看法。

“卡佳，一切都完了，”他从符教授那儿回来后，激烈地说道，“什么北方啊，探险队啊，‘圣·玛丽亚’号啊，我再也不愿意听见这些东西了！这全是些童话，早就应该把它们忘个一千二净了。”

我回答他说，让我们一起来忘掉这些“童话”吧。虽然我深信他是永远也忘不了这些童话的。

我还抱着一线希望，以为萨尼亚能在莫斯科争取到改变这个命令。但是我收到他的电报已经不是从莫斯科，而是在去萨拉托夫的途中发来的，这封电报使我完全失去了信心。他所接受的新职务也似乎更进一步地说明了探险队的彻底垮台。他调到农业航空部门，就是所谓的特种任务航空部门工作。他现在除了播种小麦，喷撒石胡荽花粉之外什么也不作。“好极了，他们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得啦，”他由集体农庄寄来的第一封信里写道，他为了和当地政权机关“协商和安排”他的工作问题，在这个集体农庄里已经蹲了一个多礼拜了，“让往日的幻想见鬼去吧，——本来这些也的确都只是幻想而已！但契同志毕竟说得对，要永远作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你别以为我屈服了。一切还有待于将来呢。”

“我们将要感谢以前的这段历史，”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至少，它帮助我们找到对方和建立爱情关系。但我深信不久的将来，这些年来的个人计划将会成为一件不仅对于我们说来才是重要的事情了。”

他用一种纯客观的态度在信中对我说，他对于担当“五谷的种植者”和“蝗虫的死敌”这一有益于人类的任务已逐渐习惯。他显然已经爱上了新的工作，因为很快我又收到了他完全不同的另一封信。

“亲爱的老婆子，”他写道，“你想想看，地球上居然有这样一种名为巴黎青的植物，它是用来在水田上空撒播的，每公里撒十一公斤。你可以想象到，作这种工作該需要多么高超的飞行技巧，更不要說这些水田都很小，散布在森林里，一块块就象亲兄弟一般彼此酷似。当你加大油门飞近一块这样的水田时，就要赶紧疾剧地俯冲，然后急上升。这不是很有趣嗎？說也奇怪，当我在这些水田上空俯冲，或者以超低空飞行撒播小麦时，我所想的却不是农业，而完全是另外一些事。現在一天飞一百二十五个起落，如果我飞机上的巴黎青一旦換成了另外一种更够味的貨載时，今天这些起落的鍛炼对我将会大有用处。一切都往好的方面走，我一点兒也不覺得后悔。拥抱你。我仿佛看見你手里抱着嬰兒，一面走着，一面哼唱着，你的辮子沒有綰好，散开了，你走近我跟前蹲下来，要我替你綰好辮子……”

薩尼亚脑子里想象着我抱小彼加的情景不是毫无道理的，我把全部的时间都消磨在他身上了。他每天都有变化。观察他怎样逐渐辨認我，辨認出罗莎莉·納烏莫芙娜，辨認出保姆来，观察他的眼睛，嬰兒的眼睛里根本是茫然沒有任何思想活动的，可是有时候会突然閃現出驚訝和专注的神情，这真是有趣极了。說来也令人难以相信，虽然他还没有滿月，可是他却会笑了。他爱看电灯，灯一熄就要哭，最初他見了自己的小手感到很害怕，可是后来他却很久很久地瞧着自己的小手，并且也不害怕了。其他的小孩在他这样大小时总是滿脸皺紋，一付苦相，而他却总是那么愉快，仿佛是因为降生到人世間来而感到高兴似的。我觉得他比我在医院里第一次看見他时更象薩尼亚了。他生下来头发就是黑的，不过那时只是脑門上有头发，而現在却滿头都长起来了。他长得非常可爱，长得十分端正……

一切事情的演变同心里想望的和幻想的完全不一样！我到列宁格勒来住这两三个礼拜，本来是为了会见萨尼亚，是为了能和他在一起，无论他到哪儿都行，可是现在他又远远地离开了我。我是出乎意料地突然有了一个家——小彼加，大彼加，还有保姆。他们需要有人照料和关心，而且谁也不怀疑，照料和关心的责任应该由我来担负。

虽然我已經告訴薩尼亞，要他永远把北方的事丢在脑后。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还繼續在研究北方的地質。我因为經濟情况很不好，所以又在地質研究所担任了一些很乏味的工作。

要是在过去，我很可能因此会苦恼，責备自己，过多地考虑自己的問題。但是現在我却被一种奇怪的平靜的心情突然控制住了。我的自尊心，驕傲和因为一切不遂心願的事而引起的怨恨仿佛都随着“童話”一起被我擯弃了。“有什么办法呢，我的亲爱的！”我回复薩尼亞道，因为在一封信里他抱怨自己，說都怨他把我弄到列宁格勒来，又把我撤下，还給我留下了一个家庭包袱。“就象老法官說的那樣，人生是变幻莫測的。”

我給他的信往往很长，写关于“科学保姆”的情形，关于小彼加变得多么快，大彼加怎样突然狂热地搞起工作来，以及普希金紀念象的設計作得多么惊人，巧妙……

可是有一件事我却一字也沒对他提过。就是有一次，我在十月革命节大街“美味之家”买东西的时候，看見窗外有一个穿灰大衣的熟悉的身影，他戴着那頂特意为我而买的軟呢礼帽，这頂帽子是那么不自然地扣在他那个方棱的大脑袋上……

当时天色已經昏暗，我可能是看錯了。不过这人确实是羅馬紹夫。他样兒很沉着，脸色蒼白，身躯微微前傾，緩緩地从櫺窗前走过，一会儿便隱沒在人群中了。



第七部 別 离

卡佳·塔塔林諾娃述

1 五 年

我不記得在什么地方讀过一首詩，這首詩里把岁月比作想象中的一条“時間之繩”上的小燈籠。

有的燈籠燃得很亮，放射出輝煌燦爛的光芒，另外一些却在黑暗中冒烟，烟气騰騰地劈劈拍拍爆着火花。

我們在克里米亞和遠東居住过。我是一個飛行員的妻子，因此有許多新朋友，她們都是克里米亞和遠東等地的飛行員的妻子。當大隊里來了新飛機時，我也和她們一樣感到興奮。當薩尼亞參加飛行到了預定時間還不回來時，我也和她們一樣總是不断地往大隊部挂電話，使得值班員感到討厭。我和她們一

样,認為自己永远也不会习惯于丈夫的职业,可是最后,也和她们一样又终于逐渐习惯了这个职业。但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地质工作(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那位直到现在还叫我“娃娃”的年老的女教授总是武断地说,“要是我不出嫁的话(偏偏还嫁了个飞行员),那我早已经得到硕士学位了”。可是一九三六年深秋,当我带着我和薩尼亚一起所作的新的工作成绩从远东回到莫斯科时,她只好把自己的话收回去了。我们的工作是在航空磁力勘探!从飞机上探查铁矿。

现在伊万·巴甫雷奇大概不会再說“你不了解他”的话了吧。在薩尼亚思想和感情遥远的深处,我看见了那曾经照亮过他童年的北极的星光。仿佛这是在一所荒废的,无人照管的房子里,每天夜间都有一种神秘的亮光在闪耀,细长的光线从牢牢钉住的百叶窗缝里透露出来。百叶窗关闭着,钉得牢牢的,可是明亮的光线照样透露出来,落在我们时聚时散的道路。

“薩尼亚,我现在了解你是个什么人。”

我们坐在海参崴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车的包厢里。这是料想不到的,但我们这一次的确是十天十夜都住在一个车顶下面,朝夕不离。我们同在一张桌上吃早饭,吃午饭,吃晚饭。白天,我们能够互相看见。据说,居然有些女人对这样的幸福不觉得奇怪。

“我是什么人呢?”

“你是个以四海为家的旅行家。”

“是的,从滨海机场起飞,由海参崴到伊尔庫茨克只要七小时四十四分钟。”

“不是这么說。他们不放你走哇。不过反正都是一样,不管从才干上說,或者从爱好上說,你都是一个旅行家。只有旅行家才能在我们吃鱼的时候,問鱼有多大的岁数。”

他笑了。

“只有旅行家才象你这么害怕文牍。只有旅行家才会在别人向他献花的时候象你这么难为情。只有旅行家才会象你这样吹口哨，总想自己的一套，每天早上用二十四个练习组成的体操来折磨自己的妻子。”

“还不包括冷水擦澡。”

“是的。只有旅行家才不容易老。”

“我可是渐渐老了。”

“你知道，我总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年龄特征。有的人一生下来就象是四十岁，可是有的人一辈子都象是十九岁的小伙子。契同志是这样的人，你也是这样的人。总而言之，很多飞行员都是这样。特别是那些喜欢飞越重洋的人。”

“你以为我是那种喜欢飞越重洋的人吗？”

“是的。你飞过大洋后不会把我抛弃吗？”

“不会的。不过我自己倒总是半路上就会被人截回来。”

我没有作声。“把我截回来”，他谈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句话是指萨尼亚把散失在从恩斯克一直到泰麦尔的残片搜集起来，组成了我父亲的生活真相，而结果却落到了外人手里。在地理协会，在北极研究所都挂着塔塔林诺夫船长的相片。许多诗人写诗歌颂他，其中绝大部分都写得不好。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登载着关于他生平的长篇论著，下面却是尼·塔的署名。他的这次探险，和塞多夫，鲁萨诺夫，托列等人的探险共同载入了俄罗斯人开辟北极的史册。

他的名声愈高，他的堂兄，这位为了组织“圣·玛丽亚”号探险队而牺牲了自己的全部财产，又献出了毕生精力来研究这位伟大人物的可尊敬的北极学家的名字，也跟着越来越经常地为

人們提到。

憑借着自己的地位，尼古拉·安東內奇的功績受到了重視，“在冰原上”這本書每年都再版，供給兒童和成年人閱讀。報紙上不斷報導一些由他主持的“學術會議”的消息。他在“學術會議”上經常發言。從這些發言中，我又發現了舊日爭論的痕迹。這場爭論是在一個臉色極其蒼白的女人被抬到冷冰冰的石板地上，被永遠地從房子里運走的那一天，那一個時刻終止的。不，這場爭論還沒有結束！這位可尊敬的學者在自己所寫的書中，也不嫌累得慌地重複着說，塔塔林諾夫船長的犧牲其錯誤是在某些“廠主”身上，特別是在一位維什米爾斯基爵士的身上，他這樣說不是沒有原因的。這位可尊敬的學者曾經用過一些証據，企圖把那個識破了他秘密的小學生反咬一口，現在他又搬出這些論據來不是沒有苗頭的。

現在這個小學生緘默了。但一切還有待於將來。

他默不作聲，日以繼夜，毫不疲倦地工作着。他在伏爾加河流域一帶撒播石胡荽。他在依爾庫茨克和海参崴之間的航綫上載運郵件，因為能在兩天兩夜內把莫斯科的報紙趕運到海参崴而感到幸福。他獲得了二級駕駛員的稱號，他曾經多次申請派他到北方去，但每一次的回答都是要他當“空中馬車伕”。這一次是調到西姆菲羅波爾和莫斯科之間的航綫，他自己倒不在乎，可是我却為他感到憤懣不平。這個每次都橫亘在他道路上的神秘的陰影究竟是誰呢？我不知道。他也不知道。

他在工作着，人們也稱贊他，說他工作得很好。可是只有我一個人猜得到他因這些千篇一律的航綫飛行感到多么疲勞。

“我最近找到一本舊筆記本，你知道在第一頁上寫的是什麼嗎？”

我穿着一件白色的連衣裙，和他并肩站在雪白华丽的輪船甲板上。薩尼亞这回是休假，我为他这次休假，为我們这次突然去塞瓦斯托波尔的决定感到非常幸福，至于以后再往哪兒去，我們自己也不知道。

“阿姆生的船名叫‘前进’。他給它取名‘前进’，自己也的确是在努力前进。这是南生对阿姆生的評論……，是我十四岁时的座右銘。的确好吧？可是現在呢，前进了又后退。忽而莫斯科，忽而西姆菲罗波尔。”

……灯籠时明时灭，在它那摇曳不定的灯光照耀下，忽兒是欢乐，忽兒是痛苦。時間头也不回地往前奔跑，只在一天晚上，就是薩尼亞叙述（不是对我叙述）他自己一生历史的时候才停頓了一会兒。这次重要的談話是在韃靼村飛行員俱乐部的花园里进行的。花园修在一片斜坡上，园中的小径穿过花开正盛的苏枋丛，蜿蜒而下，直抵海边。碎石子在飛行員們小心的步履下吱軋作响。驟然吹来一陣輕风，从阿依·华西里花园里带来了片片的樱花和苹果花瓣。这是一次公开的党的會議，說它是公开的还有着字面上的意义，因为會議是在迅速昏暗下去的南国天幕下，在戏台前的露天廣場上举行的。

薩尼亞講得很連貫，很鎮靜，但只有我知道他在講快了的时候，往往突然停頓住，这个动作表示什么意思。这是說明他发慌了。这还用說嗎！

我听着薩尼亞叙述，眼前不禁浮現出那即将遺忘的少年时代。这好象是在放演电影，有一个人的声音不慌不忙地講着，而銀幕上演的却是云彩和沿着广闊无垠的平原伸向远方的一条霧蒙蒙的带子似的河流。这是晨曦的景象。在我的印象中，少年时代就是这般霧蒙蒙的，这般幸福的。

我又想起了第四中学那个审問叶夫根尼·奥涅金的額头上总是搭着一綑头发的，又黑又瘦的共青团員。有一回在冰場上，他第一次向我傾吐了要上航空学校的志願。我看到他在恩斯克教堂花园里因讀了那些旧信而激动的情形。無論是在莫斯科，在北方，或者重返莫斯科之后，他都准备在全世界面前捍卫自己的真理。

回忆得够多了！讓我們来听听大家都說他些什么吧。

学校教育了他，苏維埃社会把他造就成了一个人，这就是大家对他的評論。他的特点是学习努力，作风正派。作为一个飞行员，他远在一九三四年就因在艰苦的北极条件下完成了多次惊险的飞行而受到涅涅茨民族区的表揚。自此以后，比如在掌握了夜航駕駛术以后，他又大大地往前迈进了一步。当然他还有一些缺点，性情急躁，易于动怒，沒有耐心。可是，对于“格利高里耶夫同志是否够得上一个党员的称号”这个问题，我們應該回答說：“是的，够得上”。

……一九三七年冬季，薩尼亚調到列宁格勒，我們寓居在柏林什登家里。一切似乎都还不错，只是每当我夜里醒来时，总看見薩尼亚睜着眼睛躺着。每一个礼拜我們都要到涅瓦大街的紀錄片电影院去看关于西班牙內战的电影。这是馬德里城郊大学区，許多手里拿着步枪，穿花格子衬衣的少年隱藏在废墟中。看吧，他們站起来，冲锋了。这是第五团在領取枪枝的場面。这是兒童从被围的馬德里撤走的情形——母亲們哭泣着跟在汽車后面奔跑，孩子們不断地揮舞着小手，这是真情实况嗎？是真情实况。那么但願这种痛苦的真情实况永远也不要 anywhere 重演了。永远也不要 anywhere！这些梗在喉嚨里的泪水究竟是从哪兒来的呢？这种痛苦的預感，这种在窄小，气悶的暗黑电影院

里突然产生的激情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

两个礼拜以后，在柏林什登家狭窄的前厅里，在挂着旧皮袄和女斗篷的衣架之间，我和萨尼亚一声不响默默地站着。这是新的一次别离前的最后一刻钟！他这次出发是穿便装，他穿着那件宽肩的时髦大衣，戴着软呢礼帽，样子怪里怪气的，使人完全认不出是他来了。

“萨尼亚，这是你吗？也许不是你吧？”

他笑嘻嘻地说：

“就算不是我吧。你哭了嗎？”

“没有。我亲爱的，我最可爱的，好好保重自己吧。”

他说“我会回来的”，还说了一些温存的，杂七杂八的话。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我请他不要轻视降落伞的作用，因为他经常不带降落伞。

他出发到哪儿去呢？我不知道。他说是到远东去。可是为什么要穿便衣呢？为什么我问起他这次出差的一些事情时，他不马上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先考虑一下，然后才说呢？为什么从莫斯科深夜里打来电话时，他只回答“是”或“不是”呢，为什么后来又在房间里来回地走了很久，不断地抽烟，显得十分激动，十分高兴，又因为什么原因显得满意呢？他满意什么？我不知道，也不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够送他到车站，他不是去远东吗？

“这有点不太方便，”萨尼亚回答道，“我不是一个人走。也许我根本就不到那儿去。如果方便的话，我从车站上再给你打电话。”

他从车站给我来了电话，说再过十分钟就要开车了，要我不必耽心，一切都会很好的，他隔一天就给我写一封信，他以后再也不轻视降落伞的作用了……

我經常收到蓋有莫斯科郵戳的信。從這些信來判斷，他也很有規律地收到了我的信。一些素不相識的人常常給我來電話，關心我的身體健康。遠在千里之外，在瓜達拉馬山，正在進行着戰鬥。在我夜間看書的小桌上方，掛着一幅釘滿了小旗子的地圖。遙遠而神秘的西班牙，霍查·吉阿沙，多洛列斯·伊巴露麗的西班牙突然變得那麼親近，就象是我度過了童年的街道。

三月里春雨連綿的一天，共和國的航空兵，“一切有翅膀的”都出動去迎擊那企圖切斷瓦倫西亞和馬德里的聯系的叛軍。這是在瓜達拉哈拉城下的一次勝利。我的薩尼亞是在那兒嗎？

七月里，共和國的軍隊擊退了布龍涅托的叛軍。我的薩尼亞是在那兒嗎？巴斯康尼亞被截斷了，需要駕駛着老舊不堪的民用飛機穿過濃霧，越過重山峻嶺飛到畢爾波去。我的薩尼亞是在那兒嗎？……

“出差期限延長了，”他寫道，“說不定我會發生意外。總而言之，請你記住，你是自由的，沒有任何義務。”

我在沃洛達爾斯基大街一個舊書商手裡買到了一本一八三六年出版的俄西字典。因為這本字典已經破爛不堪，紙張也發黃了，所以我又把它交給裝訂工重新裝訂了一下。每天晚上我都在學習這些西班牙文的長句子：“是的，我是自由的，我對你沒有任何義務。如果你真不回來的話，那我就情願一死了之。”或者“親愛的，你為什麼寫這些令人傷心落淚的信呢？”

我嚙嚙咕嚕地念着這些西班牙句子，大概在黑暗中這些話聽來更是怪聲怪氣，十分別扭，所以“科學保姆”以為我是在說夢話，趕忙起來，悄悄地為我劃了個十字……

一件似乎是最不可能，最難以令人置信的事情突然發生了。

一件最普通的，使得万物——天气、身体、工作都好了千百倍的事情发生了。

这天深夜从莫斯科来了电话，说他要回家，惊愕万分的罗莎莉·纳乌莫芙娜把我叫醒，我急忙跑到电话机前……几天以后，他果然站在我的眼前了，样子瘦了一些，人也晒黑了，真有点象西班牙人了。我亲手将红旗勋章给他佩在制服上。

……秋天，我们动身到恩斯克去。彼加和他的儿子以及“科学保姆”每年都去恩斯克过夏天。达莎阿姨在每一封信里都请我们到恩斯克去。现在，我们终于动身去了；早上决定，晚上我已经在车厢里责备萨尼亚了，因为只差五分钟就要开车，而他还没有来，买什么大蛋糕去了。车已经开动他才喘吁吁地，笑嘻嘻的跳上来。

“这玩意儿真好，他们那儿可没有这种大蛋糕！”

“要多少有多少！”

“这样的糖果该没有吧？”

的确，恩斯克大概没有这样好的糖果，甚至连盒子怎么开法也不知道。盒盖上的小红圆框里写着“长命富贵”四个金字。

我们静坐在昏暗的包厢里，很久也没开灯。

什么时候曾经有过和这差不多的事情呢？这是在我们儼如成年人似的从恩斯克回来的那一次。几个虚无主义者的老太婆统着用细绳拴着的又大又可笑的暖手筒来送我们。一个没有刮脸的小个子男人总是在猜测我们是什么关系：兄妹吗？样儿不象！夫妻吗？年岁太小！还有那些苹果——又红又结实的冬苹果！为什么童年时代才会吃到这样的好苹果呢？

“我就是那一天爱上了你的。”

“不对。有一次我们从冰场出来，你请我吃豆角，我没有吃，

你就把豆角給了一个小姑娘,那次你就爱上我了。”

“是你自己那时候爱上我了。”

“不对,我知道是你。要不然你就不会給别人了。”

他很認真地思索着。

“那么,你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不知道……一向就是。”

我們站在車廂的过道上,也和那回一样,目送着窗外一起一伏的电綫往后飞奔。一切事物都有所改变,只有幸福还是和从前一样。肥胖的大鬍子列車員不时瞧瞧我們,——也許是瞧我,——然后叹了一口气,說他也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兒……

到了恩斯克。清晨,电車还没有开始运行,所以我們只好徒步穿过全城。一个很有礼貌,衣衫襤褸的人幫我們提着东西,不停地唠叨着。尽管我們告訴他,說我們就是恩斯克生的人,可是这些话都不起作用。他所有的人都認識:已故的布宾其可夫家里的人,达莎阿姨,法官,特别是对法官熟悉,他同他打交道已經不止一次了。

“在哪兒呢?”

“列宁区的审判庭上。”

在廣場上,在农庄庄員們出售苹果、白菜的貨攤前面,样兒显得有些衰老了的达莎阿姨拿着一棵大头白菜,正站在那兒斟酌:买呢,还是不买呢?

薩尼亚招呼了她一声,她以老年人慣有的严峻神情从眼鏡下瞅着他,突然失去支持地松开了手,白菜掉到地上了。

“薩尼其卡! 我的寶貝兒!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跑到市場上来了?”

“不是的,达莎阿姨,我們是順路,达莎阿姨,这是我的妻

子。”

他把我引到达莎阿姨跟前。恩斯克市場上的交易这一来都中断了，連馬兒也把嘴从袋子里抬起来，很有兴趣地瞧着我和达莎阿姨怎样亲吻……

这是果戈理街馬尔庫兹的房子，大門的两旁都有獅子象。早餐是按照达莎阿姨的口味准备的，吃完这样的一頓早飯之后，一想到世界上还有午餐和晚餐就觉得可怕。我們在电话里和法官談了一次話。他这时正在区里开庭审訊，听他那細微遙远的声音，就好象他是在地球另一边的某个地方說話似的。小彼加居然已經三岁了，难道討論用不用奶瓶給他喂奶，出門是抱着他，还是把他放在小推車上这样一些重大問題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嗎？

我們在教堂花园里，正是在过去薩尼亚他們曾經躺在那里企图在白天看見月亮和星星的地方找到了大彼加。他們在这兒讀过尺牍文选，在这兒互相进行了“友誼的歃血盟誓”。

彼加象个土耳其人似的盘着腿坐着，膝盖上放着一本很大的亚麻布写生簿。他正在画沙河与靜河汇流处——铁栏杆的风景；洁白肃穆的波克洛夫修道院高插在充滿阳光的广闊的晴空中，在修道院的后面，在河对岸是連綿不断的田畴。

“对不住，公民，請問您沒有看見一个画匠嗎？”

他回过头来，惊异地看着我們。

“一个画匠从这兒走过去了，”薩尼亚繼續說道，“一个穿短上身，脸上有雀斑的人。”

彼加立时跳起来。他的身躯又瘦又长，举动显得很笨拙。

“你們来啦？还有卡佳？嘿，好样兒的！我真高兴！喂，講講吧！薩尼亚，你不是从那兒来的嗎？”

“我是从那兒来的。”

我們在馬尔登長老礪堡旁边坐了約摸两个鐘头，然后走到河岸上，順着一个一个的花园走遍了全城。这座城市在秋日里显得多么美丽！波达尼切斯基花园里的枫叶多么紅啊！悬崖下面，一行行树身被塗刷得粉白的矮矮的苹果树整齐地排列着。沿着这条久已荒蕪，被人遺忘了的綠蔭小径向着悬崖那边漫步走去，这又是多么愜意啊！

“我們曾經鑽到这兒来偷过苹果。你还騙我說园丁的枪里装的是盐粒。”

“那可不是撒謊。真有趣，我們当时都是些什么样的孩子呀？譬如你吧，你記得起自己小时候的情形嗎？我可是想不起来了。”

“你那时真是个奇怪的孩子。你还記得，有一次你异想天开，說老鼠里也有女王嗎？还有土耳其斯坦的事，这真是幻想。你那个时候就已經是个艺术家了，至少也可以說是一个艺术人了。”

“不过我那时覺得你才應該成为一个艺术家呢，你不是搞捏塑搞得很好嗎，为什么又半途而废了呢？”

我瞧着薩尼亚，心里想要不要揭露他的秘密，可是他对我使了一个威吓的眼色，所以我什么話也沒有說。他現在空閑的时候还在捏塑，当然是自己捏着玩的。

法官晚上很晚才回来，这时我們早已不等他了。突然外面拐角的地方，劈劈啪啪响起了“加吉克”轎車汽缸的燃爆声，接着老人便出現在便道上。他戴着一頂沾滿了尘土的白色无緣帽，提着两个公事皮包。

“喂，都来了一些什么客人？等我先去洗洗脸，然后来和你們接吻。”

随后我们就听见他在厨房里呼哧呼哧地洗了很久。达莎阿姨埋怨他又撒了一地水，可是他仍然不住地呼哧呼哧打着响鼻说：“啊哈，真舒服！”——最后，他终于梳洗得整整齐齐的，赤着脚穿了一双拖鞋，穿着洁净的托尔斯泰式的衬衣走出来了。他把我们轮流拉到台阶上，仔细地打量，先看我，后看萨尼亚，又专门看了看勋章。

“不错，”他满意地说道。“一道杠？”

“一道杠。”

“这么说来，当了大尉罗？”

“是大尉。”

他紧紧地握住萨尼亚的手。

在恩斯克这个美妙的晚上就是这样度过的。我们很少能全家团聚，但我们彼此非常亲热。现在，当我们终于聚会了的时候，大家不免因为我们原来是分居在不同的城市里而感到奇怪。

我们围坐在桌旁，一直坐到深夜，天南海北地谈得没有个止境。我们回忆起萨沙来，随随便便，毫无拘束地谈论着她，就好像她还生活在我们之间一样。小彼加一个月比一个月地越长越象她了：也是那种蒙古人的眼睛，两鬓上也是生着那么茂密，柔软乌黑的汗毛。他低下头去的时候，眉毛也是那么高耸着……

萨尼亚讲起了西班牙的事情来。一种奇怪的，早已忘记了的感觉包围了我；我听着他讲，就好像他所说的是另一个人。有一次，他起飞去侦察，看见五架“容克”飞机，他毫不犹豫地朝它们迎面冲去。难道这真是他吗？当他飞到这几架“容克”飞机的中间时，他差不多是在盲目地扫射，因为距离这么近，是不可能不击中的。难道这也是他吗？他的上衣着火了，他用手套掩护住脸，把受伤的飞机安全降落，过了一个钟头之后，又驾驶着另

一架飞机飞上天空。难道这真是他嗎？

法官听他講着，他那毛茸茸的花白眉毛下面的眼睛里閃耀着孩子般的滿意神色。他举杯站起来发表演說；薩尼亚还在火車上就对我說过，法官一定要演說。

“薩尼亚，我不准备夸奖你，虽然，你所作的事是值得夸奖的。你曾經对我說过，你想作一个飛行員，当时我問你：‘是作空軍飛行員嗎？’你回答說：‘是北极飛行員。如果需要的话，那就作空軍飛行員。’瞧，現在不真是成了一个能征善战的空軍飛行員了嗎。你就坐在我的面前，我怀着驕傲的心情回忆往事，我完全有权利把你看作我的亲生兒子。不过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脑子里还产生了另外一些想法。我想談談你力图找到塔塔林諾夫船长探险队的这一崇高的理想，这个理想曾經温暖过你的青年时代。你象是給自己提出一个要干預这个問題，并按照自己的看法把它糾正过来的任务。这是正确的，正因为这样，我們才是布尔什維克革命家。因为我从你的童年时代就了解你，所以相信你迟早是能够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

我們碰杯的时候，薩尼亚用西班牙話說道：

“Salud^①！……就当‘走向生活的旅行’現在开始吧，”他說道。“就当艦船昨天才离开港口，远方的灯塔还看得見，它已給离港的艦船拍发了告别的祝詞‘祝你們航行順利和成功’。从前我們年紀虽小，但是很勇敢，我們在城市阴暗而寂靜的街道上走着。我們俩的武装只是一把芬兰刀，也就是彼加用旧皮靴給它縫了一个刀鞘的那把刀。不过，我們內在的武装比起表面看上去的要好得多。我們前进，因为我們互相起了誓：‘奋斗，探求，

① 干杯的意思。——譯者注。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們前进，因为路程还没有結束。”

薩尼亚高举酒杯，一飲而尽，使劲把酒杯摔到牆壁上，嘩啦一声砸得粉碎……

一九三九年，我們住在莫斯科，我們經常到西夫切夫·符拉什克胡同瓦里亚和琪拉家里去。西夫切夫·符拉什克的寓所里現在显得有些拥挤了。

一个扎着小辮子的白嫩白嫩的小女孩睡在“外厨房”里，她和她媽媽琪拉一样，生着一个大大的，坚硬的鼻子。过去一度曾被瓦里亚用作照相室的貯藏室里挂着小孩的襁布。在“內厨房”里，薩尼亚差一点兒沒有坐到一个小包裹上去；原来里面裹着一个額上生着一綫黑头发的嬰兒。一张严肃的、呆呆的小脸露在外面，看样子，只要給他戴上一付牛角框眼鏡，他就会去听关于玄狐混合种的报告了。

小女孩已經能“带表情地”朗誦詩歌，从她身上也使你能覺察出琪拉的媽媽对她認真教育的結果。她的教育在原則上和那已經驕傲得不可救藥的瓦尔瓦拉·拉宾諾維奇的教育完全相反。

在西夫切夫·符拉什克胡同里，我和薩尼亚坐在这样一些可爱的，这样一些“小”朋友中間的时候，我們两个流浪人，两个旅行家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呢？

当然，我們想了自己一生寄人篱下，想了我們沒有自己的家，哪怕是象瓦里亚和琪拉这样狹小，拥挤的家也沒有。

因此，我們决定現在在列宁格勒要有这样一个家……

灯籠时明时灭，在它那摇曳不定的灯光照耀下，忽而是欢乐，忽而是痛苦。

一个晴朗的冬天，我們站在克里姆林宮牆下一块黑色的大理石前，在这块大理石上刻着一个为我們所热爱的普通的人名。薩尼亚回忆起有一次去見他时的情形，一路上他竭力慢慢地思想，借以克制內心的激动，等走到了同他說起話来时，就好象是在電話里交談一样：

“是契同志嗎？我是格利高里耶夫。”

一座巨大的城市，几百条美丽的街道、剧院、公园和花园都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时期距現在已經一年了。可是我和薩尼亚总还感到奇怪，难道我們真的永远再也听不到他那把“奥”咬得特別重的低沉的声音了嗎……

一九四一年，我們搬到列宁格勒——如果可以的話，但願这是最后的一次搬家了。我們租了一所三个房間的別墅，带一口井，还有一位貌似古俄罗斯射手的英俊的老主人，彼加立刻就給他画起象来。彼加父子两个和“科学保姆”今年沒有到恩斯克去，我們全家都住在別墅里。我們常常去湖边游泳，用真正的銅制大肚茶炊煮茶喝。我們有些妇女对于这种絕妙的安靜生活，和这样的幸福居然觉察不到，真使我感到奇怪。

我們每个星期六都要去接薩尼亚。我們全家一起都去車站接他，其中自然又要以小彼加等待薩尼亚叔叔等得最着急了。这一次他心里希望能够得到一艘鉄甲艦。希望實現了，薩尼亚拿着一只漂亮的大軍艦从經由我們面前駛过的車廂門梯上跳了下来，向我們揮着手，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还在跟着車廂走。火車停下来，他伸出一只手去，一位瘦小的老太太从車梯上走下来。她精神矍鑠，但却象是有什么心思牵挂的样子。她一只手拿着一把伞，另一只手里拿着一个帆布旅行包。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但这确实是姥姥。她穿着华丽的絲綢衣裳，戴着一頂很

显眼的草帽。这是姥姥，薩尼亚恭恭敬敬地搀扶着她，保护着她不致被顿时挤满了小小站台的喧嚣的人群挤着……

2 姥姥叙述的事

应该说明一点，近来姥姥的某些性情使我感到很神秘。她向来耻笑别人用纸牌算命的事，可是现在她却突然热中于算命，甚至自己还带了一付纸牌。她算的是红桃K，显然，她和它之间有着极为复杂的关系。

“宝贝儿，你这是打些什么算盘，”姥姥怒气冲冲地说道，“好！公家的房子都不合你的口味了？……”

她虽然刚才还抱怨，说家里太寂寞，没事可干，但在谈着话的时候，却突然跳起来急着要回家去“忙家务”。

“不，应该走了，”她慌慌张张地说道。“这怎么成！一定要走！”

她一向喜欢看电影，可是现在当我请她去看电影时，她甚至感到吃惊。

“到电影院去，”她慢条斯理地说道，“这要完全看影片的质量如何而定。”

“这要完全看影片的质量如何而定。”——姥姥以前说话不是这么咬文嚼字的呀。

我自然猜得到姥姥内心里所说的，要给他一间公家房子的那位红桃K是指的谁，以及她为什么突然着急要回家去，还有这些冗长的，转弯抹角的句子是从哪儿来的。这都是尼古拉·安东内奇，是他支配着我可怜的姥姥的全部思想活动。

这是他的势力范围，是他所起的惊人的影响！

我不止一次地劝她同我一起住一个时期，哪怕是在我和薩尼亚寓居莫斯科期間来住一住也好。但怎么說也不行，她連听也不願意听这样的話！

“我一走开，他一定要找我，”她神秘地說道。“不行，看来是命該如此。”

“什么一定要找到！他真是那样需要你嗎！他連找都不会找你的。”

姥姥默默地沒有作声。

“不，他会找的！这件事对他說来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我住在他家里，那就是說遂了他的心願，而不是随了你們的心願。別着急，他每天晚上还念書給我听哩。”

尼古拉·安东內奇每天晚上把自己的書念給姥姥听……

当我們决定在列宁格勒成立自己的小家庭时，我很想讓她搬到我們这兒来住。可是每見一次面，我就越加深刻地感觉到这是不可能的。姥姥罵尼古拉·安东內奇的次数愈来愈少，而談到他的时候那种迷信的恐惧心里却愈来愈明显。显然她心里是深信他有一种超凡的力量的。

“我只要动一动念头，他就会立刻知道的，”她有一次說道。“前几天我想烘点心，他就說：‘不过千万別用西米。胃里不好消化。’”

而現在姥姥却一手拿着伞，一手提着帆布旅行包，突然出現在列宁格勒車站上，精神勃勃地向我們走过来。大概出了什么事情了吧？

她在路上問，在我們別墅里住是不是一定要登記。

“可以不登記，就这样住下，”我回答道。“你为什么要耽心这件事呢？”

“没有什么！登記就登記好了，”姥姥把手一甩說道，“我現在对什么也不在乎了。”

关于大小彼加和已故的薩沙，我在信里和口头上对她講过上千次了。在我还是个年輕姑娘，住在特維尔·雅姆二路时，彼加到过我們家里，姥姥認識他。但她那么客气地同他問好，就仿佛是第一次看見他似的。她心不在焉地吻了吻小彼加，至于“科学保姆”，她只是冷冷地評論說她“一脸蛮气”。

姥姥受了刺激，这是毫无疑問的。但受了什么刺激呢？这就是个謎了。

我們租了两間带閣楼的房間。这間閣楼和姥姥一样瘦小，好象是特意为她修筑的一样。姥姥首先就检查窗戶上有没有插門，房門是否能够鎖住。

“得了吧，姥姥，我不喜欢这样，”我坚决地說道。“等我馬上把門关起来，就誰也听不見了。赶快談吧，究竟是怎么回事。”

姥姥沉默了一会兒。

“我就說！瞧你，还吓唬人哩！”

……她睡了一会兒，洗了脸，穿着一件带皺褶的連衣裙，一双鞋尖頂长的乳黃色皮鞋走到桌前来，服装入时，人也显得年輕了些。

“他找了个女管家，”她劈头說道。“他还說：‘不是女管家，是秘書。她对我会有帮助的。’不过她却把肮脏的鞋子放在我的爐板上。嘿，这就是給你的帮助！”

把脏鞋放在爐板上的人名叫阿列芙琴娜·謝尔盖耶芙娜。

这真是太有意思了。我們坐在花园里，姥姥很威风地叙述着，一时叫人弄不明白她說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兒。我看見彼加极力想把她画下来，我連忙吓唬他，不許他这样作；我也恫吓薩尼亞，因为他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了。只有小彼加認真地听着。

“如果你真是什么秘書，那么干嗎把鞋子擱在我作飯的地方？我永远也不允許这样作。要是我今天生爐子怎么办呢？”

“結果呢？”

“我真的生起爐子来了。”

“結果呢？”

“鞋子烧坏了，”姥姥驕傲地說道。“再不敢放了。”我們忍不住笑成了一团。

总之一句話，女管家損失了一双鞋，这就使尼古拉·安东內奇不得不把姥姥請到他那兒去进行一次严肃的談話。

“我是如此这般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姥姥气呼呼地摹仿着尼古拉·安东內奇吹嘘自己时的神气說道。“哼，如果你真的比別人都强的話，那也不要自己說，讓別人来評論好了。”他把房子指給我看，說道：“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請您挑选吧！”

尼古拉·安东內奇在果戈理大街一幢新住宅里領到一套房子，請我那可怜的姥姥在这套豪华的房子里任意挑选一个房間。他为了選購家具，在莫斯科跑了整整一个月。按照尼古拉·安东內奇的想法，特維尔·雅姆二路上的那所住宅應該作为“塔塔林諾夫船长紀念館”。他这样决定也不害臊，塔塔林諾夫船长連这座住宅的大門都沒有进过啦。

“我对他行了个礼說道：‘多謝您啦。我还没有在別人家里

住过哩。’”

就在这次谈话之后，姥姥产生了摆脱尼古拉·安东内奇，搬到我们这儿来住的念头。可是她怕他怕到了那种地步，甚至就不敢公开地收拾收拾东西就走，而是首先同他和解，甚至还竭力讨好女管家。她制定了一个反映她心里状态的极端复杂的计划，把一切寄托在尼古拉·安东内奇动身去波尔雪沃村科学家休养所的时机。二十年来，她这是第一次离开家，一只手拿着伞，一只手提着帆布旅行包，悄悄地离开了莫斯科。

……萨尼亚向来是六点多钟起床，我们在早饭前先去洗澡。这天早晨也是如此。这个早晨和任何一个礼拜天的早晨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的确是沒有！可是我为什么又記得这么清楚呢？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我和萨尼亚手拉着手，从山坡上跑下去，他一晃一晃地平衡着重心，从一条搭在小河上的白楊树干上輕巧地跨过，我干脆脫掉鞋涉水过去，我感到沙底上有着一道道密密的皺紋。这些旧日的情景为什么記得这么清楚呢？为什么我到現在还能重述我們当时谈话中的每一句話呢？为什么我到現在似乎还能感觉到娇阳斜照在湖上的那种迷迷蒙蒙，梦一般美丽的景色呢？为什么我会怀着那样一种愁腸寸断的柔情回忆这天早晨所发生的种种微不足道的細节呢？当他走出水来，双手抱膝和我并肩坐着时，在他那晒得又紅又黑的脸上，肩膀上，胸膛上的水珠，和我脑后那一綑湿漉漉的头发我都記得非常清楚。为什么我連萨尼亚跟一个翻卷着褲腿，帶了一张自制的魚网的小孩講解怎样用柴火和腐肉捉大虾的細节都記得清清楚楚呢？

因为經過了約摸三四个鐘头之后，所有这一切——我們俩人这次絕妙的游泳，朦朧的湖光，湖水中靜止不动的河岸的倒

影，还有那带鱼网的小孩，以及千百种其它的思想，感情，印象——所有这一切都骤然飞到九霄云外去了，仿佛是从倒过来的望远镜中看去一般，显得渺小，微末和无限的遥远……

3 “可不要忘了，你是相信我的”

等我跑进城时，已经找不到萨尼亚了。不知是因为什么，我在涅瓦大街下了电车，在“美味之家”宽大的橱窗前停下来，看张贴在里面的，最高统帅部出的第一张战报。如果可以把时间停止住的话，我一定要把它停止在这一个时刻上。我紧贴着橱窗站着，一气读完了这张战报，回过头来，便看见了一张张严肃的、紧张的面孔，一种奇怪的感觉突然笼罩了我，仿佛这次读战报的事情是发生在无人知道的新生活里。在这无人知道的神秘的生活里，这天晚上是夏天第一个温暖的晚上，苍白的影子在人行道上走动，太阳还没有落山，可是月儿已经挂在海军部大楼的上空了。在这个生活里最初的几句话是用粗体字满满地写在橱窗上的，接连不断地有人走上前来读这几句话。尽管人们极端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但事情已经发生，丝毫不能改变了。

罗莎莉·纳乌莫芙娜把萨尼亚留的便条交给了我，我隔不一会就从提包里掏出来看一看。这是用他记事本上撕下来的一张淡蓝色的纸匆匆忙忙写成的。

“亲爱的枇拉·波列金，让我拥抱你。可不要忘了，你是相信我的。”

我们住在克里米亚的时候，养了一条狗叫作“枇拉特”^①。我每次浇花的时候，它总是跟在我后面，萨尼亚曾笑着把我们

两个一起称为“枇拉·波列金”……“可不要忘了，你是相信我的”——这是我說过的話。我有一次曾經說過我相信他。他那时的心情非常好，就是这么一回事兒！我們沒有来得及道別。他是十一点鐘走的，等我到达城里时已經找不着他了，他留下的便条也沒有提告別的事，不过这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又回到了別墅，在那兒过了一夜。似乎一分鐘也沒睡着，但終究还是睡着了，因为我突然醒了一次，感到惊惶失措，心里怦怦地跳着：“打仗了。絲毫不能改变了。”

我起身叫醒了保姆。

“阿姨，應該收拾收拾东西。我們明天就走。”

“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保姆气呼呼地打着呵欠說道。

她穿了一件白色的长睡衣，迷里迷糊地坐在床上，嘴里嘟嘟囔囔不停地埋怨，我只管滿屋子里走来走去，沒有理会她說些什么，后来又把窗子打开，外面稀疏的小树林里寂然无声，充滿了宁靜的幸福！

姥姥听見我們談話，把我叫了过去。

“喂，卡佳，你怎么啦？”她严厉地問道。

“姥姥，我們連告別一下都沒来得及！怎么会弄得这样，我們連告別都沒有！”

她瞧着我，吻我，然后偷偷地划了个十字。“沒有告別也好，这是吉祥之兆，意思就是說他很快就要回来的。”她說道。我感覺自己在哭泣，感覺到我今后再也不能，不能，可是究竟不能什么呢，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① 枇拉特原意是海盜。——譯者注。

彼加坐晚車回来了。他的样兒十分疲憊，一脸心事，不过神色很坚定，这是和他往常完全不相象的。

我从他口中第一次听見要把孩子从列宁格勒撤走的消息。我們的別墅是那么美好，我和保姆在這兒栽种了很多花草——紫罗兰和烟草花，花坛上已經出現了初生的嫩苗，而現在却不得不离开这座別墅，我覺得这样的事情未免太不近情理了。整个六月里一直很冷，可是就在这几天开始热起来了。在这样悶热的天气里，把小彼加装在挤得滿滿的、肮脏的車厢里，不仅到列宁格勒，而且还要到別的地方，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去！

彼加說，艺术家协会决定把孩子們送到雅罗斯拉夫去。他已經給小彼加和尼娜·卡比丹諾芙娜登記上了。保姆問題是件比較麻煩的事，只好以后再想办法。

他很快地把东西收拾妥当，跑到外面去叫了一輛运貨馬車，然后又到楼上去找姥姥，因为她声明說，她不願到雅罗斯拉夫去。我不知道他們都談了些什么話，也不知道为什么姥姥对雅罗斯拉夫有那么大的反感。但过了半个鐘头以后，他們走下楼来，彼此的神色都很滿意，而且姥姥当时就动手給口袋縫拉鎖，同时又尖刻地批評了保姆的科学动作。

除我以外，大家都有点兒什么事情可作，就連小彼加也在一本正經地把玩具往三合板作成的兒童提箱里装，使劲想把小滑稽人的头扭下来，因为带着头塞不进箱子里去。

我渾身无力，沒精打采地坐在因搬家而弄得杂乱无章的房間里，一直到最后，等彼加走来关切地对我說道：

“卡佳，亲爱的，清醒清醒吧！”

……我們回到列宁格勒，彼加把我带到艺术家协会，对一个人說我什么事都能作，于是我馬上就被安插下来，搞一些多得沒

有止境的名单，关于这些事情我都不准备詳細叙述了。

命令規定发送兒童时不准媽媽和保姆跟着。因此最主要的事就是和这些媽媽保姆周旋。刚刚把她們的名字从名单上勾掉，可是不一会儿她們又通过某种方式出現在名单上了。

我对这件事处理得大概不够好，一位恶狠狠的小个子女艺术家突然从我手中把名单夺了过去。可以断定，以后大約再不会有一个媽媽，一个保姆能从她那兒得到絲毫寬大处理的。我們的保姆是第一批就被勾掉的。

去雅罗斯拉夫的事情还需要到市苏維埃去設法，就比如要客車而不要貨車的問題，以及其它成千上万的不可預料的事情一样需要設法，因为这几天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是过去从来没有碰到过的。

我們先去市苏維埃，然后又到美术学院院长那兒，求他給市苏維埃打电话。我們接收路上用的和吃的东西，縫制带号碼的袖套。不知怎么搞的，我也成了那种什么事情都得知道，別人有什么事情都来找我的女人了。

開車的日期規定在七月五日，后来又改到六日。就現在看来，当时那种每时每刻都在逼近的，最后終於把这座有四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完全控制了焦急心情，以及收拾行囊的忙乱状态，因为即将和孩子們別离而引起的痛苦，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持續了几天功夫，不免感到有些奇怪。

列車誤点了，孩子們在候車室里站了很久。他們站在一排排的成年人中間，这样作是为了防止他們的父母阻碍上車工作。但整齐的行列早就被打乱了，疲憊不堪如痴如顫的母亲們早已偎在自己的孩子身边了。天气很热，孩子們都要水喝。我們只好劝說他們，要他們忍耐一下。七月的尘土和悶热仿佛也同大

家一起，分担着别离前的苦痛。

人流终于开始移动了。前面是年龄较大的学生，然后是年龄较小的学生，再后就是六、七岁的小孩子。他们手牵手雄赳赳地走着。看到他们这样小就背着背包走路，实在不能不令人伤心落泪！他们是到某个地方去，可是到哪儿去呢？还在家里的时候，我一看见彼加的背包，立刻就感到说不出的难过。每个人都跟在自己孩子的后面，我也尾随着小彼加向前移动，他和一个胖虎虎的，很整洁的小姑娘走成一对。我夹在人群中，和所有的人一样停在入口处旁边——送行的父母不能再往前走了。我也和所有的人一样，为了不致哭出声来，紧咬着嘴唇，目送他离去。然后我又跑到货车站，因为东西送来后需要照料，免得把儿童的行李和大人的搅混在一起。

火车应该在四点钟开出，开车的时间非常准确。彼加直到最后一分钟才跑来——后来我才知道，他和校长到斯莫尔尼宫去了一趟。别人把孩子从窗户里递给他，他抱着孩子，把孩子长满黑发的小脑袋紧贴在自己的脸上，稍微站了一会儿。姥姥看到这一场面，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见姥姥很激动，便匆匆地吻了吻孩子，连忙送进车厢去了……

一直到今天，每当我回想起孩子们离开时的场面，心里就特别激动，甚至无力把当时的情景完满地叙述出来。在战争年代里遭受的苦难似乎够多的了。那些怪异的，异常强烈的印象使人往往心碎胆裂，永远也不能忘怀，可是在我的心里，这几次送别孩子的场面却是单独属于一类的，比其它的痛苦更为突出……

4 “我們一定能見面，但不会很快”

虽然艺术珍品收藏所的人說，列車已經平安到达雅罗斯拉夫，很多人带着鮮花来欢迎孩子，可是我很久也沒收到姥姥的电报。同时，他們还要由雅罗斯拉夫到一个叫什么脓谷村的地方去。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孩子們在一个村名这般令人憎恶的地方不可能过得很好。我收到了琪尔加一封极为悲观失望的信，她带着孩子和媽媽也疏散到什么地方去了。瓦里亚仍旧留在莫斯科，这是他們第一次分离。使我惊奇的是她居然对那很可能落到西夫切夫·符拉什克的法西斯的炸弹都不怕，反而怕一个叫任卡·柯尔巴克察的姑娘，因为她向瓦里亚卖弄风情。可怜的琪尔加是哭着写这封信的，因为信紙都湿透了。我从心眼兒里可怜她，虽然事情很明显，战争使她变糊塗了。

最令人忧虑不安的是关于薩尼亚的情形和一些使我苦恼的梦。我梦见自己在对他生气，为了什么呢？他脸色蒼白，疲倦不堪的样子，攢着眉头听着……

罗莎莉·納烏莫芙娜在从前的“爱里特”电影院的办公室里設了一个医疗站。因为罗莎莉·納烏莫芙娜說我“护理病人有丰富的經驗”，所以区苏維埃的防卫三人小組就建議我去当护士。

“塔塔林諾娃-格利高里耶娃同志，你要知道，”防卫三人小組的委員，一位头发斑白，心地善良的医生秘密地对我說道，“假如你不答应的话，我們就立刻派你去修建工事……”

修建工事，或者象列宁格勒的人所說的那样，在“战壕”里工作自然比作护士要艰苦得多，但我还是謝过他的好意，拒絕了当

护士。

我們傍晚出发，整夜都在中罗加特卡挖反坦克壕。这兒的土地是粘土，非常坚硬，先要用鹤嘴镐头刨松，然后才能使用铁锹。我被分配在列宁格勒一家出版社的工作队里，正如周围的人们开玩笑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替“希特勒掘坟墓”的高级工作队。这个工作队几乎全部是妇女：女打字员，女校对员，女编辑。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她们很多人的衣着都非常讲究。我问一位皮肤黑黑的，长得相当漂亮的女编辑，为什么穿着这么华丽的连衣裙来挖战壕。她笑了笑说道，因为她们“实在没有别的衣服”。这些人的生活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是戏剧，文学和艺术世界的人；这个圈子里的人一向使我感到兴趣。但是现在，当这些漂漂亮亮的女知识分子手里拿起镐头，用力在刨那坚若磐石的深褐色泥土的时候，纵使谈话偶尔涉及艺术工作方面的事情，诸如最近的新戏罗，艺术家尔同志不该搞“席尔瓦”^①的舞台设计，但她们此时也没有闲情逸致来大谈其艺术了，因为在所有的事物后面，都摆着一场折磨人的，避不了忘不掉的战争。

我和黑黑的女编辑分在一组，她说她的丈夫和两个兄弟昨天上前线去了。她特别担心她的弟弟，因为他的身体很弱，完全是个孩子，她的丈夫也极力劝阻过他，可是怎么说也不行。我把萨尼亚的情形对她讲了。我们默不作声地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们把抬架放在战壕深处的地上，另外的姑娘就把土倒在抬架上，我们再把抬架抬起来，倒在战壕的陡坡上。我没有对她说从开战的第一天就没有得到萨尼亚的消息。昨天，我给一位和他同

① 匈牙利作家伊·卡尔曼(1882—)的一部驰名的小歌剧，一九一六年开始上演。——译者注。

在一个大队的飞行员的母亲打了一次电话，她说她收到一封从里宾斯克寄来的信。或者萨尼亚也在里宾斯克吧？那兒也許正在組織飞行部队。不过，如果这个根据是对的，那在苏联境内我也可以举出另一个城市的名字来。我没有权利知道他究竟在什么地方以及他的情况怎样。假如他牺牲了，我也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时候，是怎样牺牲的。也许那个时候我正在看戏，或者是什么感觉也没有地正在睡觉，或者是在和别人谈笑，——就象现在队长建議我們要机械地工作，也就是說心里想着別的事情工作时，我和黑黑的女編輯互相看了一眼，都放声笑了起来。这个建議真是妙极了——我們應該想点什么事情。

黑夜不知不觉地破裂了。在天与地之間那靜止不动的，朦朧而稀微的鉛灰色晨光中，突然透露出了早晨清新的气息，那掠过原野，拂动着隐蔽高射炮的矮树丛的清风也好象与昨夜不同，飘散着黎明的味兒。在远方城市的上空，順馴得象一条条大魚般的銀白色障碍气球升起来，又隱沒在尚未露面的太阳的霞光中去了。

等干到天亮时，大家都累得脸色发白，一个姑娘甚至累病了，但我們这个工作队还是比其它的队搶先結束“課程”。我想要喝水，我的新朋友就引我去排队买克瓦斯^①。卖克瓦斯的帐篷搭在一座荒蕪已久的老教堂旁边，我們已經排好队了，可是女編輯忽然建議我爬到鐘楼上去。

这是一件傻事，我已經累得腰酸背痛，总之是非常疲乏了，但我竟突然答应了。

我順着插在地里，上面張貼着牆报的抬架找到了我們的工

① 克瓦斯是用面包发酵作成的一种清凉飲料。——譯者注。

段，一群新人正朝这兒走来。难道我們才干了这样一点点嗎？这个工段联着那个工段，那个工段又联着第三个工段，远得一眼望不到头。妇女們在深达三公尺的战壕里挖土。战壕的一边陡直，一边是斜坡。有的人用铁鍬往外揚土，有的用小車把土推走……如果一个月以前，有人对她們說她将要抛掉家庭，扔下工作，夜里跑到城外，跑到曠野来挖土，修壕沟，棱堡，塹壕，恐怕她們沒有一个人不从心底里感到好笑的。可是現在她們的确来了，并且眼看着这一条一条圍繞着整个城市，仅仅在路軌交叉的地方才中断的大沟几乎就要完工了。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描述自己在看到这可哀的田野时的心情。田野被許多巨大的半圓形分割得支离破碎，列宁格勒的太阳黯淡地，懶洋洋地照在上面。我好像是面临着一場无法迴避的暴风雨感到非常恐怖，但同时也有一种勇敢，年輕而乐观的感情在我的心里苏醒了。

中午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就碰見了罗莎莉·納烏莫芙娜。她非常兴奋地說刚才在涅瓦大街上看見一个特务被抓住了。

“一个胖胖的家伙，留着两撇小鬍子，真是标准的特务象！呸！”她憎恶地吐了一口唾沫。“幸亏貝尔塔沒和我在一起！要不然她会吓疯了的！”

貝尔塔是个很胆小的妇人。

我們停在二楼楼梯間，罗莎莉·納烏莫芙娜开始形容这件事情发生的經過。这时从楼梯上走下来一位軍人，高統馬靴喀登喀登地大声响着，他还没有走到我們跟前，便探身到楼梯外面往下看了看，我認出了他是卢利。

卢利是领航員，是薩尼亚的朋友，他們曾經在北方同过事，后来便分开了。薩尼亚無論在哪兒工作，总是說他沒有卢利不

行。“舒尔卡到这兒来就好了！”他从西班牙給我的信中这样說过。卢利經常到我們家里来，他是一个快乐的、喜欢吹嘘的人，留着鬍子，使得他很象一个外国人。

“卡杰琳娜·伊万諾芙娜！”他很精神地对我行了个举手礼。“我敲了半天門，又按电鈴，最后实在是絕望了，才把信扔到信箱里去了。”

“薩尼亚的嗎？”

“正是。”

卢利对罗莎莉·納烏莫芙娜也同样很精神地行了个举手礼。

他說很抱歉，他只有十五分鐘的时间。我当他面沒有閱讀薩尼亚的信，只是瞥了一眼，很自然地看到了最后的一句話：“我們一定能見面，但不会很快。”

“您是从哪兒来的？您参軍了嗎？是在列宁格勒？薩尼亚在哪兒？”

卢利参了軍，是在列宁格勒。回答这两个問題对他說来并不困难。但我还在一个劲兒地追問：

“薩尼亚在哪兒？”

他沉思了一会兒，含糊其詞地回答道：

“在团里。”

“您是不願意說，对吧？那么他身体好嗎？”

“再好沒有了，”卢利笑着說道。

尽管卢利一再重复，甚至以自己的人格发誓，他只有十五分鐘的时间，可是罗莎莉·納烏莫芙娜还是跑去煮咖啡了。这时就剩下我們两个人，我終于从他口中套出了一点消息。原来在某一个地方，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正在組織一个特种任务航

空团，空勤人员主要是飞行了一千五到两千小时的民航飞行员，他们现在正在进行新机种的改装学习。

当我听到“特种任务航空团”这几个字时，心里立刻产生了一种冰冷的感觉。但我并没有继续追问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反正卢利也不会答复的。我只问了问，萨尼亚的改装学习是不是要进行很久。卢利又沉思了一会儿，回答说不会很久。他对所有的问题都是先沉默、考虑一会儿才回答，在他那若无其事的声调中隐含着一丝忧虑。

我给萨尼亚写了几句回话，卢利刚往外走，在门口正好碰见罗莎莉·纳乌莫芙娜，他只好答应“如果可能的话”，下次再来。我们在敞着的门边又站了几分钟，分别的时候我们突然拥抱在一起，热烈地接吻……

萨尼亚这封信写得很忧伤，然而只有我一人才能看出它写得很忧伤。

萨尼亚问到大小彼加，劝我们立即把孩子从列宁格勒送走。

“到恩斯克老人家那儿去多么好啊！”他说到这里，又替法官和达莎阿姨担起心来。从一句很谨慎的话里可以了解到，虽然恩斯克距前线还很远，可是已经遭到轰炸了。总之萨尼亚知道一些风声，知道情况不好，所以才说“我们一定能见面，但不会很快”。

是的，不会很快。艰苦的日子已经来到了。我在屋子里来回徘徊，当我朝窗户走时，镶木地板的一半小方格呈阴暗色，转回来时，另一半又变成了阴暗部份，我竭力只踩在阴暗的小方格上走。

特种任务团——“这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可怕的呢”。这话是自己心里说的。可是当我重把这句话大声说出来时，心里又

感到不是滋味。“他去西班牙那一次最后不是也回来了嗎。不过我應該多写些信，告訴他說我永远相信他”。

这时我才感到自己已經累得支持不住了。我躺下来閉上眼睛，立刻一切都動蕩起来：姑娘們抬着盛滿了沉甸甸的，坚硬的泥土的抬架；小推車慢慢地順着木板滾动；太阳光在深褐色的窗框上閃耀。

后来不知从什么地方照来了一片柔和的，繼白夜之后緩緩来临的亮光，所有的东西便都逐漸发白，隱退了，这时我感到自己正在打瞌睡。一切都好，都很好，就只是不願意听見隔壁凄慘的，經久不絕的呻吟声，或者歌声……

“卡佳，警报！”

罗莎莉·納烏莫芙娜搖撼着我的肩膀。

“快起来，发警报了！”

……六月末，我在涅瓦大街遇見了瓦丽亞·特洛菲莫娃，她的丈夫是和薩尼亞在“特种航空兵”一起服务的飛行員，是一位苏联英雄。我曾經和这位瓦丽亞一起到薩拉托夫去探望过我們的丈夫。記得那个时候，我听說她是个牙科医生还感到非常惊奇。

她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坚强的女人，她的脸色紅潤，步履坚定。她有些地方，特别是当她高声大笑，露出两排細长的美丽的牙齿时，不禁使我想起琪尔加来。

“我的格利沙呀，”她叹了一口气，說道。“在轟炸柏林了！看到報紙了嗎？”

我們談了好久，她建議我到軍医学院的口腔医院去工作。

我开始考虑起来，瓦丽亞連忙說：“首先應該看看这是一件

什么工作”，要不然就要象她过去介绍的一位太太那样，“工作了两天就走了，你看，她不喜欢那种气味。”

瓦丽亚对于“太太之流”很厌恶；还是那次去薩拉托夫同路的时候起，我就记得她的这个特点了。

这种气味确实令人难以忍受，我刚一走进两边是病房的走廊时，马上就感觉到了。这种气味使我立刻就想呕吐，当瓦丽亚介绍我同其它的护士，X光医生，主任医生的夫人以及其它什么人认识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想要呕吐。

这儿躺着一些面部受伤的人。我刚一到，就送来了一名面部被地雷炸坏了的青年……

担任这件工作后的头两三天，我就理解到在护理这些人的时候，需要不断地增加他们的信心，告诉他们不要紧，即使留下伤疤的话，那也不是什么倒霉的事，只要忍耐一个时期，疤痕就看不大出来了。后来我在战地外科医院工作过，那儿这种秘密是不存在的，但是每一句话里都透露出怕残废的心理。人们第一次看到自己毁容后的面貌时感到恐怖，临出院前长时间地兀立在镜子前，无可如何地修饰自己，美化自己……

不过有时候，我们用“以后一点也看不出来”的话来安慰伤员，我们这并不是昧着良心说的。我过去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可以作一个假鼻子，或者往脸上移植皮肤。有些伤员扎着草草捆上的绷带被送来的时候，样儿真是可怕极了，可是经过两三个月之后，在他回到原部队时，先前那些似乎是要使他这一辈子遭到毁容痛苦的剧伤，却也不大看得出来了。

我在口腔医院工作，特别是开始一段时期是很困难的。不过正因为困难，需要对每一个字都特别注意，即使你心中感到非常沉重的时候，也要保持沉着，所以我也感到很快乐。

彼加的部队驻扎在大学河岸街。他在送走孩子后，便立刻报名参加了民兵队。一有空的时候，我就跑去看他。我们或是坐在靠胸墙边的木材堆上，或是从语言学院踉跄到狮身人面象的地方。其它的纪念物都已运走，或者用沙袋埋起来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狮身人面象却仍然和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以前，和那久远的和平时期完全一样地躺在那儿。它们躺在涅瓦河畔，茫然凝视着这无味的，人世间的纷纭。它们大睁着眼睛，伸着唯我独尊的脚爪。彼加看着狮身人面象时，脸色顿时变得柔和起来，象是在想心思似的。

“能塑出这样一只脚爪，死也无憾了，”他有一次对我说道，接着就滔滔不绝，很有兴趣地对我叙述，为什么说这是一只了不起的脚爪。

我和罗莎莉·纳乌莫芙娜把他所有的内衣都缝补好了，可是他一件也没有要，他在营里领的衣服还要次得多。总之，他是在努力争取早日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

5 兄 弟

我昨天晚上到他那儿去的时候，他什么也没有讲，显然命令是在夜间收到的。我这时正在值班。罗莎莉·纳乌莫芙娜把我叫了出去说道，彼加往家里打了电话，要我去一趟，如果能行的话，立刻就去，不过无论如何也要在中午以前去。我的值班时间要到中午才结束，不过我请准了假，由瓦丽亚·特洛菲莫娃代替我。还不到十点钟，我就到了语言学院。一位和彼加同营的熟识的战士在窗口里晃了一下，我连忙喊了他一声。

“您找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嗎？我們馬上就想辦法……”

彼加急急忙忙地从屋子里走出来，我們互相問了好，便沿着河岸街向獅身人面象走去。

“卡佳，我們就要開拔啦，”他說道。“我感到很高興。”

他沉默了一會兒，樣子很激動。

“誰也沒想到。我們最近幾天本來要出發作一次行軍練習。不過，看樣子情況變化了。”

我點了點頭。近來從盧加附近不斷送來傷員，因此不難猜出，情況發生了變化。

“我的信都寫好了，”他繼續說道，一面掏着袋子。“我想請您……這封不要發。”

他取出一個未封口的，沒有署名的信封遞給了我。

“這是給小彼加的。請您把這封信交給他，假如我……”

他想說“犧牲”了，嘴唇甚至都作出了說這話的動作，可是突然又孩子氣地微微一笑說：

“當然羅，不是現在給他，而是要過上十來年以後。”

“要是薩尼亞，他決不會寫這種信。”

“他沒有兒子啊。”

我臉上的肌肉可能微微抖動了一下，所以他吓了一跳，以為自己的話刺痛了我……我們停下腳步，他緊緊地握着我的手。

“薩尼亞怎樣了？他在哪兒？”

“不知道。”

“我往軍郵站給他去過信，但是沒有收到回信。反正他生活得挺好，不會出什麼事情的。”

“為什麼？”

他沉默了一會兒。

“我相信不会出什么事情的。您还记得他说过：‘天不負我，不过，在地面我可不敢担保。’”

薩尼亚的确说过这话。但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而现在在战争期间，这种话听来是多么空洞。

“这封是给父亲的。”彼加从袋子里掏出了第二封信来。“假如他还活着的话。您看，全是这类的信，实在是没法从邮局寄的，”他很感伤地说道。“我已经交涉好了，我的作品将来收藏到俄罗斯博物馆里去。”

我着急地拍了一下手。

“不，这只是说，”彼加急忙解释说，“可能会被打死，每个人都应该作这样的打算。柯斯托奇金也是这样作的，还有李佛希茨，納扎洛夫。”

这些人都是艺术家。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但不一定就发生在我身上，天晓得，”他不耐烦地说道。“或者您以为敌人只是轰炸莫斯科，对于列宁格勒就连碰都不碰一下吗？”

我并没有这样想过。但他把自己所有的事情作了这样的安排，就仿佛从心里压根儿就不希望回来了似的。

“咱们还以为自己是一回事，而战争又是另一回事，”他沉思地说道。“但我们是兵士，兵士也就是战争。”

最后他又要把手表塞给我，这一来可真把我惹恼了。我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骂得他笑了，又把表收了回去。

“你真是个怪人，我已经领了一块新罗盘表啦，”他说道。“噢，卡佳，你知道吗？我现在是堂堂少尉军官，您可不要乱开玩笑呀！”

他参军总共才一个月，我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取得少尉军

銜的。不过据他說，他在学院时受过短期訓練，是預备役指揮軍官。

我們走到獅身人面象前面，象往常一样，在不知为什么拆去了胸墙，还有一块毀坏了的栏杆悬在半腰里晃蕩着的地方停下来，彼加叹了口气，注意地看着獅身人面象。他是在告別嗎？他的身材本来就很高，这时他昂着头站着，眼睛呆呆地傲然微閉，从他这瘦削的側影上看来頗有一种山鷹的軒昂气概。过了很久以后，他的营长有一次对我說，他“对于死是毫不在乎的”。說来也未免奇怪，但正就是在獅身人面象前和彼加分別的这一天，我感覺到了这种驕傲和这种对死的鄙視。

虽然他知道我向来就把小彼加看成是亲生的兒子，不过这时似乎还應該来把这个问题对他再說一遍。在別离的时候，一定要把心里話全部傾吐出来，現在我也該学一学这些事情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对他說，等我回到家里以后，便立刻对此事懊悔起来。

他又拉住我的手，吻了吻。我們紧紧地拥抱着，他低声叫了一声：

“妹妹……”

我送他到語言学院門前。虽然經過了一个不眠之夜已經感到很疲倦了，可是我仍然徒步走到彼得格勒大街。

那天天气很热，罗斯特拉尔圓柱大厅旁新舖的柏油路面也溶化了，脚一踩下去便留下脚印。从比尔热桥畔停泊的貨船上漂来陣陣清淡的松香气味。雄伟浩蕩的涅瓦河不是在流，而是在凱歌前进，正是在河身那最美丽的地方，分成了两条同样雄伟，同样浩蕩的涅瓦河。想起来也真是奇怪，真是荒唐，就在距离这兒几百公里的地方，居然有一些德国士兵，滿身臭汗，用一

股野兽般的猛劲向着我們的高楼大厦，向着涅瓦河上充滿了节日气息的夏天的絢烂光彩，向着比尔热桥和宮桥間新修的，綠意葱蘢的街心花园拚命地冲杀。

但暫時周围还是沉寂，平靜的，一群孩子在街心花园里嬉戏，看門老头兒手里拿着一根鉄条在小径上走着，不时停下脚步用鉄条把碎紙片撿起来。

6 現在我們平等了

每次和薩尼亚会面的日期我都記得。現在也和过去一样，我似乎永远都記得收到他来信的日子。假如不算那封他把我称作“枇拉·波列金”的短笺的話，他的第二封信我是八月十日收到的。繼后很长一段時間內，这一天都常来入梦，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尽是一些最恼人的梦，我甚至因此对自己生起气来，仿佛为了作梦也可以生气似的。

我沒有在医院里住，是在家里住宿的，因为家里沒有人，所以我一早便去找罗莎莉·納烏莫芙娜。我在院子里找到了她，这时有三个男孩站在她面前，她正在教他們如何調顏料。

“太稠和太稀都不好，”她說道。“板子在哪兒？瓦洛布約夫別搔痒。在板子上試試看。不要一齐动手。”

由于惯性的关系，她对我也用这种一本正經的腔調說道：

“頂楼和建筑物上部的木料部份塗上顏料是一种防火办法。这是耐火原料。我在教孩子們怎样塗顏料。”

“罗莎莉·納烏莫芙娜，”我畏縮地問道，“您現在不馬上回家嗎？等会兒有人要給我打電話来。”

我在等俄罗斯博物館的電話。彼加的作品早就包裝好了，但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還不派人來取。

“再過一個鐘頭。我先帶孩子們到頂樓上去，給他們分配工作，然後我就有空了。卡佳，你看我這是怎麼搞的！”她把手一掰，急忙說道。“有您的信，一封信！我手上都是顏料，您自己掏吧！”

我伸手到她衣服口袋里掏出了薩尼亞的來信……

同往常一樣，我先草草地把信看一遍，好盡快一點兒了解薩尼亞出了什麼事情沒有，然後再慢慢地，一個字一個字地精讀一遍。

“你還記得格利沙·特洛菲莫夫嗎？”他在信末尾告別時寫道。“我們曾經一起在湖上播過巴黎青。我們昨天把他埋葬了。”

我到薩拉托夫不久之後，格利沙·特洛菲莫夫就離開了，所以我不太記得他的樣子，更不知道他現在和薩尼亞在一個團里服務。但是瓦麗亞，不幸的瓦麗亞的形象立刻浮現在我的眼前，我手里的信不知不覺地滑下來，信紙飛散到了地上。

……該去醫院了，但不知為什麼我却拖着步子回到家里，完全忘記自己已經把房門的鑰匙交給羅莎莉·納烏莫芙娜了。我在樓梯上碰見了“科學保姆”，她馬上就向我訴起苦來，說她怎麼也找不到工作。因為“糧食不夠”，誰也不肯收用她，又說某一個女傭人到造林托拉斯工作去了，可是她現在已經干不了這樣的工作等等。我一面聽着她講，一面心里在想：“瓦麗亞，可怜的瓦麗亞。”

我到了醫院，在走進“口腔醫院”以前，因為可能在這兒碰見她，所以我又把信重讀了一遍。我忽然想起薩尼亞過去從來也沒有寫過這樣的信給我。記得有一次在克里米亞，他回來的時候，

脸色苍白，样子显得很疲乏，他說，他的后脑壳因为灼热整天都感到胀痛。第二天，领航員的妻子告訴我說，他們的飞机在空中着火了，他們就是駕駛着这架着火的飞机，上面还带着炸弹着陆的。我連忙跑去問薩尼亚，他笑着对我說道：

“你这是在作梦。”

薩尼亚一向爱护我，有意識地不讓我分担他职业生活中的一切惊险。現在他突然这样詳尽地描写了他的同志牺牲的情形，他甚至把特洛菲莫夫的坟墓也描繪了一番。薩尼亚居然描写起坟墓来了！

“我們把未爆炸的炮弹放在中央，然后放上較大的，象一朵朵花似的安定翼片，安定翼片愈往中間愈小，这样就构成了一座仿佛是长滿了鉄花的花坛了。”

我不知道这种想法是否太复杂，伊万·巴甫雷奇曾經說过，我把薩尼亚看得太复杂了，这不是沒有道理的。这封信里虽然沒有明說，但我讀信后就理解了他的意思是說“我們現在平等了，你要准备迎接一切，我以后什么事也不瞞着你了”。

挂白罩衫的柜櫥放在“口腔医院”，我急急忙忙穿上白罩衫，走到空場子上去，因为医院还隔着一块空地。我还没有走到自己的病房，便听到瓦丽亚的声音。

“如果病人还不会的話，那就應該自己动手作，”她气忿忿地說道。

她正在申斥一个护士，因为她沒有用双氧水替病人嗽口。她說話的声音还是和昨天，和前天一般平常和坚决。她仍然是那么刚强，具有几分男子气概。她一面吩咐着什么事情，一面往外走。我瞥了她一眼，她仍旧是原来的那个瓦丽亚！她什么也不知道。对于她說来，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发生！

我應該把她丈夫犧牲的消息告訴她嗎？還是什麼話也不要說，等那不幸的日子降臨，“死亡通知書”就象給千千万万个俄羅斯婦女的那樣，送到她的手里，說他“為了祖國在戰鬥中犧牲”。起初她也許還不明白，感情上不能接受，可是隨後就會象一只失掉自由的小鳥，心兒怦怦地跳起來——跑也跑不了，藏也藏不掉。只好把你的痛苦承擔下來吧！

我從瓦麗亞的辦公室旁走過，連眼也不敢抬，仿佛我對她犯了錯誤似的。究竟犯了什麼錯誤呢？我自己也不知道。

這一天過得很慢，傷員源源不斷地送來，最後連床位都沒有了，護士長只好派我去請示主任醫師，是否可以在走廊里放幾個床位。

我敲了敲辦公室的門，先是輕輕地敲，以後又重一點兒敲。沒有人回答。我把門推開了一點，一眼便看見了瓦麗亞。

主任醫師不在，她大概也是在等他。她微拱着背站在窗前，重重地單調乏味地用手指彈掉窗上的碎玻璃片。她沒有轉過身來，沒有聽見我走進去，也沒有看見我站在門口上。她小心地順着窗台邁了一步，把頭在牆上狠狠地撞了几下。

我還是第一次看見人用頭去撞牆壁。她不是用前額去撞，而是用兩邊撞，大概為的是能更痛一些。她沒有哭，臉上的表情呆呆的好象是在作一件什麼正經事似的。她的頭髮抖動着，突然兩臂一張，把臉貼在牆壁上……

她已經知道了。在這令人操心勞累的一天中，由於門診的人手不夠，許多不十分緊急的手術都不得不往後延遲了，由於沒有地方安置病人，大家都感到十分焦急，而她一個人却象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似的工作着。她在一號病房教一個舌頭外吊的不幸的青年說話。這時她已經知道了。因為土豆沒削干淨，因為管子

堵塞了，她用煩躁的口吻把炊事員申斥了好久。這時她已經知道了；各個病房里都可以聽到她那氣忿忿的充滿了自信的聲音，可是在這世界上卻沒誰，沒有一個人能猜到她已经知道的是什麼事。

7 “叶卡杰琳娜·伊万諾芙娜· 塔塔林諾娃-格利高里耶娃”

我在醫院住宿的次數越來越多了，後來一住就是兩三天，最後只有在羅莎莉·納烏莫芙娜找我時，我才回家一趟。

“卡佳不在，我覺得有點怪煩悶的，”她說道。

“煩悶”，這話的意思就是說她又不知道該怎樣對付貝爾塔了。因為她變得愈來愈膽小，愈加不愛說話了。她每天都不上班，整天躺在沙發上，而且最主要的是她幾乎完全絕食了。

她的情況很不好，所以我就勸羅莎莉·納烏莫芙娜立刻帶她離開列寧格勒。可是，羅莎莉·納烏莫芙娜既不放心想讓她一個人走，也不願意听要她自己去送她的話。

……屋子里充滿寂靜和空虛。太陽穿過了半掩的百葉窗的窗孔，一條一條細長的光綫照射在家具上和地板上。我挨着貝爾塔坐下，開始沉思起來，後來好象是從夢中，從一些令人厭煩苦惱的思想中清醒過來，它們仿佛是要把我帶出這間屋子。屋子里擺着帶布套的家具，坐着一個穿潔淨睡衣的瘦小的老太婆，她正以孩子般專心一意的神情剪裁紙餐巾，這是她近來喜歡作的一件事。

“你这么干下去，非神經失常不可……”

大概是我失口把這句話說出声來了，貝爾塔立刻放下了她

的餐巾，呆呆地看了看我。

“卡佳，有人在等您，”她停了一会兒說道。

“誰呀？”

“我不知道。”

我連忙跑回自己的房間里去。一个完全陌生的老人双手交叉着放在肚子上，在我的房間里睡着了。

我躡着脚，又回到貝尔塔屋子里問她道：

“他說他認識我嗎？”

“是罗莎和他談的。怎么啦？”

“没有什么，不过我生来还是第一次看見这个人。”

“您这是說什麼？”貝尔塔惊怖地問道。“他說是朋友！”

我劝她放心。不过我的确是沒有这样一位高个子，大胡子，吊着夹鼻眼鏡繩的可敬的朋友。我感到好笑。居然有这样的事兒！他的軍服和防毒面罩搭在椅背上，这人是一个海軍。

他終於醒了。悠长地打了一个呵欠坐了起来，象所有近視的人一样，周围乱摸了一会兒，大概是找他的夹鼻眼鏡。我咳嗽了一声，他立刻跳了起来。

“卡杰琳娜·依万諾芙娜嗎？”

“是的。”

“总之，卡佳，”他慈祥地說道，“真是莫名其妙，我一来就睡着了。”

我睜大了眼睛望着他。

“当然，您很难認得我。可是我和您的薩尼亚却是老相識了……天哪，有多少年啦？”

他默默地計算着。

“二十五年了。我的天哪！不多不少，整二十五年。”

“您是伊万·伊万内奇嗎？”

“正是我。”

他是伊万·伊万内奇医生。我听薩尼亚講他不下一千次了。他教会了薩尼亚說話，我甚至还記得最初的那几个可笑的詞：“阿布拉木，母鷄，箱子”。他和薩尼亚一起坐飞机到过万龙坎，途中碰上了暴风雪，整整刮了三天三夜，他們除了坐以待毙之外，什么办法也沒有，若不是医生那惊人的毅力，恐怕事情就糟糕了！我总觉得薩尼亚談到他的时候甚至象一个小孩子似的那么兴奋，象講神話似的。他确是很象阿依波里特医生，生着一张紅潤的，滿布着皺紋的脸，一个昂然架着夹鼻眼鏡的肥大的鼻子，一双大手令人发笑地揮动着，他在說話的时候，总是就好象要把什么东西朝你脸上抛过来似的。

“我还在絞尽脑汁想，这到底是哪位朋友呢！医生，您究竟是从哪兒来的？您不是在很远的地方嗎？”

“不，并不远。在緯度六十九度。”

“您是海軍嗎？”

“我是一个紅海軍，长得年輕又漂亮^①，”医生說道。“我現在就講給您听。先来一杯茶吧！”

不知道为什么，他把胡子貼着我的脸吻了一下。我跑去煮上了茶，然后回来对他說，薩尼亚直到現在还带着医生遺忘在恩斯克，一个荒凉而偏僻的乡村中，一座被积雪埋沒了的小屋里的听診器。

他笑了一笑。几分鐘以后，我們便坐在一块兒談起話来了，就好象我們已經認識了一千年。事实也确实是这样，虽然沒有

① 这是苏联海軍中流传很广的一首歌中的第一句。——譯者注。

一千年，但畢竟也很久了，從我第一次聽到薩尼亞談到他之后就相識了。

醫生到艦隊服務還是不久以前的事，是在戰爭爆發以後。這是醫生自己請求的，儘管涅涅茨民族自治區不同意，由一位姓列德可夫的人同他談了整一個晚上，勸他留下來，但他還是堅持自己的意見。他的兒子沃洛嘉在列寧格勒前綫的軍隊里服役，醫生也認為應該去打仗，而不應蹲在離前方十萬八千里的地方。後來他被派到北極城潛艇部隊工作。北極城不是北地城。這是在科拉海岬，距北地城兩千公里的一個小城市。北極城那兒的海空軍飛行員對他說，薩尼亞在遠程航空兵中服務，常去肯尼斯柏格，並且聽說，遠程航空兵的一個團就要調到北方來。

“怎麼去肯尼斯柏格？我一點兒也不知道。”

“你瞧！”醫生生氣說。“親愛的，要是您都不知道，那還有誰能知道呢？”

“從哪兒知道啊？薩尼亞寫信又不告訴我這些事。”

“就假定是這樣吧，”醫生同意道。“反正應該知道，應該知道。”

我拿了茶來，他一口氣喝了一杯，說道：“不錯。”

“現在前綫很苦，”他說道。“我見到沃洛嘉，他也說很苦。就在此兒，在列寧格勒近郊。對不起，我還給您捎來了一封信呢！”

“誰來的？”

“一個老朋友，”醫生神秘地說道，一面到處找他的防毒面罩，其實防毒面罩就挂在他眼前；顯然這封信是放在防毒面罩里的。——他和沃洛嘉在一個部隊里。就是他告訴我的，說您在列寧格勒。臨走時他托我帶一封信給您。

信封上寫着：“叶卡杰琳娜·伊万諾芙娜·塔塔林諾娃一格

利高里耶娃收”，和詳細的地址。为防医生在家里找不到我，上面还写着医院的地址，笔迹清晰，尖細，說是不熟悉吧，似乎又还是熟悉的。我惊异地看着信封。这封信是羅馬紹夫写来的。

“喂，怎么样？”医生郑重其事地問道。“認出来了嗎？”

“認出来了。”我把信扔在桌上。“您認識他嗎？”

“我們在沃洛嘉那兒認識的。这人挺好。干行政經濟方面的工作，沃洛嘉还說，若是沒有他就会象沒有了手一样。很和藹的一个人。可惜离开了。”

我喃喃說了几句話。

“是的，很和藹，”医生繼續說道。“不錯，爱喝点酒，可是誰不喝酒呢？”

“真有意思，他是从哪兒知道我在列宁格勒的呢？”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沒到您这兒来过？”

我沒有作声。

“唔，”医生从眼鏡上面瞧了瞧我，說道。“我以为他是您的朋友，他把您的一生經歷，特別是最近几年的情况都对我講了，关于这些我是知道得很少的。”

“医生，这是个非常可怕的人。”

“哦，是这样啊！”

“总而言之，見他的鬼去吧。还要茶嗎？”

医生又喝了一杯，仍然是一飲而尽，然后取出帶可可的巧克力糖来招待我。

“真奇怪，”他沉思地說道。“怎么，你不准备讀这封信嗎？”

“不，我要讀。”

我拆开信封。“卡佳，請您立刻离开列宁格勒，”信写得很潦

草，很仓促。“我恳求您。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我不便把我知道的都告诉您。愿我的爱情保佑您，亲爱的卡佳！您看，我都说些什么话。要不是因为您孤孤单单一个人留在列宁格勒把我急得发疯了，难道我敢说这样的话吗？到吉赫文可以乘汽车，但如果火车还通行的话，最好还是坐火车。我的主啊！我不知道，不知道是否还能见到您，我的亲爱的，我的幸福和生命……”

8 这是医生的成绩

我们每天傍晚都在彼得格勒街聚会。有一次我邀请了瓦丽亚·特罗菲莫娃来，她这次同医生第一次谈到她的丈夫。他很简单地问了几句话，她一一回答了；当时就可以看出谈谈她丈夫对于她说来是多么重大的事，要想掩盖自己的痛苦是多么困难。第二天她把他的来信和相片都捎来了，我们回忆起薩拉托夫之行禁不住落下泪来，仿佛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们还是不大懂事的姑娘哩！当我送她回去的时候，她的眼色悒郁而沉静，她已经感到稍微宽心了一点儿。

这是医生的成绩。

他住在我們家里的这个星期中，列宁格勒前线情况恶化了，德寇开来许多生力军，从早晨起就要躲警报。我睡眠很不好，总是为薩尼亚担心。有一次，我刚刚躺下还没有脱衣服，医生敲了敲门进来了，在黑暗中他把一个小狗熊塞到我的手里。

“这是潘柯夫的作品，”他说道。“潘柯夫是涅茨茨一位出色的手艺人。留下作纪念吧。这个小白熊是我伊万·伊万内奇医

生送给您的，它会告诉您，萨尼亚能回来的。”

当然，这是无稽之谈。可是现在，当我心里忧郁的时候，我便从提包里取出这个小狗熊来。说实话，我看到它就感到高兴了些。

医生每天早晨都要唱歌，或者哼几句幽默的诗歌，这大概是他自己的创作，然后长时间地在浴室里盥洗。他说德寇的空袭和他的洗澡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他只要一跨进澡盆，警报就响起来了。这样的事发生了好几次。他来吃早饭的时候，他那看了叫人很起好感的胡子，往往还是湿漉漉的。他第一件事就是把椅子抛给我，我必须抓住椅子腿给他扔回去。他有一些令人高兴的怪脾气。他喜欢使人惊讶。

医生住在我家里的这一个星期真是好极了！这仿佛是在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中突然听到了安详的人语声。

但分别的日子终于来临了。他收拾好了自己的提包，把在列宁格勒买的书都捆扎了起来。

我去送他……

涅瓦大街上似乎从来还没有过这样多的人。妇女们推着满载包袱、箱子、洗衣盆等东西的小推车，仓皇不安地回头照顾那些疲倦不堪，满身尘土的孩子。一些从乡下来的，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老头儿弯着腰，在人行道上逆着人流走着。他们是柯尔平镇人，儿童村人……城郊的人都拥进城来了！

我们足足走了两个钟头才走到莫斯科车站。我没让医生提行李包穿过广场，我自己提起行李包在旧涅瓦大街的拐角处停了一下，为的是把包裹提得合手一些。伊万·伊万内奇走到前面去了。宽阔的车站前一个人也没有，我感到很纳闷儿。

“可能现在是在里果夫加站上车吧，”我寻思道。

真是奇怪，这一刹那間的情景我記得那么清楚：太阳光滿洒在起义廣場上，穿着海軍大衣的高个子医生一步一步地跨上台阶，被台阶截成几段曲曲折折的影子随着他步步上升，車站的正門那兒，冷清清的一个人也沒有，使人感到不安……

門紧紧地閉着。医生敲了几下，一个戴鐵路員工帽子，身体丰满的女人探出头来，不知对他說了两句什么話。他站了一会兒，然后慢騰騰地回到我这兒。他的脸色显得非常严峻。

“喂，卡佳，把行李包提到这兒来，”他說道，“回家吧。最后的一条路也被截断了。再沒火車了。”

几天以后，医生坐飞机走了。

9 撤 退

我們的司机是第一次在前綫这个地段開車，我們好几次在叉路口停下来看地图。我們已經走了一个多鐘头，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德寇距列宁格勒还相当远。不过在奥兰林巴烏木后面，經過果斯古里茨向柯波林方面去的这个地段也是最突出的一个地段。海軍利用远射程艦炮的火力控制着这块地方。

我們向民兵师駛去，一路上我都在盼望着能够看到彼加，因为他正是在这个师里服务，我还知道团政委姓什么。

牵引車拖着被击伤的火炮迎面向我們駛来。輕伤号三三两两的在田野上沿着空曠的，尘土飞揚的大道走着。一个小矮个兒，身体很結实，两腮象小孩子似的女卫生員巴尼雅告訴我，說前面某处路上双方正在互相射击。这个姑娘的辮子盘在头上。每当汽車碰上弹坑蹦起来的时候，她都忍不住要高声大笑。

我們越过了射击区域，偶尔在車后发生了两三次爆炸，我微微敞開車后門，看見路上一团云雾般的尘土正在墜落。我們以全速冲进了村庄。司机刹住車，一面看着那被打坏的护泥板，一面咒罵着。我和巴尼雅便趁这时跑去找卫生营营长了。

这是一个极普通的村庄，周围的景物也是极普通的：柳枝編成的新篱笆，疏疏落落刚露出尖兒的树芽，院子里的砖灶，用一条繩子吊着門的谷仓，里面有一种阴森的感觉，散发出新收的干草气息。师司令部就駐在这里，前沿距这兒还有两三公里。一位皮带上插着笨大的左輪枪，穿着长褲的女卫生員指着草地尽头稀疏的小树林对我說道：“就在那兒，小树林那兒。”小树林背后是一片白樺树丛，在太阳照耀下閃閃发光。

命令規定在天一黑的时候运送伤員。所以我一有空就去找彼加。我問遍了伤員，护士，师联络政委（別人对我說，他認識所有的軍官）。我知道姓氏的彼加的那位团政委昨天牺牲了——这是政治部告訴我的。

“司考尔尼亚可夫也牺牲了，”政治部的一位校級检查員，一个身材魁梧，体質結实的汉子对我說道。

我是在吃飯的时候找到这位检查員的，大概是因为我的脸色吓得发了白，所以他停止了喝湯，向周围看了看，用一种很严厉的吼叫声問一个盖着軍大衣，躺在长凳上的軍官道：

“魯宾·司考尔尼亚可夫牺牲了嗎？”

盖軍大衣的軍官說是牺牲了。

“是司考伏罗得尼可夫，”我的音声都变了，更正道。“怎么司考尔尼亚可夫呢？我問的是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少尉！”

“司考伏罗得尼可夫？我不認識这样一个人。您吃过飯了嗎？”

“吃过了，謝謝。”

我从政治部走出来的时候，两条腿还在不住的发抖……

一架飞机在村庄上空盘旋，女卫生員連忙从后院里跑出来，可以清晰地听到她們的喊声：“瑪露霞，空袭警报！”炮弹落到街上的愈来愈多，現在看得很清楚，德寇轟击的不是炮兵連陣地，而是村庄。我們的部队在撤退，村庄里迅速集滿了穿着肮脏的，被泥土染紅了的軍大衣的人，一会儿又同样迅速地走空了。一个双眉飞揚，嘴唇紧閉，尖瘦的鷹鼻子少年跑到卫生营里来求点水喝。巴尼雅把水递給他，我以一种从未对世上任何人有过的强烈的，純洁的体貼心情望着他喝水。他那干瘦的喉結一上一下地动着，他憤怒地斜着眼睛望着我們部队撤退的道路。

我們是在八点多鐘出发的，整个卫生营也和我們一起撤走了。不久以前还是那么輕盈，靜謐，光閃閃的小白樺林現在正在燃烧，一股股飘忽不定的黑烟被风兒吹着直向我們扑来。这样倒也正好，我們毫不困难地便越过了村口正在互相射击的一段道路。現在，車上載得滿滿的，所以搖晃得不那么厉害了，但每次碰到凹凸不平的地方，汽車起伏震动的时候，都可以听到一陣呻吟声。我和巴尼雅忙着照料伤員，生怕他們的头碰到車厢上，我們可真是累坏了。

这一天是九月八日，是德寇准备进行坚决冲击的一天，他們对列宁格勒第一次疯狂地轟炸起来。凄慘的火焰迎着汽車飞来。我們的汽車开上了国际大道，看見全城仿佛都籠罩在熊熊的烈火中。伤員們絮絮不休地說起話来。透过斜射到汽車里来的血紅的反光，我看見一个头上纏着綳带的肩膀寬闊的水兵，他一面撕着貼身的衬衣，一面伤心地哭着。

10 生活在前进

商店橱窗前的木板已经陈旧不堪，有了裂缝，油漆也剥落了；花园和公园的壕沟里早已杂草丛生；由于警报频繁，百叶窗刚打开又要关起来实在没有意思，所以家家户户的屋子里一清早就黑沉沉的不见阳光。七月间我曾经去过一次的战壕早就变成了设有临时火力点的坚固防御工事，这些防御工事的钢骨架都是在工厂里浇制成的。

在我的一生中，好象从来还没有象在列宁格勒的这个秋季里这样紧张地工作过。我一面在俄罗斯红十字会讲习班学习，一面还经常上前线。我因为冒着强烈的炮火从前线上抢救伤员，甚至还受到通令表扬。

信始终也没有，我只好愈来愈经常地从口袋里掏出小白熊来安慰自己。没收到他的信，所以我只好徒劳无益地常常在那些因空袭柏林、肯尼斯柏格、布罗叶什基而受勋的飞行员中寻找萨尼亚的名字。

但我是在“加快速度地”工作着，象是一列疯狂的火车不顾信号灯地在向前飞驰，只有秋夜的寒风呼啸着，闪到一旁去了！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列车从身旁驰过，只剩下我一个人躺在路堤下面，孤零零的，浑身无力，悲恸欲绝。

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羞于叙述梦里的情景。我好象是把内心的秘密托付给了自己，如果我把全世界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的事情都讲了出来，那就等于我自己揭露了这一秘密。但是，

这个梦我还是要把它说出来。

下班以后我在医院里睡了十来分钟，梦见自己坐在窗前学习西班牙文。我们住在克里米亚的时候，萨尼亚就曾因为我荒废了外文的学习生气过，所以我现在又重新学起西班牙文来。可是，难道窗外是克里米亚吗？又仿佛是在天堂，结满了毛茸茸的深青色果实的沉甸甸的李树枝低垂着，透亮的、黄橙橙的桃子光泽闪闪，好象要被太阳光融化了似的，遍地开满了鲜花：烟草花，紫罗兰、玫瑰花，真是百花齐放。此时万籁俱寂，突然一声震耳的鸟鸣，一阵翅膀的挥舞，好不叫人心慌！我抛下书本，跨过桌子，越过窗户，直向花园里奔去。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是一只鸱鸇还是乌鸦，只见一只生着钩嘴的大鸟蹲在梧桐树上伸展着利刃般的翅膀。这只大鸟嘴里衔着一只似乎是小鹰的鸟儿，它衔着小鹰的腿，这只小鹰已经不能叫了，只是用一双象人一般的眼睛瞪着我。我感到我的心都要沉下去了，我放声喊叫，想找根棍棒之类的东西，可是鸱鸇已经慢慢地腾空飞去了。它的头扭到另一边去不看我，展开翅膀，一动也不动地平伸着翱翔。

“就是这样，卢凯里亚·伊里尼希娜，请您把这个梦解说一下吧，”我向我们的办事员，一位使我常常想起达莎阿姨来的上了年纪的旧式妇女说道。

“您的丈夫要回来。”

“那为什么呢？鸱鸇不是飞走了，而且还把小鹰衔去了吗？”她想了想。

“反正是要回来的。”

我这一整天都摆脱不开这个可怕的，荒谬的梦给我的影响，晚上我约瓦丽亚到我家住宿。

空袭警报和往常一样，七点半钟便开始了。发第一次警报

时，尽管罗莎莉·納烏莫芙娜打电话来，以自卫小组的名义命令我們下防空洞去，可是我們还是坐在家里沒有动。第二次警报我們仍然是在家里坐过了。我在防空洞里总是感到心煩，所以我早已决定，万一我要遭遇“不幸”的話，也讓它发生在清新的空气里，发生在列宁格勒的晴空下也痛快一些。我們留在家里并不是老老实实坐着，还要煮咖啡。这是一件重要的事，因为这不只是咖啡，如果在渣滓里加上一点面粉的話，还可以作成烤餅呢。

可是第三次警报又发了，炸弹落在很近的地方，房子搖晃了一下，就仿佛是一前一后地迈了一步似的。厨房柜架上的鍋子都震落到了地上。瓦丽亚不顧我怎样极力反对，拽住我的手就把我拖了下去。許多妇女站在漆黑的洞口，急促而惊慌地談論着。我听出了看門人妻子的熟悉的音調，她的名字叫居里·伊日柏尔捷耶娃，是一个韃靼人，可是不知为什么，全房子里的人都叫她瑪莎。

“九号被炸了，”她說道。“炸得很厉害。管理員吩咐拿鉄鍬掘去。”

她所說的九号是指第九食品商店的房子。

“拿鉄鍬掘去，大家都去！誰沒有鍬就去領。快拿去，妇女們，快拿去！要是将来把你炸死了，別人也要来掘你的。”

在黑暗中，她把鉄鍬弄得叮叮当当地响着。她塞了一把鉄鍬給我，又把一把給了瓦丽亚。可怕，多么不願意去啊！軍医学院外科神經医院被炸毀时，我可已經“掘”过一次了。但站在洞口的那群妇女嘀咕了一陣之后还是去了。所以我們也跟着她們走了。

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象列宁格勒人所說的，最“适于空袭的”晴朗的夜晚。一輪圓月象黃色气球似的高悬在城市上空，

霜冻刚刚开始，空气清新而凛冽。在这样的夜晚散散步，和亲密的朋友共拥一件斗篷坐在河边，倾听脚下波浪冲击着石岸的声音该多么好啊！

可是我们却扛着铁锹，拖着疲惫的身躯，一声不响，愤愤地走着，到房屋的废墟里去掘活人，或者掘死人。

“九号”房被劈成了两半，炸弹把五层楼全打穿了，在乌黑的横七竖八倒塌的地方，露出一所狭窄的列宁格勒式的院落，地面上映着一些怪异的支离破碎的影子。房屋是向前倒下的，瓦砾把街道都堵塞住了，在这碎砖、家具、钢架堆里，高高地竖着一块钢琴的翼板。三楼上歪歪地挂着一个食橱，可以清楚地看到墙壁上还挂着一件大衣和一顶女帽。

象上一次在病院的瓦砾场上一样，周围死一般的寂静，人们不慌不忙，镇定得出奇地走近这所房屋，连说话的声音也是那么不慌不忙，谨慎小心。一个女人尖叫了一声，扑倒在地上，大家把她抬到一旁，一切重又归于寂静。一个被炸死了的老头儿，穿了件白色的大衣，身上落满了石灰和碎石，躺在人行道上，人们走过的时候，看了看他的脸，又慢慢地从他身旁绕过去了。

地下室浸满了水。首先得想个排水的办法，一位负责救护工作的，清瘦俐落的警士把我和瓦丽亚指派到水泵上去抽水。

脚下的地面动了一下，又静止下来了。在我们的头顶上，曳光弹象一道道黄色的弧光一个跟着一个向天空窜去。探照灯光神奇地忽而缩短，忽而伸长地交叉着；我似乎看见在一个灯光的交叉点上闪过了一架小飞机。

高射炮开始射击了。刚才声音还很远，可是一忽儿便越来越近，仿佛是一个巨人大踏步迈过市区，一面用几千支手枪向天空射击似的。我一面不停地工作，一面抬起头来朝天空张望了

一下，心里不禁大吃一惊：一面是探照灯疯狂的探索，另一面是漠视着人间一切的浑黄的圆月，和那明净的黑夜的恬静，这是多么罕见的对照啊！机枪短促的噠噠声，五光十色的信号弹在晴空中急速飞驰，这幅战争的图画多么可怕，又是多么美丽啊！

救护车停在民警用来把被炸房屋圈起来的绳子旁边。各种工作正以全力进行，喧嚣声，嗡嗡的人声从地下室不断传来。人们从下面走出来时，一个个脸色惨白，水湿到了腰部，看来牺牲的人并不多。

瓦丽亚脸色红红的，显得十分漂亮。她不断地从破碎的家具堆中检出一些褥垫、被盖和枕头来，安排着受伤的人，给别人作人工呼吸，叫唤卫生员。随救护车来的两位医生象小孩子一样跑来跑去听从她的每一句话。

她把裙子提高一些，走到地下室去，把一个浑身透湿的人架了出来。瘦小的警士连忙跑过来协助她，卫生员也把担架抬过来。

“放上去，”她以命令的口吻说道。

这是一个红军战士，或者是一个军官。他穿着一件因为被水浸湿，颜色变黑了的军大衣，没有戴帽子。大家把他抬上担架。他的头垂在胸前。瓦丽亚捧着他的下颔，他的头就象玩偶似的轻轻仰到后面去了。在这张被深黄色的乱发遮住了前额的脸上，一个熟悉的形象闪了一下；在几分钟之内，我一面工作，一边竭力回想，我曾经在哪儿看见过这个人。

“这就行了，现在他能活了，”瓦丽亚用低沉的，气忿忿的声调说道。

她撬开他的牙关，把手指塞进口里去。他的头在她手上摇动了一下，哆嗦起来，嘴里呼噜呼噜地，急剧地往里吸气。

“啊哈，还咬人呢，好宝贝！”瓦丽亚又说道。

水泵的把手一上一下地动着，我断断续续地看到瓦丽亚给他进行的工作。他现在已经坐起来，紧闭着眼睛在艰难地喘息。他的脸孔在月光的照耀下显得很白，简直白得可怕，再加上他那个扁鼻子和他那好象是用粉笔勾画出来的方下巴，这张脸我曾经看见过千百次，可是现在我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有认出……

我到今天也还不明白，为什么我当时没有让他们把罗马绍夫——这个人是他——送到医院里去。他穿着军大衣，敞着怀坐在地上。他抬起眼睛，眼光里还充满着恐怖，恍惚的神情，模模糊糊地看见了我，有气无力地叫了一声：“卡佳”。说来也难以令人相信，不过我听见他能说话时真是高兴。当他确信是我站在他的面前，手里拿着瓦丽亚吩咐给他嗅的瓶子时，他并没显露出惊讶的神色。可是，当我拿起他的手检查脉搏时，他紧咬着牙关，打着寒战，声音稍微大了一些，又说了一次：“卡佳，卡佳”。

快天明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家里。我们踉踉跄跄地走着——炸弹虽然不是在我们头顶上炸开了五层楼，虽然没有把我们埋在灌进了水的地下室里，可是我和瓦丽亚这时的感觉也并不比罗马绍夫好多少。我们在前面走，玛莎和另外一个妇女架着罗马绍夫跟在后面。他总是不放心，怕背包丢了，最后玛莎气冲冲地把背包送到他的面前说道：

“你别光顾了想背包，你多想想上帝吧。傻瓜，你这是捡了一条命，你该多做点祷告，念点可兰经！”

我们好不容易走到家里时，咖啡这会儿是最受欢迎的东西。我们几个脏得象魔鬼一般，蓬头垢面的人，把罗马绍夫交给了罗莎莉·纳乌莫芙娜之后，便躺倒在厨房的床上了。

“总而言之，我始終还不明白，他究竟是怎样一位大爷，”瓦丽亚說道。

“他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我疲憊不堪地回答道。

“傻瓜，那你干嗎还把他弄来呢？”

“老朋友啦，有什么法子呢。”

我喝咖啡喝得热起来了，开始脫下連衣裙，脑子里忽然一陣发迷，最后在我眼前出現了一张大白脸，梦中我无可如何地揮动着手想攆开它。

11 晚餐。 不是說我

罗莎莉·納烏莫芙娜把他的床位鋪設在餐室里。等我們出来时，他还在酣睡。被子滑在一边，他穿着一身干干净净的內衣；瓦丽亚用她那习惯的动作順便把被子掖了掖，整理了一下，他紧咬着牙关在呼吸，眼臉間露出一綫眼珠，——現在，这个羅馬紹夫和世界上其它的羅馬紹夫决不可能混淆了！

“真是最坏的人嗎？”瓦丽亚悄声問道。

“是的。”

“不过我看也沒有什么嘛。”

“你发疯啦！”

“老实說——沒有什么。你想想看，他为什么这样睡？因为他的眼臉太短了。”

……为什么我会以为羅馬紹夫到傍晚就應該象那已逝的黑夜的幻影一般消失呢？事实上他並沒有消失。我給家里挂电话，接电话的人不是罗莎莉·納烏莫芙娜，而是他。

“卡佳，我需要和您談談，”他用一種尊敬而強硬的口吻說道。“您什麼時候回來？要不然我到您那兒去，怎麼樣？”

“您來吧。”

“不過我怕醫院里不太方便。”

“那倒也是。不過我得過幾天才能回家。”

他沉默了一會兒。

“我知道，您沒有絲毫想看見我的願望。不過事情已經很久了……您不願意遇見我的原因……”

“不，並不很久……”

“您指的是我請巴甫洛夫醫生帶的那封信嗎？”他趕忙說道。
“您收到這封信了嗎？”

我沒有回答。

“請原諒我。”

又是一陣沉默。

“我們這次見面不是偶然的，我是來找您。因為聽見有人喊叫，說有些小孩還在地下室里，所以我就向地下室奔去。但這都不相干。我們必須見見面，因為事情和您有關係。”

“什麼事？”

“很重要的事。我要把所有的情况全告訴您。”

我的心跳了一下，就好象是不知道誰在和我談話似的。

“您講吧。”

現在他又不說話了，沉默了那樣久，我幾乎都要把听筒挂上了。

“好吧，那麼說來不需要羅。我這就走，以後您再也見不到我了。我敢發誓……”

他還嘟囔了幾句什麼話；我仿佛看到了他怎樣站在那兒，緊

咬着牙关，闭着眼睛对着听筒沉重地喘息。可是他这一阵沉默和决绝的态度突然使我相信了他。于是我告诉他，说我就去，然后便把听筒挂上了。

我用自己的钥匙开了房门，走到餐厅门口停下，我看见餐桌上放着奶酪和牛油。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居然有真正的奶酪，通红的荷兰奶酪，牛油也是真正的牛油，说不定还是奶油，装在一只大搪瓷杯里。一个很少见过的，不是列宁格勒做的面包大大方方地被切成了几大块。当我走进来时，罗马绍夫正用厨房的菜刀在开罐头。放在桌上的背包里翘着一只瓶子……

罗莎莉·纳乌莫芙娜蓬散着头发，一脸幸福的样子从卧室里走出来。

“卡佳，您看，贝尔塔怎么办呢？”她悄声问道。“我可以请她来吗？”

“我不知道。”

“我的天哪，您生气了吗？我只不过是想问问……”

“米沙，”我大声说道，“罗莎莉·纳乌莫芙娜求我问一问，可不可以把她的姐姐贝尔塔请来一块儿吃饭。”

“这有什么问题！她在哪儿？我自己去请她。”

“她也可能会害怕您。”

他很不自然地强笑了笑。

“请吧，请吧！”

这是一次十分欢乐的晚餐。可怜的罗莎莉·纳乌莫芙娜往面包上抹牛油或奶酪的时候双手都在发抖。带着一种宗教式的虔诚的表情吃着。贝尔塔这位小矮个儿，白头发，尖鼻子，眼光流散的老太婆，每吃一块面包都要嘟囔上几句。罗马绍夫刺刺不休地只管唠叨，一面磨牙，一面喝酒。

这时我才把他好好地端详了一番！

我們已經好几年沒有見面了。他过去相当肥胖。在他的脸上，在他那略微挺起的身躯上，那种发福的人所特有的派头正在开始形成。他和所有相貌极端丑陋的人一样，穿戴总是百般讲究，甚而浮华炫耀。

他現在消瘦了，骨头都露出来了，穿着領章上有两道横杠的軍服上衣，衣服外面紧紧地扎着吱轧作响的新皮带；难道他当了少校嗎？脑壳上的骨头也显出来了。在他那一眨也不眨，睜得溜圓的眼睛里，好象有什么新的东西——是劳累嗎？

“我变样兒了，是嗎？”他发现我在打量他时，这样問道。“战争把我改变了。灵魂、身体，一切都变了样。”

如果一切真是变了样的話，那他一定不会拿来向我表白的。

“米沙，您从哪兒弄来这么多的好东西？是偷的嗎？”

显然，他沒有听清楚最后的一句话。

“吃吧，吃吧！我还可以弄得到的。这兒什么东西都可以弄到。您們只不过是不知道門路。”

“真的嗎？”

“当然，当然。有人就行。”

我不知道，他說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但我不由得把抹了牛油的面包片放在盘子上。

“您早就在列宁格勒了嗎？”

“今天是第三天了。我是从莫斯科調到軍人商店来的。我以前在南方战綫。有一次落进了包围圈中，侥幸才突围跑出来了。”

这是事实，是我最害怕的事实。我漫不經心地，怀着一种久已忘怀的，觉得他是听从我駕馭的感情听着他講。

“我們向基輔撤退。当时我們并不知道基輔已經被切断了，”他說道。“我們心想，鬼才知道德寇在哪兒，哪知他們就在赫里斯金洛夫卡附近，距前綫二百公里的地方和我們遭遇上了。真是慘不忍睹，”他笑着补充了一句說，“不过，关于这件事，留待以后再說吧。現在我想告訴您，就是我在莫斯科看見了尼古拉·安东內奇。真也奇怪，他哪兒也沒有去。”

“真的嗎？”我毫不在意地說道。

我們沉默了一会兒。

“米沙，您似乎是打算談什么事情吧？那么到我屋子里去吧。”

他站起来，伸了伸腰。嘯了一口气，把皮带整理了一下。

“好，走吧，可以讓我帶酒嗎？”

“請便。”

“哪一种？”

“随您便，反正我不喝。”

他从桌上拿起酒瓶，杯子，謝过了罗莎莉·納烏莫芙娜，便跟着我走了。我們坐下来，我坐在沙发上，他坐在桌旁。这是过去薩沙的桌子，桌上放着一只高脚杯，她的画笔放在里面，从来沒有人去触动过。

“說来話长。”

他很激动。我却很鎮靜。

“太长了……您抽烟嗎？”

“不抽。”

“許多妇女在战争期間都抽起烟来了。”

“不錯，有許多。医院里还在等我哩。給您整二十分鐘的时间。”

“好的，”羅馬紹夫沉思着，一字一頓地說道。“你知道，我是八月里离开列宁格勒前綫的。我本来不想走，实指望見您一面。但命令总是命令。”

薩尼亞常爱重复這句話，所以我听到羅馬紹夫說出来心里就感到不舒服。

“我不准备叙述我是怎样到南方去的。我們原来在基輔一带苦战，后来被击潰了。”

他說的是“我們”。

“我在赫里斯金洛夫卡碰上了一列繞道基輔的軍用卫生車，就搭乘这列火車到烏曼去。这是几节最普通的暖車，里面躺着伤员，……其中有很多重伤号。車在酷热，气悶和滾滾风尘中行駛。”

貝尔塔正在隔壁房間里祷告。

他站起来，不耐煩地关上了門。

“我在上車的前两天受了內伤，伤的确很輕，只不过身体的左側有时感到刺痛。这块地方已經变成褐色的了，”羅馬紹夫勉強笑了笑說道。“现在还这样。”

那天晚上是瓦丽亚替羅馬紹夫換的衣服，她說他身体的左側受了灼伤，大概这就是他所說的“变成了褐色”的那块地方。

“我只好担負起我們列車上的事务工作。首先要把伙食搞好。我可以驕傲地說，在这一个礼拜之內——我們总共走了两个礼拜，——沒有餓死一个人。不过現在的問題不是說我。”

“那是說誰呢？”

“和我們同行的有两个姑娘，她們是斯坦尼斯拉夫师范学院的女大学生。她們給伤员送飯、換紮帶，凡是她們能够作到的事都作。有一次，她們之中的一个叫我到一位飛行員那兒去——

这位受伤的飞行員躺在一节暖車廂里。”

羅馬紹夫斟上酒。

“我問姑娘发生了什么事。‘您和他談談吧？’——‘談什么呢？’——‘他不想活了，說要自杀，总是不停地哭。’于是我們就走到他那兒去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兒，我以前一次也沒有到这节車廂里去過。他臉向下趴着，腿上纏着綳帶，不过实在是纏得太馬虎，太不象話了。姑娘們坐到他身旁，招呼了一声……”

羅馬紹夫停頓了一会兒。

“卡佳，您怎么不喝呀？”他的声音有点兒嘶啞地問道。“总是我一个人喝，要是我喝醉了，您怎么办呢？”

“我就把您赶出去，把您的故事講完吧。”

他把酒一飲而尽，来回走了一圈兒，坐了下来。我也啜了两口。世界上的飞行員多着哩！

12 我 相 信

下面就是羅馬紹夫所叙述的故事。

薩尼亚的脸部和腿上都受了伤，脸上的伤口已經在合縫。关于这件事，羅馬紹夫是从一张报导了薩尼亚的内部刊物“紅鷹”报上偶然看来的，所以他沒有說薩尼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負伤的。他带着这一期报纸准备給我看。毫無疑問，要是沒有这次搶救兒童，差点兒淹死在地下室里的荒唐事情的話，那么这份报纸一定会送到我手中的，不过这并沒有关系，他已經把这篇报导背熟了：

“格利高里耶夫大尉駕駛着飞机，执行战斗任务后返航时，

被敌人的四架歼击机追上。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激战中，格利高里耶夫击落敌机一架，其余三架未敢应战，仓惶遁去。格利高里耶夫的飞机虽被击伤，但仍坚持飞行。在距战线不远的地方，他又遭到两架‘容克’飞机的攻击，格利高里耶夫駕駛着被火焰包围了的飞机，成功地撞下了一架‘容克’飞机。某部全体飞行员将永远纪念这些斯大林之鹰——为祖国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的共产党员格利高里耶夫大尉，领航员卢利，射击报务员卡尔宾科和空中射击员叶尔绍夫。”

全文可能不够准确，词句可能有些颠倒，可是，罗马绍夫以自己的头颅来担保这篇报导的内容的真实。他把这份报纸连同其它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一起放在图囊里。图囊掉进水里去了，所以报纸湿成了一团，等他把这张报纸烘乾以后，又恰好不见了登戴着这篇报导的那一部份。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

因此，萨尼亚就算是牺牲了。但事实上他并没有死，只是脸上和腿上受了伤。脸上的伤很轻，可是腿上的伤看样子是相当严重的，至少自己不能行动了。

“他是怎样到军用列车上来的呢？”——“我不知道，”罗马绍夫说道，“我们没有谈到这件事”。——“为什么？”——“因为我们见面之后过了一小时，距赫里斯金洛夫卡二十公里的地方，德国鬼子的坦克对列车进行了一次扫射。”他就是这样说的：“扫射”。

这是意想不到的事——在我们的后方居然遭遇上了德寇的坦克。头一发炮弹就打坏了机车，列车停下来了。伤员们跳到路基下面四散奔逃，德寇隔着列车用榴霰弹向他们轰击。

罗马绍夫首先向萨尼亚奔去。要冒着炮火把他从暖车里拖出来是很不容易的，但罗马绍夫还是把他救出来了；他们躺在车

輪後面。車廂里的重傷號在叫喊：“弟兄們，幫一幫忙吧！”可是德寇不停地射擊，而且已經打得很近，打在鄰近的車廂上了。這時躲在車輪後面再也不成了，於是薩尼亞說道：“你快跑吧，我身上有手槍，我不會讓他們活捉的。”但是羅馬紹夫沒有丟下他，儘管薩尼亞打他的手，詈罵他，他還是從壕溝里，踏着沒膝的泥水把薩尼亞拖到一邊去了。後來一位灼傷了臉的中尉協助羅馬紹夫把他背過了沼地，他們兩個人便留在了一個潮濕的，小白楊樹林里了。

這一次真是可怕极了：一支十分龐大的德國登陸部隊侵占了距離最近的一個車站，四周圍都在進行戰鬥，德國鬼子隨時都可能在這個小樹林里出現，因為在這片沒有遮攔的地區，這兒是唯一的、一個便于防禦的地方。必須刻不容緩地走遠一些。可是薩尼亞臉上的傷口露出來了，體溫升高了，他不住地對羅馬紹夫說道：“扔下我吧，不然你也要完蛋了！”有一次他還說：“我認為處在我的地位，我應該為你耽心。”當他把腿放下來時，血液就往傷口流去，使他感到難以忍受的痛楚。羅馬紹夫給他作了一根拐棍：劈開樹枝，綁上一頂飛行帽，就作成一根拐棍了。但他還是不能行走，羅馬紹夫只好一個人走了，不過他不是向前走，而是往回走，回到軍用列車那兒去；他希望能找到剛才那兩位斯坦尼斯拉夫來的姑娘。因為沼地那邊的敵人向他開火射擊，所以他沒有走到列車那兒，又折回來了。

“我回來的時候已經過了一個鐘頭，也可能更久一些，”羅馬紹夫說道，“就沒有找見他了。樹林很小，我里里外外都走遍了。我又怕大聲喊叫，不過我終究還是喊了幾聲，結果一點回聲也沒有。我通夜都在尋找他，最後倒下來便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找到了我們分手的地方；地上的青苔有的地方被擦去了，有的地

方被揉烂了，自制的拐棍竖在白杨树下面……”

羅馬紹夫后来落在包围圈中，但他和德涅泊尔区艦队的一小队水兵共同突围，回到了自己的队伍里。这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听见过关于薩尼亚的消息了……

我曾經千百次地假設过得到这个消息时的情形。也許是一封普普通通的信，只是沒有貼邮票，我拆开一看——立刻一切都不存在了，我一句話沒有說便暈倒在地上。也許是那曾經被我安慰过多少次的瓦丽亚走来，她开始說起他来，起初十分謹慎地，拐弯抹角地說，后来就問道：“假若他是真的牺牲了，那你怎么办呢？”我便回答說：“我受不了这样的痛苦。”也許是在軍事委员会，我和其他的一些女人站在一起，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思想：“今天将会对誰說——你的丈夫牺牲了呢？”所有这一切的情景我都想遍了，只是沒有想到这件事情会由羅馬紹夫来告訴我。

自然，这全是扯淡，是他瞎編的，要不然就是从杂志上看来的。最可能的还是他瞎編的，因为在他每一句話里都透露出他特有的打算。但是，这次不明不白的，愚弄人的鬼把戏偏偏落在了我的头上，这是多么不公道，多么使人难过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到列宁格勒来，——这兒就是沒有他已經够苦的了，——到这兒来无耻地欺騙我！我不应受到这样的报应！

“米沙，”我非常鎮靜地說道，“您在信里对我說：‘你是我的幸福和生命’。这話是真的嗎？”

他一声不响地望着我。脸色惨白，耳朵却是赤紅的。現在当我問他：“这話是真的嗎？”他的两只耳朵愈发紅了。

“那么您为什么要想尽方法来折磨我呢？我應該承認，有时候我也有点可怜您。一个女人对于一个热爱自己很久的人从不

产生一点怜悯的感情，这样的事是不会有。但您这个不通事体的人怎么就不明白，假如薩尼亚真要是牺牲了的话——但愿上帝保佑不是这样——我一定会痛恨你的。米沙，您应该承认这些都是谎话，而且请求我的原谅，不然我就要把您当作一个坏蛋赶出去。您讲的这些事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九月里。”

“九月里，您看，我十月十号还收到他一封信。薩尼亚在这封信里说，他生活得很好，而且如果上级批准的话，可能还要飞到列宁格勒来玩一两天呢。米沙，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不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力量遇到这样的事情还能编出一套谎话！我在十月十号那天什么信也没有收到。已经三个月没有收到薩尼亚的片纸只字了。

羅馬紹夫冷笑了一声。

“您不相信我的话，这太好了，”他说道。“我怕的是另外一种情况。但愿一切都能转向好的一方面。”

“那就是说，刚才你所说的都是谎话喽？”

“对，”羅馬紹夫说道，“都是谎话。”

他本来是应该对我进行说服，应该向我证明，应该生气的，就象那次在义犬广场时那样，应该站在我面前气得嘴唇发颤才对。但他只是冷冷地说道：

“对，都是谎话。”

我的心不禁跳起来，又墜落下去，变空虚了。

他大概觉察出了这点，他走过来，大胆地，毫不拘束地拉起我的手，我把手挣脱开。

“如果我想要欺骗您的话，我只消把那张报纸给您看看，白

紙上印着黑字，說薩尼亞已經犧牲了。可是我却对您叙述了一件全世界再沒有別人知道的事。這真可笑，”他很傲慢地說道，“就好象我這樣作是出于一種卑鄙的個人打算似的。或者說我會以為類似這樣的消息能博得您對我的好感？但是我不敢對您隱瞞事實。”

我們仍和剛才一樣端正地，一動也不動地坐着，可是周圍的一切——薩沙那張上面放着高腳杯，杯里裝着畫筆的桌子，和在桌邊坐着的那個人，我忘記了他姓什么的紅褐色頭髮的軍人，都开始慢慢地離開了我。我什麼話也沒有說，我什麼也不需要，可是這個軍人却不知為什麼竟急急忙忙地走開，隨後又帶着一位白頭髮的文文雅雅的矮小女人回來了。她一看見我，便抱着头說道：

“卡佳，我的天哪！快拿点水来，水！您是怎么啦，卡佳？”

13 希 望

“瓦琳加，我怎么啦？我病了嗎？”

“一点病也沒有——挺好的。”

她摆了摆手，接着便有一个人小心翼翼，皮鞋嘎吱嘎吱地响着走了出去，輕声問道：

“清醒了嗎？”

“他是誰？”

“还不就是那个人，你的那位紅头发，”瓦丽亚气恼地對我說道。

我沉默了一會兒。

“瓦琳加，你知道嗎？”

“我的天呀，還沒有出什么事嘛。嚕，受了伤，这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我的亲爱的，”她貼近我，擁抱着我。“难道能这样作嗎？那我該怎么办哩——寻死嗎？你长得多么标致啊！我本来也不想談这类的話。你以前就很难过嗎？还是他不当心說錯了話呢？”

“不，他很当心，一会儿就过去了。”

“当然会过去的，而且已經过去了。你喝咖啡嗎？”

我又沉默了一会儿。

“瓦琳加！”

“什么事，亲爱的？”

“我抱着希望。”

“当然，哪能不抱希望啊！而且，也应该抱希望！你記住我对你說的話吧。你的薩尼亚万无一失，一定会回来的。”

在列宁格勒很难弄到刊載着报导薩尼亚消息的那份“紅鷹”报，我起初竭力找，并且已經从一个軍事記者口里打听到这种报是哪个部队发行的了。可是，后来我不再找了，因为彼加写信告訴我，說他亲眼看到了这篇报导，他写道：“我想来想去，总是在想着您，亲爱的卡佳。薩尼亚死得英勇，死得伟大！對我說来，他是我在世界上最亲近的人，自小就在一起的亲爱的兄弟。他的灵魂里总有一种什么东西，发出嘹亮的响声，每当听到这种青春的音响时，你就会感到生活得更加輕快。这就是我們的童年，我們的理想，他終生念念不忘的我們的誓言。我多么渴望着見到您，分担你的悲慟。”

我在回信中把羅馬紹夫所講的事情詳細地叙述了一遍，并且还附带說，我並沒有失去希望……

我回家的次数愈来愈少了。我就要在俄罗斯红十字会講習班毕业，开始进医院工作，今后再不是“社会工作者”，而要成为一个“专职护士”了。飢餓給我造成的困难并不久，可是，象外表上比我結实得多的瓦丽亚这样的人就苦了很久。这个痛苦的消息在这样艰苦的日子里，在列宁格勒这个地方临到我的头上，对我說来反而觉得輕松一些。現在，在列宁格勒，哪怕是躺在床上，炮弹也可能从天上落下来。街道上初雪已經封地，可是，窗戶却大开着，因为还在天气暖和的时候，許多列宁格勒的居民就轉入露营状态，一直就沒有回过家。

感到輕松一些，这是因为当我在抵抗因封鎖而带来的一切灾难的同时，不知不觉地也抵抗了个人的悲慟。說也奇怪，羅馬紹夫却是理解我这种心情的。难怪他絕口不再劝我离开列宁格勒……

他又重述了一遍他的故事，我現在知道了許多新的細節，这些細節他在第一次談話中一字也沒有提到过。羅馬紹夫和中尉抬着薩尼亚过沼地的方法是把手交叉成十字，讓薩尼亚摟着他們脖子。两个姑娘中有一个名叫卡佳，所以薩尼亚非常欢喜，后来只管喊着她：“卡佳，卡佳！”当薩尼亚說“我認為，我應該为你耽心”的时候，羅馬紹夫只是笑了一笑作为回答。这的确可笑——每一分鐘德寇都可能在小树林里出現。

这是实話，他为什么要撒謊呢？如果他真想欺騙我的話，他只要把報紙給我看看就行了。白紙上面印着黑字，明明說薩尼亚牺牲了嘛。他这样說也是合情合理的。“可是他毕竟是羅馬紹夫，”我对自己說道。“是生着一双一眨也不眨的眼睛的羅馬紹夫。是薩尼亚称他为猫头鷹的羅馬紹夫”。

“战争会把人改变过来的，”我用这样的話来回答自己。“他

見過死亡，他現在在那過去是他賴以為生的虛偽和欺騙的世界里感到了苦悶。他為薩尼亞作了自己所能作的事。他之所以這樣作，也正是因为別人不可能設想到他會作出這種事。”

有一次我略微對他提了一下，說我很願意看見彼加。

“辦妥了，”過了幾天他對我說道，“明天就來。”

羅馬紹夫雖然一再說，是他通過美術學院的院長要彼加來的，這也可能純粹是一種偶合。但過了幾天，彼加真的來了。

我已經三個半月沒有看見他了。在送他走的時候，我還對他那種漫不經心的樣子，詩人的派頭和只顧埋頭作自己的事情的作風感到十分耽心。因為這些特點在戰場上對他都是很沒有好處的。可是這回走進屋里來的卻是一個身體結實，皮膚晒黑了的漢子，再不象過去那樣彎腰駝背，而是腰杆筆挺，雙目前視，充滿着信心的人了。

我們擁抱在一起。

“卡佳，現在我也認為薩尼亞是一定会回來的，”他開頭第一句話就說道，“當大家都認為他已經犧牲了的時候，而他卻復活了。現在一切都結束了。他會活着的，這是我們前綫的一種預兆。他們部隊里都知道他還活着。要不然，通知書早就寄來了，這是十分明顯的！”

其實這件事遠不是那麼明顯，但我還是聽他講下去，我沒有力量不相信……

彼加在一清早五點多鐘就到我这兒來了。我們等候着羅馬紹夫，一直等到中午。彼加只顧在講，我听着，感覺得這好象不是彼加，而是他的小弟弟，一個皮膚紅潤楞頭楞腦的小伙子在講。他穿着一件短皮袄，散發着強烈的羊膻味。他用焦黃的手

指熟練地卷着一根粗大的卷烟，他叙述了自己的情况，叙述了一个性格演变的过程。象他这样一位美术家，艺术人士上战场，最初的日子里他所看到的不是战争，而是战争的风景画。他自己是一回事，战争又是另一回事。可是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他杀死了第一个德国鬼子。

“这是怎么一回事兒？我，美术家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居然杀了人？但是我杀死的是没有权利称自己为人的人。我杀他就是为了保卫这一权利。”

他就是这样成了一枚“战争原子”。他再不是以美术家的身份来观察战争。他现在是一个兵士，能作的事他都作，争取成为一个真正的兵士。

“我在旧日的世界里有什么可作的呢？”他略微环顾了一下，感慨地说道。

我们没有等着罗马绍夫，我看出彼加是想在这个“旧日的世界”里独坐一会儿，所以我便先走了。我走到门口回过头，正看见他从自己那些卷成了筒状的油画中取出一张，用他那突然抖颤了起来的，变得粗笨了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把它摊开来。

我从医院里给罗马绍夫打了一个电话。

“来了嗎？”他兴高彩烈地说道。“您看，您还怀疑呢！”

“是的，他来了。您晚上来吧，他想见见您。”

“晚上？！很遗憾，我不能去——有件紧急的事情要办。”

“不，您一定要来。”

“我实在不能去。”

“一定要来。米沙，您听见了嗎？”

我放下了听筒。

晚上他果然来了。我們正坐在餐厅里，他一进门，便立刻伸着手向彼加走过去。

“很高兴，很高兴，”他說道，“非常高兴。說实話，應該承認，我根本沒有料到这事能成功，您原来是一位名人啊。如果您不是一位名人，那也許是毫无办法的。”

“非常感謝您，少校同志，”彼加用一种官腔答道。

“得啦，什么少校不少校！还不只是个二級軍需官！我也不准备再加豆兒了，当个少校算了。”

彼加看了看他，然后又往旁边的角落里看。显然，羅馬紹夫認為加豆兒，使人再不敢把他这位二級軍需官当成少校看待是一件輕而易举的事。

“喂，前綫的情况怎么样，听到什么消息了嗎？刚才有人对我說里高沃已經拿下来了。”

“据我所知，还没有拿下来，”彼加說道。

“哦，还没有拿下来！我刚才还在想：嘿，这下子可成啦，几天之内就能坐上国际列車直趋莫斯科了。这么一来只好再等一等了，是不是？”

在列宁格勒还没有人用“直趋”这样的話来談論过这件事。我感到很不自然。可是，彼加似乎絲毫也沒有觉察到什么。

我們沉默了一会兒。

“那么，”羅馬紹夫說道，“首要的，也是唯一的一个問題，就是薩尼亚的問題！”

他为什么表現得这样鬼鬼祟祟，这样奇怪呢？他为什么笑的时候一会兒畏畏縮縮，一会兒又高傲自大呢？他为什么罗罗嗦嗦地老是講那些穿着伪装外衣，在炮火下挖土豆的消防队员的故事呢？我不知道。这些事情和我毫不相干，我心里想的只

是薩尼亞……

“只有一条路，”最后，羅馬紹夫帶着一種神秘的，洋洋得意的神氣說道。“問題在於基輔一帶現在掌握在游擊隊的手里。毫無疑問，游擊隊和前綫指揮部是保持着聯系的。應該打通這層關係，也就是說委託一個人搜集有關薩尼亞的一切情報。”

彼加架着腿，一隻手捏成拳頭支着下巴，目不轉睛地瞧着他。

“这里面存在着兩重困難，”羅馬紹夫繼續說道。“第一：因為我們在列寧格勒，第二：這樣一道要求尋找薩尼亞，或者搜集他的消息的命令只有一個很高的領導機關才可以發布，要打通這個機關的關係是非常困難的。不過天下無難事。我在这兒，在游擊隊駐列寧格勒司令部里有一些熟人。讓我来負責辦這件事，”他的臉色轉白了，又補充說了這麼一句。“自然，這也要沒有其它意外的情況來阻礙才行。”

“意外的情況”隨時都有，生活本身就是一種“意外的情況”。拉多牙湖的彼岸早已被稱為“大陸”^①，即使用普通電報來聯絡也一天比一天更困難了。

“彼加，您怎麼不說話？”

“我在听呢，”彼加仿佛從夢中醒來似的說道，“沒有什麼，說得很對。我很难說依靠這種聯系的可能性有多大，特別是在目前。但總應該立刻開始進行。羅馬紹夫同志在這方面說得很對。卡佳，要是我處在您的地位，我就給那個部隊寫封信去。”

① 因為列寧格勒被封鎖得愈來愈緊，有如孤島一般。——譯者注。

“亲爱的，”羅馬紹夫走后，他对我說道，“我对您說什么好呢？我非常非常討厭他，不过这又算得什么呢，对不对？这是无所謂的。他身上有一种討厭的，冷酷的，隱晦的东西，在他的一言一动之中，这些感情流露得多么明显！我当时甚至想把他画下来，脑袋瓜那么方方的！不过这都是些小事情，小事情！依我看，最主要的他是一个干实事兒的人。”

“是这样！”

“而且老纏着您。”

“这是毫无疑問的。”

“您能不能同他一起到游击队司令部去一趟呢？”

“当然可以。”

“那您还是去吧。但一定要写信，要打听，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您自己的心境也会好一些。瞧您瘦成什么样兒，熬煎成什么样兒了！”他拉起我的手說道。“可怜的，亲爱的！您大概根本不睡觉吧？”

“不，我睡的。”

“薩尼亚一定会回来的，会回来的，”我紧閉着眼睛，极力控制住顫抖的嘴唇听着他說。“一切又会很美滿的，因为你們的爱情是那樣的深厚，就是最可怕的痛苦在你們的爱情面前也要退却，打一个照面就退却了。除了您和薩尼亚之外，似乎再沒有人能够这样地相爱，爱得这么强烈，这么固执，終生不渝。如果有人这样地爱着您，哪兒还能談得到死呢？不能这样子下去，誰也不允許您，首先就是我不允許！还有薩尼亚呢，难道您能讓他死掉嗎？”

我一面听着他說，心里逐漸松快一些。一个模模糊糊的，遙远的回忆突然閃現在我的眼前：薩尼亚非常疲倦的样子和衣睡

着了。这时虽然是夜間，但屋子里很亮。一个瘦弱的男孩在隔壁演奏：“苦尽甘来，久別重逢。一切都会美滿如意，因为我們所相信的神話还存在在这世界上……”

到前綫去可以乘电車，彼加所在的师現在駐扎在斯拉維揚克。他要求我不要去送他；这样作很冒险，沒有通行証很可能在雷巴茨克被扣留起来，但我还是去了。

“嘿，扣留，是你这样想！卫戍司令已經認識我了。”

电車里很拥挤，吵鬧得厉害，但我还是匆匆地又看了一遍姥姥来的信。彼加在最近一次就收到姥姥寄来的四封信和十二张明信片。列宁格勒在这些日子的情况就是如此：两三个礼拜誰也收不到从大陆寄来的片紙只字，可是突然一来就是一大捆邮件。我剛才在家里只来得及讀完了明信片。其中一张明信片上，小彼加用粗大的四方字母附上了一句：“爸爸，我們养了一只小兔子”。他那偏着头，揚着眉梢，带着使我特別喜欢的，酷似他媽媽的那种可爱的神情写信的样子，立刻活生生地呈現在我的眼前。他現在很安全，吃得飽，身体好，姥姥也是一样。在这么艰苦的时期还能有什么更多的希求呢？

“彼加，是这样嗎？”

“当然是这样的，”他很忧伤地說道。“您不知道，我是多么想念他！”

电車已經在雷巴茨克街行駛了。有人說，到終点站要检查証件，一个人一个人地放行。彼加替我耽心，所以我就决定回去了。

“亲爱的，祝您健康。”

“好，好，我一定会健康，”他乐哈哈地回答道。小彼加也常这样回答。

車上的人都怀着心事，忙着自己的事情，我們从这些陌生人的头頂上向对方伸出手，这时我有些后悔起来，因为我对于他的情形几乎还一点兒也沒有了解到。“但这又不是最后的一次見面，我們还要見面的，”我安慰自己道。“他的部队駐得这么近，只要在医院里請一次假就去了。”

我哪里知道，到我們再相逢时，需要經過多少苦难的，惊惶不安的日子啊！

14 失 望

貝尔塔在十二月中旬空袭最頻繁的一天死去了。在这段时期，轟炸从一清早便开始，或者，更确切一点說，从夜里就沒有間断。她不是餓死的——可怜的罗莎莉·納烏莫芙娜重复了几十次，說飢餓不是原因。

她一定要把她的姐姐按規定的日子安葬，但这是不可能的。她因此請了一个細长个子，愁眉苦脸的犹太人来为死者念了一夜經。死者还按仪式穿着由两幅未縫的被单作成的寿衣，躺在地板上。炸弹在很近的地方爆炸，这天晚上，馬克西姆·高尔基大街上沒有剩下一块完整的玻璃，火光和映成玫瑰色的积雪照耀得街上通亮，十分怕人，可是这个愁眉苦脸的人却坐在那里噤哩咕嚕地念經，过了沒多久，他便异常安靜地睡着了。天刚亮的时候，我走进屋子里去，发现他头下枕着經書，安安稳稳地在死者身旁睡大觉。

羅馬紹夫弄来了一口棺材；这时是十二月里，找棺材还是可能的。当这个乾癟的老太婆躺进了这口寬大的，馬馬虎虎釘起

来的匣子的时候，我仿佛觉得她是吓得蜷缩在棺材的一个角落里。

照羅馬紹夫的說法，掘墓工人是在“漫天”要价，所以只好自己动手掘坑。他雇来几个小孩子，也就是罗莎莉·納烏莫芙娜教他們抹漆的那些小孩。

他兴致很高地跑到楼下院子里去了十几次，和管理員噉噉嚙嚙不知講了些什么，又拍拍罗莎莉·納烏莫芙娜的肩膀，最后竟对她发起脾气来了，因为她坚持要把貝尔塔就这样穿着未縫的被单作成的寿衣埋葬。

“被单可以換一換，”他大声喊道，“她根本用不着这些东西。頂多过两天就会被人从身上剝掉的。”

我赶走了他，并向罗莎莉·納烏莫芙娜說，一切都按她的要求办。

一大清早，碎小坚硬的雪花旋卷飞舞着，仿佛是着急似的突然落在地上。羅馬紹夫和几个孩子在墙壁間拥拥挤挤，在楼梯間拙笨地轉弯，好歹把棺材抬出来放在院子里的雪車上。我本来想給孩子們一点錢，可是羅馬紹夫說，他和他們講定是用面包来支付的。

“孩子們，每人先借支一百公分，好不好？”他很开心地說道。

孩子們看也沒有看他，都同意了。

“卡佳，您要上楼嗎？”他繼續說道。“劳駕，面包在軍大衣里，請您拿下来。”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面包放在大衣里，大概，是害怕罗莎莉·納烏莫芙娜或者刚才那个犹太人看見。軍大衣挂在前厅，他已經穿了很久的短皮袄了。

我走上楼，記得在楼梯上还考虑了一下，是不是應該加点

兒衣服。从昨天晚上起，我就感到身上有点兒发冷。也許最好还是不要到墓地上去，因为到那兒足有七公里。但我怕如果我不去，罗莎莉·納烏莫芙娜会倒在路上。

軍大衣口袋里放着一块用紙包着的面包，我伸手去取面包时，发现口袋里还有一个柔軟的小包。小包掉在地上，前厅里光綫很暗，我打开通楼梯的房門，想把它撿起来。这是一个黃色的鹿皮烟袋；我們寄到前綫去的慰問品中就有这种烟袋。我躊躇了一下，便把它打开了；里面装着一张对折的画片，还有几个戒指。我嫌恶地想道：“又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搞来的。画片原来是一张照片，已經非常破旧，揉搓得很不平整，反面的題字因为褪了色，变得十分模糊，所以很难辨認。我本打算把这张相片放回烟袋里去了，但一种奇怪的感觉阻止了我。我好象覺得我曾經見過这张相片。

楼梯口比較明亮。我走出去站在那兒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辨認着：“永远作……”一道白色的强烈的光綫在我眼前一閃，直射在我的心上。照片上写的是：“永远作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我不知道自己后来怎么样了。我喊叫了一声，后来便发现我坐在楼梯口上，用手摸来摸去到处寻找这张相片。我透过眼前的黑霧，念完了相片上面的題字，認出了这是戴着一頂飞行帽，使得他酷似一个女人的契同志，这是生着一张寬大的山鷹般的脸膛，在低垂的眉毛下面有一双善良，忧郁的眼睛的契同志。这是薩尼亚无时无刻不带身上的契同志的相片。尽管我多少次对他說，相片放在口袋里会揉搓坏的，應該用玻璃框鑲起来摆在桌子上，可是他仍然把这张相片和文件一同放在皮夹子里带在身上。

我发疯似的奔回前厅，从衣架上把軍大衣扯下来，扔到楼梯

口上，把所有的口袋都翻了一遍。薩尼亞死了，被害死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找什么东西。羅馬紹夫杀死了他。另外一个口袋里放着一些錢，我把它揉成一团从楼梯縫里扔了下去。他害死了他，拿走了这张相片。我没有哭。他偷走了証件和相片，偷走了所有的文件，也許还偷走了奖章，为的是不讓任何人認出树林中的死人，这具尸首是薩尼亞。我心里面好象听见有人在說“是同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一起放在图囊里”，并且好象有人在羅馬紹夫說的每一个字前面都点上了一盞灯，照得通亮。

这张相片是放在图囊里的。其它的文件和“紅鷹”报也放在图囊里，不过这些文件都湿透了，丢掉了；本来羅馬紹夫自己就說过：“报纸湿成了一团”。可是相片却保存下来了，也可能是因为薩尼亞总是用描图紙包着带在身上的关系吧。

楼下传来了人声，这是罗莎莉·納烏莫芙娜在喊我。我把相片藏在怀里，把烟袋放回軍大衣口袋里去，將軍大衣挂回原来的地方，便走下楼来，把面包交給羅馬紹夫。

他問道：

“您怎么啦？不舒服嗎？”

我回答說：

“不，我很好。”

什么也不存在了。人們仿佛是在一个可怕的，迟緩的噩梦中慢慢地往前迈脚步，在那空蕩蕩的，一点声息也沒有的街道上默默地走着，这些街道不存在了。結滿了冰的电車陷在街道中間，車頂就好象乡村房舍的屋頂一般，挂着厚厚的雪檐，这些电车不存在了。一个矮小的，象嬰兒般用襁布包裹着身体的人躺在雪車上，窄窄的車轍並沒有离我們越去越远；直到这时，我才想起羅馬紹夫吩咐过不用棺材，因为雪車上擱不下。

“没关系，我們以后把它卖了，”他說道。

罗莎莉·納烏莫芙娜大概也是发疯了，因为她也說什么照規矩就應該这样不要棺材的。我刚一想这些事，立刻又忘了。沿普式卡尔斯卡娅大街修的一条小路非常狹窄，两个人都轉不开身，一个脸盘很小，但长相很大的女孩子退到雪地里，給我們讓路。还有一个用細繩拴着皮包挂在肩上的男人，穿着一件宽大的外套怪里怪气地晃晃蕩蕩着走了过去。我看过他們，也立刻忘記了。我什么都看見了：寂然无声，被大雪盖起来的街道；用布裹着躺在雪車上的尸体；路那一边还有一个女人在运送尸体，她走不多远便停一会儿，終于落在后面了。白茫茫的沉沒在雪海中的冰冻了的都市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就象是一些影子无声无息，不留痕迹地在玻璃上滑过似的。

我还看到了另外一幅痛心的景象：薩尼亚伸着两腿，腿上纏着污脏的、被血染黃了的綑带，脸朝下趴在地上，凶手站在他身旁。在潮湿的小白楊树林里就只有他們两个人！

15 願我的爱情拯救你

犹太教的墓地离得太远，沒法子去，所以罗莎莉·納烏莫芙娜决定把她的姐姐安葬在斯摩棱斯克公墓。替貝尔塔念經祈祷的那个愁眉苦脸的犹太人收了六百公分面包之后，便同意护送他的“被保护人”到正教墓地，照他說这也是按規矩办事的。

十二月里天黑得很早，送葬的事从清晨忙到傍晚，忙了整整一天；我現在已經不大記得当时的情形了。我的眼前仿佛是在放映一部无声影片。一种如梦的感觉随着影片忽而到来，忽而

又隱沒在华西列夫島的雪地里。

我們走着，除了寒冷、疲勞和對那僵硬的尸體的嫌惡之外，什麼也沒有感覺到。孩子們兩個人一班輪流拖着貝爾塔往山上爬。到下坡的地方，屍體自己慌慌忙忙滾了下去，仿佛想趕快使我們擺脫這些並非出自她本意給我們帶來的煩人的勞頓。

綁在屍體上的鐵鍬在陽光下閃閃發光。不知道為什麼，我看到這種閃光竟想起了克里米亞和海洋的風光。我們在克里米亞生活得多么愜意！薩尼亞總是在五點鐘起床。如果我知道他要作高空飛行時，就給他作一餐清淡的早點。我們買了一個“標準”牌的淋浴器；我把洗澡的一切事情都調理好，安排妥當，薩尼亞洗了淋浴以後，穿着一件黃條紋的睡衣坐在桌邊。有一次，我們到塞瓦斯托波爾去，海上的風浪很大，天氣陰沉沉的；飛行員總是在天氣最不宜人的時候休假。我感到十分掃興，可是薩尼亞說道：“沒關係，我給你安排好天氣。”果然，汽船刚一離岸，天氣立刻就變得好極了。

我穿着一件白色的連衣裙，和他一起站在潔白、華麗的甲板上，邊談邊笑，竭力使自己顯得更漂亮，因為我知道他喜歡看見別人贊美我！這時我是多么快樂，多么輕鬆啊！不管你把眼光投到哪兒去，投到船長室的銅欄杆上去，投到被風吹得向後仰的浪峰上去，投到戲水的海鷗濕潤的翅膀上去，——在所有的地方，太陽都閃耀着奪目的光芒。

……我蜷縮着身子，臉上凍得發青，用手摻扶着步履艱難的羅莎莉·納烏莫芙娜，——她穿得實在太厚了，——一步一顛地跟在雪車後面。雪車時而距我們很遠，時而又因孩子們停下來抽煙，距離我們很近。我和她完全一樣，我們兩個人都是同樣可憐的老太婆了。羅馬紹夫大概也有同樣的感覺，所以他追上了

我們時，很生氣地說道：

“卡佳，您為什麼要來？您會感冒，病倒的。趕快回家去吧。”

我看了他一眼：這個人好好的什麼事也沒有嘛，那他為什麼說這種混賬話。他身上穿着一件結實的白色短皮袄，皮帶交叉扎着，腰上挂着槍套。這是個活人！我張着嘴呼吸。這是個健康的人！我彎下腰抓了一點兒雪放在口里。綁在屍體上的鐵鏈一直在閃閃發光，我對着這催眠的閃光，始終不停地看了又看。

墓地到了。我們在一間狹小污穢的辦公室裡等候了很久。在一道道用麻屑填過的牆縫裡掛滿了霜。一個臃腫的女辦事員坐在小鐵爐旁邊，將兩只纏滿了破布的肥腳湊到爐火跟前。羅馬紹夫為了一點什麼事情正在斥責她。後來有人來喊我們，說坟墓挖好了。孩子們拄着鐵鏈，站在一個混有雪塊的土堆上。他們本來就沒有打算把可憐的貝爾塔往深裡埋葬！羅馬紹夫打發他們去抬屍體，屍體已運來了。高個子的，愁眉苦臉的猶太人走在雪車後面，不斷地命令停下來念一遍短短的禱告文。羅馬紹夫在雪地上擺好繩子，很俐落地提起死尸，一脚把雪車蹬開。現在貝爾塔躺在繩索上了。羅莎莉·納烏莫芙娜最後一次吻別了她的姐姐。猶太人象一只衰老憂傷的鳥兒忽而用令人意想不到的重音高聲吟唱，忽而又低聲叨念……

我們回到辦公室裡去烤火，我們是指的我和羅馬紹夫。他拍拍口袋，向我作了一個暗示，等大家向門口走去的時候，我們便走進辦公室裡去烤火。

“喝點嗎？”

啊！我的心開始燃燒起來了，急速地跳動，一股股的热流通過了四肢！我感到一陣燥熱，解开衣扣，摘去了頭巾；我拖着兩條腿飄飄然，悠悠然在辦公室裡走來走去。

“还来一杯嗎？”

那个皮肉松弛的女人貪婪地瞧着我們，我讓羅馬紹夫也給她斟一杯。他倒酒的时候，心里大概在想：“他媽的，豁出来了！”他兴致勃勃，脸色蒼白，耳朵通紅，遮耳帽很神气地推在后脑勺上。我也很高兴，我从桌子上拿起一块黑漆墓碑递给羅馬紹夫，跟他开玩笑說：

“这是給您准备的。”

他笑嘻嘻地說：

“您現在又变成从前那个卡佳了！”

“总之不是您的！”

他湊到我跟前，拉起我的双手。他的嘴巴开始颤抖，露出了两排細小得象孩子的牙齿。說也奇怪，我以前从沒有发现他的牙齿这样尖利，細小。

“不，是我的，”他声音嘶哑地說道。

我把右手从他手中掙脫出来。这时我看見窗台上放着一把錘子，——大概是用来釘十字架上的牌子的。我不慌不忙地拿起了窗台上的这把虽不很大，但却相当沉重的鉄柄錘子……

要是击中太阳穴的話，我这一下子可能就把羅馬紹夫砸死了。但是他往后一閃，錘子从旁边擦了过去，只把顴骨砸伤了一点兒。屋子里的那个女人吓得跳了起来，尖叫着向門厅奔去。羅馬紹夫追上她，把她拉了回来，砰地一声关上了門。然后就向我走过来。

“放开我！”我厌恶地拚命喊道。“您是杀人的凶手，您杀害了薩尼亚。”

他一句話不說。顴骨被砍伤了的地方不断地流着血，他用手擦掉，甩在地板上，但血仍然不住地流，滴在肩上，胸膛上，整

个短皮袄都沾满了粘湿的殷红的血迹。

“应该把血止住，”他没有看我，自己嘟囔道。“卡佳，您能不能找到一条干净手绢？”

“好吧，就算是我害死了他，那么我为什么还要保存这张相片呢？我们本来想把那些文件埋起来，当时萨尼亚手里捏着这些文件，大概相片已经丢掉了。我恐怕您不相信我，所以没敢对您说找到了这张相片。我的天哪，您简直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我竟能杀死一个自己人，这简直是一种神经错乱的想法！不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管我和他的关系如何！杀死一个受伤的人，卡佳！这是梦话，是谁也不会相信的！”

“谁也不会相信的”，罗马绍夫把这句话反来复去说了好几遍。他害怕我把自己的怀疑写信给军事法庭或检查长控告他，他把身上的钱和面包统统都给了墓地的女办事员。我听见他对她说：“不准对任何人说出一个字。”他没有去医院，罗莎莉·纳乌莫芙娜帮他止住了血，用一张膏药贴住了他颧骨上那块很大的伤口。

“是的，我不喜欢他，这是事实，我也不想隐瞒，”罗马绍夫继续说道，“可是当我在肮脏的暖车里发现了他，看见他的腿打坏了，看见他头边放着一支手枪时，我想到的不是他，而是您。他看到我以后那样高兴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知道我就是他的救星。当我去找人来抬他时，他就不知到哪儿去了，这并不是我的过失！”

他在小厨房里跑来跑去，一面跑，一面说……他用手抱着头，此时，墙上那个随着他东奔西窜的影子无声无息地长成了两个大鼻子的怪物。我回忆起了久已忘怀的，儿时的景象，似

乎隱約聽見了媽媽的聲音：“看，一只老牛”。我睡在小床上，媽媽坐在我身邊把手摯在牆壁前面，她笑我不去看牆上的影子，只顧看她的手。“看，一只長鬍子的山羊”……我的眼濕潤了，但我並沒有擦眼淚，因為從這一大堆被子，大衣，老狐皮套筒中把手伸出來實在是太冷了。

“真是命該如此，會在列車上碰見他！我可以殺死他，從暖車里每天都要抬出幾個死尸去。如果這個已經被人宣告失蹤的，想要自殺的飛行員第二天被人發現他的腦袋已經打碎了的，誰也不會感到驚訝的！但我不能殺死他，”羅馬紹夫大聲喊叫了起來，“因為這樣作的話，那麼被打碎了腦袋躺在那兒的人第二天就可能是您！在他問那個姑娘叫什麼名字，姑娘回答說叫‘卡佳’的時候，他頓時喜笑顏開。從這次事情上我明白了這個道理。我認識到自己盼望他死的思想，用他的生命來換取幸福的想法在他的面前顯得多么卑鄙，多么渺小。所以我決定為了您盡一切力量來救他。而現在，您居然敢咬定說我殺死了他！沒有，”羅馬紹夫鄭重地說道，“我用把我生到這不幸與痛苦的世界中的母親來起誓！用最神聖的東西——我對您的愛情來起誓！假如他真是犧牲了的話，那我無論在哪一方面，對他的死亡都是絲毫沒有過錯的！”

他想要扣上短皮袄，可是手在發抖，總扣不到扣孔里去。

如果我能够，如果我还敢再一次地相信他的話那該多好啊！但我無動于衷地望着他那張憔悴的，眼睛不自然地深深陷下去的面孔，望着他那披散在前額上的亂蓬蓬的黃頭髮，望着那塊使得他的腮頰變歪了，變得緊綳綳的難看的膏藥。

“滾出去。”

“您身體不舒服，還是讓我留在这兒吧。”

“滾出去。”

我不知道他以前哭过沒有。但当他跪下，把头埋在床上不肯起来，渾身抽动着，神經質地抽泣时，他的脸上淌滿了眼泪。“薩尼亚还活着，”我忽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幸福的感觉使得我的心突地跳了起来，又突地停止了跳动。“跪在我面前的这个家伙也許不是人，而是一个惡魔？不，不，要假装成这付模样是不可能的，是难以想象的”。

“滾出去！”

我不知道要赶他到哪儿去，他住在我們这兒已經快一个月了。不知道为什么，罗莎莉·納烏莫芙娜还替他报了戶口。这时正是夜間，而且是有警报的时候。但他还是走了，屋子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微時計“滴一嗒”地响着。記得有人对我說过，只有在列宁格勒发警报的时候才广播微時計的敲击声。玻璃抖动的时候，桌上放着的那盞无罩小煤油灯的黃色火苗也随着抖动。在潮湿的小白楊树林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蜷縮在皮大衣、被子、老狐皮套筒里，沒有听見解除警报的声音。警报解除了，但又开始发了。“滴一嗒，滴一嗒，”微時計的声音响了起来。“相信他呢，还是不相信呢。”

冬夜，在飢餓的城市里，在一間寒冷的屋子里，在一盞光綫很弱，正在同来自屋角落的暗影作斗争的，小煤油灯的黃色灯光微微照亮的小厨房里，这是心兒在叩击，这是心兒在祈祷。願我的爱情拯救你！願我的希望保佑你！讓爱情和希望飞到你的身旁，看看你的眼睛，把生命呼入你那僵硬的嘴唇里！把脸紧貼在你腿上沾滿了血污的綑帶上。告訴你：这是我，是你的卡佳！無論你是在天涯，还是在海角，我都要来到你身旁。不論你发生了

什么意外，我都要和你相守在一起。誰要是幫助了你，支持过你，給你水喝，喂你飯吃，那她也就是我——是你的卡佳。如果死神降临到你的头上，你再沒有力量来和死神搏斗，这时在你的心中哪怕只有最后的一滴点兒最微小的力量——那也就是我，我一定要把你救活。

16 再見吧，列宁格勒！

一九四二年一月，我被送出了列宁格勒。我的身体极度衰弱，医生不准我乘坐軍用列車，所以瓦丽亚便設法讓我坐飞机走了。

临行前的头一天，分組病院給我来了一个电话，說司考伏罗得尼可夫中尉負伤了，托他們向我問好。

“您是他的妹妹嗎？”

“是的，”我声音顫抖地回答道。“伤很重嗎？”

“不怎么样。他希望能見到您。”

我本来想去一趟，但瓦丽亚不讓我去。她这次作得很对，要不然我一定会死在路上的。在我身上，生命的呼吸是那樣的微弱，勉强可以听到它跃动的声音，而医院又是那么遙远，远在华西列夫斯基島上，仿佛是在世界的另一端！瓦丽亚希图能把彼加轉到軍医学院来，当然不是轉到“口腔医院”，——他的伤在胸部和左臂上，——而是到外科去。但这兒离口腔医院很近。她答应我，她要每天去看望他，总而言之，要关心他的健康。毫無疑問，她当时并沒料想到，使这个諾言兌現，不仅对于彼加，就是对她自己說来也是很重要的。

仿佛是在一个易于惊觉的，飘然远逝的梦中。我模模糊糊記得一幢高大的木結構建築物。是机庫嗎？我夾在許多和我一樣包裹得緊緊的，默不作聲的人們中間，在這幢建築物的地板上坐了許久。後來，我們被人領着經過一片潔淨的雪地，穿過一條狹窄的小徑到一個什麼地方去。路旁有許多很深很深的炮彈坑，坑里亂七八糟堆着被毀坏的飛機殘骸。路旁還有一些沒有被積雪完全掩蓋起來的粉紅色的小丘，我當時沒有立即猜想到這是用飛機運到列寧格勒來的牛肉。後來我們便扶着那搖搖晃晃的鐵梯子登上了飛機。飛機里空空的，冷清清的，兩邊各放着一排光禿禿的條凳，一挺揭開了透明的槍罩的機關槍支在槍架上。

一切經過的情形就是如此。一位滿臉怒氣，穿着飛行皮靴的小矮個兒飛行員走進了機艙。發動機嗡嗡地吼叫起來，對世事漠不關心的，光輝燦爛的田野晃動了一下，忽左忽右地在兩旁閃現。這時我清醒過來了。再見吧，列寧格勒！

我現在飛行在拉多牙湖上空。再過幾天，第一批車輛就將載着列寧格勒的難民經過這裡向“大陸”駛去，然後又滿載着麵包和面粉回到列寧格勒。這一帶到處豎立着標杆，標幟着“生命的道路”，人們在深可沒胸的雪地里工作着。

我飛翔在一場偉大戰爭的地图上，在我的飛機駕駛盤前坐着的已不是那個滿面怒容，穿毛皮靴的小個兒飛行員，而是“時間之神”親自坐在那里駕駛飛機。

時間總是往前看的。在它的眼前展開着一付雄偉驚人的畫面。許多被拆卸成零散部分的大工廠的車間，沿着連綿不斷的交通干綫絡繹不絕地向東開去。披復了一層雪的車床不斷地往前運送着，要運完它們似乎需要好多年。積雪雖然還沒有開始融化，冬天的太陽還十分吝嗇自己的熱量。可是在那荒無人煙的

草原上，在那过去只有带棚馬車慢騰騰走过了一个帐幕又一个帐幕的地方，在那牛羊群曾經徘徊过，哥薩克的老牧人弹过自制的冬布拉的地方，如今聳立着高楼大厦，并且一天比一天修得更高。我們的祖国被人向后推了一步，現在正屏住气息，鼓足勁兒准备跃向前去……

我被送到雅罗斯拉夫的“列宁格勒”病房时已經奄奄一息了。这兒住着一些非常文靜的人，他們竭力不想吃飯的問題。医生囑咐不要耽心吃飯問題；他們把那些不相信的人帶到食品仓库里去看。仓库里装得滿滿的！

姥姥在医院里找到了我，也可以說沒有找到我。她犹豫不决地站在門口，用眼睛扫視着病房，她看着我，却没有認出是我。我觉得好笑，招呼了她一声，心里感到又是高兴，又是辛酸……

前进，前进！过了白天是黑夜，过了黑夜又是白天。然而白天和黑夜早已混合在一起，連太阳自己似乎也不知道它應該在什么时候，在几点鐘，在这动荡的大地上升起来。

一个德国兵士趴在雪地上，两条僵硬的大腿伸在雪堆外面。他用手拚命抓着异邦的泥土，嘴里填滿了异邦的泥土，他仿佛是想把泥土吞下去因而窒息死了。

一个俄罗斯兵士跃起往前冲锋，举起了手榴弹，就在这頃刻間，一顆致命的子弹打中了他的心房。他靠在一棵松树上，就这样冻僵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里了。他驕傲地仰着头，充滿了因战斗的鼓舞而掀起的忘我的激情，站在那兒儼若是一座冰雕的塑象。

这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

但这是一个举世难忘的冬天。在苏維埃联盟辽阔无边的土

地上，新的力量开始呼吸了，象一阵风吹进了“列宁格勒”病房。心兒又重新燃烧起来，生命在輕敲，在呼喚，不由使人产生了恼恨自己，恼恨自己的沒有作为和身体的虛弱，这种恼恨的心情煎磨和激动着我們的灵魂……

三月里我便出院了。姥姥領着我上車站去。路旁融雪汇成小溪在太阳光下奔流閃耀，清新的空气，街上的人群和車輛来来往往地閃过，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头晕。我們到膿谷村去。

我过去还以为孩子們在一个村名这样不吉利的地方生活得不会很好，現在看来我的这种顧慮是多余的！孩子們在這兒生活得很好。小彼加长大了，长結实了，完全成了一个农村里的孩子，鼻子上被太阳晒掉了一层皮，晒得油黑油黑的小腿上已长出了細細的金黃色的汗毛。

我当着別的孩子面前吻他时，他已經会不好意思了。他現在正在集邮。他已經知道輕視那个好哭的，动不动就“告”媽媽的維其加·柯杰尔可夫。他和爸爸經常通信，說也奇怪，爸爸总是代一位名叫瓦丽亚的阿姨向他問好。

“她年紀很大嗎？”

“不，很年輕。”

“她問好干什么？想和我交朋友嗎？”

“大概是吧……”

村里的墓地在一片高高的山坡上，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从老远就可以看見墓場上的十字架和五角星。我們在墓地和道路間的洼地上游玩。洼地后面，是一望无际的，顏色深浅不一的綠油油的田野。我們站在一片野生的复盆子丛蔭里。

“媽媽死的时候，不是也很年輕嗎？”

“是很年輕。”

他在揪嫩草，一只金龟子正在草莖上爬，忽然一下飞去了。

他在想什么心事呢？

“薩尼亞舅舅象媽媽嗎？”

“象極啦！”

他怯生生地望着我，撫摸着，亲吻着我的手。我哭了，眼淚落在他那被太陽晒爆了皮的鼻子上。我們倆偎抱着，默默地坐在野生復盆子叢里，那攞走了薩尼亞生命的，可惡的，冷酷无情的死神斜吊着眼坐在不遠的地方。

前進，前進！既不回顧，也不緬懷過去……

一九四二年夏天，藝術珍品收藏所的兒童營轉移到新西伯利亞去了。我回到黯淡淒慘的莫斯科，屋頂上架着高射炮，廣場上畫着假屋頂。

經過一年的戰爭，地下鐵道仍然是那麼干淨，那麼新，絲毫也沒有變樣。在果戈理林蔭道上，仍然有一群群的孩子和保姆在散步。在西夫切夫·符拉什克胡同里，雖說是新修了兩座房子，居高臨下俯視着它們周圍那些脫落了油漆、又老又舊的鄰居，但這仍然是先前那條彎彎曲曲的，狹窄的，可親的胡同。一道熟悉的肮臟的樓梯出現在眼前。門口的銅牌上寫着：“瓦連金·尼古拉耶維奇·朱可夫教授”。啊，成了教授了！這倒是件新鮮事兒！我按了按電鈴，敲了敲門！門開了。一位戴着眼鏡，留有鬍子的軍人站在門口。

自然我立刻就認出了他。除了他還有誰會帶着這樣猶疑不定，客客氣氣的神情注視着我呢？我問他：

“瓦連金·尼古拉耶維奇·朱可夫教授住在這兒嗎？”

除了他还有誰会这样可笑地歪着头，眨着眼睛呢？除了他还有誰能这样震破人耳朵地狂叫，向我扑过来，笨拙地在我耳朵上乱吻呢？并且还踩了我的脚，痛得我忍不住叫喊起来。

“卡佳，亲爱的，我太高兴了！真想不到你找到了我！”

他接过我的箱子，我們便自然而然地向那曾經是書房，同时又是餐厅兼兒童臥室的“外厨房”走去。我的天哪，这间古老舒适的厨房現在弄成什么样子了！桌上放着籃子，籃子里面盛稀粥，地板沒有打扫，窗戶上挂着破破烂烂的蓝紙片……

瓦里亚握住了我的手。

“我全都知道，全都知道了。”他脸上的肌肉颤动了一下，眼鏡下的眼睛深深眯縫了起来。“亲爱的薩尼亚，亲爱的朋友……不过还有希望。伊万·巴甫雷奇把你的信讀給我听了，我們和一位上校商量过，他也說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回来了。”

我說：“是呀，很多人。”接着他又把我拥抱起来。

“我哪兒也不放你去，”他决然說道。“房子完全空着。你在这兒会很舒服的。伊万·巴甫雷奇說你要来，我已經稍微收拾了一下。还需要刷洗刷洗，对不对？”他躊躇不决地問道。

我忍不住笑了，他坐在床上，也笑了起来。

“說老实话，現在的确沒有時間。我差不多沒有在这兒住，全部時間都在前綫上。不过冬天这里很不錯。因为研究所里太冷，所以一到冬天，我就把动物都搬到自己家里来。”

自然，他不可能把所有的动物都搬来，他拿来的只是一些貴重的品种。这真是一个好主意，因为有只罕見的外国种家鼠以前怎么样也不肯生小老鼠，可是到了瓦里亚家里却生育了；由此可見家庭环境对于家鼠有多大的影响。屋子里的家具都被瓦里亚烧光了。其实这倒也好，要不然，讓琪拉看見这些“貴重品种”

把家具糟踏成那个样子，毫无疑问，她一定会很生气的。

“不过必需的家具中，我只烧了一张厨房里用的桌子，”瓦里亚有点顾虑地说道，“所以说，最主要的东西还是保存着的。你看，这是椅子，这是琪拉最心爱的小柜，还有门帘等等。”

这些野兽到春天就回到研究所去了，这时，瓦里亚也取得了大尉军衔，开始在军医部工作。我问他，前线有谁需要他和他的那些啮齿动物。他一本正经地说道：

“这可是军事秘密。”

总而言之，一切都很好。唯一不如意的是他去年冬天用电超过了“该死的限度”，电灯公司干脆派了人来把电线割断了，因此现在就没有亮了。不过幸好现在白天长了，瓦里亚夜里工作就靠着一盏酒精灯，这可真是一件好东西！

“可以在这个灯上烧水吗？”

瓦里亚不知所措地看了看我。

“天哪，我真是个傻瓜！”他叫道。“你远道来了，我连茶都没有请你喝。”

“不，我要多用些水，”我说道，“需要很多水。你有桶吗？”

当我脱去鞋袜，撩起裙子，拿着湿抹布开始打扫卫生时，他只是在一旁自怨自艾地唉声叹气。

他用手指揉擦着鼻子，惊讶地看着我从床底下掏出许多马铃薯皮，看着我撕去窗户上的脏纸，看着地板上堆成了小山的发霉的面包。

我光着脚，撩着裙子站在桌上，用绑在笤把上的湿抹布正在扫墙上的蜘蛛网。这时，有人在外面敲门，瓦里亚提起满盛污水的水桶向前厅跑去。

我听见他对一个人低声地说：“还好，很能控制自己。好样

的，太好了。”再就什么也沒有聽見了。

一个碩長的身影在敞開着的門外閃了一下。他摘掉帽子，放下手杖，掏出梳子站在鏡子前梳了梳花白鬍子。这个人从門外走進來了，他停下脚步，驚訝地凝視着我。

“伊万·巴甫雷奇，亲爱的！”

我們一直保持着通信关系，所以他知道我最近要來，因此，他在瓦里亚家里碰見我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可是我还是感覺到这样的會見似乎只是在夢中才能有，只是在夢中才能撲在一起互相擁抱。我們忍不住地哭了起來；他也一陣心酸，歔歔起來，伸手往口袋里去掏手絹。

“为什么不到我那兒去呢？”他有点生氣地問道，不住地擦着眼睛和鬍子。

“伊万·巴甫雷奇，我今天就準備去的！”

我站在敞開的衣櫃門後面換衣服，我們談着，沒有止境地談着，談我坐飛機的情形，談我害病的情形，談列寧格勒的封鎖，談我們在莫斯科近郊的進攻……現在已經看得出伊万·巴甫雷奇是老多了，他那高大的前額上滿布着皺紋，臉上出現了上年紀的人所特有的不均勻的紅色。不過他的外表還是那樣端正，文雅。

我們上一次見面是在一九四〇年。可是我的天哪，這象是多久以前的事了！有一次，我和薩尼亞突然想念起這個老头來了，於是便帶了一個大蛋糕和法國葡萄酒，跑到公園凱旋路他那冷冷清清的單身寓所里去找他。那一回他是多么滿意啊！他津津有味地喝着葡萄酒，和薩尼亞回憶起格里沙·法伯爾，以及悲劇“時間到了”（在這個劇中，格里沙·法伯爾飾演主角——一個猶太人的養子），他們是多么開懷地暢笑啊！我們圍爐直坐到深夜。那時候真是另外一個天地，另外一個時代！

“我老啦，对不对？”他发现我总是在看他，便問道。

“我們都老啦，伊万·巴甫雷奇，亲爱的，你看我呢？”

他半晌沒有說話。过了一会兒，感伤地說道：

“你呀，卡佳，你是越长越象你母亲了……”

这时已經入夜了。瓦里亚点上了他的酒精灯，可是我們馬上就把它吹灭了；柔和的黄昏残照从胡同里射进来，在沒有防空帘子遮拦的，大开着的窗戶前坐一会兒真是再美也不过了！胡同里还是輕淡透亮的麻麻黑，而在瓦里亚家里，却完全是另一种室內独有的黑暗。黄昏不知不觉来临了，我看見的再不是伊万·巴甫雷奇，而是他那花白的鬍子，再不是瓦里亚，而是他那一轉脸时閃閃发亮的眼鏡。在这寂靜的頃刻間，我特別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生活在真正的、忠实的、生死之交的朋友当中。我暗暗对自己說道：“最艰苦的时期也許已經过去了，要不然，怎么这些人会这样地爱我？要不然，他們怎么会永远和我在一起，使生活变得更輕松，更美好呢？要不然，怎么会这样的恬靜，在昏暗中，这些善良可亲的花白鬍子看上去又那样模糊不清呢？”



第八部 奋斗和探求

薩尼亞·格利高里耶夫述

1 晨

卡佳靠着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坐在凉台上；我在睡梦中听见她们怕扰醒我而放低的谈话声。昨晚的情景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因为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来了，所以破例把餐桌搬到小花园里；我们等了她好半晌，最后她总算来了。她身上穿着一件一九〇八年式的带折边的新连衣裙，脚上穿着一双带钮扣的长脸儿皮鞋，她的样子很庄重，严肃。

她叙述尼古拉·安东内奇的女管家把脏鞋放在炉板上的故事多么有意思！她叙述尼古拉·安东内奇在高尔基大街领到一

套有四个房間，帶煤氣和暖氣設備的新房子后，坐着自備小汽車去看房子的情形時，臉上的表情多么生動！她學着尼古拉·安東內奇的腔調說道：“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請您隨便選一間吧。”然后又用自己原來的聲調，帶着自傲的表情回答道：“謝謝您，尼古拉·安東內奇，我是快入土的人了，誰的東西我也不要。”

我好象看到了一個老人坐在莫斯科一所精美的新住宅里，有電燈，新鮮空氣，煤氣和暖氣設備供他享用，但他卻寫一些顛倒是非的東西，把白的說成黑的，把黑的硬說成白的。

六點一刻，應該起床了。可是象這樣閉着眼睛躺着，听着卡佳在這座古老的別墅里走路的声音，和干燥的地板在她腳下發出來的輕微的軋軋聲，實在是太愜意了。她在房門邊站了一會兒，大概是听听我醒了沒有，後來大概又想了想，還是舍不得把我叫醒。她又到廚房去，對“科學保姆”說，今天用不着去市場了，反正我十點鐘就要走。

我的妻子啊！我們常年不在一起，我已經習慣了把她作為想象中的人物，即使她現在在我身邊，我也要在腦子里想她：她穿着一件綢料條紋罩衫，頭髮已經梳過了，說得更正確一些，也許她還沒有梳頭，只是倉促間草草地用發針把辮子綰住。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她這付樣子，而這也正是我所喜欢的樣子，正因為如此，所以那天早晨我非常高興。我們經常分離，以致每次別后，一切仿佛又從頭開始。

六點半了。她踮着腳尖走進來，吻了吻我。

“你都睡了一百年啦。去游泳嗎？”

“好不好啊？”

我是在問天氣好不好。

“很好。”

“那就去吧。”

“到河里去？”

距山坡下不远的地方便有一条小河，可是我們却喜欢在湖边游泳，所以尽管時間不多，我們还是到湖边去了。

仅仅說天气很好还不够，整个夏天也沒有这样美丽的早晨！太阳好象急于要尽快地把万物变得又灿烂，又壮丽。看吧，它已經把那边湖上的景物变得輝煌壮丽了，現在正以造物主宰的气概发射着万丈光芒向我們袭来。凝聚在小松树中間的白色夜霧，匆匆忙忙惊惶失措地消失了。

上个星期天我和彼加在乳牛洼溪上架設了一道桥，現在这桥就剩下一条楊木了；我从这条独木桥上跑过去，卡佳却是涉水过去的。天啊，在这刹那間她的样子我記得多么清楚！她微微提着衬裙，小心愉快地用脚試探着沙底走着，搭在肩上的毛巾掉了下来，她敏捷地在水面上把它接住了。

我們上了山坡，便向着古老的瑞典墓园走去，繞过墓园就是万頃晶波。矮矮的湖岸上綠柳成蔭，一个冻得渾身发青的赤膊孩子順着湖岸在拉网捕虾。真奇怪！哪有在七点多鐘就捕虾的呢？！

我把孩子連虾网一起从水里拉上来，向他簡短地講了一番捉虾的常識，特别是捉青虾的常識，告訴他这种虾最好用臭肉釣，卡佳听到笑了起来。这兒的虾一般都很小，恩斯克的虾那才真大哩！

太阳透过柳枝，把有些地方的砂子都晒烫了，砂地上微微冒着热气。柳树丛下是一片浓蔭，而在距岸边几公尺的湖上却是阳光普照。我和卡佳同平日一样向着太阳游去，把手抱在脑后躺在水里“晒”太阳……

为什么我要从这天早晨开始叙述我的故事呢？它和其它任何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并没有丝毫差别呀！那是因为旧日的生活在这天结束了，代之而来的是蓦然出现的，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它按照自己的意志支配着我，支配着卡佳，支配着我们的全部思想，感情和印象……

这另外的一种生活就是战争。若不是塔塔林诺夫船长和“圣·玛丽亚”号的历史，和我在战争中的遭遇又百般离奇地交织在一起，若不是这是完全不同的另外的一种生活，那么也许我就不会去写它了。

2 他

我注视着战争开始的头几天，头几个礼拜中所发生的情景，怀着一种因为无法将自己所见到的事情转述出来而产生的怪异的心情。

我看见的是一个宽大而黑暗的农村的房间，一支残烛黯然照耀着的桌子，一面用军用雨衣遮着的窗子。门开了，一个穿夏季军服的人敞着怀走了进来，他搗腾着炉子，狼吞虎咽地吃着东西，这人就是格利沙·特洛菲莫夫。从床上又站起来了一个人，和他并排坐在桌前，这人就是卢利。我听着他们低声的谈话，我的心剧烈地，缓慢地跳动了起来。

“到过拉多牙吗？”

格利沙一边吃着，默默地点了点头。

“喂，怎么样？”

“还不是那样。”

“茨万克呢？”

他沒有吭声，繼續吃东西。他到过茨万克。

两个列宁格勒人面面相覷地望着。这是列宁格勒被围后的第一个夜晚。

我看見我的飞机上豎着一根旗竿，机艙外飄揚着带字的旗子；我們就是用这种办法来支援那些誤以为自己被围得水泄不通的人們。

我看到了第一座坟墓；我們用炮弹的安定翼片和弹壳作成的鉄花来裝飾它。每次战斗飞行返航时，我們都尽可能低地从它上空掠过。

湖泊重又出現在我的眼前。旧日的生活在早晨蒙蒙的湖光中投下了最后的一个幻影。現在这湖显得十分阴郁凄惨。和湖岸一般高的湖水惨淡地发着光，暗蓝色的烟霧在湖水迷迷蒙蒙的鏡面上游动，这是德寇縱火烧掉的树林在燃烧。

傍晚，我們从山坡上的地下掩蔽部出来。柳蔭下停着几艘快艇，我們在浪花泡沫和汩汩的濺水声中，在幽暗的水面上急馳。飞机仿佛大海鳥一般从林垣里冲着我們游来。这儿是我們的三号 and 四号基地列湖。

我看見了許多事物。不过我所見的一切仿佛是发生在一幅地图上，它每天都展現在我的机翼下，——图上东一条西一条的画着战綫，德寇进攻的黑浪蔓延得愈来愈广了。

每天都有新飛行員来到部队，从民航局来的人愈来愈多；我和有些人还在北方共过事，和有的人是在远东一起工作过。他們都是些有經驗的駕駛員，很多人是一、二級飛行員，甚至还有三位“百万富翁”，意思就是飞行了一百万公里以上的飛行員；看到这些老百姓变成軍人，不断地出洋相时真是有趣得很。我們

經常談這些事，在食堂里，在軍官之家，在我和盧利及機械師三人居住的窑洞里，到處都談。我們之所以經常地談這些事，是因為我們之間有了默契，不談“別的事”。因為“別的事”有報紙代我們談。

八月里，我和我的空勤組調到南方戰綫空軍部隊中工作。

這是一個漆黑的夜，正如盧利所說的，是拉明城特有的夜。霏霏細雨變成了鉛黑的濃霧，一動也不動地籠罩在水面上。哪怕你把眼睛鼓得掉出來，也還是漆黑一团，什麼也看不見！要不是機械師猜到我迷失了方向，用手電筒給我照了一下，我一定找不到快艇了。

上校把我叫了過去，我們默默地站了一會兒；在黑暗中，我隱約地看到他那生着小翹鼻子，還十分年輕的，剛毅的面孔。這時實在是沒有什麼話可說，不過他還是詢問我帶了照明彈沒有，我回答說帶了。他問照明彈的事是表示客氣，因為我上次在飛行講評會上講過，使用照明彈可以大大提高夜間轟炸的準確性。

盧利的情緒顯然不很好，否則他也不致于把波長調整到那座泄氣的羅馬尼亞電台上去。我想起了在飛行前我叫醒他，他睜開眼睛，沒有認出是我時的那種樣子。他當時的臉色顯得非常疲勞，他平常愛引“您的翅膀”中的一句話：“如果你累了，最好先休息，再去飛行……”。今天他坐起來時，也沒有說這句他愛說的話。

岸邊的探照燈射出了一道亮光，緊追在我們的後面；迷迷蒙蒙的燈光在我們頭上乳白色的，無底的天空中忽兒出現，忽兒散失。這還不算十分倒楣。我們在大雪中飛行，雪花開始吹進了襟翼。

卢利现在找到“康士坦察”电台了，鬼才知道“康士坦察”广播一些什么玩意儿！在你吹吹口哨，想想心事的功夫，四周围已经升起了成团的黑压压的高山。等你再想一想心事，吹一吹口哨，又已经到了应该绕过山头的时候了。可是从云底下是鑽不过去的，因为在大雪中飞行，飞机上会结冰。吹吹口哨，又想想心事：“卡佳，瞧你还生气哩，埋怨我写信不把飞行的情况告诉你。”

云层正好在它不消没便不行的时候没有了。事实上云层并没有消没，而是向两旁分开。前面闪出了一条宽阔走廊，走廊上充满了瑰丽的，珍珠色的晨曦的霞光，我们的影子投在下面的云层上，可是在头上也有一个影子。这真奇怪，谁都知道宇宙间没有一种东西能同时投下两个影子的。我有些惊讶，不过可能也没有惊讶，因为我当时就猜到这第二个影子根本不是我们的，而是一架飞得比我们高得多的“密塞尔”飞机的影子。如果它真是一架那倒也还好。可是在它后面，象太阳光下的鱼儿似的，光闪闪地又出现了第二和第三架。

这时，无论按照什么规章条令来说，我们都应该尽快地避开它们。要不然我们也能逃掉，偏偏这时云层就象一座固定不动的暗蓝色的建筑物一般，远远地停在后面，使我们再没有地方可以躲藏。噠噠噠的声音响了，宛如小石子打在机翼上，溅到了座舱上……

这是一次最平常的，一点也不出色的战斗，同时战斗结束得也很快，所以我不准备叙述它的经过了。我们一下子就击落了一架“密塞尔”飞机；这是在它转弯的时候，它一直保持着转弯的姿势栽到地面去了。另外两架作了个急跃上升，气势凶凶地企图窜到我们的机尾后面。当然这也是个聪明的办法，不过不算

頂聰明，因為我們並不是那種肯讓別人咬住自己尾巴的人。他們進入一次沒有成功，又來了第二次，这回差点沒有落在我們的彈道綫上。總而言之，我們尽自己力量在回擊，敵機終於落到後面了。于是我駕着飛機保持直綫飛行，戰綫已經不遠了。

我駕着飛機保持直綫飛行。這句話說來很簡單，然而左機翼被削掉了四分之一，油箱打穿了，我的腿上和臉上都挂了花，殷紅的血不斷地往眼睛里流。

……我全身感到一陣異樣的虛弱。就在这當兒，我想起了童年時期常作的噩夢，有人要殺死我，淹死我，当我醒來時，却發現自己仍然活着，因此感到非常幸福。

“不過这一回，——这时的思想非常平靜，——这一回我可是再也不会醒了”。

我可能是失去了知覺，不過時間不久，因為還在知覺恢復以前，我似乎便已經開始說話，并且被自己的聲音驚醒了。我命令空勤組跳傘。報務員和空中射擊員跳下去了，可是盧利却滿心不願意地嘟囔着說道：“好吧，好吧！”仿佛是要他去作一次無聊的散步，他只是碍于我的情面才勉強答應似的。

……最困難的是和這彌天大霧作鬥爭，它使你睜不開眼睛，使你累得不得不放下手。我好象一千年中也難得戰勝一次這樣的濃霧似的，這時我才明白，雖然沒有完全明白，但最重要的一點，也就是立即需要加以糾正的一點已經明白了。時間久得象過了一千年——我費了很大的力氣把飛機脫出危險狀態，蹬着左舵勉力地飛行。又過了一千年——我看見在我們的飛機下面有兩架“容克”飛機，象兩只笨重的大公牛似的，不慌不忙地朝我們飛來。不消說，這一下是真完蛋了。可是，我一眼便看出他們甚至還不急於來結果我們。

卢利跳伞了，他们向他射击。他被打死了嗎？后来他们又掉转头，占据了两翼的位置，和我并排着飞行。

……德国鬼子长着一张什么样的面孔，是俊还是丑，是年老还是年轻呢？这对我来说都不相干：在我身旁飞行的不是兵士，而是杀人犯，不是兵士，而是恶棍。他赶到我的前面去，闪在一旁，然后又凑过来，观望着，不慌不忙地飞着，陶醉在自己唾手可得的胜利里。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解释，不过我觉得这当儿我的确看见了自己和他的形状了。我满脸鲜血，两手软弱无力地把着駕駛盘，坐在正在往下墜落的飞机上。他把飞行眼鏡推到額头上，带着冷酷的欣賞的姿态，和绝对控制了我的神色瞧着我。我忘记了卢利已经跳伞，而且可能已被他们屠杀了，我似乎还对他说了几句话。德国鬼子准备从我的飞机下飞过去，塗着黄色十字架的机翼出现在左方。我猛一压杆，蹬舵，駕着飞机对准这片机翼冲去。

不知道是撞在什么地方，大概是座舱上，所以德国鬼子連降落伞也没有来得及拉开。我杀死他了。多么幸福啊！

一个伟大壮烈的感觉支配着我。应该活下去！尽管刚才这个杀人的凶手回过头来，把眼鏡推到前額上，冷酷地等待着我死亡，可是我仍然战胜了他。我应该活下去！我在沒有碰见他之前倒是无所谓的，因为我負伤了，我知道他们会捉住我。可是现在却不一样了！我应该活下去！我看见地面了，田畴和飞揚着尘土的白色的道路，距地面已经很近了。

我身上的飞行服和皮靴烧着了，但我并不感到烫。说来也许是不可能的事，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能够在紧贴地面的高度上扭转了这个危局。我解开了皮带——这就是我在这天，这

个礼拜，这个月，这四个月中间最后所能作到的事。我們暂时就说到这里！不要跑得太远了吧。

3 能作到的事

他們用車子把我拉到村子里。我口渴极了，一路上都在要水喝，在打听卢利的情况。村里的人给了我一桶水，我一头扎在桶里，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地喝起来。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在周围看着我的妇女这时都放声哭起来了。我的脸烧坏了，头发粘在一起，一条腿折断了，背上有两条很宽很宽的伤口。我的样子可怕极了。

……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幸福的感觉，它逐渐扩展，逐渐强烈。我躺在农村大院子里的一间草棚旁边的干草堆上，我觉得这种幸福是从切草的声音，从干草味中，从那保护我，使我不会被人杀死的土地上传来。我是被一匹老迈的白马拉来的，它现在就拴在离我不远的木栅上；我一看见它，眼泪就随着幸福的感觉涌出来了。我們似乎已经作了自己所能够作到的一切。我并不担心报务员和空中射击员，我只要求在他們没来之前不要将我送走。“卢利也活着，”我兴奋地想道，“既然我們这一仗打得这样漂亮，他就不可能不活着。他活着，我马上就可以看到他了。”

我真的看见他了。当他被运到时，老白马打着响鼻，不住地蹦跳。一位严厉的老大娘——不知道为什么她是我所记得的唯一的一个人——走过去，一声不响地照准马脸捣了一拳。

他的脸色很安详，脸上也很完整，仅仅腮上有点擦伤，大

約是在着地时被降落伞拉伤的。他的眼睛睜着。我起初不明白为什么大家把他放到地上时都摘下帽子。刚才的那位老大娘坐到他身旁去，把他的手放好……

后来我就被放在一輛大車上，搖搖擺擺地送到卫生营去了。另外一位看样子不象是乡下的妇女，握住我的手摸脉，不住地招呼說：

“当心点，当心点。”

我感到納悶兒，心里想道：“干么当心点呢？难道我快死了嗎？”我大概是說出声来了，所以她才微笑着对我說道：

“您会活下去的。”

大車重又搖晃起来，不停地顛簸着，我的头靠在一个人的膝盖上。我看見卢利了，他躺在台阶上，两只僵硬的手交叉放着；我不顧一切地向他奔去，可是我被人阻止住了。

地面忽而在左机翼下，忽而在右机翼下升騰起来。在我的面前聚集着一些人，我在他們中間寻找我的卡佳。我呼喚她。可是从乱糟糟黑鴉鴉的人群中走出来的不是卡佳，不是在被我拥抱时表情变得严肃了的卡佳，这不是我的幸福，我的卡佳。这是他。他象一只怪鳥似的轉过头来，掀起眼鏡，以一种冷冷的聚精会神的样子凝視着我。

“喂，怎么样，”我对这个德国鬼子說道，“誰贏啦？你看，我現在还活着，我将要在森林上，在海洋上，原野上，在整个地球上飞翔！可是你这个凶手却已經报銷了！我战胜了你！”

4 “是你嗎，猫头鷹？”

我們乘坐的是暖車（安有火爐的貨車廂），只有前面兩節才是客車廂。一位面貌聰慧，神色疲倦的小个子医生在第一次巡視之后，便吩咐把我迁到客車車廂里去；从这一点看来，我的情况大概是很不妙。我的头，胸，腿，全身都捆扎着綳帶，象个白胖白胖的洋囡囡似的一动也不动地躺着。卫生員在我們車窗外的站台上談話：“到重伤号那兒去拿吧。”这么說来，我成了重伤号罗。可是不知是在什么地方，不知是在脑子里还是在心里有东西还在跳动着，我似乎觉得这是生命在跳动，在忙碌，并且用一双还是很軟弱，但却不肯放松的手在創造着什么东西。

我和邻近的人都熟識了。其中也有一名飛行員，他还很年輕，比我年輕得多。我不喜欢講自己是怎样負伤的，可是他却很願意講。我有好几次听着这年輕人的不大清楚的說話声，不住地打瞌睡。

“我刚退出攻击，便看見一群加油車。‘干掉这些油車吧’我心里想，于是瞄准了目标，一按电紐便打响了。‘行啦，’我心里想道，‘再不拉起来就要一家伙撞上去了’。我刚拉开飞机，这时便觉得有一个东西重重地打了我一下。我离开了这个地方，等我蹬舵的时候，觉得就象是沒有了脚似的。我暗想道：‘嘿，脚被打掉了。’可是我沒有往座艙里看，我害怕……”

他飞的是“海鷗”式飞机，在包魯尙一带挂的彩，我以为他的伤势比我重。后来我才知道正相反，我的伤比他重得多。

我的邻床名叫西瑪柯夫。我一面听着他講，一面望着車窗外

的秋天的原野，白色的土房，和铁路工房旁菜圃里沉甸甸的向日葵花头徐徐掠过去；这是一些短暂的、和平的景象。车厢里一切好象都很有次序；卫生员到时候就把一桶满满的菜汤提来，乒里乓啷地将桶放在地板上，吊床摇荡着，这就是说明我们在前进。尽管列车不时停下来，让那些载着武器开往前线的列车通过，因而走得很慢，但我们总是在前进。

不过也还有另外一些与此完全不同的景象！我们的列车并不只是军用卫生列车，在暖车后面还挂着平台车，上面载着许多机床，——这是我看到一次令人痛心的景象时才知道的。车上的厨房坏了，要等着到站之后才能买到牛奶和西红柿。小个子医生扯破喉咙地在喊叫，用手枪恫吓一个什么人。在客车的门梯上，缓冲器上，到处都坐着从乌曼，温尼察逃出来的妇女，她们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包袱坐着。正象一位卫生员说的那样，要把这些受了很大刺激，失去了一切，被痛苦折磨得麻木了的妇女轟下车去，真是“于心不忍”。

我们的军用卫生列车驶进一个铁路干线交织的庞大的铁路网之后，便再没有按照自己的使命行驶，而是同老百姓一起在撤退。

……窗外不断地飞进许多硬得象小石块似的大绿头蝇来；当我又因闷热和烦躁醒来时，看见它们钉在三天都没有换过一次的绷带上，无论怎样也赶不走它们。这时正是晌午时分，我们停在旷野里。从我的窗口望出去是一块四四方方的麦田，一个赤脚的小女孩提着一筐西红柿，从这块被践踏过的麦田里走出来；几个轻伤号便一齐向她奔去，她停了一下，然后撒开腿便往回里跑，把西红柿都丢掉了。

……仅仅几天以前，我还能从飞机上观看那些只在地面上

参加这次战争的人所不可能看到的场面，——我当时这样认为。那时候，我们撤退的情景在我的眼里就象是一列展开的代数公式。而现在，这些公式却成了有生命的东西，变成现实的事实了。

我现在再不是从六千公尺的高空来观看我们的撤退了！现在我自己也在撤退。我受着创伤，干渴，溽暑的熬煎，更加上一些不愉快的思想，就象是那些讨人厌的，嗡嗡叫着落在绷带上的，坚硬的绿头苍蝇一样，使人无法摆脱它们。

黄昏的时候，显然这时我们的列车已经开动了，因为我的“摇篮”很有节奏地随着车厢的运动在摇晃着。西下的太阳斜斜地照射在车窗上，在它那股红的光芒中，可以清楚地看见飞扬着尘埃，充满了碘酒味的浓浊的空气在浮动。有人在呻吟，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听了很使人心烦。这甚至不能说是呻吟，而是象一个蜂音器似的，从齿缝里发出单调的嗡嗡声音。我喊了邻床的人一声。不对，这不是他。我在什么地方听说过这种哭丧的声音呢？为什么我要这么尽力回想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听说过这种声音呢？

突然，在我的眼前摆上了一排排的书桌，我清清楚楚地看到许多活泼的儿童的笑脸。这是很有趣的一堂课，讲的是楚克奇人的风俗习惯。不过既然打了赌，既然那个两只眼睛隔得很宽的紅头发小孩子抓住我，狠心地用小刀割我的指头，那怎么还有心上课呢。

“罗马什卡！”我高声喊道。

他大吃了一惊，不再哼哼了。

“是你吗！猫头鹰？”

他在那些躺在地板上的伤员中间挤了很久，最后才从绑着绷带，翘在空中的人腿中间露出头来。

“怎么一回事？”他直冲着我看，沒有認出是誰，慎重地問道……

我覺得他雖然仍是達莎阿姨說的那樣“不會吃漂亮的虧”，但他現在比過去是多少象個人樣兒了。最低限度他從前那種矯揉做作的架子一點也不存在了。他現在形容憔悴，臉色慘白，耳朵象玩偶彼得魯什加的耳朵一樣向上翹着，左眼睛鬼鬼祟祟地斜着看人。

“認不出來了嗎？”

“認不出來了。”

“那末想一想吧。”

他一向就不善於隱藏自己的感情，這一回也是如此。他的種種感情有秩序地，或者更確切一點說，毫無秩序地流露在我的面前。先是困惑，繼而驚愕，隨後恐懼得牙齒打着哆嗦。又是困惑，最後是絕望。

“對不起，你不是已經被打死了嗎！”他喃喃地說道。

5 旧 恨

在古俄羅斯的歌子里常常提到命運。我雖然不是一個宿命論者，可是當我讀到“紅鷹”報上關於我自己的死訊時，在我的腦子里不由得出現了這個字眼兒。我還能背出這篇報導。

格利高里耶夫大尉駕駛着飛機，在執行戰鬥任務後返航時，被敵人的四架殲擊機追上。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激戰中，格利高里耶夫擊落敵機一架，其餘三架未敢戀戰，倉惶遁去。格利高里耶夫的飛機雖被擊傷，但仍堅持飛行，在距戰綫不遠的地方，他又遭到兩架

“容克”式飞机的攻击。格利高里耶夫駕駛着被火焰包围的飞机，成功地撞下了一架“容克”飞机。某部全体飛行員将永远紀念这些英勇的斯大林之鷹——为祖国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的共产党员格利高里耶夫大尉，领航員卢利，射击报务員卡尔宾科和空中射击員叶尔紹夫。

一直到一九四三年夏天，我才知道在我从列村刚被送走以后，便有一位軍事記者到了那兒。这位記者採訪了目击这次空战的农庄庄員，把飞机焚毀后的残骸拍了照。大家对他說我已經沒有救了。

为什么这篇报导会給我一种似乎是受了侮辱的感觉呢？是因为我这次死里逃生的确是一种奇迹，还是因为我生平第一遭讀到了自己的訃告呢。我的思想突然分散了。卡佳出現在我的面前，不是那个常常突然醒来在房間里走来走去思念着我的卡佳。而是另外一个心情忧伤，面容蒼老的卡佳。她讀完这篇报导后便把報紙往桌上一放，仿佛沒有发生什么事似的，臉部的神情木木的，还要找点兒什么事干，也許是編辮子，随后又把它解开，但突然間，她象个木偶似的倒在地上了……

“是的，”我說道。“这是常有的事。”

于是我把報紙捏成一团扔到窗外去了，羅馬紹夫惊叫了一声。火車这时正停着沒有动，在我們談話的时候，他不住地往窗外望。后来他又把这团報紙撿了回来；他現在已經亲眼看見我还活着，所以即便能看看報紙上說我已經死了的消息，显然也会給他一点快慰。

“这么說来，你还活着！亲爱的，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居然說什么“亲爱的”。

“鬼才知道，我多么高兴！这会是巧合嗎？会是同姓的人嗎？反正都一样！主要的是你活着。”

他开始問我伤在哪儿，伤势重不重，伤着骨头了沒有等等。在他听到我說伤势很輕，一位相識的医生把我安置在客車廂里之后，不禁又大失所望。

“不过我可以想象得到卡佳会怎样着急！”他說道。“因为她也可能看到这篇报导的。”

我說“是呀！很可能”，便开始問起他莫斯科的情形。羅馬紹夫在話里說到，他离开莫斯科还不到一个月。

和他談話的时候，不仅要用最和平的方式，而且从头一个字开始就要讓他明白我們之間的关系絲毫沒有改变；大概这就是我应该采取的态度。不过人是奇怪的动物，——这种說法已經不新鮮了。我望着他那张十分紧张的，白得很不自然的脸面，除了慣常的，甚而掺杂着某种幸灾乐祸的卑夷之外，我的心絲毫沒有动一动。在我的心目中，他过去是怎样一个坏蛋，自然現在还是怎样的一个坏蛋。不过这时他給我的感觉仿佛他是一个老早就熟悉了的，习惯了，所謂“自己家里的”坏蛋。

他也明白，一切都明白！他談起柯拉布略夫，問我知道不知道，老头虽然六十三岁了，可是还报名参加了民兵队，“莫斯科晚报”因此还登載了一篇报导呢。他又用一种譏諷的口气談到尼古拉·安东內奇，說他不仅領到新住宅，而且还获得了学位。什么学位呢？地理学博士。照羅馬紹夫看来，不經過論文答辯要获得学位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知道是誰使他飞黄騰达的嗎？”羅馬紹夫眼睛里放出光来，忿恨地說道。“就是你。”

“我？”

“对。他姓塔塔林諾夫，就是你使得这个姓出了名的。”

他想說我研究“圣·瑪丽亚”号探险队的工作最先引起了大家对塔塔林諾夫船长的注意，而尼古拉·安东內奇也就利用自己同姓这一点沾了光。羅馬紹夫的表达能力的确不錯，他把这一思想表达得再簡要，再明确不过了。

可是我偏不願意和他談这个問題。他明白到了这点之后，便又岔到別的話題上去了。

“你知道我在列宁格勒前綫碰見了誰嗎？”他說道。“遇見了巴甫洛夫中尉。”

“巴甫洛夫中尉是誰？”

“瞧你！他一再說，他从小就認識你。一个身材高大，肩膀寬闊的小伙子。”

可是我怎么也沒猜想到这个身材高大，肩膀寬闊的小伙子就是那个生着一双孩子气的蓝眼睛，喜欢写詩，曾經駕着卜西卡和托加两条狗拉的雪橇送过我的沃洛嘉。

“我的上帝，他的父亲是位老医生，曾經来看过他的！”

“伊万·伊万內奇！”

听到伊万·伊万內奇医生身体健康，并且还在艦队服务的消息，即使这个消息是从羅馬紹夫口里說出来的，我也感到高兴。他真是个好样兒的！

羅馬紹夫屡次說他到过列宁格勒前綫。卡佳也是留在列宁格勒，我真替她担心。不过要我向羅馬紹夫打听卡佳的消息，任憑怎样我也是不干的！

总而言之，現在，在他对我活着的这一事实已稍覺习惯了之后，就老想显示他自己。他似乎因为能在軍用卫生列車上遇見我，因为和我一样挂了彩等事而感到驕傲。

战争爆发时，他在列宁格勒科学研究所任行政副所长。他本来可以服役的，可是他沒有那样作；整个研究所沒有一个人不报名参加民兵队的。他在列宁格勒近郊負了伤，但仍然坚持留队。他的一个現在成了高級軍事首长的老上級把他調到了莫斯科。他接受了新的职务，还没有到职，火車在温尼察就被炸毀了。爆炸波把他冲到一根电綫杆子上，所以他現在整个左半身經常感到“难以忍受的酸痛”。

“你刚才听到的是我梦中发出的呻吟声，”他解释道。“連医生都不知道該对我怎么办，根本不知道。”

“喂，你現在該老老实实承認，”我严厉地說道，“你所說的哪些是謊話，哪些是眞事？”

“全是眞事！”

“不見得！”

“一点不假！我們需要勾心斗角的时期早已經过去了。”

他竟然說什么“我們”。

“老弟！現在一切都結束了。我过的是一种生活，你过的又是一种生活。我們現在还有什么可爭的呢？說来你又不肯相信，不过說老实话，回想起那些引起我們发生冲突的事来，我有时感到惊异。它比起我們眼前所发生的惊天动地的事件来，那真是太不足道了。”

“这还用說嗎！”

“那么关于这件事就算完結了吧！”

他帶着一种詢問的神情看了看我，显然还不敢相信我究竟是否同意把“这件事”就此完結。

不过我倒同意的。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哪兒还顧到这些旧恨呢？我受着痛苦的煎熬，时而想到那迫临我国的巨大的暗

影。現在它正緊緊地跟踪着我們，追趕着我們這列迷途的火車。象我這樣一個斷了腿的殘廢人在這個暗影面前是悲慘的，是無能為力的。我時而想到醫院里的情形：日子過了一天又一天，多么單調，仿佛永遠也沒個盡頭了，穿着軟底鞋的護士走進來把鮮花放在小桌上。天啊，我打心眼兒里不願意享受這種清福，不願意看見桌上的這些鮮花，不願意聽見那種肅靜的，醫院式的腳步聲！

我心里产生了一个我能够想象到的最可怕的思想。这个思想就是：“我再不能飞行了”。我頓時感到渾身燥熱，張大了嘴呼吸着，我的心飛得那麼遠，遠得好象再也回不來了。

6 来自斯坦尼斯拉夫的姑娘

上面我說到傷員跑去撿西紅柿的事。這是使我感到最痛苦，最傷心的事。這時人群中突然出現了兩個我先前沒有見過的穿便衣的姑娘。她們似乎並沒有費很大力氣，只是對一個個傷員迅速地說了几句(她們說的是烏克蘭話)，聲音就象唱歌那樣悅耳，傷員們就一聲不響地散開，回到各個車廂里去了。

這是兩個斯坦尼斯拉夫師範學院的學生——兩個人都長得很豐滿，黑黑的皮膚，低低的眉毛，輕細的嗓音，雖然她們外表上看来很堅強果斷，但却是兩個異乎尋常的善于料理“家務”的姑娘。她們剛參加到我們這一伙里來，便設法弄到了水，珍惜地分給每位弟兄一杯。就連上帝也不知道她們是從哪兒弄來了一筐紅莓；吮吸着這微微有些苦澀的莓果多么舒服！這些莓果多么新鮮！

除了知道一位姑娘名叫卡佳之外，我对她们俩甚至一点也不了解，可是为什么我却从这些日子里所遇到的千百人中独独去谈这两位姑娘呢？

因为……这一来我又要把话题扯到前面去了。

我背朝着列车运行的方向靠窗躺着。窗外的景物不断离我远去，所以等我们的车已经开过去之后，我才看到有三辆坦克。这是三辆没有丝毫特色的中型坦克！坦克手敞开着进出口，向我们张望。他们没有戴钢盔，所以我们把他们当成自己人了。过了一会，舱门关上了。就在他们关舱门的最后一分钟，也还不可能想象，一些身体健康的人会对这列载有不下一个千个伤号的卫生列车进行炮击。

但这样的事偏偏就发生了。

车厢发出了一阵钢铁互相碾轧的声音猛地一震，把我抛了起来，负了伤的一只腿被压在下面，我忍不住疼得呻吟起来。一个把拐杖挂得咚咚发响的小伙子叫喊着，满车厢里奔跑，他被人推了一下，便一头栽倒在我旁边的角落里。我从窗口看见一些伤员带头跳下车去，跑的跑，跌倒的跌倒，因此坦克就用榴霰弹对他们射击。

我邻床的西玛柯夫在我身旁向窗外观望。当我们同时掉转头来，面面相觑地望着对方时，他的脸变得雪白了。

“应该跳出去！”

“也好，”我说道。“不过，要跳下去就得有一件最起码的东西：腿。”

我们好歹总算爬开了我们的床位，伤员们把我们抬到了车厢口。

我克制着难以忍受的痛楚从车台阶上走下来，倒在车厢下

面，我永远也忘不掉这时候心头那种强烈的感情。我大概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这种蔑视，甚至是仇恨自己的感情。许多人奇奇怪怪地摊开手躺在我的周围。这是一些尸体。其他的人有的在跑，有的叫喊着跌倒在地上。我被愤怒和痛楚折磨着，毫无办法地蹲在车厢下面。

我掏出手枪，——并不是想自杀，虽然在千百种此起彼伏的思想中这样的念头也可能閃了一下。我的手腕被人紧紧的抓住了……

这是刚才的一位姑娘，而且正巧是那位面孔更黑些，名叫卡佳的姑娘。我对她指了指西瑪柯夫，他脸貼着地趴在不远的地方。她瞥了他一眼，摇了摇头。西瑪柯夫被打死了。

“他媽的，我哪兒也不去了！”我对第二个姑娘說道。她不知从哪兒突然鑽了出来，在劈劈啪啪杂乱的枪林弹雨中，她一点也不慌张。“不要管我！我有手枪。我不能讓他們活捉了去。”

可是这两位姑娘抓住了我，我們三个人一起滾到路堤下面去了。这时羅馬紹夫在我們前面露了一下脸，他脸黃黃的，在地上爬着。铁道旁有一条潮湿的臭泥沟，他和我們都在順着这条泥沟往前爬，沟的那边紧接着是一片沼地。

姑娘們拖着我感到很吃力，我几次三番求她們丢下我。卡佳似乎还招呼了一下羅馬紹夫，要他等一等，帮帮我們的忙，但他只是回过头来看了看，就又象个猴子似的用四肢撑着，不挨地面地爬走了。

当时的經過就是如此，不过比我現在叙述的要慢千万倍。

我們好歹穿过了沼地，潜伏在一个小白楊树林子里面了。我們是指两位姑娘，我，羅馬紹夫和两个在半路上加入到我們中間来的兩個战士。他們的伤势都很輕，一个伤了右手，另一

个伤了左手。

7 在小白楊树林里

我派这两个战士去偵察情况。他們回来报告說，周围停有近四十輛机关車，还有不知从哪里来的一些行軍灶。問題很明显，刚才炮击我們列車的坦克是屬于一支庞大的登陆部队的。

“当然，用腿走掉也可以。不过，既然大尉不能独自行动，最好还是利用一下驗道車。”

这輛驗道車是他們在錯車站旁的路堤下面找到的。

我們正在討論是否可以将这輛驗道車抬起来放到路軌上去。羅馬紹夫就在这时躺在地上开始哼哼起来，嚷着痛得受不了。他的癲癇病可能是真的发作了，因为两个姑娘解开他的制服时，看到他的左半边身子全都紅了。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說过象这样的內伤。不管怎样吧，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不能跟着两个战士到錯車站去了。所以两个姑娘便跟去了；她們仍旧是那么不慌不忙，坚决果断的样子，用烏克蘭話从容不迫地交談着，声音輕細而优雅。

在潮湿的小白楊树林里就剩下我和羅馬紹夫两个人了。

他是装病呢，还是真不舒服呢？也許不是装病吧？

他象癲癇病人似的抽动了几下，随后嗚嗚的号叫了一陣便安靜下来了。我喊了他一声：

“羅馬紹夫！”

他一声不响地躺着，胸脯鼓得老高，鼻子白得完全象是一个

死人的。我又喊了他一声，他回答的声音那么微弱，就好像他已经到了幽冥世界，现在要回到处在德寇登陆部队活动地区的这个小树林里来，他感到十分勉强似的。

“发作得好厉害，”他勉强笑了笑，囁囁着說道。

他抬起眼皮，很吃力地站了起来，机械地拭着貼在脸上的白楊树叶……

虽然这天的情况很复杂，但是过得相当单调，特别是比起第二天早上所发生的事来，就更加枯燥无味，所以我很难說出这一天是怎样过去的。我們在等待着，沒有止境地等待着，我倚着木柴垛躺在去年的落叶堆中。羅馬紹夫象土耳其人似的盘着腿坐着，半閉着两只鳥眼，把双手擱在枯瘦如柴的膝盖上，誰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树林里本来就很潮湿，再加上新雨初霽，树枝上，被压得顫动着的蜘蛛网上都閃耀着大顆大顆的水珠，啪嗒啪嗒地落在地上。这样一来我們就不怕口渴了。

太阳有两次照着我們，开始时是从我們的右边，后来好象划了个半圓，又从我們的左边照来。这样看来，战士和姑娘們去收拾驗道車已經有三个来鐘头了。

那位名叫卡佳的姑娘临走的时候，把她的背包塞在我的头下。当我用一只拳头去捶头下的背包，想把它弄高一点的时候，发现背包里面有什么东西喀吱喀吱作响；显然里面装的是面包干。羅馬紹夫又开始叫起苦来，說他要餓死了，我喝斥了他一声，他又不吭气了。

“他們不会回来了，”过了一会兒他神經質地說道。“他們把我們抛弃了。”

他的癲癇病已經过去了，現在他居然蹣跚起来了，竟不顧小

白楊樹林很稀疏，從這兒到路基那邊又是片空曠地帶，他這樣作會暴露我們。

“這都是你的錯兒，”他轉回來，挨着我蹲下，說道。“你把他們都打發走了。應該留下一個姑娘。”

“作人質嗎？”

“對，作人質。現在算完蛋了！他們不會回來接我們了，這是驗道車，總共也只能裝四個人。”

我這時情緒大概不很好，所以我掏出手槍對羅馬紹夫說道，假如他還要在那兒怨天尤人的話，我就打死他。他果然不吭聲了，皺着一副嘴臉，大概費了好大的勁兒才忍住沒有哭出來。

總而言之，事情很不妙！暮色已經偷偷鑽進了樹林，而姑娘們還沒有回來。我自然不會讓自己有象羅馬紹夫那樣卑鄙的想法，以為他們會拋棄我們，自己坐着驗道車跑掉了。現在最好暫時不要去考慮他們回不回來的問題。

我躺在那兒望着天空，天空逐漸昏暗下來，在搖搖擺擺，濕漉漉的白楊樹中間逐漸離我遠去了。我沒有想卡佳，可是有一種東西溫柔地，徐徐地從我心里爬過，我感覺到“卡佳”了。這是在作夢。要不是夢里有卡佳，我一定要驅散這個夢。雖然我還不知道為什麼要驅散它，可是我覺得睡覺是不行的。我似乎覺得這是西班牙，或者是我從西班牙發出的一封信，——一種從未有過的錯亂感覺。不是打仗，而是在瓦倫西亞近郊的小果園中。果園的老太太知道我們是俄國人之後，簡直不知道要把我們放在哪兒和怎樣對待我們才好。“總之要記住，”雖然我感覺到卡佳在我的身邊，可是我仍舊這樣寫道，“你是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義務的約束。”

雖然因為濕透的腿凍得發僵了，軍大衣從肩上完全滑下來，

被压成了一团，而我还是怕和梦境分别。我拉着卡佳的手，我不肯放走这个梦，可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需要使自己醒来。

我睁开眼睛，看见被初升的阳光照耀着的晓雾，缓缓地在林间浮游。我的脸和手都是湿的。罗马绍夫保持着原来那种困倦的，冷漠的姿态坐在不远的地方。一切似乎仍和刚才的情景一样，其实一切已经完全两样了。

他没有看我。过了一会，他斜着眼非常迅速地看了我一下，我恍然大悟，为什么我刚才会感到那么不舒服。他把我头下枕着的装着面包干的背包偷去了。此外他还偷去了装着伏特卡酒的水壶和手枪。

我感到血液直往脸上涌。他居然偷去了我的手枪！

“混蛋，赶快把手枪还回来！”我镇静地说道。

他没有吭声。

“喂！”

“你反正就要死了，”他急忙说道。“你用不着武器。”

“死不死是我自己的事。但是如果你不想受战地军事法庭审判的话，那就赶快把手枪还给我，明白吗？”

我开始急促地喘息着。

“有什么战地法庭！现在就是我们两个人，什么事情也没有人知道。实际上你这个人早已经不存在了。根本没人知道你还活着。”

现在他直楞楞地看着我，他的眼睛非常古怪，睁得滚圆，流露出一种躊躇满志的样子。说不定他是发疯了吧？

“你先喝一口水壶里的酒，”我平静地说道。“让你自己清醒清醒吧。然后我们再来看，究竟我是活还是死。”

可是羅馬紹夫並沒有理會我。

“我留下來是為了告訴你，你無時無地不在妨礙我。每一天，每一小時都在妨礙我！我恨你恨透了，我恨你恨得發瘋！我已經厭惡了你千年萬世！”

他這時候無疑地已經神經失常了。我很相信他最後的一句話：“我已經厭惡了你千年萬世”。

“不過現在一切都結束了，永遠結束了！”羅馬紹夫忘其所以地繼續說道。“你得了坏疽病，反正是要死的。你現在很快就要死的，馬上就要死，就是這樣。”

“就算是這樣吧！”我們之間相隔不到三步，假如能夠把拐杖擲得很准，我也許可以打昏他。但我還是平靜地說道。“可是你把紙夾拿去幹什麼呢？裡面全是我的証件嘛。”

“幹什麼？好讓別人發現你的時候，只是光杆一個人。誰也不知道你是什麼人。（他這時說漏了一個字。）地上橫七豎八躺着的死尸多着哩。你就要變成死尸，”他傲慢地說道，“而且誰也不會知道是我把你殺死的。”

現在，这一幕情景浮現在我的眼前似乎有些荒誕無稽，可是我並沒有更改和增加一個字。

8 誰也不會知道

我小的時候性情非常急躁，到現在還很清楚地記得自己那種只圖一時痛快時的危險的快感。當我聽到羅馬紹夫的話時也就有這樣的感情，它使我的腦袋有些暈眩起來。應該命令自己要絕對鎮靜，我給自己下了這樣的命令，然後悄悄地把手伸到背

后，握住了拐杖。

“你可要知道，我已經給部队里写了信了，”我居然能一开始就用一种十分平静的声調說道。“所以你想利用这篇报导那是枉費心机的。”

“那么軍用列車被截的事呢？”

他帶着一種愚蠢的，洋洋得意的神情看了我一眼。他想要說在軍用衛生列車被炮击之后，解释我失踪的原因，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这时我才明白，他很早以前，可能在小学念書的时候就盼望着我死掉了。

“就算是这样吧。不过，奇怪的是你在这件事情上是占不到便宜的，”我說了一些这类的話；反正說什么話都行，目的只在于延迟時間。

木柴垛妨碍着我擲他。必須悄悄地离开木柴垛一点兒，从旁边打去，才能更准确地打中他的太阳穴。

“我能不能占到便宜，这没有什么关系！反正你是吃了亏。现在我就打死你。瞧着！”

他掏出了我的手枪。

如果我相信他真会打死我，那他倒很可能采取这一着的。我从来还没有看見他这样兴奋过。但是我冲着他的脸啐了一口，說道：

“开枪吧！”

我的上帝，他怎么能这样怪声怪气地号叫，他滿地乱轉，把牙齿咬得吱札作响，甚至发出喀噠喀噠的声音！如果我不知道他的这些鬼把戏除了表示畏怯和无耻之外再沒有別的东西，那他也許会吓唬住我。他这种野人般张牙舞爪的动作說明他內心的自我斗争——开枪呢，还是不开枪呢？手枪灼烧着他的手，他

一次又一次地举起枪向我瞄准，浑身打着哆嗦。最后我倒真的害起怕来，恐怕他一不小心会触动了枪机。

“死鬼！”他大声叫道。“你总是在折磨我！你知道多亏谁救了你的性命！贱种，下流东西！要是我能够，天哪！你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活着？你的腿反正是要锯掉的。你以后再也不能飞行了。”

这是很可笑的，在他这些疯疯癫癫的谩骂当中，使我感到最受侮辱的，莫过于说我以后再也不能飞行的这句话了。

“这么说来，我是在空中最碍你的事了，”我感到自己说话的声音很可怕，但说的时候仍然竭力保持冷静。“那么我们在地上就该象奥勒斯特和庇拉得^①一般亲昵了吧。”

他现在正好侧着身子站着，还用左手遮着眼睛，仿佛因为无法说服我赶快死去而感到绝望似的。这是一个最有利的时机，我将拐杖猛地向他掷去。本来掷拐杖应该象掷标枪那样，身体尽力往后一仰，然后全身向前送出，最后再撒手。我能作的都作到了，但是很可惜，拐杖没有击中太阳穴，而是落到肩膀上了，并且打得似乎并不太重。

罗马绍夫怔住了。象一只袋鼠似的笨拙地狠命地一蹦，然后转过身子来向着我。

“好哇！”他骂道。“干得不错啊！”

他不慌不忙地收拾好背包。为了拿着方便起见，他把背包捆起来，一只手拿一个，不慌不忙地从我身边走过。他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挥舞着向沼地那方面走去。五分钟以后，他那佝偻的身影便一闪一闪地隐没在远处的白杨丛中了。我用两只

① 奥勒斯特和庇拉得是希腊史诗中两个最亲密的朋友。——译者注。

手撑住地面坐着，口里干得象火烧一样，我竭力忍住不去喊“羅馬紹夫，你回来！”因为要叫我这样作自然是不可能的。

9 一个人

把孤零零的，飢寒交迫，手无寸铁，身负重伤的我一个人留在树林里，留在距德寇登陆部队只有两步远的地方，我相信这个阴谋是他昨天晚上就考虑成熟了的。至于羅馬紹夫在冲动的时候所干的和所说的一切，显然也是为了要吓唬和侮辱我。可是他的算计落了空，所以他就离开我走了。他虽然没有杀死我，但这一着和杀死我没有两样，甚至更毒辣一些。

我不敢说我思想清醒之后，心里就感到轻松了一些。应该动身离开这儿，要不然就得同意羅馬紹夫的说法，永远留在这一小片白杨树林里。

我站起身来。拐杖好象是一高一低。我迈了一步。这不象是后脑勺被击中，立刻失去了知觉的痛法，而是象几千个小妖怪将我的伤腿撕成碎片，用铁制的小刮刀在刮我背上刚要愈合的伤口。我走了第二步和第三步。

“怎么样，能不让我走吗？”我对小妖怪们说道。

又迈了第四步。

当我挣扎到树林边沿时候，太阳已经相当高了。林边露出了昨天见过的沼地，仅有的一长条被压伤了的潮湿的草地把沼地分割开来。沼地上到处是美丽碧绿的圆球一般的草堆，我回想起这些草堆昨天在姑娘们脚下滚来滚去的情形。

路堤上有人在走动——是自己人呢？还是德国鬼子呢？我

們的火車還在燃燒；太陽光下顯得慘白的火焰正沿着烏黑的車廂板到處竄動。

不然就回到火車上去罷？回去干么呢？大炮轟擊的聲音傳到我的耳朵里，聲音沉重，遙遠，象是從東方傳來的。最近的一個車站是新謝里亞車站，距我還有二十來公里。那兒正在戰鬥，看來，那兒一定有我們的人。如果這種每走一步路都是一次莫大的痛苦也可以稱為走路的話，那麼我就算是向那個方向走去了。

樹林走完了，前面是一叢叢結着藍黑色的漿果的灌木。我不記得這種灌木叫什麼名字了，它的果實形狀很象歐洲越橘，只不過大一些。我已經一晝夜多沒有吃東西了，這真是來得湊巧。灌木丛后的田野上躺着一個一動也不動的黑色的東西，大概是一個死人。每次我撐着拐杖探身去摘漿果時，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死人總使我感到心神不安。後來我忘記了它，但不一會兒又帶着一種不愉快的感覺想起了它，甚至因此而感到毛骨悚然。幾個漿果滾到草里去了。我小心翼翼地彎下腰想要把它們撿起來，這時我的心好象被一根針猛的刺了一下：這是一個女人。我現在儘可能快地向她走去。

她張開兩臂，仰面朝天地躺着。她不是卡佳，是另外那位姑娘。子彈打中了她的臉，兩道秀麗的黑眉帶着痛楚的表情緊緊地蹙在一起。

似乎就是這個時候，我覺察到我在自言自語，並且談的盡是一些十分離奇的事情。我想起了這種藍黑色的，象歐洲越橘似的漿果叫什麼名字了，它叫做篤斯越橘，或者又叫水越桔。雖然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發現，但我卻因此歡喜欲狂。我開始大聲地編造一些話來敘述這位姑娘被打死的情形：她很可能是回來

接我，德国鬼子从土堤上用自动枪向她发射了一排子弹。我对她说了许多安慰的话，竭力鼓励她，就好象她并没有死，好象这个痛苦地蹙着两道低垂的眉毛的姑娘不是一个死人，不是一个不能复生的死人。

我后来忘记了她。我在向什么地方走着，嘴里不住地说胡话；我对自己这样荒诞的胡言乱语感到讨厌极了。这是谵语，它是在不知不觉中突然发作的。我这时已经顾不得和这种谵语作斗争了，因为我现在需要和另一种不可抑制的愿望作斗争，这就是要抛掉这两根把我的胳肢窝磨起了水泡的拐杖，躺倒在宁静和幸福的土地上的愿望。

……在失去知觉以前，我大概很久就没有看见自己周围的一切了，要不然我脑袋旁边的这一棵茂盛的淡绿色的大头白菜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呢？我躺在果园地里，兴奋地瞅着这棵大头白菜。要是那个戴顶黑色破礼帽的稻草人不在我的头顶上缓缓地划圆弧的话，那一切实在是太好了。一只乌鸦落在稻草人肩上，随着它一起打转。我想，如果这个乌鸦不那么乏味地眨着一只眼睛的话，世界上的一切实在是太好了。我对它吆喝了一声。但我的声音是那样微弱，那样嘶哑，它只是看了看我，满不在乎地拍了拍翅膀，仿佛是耸了耸肩膀似的。

的确，假如我能使这缓缓旋转的世界静止不动，那一切就太好了。这时我也许能够看清菜园后面的那座没有刷过油漆的木头小房子，看到台阶和院子里水井边上高高的吊杆。我也许能看见那扇忽明忽暗的窗户里有人在屋子里走动，并且惊惶地往窗外张望。

我站起身来。到门口约摸有四十来步；和我头一天所走过的路比较起来，这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才

走完这四十步啊！我一点兒力气也沒有了，倒在台阶上，拐杖啪嗒响了一声。

門微微开了一点兒。一个大約十二岁的孩子半跪在小方凳后面。屋子里的天花板很低，里面摆着寬大的双层板床，板床中間用印花布帳幔隔着。我躺在台阶上，一下子很难看清在黑洞洞的房間深处的小孩子的面貌。他举着枪对我瞄准，甚至用臉頰紧貼着枪托，眯縫着一只眼睛作出要发射的样子。

“喂，帮帮忙吧，”我說。我竭力使这个已經开始繞着我作該死的慢速运动的房間停止旋轉。“我是受伤的飛行員，从列車上逃出来的。”

“基里尔，不要动！”拿枪的小孩說道。“他是自己人。”

这时候，我覺得他好象分成了两个人；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孩子很小心地从帳幔后面探出头来，向外张望了一下，他手里拿着一把芬兰刀，紧张地一面眨眼睛，一面喘粗气。

10 孩子們

以后的事情我就不大記得了，在孩子們这兒度过的日子我覺得自己好象是在一团团水蒸汽中。水蒸汽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在俄国式爐子的一只三脚架上，从早到晚总放着大茶炊煮开水。不过另外还有一种看不見的，奇怪的蒸汽，它使我急促嘶哑地喘息，使我渾身淌汗。它有时变得很稀薄；这时我便能看見自己躺在床上，一条腿下面象小山般堆放着各种顏色的枕头。这是孩子們为了使血液不向伤口流而想出来的办法。我現在已經知道他們一个叫基拉，另一个叫沃瓦，是扳道員約那·彼得罗維

奇·列斯可夫的兒子。父親昨天到站上去了，囑咐他們關起門來，什麼人也不讓進來。他們兩個是雙生子，——這一點我很清楚，——但每次我看到他們在一塊兒時，總不免吓一跳：他們長得完全一模一樣，這又好象是我神志不清了。

……我的身上象是有兩個人在決鬥：一個是輕鬆愉快的人，他竭力在回憶並且生動地想象着生命中最美好的東西；而另一個却是陰郁沉悶的人，他忘不了身受的屈辱，懷着復仇的決心，因為無法報復而痛苦着。

有時，我似乎看見一個滿臉鬍鬚，身材高大的人走進我和妹妹所住的小木板房裡，他凍得那麼厲害，甚至連門也無力帶上。但這不是伊萬·伊萬內奇醫生。這是我自己。我無力地倒在台階上，門敞開了，兩個孩子用槍瞄準我，後來又說“他是自己人”。

我總覺得，他們之所以待我這樣熱心，那是因為多年前，我和妹妹曾經搭救過醫生，那時我們倆還是孤苦伶仃，被拋棄在一個為積雪淹沒了的，荒僻的鄉村中的孩子。

時而我看見自己在火車車廂下面，手里拿着手槍，恨得呲牙咧嘴。一些人奇奇怪怪地攤開手躺在我的周圍，我作了什麼事呢？我犯了什麼錯誤呢？竟至使我放過了生命中最重要，最不可缺少的東西。鬼子怎麼會跑到我們的領土上來，並且胆敢卑鄙地向受傷的人射擊呢？難道世上就沒有公理，沒有良心，沒有我在學校里所學過的，我虔誠地信奉過的，從童年時候就習慣了對它尊崇和熱愛的真理了嗎？

我竭力想要回答這個問題，但是我回答不了，因為我的呼吸減弱了；孩子們焦灼不安的看著我，不住地說，如果父親能回來的話，那他一定可以想些辦法，我立刻就會好一點。

父亲真的回来了。毫无疑问这是他。因为他和两个孩子同样的笨拙，长着一副忧郁的面孔，一双闪闪发光的深蓝色的眼睛。当他垂着手，拱着腰站在床边的时候，他的眼睛闪亮了一下。

“登陆部队被打垮了，”他说道，“我们把他们围在新谢里亚车站附近，把他们全部歼灭了，一个也没跑掉。”

后来他沉默了一会儿，皱着眉头看着我。我暗暗想，我的病况一定不妙，所以别人才用这样慈爱的眼睛看我，所以才问我的名字和父名，姓和军衔，并且叹了一口气，用一张纸条记了下来钉在墙上，以免忘掉。但这也不要紧，让他们去钉吧，反正我不去看这张纸条。我拉着扳道员的手，开始兴奋地向他叙述他的儿子怎样迎接我。我大概说得太久了，不少颠三倒四重复杂乱的地方，所以他才在我的额上放了一种清凉的东西，并且劝我一定要好好地睡一觉。

“睡吧，睡吧！”

我知道，如果我能够睡着，他一定会满意的，所以我便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的样子。但我向他描述的画面并没有消失，它已不限于在这间房子里，而是存留在无穷尽的远景上。

我好象觉得有成千上万间象这样的小房子。千万个孩子跪在小方凳后面，每张小方凳后面都伸出一支枪来。千万个孩子手里拿着刀藏在印花布帐幔后面。在伟大的俄罗斯平原上，从地平线的一边到另一边，在每家黑洞洞的房间深处，都有许多孩子在等待着敌人。只要敌人一走进去，便把他们消灭。

11 爱 情

假如象很多詩人那样把生命比作道路的話，那么，可以这样說，在这条道路上最险峻的轉弯地方，我总是遇到給我指出正确方向的交通警。这个轉弯和其他的轉弯所不同的地方，仅只在于搭救我的是一位扳道員，他的专职就是保障交通安全。

我在他家里睡了两天两夜，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每当我睁开眼睛时，总是看見这个愁眉不展的人，寸步不离地站在我的床前，就好象是不肯放我走到路那边的万丈深渊里去。有的时候，他又变成了一个眼睛同样亮得惊人的孩子。而孩子也坚守在自己的崗位上，把我看守在这兒，看守在这間有小窗和低矮的天花板的房間里，說什麼也不放我到另一个世界里去，那兒（假如相信“紅鷹”报的話），我已經去游历过一遭了。

無論在我清醒的时候，还是在神志昏迷的时候，我一次也沒有想到过羅馬紹夫，这实在是再好不过了。这是自卫的本能嗎？大概是的。因为回忆这些事情对我的身体是不会有好处的。

交通恢复以后，这家人用驗道車（无疑是两位斯坦尼斯拉夫的姑娘所沒能得到的驗道車）把我送到札奥节尔；三双碧蓝的眼睛同时閃耀着，羞怯地和我告別了。我又坐上了軍用卫生列車，这次是名符其实的卫生車，——有洗澡間，无綫电收音机，閱覽室。我洗过澡，換了綳带，吃得飽飽的，完全符合医疗科学的規定，将伤腿向上抬起，一觉睡过了整个中俄罗斯，醒来已在基洛夫城外的一个什么地方了。在这大后方的，仿佛是另外的一个世界里，首先使人感到奇怪的是窗戶可以不用黑窗帘遮住。这时，

我才想起，并在心中重溫了一次我和羅馬紹夫之間所發生的事。

我想起了我們在德寇坦克炮击列車的头一天的談話。

“你應該承認，你一生作了許多無耻的事，”我說道，“這些事在你自己看來也是無耻的。”

“就算是這樣吧，”他冷冷地回答道。“不過，什麼叫無耻呢？我把生命看作兒戲。譬如說，現在就是這樣。這次命運之神不是親自把牌交到我們自己的手里了嗎？”

交這付牌的不是命運之神，而是戰爭。不是戰爭，而是撤退，因為若不是撤退，他無論如何也不敢偷去我的手槍和文件，並且把我一個人丟在樹林里。

我象是在法庭上，從各個角度，同時也從軍法方面（雖然我對軍法科學的概念很模糊）來分析他的行為。

我回憶起我們之間關係的全部歷史過程，這是一段極為複雜的歷史，特別是想起他曾經認真地打算和卡佳結婚的事（現在看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了）。

他甘心永遠失去她嗎？我不知道。他娶了個名叫阿列芙吉娜·謝爾蓋耶芙娜的女人。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說，他在結婚的時候喝得酩酊大醉，並且痛哭了一場。卡佳聽到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說這話的時候，似乎很難為情，臉都紅了。這是怎麼回事呢？是她猜到羅馬紹夫還在愛着她嗎？

當他拿着手槍，對我咆哮說：“你知道多虧誰救了你的性命！”他這時無疑的已經忘其所以了。

可是究竟多虧誰呢？

是的，軍事法庭不难找出一條法律，來槍斃二級軍需官羅馬紹夫。

不過，世界上能不能再找到這樣的法庭，它的判決是不憑良

心来预测的呢？在这个法庭上，被告会供认说：

“是的，我想杀死他。”

然后又说：

“可是我沒有杀死他，因为我所爱的那个女人受不住听到他的死讯的打击。”

沒有这样的法庭！他之所以沒有杀死我，不是出于对卡佳的爱，而是由于他自己的胆怯！我的天，这算什么爱情！爱情使生命变得崇高而纯洁，爱情使生命变得新颖而壮丽；爱情不需要人們請求，就会把人变得比过去更加可爱和善良。难道他的爱情是这样的嗎？

不，这不是爱情。天晓得这种錯綜复杂的感情算什么，在这种感情里面，情欲和受了損害的虛荣心掺杂在一起，甚至还可能有其它的打算，因为我相信这个坏蛋的心里无时无刻都在打着一些无聊的算盘。但我仍然想象着有这样一个实际上不可能存在的法庭。

我認为伊万·巴甫雷奇要来审判羅馬紹夫，因为不要我們这位严厉的老师，还能要誰来审判呢？我仿佛覺得我看見了一間装有壁爐的单人房間，伊万·巴甫雷奇穿着厚长毛呢的制服上衣。他那花白的鬍子严峻地抖动着，眼睛忧伤而森严地注視着。他坐在桌子后面，羅馬紹夫漠不关心地，好象沒睡醒似地眯縫着眼睛站在他面前。他以为我早已死掉了。我們的老师对他說什么他反正都不在乎！

但还有一个人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她不时在壁爐旁边停下，手伸到爐前烤火。站在壁爐旁边的人就是女証人。她一面烤手，一面想着自己的心事……

我的女証人离开我多么遙远啊！誰知道她是不是还活着；

我已經两个月不知道她一点兒消息了。一九四一年秋的两个月是多么艰苦困难的日子啊！

她住在一个四面八方都被包围了的城市里；我們曾經計劃，如果将来有可能，我們就在这兒建立自己的小家庭。敌人現在正恣意地轟炸和炮击这座城市，竭尽全力迫使城內这些不甘屈膝的居民冻餒而死；敌人疯狂地鑄造重炮，把它們从迢迢千里之外拉来；不断从德国本土运来水泥，浇灌战壕和永久火力点的护壁；每天夜里都用信号弹把涅瓦河照得通亮，不讓載着面粉和面包的駁船从黑幽幽的水面上通过。他們残忍凶暴地在蛮干，目的是把我的卡佳置于死地。

12 在医院里

我一向总以为医院就是：夜間小桌子上的玫瑰花，光洁耀眼的病房，象仙子一般在病床間飘然来去的肃靜的护士等等。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印象是从哪里得来的，大概是从一篇小說中看来的。实际医院要比这簡陋得多。

这是一座大楼，里面的病人已經装得不能再滿了，走廊上，甚至食堂里（虽然食堂是設在一間过堂屋里）都放着病床。以前这里是一所医学院，墙上还挂着表明神經分布状况的腊型。这些腊型的面孔象死人般的可怕，半个面孔是剥去了皮的。玻璃櫥窗里还保存着課程表，和系主任发布的严厉的命令。

我住的地方是一間名符其实的礼堂，不过用来作病房未免太大了一些。我覺得这間屋子的那一头仿佛弥漫着霧气，远得看都看不清楚。实际上也真是如此，一道道斜射进来的，寬闊的

冬季里太阳光綫穿过礼堂的时候微微抖动著，真象是在迷蒙大霧里一般。这兒躺着将近一百个人，几乎全是列兵。我身上沒有証明文件，所以，在部队沒有把証明書寄来，証明人世間还有我这么一个太尉之前，我便和列兵們躺在一起。不过唯一的差別仅仅在于发給我們的是馬合烟，发給軍官的是清淡的烟絲。

在我們这間大病房里，汇聚了从各个战綫上来的人。很多人是从列宁格勒战綫来的，在那年冬天，这些从列宁格勒战綫来的人是說不出什么能令人告慰的事情来的。

我在旅途中就給卡佳写过信，到医院里来了之后，又几乎每天都有信寄給她。我不是寄到彼得格勒大街柏林什登家里，就是通过軍邮寄給彼加，或者寄到軍医学院，因为卡佳在七月間曾写信告訴我，說她和瓦丽亚·特洛菲莫娃一起在軍医学院里工作。去列宁格勒的铁路虽然不通，但信件还是可以用飞机运去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信就寄不到，这件事始終还是一个謎。我不知道艺术珍品收藏所的兒童营又疏散到新西伯利亚附近去了，所以我給姥姥的信还是往雅罗斯拉夫寄。我可以聊以自慰的只有一点，就是假如卡佳发生了什么不幸的話，那么一定有人会回我信的……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这不幸的一天永远銘刻在我的記憶里。一位女社会活动家（医院里都这样称呼那些不要任何报酬，自願来看护我們的妇女）跑来，对我叙述她們在車站上迎接一列車从列宁格勒来的技工学校和特种工艺学校学生的情形。这是一位严肃的妇女。她有一次說，她的丈夫和兒子都在前綫牺牲了，她說这話时态度那么平靜，使我感到非常惊讶。可是当她說到从列車上往下抱孩子的时候，却忍不住哭起来了。

我这天費了很大的力气才勉强使自己吃了一頓飯。伤腿敷

上石膏已經一个多月了，今天却突然疼得我簡直不知如何是好。医生決定給我进行爱克斯光透視，就象达莎阿姨爱說的那樣，我这回又“背时”了。

第一，透視結果証明我的腿愈合的不对，所以必需拆除石膏，弄断几根骨头，总之一句話，要从头治疗。第二，把我放在冷得要命的外科手术室里候了一个半鐘头，大概我就此感冒了，所以到傍晚的时候，我便发现自己在說胡話，——这向来都是我体温增高的第一个征候。

簡短地說，我是患肺炎了。这一来就影响了第二次手术的进行，医生們十分担心，怕我成癩子。

关于我的病情似乎写得太罗嗦了；这实在是一种枯燥无味的題材，特別是一想到自己在开战的第三个月便負了伤，还沒来得及作出什么成績来。

我沒来得及作出什么成績。可是这时候，正如外国报纸所說的，出現了“莫斯科城下的奇迹”，从莫斯科往西三百公里，雪堆中布滿了穿着代用品制成的笨大毡靴的，冻僵了的人腿！我沒来得及作出什么成績；可是組織最新式的远程海軍航空兵的工作却在加速进行，在这項工作里沒有我的份兒，仿佛我已經十五年沒有在海面上空各处飞翔了！我沒来得及作出什么成績，我甚至感到那种所謂的“战争感”在我身上也日漸减少，而住院生活的种种无謂瑣事却愈来愈多了。

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部队給我寄証明書的事。接到这份証明書以后，我又收到了米沙·戈洛布寄来的一封信。他是我的老朋友，我們过去曾在国防航空化学建設后援会航校里一起飞过“棺材”式飞机。当我一看见信尾的署名时，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这的确是米沙；他現在在我們的团里服务，是在报纸

上登出我的訃告后两天到团里来的。

“薩尼亚，你这次毕竟使我大吃了一惊，”他写道，“并且，你要知道，使我惊讶的不是在收到你的信，证实你还活着的时候，而是当别人对我说你着火牺牲了的时候。因为象你这种人是不会牺牲的。你想想看，现在无论谁，包括你在内，没有不反对这一次报导错误的。大家都在炸弹上写着‘为格利高里耶夫复仇’，所以你就是死后也仍然继续在战斗。上校讲了话，说要为你申请红旗勋章。让我祝贺你，祝你幸福，永远幸福。”

初春的时候，我开始逐渐地走到，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爬到医院的小花园里去玩。这时，我才看到我在这兒住了差不多半年的城市的面貌。我虽然只看到一条栽植着菩提树的林荫大道，但从这条街道似乎也可以见到牢城的全貌。后来，当我被准许到城里去玩的时候，——起初是拄着拐杖，后来只带一根棍子，——我才相信自己过去设想的没有错。这是一座开阔，安静的城市。所有较好的街道都象要飞升似的，向陡峻的加馬河岸伸去，这种争腾奔跃的形势，使我想起了故乡恩斯克沙河和靜河岸上的小山坡。过去我仅仅由牢城上空飞过两三次，没有机会在这兒住下。

列宁格勒歌剧和芭蕾舞剧团疏散到牢城来以后，我到剧院去看过演出。在帷幕拉开以后，我看到一些服装华丽的男女，步调平稳，不慌不忙地在舞台上走动，仿佛没有发生什么战争似的，我不禁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时间倒流的感觉。

在这本书里本来不值得把我看戏的事也提出来。可是生活中的一些事，正如钟表里的齿轮一样，一个扣着一个彼此牵连着。在看“天鹅湖”的时候，我遇见了一位曾在远东和我共事的同志的妻子安娘·伊林娜。我和卡佳都很喜欢伊林^①夫妇。他们

的性情很温和，待人很有礼貌，生活很愉快，爱好戏剧和运动，特别是喜欢打网球。我一直还记得安娘穿着白色的连衣裙，手里拿着网球拍的样子。可是也许正因为他们过分有礼貌，对谁都是四平八稳的，很象有本小说中所描写的一对美满的夫妇那样，所以大家对他们都不十分信任，甚至对他们还相当不好。可是，我和卡佳总觉得他们是完全应该得到这样的地位和幸福的。大家都说伊林交了红运。也的确，他什么事都碰得那末巧，那么顺利。这种好运一直继续到战争期间。战争开始的时候他还是中校，到一九四二年春天，他已经是少将了。

我和安娘在看戏的时候遇见，大家都很高兴，约定第二天在她家里再见面。她是本地人。战争开始以后，她的丈夫就把她同小女儿一起送回牟城娘家来了。

这是一个没有受过战争灾害的家庭。在上前线和住院以后，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家庭。我们坐在餐厅里。食橱的玻璃板上放着餐巾，墙上装钉着精工雕刻的隔板，上面放着些小玩意儿，沙发床上挂着一幅针织壁毯。这些东西，毫无疑问还是战前的东西，还保持着战前的放法。我望着坐在这间漂亮的房间里的这位华丽，温柔和蔼的妇人，忍不住痛心地怜悯起我的卡佳来了。

“如果我能到列宁格勒去，哪怕是住两三天也好，我一定能找到她。我相信她一定在列宁格勒。可是他们就是不批准我走。德米特里在莫斯科吧？”

“唔。”

安娘立刻明白我问她丈夫的用意了。

“他会帮助您的，一定会帮助的！我马上就给他写信。需要

① 伊林即伊林娜的丈夫。——译者注。

他作些什么事呢？”

“把我調到莫斯科去吧，”我說道，“不然，体格检查委员会就要送我到后方去了。”

“体格检查委员会什么时候来？”

“五月里。”

“这好极了。我还来得及收到米加的回信。这件事他應該和誰交涉？”

“和海軍人民委员会航空兵干部部。”

安娘在小本上記下：“和干部部……”

“可惜您不能由牟城直接飞到列宁格勒去。这兒有‘道格拉斯’飞机往来。这一条航綫的班机实际上早已經沒有了，不过听说又快要来了。只要飞机場一乾，就可以通航。我一定給您想办法。”

我謝了謝她，說如果真能这样作，自然再好不过了。不过世界上还有那么一本叫作“紀律条令”的書，上面規定不可以作这种飞行的①。

我沒有料到仅仅在几天之后，我就能够不受这本鉄面无私的書的約束，随便飞到哪兒去都可以了。

13 判 决

对于我說来，体格检查委员会总是象一个法庭。我每次在这个法庭上都得承認自己犯了罪，因为先天沒有把我生成一个下

① 按規定，飛行員經過較長時間停飛后，需經過有關部門檢查，批准，方可重新駕駛飛機。——譯者注。

顎方圓，肌肉发达，能力举四普特，肩膀寬闊，身材高大的汉子。当我渾身脫得精光，站在牟城体格检查委员会面前时，心里就有这样不愉快的感觉。我蹲下来，闔上眼睛，把双手伸到前面，竭力不使它顫抖，然后試驗伤腿的活动能力，然后在距离很远的地方准确地辨認最小的字母。后来一位上了年紀的，花白头发的女医生听了听我的心脏，便开始用手指敲我的脊背和胸部。显然我的胸腔里有什么东西使她不够滿意，所以她停下来，皺起眉头，象弹音阶似的又敲了一遍。然后說道：

“呼吸。”

在我到体格检查委员会来的时候，使我耽心的完全不是肺的問題。当我精神紧张的时候，特别是当我想到在战斗飞行的情况下伤腿将要怎样动作时，不知为什么这条腿就癱起来了，这真叫人不愉快。虽然我在小孩子的时候患过西班牙流行性感冒，后来又害过严重的肋膜炎，但是我的肺一向是很好的。然而这次，不知为什么偏偏是我的肺給了这位气忿忿的，年老的女少校軍医一种不好的印象。她敲了一通，拨着我的身子轉来轉去，又敲了一通，命令我躺下来，仿佛是决心要証明我是病了，病了，病了……病了，而且以后再也不能飞行了。

我一直把这个不能飞行了的可怕的想法隱藏在很远的地方，隱藏在心灵的最深处已經将近半年了。我隱藏着，并且随便用一些事情把它掩盖起来。可是这个想法既沒有死，也沒跑到什么地方去，它只是暗暗地和另外一件心事——想念卡佳的心事一同潜匿了下来。

可是現在，当我赤着身子站在体格检查委员会面前，露出腿上和背上累累的伤痕时，这个想法不論对自己还是对別人再也掩飾不住了。大概女医生从我的眼睛里看出了这个想法，所以

她虽然已经拿起了笔，但对于写结论却又迟疑不决，反而把我交给了委员会主席。戴着玳瑁眼镜的矮胖医生便立即着手来敲打我的肋骨和肩胛骨，不过他不是用指头，而是用小锤子。小锤子敲出的声音时高时低，仿佛是在询问：

“你真的病了嗎？病了嗎？病了嗎？病了，而且再也不能飞行了嗎？”

“大尉，不要紧张，”医生说，他向我瞥了一眼，把橡皮管塞到他那两只毛茸茸的大耳朵里去。“只要略加治疗，一切都会好的。”

他听了听我心音，在病历表上作了一些符号。他样子很和蔼地又说了一遍：

“一切都会好的。”

但是他却给了我半年的休假期。我很清楚，在一九四二年那样的年代，体格检查委员会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给一个战斗部队的指挥员作这样的结论。

我回到医院的时候脸色似乎不太好。我的邻床是一位陆军朋友，他的两条腿虽然没有了，但他每次洗完澡被抬出浴室时，他那丰满，红润的面孔总不免使人感到惊讶。这一回，他放下了书本，瞥了我一眼，什么也没问。过了一会，他忍不住还是问了：

“喂，怎么样？”

虽然结论里一点也没有说我是残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要对他讲，他们给我下了这样的结论。午饭端来了，我机械的吃完饭。虽然我这时很想躺下来，把头埋在枕头里，可是我仍然走出去了。结论里不是没有写这个字吗，反来复去地想它干什么呢？每次想起这件事都象是连脑袋一起鑽进了烂泥塘的污水里那么难受！

也許当时應該說服他們，應該說服那个用骨节敲着我的肋骨，仿佛在奏丧礼进行曲的老巫婆吧？應該說服那个不肯說別的話，只会說我不能再飞行了的大胖子吧？也許我應該要求他們送我到駐防軍体格检查委員會去吧？

我沿着一条坡度很陡的通往加馬河的林蔭路走着，吹着口哨，但是声音很低，怕引起行人的注意。在这座全城最好的航空学校大楼的牆壁上，我又讀了一遍鐫刻在大理石上的銘文：“天才的俄罗斯科学家，无綫电发明者，波波夫曾就学于此”。

我一瘸一跛地登上了陡高的河岸，春意犹酣的加馬河展現在我的眼前。这时正是落潮的时候，混浊的河水呈現着灰不灰，黄不黄的顏色。那兒是碼頭，是拖着庞大的駁船的汽輪；汽笛的鳴叫声和人群的喧囂声，在寬闊的水面上向远处散布开去……

“可惜您不能由牟城直接飞到列宁格勒去。要不然，我一定給您想办法。”

沒有什么，現在一切都好了。坐上飞机走吧！什么批准的手續也不需要。您現在已經由駕駛艙里轉到乘客艙里了。座椅挺舒服，把身子往后一仰，躺下休息吧！

我大概失口說出声来了，因为站在河岸上的一群“工艺学生”，——他們穿着大得极不合身的制服，戴着大得极不合适的学生帽，——看見我都笑了起来，并且跟在我背后走了一段路。这不禁使我想起来从西班牙归国后同卡佳回恩斯克去的情形。恩斯克的一群孩子跟在我后面，一举一动都跟着我学；我停下来，到小鋪里去买烟卷，他們也停下来，买同样的烟卷。我想游泳，卡佳留在教堂花园里，我下了坡走到靜河边上，脫去衣服，跳进了水中。他們也在不远的地方完全象我一样，脫去衣服，跳进了水中。我那时是一个在西班牙作过战的飛行員，是在胸前挂着

紅旗勳章，載譽歸來的飛行員！可是現在呢？

我的手指有點兒發抖，不過我還是卷好了煙吸起來，在河岸上呆呆地站了一會兒，眺望着河上這種對我說來全然是陌生的，形形色色的生活。一艘灰色的客輪駛過去了。我看到了船的名字叫“列比捷夫斯基”，心里暗忖道：“我怎麼沒有成為列比捷夫斯基那樣的人呢。”過了一會兒，又有一艘不大的輪船駛過去，我看到了船名是“卡瑪寧”，心里想道：“老兄，你也沒有成為卡瑪寧那樣的人啊！”遠處的碼頭旁停泊着“瑪茲魯克”號，我不由得笑了笑，心想，假如加馬輪船公司的船隻都以著名飛行員的名字，而且還是以我所熟識的名字為名的話，那我恐怕要一直自怨自艾到深夜了。

不管怎樣吧！現在沒有人阻擋我乘飛機到列寧格勒去找我的妻子，或者証實我已經永遠失去了她。

我候了三個星期的飛機。是因為我對自己的病習慣了呢，還是因為希望偷偷潛入我的心中，對我低聲耳語，要我相信一切都會順利過去呢？不過我已從這次意外的打擊中逐漸清醒了過來，把自己的全部思想和感情整理了一番。

我現在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卡佳。我聽到收音機廣播她所喜愛的那支“尼娜幻想曲”時，要想念她。我看傷病員們演出的節目時，要想念她。我們過去到劇院的次數太少了！在寬大的病房里大家都已入睡，只有此起彼伏的呻吟聲，或者是短促，嘶啞，說夢話的聲音，這時我也要想念卡佳。

安娘·伊林娜終於給醫院里打來了電話，說飛機已經到了。她介紹我和飛行員認識。這位身材高大，心地善良的少校是受列寧格勒戰綫司令部的委托來到牢城的，他欣然同意把我帶到列寧格勒去。

14 寻找卡佳

我在地面上已經呆了整整六个月了！怎样才能表达我終于离开了地面时的感情呢？一切都没有改变，只不过当我想到自己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以乘客的身份飞行时，心里反而感到更加难过。但在这些年的飞行工作中，我已經习惯在空中比在地面上舒服一些。我怀着愉快的心情望着窗外，仿佛是在检查由春天黑色田野，閃閃发光的曲折的河流，以及象深綠色天鵝絨般的森林所构成的这份巨大的家业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幸。我怀着欣慰的心情走进座艙，艙里虽然很狹窄，但我渾身仍然立刻产生了一种非常习惯的，处处都很合适的感觉。我怀着欣慰的心情等着看駕駛員怎样繞过雷暴；我們是在切列波維茨上空遇見这次雷暴的。这次雷暴非常瑰丽壮观，烏云仿佛巍峨的宮殿，閃电一次又一次地劈毀了这些宮殿的牆壁。我不禁回忆起了初期飞行的情形，那时候天空对于我説来，还不是一条簡簡單單的航綫。

……我无意中碰上了一輛到柏加尔多夫卡来运“真理报”紙型的汽車，便搭了这輛車，来到利金大街。由此往前只能步行，或者等候在彼得格勒街上行駛的唯一的一輛电車——三号車。不过那些就象在自己家里一般安心在車站上等車的列宁格勒人説：“一定要等的話，那很可能等上一个鐘头左右。”有一位少校也要到彼得格勒街去，他坚持留我等車，因为我身上还背着一个沉重的背包——我給卡佳捎了一些食物来。我这时只有一个想法，那便是我和卡佳終于在一个城里了。她現在怎么样，是在等

待着我呢，还是臥病在床，或者命在旦夕呢？我不知道。这些个想法压得我气都接不上来了，我哪里还能在这兒等車呢！

我不顧一切地沿着夏园旁的林蔭道飞也似的奔跑。我对自己这时所見到的心里都明白：那些在馬尔索夫广场上的菜园，其間架設着用伪装隱蔽着的高射炮連；那种不平常的一片葱綠的景象，这在列宁格勒从来还未曾有過；整个城市打扫得那么洁淨，在我临来之前就曾看到报纸上說，在一九四二年春季，出动了三十万列宁格勒居民来打扫自己的城市。可是我現在看到的一切又回到一个問題上来了，那就是：卡佳在什么地方？我能找到她嗎？我覺得既然家家戶戶的玻璃都被打碎了，所有的房屋都象是悲伤地低垂着眼帘，默默不語地站在那兒，那么我也就找不到卡佳了。既然每一堵牆壁都被炮弹打上了无数洞眼和裂痕，那么我也就找不到卡佳了。但是我又覺得自己能够找到卡佳，因为連苏沃洛夫紀念塔的广场上都种滿了胡蘿卜和甜菜，而且菜苗长得那么茁壯，仿佛这兒的自然条件对它們來說是再好不过的了。我走到涅瓦河边，目光不由得落在海軍部大厦的尖頂上面。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形容我在这頃刻間的感觉，海軍部大厦的尖頂好象画在一幅旧版画上，已經失去光澤，然而这一切是和卡佳分不开的。这次战争爆发的时候，我們是不辞而别的。但是另外一次別离，就是我出发去西班牙之前的一次別离我記得清清楚楚，我現在仿佛真的看見了她，她站在柏林什登家里黑暗的前厅里，在皮袍和大衣之間。應該怎样作，一切才能重回到当时的那个样子呢？我才能重新拥抱她呢？她才能問我：

“薩尼亞，是你嗎？也許不是你吧？”

我老远便看見柏林什登家的那所房子了！房子还在原来的

地方，奇怪的是我覺得比以前更加漂亮了！窗戶都很完整，房子的正面富麗堂皇，新鮮的油漆在太陽光下尤其光彩奪目。但我愈往前走，這種神秘華麗的景象就愈使我感到不安。又走了十步，十五步，二十步，——象一個人猛力地抓住了我的心，然後把手一松，於是我的心卜登卜登地跳了起來……這座房子不見了。房子的正面景象原來是畫在許多張大三合板上的圖畫。

在這漫長的夏日里，遠方炮火轟擊的聲浪始終在我的耳朵里響着，時而沖來，時而退去，彷彿拖着一塊噪聲震耳的大圓石似的。

我整天尋找着卡佳。

我在一所破房子旁邊遇見一位面色發青的三角臉的婦人，她指引我去見區蘇維埃委員奧萬涅桑醫生。在過去“埃里特”電影院的辦公室里（現在這兒駐着區防空、防化學司令部）坐着一位頭髮斑白，沒有刮臉的，善良的阿爾明尼亞老人。我問他知不知道葉卡杰琳娜·伊萬諾芙娜·塔塔林諾娃-格利高里耶娃，他回答說當然知道，並且在戰爭開始的時候，他還曾請她在他那兒作護士。

“結果呢？”

“她沒有答應，後來便挖戰壕去了，”醫生說。“很遺憾，我再就沒有見到過她了。”

“您認不認識羅莎莉·納烏莫芙娜？”

他用慈祥的，老人的眼光看了看我，咬了咬嘴唇，把嘴唇噉了起來。

“您是羅莎莉·納烏莫芙娜的什麼親戚？”

“不是亲戚。只是熟人。”

“唔。”

他沉默了一会兒。

“她是一位优秀杰出的妇女，”他叹了口气說道。“我們把她送到医院，可是已經迟了，她去世了……”

我轉身回到破房的院子里。房屋的正面虽然倒塌了，可是朝院子的这一边还保存得很好。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緣故，便順着盖滿了瓦砾木屑的楼梯走上了一楼的楼梯口。从这兒再往上去，有一些鋼筋，鉄条在楼梯的空架子上豎着，直到三楼以上，才开始又露出梯阶来。

我心爱的妹妹曾經在这所房子里住过。我們曾經在这里庆祝过她的婚礼。当时我还是个穿蓝工作服的飞行學員，幻想着伟大发现的幸福，每逢假日都要到这里来。我和卡佳每次到列宁格勒都住在这兒，而且不論什么时候来，我們在这間屋子里都被当作是最亲近，最要好的朋友。我在西班牙作战的时候，卡佳曾經在这間屋子里住过一年多。这次列宁格勒被封鎖的期間，她又在这里住过，她忍受着飢餓和寒冷，坚持工作，帮助别人，她把自己的純洁，和內心力量的光輝散播給大家。她現在在哪兒呢？恐怖包围了我。我紧咬着牙齿，忍住不要打战。

正在这时候，我听到了孩子的声音，一个十二岁上下，肤色亮黑，顴骨寬大的孩子在我头上断墙空隙間出現了。

“指揮員同志，您找誰呀？”

“你住在这兒嗎？”

“是的。”

“一个人。”

“怎么会一个人呢！和媽媽在一起。”

“你媽媽在家嗎？”

“在家。”

他指点我怎样走，——有个地方塌陷了，上面搭了一块窄木板，——几分鐘以后，我便和他的母亲，一位眼皮浮肿，精神困頓的妇人攀談起来了。她一說話，我便听出她是韃靼人。她原来是七十九号房的清扫工人，自然她是很熟悉罗莎莉·納烏莫芙娜和卡佳的。

“九号被炸坏了的时候，她挖土去了，”她說的是卡佳。說一口純正俄国話的孩子在一旁解釋說，“九号”就是第九食品商店的那座房子。“挖出了一个熟人來，是一个紅头发的。后来他就住在她家里了。”

“挖出一个紅头发的熟人，”孩子迅速地翻譯道，“他后来就住在她的家里了。”

“第二个老婆子死了。哈金木去埋的。”

“第二个老婆子指的是罗莎莉·納烏莫芙娜的姐姐，”孩子解釋說，“哈金木就是我。她死了以后，我們就把她拉去埋葬了。拉到斯摩棱斯克公墓。紅头发的人也在那兒。就是他雇用我們的。他也是軍人，是个少校。”

現在，應該問卡佳的情况了。我覺得很可怕，但我最后还是問了。清扫女工生气地搖着头，說她自己“在医院里躺了三个多月，叫过阿訇，可是列宁格勒一个阿訇也沒有，所有的阿訇都死絕了”。等她回来时，罗莎莉·納烏莫芙娜的房子里已經空空的了。

“應該向住宅租賃合作社去打听一下，”她沉思了一会兒，說道，“住宅租賃合作社也沒有人了，死了。也許她是走了？她挖出的那个紅头发帶着面包。装了一大口袋，总是自己背着，不肯給

我拿。我对他说：‘你这个贪婪的傻瓜。我们救了你的命。你不应该只顧想着面包，您应该祈祷，应该念可兰经。’”

我所了解到的全部情况就是这些，罗莎莉·納烏莫芙娜的房子被炸时，卡佳已经不住在她家里了。我还和其他一些妇女谈过话，当她们说起卡佳当时怎样帮助过她们时，都激动地哭了起来。哈金木把他的小朋友們带了来，他們都抱怨那个紅头发少校，说他答应給他們每人三百公分面包的“埋葬”費，可是他后来却“賴賬”，每人只給了二百公分。

天晓得这个紅头发少校是誰。是彼加嗎？可是彼加不是少校，而且不可能想象彼加会吞沒这些受飢挨餓的兒童一百公分面包。算啦，管他是誰呢！反正他帮助罗莎莉·納烏莫芙娜埋葬了她的姐姐。说不定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还帮助过卡佳呢？送殯的时候她还和他在一起，要是能从彼得格勒走到斯摩棱斯克公墓，可見她的身体还不是怎么坏的。然而自此以后，就沒有人看見她是死是活了。

現在已經五点多鐘了，我拖着疲憊的身子，熬着难忍的头痛前往軍医学院。学校撤退了，可是，从战争发生的第一天起便成了后方医院的原医学院附屬医院却留在这里。卡佳曾經工作过的口腔医院也留下来了。我被指引到一个办公室。一位有点象达莎阿姨的年老的女打字員說，卡佳当时的情形很不好，所以特洛菲莫娃医生帮助她离开了列宁格勒。

“到哪兒去了呢？”

“这我可沒法說，不知道。”

“特洛菲莫娃医生本人还在列宁格勒嗎？”

“她送走尊夫人后，便立刻上前方了，”女打字員回答說，“从此以后，再也沒有听到过她們两个人的任何消息。”

15 同水道測量家尔同志的会面

我現在才明白自己过去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我这半年一直在給卡佳写信，从未收到片紙只字，但我始終抱着希望，以为只要一来到列宁格勒，她就会站在門口，伸出双手来迎接我。仿佛一九四一年那可怕的冬季，那許多滿載着奄奄一息的兒童的列車，那分布在全国許多城市中，专为列宁格勒市民設立的特种医院都不曾存在了。仿佛那許多睜着一双双肿得变了原形的，水汪汪的眼睛的面孔我不曾看見过。仿佛那些忽而从东，忽而从西传来的隆隆大炮声我不曾听見過。

我坐在口腔医院的办公室里思索着这些事，一面傾听着女打字員的叙述。她說，那时她餓得連起床的气力都沒有了，一个酷肖她的牺牲了的兒子，和她兒子的面貌就象是两滴水珠一般相似的紅海軍战士突然跑来，給了她三百公分面包。

“卡杰琳娜·伊万諾芙娜是能找着的，”她說道。“她作过一个梦，梦见一只大鷹飞来了。我說是她的丈夫，她还不相信。您瞧，我的話果然应驗了。現在我也对您說——她是能找着的！”

是的，可能找着。我呆呆地望着老太婆，心里想：“我在牢城的生活实在是太好了，而她那时却掙扎在死亡綫上。”老太婆不住地劝慰我，說卡佳一定能找着，一定会回来的。“我受到大家的关怀，我的病有人医治。而她呢？孩子們帮她埋葬了貝尔塔，她却連給孩子的一百公分面包都付不起。”我发疯般，拚命地想着，我應該在一月間就飞到列宁格勒来，應該坚持自己的意見，

要求讓我出院，這樣說不定我還可能比現在更健壯一些，說不定我還能找到卡佳，救出我的卡佳。

但對於已經不可挽回的事情懊悔也晚了。卡佳從列寧格勒給我的信中說過：“我和所有的人一樣”。現在我才明白她說這句簡單的話的用意。

老太婆比我經歷的痛苦自然要多得多，她不住地安慰我。我向她要了點開水喝，拿出腊肉和蔥頭來招待她；在當時的列寧格勒，這还是很希罕的東西呢。

從這時起，我心里象是有了一股寒氣。我無論做什么，無論想什么，總聯系着一個問題：“卡佳呢？”

還在牢城的時候，憑着記憶，我差不多把所有我在列寧格勒認識的朋友的電話號碼都回想起來了。可是現在，我從醫院里不管給誰掛電話，總沒有人接，仿佛所有的電話都落到列寧格勒一個神秘空虛的境界中去了。最後我撥了僅余的一個電話號碼，這是我唯一不敢肯定的的一個電話號碼。我握着听筒聽了很久，傾听着遠處沙沙的聲音，在這種聲音之後，又聽到了更為遙遠的一個很不耐煩的人聲：

“喂，什么事？”一個低沉的男人聲音突然響道。

“請問……”

我說出了一個人的姓。

“就是我。”

“我是飛行員格利高里耶夫。”

沉默了一會兒。

“這簡直不可能！您是亞歷山大·伊萬內奇嗎？”

“是的。”

“這能不相信命運嗎！親愛的亞歷山大·伊萬內奇，這是第

三天了，我总在想，怎样才能找到你。”

六年前，在决定成立搜索塔塔林諾夫船长的探险队以后，我在列宁格勒負責組織这支探险队的时候，符教授介紹我認識了一位海軍，他是伏龙芝軍事学校的教員，是一位水道測量学家。

我們只在一起过了一个晚上，可是我后来却常常想起他；——他那时曾經十分清楚地为我描繪了未来世界大战的情景。

他那一次来得很晚。卡佳已經蜷着腿，在安乐椅上睡着了。我本想叫醒她，可是他沒有讓我叫，我們弄了点东西喝着，一面嚼着橄欖，——卡佳总是儲存一些橄欖的。

他对北方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深信北方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战略原料，在未来的战争中将会起重大的作用。他把北方的海路看作是战争的道路，并且断定說，日俄战争中，俄国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懂門德烈也夫曾經发表过的这一思想的结果，他要求在所有商船队行駛的航綫上都修建軍事基地。

記得当时这种观点使我很惊异。可是到了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四日，在我来到列宁格勒的前几天，有一次坐在加馬河畔，听播音員十分庄严地宣讀苏英条約的遥远的声音时，我重新估价了这个观点。不难猜到这次条約中所提到的是哪些路綫，因此，我回想起了和这位后来被卡佳称为“深夜的客人”的水道測量家会見的情形。

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〇年間，我曾經不只一次地和他見過面，讀过他的論文，和一本叫做“苏維埃北极的海洋”的書。这本书后来轟动一时，譯成了欧洲各国的文字。我一直对他抱着好感，注視着他的命运，如同他注視着我的命运一样。我知道他离

开了伏龙芝軍事学校，曾經指揮过一只測量船，在海軍人民委员会的水道測量局工作过。战事爆发前不久，他进行了博士論文答辯，这个消息我是从莫斯科晚报上看来的。

我以后就称他为尔同志。

……我这次在他家里找着了，正如尔同志所說的，是一件“千載难逢”的稀罕事。他的房子已經上了封条，只是因为他这次要离开列宁格勒，而且一去很久，所以又把房子启开了，进門才不过两分鐘。

“上哪兒去？”

“到很远的地方去。您来了以后我再告訴您。您住在哪兒？”

“暂时还没有地方。”

“那太好了。我等着您。”

他住在利金橋旁一座新樓房里的一套寬敞住宅里。战争爆发后一年以来，屋子自然疏于整理，不过还叫人感觉出里面有着一种詩意，仿佛是一个演員的住房似的。这也許是因为鋼琴上玻璃罩里的几个縫制得很艺术的玩偶，也可能是因为地板上和書架上的这許多的書籍，也可能是因为主人自己。他只穿了一件衬衣，領口敞着，露出丰满多毛的胸膛，很随便地接待我，所以才使我产生了这样的感觉。我曾經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一张类似他这个样子的謝甫琴科的画象。不过尔同志可不是詩人，而是一位海軍少将；只要看一下挂在安乐椅背上的他的軍服上衣，就不难証实这一点。不論在什么地方，不論在什么时候，只要我們一見面，他从第一句話开始，便是叙述現在他認為最主要的事情。这毫无疑問，是因为我們的兴趣总是在“最主要的”事情上，很少涉及到私人的或日常瑣碎工作方面的問題。

但这次他却首先问我战后这一年都在什么地方，作了些什么事。

“是的，运气不好，”在我对他诉说了自己不幸的遭遇以后，他说道。“不过，您还可以迎头赶上。您是怎么搞的，一会儿在波罗的海，一会儿又在黑海舰队，‘背叛’北方了吗？我还把你当作一个永远忠实于北方的人哩。”

要叙述我“背叛”北方的原因实在太复杂。所以我只是辩解，我是在完全失去了回到北方的希望以后，才离开民用航空局的。

尔同志没有应声。他眯缝着一双乌黑灵活的眼睛，一面揪着他那已经斑白稀疏的哥萨克式的额发。我不知道他这时在想什么。我们靠窗坐在安乐椅上，这扇窗子当然也和所有房屋的窗户一样被震碎了。从这儿可以看见利金桥，桥那边停泊着许多船舶，油漆得奇奇怪怪鲜艳夺目，使人很难分辨出从哪儿开始是岸上的房屋，从哪儿开始又是军舰。街上空荡荡的，——我心里暗想，这“好象早晨五点鐘”。后来，我回忆起卡佳有一次对我说，就她个人说来，她没有生在列宁格勒城是一个错误。

我想得正入神，尔同志招呼了我一声，我不禁吓了一跳。

“喂，您躺下睡觉吧，”他说道。“您累了。我们明天再谈。”

他不容分辩地拿来枕头，取下了长沙发上的靠垫，强迫我睡下。我一眯眼就睡着了。象是有人踮着脚走近前来，他沉吟了一会儿，便将一块黑黑的，厚实的铺盖抛在这一天中所发生的全部事情上了。

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天色还很早，大约是四点鐘左右。可是尔同志已经起床了，他正在用旧报纸遮盖书架。我想到他今天

就要走了，不由得引起一陣莫名的悲淒。他靠著我坐下來，不讓我起床，便開始講了起來。毫無疑問，他所講的是“最主要”的事，如果我不是那麼疲憊的話，他昨天就會告訴我了。

……在我們今天，即便是一個小學生，對於在一九四二年夏季，從英國和美國通到蘇聯的廣闊的海路上所發生的事件，至少也有一個一般的概念。可是那時候，我雖然對北方的興趣從未中斷過，並且經常從報刊上搜集有關北方艦隊航空兵活動的每一項消息，但爾同志當時對我講述的一九四二年夏天所發生的事對我說來，卻還是一件新鮮事兒。

他攤开了自己寫的一本書里所附的地图，但沒有立刻找到那張他能夠從上面指出戰區界限的地图來，據他說，海軍和空軍經常活動的這一個大戰區就是這樣的。他把巴倫支海上當時發生的一場大戰對我描繪了一番，他講得很簡要，然而也比我後來在一些專門論著中所讀到的要詳盡得多。我專心一意傾聽着他講關於袖珍潛水艦沖入敵人的主要海軍基地——彼得薩莫灣的英勇的航行故事，關於在海洋上空击落二十五架敵機的薩富諾夫的故事，關於那些在雪幕的掩護下，——我現在還忘不了雪幕是怎麼一回兒事，——攻击運輸艦的飛行員們。我在聽他講的時候，一種不幸的感覺在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這麼深切地刺痛了我。爾同志所講的正是我嚮往的北方啊。

我從他那兒第一次知道了什麼叫“運輸隊”。他把可能的“會合”點指給我看，這也就是秘密議定的英美軍艦會合的地点，他並且還給我解釋，這些軍艦怎樣在我國旗幟的保護下進行交接工作。

“你看，這就是它們航行的地方，”當然，他指的僅僅是個大概的輪廓。因為在一九四二年，關於這條航路的情況還是不許

到处宣扬的。“这是由一、二百艘船只组成的纵队。您猜猜看，这些船只在哪些地方最困难？”接着，他大致地指了一个地方。“不过我们且不去操心西方的航路，何况这儿（他指了一个地方）有极其精明强干的人坐镇。让我们来谈谈其它一些重要性不亚于此的事情吧……这就是德寇力图要封闭的大门，”他急促地说道，把一只手盖在从巴伦支海通往喀拉海的出口处，“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这一着的作用，最低限度，他们是了解某些矿区对航空发动机制造业的意义的。当然，北方海路的运输作用也是他们很不喜欢的，何况今年春天他们就曾经希图……”

他没有把话说完，可是我领会了他的意思。我曾经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德寇在春天曾经严重地破坏了对西方航路有极其重大意义的一个港口。

“你想想看，战火蔓延到什么地方来了，”尔同志继续说道，“德寇的潜水舰甚至不久以前，还在新地岛附近扫射过我们的飞机。然而事情还不仅如此。我今天就要坐北方舰队军事委员会派来接我的飞机到莫斯科去。飞行员卡良庚少校对我说，他狩猎德国鬼子的一只袭击舰已经两个礼拜了，您猜猜看，在什么地方？在……”

他说了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

“简单地讲，战火已经燃烧在过去只有水道测量学家和白熊出没的地方。所以他们也就想起我来了，”尔同志微笑道。“不仅想起了，而且还……”他脸上显得十分和善和愉快，“而且还委托我作一件极有趣，极重要的工作。当然，关于这件工作我什么也不能对您说，因为这实在是军事秘密。我只准备说一点，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您。正好您这时就来了电话，这真巧极了。亚历山大·伊万内奇，”他认真地，甚至是郑重其事地说道，“我建

議您和我一起乘飞机到北方去。”

16 决 定

他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留在这空虚的，仿佛是没有主人的消夏的住宅里。所有这三间宽敞的房间都归我支配，我可以在里面转圈，可以随随便便地思想。尔同志准备十五点钟回来，那时我就应该向他說一个简短的字：

“行。”

或者，稍微复杂一点的：

“不行。”

在这两者之间，摆着一条多么遥远，多么艰苦的道路啊。我沿着这条道路走着，走着，休息休息又走，总看不见头，看不见边！

德国鬼子正在炮击这一带。第一颗试射的榴霰弹已经爆炸很久了，烟雾虽然在缓缓地消散，却还笼罩在利金桥上空。刚才远处的爆炸声突然迫近了，粗鲁地从右向左往城区里迈着大步，直向着这座房子，向着我徘徊在彼此相距无穷远的“行”与“不行”之间的空房子。

……这一间大约是儿童室。独眼的小黑熊玩具悲伤地，垂头丧气地蹲在厨柜上，一只儿童玩的双轮滑板车扔在墙角里，在一张矮圆桌上放着积木和玩具；我脑子里不禁浮现出一个小尔同志的形象，他也是那样劲头十足，克制着一股热情，长着哥萨克式的有趣的额发，和一张圆脸蛋儿。我在这间房子里暂时摆脱了“行”与“不行”的纠缠，舒了一口气。甚而还可以在这里寻味

一下我和卡佳曾經計劃建立在列宁格勒的家庭。哪兒有家，哪兒也就有孩子。

炮弹的爆炸声愈来愈近。有一颗炮弹就在附近爆炸了。房門忽地震开了，什么地方玻璃带着悅耳的声音撒落在地上。在随之而来的一陣寂靜中，街上传来脚步聲，我往窗外一看，見到两个男孩朝这座房子跑来，我覺得他們脸上的样子很可怕。眼看着他們两人跑在一起了，第一个男孩子在另外一个的背上拍了一下，哈哈大笑著往回跑，他們是在玩捉迷藏的游戏。

……尔同志在十五点鐘就要回来，我一定对他說：

“行。”

对于战争期間的每一个苏联人說来，游手好閑的生活都是最难熬和最可耻的！就当我沒有过这半年折磨人的，无所事事的生活吧！我一定要到北方去。这几年来，北方离我愈远，我就愈感到它亲切，愈有誘惑力。难道我在西方和南方沒有竭尽全力战斗嗎？然而我應該到北方去，去保卫我所了解和热爱的边疆。

这时我突然停下脚步，自言自語地說道：

“可是卡佳呢！”

离开这兒，丢下她不管？长年累月地在外远游？也不先找一找彼加，說不定只是他的軍邮代号变动了一下呢？为什么不在列宁格勒这兒，以及在列宁格勒战綫采取其它的办法来寻找一下再說呢？無論卡佳疏散到哪里，她在任何情况下，一定会爭取和尼娜·卡比丹諾芙娜以及小彼加取得联系的。难道要失去这条綫索嗎？这条綫索虽然渺茫，虽然不明显，但却很可能通到她所在的地方；她現在正受着痛苦的折磨，因为那篇該死的报导不可能不被她看到。

决定了，我决定在列宁格勒再留几天。等我找到卡佳后再去北方。

尔同志到十五点鐘便回来了。我把自己的决定告訴了他。他听完了我的話說道，假如他处在我的地位，也要这样做。

“不过，我們應該一块兒去莫斯科。我給您在部里办好手續，然后，司列普式庚再給您两礼拜的假期，讓您去处理家庭問題。妻子，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呀！更何况是那么一位好妻子呢！我还記得叶卡杰琳娜·伊万諾芙娜。她是一个聪明，善良的女人，总之一句話，是一个世上少有的十全十美的人！”

我第二天回到彼得格勒街，又訪問了七十五号房的許多房客；我到过美术学院，想了解彼加的地址，可是我只了解到彼加負了伤，曾在华西列夫島上的分組医院里住过。雕刻家科斯托其庚曾經去探望过他。可是这位雕刻家后来餓死了，而彼加（听人說）又回前綫去了。我往艺术珍品收藏所兒童营寄的信件都沒有寄到，原来兒童营又疏散到新西伯利亚去了。奥万涅桑医生陪我到区苏維埃去了一趟，他对一个漠不关心的胖家伙大发了一頓脾气，因为他拒絕調查卡佳的消息。所有这样一些事情，我都不准备再一一叙述了。

在雅罗斯拉夫专为列宁格勒人設立了一些医院，一月份有許多列車是开往那兒去的。这是我能够断定的，惟一无可爭辯的事实，而且許多和我談过話的列宁格勒人都認為應該到雅罗斯拉夫去寻找卡佳。

有两个情况使我深信这样作是对的。第一，艺术珍品收藏所兒童营在第二次疏散前，是在雅罗斯拉夫腋谷村。第二，露凱里亚·伊里尼希娜——那位口腔医院女打字員的名字——突然

對我說，她想起了一件事：特洛菲莫娃醫生正是把卡佳送到雅羅斯拉夫去的。

“我的上帝呀！”她惱恨地說道。“這樣的事還能憑着想象瞎說嗎？我忘記了，我的記憶力不行啦，這是缺糖的原因，我現在一點糖都吃不到。不過這回我雖然沒有吃糖，可是想起來了！我告訴您，去雅羅斯拉夫就能夠找到她。”

爾同志的飛機在半夜里飛走了。我先用電話聯繫了一下，在起飛前十分鐘趕到了機場。

17 不在家的朋友

假如把我從飛機著陸後，到火車出發前的幾小時內所走的路綫標在莫斯科地圖上，那很可能使人以為我是在想盡辦法，故意迴避那些我早就渴望着要和他們見面的人。儘管我想要看到他們的原因各不一樣，可是我說“渴望”看見的心情却是一點兒不假的。他們當時都在莫斯科。如果我們再看看地圖，就可以看到，他們那一天所走的路綫，或者和我所走的平行，或者晚那麼兩分鐘就通過我走的地方，再不然就是在鄰街上，僅隔了一道狹窄的建築物，對面錯過。說來說去，我這一天是不走運，除了一個例外的情況，我什麼人也沒碰見。

我從飛機場一直就奔公園路領子巷去找柯拉布略夫，好在我的全部行李只有一个小手提箱。

……老朽的木头釘起來的廂房已經傾斜，湮沒在許多改建的高大樓房中間，很象一座帶百叶窗和露台的鄉村別墅。伊萬·巴甫雷奇已不象從前那樣獨自占用着底樓的一半房間。虽

然我乍一看到莫斯科时，觉得它空虚得令人不惯，可是在这所小小的房子里，几乎每一个窗戶里都有人探出头来张望。台阶上有几个妇女在織毛綫，我刚一露面，就象是在恩斯克我們院子里的那次一样，至少有二十只眼睛帶着好奇的神情迎接我。

“您找誰？”

“找柯拉布略夫。”

“是伊万·巴甫雷奇嗎？走廊左边第二个門就是。”

“我知道，”我說，一面往台阶上走去，“他在家嗎？”

“您敲敲門看，好象是在家。”

我最后一次和伊万·巴甫雷奇見面是在战争爆发前。我和卡佳事先沒有通知老头，便帶着大蛋糕和法国葡萄酒到他那兒去了。他在隔壁房間里一面慢騰騰地刮着鬚子，一面和我們談話，我們就在翻看学校里的旧相片。最后伊万·巴甫雷奇出来了——穿着一套新衣服，領子浆得挺硬，唇上的鬚髥照青年人的式样向上卷着。今天，在这阴暗的走廊上，他的样子也一定会和那个值得紀念的、美妙的晚上一样。他馬上就会走出来，并且一眼就会認出我：

“薩尼亚，是你嗎？”

我在一扇熟悉的，釘着絨毡的門上敲了两三下。里面靜靜的一点兒声音也沒有。伊万·巴甫雷奇不在家。

“亲爱的伊万·巴甫雷奇！”妇女們都在瞅着我，我不願意讓她們发现我很着急，所以便躲在一边，給他写了一张便条。“我不知道是否还能再到您这兒来。卡佳一月間疏散到雅罗斯拉夫去了，我今天就要上那兒去。可能我还要到更远的地方，一直到找着她为止。我无法在这样一小张紙条上說明我遭遇的事情，和我們彼此失掉联系的原委。假如您或者瓦里亚（我希

望今天能够見着他)知道她的消息,請您立即写信到北极城,政治部海軍少将尔同志轉我收。亲爱的伊万·巴甫雷奇,我的死耗可能也传到您耳朵里来了,不过这张便条的确是我,是您的薩尼亚亲笔写的。”

至少有十只手同时向我伸过来拿这封信……

地下电車站变得似乎比以前更美丽,更雄壮了。我乘車到了苏維埃宮,果戈理林蔭道上坐着一些老年人,他們拄着专为上了年紀的人預备的粗手杖,脸上那付神气,就好象战争老早老早就已經結束了。孩子們在街头游戏,——就在这一刹那,被焦急和忧虑占据了的我,才初次感觉到这兒到底是莫斯科呀!

瓦里亚家的門上挂着一块銅牌:“瓦連金·尼古拉耶維奇·朱可夫教授”。嗨!成了教授!我按了按門鈴,敲了敲門,随后又踢了一脚。

在一九四二年夏天,几乎所有的莫斯科人都在工作单位住宿的时期,我在白天,在工作時間內,沒有在家里找着朱可夫教授可以說是毫不奇怪的。但是瓦尔加,我的瓦尔加,总是在我极端需要他的时候,跑到別的什么地方游蕩,这种印象使我非常憤慨。我对准門又踢了一脚。它象懂人事似的突然讓步了,訴苦般地吱軋响了一声。我拉了一下門把手,門就开了。

自然,房間里是空空的沒有一个人,我原先以为瓦尔加可能睡着的一綫微弱的希望刹那間也落空了。我走进那間曾經既是餐厅,同时又是兒童室的“外厨房”。真也奇怪,这間“外厨房”怎么收拾得这么干淨!桌上鋪着桌布,擱板上吊着各种花样的白色剪紙。从这儿面扫得十分清洁的墙壁,以及摆着新鮮鈴兰花和夜来香的窗戶上,可以想見这是經過女人的手布置的。嗨,瓦尔加居然买起花来了!——只有伟大的艺术家才能設想瓦尔加

养花的画面。

我走进了“内厨房”。墙边放着一张窄窄的铁床，床头放着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连衣裙；卡佳从前也有过这么一件带白豌豆花的天青色连衣裙。住在瓦里亚的这间“空房”里的女人究竟是谁呢？我从卡佳的头几封信中，就知道琪拉在战争一开始时便带着孩子走了。“我的宝贝儿，究竟谁把你缠上了？”我不由得想起了卡佳的一封信。她在这封信里嘲笑琪拉，说她为自己那埋头研究玄狐混合种的丈夫和一个“两只眼睛不一般大的姑娘任卡·柯尔巴克察”相好而吃醋。这位任卡·柯尔巴克察虽说两个眼睛不一样大，但却不肯放过机会呀！

说来说去，我还是没有找到瓦里亚。

“我亲爱的瓦列其卡，”我给他写道，“我现在要到雅罗斯拉夫去，希望能在那里找到卡佳，即使能了解到她的情况也好。我在途中顺便来看望您，非常遗憾，没有在家里碰见你。我没得到卡佳的任何消息已经半年了。她在列宁格勒时曾经和琪拉通过信，也许琪拉或者您能知道一点她的情况吧？我受伤后便在牢城住院，曾经给你写过信，但没有收到回信。我历尽了千辛万苦，但是，如果我们彼此能知道对方都还健在的话，哪怕不见面，心里也会感到轻松一些。来信请寄北方舰队，地址是北极城政治部海军少将尔同志转。这是我惟一可靠的地址，我暂时没有其它的通信地址了。亲爱的朋友，祝你健康。门是自己开的。你现在只好把它打坏才能进去，——这样总比让房门敞着要好些。我也许在离开此地之前再到你这儿来一趟。”

我把条子放在“外厨房”的桌子上。然后把门上的锁拾掇了一下，好让它能够自己掉到锁眼里去，于是用力把门一带，便很巧妙地锁上了。

我在这兒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距离瓦里亚亚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人，我一定要去拜訪他。至于主人是否欢迎我这个客人，我却并不十分在乎。

我早就要去拜訪他了！

在医院里，每当夜間不能成眠，輾轉呻吟在梦囈之中的时候，我就想着这次的会見。我是这样的需要他，甚至在我沒有見到他之前，似乎死了也是不甘心的。

我不止一次地給自己描繪着这次見面的情景。有时，我想在他生活中最輕松愉快的一刻，譬如在戏院里，当他根本沒有想到我的时候出現在他的面前。有时，我又想在旅館里，我把門反鎖上，盯着他微笑。有的时候，我会在黎明前朦朧的晨光中看見他盘着腿，就坐在邻床上，他那扁平的眼睛半睜半閉着，眼光显得冷酷怕人。

18 老相識。卡佳的相片

卡佳有一次同我走过义犬廣場时，說：

“羅馬紹夫就住在这兒。”

她指着一座暗綠色的，与左右两边的房子似乎毫无区别的房子給我看。無論是那个时候，或是現在，我似乎都觉得在这些剝落的墙壁里，有那么一个捉摸不定的卑鄙的东西存在。

旅客表已經不象战前那样挂在門上了，我只好到房管会去了解他的住所號碼。

在房管会里的經過是这样的。公民証登記員是位一脸火气的旧式太太。她戴着夹鼻眼鏡，当我問起她羅馬紹夫的时候，

她突然打了一个哆嗦，把眼睛睜得滾圓。在這間小木板房里有許多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胸前都扎着围裙，看樣子都是一些清掃工人，他們之間似乎也發生了一點騷動。

“您應該先給他挂一個電話，”登記員好心地建議道。“他家里剛好昨天裝了電話機。”

“不用，這樣更好一些，用不着先打電話，”我笑着說道。“這樣會更突然一些。因為我是他的老朋友，一個他認為早已報銷了的老朋友。”

我的這一番話里似乎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但是登記員却很不自然地笑了笑。從隔壁一間也是板壁的屋子裡，走出一個動作遲緩的，非常沉靜的年輕人，他戴着一頂頗為高級的鴨舌帽，仔細地打量了我一番。

從正門進屋需要從大街上繞道才行。我在正門前稍微放慢了一下腳步。我身上沒有帶着武器，也許應該對那位站在拐角處的民警先打個招呼。後來我反復地想了想，又改變了主意：“他跑不了”。

我从不懷疑他是住在莫斯科的。他可能不在部隊里工作了，不過即使在部隊里的話，那他也還是會在自己家里住宿的，再不就是在別墅里住宿。他早晨總是愛穿睡衣。我仿佛看到了一個逼真的羅馬紹夫的形象，他洗完了澡以後，穿着睡衣，一團濕淋淋的，亂七八糟的黃頭髮豎在頭上。這是一種錯覺，使得我眼前冒起了許多淡紫色的光圈兒。應該鎮定一下，也就是說應該想點別的事情才對。於是我想起了十七點鐘，爾同志將在水道測量局等我。

“誰呀？”

“可以見羅馬紹夫同志嗎？”

“过一个鐘头再来吧。”

“請您讓我在这兒等一等米哈依尔·华西里耶維奇好嗎？”我很客气地說道。“很抱歉，我沒法再跑一趟。恐怕他会因为我們沒有見着面而感到遺憾的。”

鎖鏈子嘩啦响了一声。但是並沒有取下来，相反地却挂上了，为的是把門稍稍打开一点兒好看一看我。接着鎖鏈子又响了一声，这回才算是真取下来了。不过还在下門門，接着是鉄的磨擦声，鑰匙的启动声。一个穿着寬大的衬褲，系着吊带，敞着內衣的老人把我讓进了門厅里去。他哈着腰，狐疑地盯着我打量。在他这张长着一个鷹鼻子的干巴脸上，透露出貴族式的傲慢和可怜相。一綹斑白的黄头发翘在秃头頂上，脖子上喉結地方垂着一块长长的皺皮，好象鐘乳石一般。

“您是維什米爾斯基爵士嗎？”我驚訝地問道。他打了一个寒战。“就算不是‘爵士’吧，但反正一样，是維什米爾斯基·尼古拉·伊万內奇，是嗎。”

“什么？”

“可敬的尼古拉·伊万內奇，您不記得我了吧？”我显得很愉快地繼續說道。“我到过您家里。”

他抽送了一下鼻孔。

“到我家来过的人多着哩，成千上万，”他苦丧着脸說道。“一张桌子上曾經坐到四十个人。”

“您从前在莫斯科剧院里工作过，还穿过那种扣子雪亮的号衣。在我的朋友格里沙·法伯尔扮演紅头发医生的那一次，伊万·巴甫雷奇·柯拉布略夫在他的化粧室里介紹我們認識的。”

我为什么这样高兴呢？我象是主人一样地站在羅馬紹夫的住宅里。再过一个鐘头他就要回来了。我半张着口在微微呼

吸。我将怎样对付他呢？

“不知道，不知道！您贵姓呀？”

“我是格利高里耶夫大尉，我很愿意为您效劳。您现在就住在这兒嗎？住在羅馬紹夫家里？”

維什米爾斯基猜疑地看了看我。

“我的戶口在哪兒，就住在哪兒，”他說道，“不是住在这里。管理員知道我住在哪兒，不是这里。”

“明白了。”

我掏出烟盒，高高兴兴，啪的一下打开盖子，請他抽烟。他把烟接了过去。隔壁房間的門大开着，屋里所有的东西——墙壁，沙发，和沙发前的一张小圓桌都非常洁淨，呈现出淡灰和深灰色。就連沙发上方挂着的一张什么人的大相片也是用光洁的，淡灰色相框嵌着的。“一切都很协调，”我还是很高兴地想道。

“哪一位伊万·巴甫雷奇呀？是作教員的嗎？”維什米爾斯基突然发問道。

“是教員。”

“不錯，是柯拉布略夫。他是位很好的人，杰出的人。瓦列其卡跟他学习过。紐达沒有，她是柏尔若佐夫斯卡雅女中毕业的。不过瓦列其卡是跟他学习的。那还有錯嗎！他不断地帮助……”在他那长着大鬍子的老脸上，閃露出一種只有鬼才知道的感情，然而是一种善良的感情。

老头兒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急忙把我讓进屋子里，——我們这时还站在前厅里，——并且問我是不是刚下車的。

“如果是刚到的話，”他說道，“那么可以到軍人食堂去，根据出差規定，花不了几个錢就可以买到一份挺不錯的，有面包的午

餐。”

他还在刺刺不休地唠叨着，可是我这时已经沒在听他說話了。我大吃一惊地站在門口，原来在沙发上方淡灰色相框里嵌着卡佳的相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漂亮的相片。这是她穿着战争前夕自己刚縫好的，一件十分合身的灰鼠皮大衣拍的全身象。为了这件衣服，她那时曾費了很大的劲兒，专门找一位名叫曼蕾的名裁縫作的，并且还因为我不懂得帽子和暖手筒也要用同样的皮子而嗔怪我。我的天哪，这张相片說明什么问题呢？

这时在我脑子里至少有十种不同的想法互相推拽着，其中也有使我直到現在一想起来就感到慚愧的，荒謬的想法。我什么都想遍了，只是沒有想到真实的情况，原来真实的情况比我这些荒謬的思想更荒謬！

“尼古拉·伊万內奇，說实話，我真沒料到在这兒碰見您，”我說道。这时老头不断向我介紹自己的情况，說他离开剧院后怎么进了精神病院，也是在衣帽間工作，因为“疯人不断向事务长彙报，說他每天偷菜湯，留着晚上喝”。

“这么說来，您是在羅馬紹夫这兒工作罗？或者只是因为朋友的关系？”

“对，是朋友关系。他請我帮忙，我也就答应了。我过去跟大主教伊西多尔当过秘書，我并不隱瞞这回事，相反地，我把它填写在履历表內了。这是一件巨大的工作，是一种巨大的劳动。光信件当时我們一天就要收到一千五百封左右。現在这兒也差不多。不过，我在这兒工作是因为情面关系。我也領了工作証，米哈依尔·华西里耶維奇把我安插在他的机关里了。机关內部也都知道我在这里工作。”

“难道米哈依尔·华西里耶維奇現在已經不在軍隊工作了嗎？我們分手的時候，他还穿着軍裝呀。”

“对，他現在不在軍隊里了。他是一个有特殊需要的人。詳細情形我不知道。他服役到战争結束時为止。”

“您每天收到的都是些什么信呢？”

“这都是极其重要的文件，”維什米爾斯基說道，“非常重要，因為我們有任务。我們目前的任务就是寻找一位妇女，一位夫人。不过，我疑心这不是任务，是私事，也可以說是爱情吧。”

“她是位什么妇女？”

“是一位历史人物的女兒，这个历史人物我很熟悉，”維什米爾斯基带着驕傲的神情說道。“您大概也听到过有位姓塔塔林諾夫的人吧？我們現在就是寻找他的女兒。要不我們早就把她找着了，但头緒太乱。她早已出嫁，所以她有两个姓氏。”

19 “你杀不死我”

生活似乎是在奔馳着的时候突然停頓下来，我因为没有估計到运动的慣性，所以前額在一堵臆想的牆壁上狠狠地撞了一下。我看着面前这个一般說来还算正常的老人，这时我心中的感觉就是这样。是他站在这間明亮，也还正常的房間里，告訴我說，羅馬紹夫也在寻找卡佳，也就是說，他也在作我所作的事。

但是我們的談話仍然象什么事情也沒有发生似的繼續下去。維什米爾斯基从卡佳的問題又扯到了某个地方委員身上，

說他沒有權利稱他為“舊職員”，因為他有“五十年的工齡”。後來他又沉溺在回憶中，他敘述一九〇八年自己每次從戲院走出來時，驗票員就吆喝：“維什米爾斯基老爺的車！”馬車就拉到他跟前來。那時他戴的是大禮帽，穿的是斗篷，這些東西現在都不時髦了，他感到“很可惜，因為這種穿戴很漂亮”。

“他什麼時候去世的？”他突然冒出這樣一個問題，把他那鐘乳石般的皮膚使勁地往下拉了一下。

“誰？”

“柯拉布略夫。”

“怎麼去世了呢？他不是好好活着嗎？尼古拉·伊萬內奇！”我用开玩笑的口吻說，可是心里却在發抖，想道：現在一切都要見分曉了，可得當心點兒，“您說這是私事，對嗎，關於那位夫人呢？”

“是呀，是私事。但却是非常緊要的私事。塔塔林諾夫船長是一位歷史人物。米哈依爾·華西里耶維奇到過列寧格勒。在封鎖期間他餓得連牆紙上的漿糊都吃了。他把牆上裱糊的紙撕下來煮着吃了。後來他出差去收購肉類，可是等他回來時一個人也沒有了。都被送走了。”

“哪兒去了呢？”

“問題就在這裡，”維什米爾斯基鄭重其事地說道。“您知道，這次是怎麼撤退的嗎？您去找找試試！主要的問題是，如果她是用火車送走的，那只要了解那是哪個單位的列車就行了。假定說是冷藏聯合企業的專車，這趟列車到哪兒去了呢？到西伯利亞去了，那麼她也就在西伯利亞。但她是用飛機送走的。”

“怎麼，用飛機？”

“是哇，显然她是优先被送走的。所以她就下落不明了。看你怎么去找吧。只知道飞机通过了赫沃依那雅站，也正就是从米哈依尔·华西里耶维奇去取肉的那个车站上空飞过。”

这时候我大概本能地感觉到什么时候应该不说话，什么时候应该说上两三句话。一切都处理得很好。一位军人嘛，大概是才从医院里出来的，又瘦又黑，前来访问一位在前线分手的朋友，问他现在干什么，生活怎么样。“现在一切都要见分晓了，可得当心点儿”。

“喂，怎么样？找着了嗎？”

“还没有。不过根据我的方案，是会找着的。”维什米尔斯基说道。

“我写信给布古鲁斯兰中央问事处，不过，结果简直是扯淡，他们给我们寄来了十来个姓塔塔林诺娃，成百个姓格利高里耶娃的女人的材料，可是我们不知道应该首先从哪个着手找起。因此我就亲自找到各省城的执行委员会主席。这真是一种巨大的劳动，一个重大的任务。不过，塔塔林诺夫是我的朋友，所以为了寻找他的女儿，我三个月来一直在写这些千篇一律的询问信——求您指示，疏散站，历史人物，等候回音等等。这样一来，我们就收到了这些东西。”

响起了一阵刺耳的门铃声。维什米尔斯基说道：

“这是他。”

他的脸显出了惊恐的颜色，头上那一撮尖细的白发哆嗦起来，八字髭也垂下来了。他走到门厅里去，我慢吞吞地在靠门的墙边站了起来，为的是让罗马绍夫不致于一进门立刻发觉我。

他完全来得及跳到楼梯口去，因为維什米爾斯基在門厅里便对他說：

“有人在等您。”

他急忙問道：

“是誰？”

老头兒回答道：

“一个姓格利高里耶夫的人。”

他並沒有甯出去，虽然他完全来得及这样作，——我这时的动作仍是不慌不忙的。他站在衣櫥和牆壁之間黑暗的角落里，他看見我以后，先是惊叫了一声，然后象小孩子一样举起拳头遮住了脸。外面一道門上插着鑰匙，我把它在鎖眼里轉了一下，取出来放进口袋里去了。維什米爾斯基停在我們中間，我不小心碰了他一下，順手象抱玩偶似地把他換了个位置。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又碰了他一下，他机械地倒在安乐椅上了。

“喂，我們談談去，”我向羅馬紹夫說道。

他沒有吭声。他把手里的鴨舌帽放到嘴上，用牙紧紧地咬住。我又說道：

“喂！”

他疯狂地搖了搖頭。

“你不去嗎？”

他喊道：

“不去！”

但是他乍看到我时那种絕望的神情，这时已經快沒有了。我拉住他的手，他把腰杆挺得笔直，我們走进房間。这时，除了一个眼睛稍稍有些歪斜外，他的脸色已經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付样子，变得平靜，麻木了。

“看見了吧，我還活着啦，”我小声地說道。

“唔，看到啦！”

我這時可以仔細地看一看他了。他穿着一身灰色的單西服，上身翻領上佩着黃色的綬帶，這是受過重傷的記號，可是事實上，他只受了一點極輕微的震傷。綬帶下面有一顆扣子在暗中閃閃發光。他現在長胖了。要是沒有他那對向上豎着的，可以和扣子媲美，能在暗中發亮的紅耳朵的話，可以說，他從來還沒有這樣的象一個體面的紳士呢。

“手槍拿來。”

我以為他會撒謊，說在復員的時候已經上繳了。不過我的手槍上刻着名字，這是我轟炸納羅瓦河的橋梁後，團長獎給我的。如果羅馬紹夫把槍上繳，那他一定會暴露自己。這就是為什麼他會一聲不響地拉开書桌抽屜，取出了手槍來。槍里沒有壓子彈。

“文件呢。”

他不吭聲。

“喂！”

“弄濕了，丟掉了，”他慌忙說道。“在列寧格勒防空洞被水淹了。我當時失掉了知覺。只有契同志的相片保全下來了，我已經把它交給卡佳。她是我救活的。”

“真的嗎？”

“是的，是我把她救活的。所以我不駭怕。反正你不能把我殺死。”

“走着瞧吧。畜生，你把一切經過都說出來吧，”我一把抓住他的領口，他頓時呼吸微弱起來了，所以我連忙又把手鬆開。

“在她只剩一口氣的時候，我把所有的東西都給了她。唉，你

不相信我，”他从旁边歪过身子，想要看一看我的眼睛，一面拚命的喊道。“但你会相信我，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你什么也不知道。我不喜欢你。”

“真的嗎？”

“我为什么要喜欢你？你把人生最美好的东西都从我手里夺走了。我可以干出許許多多的事情，”他傲慢地說道。“我的运气一直很好，因为周围都是些笨蛋。我本来可以飞黃騰达，可是我不在乎这些！”

“我不在乎这些”，——这話說得未免太响亮了。据我所知道的，羅馬紹夫不仅在乎这些，相反的却是一貫拼命追求名利。并且他在这些方面是一帆风順的，特别是想到他在小学的时候就是一个笨到极点的蠢物，那么更可以說，他是十分走运的。

“你好好听我說嘛，”羅馬紹夫說，他的脸色更加惨白，虽然看来已經是不可能再白了。“你要相信我，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关于寻找塔塔林諾夫船长探险队的事是我破坏的！起初，我帮着卡佳搞这件事，因为我相信你会一个人去的。可是后来，她决定同你一块兒走，所以我就把探险队搞垮了。我写了一份报告書，这是一份很冒险的报告書；如果我不能証明这份报告書的真实性的話，那我自己就要栽斤斗。但是我成功了。”

在印着金字“米·华”的灰色皮文件夹里放着一叠紙片。我抽出了一张，羅馬紹夫怔住了，他睜圓了眼睛，向我头上的什么地方望着。他仿佛是努力想要看到時間的前面去，想要看到自己的将来，企图知道和猜出我从公文夹中抽出一张紙，把它放在面前的这一簡單动作对他有什么威胁。

“也好，你写吧，”他說道，“出头阻止探险队的这个人后来被流放，死掉了。沒关系，如果你認為这些事还有价值的話，那你

就写吧。”

“一点价值也没有，”我冷冷地说道。

“我说你是神经病，满脑子就是要找一个不知在什么地方失踪了二十年的塔塔林诺夫船长。我说，我从小读书时就认识你，知道你向来就是个神经病。不过，在你这些活动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你娶了塔塔林诺夫船长的女儿作妻子，你为了达到自己往上爬的目的，所以就借着船长的名字大作文章。这份材料不是我一个人写的。”

“当然啦！”

“你还记得‘保卫学者’那篇文章吧？那是尼古拉·安东内奇发表的。我们在报告书中也引证过这篇文章。”

“也就是在诬告中，是不是？”

我这时已经开始记录他的话，并且尽可能地记得快些。

“对，就算是在诬告中罢。我们确切地证明了一切都是真实的！我把这张纸塞给尼娜·卡比丹诺芙娜，骗她也签了个名。我的主啊，后来要设法使他们不传她去作证是多么困难哟！真是困难极了！你甚至还不知道这一着害得你有多苦！你在民航局，以及在参军之后一定都受到了影响，一定的！”

怎样才能表达出我在听完他这篇供状后心中所产生的感觉呢？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出这件事实的真象，不过，他这次不算很复杂的花招很快便揭穿了。从前我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总要有意无意地想到的一些事，这时，仿佛是在一道迴光反照下，变得昭然若揭了。

20 暗 影

“起因說来很早，还是在小学的时候便开始了，”羅馬紹夫繼續說道。“我那时要天天开夜車，才能在課堂上回答問題象你那样流利；我希望自己不去想錢，因为我看到金錢引不起你的兴趣；我幻想能成为象你那样的人，幻想自己能成为你。我感到痛苦，因为你在各方面永远都比我高出一头，比我强。”

他的手打着哆嗦，从桌上的玻璃盒里抽出一支烟来，到处找引火。我燃着了打火机。他吸着了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便扔掉了。

“有的时候，我在大街上遇見你；我常常在一些路口上躲躲藏藏，象一个影子似的尾随着你。在戏院里，我就坐在你的背后。天哪！我究竟和你有什么不同呢？然而我知道，我看到的舞台和你們看到的不同，因为我看一切問題的眼光和你完全不一样。是的，不仅卡佳是我們爭奪的焦点，甚至我感觉到的一切随时随地都和你感觉到的在作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你的情况很了解的原因。你曾經在伏尔加河农业航空队工作，后来又在远东工作。当你再次申請去北方，沒有被批准时，你就到西班牙去了；天哪，我长年累月，梦寐以求的事情这次仿佛是驀然間不請自来了。但后来你又回来了，”羅馬紹夫憎恶地喊道，“并且自此以后，你的一切反而順利了。你和卡佳一块兒回到恩斯克去，——你看，甚至連你自己早已忘記了的事，我却都知道。你自然可以忘記，因为你是幸福的，可是我却不能，因为我不幸的。”

他神經質地嘆了一口氣，閉上了眼睛，後來他又把眼睛睜開。在他那迅速的一瞥中，有一個清醒的、銳敏的、和這番熱情的自白截然不同的思想倏然閃過，我默不作聲地聽着他講下去。

“不錯，我想把你們拆散。因為愛情是你畢生最大的幸福。我嫉妒得要死，我想你之所以愛她純粹是由于愛她；而我呢，却還因為要想把她從你手里奪過來。我現在居然和你談起戀愛的事情來，這似乎有點可笑！但爭奪的結果是我失敗了。對我說來，這種恥辱比起你依然活着以及命運又欺騙了我這兩件事更為難堪。”

門廳里響起了電話鈴聲。是維什米爾斯基在回話：

“對，他回來了。您是哪兒呀？”

但不知道為什麼他沒有來叫羅馬紹夫接電話。

“這時戰爭爆發了。我自己也報名參了軍。我本來可以緩役的，可是我拒絕了。如果我被打死的話，那就太好了！不過，我心里暗暗地希望你死掉，希望你！有一次我正躺在溫尼察一間庫房里，一個飛行員走過來，他站在門口讀報。‘真是好樣的！’他嚷道。‘可惜燒死了。’——‘誰呀？’——‘格利高里耶夫大尉和他的機組。’我把這篇報導讀了千百次，把它背得滾瓜爛熟。幾天之後，我在軍用列車上就遇見了你。”

這實在是天大的怪事，仿佛因為我沒有滿足他的希望，居然還敢活着，所以他現在就可以要求我同情他似的。但他談得那麼起勁兒，一點也不去注意自己處境的尷尬。

“後來的事情你都知道了。這簡直是一場噩夢，我想起來就感到慚愧！還在火車上的時候，使我感到十分吃驚的是你似乎並沒有在想卡佳。我看到你所痛心的是當時那種混亂局面。這些都是你的作風，你為了不再撤退，甚至願意付出自己的生命。

对于我来说，这只不过是再一次地说明了你比我高出一头，比我强。”

他住口不说了。他坐在我的面前，穿一身灰色单西服，满象一个仪表堂堂的绅士。仿佛在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小白杨树林，没有过一堆堆的潮湿的落叶，和妨碍了掄拐杖的木柴垛。仿佛我没有用肘撑在地上躺着，竭力忍住不去喊他：“罗馬紹夫，你回来吧！”我这时甚至把手都捏疼了，恨不得用手枪揍死他。

“不错，真可算得用尽心思了，”我说道。“请你顺便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吧。”

在他刚才忏悔的时候，我写好了一份“供状”，也就是破坏搜寻探险队的简单经过。我不会写公文，对我来说这是一件伤脑筋的事。不过“米·华·罗馬紹夫的供状”似乎写得还可以，因为我是照直笔录的：“卑鄙地欺骗了北方航务总局的领导”等等。

罗馬紹夫迅速地把这份文件阅读了一遍。

“好，”他低声说道，“不过我首先应当向你解释……”

“你先签字，然后再解释。”

“然而你不知道……”

“签字吧，卑鄙的家伙！”我当时说话的那种腔调吓得他倒退了一步。他的牙齿慢腾腾地，象是很勉强似的抖动得格格地响起来。

“签吧。”

他签了字，恶狠狠地扔掉了钢笔。

“你应该感谢我，可是你现在却想利用我的坦白来捉弄我。好哇！”

“不錯，想捉弄一下。”

他看了看我，这时他大概在后悔沒有在小白楊树林里結果了我的性命。

“我回到了莫斯科，”他繼續說道，“立刻就积极設法到列宁格勒去。我是經由刺多牙湖去的，德国鬼子在这里击沉了許多船只，但是我却到达了目的地，并且是准时到达的。謝天謝地，”他急忙加上了一句說，“只要再晚一天，那可就不知道要怎么样了，說不定我只能赶去給她送葬了。”

这件事可能是真的。当維什米爾斯基說到他去过列宁格勒时，我就想起了女清扫工和孩子們所談的那个紅头发少校。“她挖出一个紅头发的人，他带着面包。有一大口袋，总是自己背着，不肯給我。”但使我不安的是另外一种情况。羅馬紹夫会說服卡佳，使她相信我已經牺牲了，当然，說我是在战斗中，而不是在小白楊树林里牺牲的。

“我就这样来到了列宁格勒。你想象不到那时的情况。我領三百公分面包，一半送給卡佳。到了十二月底，我又搞到了一点兒葡萄糖。当我把葡萄糖給卡佳送去时，我把自己的手指都咬坏了。我倒在她的床前，她叫了一声：‘米沙’，但我連站起来的力气都沒有了。我救了她。”他伤心地又說了一遍，好象是因为我可能不相信他，使他又产生了一种恐怖的思想，“至于我自己为什么沒有死掉，那只是因为我确实認識到她和你都需要我。”

“我也需要你？”

“是的，你也需要。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写信給她，說你被打死了。等我去的时候，她由于过度的悲慟已經命在旦夕了。当我告訴她，說我看見你还活着的时候，她那一会兒的神情，——唉，要是你看到就好了！就在这一刻功夫我明白了自己是可耻

的，”他放开喉嚨大声說道。他的声音那么响，使得門厅里也咕冬响了一声，仿佛是維什米爾斯基惊得从椅子上滾了下来。“在这样的爱情面前我是可耻的。这时候，我痛苦得象被絞割一般，后悔自己有过要杀害你的想法。我是鬼迷了心窍。你的死亡不会給我带来幸福的。”

“說完了嗎？”

“对，說完了。我在正月間被派去赫沃依那雅出差。我离开了两个星期，等我把肉运回来时，房子已經空了。你大概也知道瓦丽亚·特洛菲莫娃吧，她送卡佳坐飞机走了。”

“送到哪兒去了？”

“我打听得很清楚，送到沃洛格达，后来，又到雅罗斯拉夫去了。”

“你問过雅罗斯拉夫的什么人嗎？”

“問过疏散站。站长和我熟識。”

“收到回信了嗎？”

“收到了，不过信上只說她經過疏散站，又被送到专为列宁格勒难民开办的医院里去了。”

“把信拿来看看。”

他从書桌抽屜里找出这封信递給我。“弗斯波里叶站，”我讀道，“关于您所詢問的問題……”

“怎么是弗斯波里叶呢？”

“疏散站在那兒。距雅罗斯拉夫两公里。”

“現在都說完了嗎？”

“說完了。”

“那就听我的吧，”我竭力使自己不要激动，对羅馬紹夫說道。“無論你怎样看待过卡佳，可是关于饒不饒恕你的問題，我都

不能决定。因为在你对我作出了那样的事情之后，这就已经不是我們私人間的爭執了。当你想要杀死我，杀死一个身負重伤的人，盜窃了我的东西，将我一人抛在树林里的时候，你不是在和我斗意气。这是屬於軍事性質的犯罪行为。你已經犯下了这样的罪，所以，首先应将你作为一个违背了軍人誓詞的坏分子来审判。”

我正冲着他的脸看了一眼，我感到很惊奇，他这时并没有在听我說話。有两三个人正朝楼上走来，脚步声在楼梯上咚咚地响。羅馬紹夫不安地向周围看了一下，站起身来。外面先是敲門，接着又按門鈴。

“开不开？”維什米爾斯基在隔壁問道。

“不开！”羅馬紹夫喝道。“先問清他是誰，”他仿佛是若有所悟，又小声地添了这么一句話，然后放輕脚步，差不多象跳舞似地在房間里走了一轉。

“誰呀？”

“開門吧，房管會來的。”

羅馬紹夫从紧閉的牙縫里吁了一口气。

“告訴他們，就說我不在家。”

“剛才來電話的時候，我不知道，已經告訴人家，說您在家。”

“當然在家啦，”我高声說道。

羅馬紹夫朝着我扑过来，抓住我的手。我推开了他。他尖声地叫喊起来，后来便跟着我走到門厅里去，象刚才一样，站在牆壁和柜厨的中間。

“請等一會兒，”我說道，“我馬上就開。”

門外走进来两个人——一个中年男子，从他那阴沉的，当家

人般的表情上看来，显然是房产管理員；另一个就是我在房管会見過的那个年輕人，他戴着一頂頗为高級的鴨舌帽，动作总是慢騰騰的。这个年輕人首先看了看我，然后不慌不忙地看了看羅馬紹夫。

“您是羅馬紹夫公民嗎？”

“是的。”

維什米爾斯基吓得牙巴直打战，声音那么响，使得大家不禁都轉过头来看他。

“有武器嗎？”

“沒有，”羅馬紹夫几乎是不动声色地回答道，只是在他那呆呆的面孔上有一条青筋不安地跳动着。

“好吧，把东西收拾一下。不用带多了：带点換洗衣服就够了。管理員，請您把犯人带走。大尉同志，請您把証件拿出来看看……”

“尼古拉·伊万諾維奇，这真是扯淡，真是乱弹琴，”羅馬紹夫在另外一个房間里大声嚷道，他正在那儿往背包里收拾自己的东西。“我过几天就回来。老是为那件牛羊下水的混帐事。您总該記得我对您說过从赫沃依那雅运回来的下水的事吧。”

維什米爾斯基的牙巴又打起架来了。从各方面都可看出，他根本沒听說过关于什么下水的事。

“薩尼亚，希望你能在雅罗斯拉夫找着她，”羅馬紹夫說这句话的声音更高，“請你代我問她……”

我从門厅里看見他把背包掉在地上，閉着眼睛又站了一会儿。

“行啊，沒什麼大不了的，”他自言自語地說道。

“对不起，您能給弄杯水喝嗎？”戴鴨舌帽的人問維什米爾斯

基道。

維什米爾斯基送給了他一杯水。這會兒大家都站在門廳里了；羅馬紹夫背着背包，管理員仍然一句話也沒有說，驚惶失措的維什米爾斯基手里擎着空杯子。大家沉悶了一會兒。後來便衣偵察員推開了門。

“再見。對不起，打擾了。”

然後，偵察員便很客氣地把羅馬紹夫請走了。

命運之神這次通過莫斯科民警局的代表來到了羅馬紹夫的住所，斷然地打斷了我們的談話。如果當時我有空閒時間的話，我也許要設法探聽一下其中原委，可是去雅羅斯拉夫的火車在二十點二十分開，而我還要作下面這幾件事：

一、去見司列普式庚。不僅是去，而且還要辦手續，這可能要占一個半小時；

二、去獎勵局。還在牢城的時候，我就接到通知，說我的第二枚紅旗勳章已經批准，可以到人民委員會去領證明書；

三、準備路上吃的東西。我從牢城帶來的食物都留給一個過去列寧格勒的同團戰友，現在波羅的海工作的飛行員了；

四、買票。不過這個問題我並不着急，因為即使沒有票我也要走。

此外，我還要給軍事法院檢察長寫羅馬紹夫的材料。

這些事我全要辦，也就是說，在上車前的四、五個小時里面，我的生活內容應該包括這幾項工作。不過，事實上我當時只需要再回瓦里亞·朱可夫那兒去一趟。到他家需要走五分鐘，這樣，說不定我就會利用這點時間，來考慮一下羅馬紹夫剛才在我面前企圖開脫自己的那一番真真假假的話了。

我甚至在阿尔巴茨卡廣場上還停留了一會兒。“是不是再到瓦里亞家去看一下呢？”可是我沒有去瓦里亞家，而是去理了一次發；去水道測量局應該先刮臉，換一條幹淨的領子才行，因為一位海軍少將打算在那里介紹我和另外一位將軍認識。

我在正十七點鐘的時候到了司列普式庚那兒，十八點鐘的時候，在水道測量局幹部部办好登記手續，領到了去北極出差的證明，在爾同志領導下工作。若是兩三年前，哪怕能看到這樣几句干巴巴的公事話，我眼前定會立刻出現一抹荒涼的遠山，被北極初升的太陽微弱的光芒照射着的情景。可是現在，我滿懷着心思和激情，只是機械地把證明書塞進了口袋，心里想着：唉，我干嗎不請爾同志用軍用电報和雅羅斯拉夫聯系一下呢，一邊想着，一邊走出了測量局。

我不準備敘述在獎勵局耗費了一個半小時這些事情了。可是應該敘述在莫斯科和一個人值得紀念的最后一次會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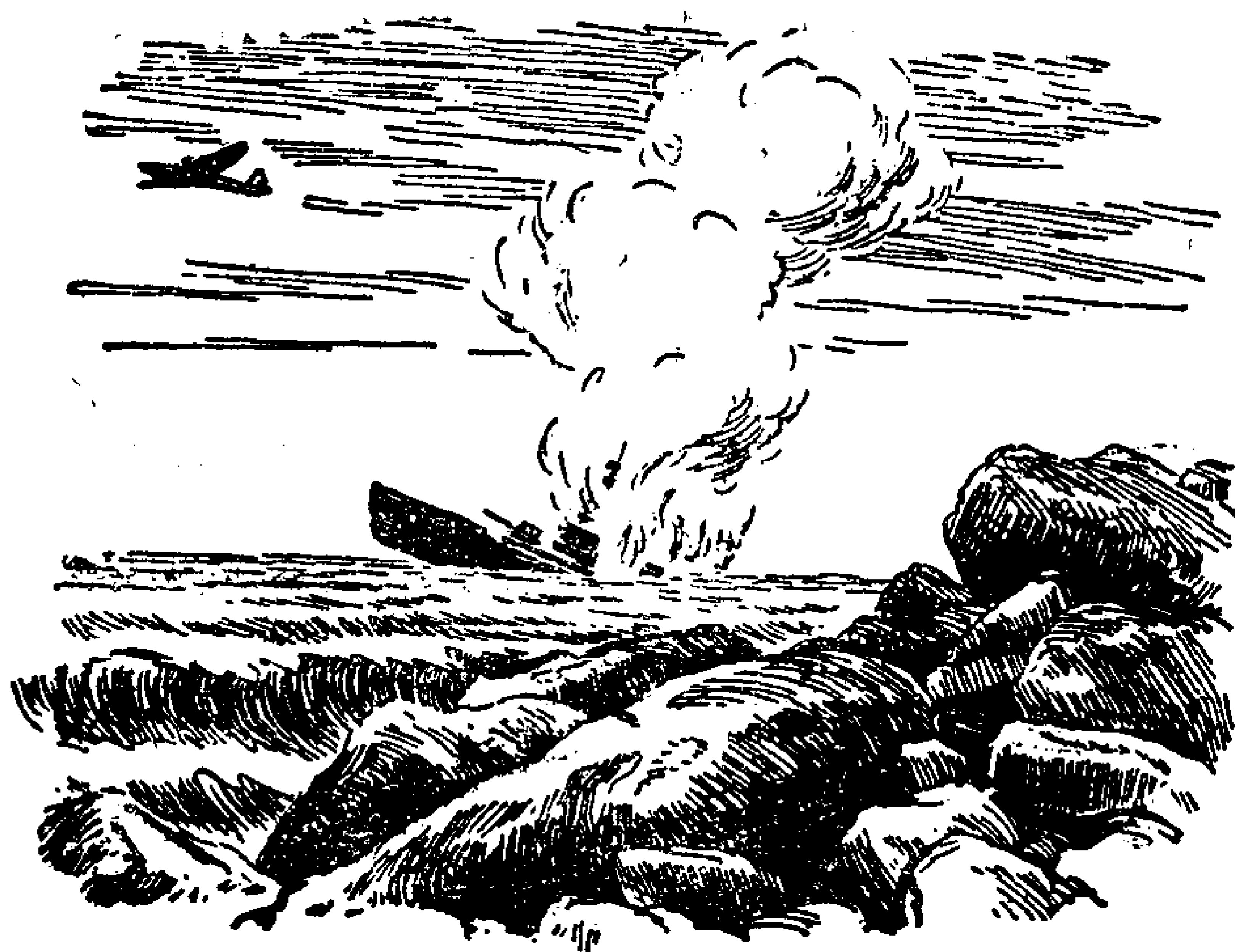
我是在“獵行”車站進入地下鐵道的。這時我已經非常疲倦，一只手拿着背包，一只手提着皮箱。正是下班的時候，雖然一九四二年夏天的地下鐵道還很松快，可是在自動升降梯前還是站着一大群人。梯帶迎着我在往上升，我注視着這些莫斯科人的面孔，心里忽然想到自己在这忙碌，勞累的一天中，還未能好好地看一看莫斯科的市容。這時候，我遠遠地看見一個十分臃腫的人，戴着一頂厚厚的鴨舌帽，穿着寬大的墊肩大衣。他不是往上升，而是在游動，身體漸漸增長，落落大方地等待着這架強大的機器把他送上來。

這人就是尼古拉·安東內奇。

他認出我來了嗎？不見得。即使他認出來了，可是象我這樣一個小小大尉，穿一件破軍衣，提着一個露出面包頭的，難看

的破背包的人和他有什么相干呢？

他用迷迷糊糊的，威严的眼光漠不关心地在我脸上扫了一眼。



第九部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薩尼亞·格利高里耶夫述

1 妻

弗斯波里叶这陌生的，夜色籠罩着的車站象是被照明弹照亮了一般，充滿了战争带来的忧虑、忙碌和騷动的气氛。在这耀眼的、反常的亮光下什么事都可以看到！領队的人一边叫罵着，一边在集合队伍，一些沒有睡醒的、愁眉苦脸的人跟着在排队，——战争！站台上的小卖店憑护照和証明配售食物，一双双当兵的手珍惜地捧着黑面包，——战争！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女孩走丢了，沒有赶上火車，广播器里正在呼叫找她的媽媽；找呀找呀，可就是找不到，——战争！从莫斯科来的火車上走下一个飛行員，他一只手拿着背包，另一只手提着箱子，到处向人打听

疏散站在哪兒。他走進一間又小又脏的房間，房間里滿滿地擠着一群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躺着，後來，他也擠進了等候謁見站長的行列，——戰爭！

我把這一切都看在眼里，記在心上。戰爭的巨大的照明彈已經燃起來了，高懸在人們的思想意識之上，可是思想意識在亮光和暗影之中却不能很快地尋找着道路。

深夜的田野上籠罩着夏日特有的寂靜，我沿着夜間的田野一步一步地走進城去。探照燈的光綫在繁星閃閃的，溫順的天空中逡巡。城市到了。每一條街上都會碰上衛戍司令部的糾察隊，他們攔住我檢查證件。這就是專為列寧格勒人開設的醫院。值班護士鄭重其事地對我解釋說，她們醫院里已經三個月沒有收容過一個列寧格勒人了。

“辦公室九點開始工作，”她說道，“可是現在才夜里三點半。”

我躺在一張矮矮的漆布沙發上，似睡非睡。我的卡佳在什麼地方呢？

第二天早晨，主任醫生把我領進他的辦公室里；里面的東西全是白色的，白色的桌子，乳白色的窗子，白色的臥榻上鋪着新換的白單單。我沉湎在遙遠的回忆里。那時我是一個十七歲的少年，靜坐在候診室里，在那微微開着的門里面，一張矮矮的白色的臥榻上躺着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她的臉色慘白，仿佛是用象牙雕刻的一般。

“她叫什么名字，父稱是什麼，姓什麼，多大年齡？”主任醫生問道。

我說出了她的名字，父名，姓和年齡。這時有一位護士一邊扣着白單衣走進來，醫生托她去把卡佳的卡片和病歷找來。

我們抽抽煙，談談話，談談話又抽抽煙。最近又有一千多架

英国飞机袭击不萊梅。据说莫斯科的面包供应标准提高了，这话是真的吗？现在既然我们和美、英之间已经签订了协定，我是不是也认为第二战场很快就会开辟呢？

这时护士同志正在隔壁房间里翻寻卡片：生的卡片，死亡卡片。

电话铃响了，主任医生将总务主任骂了好半晌。我在一旁默默地等着。护士将给我带来什么消息呢？是卡佳的死耗，还是卡佳的生讯呢？象这样默默地等待着究竟又能使人轻松多少呢！

护士终于回来了。主任医生还没有骂完，她把卡片拿在她那小得几乎象儿童的手里。

“嘿，没有什么，一切都很正常，”他说道。“情况良好。一九四二年三月出院了。”

我这时的脸色大概比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有的更白了一些，所以他站起身，从桌子那边绕过来，将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重复说道，“情况良好，一九四二年三月出院了。”

他看见我一听说二月间卡佳的血红素总共只剩下了百分之四十二时那付着急的样子，不禁衷心地笑了。

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她是随儿童营到新西伯利亚去了。若果真是到这个城市里去那倒也好，然而不是！野营还在距新西伯利亚二百公里的一个集体农庄里。

我到雅罗斯拉夫区执行委员会抄下了它的准确地址：上雅多站，大鲁宾村邱根区，邱根村苏维埃等等。在给卡佳的这封短短的二十五个字的电报里，她的地址就占了十七个字，再加上我的地址，因此，剩下来表达我全部感情和思想的话只有四个字了。

除了这封电报之外，我在雅罗斯拉夫还发了三封电报。一封給恩斯科的达莎阿姨，告訴她卡佳还活着，我希望很快就能見到她。一封給在莫斯科的瓦里亚·朱可夫，說我沒有找到卡佳，她大概是随营到新西伯利亚去了。再一封也是拍到莫斯科去的，是給司列普式庚，請求他按照我們在个别談話中議定的，允許我繼續寻找妻子。

我是多么想独自一个人休息休息，独自一人考虑一些問題啊！可惜我沒有租到单人房間。不过我的同屋是一位中年的陸軍少校，他之需要休息无疑問也不次于我，所以刚到八点鐘，他就躺下了，而且睡得那么熟。不管我一夜怎样在床上翻来复去，把床舖弄得吱吱呀呀作响，不管值班女工两次来检查熄灯沒有时，在走廊上走动的脚步声，这些声音都不能吵醒他。

半夜里，他醒来吸烟，象一个土耳其佬似的盘着腿，一声不响地坐了好久。我也吸起了烟来。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他对我也是一点不了解。可是，我們都在看着手里的烟卷在黑暗中发出的那一点兒紅光，默默地想着同一件事情。战争使我們两个素不相識的人聚在一起，聚在这个房間里。我們这时共同想着的問題就是战争。經過了二百五十天英勇的保卫战之后，我們的部队已經在昨天从塞瓦斯托波尔撤退了。

同屋的伙伴抽完了烟又睡了，我也跟着睡下。不过，大約睡得并不太久，我听見走廊里有人在高声說話：

“一点半啦。”

塞瓦斯托波尔的情景浮現在我的眼前。它不是一九四一年九月間我所見到的那座宛若要摆脱一切，冲向前去迎接它那伟大命运的城市，那座森严的、飞揚着灼热的灰尘的城市，而是从

0 前那座充滿着欢笑和青春的声音的城市。那时我和卡佳每星期都到塞瓦斯托波尔来。小汽艇停泊在碼頭旁边，水兵們同一些披着薄紗巾，穿着白色連衣裙的姑娘在伊斯多利亞林蔭道上散步，他們一直走到眼睛所能看得到的最远的地方。我們两个人都很喜欢作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是卡佳想出来的：假定她是我心爱的姑娘，我們刚刚認識，就如同这些青年男女一样，我們現在应当約定幽会，写情書，很客气地称呼对方为“您”。那时候的一切多么美好啊！我每天五点钟起床，这时卡佳已經把早餐准备好了；如果我今天要作高空飞行的話，那她就把早餐作得清淡一些。随后便是快活有趣的一天。不仅是因为飞行有趣，而且因为我知道，过一会儿又将是“我們的時間”，我們又可以到幽深的、仿佛是把天空翻轉了过来的海水中游泳，又会看到哈拉克斯的灯塔緩緩地一明一灭了。

作我的妻子大概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可是，卡佳却說，她只有在不知道我在哪兒，不知道我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才感觉到难受。

我又特別清楚地回想起我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口角。那是一九三六年在列宁格勒的时候，組織搜索探险队的問題已經決定，我們眼看就要出发到北方去了。我的妹妹薩尼亞抛下了嗷嗷待哺的嬰兒，去世还不到一个月。我們都很着急，不知道留下嬰兒該怎么办，最后，已故的罗莎莉·納烏莫芙娜找到了“科学保姆”，我們才作了決定。決定之后，就赶紧准备动身。可是小彼加突然病了。

……卡佳脸色蒼白，精神恍惚，坐在装衣服的籃子旁边，籃子里躺着伸张着四肢的患病的孩子。我刚跨进門，卡佳就伤心地痛哭起来。我把她抱在怀里。

“你是怎么啦，不要这样，”我撫摸着她泪湿了的臉腮說道。
“你还是去。到阿尔汗格尔斯克就可以追上我們了，就这样吧。”

我还能对她說什么呢？其实搜索探险队在阿尔汗格尔斯克停留的时间頂多不超过一昼夜。

“唉，我真不願意再离开你了！”

“一切都会慢慢解决的。”

“什么也不能解决，我为了成立这支探险队，奔跑了一个冬天。我为了使它能够去，尽了自己的力量，可是現在你就要走了，我甚至連你在什么地方，你会发生些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卡佳！卡佳！”

“我什么也不需要。不需要这支探险队，反正你也不会探索出什么来的。天哪，难道我真的就沒有福份享受这种其它女人从来也不追求的幸福嗎！而且你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

她看到我开始生气了。但她深深地陷于悲慟絕望的境地，难过到了极点，她站起来，把两只手紧紧地压在胸前来回地走着。

“我知道，你不願意我和你一道走！你說，对不对？”

“唉，不要这样了！”

“好吧，”她似乎也为自己說話时的这种沉靜得不顧一切的情緒吃了一惊，“讓我們結束这次爭吵吧。我要去。我知道你不願意讓我去，因为你不爱我。”

我們一直談到天亮。小彼加的身体到第二天就好了些，又过了一天，他就完全恢复健康了。

这就是我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談到这个使她一生都为之苦恼，都感到忧虑的問題时的情形。每当她想到自己永远也不能够渗入到我的这个世界，渗入到这个使我常常忘記了她，抛

弃了她的世界里来，总是感到万分难过！可是要她不去想这个问题，那她就会更加难过。

她每次给我送行时，就象她送我到西班牙去的那次，在她的内心里需要多大的抑制力？我在薩拉布斯第一次率领我的中队作完了夜间飞行以后，无意中从我的领航员的妻子那儿得知，卡佳等我整整等了一夜都没有睡觉。

卡佳，你究竟在哪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爱情已经联成了一体，卡佳，你快回到我的身边来吧！战争还只是开始，摆在我们前面的还有许多事情要作，还有许多事情要操心。卡佳，不要抛弃我！我知道，你和我一起生活很困难，你为我担惊受怕，我们一生总是在别人家里团聚；难道我就不懂得，对于一个作妇女的来说，家庭是多么必需，多么重要吗？我也许不够爱你，不够想念你……卡佳，请你原谅我吧！

……我不知道是在醒着，还是在梦中，我恳求她不要抛弃我，恳求她即使能来梦中相见也好，恳求她不要去相信那些说我永远不会回来的胡话！

2 事情还没有结束

深夜里，不知道这时有四点钟没有，我睁开眼睛看见在走廊上值班的女工，她的面孔苍白，带着一付还没有睡醒的样子站在我的床边。

“您是格利高里耶夫吗？”

“是。”

“有您的电报。需要签字。同志，请进吧，”她说道，接着有

一双紅軍战士皮鞋小心地踏着地板走了进来，停在門旁。“他是从軍用电台来的。”

我签了字，拆开电报。电报上写的是：“即去阿尔汗格尔斯克，并告抵达日期。罗巴金”。

这封电报无疑問是測量局发来的。但复我电的为什么不是司列普式庚，而是一个姓什么罗巴金的人呢？不是已經和司列普式庚講好了，如果我在雅罗斯拉夫沒有找到卡佳，应该怎样进行下一步的寻找工作嗎？为什么“即去”呢？为什么去阿尔汗格尔斯克呢？不錯，每一次在北海航路进行水道測量工作都是以阿尔汗格尔斯克为主要基地。可是尔同志不是說过我們到北极城会面，北海艦队司令要在那兒批准他的計劃嗎？所有这些疑竇不久以后便都消释了。可是，在当时，在雅罗斯拉夫那間狹小齷齪的房間里，我却把蓝紙窗帘掀起了一点来，一遍又一遍地讀这封电报。那种威胁着卡佳，毁灭了我即将看見她的希望的，混乱，模糊，懊丧的感觉愈来愈激动着我。

我什么办法也沒有想出来，就跑到电台去，又拍了一封电报往大魯宾村，邱根区，邱根村苏維埃去，这次发的是加急电。昨天我发的是一封平电，因为我当时只剩下了七百卢布，而要走的路还很远。現在摆在我前面的路可不远了，从卡佳那兒到北方只有一千公里……

自从我在牟城坐了飞机的客艙到現在一共才过了八天。可是在这八天当中，我所見到的事物是那样的多，以至于我的心里仿佛已經拒絕收容这些印象，而只肯收下那些与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东西。半年多以来，我所看到的老是一种景色：病房的牆壁，以及牆外加馬河上陌生的烏拉尔城市。可是現在，天晓得这

些景象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跑得无影无踪，幻灭在一縷青烟里了。而向我迎面飞来的是列宁格勒，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这些城市的轉瞬即逝的影象。虽然我說它是轉瞬即逝的，但也仿佛是拍在相紙上的，永志不忘的影象。特別使我永远不能忘掉的是那严以求全的列宁格勒。在它那一扇扇被封閉了的窗眼里潜藏着曠古未有的毅力。还有那座弗斯波里叶車站的夜景，这兒沒有睡眠和休息，只有劳累和战争的污秽……

我下了火車，便直接到白海区艦队司令部。这才明白：被我埋怨了一路的罗巴金原来是水道測量局的干部处长。这时候我才想起在人民委员会曾經听到过这个姓。他的电报一点也沒有錯。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后，北方边境上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因此，海軍少将尔同志不得不立刻乘飞机前往任所。因为艦队司令亲自到阿尔汗格尔斯克視察基地，所以他和我在北极城都沒什么事情可作了。尔同志在第三天晋見了司令員。显然那件“极有趣的工作”計劃已經被批准了，所以尔同志在晋見首长以后，便立刻乘飞机到迪克逊去了。毫無疑問，他去得很仓促，或者他这次不用我也行，否則，关于我的問題，一定会有指示給区艦队司令部的……

“大尉同志，您来迟了，”这位头发斑白，面貌慈祥的干部处长說道。他留着两撇鬍子，很象第一次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争时期的老水兵。“我也想不出現在对你的問題該怎么办好。我們不准备讓你去追赶他們了。”

他于是命令我过几天再来……

我沒有租到旅館，只好在庫斯涅契哈街一位會計的小房子里租了一个房間。我把我的一部分口粮交給了房东作为租金。老會計为了表示感謝起見，一連好几天地对我講會計工作中那些永远講不完的故事。这行工作也有它自己的乐趣和激动人的

地方，主要是表現在准時，定期，和精確得使托拉斯的經理都為之吃驚這些方面。

阿爾汗格爾斯克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雖然它仍然還叫阿爾汗格爾斯克，可是變得完全不象它了！

美國水兵在大街上游蕩。他們戴着有帽纓的帽子，穿着寬腳褲，任意露在褲子外面的羊毛衬衣緊箍在腰上。英國水兵戴着綉有HMS（皇家海軍）字母的無檐帽，態度比較嚴肅一些，但是他們那種逍遙自在的樣子也和我國水兵迥然不同，這使我感到奇怪。到處都可以碰到黑人，他們的皮膚有的漆黑，有的橄欖黑色，後者大概是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兒。在北德維納河上，河堤下面緊臨着水的地方，有幾個中國人在洗衣服，噤哩咕嚕地高聲說着他們喉音很重、音調低沉的話，一面把衣服鋪開，晾在太阳光下的大石頭上。

象這般浩浩蕩蕩，充滿着俄羅斯情調的德維納河在世界上似乎還沒有第二條，它自由自在地伸展開自己的軀體，攜帶着丰满的河水往前奔流。

小快艇象是一把利刃，割開閃閃的波濤，一直往商港那一边駛去……

這幾天，雖然表面上我是怀着強烈的好奇心在觀看這些外國人，可是占據着我思想的卻並不是他們。阿爾汗格爾斯克曾經是塞多夫·布魯西洛夫居住過的城市。我在梭羅姆巴拉公墓里一個“航海隊之墓”前站了很久。這個航海隊是由“曾任陸軍中尉，並得過獎章的彼得·庫茨米其·巴赫圖索夫領導的。巴赫圖索夫因航行中過於勞累和忧虑致疾去世，享年三十六歲”。塔塔林諾夫就是從這兒開始，率領着自己那只帆船走上了遙遠的征途。航海長克里莫夫是參加過這次探險，又回到大陸上來的唯

一的人，他就是死在這兒市立醫院里的。當地的博物館專門為“聖·瑪麗亞”號探險隊开辟了一間陳列室。在許多熟識的展覽物中，我發見了塞多夫的一位朋友，一個姓列的畫家所寫的回忆錄。這些材料都極有意思，而且對我說來，完全是新穎的，其中談到在弗羅拉海岬發現克里莫夫航海長的情形。

早上，我照例寫了一封信寄往大魯賓村。後來自己也不知道還應該做點什么事，便信步走下庫斯涅契哈街來。河上彌漫着松樹林特有的刺鼻的氣味。橋已經拉開了，一只小火輪繞着那望不到盡頭的木排，將乘客從橋口這邊載運到碼頭那邊去。不論你朝哪兒看去，到處都是樹木。靠近那片矮矮的尼古拉時代的房子的几座窄狹的小橋是用木頭架起來的。在這些房子里現在開辦了醫院和學校。街道是用樹木鋪成的，河岸上一片富有神話色彩的房屋也是用新劈的木板釘成的。這塊地方就是梭羅姆巴拉。我終於在這裡找到了塔塔林諾夫船長在一九一三年裝備“聖·瑪麗亞”號時所住過的屋子。

我設想着這個肩膀寬闊，身材高大，穿着一件白軍服，留着兩撇舊式的，往上翹的八字鬍的人，他怎樣從這座木頭小房的台階上走下來，穿過花園往前走去。他執拗的低著頭在听一個姓杰米多夫的商人講話。這人是向他要醬牛肉錢的，要不就是討“成衣費”的。在商港那邊，在許多舷側裝置着推進輪的笨重的貨船中間，隱隱地可以看到一只輕巧秀麗的帆船。——從阿爾汗格爾斯克沿西伯利亞的海岸到海參崴去，這樣一只船未免過於輕巧秀麗了。

一件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但對我說來却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可怪地使得這些模模糊糊的情景變清楚了。

……昨天到了一支護航運輸隊，我跑到布港去看外國船只

怎样卸货。

啊，这座古老的港口成长得多么迅速！变得多么宽阔，牢固和壮观啊！无数的起重机正在往高高的方垛上面堆放军用的和非军用的物资。我沿着码头走了约摸二公里，可是还没有走到这些起重机的尽头。港口的修建没有竣工，还在进行延展工程。我走到尽头停了下来，想好好地看一下这个象一条抛物线似的，很柔和地圈了一个弯的码头全景。正在这时，一艘小火轮很起劲地喷着气，绕过一艘船头上写着“哈立克”字样的美国大轮船，开始靠岸。我看了一下船名是“天鹅”；记得当时脑子里还转了一个念头，觉得这个漂亮的词儿显然已经成了北方海洋中传统习用的船名了。当年也有过一条同名的船，塔塔林诺夫的朋友和亲人就是乘坐这条船到他的帆船上，和他最后一次拥抱，预祝他“航行幸福和成功”的。这可不可能就是某一篇文章里把它称作“俄国第一艘破冰船”的那个“天鹅”号呢？当然，这不可能是！

一个水手沿着踏板在推一只装着汽油的油桶，我请他把船长请来。过了一会，一个二十五岁左右，脸色红润，穿着一身朴素的蓝工作服的小伙子走到甲板上来，一面用抹布擦着手上的油污。

“船长同志，我有一个历史问题请教您，”我说道。“您的这只拖轮在革命前也叫‘天鹅’号吗？”

“是的。”

“它是什么时候下水的？”

“一九〇七年。”

“一直叫这个名字吗？”

“一直是。”

我向他解释了事情的原委。他以一种含蓄的骄傲神情，把

自己这条船仔细地端详了一番，仿佛他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它将在俄罗斯的舰船史上占有自己的位置。说来这似乎有点可笑，不过碰见“天鹅”号这件事的确使我高兴，使我特别振奋。我虽然已经熟悉了塔塔林诺夫船长的生活，可是它的最后一页始终还没有揭开。

“事情还没有结束，”脸色红润的青年船长的这艘老拖船仿佛对我说道。“说不定有那么一天，你能够揭开最后的一页，并且把它读完呢？”

我第三次来到了干部处长这儿，请求他把我派到团里去，如果不可能的话，那就让我到北方舰队航空兵首长那儿去听候调遣。

毫无疑问，他已经知道了我的一些公私情况，所以他沉默了一会儿，以温和赞许的神情问道：

“那么你的身体怎么样？”

我回答说身体完全正常。这是实话，或者说基本上是实话。因为我在北方比在南方，比在西方和东方都感到要好一些。

“好吧，在这种时刻，与其没事闲着游荡，倒不如让他们去设法安排使用，”干部处长的话虽说是模棱两可，但却很有道理。

当然他指的是在地面上使用。我眼看着他那只苍老的，但却很结实的手在活页的日历记事栏里记下了我的姓，又在下面重重的划了两道线。我心里立即想：“管他娘的，反正我要飞行。”

3 自由巡猎

一切都非常理想。大尉来到团里，团长介绍他和同志们，和机组都一一认识。领航员衔着一个烟斗，穿着一条宽大的裤子，是一个喜欢沉思，对什么事情都不大在乎的拉脱维亚人。他能顶替已牺牲的亲爱的卢利吗？

在飞行员当中，大尉看到好些过去他在巴拉绍夫航校时的学员。他和自己的机组一起，住在新造的木头房子的一间宽敞的房间里，墙壁还散发着树脂的气息。窗外的景色使他不由得回忆起在北极圈外一个小城市里度过的青年时代。

他十分惊异地发现许多飞行员都知道他，甚至认为他没有得到四枚勋章是不公允的（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就这样，一切都理想极了。不过实际问题远非第一眼看上去的那么好。比如这位大尉每天晚上都不睡觉，一遍又一遍地读一封从大鲁宾村别雷什金院长给他寄来的信。院长在信上说，据他了解，卡杰琳娜·伊万诺芙娜·塔塔林诺娃-格利高里耶娃在五月间也就是在儿童营到达新西伯利亚之前，便已离营他去了。此外，关于姥姥和小彼加的情形，不知道别雷什金院长为什么却一字没有提。

另一个实际问题，就是航空兵司令派这位大尉去工作的单位是一个鱼雷轰炸团，因此大尉必须从头学习新的技术。

还有一个实际的情况，就是他的信心现在大大地动摇了。他在第一次飞行中就感到自己对北方已经不习惯了，生疏得甚至忘记了这儿和别的地方一向不太相同的“地面感觉”了。

不过，这都不算什么倒楣的事。凡事都有个定数。除了那些不請自来，逃避不开的，无法挽回的事情以外，一切都是可以补救的。

虽然在北方所进行的空中战争很有趣味，可是我不准备一一细述。在北方飞行，除了一般的困难和危险之外，更加上恶劣的天气，和此地延续达半年之久的北极夜。所以，再没有比北方更适宜于俄罗斯飞行员显露他们卓越本领的地方了。一位不列颠的军官当着我的面说过：“只有俄国人才能在这兒飞行。”当然，这话未免过誉，不过我们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在北方作战所遇到的情况，比这次大战中其他空战区复杂得多。德寇的运输船总是紧贴着高陡的海岸，靠岸极近，在水深刚够的地方航行。要击沉它们是非常困难的，不只是因为击沉运输船一般都很困难，更主要是因为不可能，或者几乎是不可能从陡峭的海岸进入运输舰上空。将近一半的方位（一百八十度）我们都无法利用。不信您也可以试试看，只用一半方位去冲击舰艇，同时又要尽可能地低空通过舰艇上空，使投入水中的鱼雷能够准确地命中目标，您就知道这样做是多么困难了！加上这些舰船不是坐以待毙，而是和护航的舰只一起，用高射炮、机关枪和主炮的火力全力向飞机射击。在熾热的战斗中，一切早已置之度外，只有紧咬着牙关，向着这座闹声震天，五光十色的地狱冲去！

如果把我们在恩城生活一丝不漏，逐日逐时叙述出来的话，那么一定会给人一种千篇一律的感觉。老是飞行，讲评和演习；其实演习也是飞行。吃饭是在一间很长的木棚里。吃饭的时候，谈话也离不了飞行。到了晚上，大家都到军官俱乐部去，这个俱乐部是我亲眼看见它开幕的。年轻人对俱乐部特别感到兴趣。

剛才他們還冒着生命危險進行魚雷衝擊，而現在又來和姑娘們盡情跳舞，娓娓傾談了，轉眼間變得這樣輕鬆愉快，實在是令人羨慕。在這種晚會上，下級女軍官是允許穿便服的。

生活中的這些變化，正說明了它本身並不是單調無味，或者象我們假象中那樣千篇一律，相反，它是極不平凡，極為豐富多彩的。我們這时的生活事實上也正充滿了種種不平凡的，神話般的奇蹟。空戰雖然結束了，但是戰鬥的余音還在漸漸冷下來的身軀里轟鳴，冒着旋卷的風雪在黑暗中飛行，駕着被打傷了的，象篩子一樣的飛機在汪洋大海上空飛行。兩個鐘頭以後，又出現在軍官俱樂部明亮華麗的房間里，一面喝着葡萄酒，一面扯些無足輕重的事——應該怎樣看待死亡，才不至于覺察出生與死之間的差異，或者至少是可以不想這種差異呢？不過，關於這個問題，我還只是在頭幾天里才考慮過。

我上面已經提到，青年人對俱樂部特別感興趣。可是我們全團除了三、四個象我這樣三十歲開外的“老头”之外，幾乎全部都是青年小伙子。指揮我們這個團的是一位臉色紅潤的鷹鼻子青年，兩只眼睛熱情地鼓着。他是蘇聯英雄，大概剛剛才滿二十四周歲。大家都很方便地稱呼他為彼加，不這樣也沒法稱呼他別的。

我來到北方以後，碰到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這個耐人尋味的問題也是其中之一。在這次戰爭中，新的一代飛行員成長起來了，甚至于有些東西我們還得向他們學習。不知道為什麼，一般人總認為在“父子兩代”之間一定有一道鴻溝。自然，在我們兩代之間不是什麼鴻溝的問題，可是多少還是有些差別。比如，我在恩城表現得就不如過去那麼小心謹慎，對於各種冒險的事情也總是坦然去干，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也許正是因为我“年輕”了許多，所以在战争初期曾經严厉对待过我的命运之神，这次在恩城待我的态度却完全两样了。

我在七月間还經常带着炸弹去轟炸基尔金涅斯；从照片上看来，結果还相当成功。到了八月初，我請求团长批准作“自由巡猎”。这种活动的意思，就是在沒有掌握情报的情况下，到易于碰上德寇护航运输队的地方飞行。有一次，我和一位中尉双机出动，击沉了一艘四千吨的运输船。严格說来，这艘运输船是中尉击沉的。因为我投的一条魚雷距离太近，从船的龙骨下面鑽过，然后偏到左边去了。不过在这次战斗中一切都經受了考驗，其中也包括我那条負伤的腿，这条腿在这次战斗中表現得好极了。尽管大队长（从前在巴拉紹夫航校时，因为他轉弯的动作老是作不好，我差一点把他开除了）在飞行講評会上，以毋容爭辯的明确态度証明，說我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沒有击沉运输船”。可是，我自己还是感到很滿意的，过了两三天，他又不得不重复一次他的那套論据，因为我这次通过运输船上空时，飞得更低，甚至将一段天綫卡在飞机的机翼上带回机場来了。不过运输船这次却被击沉了，这是我的第一次战果。因此，他的那些論据虽然并未失掉自己的完整性，但也只具有一些理論上的价值了。

更簡單一点說，我在八月中旬又击沉了一艘运输船，这是在一艘护卫艦和一艘驅逐艦掩护下，排水量达六千吨的运输船。我这一次是和大队长双机出动的，使我大为高兴的是我发现他在冲击的时候，比我飞得还低。不消說，他並沒有因此給自己以警告处分。

我的生活就是如此，总的說来，是很不坏的。到了十月底，艦队航空兵司令授予我以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勛章。

我在恩城已經結識了不少朋友。如口里总是銜着烟斗，穿着肥大的褲子，不爱活动，沉默寡言的领航員就是一个。他是一个聪明、博学的人。不錯，他說話很少，在飞行时更是根本不說話，可是对于“我們現在在什么地方”这个問題，总是回答得极其准确，准确得使我吃惊。他作的进入目标的方法我很喜欢。我們虽然性格不同，但是这不会影响到你去爱一个与你朝夕相处，在飞行和魚雷冲击中共同从事艰苦而冒险劳动的人。假若死神在等待着我們，那么我們也是在同日，同时而死。凡是可能死在一起的人，他們也就有共同的生命。

在恩城和我往来密切的不仅是领航員一人。但这終究还不是我念念不忘的那种友誼。由这个时期开始，我保存了一大堆未发出的信件，这样作不是沒有原因的，我希望战后能和卡佳一起閱讀这些信。

可是就在这时，我的一位朋友，我最真挚的朋友就住在附近，近得只要坐上快艇，二十分鐘以后，就能拥抱他，对他尽情傾吐我在未发出的信件中想要对卡佳所叙述的一切。

4 医生在北极城服务

……我整夜都在做梦。仿佛又負了伤，伊万·伊万內奇医生弯着腰站在我的面前。我想对他說“阿不拉姆，暴风雪，喝酒”，但是我說不出話来，我又变成哑吧了。虽然我經常作这样的梦，但是那早已忘記的哑巴感觉在梦中能够这样真实，这还是第一次。

这一天我沒到起床的时间便醒了。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

对什么都能感觉到，都能知道，但又强使自己什么都感觉不到，什么都不知道。我开始想医生，回想起羅馬紹夫所說的医生去前綫探望兒子的事。我不知道該怎样解释这种現象，但我覺得在这次回忆中，有一种模模糊糊，似乎很久以前就使我不能安寧的事情存在。我逐字地回味他所說的話，于是恍然大悟：羅馬紹夫是說医生在北极城服务。

那次在列車上，我还以为这不过是胡扯罢了。試想，医生能离开那个連牡鹿碰見他都要轉过头来，向他表示好感的城市嗎？他能离开以他的名字为名的那条街道上的家园嗎！他能离开那些称他为“驅虫大师”，远道来向他求教汽爐子在家庭中的作用的惺惺茨人嗎！羅馬紹夫錯了，医生不是在北极城，而是在北地城。

可是这天早上在恩城，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万一他沒有錯呢？”

北地城远在天边，难道一九四一年夏天医生真的会从北地城跑到列宁格勒去嗎？不过話又說回来了，如果真是在北极城工作，那我岂不是和亲爱的老朋友比邻居住已經三个月了嗎？……

值班員走进屋来，低声說道：

“同志們，起床吧。”

他看到我一只手在匆匆忙忙地系褲子，另一只手去取椅背上的制服的那付样子，忍不住直眯眼。

妙极了。医生恰好也在这天，在同一个时辰想起了我；他后来認真地要我相信这一点。他昨天已經看到关于我受勛的命令，起初还没有想到这就是我，因为“世界上姓格利高里耶夫的人有的是”。可是，第二天快天亮的时候，还躺在床上，他便覺得毫无疑問，这一定是我，所以也和我一样，立刻奔到電話

机前。

“伊万·伊万内奇，亲爱的。”我喊道。这时有一种嘶哑的，令人难以相信这是伊万·伊万内奇的声音，似乎很吃力地穿过这天早上盘旋在科拉湾上空的秋风的呼啸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是萨尼亚·格利高里耶夫。您听出是我吗？我是萨尼亚！”

嘶哑的说话声变成了很有旋律的呼啸，医生是否听出是我的问题的下文不明了。我疯狂地喊叫着，女电话员体会到我的努力，便转告我说：“二级军医巴甫洛夫向您报告。”

“报什么告呀，请您告诉他，说我是萨尼亚。”

“马上就告诉，”女电话员说道。“他问您今天去不去飞行。”

我感到很惊讶。

“与飞行有什么相干？你对他说，我是萨尼亚。”

“我对他说你是萨尼亚，”女电话员有点愠怒地说道。“你今天晚上去不去恩城，在哪儿能够找到你？”

“我去！”我喊道。“请他到军官俱乐部里来。明白了吗？”

女电话员什么话也没有说，随后听到听筒里有挪动东西的声音，似乎已经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个人在嘟囔说：

“他来。”

我本来还想请医生去政治部看看有没有我的信件，我已经十天没有打听来信的事了，而我给柯拉布略夫和瓦里亚留的地址都是北极城政治部。可是后来便没有听见任何声音了。

知道医生在北极城，知道今天如果不刮暴风的话，我马上就要见到他，这时心里当然高兴极了。不过，有一件事对我来说始终还是个谜：为什么我到军官俱乐部先喝白酒，继而喝红酒，后来又喝白酒等等。自然没有喝出什么乱子，特别是舰队航空兵司

令和一位軍事記者在隔壁房間里進晚餐。但幾個素日相識的姑娘在每次狐步舞間歇的當兒，不時坐到我的桌旁來，我對她們解釋說，假如我會跳舞的話，那我的生活一定和現在完全兩樣，一定是異常豐富多采的，她們听了這話都笑得直不起腰來了。產生這一切不幸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我生平不會跳舞。

實際上，這話並沒有什麼可笑的地方。譬如我的領航員吧，他坐在我的對面，若有所思地吧噠着煙斗，就說我講得很對。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姑娘們都要笑。

我坐在軍官俱樂部里，雖然多少有點傷感，但心情還是很好的。這時門口出現了一位袖口上鑲着銀道，身材高大，上了年紀的海軍，他很小心地从桌子中間穿過來。據我看，這就是伊萬·伊萬內奇醫生。

我可能這樣想過：他真是老多了，背也駝了，鬍鬚也白了！但這一切想法，自然僅僅是一種幻想，實際上他仍然是我童年時代的那位神秘莫測的醫生。他把眼鏡推到額頭上，向着我走過來，似乎就要拽住我的舌頭，或者檢查我的耳朵了。

“醫生，我想請你去瞧一個病人，”我一本正經地說道。“實在是一個有趣的病例！這人只會說六個詞：母雞、馬鞍、箱子、暴風雪、喝酒、和阿布拉姆。”

“薩尼亞！”

我們擁抱在一起，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又擁抱了起來。

“親愛的伊萬·伊萬內奇，我有点醉了，是嗎？”我說。我發現，在他慈愛可笑的臉上掠過了一絲悲傷的暗影。“我們在機場上凍壞了，所以就……讓我介紹一下吧，這位是奧佐林少校。”

“薩尼亞，你到這兒很久了嗎？”醫生問道。這時領航員怕妨

碍我們的会晤，随便說了两句話，便告辞出去了。“薩尼亚，我們怎么会这么长的時間都沒碰見呢？”

“三个月了。当然是我的过錯。”

“难道你不知道我在北极嗎？我不是把地址留給卡杰琳娜·伊万諾芙娜了嗎！”

“留給誰？”

大概我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所以他弄了弄眼鏡，帶着一種不安的神情瞧着我。

“留給你的妻子呀，薩尼亚，”他十分慎重地說道。“我想她会很健康的吧？我在列宁格勒去过她那兒。”

“什么时候？”

“去年八月。她現在在哪兒，在哪兒？”他移过身来紧靠在我的旁边，不安地眨着眼睛問道。

“我不知道。給你斟点酒嗎？”

我沒等他回答便拿起了酒瓶。

“得啦，薩尼亚，”医生温和地說道。先将他自己的杯子推开，然后又把我的杯子推开。“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訴我吧。你記得沃洛嘉嗎？他牺牲了，”他突然說出这样一句話来，好象为了要証明我現在可以把什么事情都对他傾訴似的。这时他的眼睛在眼鏡下已經泪珠閃閃了。

我們低着头坐在灯光輝煌，人声嘈杂的軍官俱乐部里。乐队演奏着狐步舞和华尔兹舞曲，銅管乐器过分震耳地在这些不大的木結構的大厅里响着。

年輕的飛行員們在客厅和飯厅之間的走廊里高声談笑。这个二十来岁，肩膀寬闊，生着两道浓眉的飛行員也許就在今天夜里，在寒冷平靜的海上，在迷蒙的大霧里会撞見死神。死神象主

子似的迈进他的飞机座舱……仿佛有一块巨大的，石头般的，使人感到很不舒服的东西，塞进了我們曾經生活得很美滿的家园里。現在要想不考虑这块石头般的使人不舒服的东西，而能暢快地交談，跳舞和欢笑，那就需要象沃洛嘉那样英勇地死去。

他曾經写过詩，一直到現在，我还記得那四行“通古斯人乔加尔从学校回到家里”的詩。他常常引以自豪的，是莫斯科艺术团到北地城的时候，他曾向演員們献花表示欢迎。医生有这么一个兒子，对他說来这实在是幸福，可是現在，老人家垂着头，竭力克制着眼泪，坐在我的面前。

“卡佳到底在哪兒，她怎么样了？”

我把我們失掉联系的情形向他講了一遍。

“天哪，是你的下落不明，不是她呀！”医生驚訝地說道。“是你輾轉在三个海上作战，受了伤，躺在医院里，而不是她呀。她还是活蹦乱跳的一个人！”他郑重其事地說道。“她白天黑夜地在寻找你。她一定能找着你，否則我可就不了解什么是恋爱中的女人了。現在正式斟酒吧，讓我們为她的健康而干杯……”

現在，这些最主要的問題已經談开了。我們已經痛苦地認識到，虽然我沒有找到妻子，又不知道她的生死存亡，虽然医生失去了爱子，可是生活仍要繼續下去，但我們还是始終不能摆脱这些悲慟的思想。最近几年来亲身經受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多得連以前沟通我們之間的桥梁，現在也显得脆弱，遙远了。但是，我們有一个共同的浓厚的兴趣，当痛苦的幻影稍一退避，这个共同的兴趣便撞进我們的談話里来了。

当然，这个兴趣指的是北方，我們象两个經驗丰富的老医生，站在病人的床边，談論着如何保卫北方，爱护北方，如何使它

成为世界上最美好，最欢乐，最好客的地方。我对医生谈了我的同团战友，谈了年轻的一代。虽然他们作战很出色，可是他们很少去考虑北方的未来，至于北方的过去，那他们想得就更少了。

“他们没有考虑，那是没有时间，”医生说道。“也许不考虑是对的，”他沉默了一会儿，又加了一句说。

但他不仅没有证明为什么不考虑是对的，反而大谈“那些考虑北方问题的人”，也就是谈那些北方本地人的事。

他谈到安娜·斯切潘诺芙娜的兄弟。他们过去在运输船上服务，现在却在猎潜舰上那么奋勇地作战，好象他们从来就是海軍似的。

“不，任何努力没有白费的，”他归结道。“至于北方的问题，就象門德列也夫所说的那样，是我们房屋的正面；对我来说，这一点从来还没有象现在战争期间这么明确！”

应该走了。餐厅里就剩下了我们两个人。医生还没有睡觉的地方。因而需要早一点儿回到团里去给他搭一个铺。

总而言之，黄昏已经逝去了，这一点是没有丝毫可以怀疑的。但是天哪，我们多么不甘心承认黄昏已经逝去，因为这时我们想要说的话，连十分之一都还没有来得及向对方说出！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走下楼来，披上军大衣，那温暖、明亮、微含醉意的世界便抛在背后了，展现在眼前的是象皮鞋油一般墨黑的恩城，使人不舒服的，粗野的、凄苦的北风在城里游逛着。

5 为海上的人们干杯

这一带的主要人物是潜水艦的艦員。不仅因为他們在战争初期比北方艦队所有的单位作的事情几乎都多，而且还因为他們在生活方式上，彼此間的关系上，紧张的战斗活动等各方面的典型特征，給全城的生活盖上了他們独有的烙印。任何地方都不可能象潜水艦艦員之間那种在死神面前绝对平等的关系；或者一齐牺牲，或者是共同取得胜利。每次的軍事劳动都是艰苦的，但是潜水艦員，特别是“袖珍艦”艦員的劳动更其如此。如果誰想用十次最危险的飞行，来和我换一次“袖珍艦”的航行，那我也不肯干。当我还在童年的时候，就認為在那些潜入深水中的人们之間一定有着某种秘密的默契，就如同我和彼加之間互相立下的誓言一般。

一九四二年八月底，我和一位大尉合力击沉了第三艘运输船。大名鼎鼎的弗同志的“袖珍艦”在我的协助下，击沉了第四艘。关于这次战斗經過本来是不值得提起的；我当时的炸弹艙已經空了，唯一能办到的只不过是把德寇艦船的座标位置报告司令部。可是弗同志却一定要邀我去共享这只烤乳猪，值得叙述一下的事也是由这只烤乳猪引起的。

誰都知道，海軍里有一个出名的传统，就是每次击沉敌人艦船之后，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在这次宴会上，首长总是用一只烤乳猪来招待胜利的英雄。昨天一艘运输船，一艘护卫艦和一艘驅逐艦被送到海底見龙王去了。因此，热心的，戴着白帽子

的炊事員端进餐厅来的烤乳猪不是一只，而是整整三只。軒敞的軍官食堂里，桌子摆設成Π字形，在Π字形橫档正中坐着海軍上将——北方艦队司令員。

盘子里盛着令人饞涎欲滴的，烤得嫩嫩的，玫瑰色的乳猪，蒼白的猪嘴脸象是很难过的样子，三位指揮員手握刀叉，站在盘子前面。这是一个传统——胜利者必須亲手将乳猪割成小块。多大的块哇！一大块填滿了蕎麦粥的猪肉，上面撒着一层很別致的芥菜末送到我的面前！必須将它对付掉，才不致得罪主人。

海軍上将举杯站起来。第一次干杯是为了庆祝取得胜利的指揮員以及他們的艦員和空勤組。我看着他，——他曾經来过我們团里，——不由得回想起他昂着头，站着听取团长报告时那种生气勃勃的，青年人的动作。他很年輕，只比我大四岁。我还是在西班牙的时候就知道他了。

为在海上航行的人們……第二次干杯，立刻响起了一片清脆的碰杯声，海軍同志們站在那里，为在北极茫茫黑夜中建立功勛的弟兄們干杯。为了軍事上的順利，为了每一顆心能在危急的，决定性的时刻保持鎮靜而干杯！

这时桌子对面的海軍上将正望着我。我坐在他的右手一群特邀記者的中間。弗同志正在用刀子叉子比划那艘驅逐艦被击沉的情形。海軍上将目不轉睛地望着我，向邻座說了几句什么話。于是，他的邻座，一位艦艇大队的大队长站起来，宣布第三次干杯。他建議为格利高里耶夫大尉干杯，因为他“巧妙地将我們的潜水艦引导到德寇商船队的地区”。于是海軍上将作了一个动作，表示为我干杯……

这天晚上喝了許多酒，我不准备一一列举干杯的次数，何况那些我前面提到过的記者們，已經在期刊上报导了这次“三只烤

乳猪”的盛况。我要談的只有一件事，便是海軍上将令人完全想不到地突然站起来，向門外走去。当他走到我身后时，沒有讓我站起来，他弯下腰对我低声說道：

“大尉同志，請您今天到我那兒去一趟。”

6 遙远的距离

飞机起飞了。霏雨攪合着浓霧，在地面上我們是不把它当作回事的，可是再过几分鐘，它就要成为飞行中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了。这次的飞行和所有的飞行一样，分成两部分：第一，是任务；第二，是一切妨碍完成任务的因素。

我們以很小的傾斜度轉了一个弯，便进入航向。

这次的任务，或者象海軍上将所說的“特殊任务”，就是：德国鬼子的一艘袭击艦（显然是艘輔助巡洋艦）窜入我喀拉海，轟击了特港，現正在东部某处騷扰，我的任务就是找到并且击沉它，而且越快越好。因为一支載有軍用物資的我商船队正沿北方海道航行，而且距特港已經相当近了。总而言之，象这样一条大型軍艦，在和平的水区可能造成多大的危害，这一点是不难想到的！

尽管飞机懶洋洋地不肯向上爬，但仍旧不得不爬到五千五百公尺的高空上去。可是在这样的高度上，除了一片仿佛上帝老爷用一把大勺子攪拌过的，混得象鍋稀粥似的，使人泄气的云海之外，仍然是什麼也沒有。

問題就是这样——把它找到，并且击沉！前一任务比后一任务复杂得簡直不能相比！后来，等我把海軍上将的地图上的

諾登塞爾特群島东部島嶼几乎全部都更正了時，上將感到多么
驚異呵！

“你從前到過那兒嗎？”

“沒有。”

他不知道我既可以說到過，也可說沒到過那個地方。諾登塞爾特群島的圖是戰爭前夕由“諾登”探險隊更正的。我雖然並沒有到過那個地方，可是塔塔林諾夫船長曾經走過這些地方。所以我在思想上也就成千次地跟隨着他周遊了這些地方。

伊萬·伊萬內奇醫生說得很對：任何努力沒有白費的！生活就象地底下的暗流，在黑暗中，在漫漫無期的長夜的寂靜中穿行，時而向東，時而向西，時而一瀉直下，時而又象我的飛機現在鑽出雲團一樣，突然進入晴空，奔向太陽和光明，等到沖出來之後，才感到原來力氣並沒有白費！

我經常這樣想：如果找到了卡佳，如果我們一起住在恩城，那麼我在北方的生活又將怎樣呢？

那麼這天當我飛行前在夜間三點多鐘到家里去一趟的時候，她一定會醒來。她一定是紅暈滿面，暖意襲人，睡眼惺忪的樣子。大概我走進來吻她也和往常不一樣，她立刻就會明白，這次海軍上將交給我的任務對我說來是多么重要，多么有趣。

這樣的想法有過不下千百次了，可是這樣的事情有沒有再來的時候呢？

就象從前在薩拉布斯，列寧格勒，海參崴居住的時候一樣，我夜里叫醒了她以後，我們就坐在一起喝咖啡。她穿着一件襯裙，為了睡覺方便，頭髮扎成了辮子。她正默默地看著我，突然又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一趟，原來她想起了給我準備的一點好吃的東西——我們兩人都愛吃的醉櫻桃或者洋橄欖。後來，在

飞行中整个机组都夸奖我的妻子，都吃着洋橄榄和醉樱桃。

这就是我的卡佳。她有着潇洒不羁和高傲的性格，她有着一种使我至死也将永远迷恋的爱情。可是现在，关于她的情况我除了知道她不在我的身边之外，再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哪怕是为了这个原因，也必须把这艘袭击舰找着，必须把它消灭。

“领航员，航向！”

驾驶员的航向和领航员的航行差了三度。等我们把口袋里的烟盒，手电筒，打火机扔掉了以后，航向就很理想地一致了。

我刚才在想些什么呢？我在想卡佳。我在想我现在飞的地方，那兒是我和她曾经准备要去，可是许久也没有让我去成的地方。

我当初不也是意识到，毫无问题总有那么一天，我是会坐着飞机到这些地方来的吗？我不是也曾极其精确地，精确到差不了半度地绘制过这条航线吗？这条航线不就是象我在童年时代一次耀眼的梦中梦到的那样，“圣·玛丽亚”号的船员们沉重地喘着气，为怕光线刺伤而紧闭着眼睛所行经的路线吗？他们走着，在他们的前面是一个身材高大，穿着毛皮长统靴的巨人……

然而这都是梦中的幻景。我驱散了这个梦。新地岛已经不远了。

如果把我們寻找袭击舰的全部过程详细地叙述一遍，大家一定会感到枯燥乏味。北极海洋的水面处处一样，要在这茫茫无边的海面上寻找一艘经过伪装的，极不显眼的军舰是十分困难的。我們从一个基地转到另一个基地，整整飞了两个礼拜。有一次连续飞了七个钟头。如果飞行的时间短一些也好一点，因为我們这次在喀拉海上飞了两个航向之后，转航回到新地

島，便差一点沒有找到它，仿佛这些巨大的島屿以前只是被人錯誤地标在地图上似的。后来，我們趁着燃料还够，在新地島上空黑沉沉的浓霧中不断轉圈飞行。总算我們走运，若不是一陣风将这层浓霧刮开了一条不大的亮縫，恐怕我也就不能将这本書写完了。我們赶忙搶到这块空白地方去，迅即关闭油門，便順利地着陆了。

沒有疑問，这都是上帝在生我們的气。有这样的一次，从我們这方面來說是一点兒不对的地方也沒有的，可是上帝讓我們看見的不是一个或两个，而是整整五个太阳。这都是些“假太阳”，是文学中所描述的海市蜃楼。不过，當我們看見这个在我們頭頂上悬挂了好長時間的，火紅的十字以后，我們恍然悟解了好些古代宗教方面的故事。

另外还有一次，我們乘着舢板划到鳥市前。只見岩石上落着千百万只羽色黑白相間的北极海鷗，这些海鷗多得意使将近两海里的海岸上仿佛厚厚地撒上了一层盐粉。海鷗呼喚着，拍打着翅膀，尖声鳴叫。有的失足滑下来，又推开邻近的海鷗落在陡峭的岩石上。在这震耳欲聾的一片喧囂声中，还可以听出个別的叫喚声，这也正如同一个市場，在这个市場上有一些好吵架的婆娘坐在貨車上叫罵。这种恶臭，这种奇异的現象自然只能稍微看一下，最好就赶快走开。可是，偏偏我們的射击报务員不知从哪兒讀到过关于海鷗市长的故事，而且更倒霉的是他发现了两个这样的大鳥单独蹲在一般海鷗之上，以一种煞有介事的神情注視着鬧市的秩序。他放了一枪，打死了一只海鷗市长。我的天哪，为这倒霉的一枪，我們受了多大的报应啊！天也好，地也好，一切全都看不見了！千千万万只鳥兒形成了一股黑白斑駁的暴风，离开了海岸，叫嘯着，冲上了云霄，向我們的小船扑来。

一陣鳥翼煽動的聲音，好象強大的瀑布從空中瀉到我們頭上（如果僅只聲音聒噪刺耳也好）。事後，我們費了一天一夜的時間，忙着刷洗舢板和洗澡，甚至在上衣一個扣得很好的口袋里，我都發現落進去了鳥糞。

總之，在新地島的兩個星期是十分艱苦的。雖然我心里明白應該到東邊更遠的地區去搜索這艘襲擊艦，可是每次起飛還是抱着極大的希望，總覺得這次或許能找到它。我們在海上不斷地飛來飛去，直飛到油料眼看就要用完和領航員冷冷地問我：

“回家嗎？”

我們這才返航“回家”——家就是東一座，西一座險惡的大荒山，和一道道宛若滑入了無底的雪谷中的青幽幽的冰川。

我們結束“新地島的生活”的時辰終於來到了。關於這個美妙的時刻是值得略微詳盡一點講述的。

我當時正站在機庫旁。機庫頂上鋪滿了被打死的鳥兒，四壁張挂着海豹皮。兩個涅涅茨孩子穿着他們慣穿的悶袖皮衣在海邊遊戲，活象兩只企鵝。孩子的母親小得象一個小姑娘，爸爸也象媽媽那麼瘦小，一顆棕色的腦袋露在鹿皮上衣的外面，我和他們隨意地交談着，記得當時談的是國際問題。儘管我分析德寇無可挽救的局勢所引用的材料還是從一張很老的“真理報”上看來的，可是，這位涅涅茨人還把它當作新聞，準備今天就去告訴住得比較“近”——總共不過二百公里——的朋友聽。他那瘦小的妻子雖然不見得懂得什麼政治，却也頻頻地點着她那頭髮烏黑油亮，剪成了新月形的小腦袋，不斷地說道：

“豪，豪。”

“你願意上前綫嗎？”我問男涅涅茨人。

“願意，願意。”

“不害怕嗎？”

“有斯么可怕的，有斯么可怕的？”

就在这个当兒，我看見領航員朝我跑过来。他不是走，的确是从后面放着飞机的小海岬那兒順着海岸跑来。

“轉移基地了！”

“哪兒去？”

“到北地城去！”

他是說到“北地城”去。虽然把我們調到北地城，也就是說，調到我認為應該到那兒去寻找袭击艦的地方，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可是我这时仍不免大吃一惊！因为这是“我的”北地城！

“这不可能！”

領航員又作出了他平日那种冷冷的，不慌不忙的，地道拉脫維亞人的神情。

“您命令大家检查飞机嗎？”

“不用了。”

“我們什么时候起飞？”

“三十分鐘以后。”

7 重游北地城

从机場去市区的路不是一条普通的道路，而是一条滿栽着杉松的林蔭路。当我看見这一片茂密的，喧囂的杉树时，不由得想起我的确已經很久沒有到这座城市，到这座象征着我的青年时代，和我一生中对它怀着最大胆的希望的城市中来了。

我沒能立刻找到巴甫洛夫医生所居住的街道，因为在“我

的”那个时期，这条街仅有一所房子，也就是医生的房子。那时候，其他的房子还只在区执行委员会的一纸计划中存在。可是现在，那所我曾经在里面阅读过克里莫夫航海长的日记，度过了多少个傍晚的小房子，已经隐没在它周围的高邻之中了。青春时代的傍晚是多么可爱啊！隔壁屋子里的地板被沃洛嘉轻微的脚步踩着，发出了谨慎的咯吱咯吱的声音。医生突然学着鸭子叫了几下，用力地搓着手，高声朗读他所欣赏的一段书，随后就开始吆喝那只不知道为什么专爱啃他的拖鞋的小刺猬。这时安娜·斯切潘诺芙娜向我走来了。她是一位什么事都可以向她讲，都可以信托她的女人。她身材高大，处事果断，待人公允。她默默地将一大块盛在盘子里的点心放在我的面前。

……就是现在她也沒有驼背，沒有向悲痛屈服，只是头发有些白了，下垂的嘴角上挂着两道深深的皱纹。在她的体态和面部表情上，同那些身体健壮的，上了年纪的妇女一样，有着一种男人的气概。

“现在怎么称呼您呢？”她很犹疑地问道。我们在屋前的小花园中碰见后，一同走进餐厅里去。这间屋子和过去似乎完全一样，地板是黄色的，非常洁静，上面铺着乡下地毯。“那时候您还是个孩子。过了多少年啦？十五年？二十年？”

“才九年，安娜·斯切潘诺芙娜。您还是叫我萨尼亚罢。对您说来，我永远都是萨尼亚。”

她一眼就看出我已经知道沃洛嘉的事了，可是她很久都沒有谈到他。我觉得她这种用心完全是出于一种善意，免得一见之下，马上就要我和她共同分担痛苦。我刚要谈到一点见，但她把话岔开了，赶忙说“以后再谈吧！”

“您到我们这儿来有什么事吗？住很久吗？我看见您身体

很好，心里多高兴！”

“住不了多久，安娜·斯切潘諾芙娜。我們今天就要飞走。”

“哈，成了海軍飛行員，还得过勳章，”因为我是得了勳章的海軍飛行員，她仿佛也和我一起感到自豪地說道。“这次是从哪兒来的？从哪个战綫？”

“这次是从新地島，上次是由北极城来的。就是从伊万·伊万內奇那兒来的！”

“我不信！”

“是实話。”

安娜·斯切潘諾芙娜沉默了一会兒。

“那么，您看見他罗？”

“岂止看見，我們是經常見面的。难道他給您写信沒有提到过这件事嗎？”

“提到过，”安娜·斯切潘諾芙娜說道，我这时才明白，她还知道卡佳的事。

可是，我不需要阻止她的話，就象刚才我一談到沃洛嘉时她阻止我那样。誰能比她更深刻，更强烈地感受到我的忧愁和激动，感受到我无法向任何人道出的一切隱忧呢？她沒有用話来安慰我，沒有拿自己的痛苦来和我的痛苦相比較，她只是拥抱我，吻了吻我的头，我也吻了吻她底手。

“喂，我的那个老头子呢？他身体好嗎？”

“很健壮。”

“現在服役已經老啦，”安娜·斯切潘諾芙娜若有所思地說道。“他在这兒和乡亲们很处得来，不受拘束。六十一岁服兵役，这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我可以把您飞到这兒来的消息告訴这兒的朋友嗎？您的時間怎么样？”

我說，時間可以到晚上。于是她把面包，魚和一杯家釀的葡萄酒（北地城作的葡萄酒味道都很好）放在我的面前，便披上头巾，說了声对不起，就走出去了。

从我这方面来看，答应安娜·斯切潘諾芙娜把我来了的消息告訴朋友們，这确实有点欠考虑。沒有过一个半鐘头，一輛小轎車开来停在小花园旁边，我驚訝地看到我的整个机組都坐在这輛車里。射击員和报务員不知为什么在高声大笑，領航員穿着他那以肥大馳名全北方艦队的礼服褲，和司机并排坐着，漠不关心地向空中吐着一个个极大的烟圈。

“薩尼亚，列德可夫同志派車来接我們啦，”当我走出来的时候，他說道。“赶快上車去他那兒。我們在他那兒吃点早飯，然后……”

“哪一位列德可夫同志呀？”

“我不知道。一位披着头巾的高个子妇女跑到机場来，說列德可夫同志派車来接我們。她是从区执行委員會出来的。”

“列德可夫？等等……啊，我記起来啦！嘿，一定是列德可夫！”

他就是从前腿上負过重伤，躺在万龙坎屯，由我和伊万·伊万內奇医生駕着飞机去接的那位区执行委員會的委員。他在北方涅涅茨人中的声望，不亚于著名的伊里亚·維尔卡之在新地島。順便还可以說一下，不久前在北极城的时候，医生还談到过列德可夫，說他現在是一个十分果断，干劲冲天的工作干部，他上任几个星期，就能够使一个四处分散的，广大的牧民区全部生活服从战争的需要。

“同时，”医生說道，“他还关心你找到塔塔林諾夫船长了沒有。你还記得嗎，我們曾經等待着你帶着搜索队来，他甚至还到

一些游牧屯去問过涅涅茨人。根据他的了解，有一个氏族还流传着关于‘圣·瑪丽亚’号的故事。”

不难想象到列德可夫是很高兴在北地城这兒接待我們的。我还隱約記得他当时的样子，可是当我看到他远不是一个什么上了年紀的人时，不禁大吃一惊。他那結实的面庞，象是用一块块鵝卵石造成的，唇上留着向前直豎着的中国式的小胡子。他站在区执行委员会門前的台阶上迎接我們。进餐的时候，我把伊万·伊万內奇医生和他在北方艦队的战斗活动講了很久。飯后我們到了木材加工工厂，然后又到新成立的診療所等地方去了一趟。到处都招待我們吃喝，我也是到处都談伊万·伊万內奇的情况。以至于最后，我自己甚至覺得，如果沒有伊万·伊万內奇参加我們北方航路的保卫战，我們的保卫战就可能会受到挫折似的。

我怀着浓厚的兴趣游覽了北地城。当我离开此地的时候，这座县城剛六岁，如今它已經滿十五岁了。使人一眼就可以断定，它沒有讓这段时间白費，特别是其中还有三年最宝贵的时光献給了战争。

如果深入观察一下的話，你就能在这距前綫远达二千五百公里的地方，从很多事物中感觉到战争的气息。港口中虽然仍旧和往年一样，有人在准备出航去喀拉海，但是碼頭旁边再沒有那些巨大的外国商船停泊了，再看不到那些乐乐哈哈，大惊小怪的黑人滿城乱逛了。从叶尼塞河，安加拉河，下通古斯河的上游虽然照旧有許多木排向木材市場漂来，木排上依然有烟囱里冒着青烟的小房子，繩索上晾着衣服，給普罗托克的水上村落造成一种和平的气氛。但是，有經驗的人用眼睛一看，就很容易断定，构成这种水上村落的木材根本不是用于和平的。

可是当傍晚我們到达熊谷时，一种絕然不同的情景使我大为震惊。过去，这兒仅有我的一位通古斯族朋友烏达格尔的一所窝棚，可是現在却扩展成了两个大大方方，寬寬敞敞，全是二层楼房的住宅区。我觉得在这些地方，“战前”和“战后”之間似乎搭上了一座桥。我們的生活不仅反映了进攻的活动，而且用和过去同样严峻頑强的干劲兒，在建設北方的伟大事业中，变得更加巩固和坚强了。

起飞前还有一些工作要作，所以我就讓領航員和射击員先回机場，自己同列德可夫留在区执行委员会他的办公室里。

安娜·斯切潘諾芙娜走了。不过我們約好在起飞之前一定到她家里去告辞。

“喂，您坦白地說，”列德可夫說道，“我們那位老头子在那兒怎么样？呃，要知道我們沒有他就象是沒有了手一般。”

“您这說的是什么意思？”

“調回来，讓他复員。他已經超齡了。”

“那可不成，他不肯留在这兒的，”我說，因为我想起了有一次大队长不讓他参加潜水艦的冒险航行时，伊万·伊万內奇多么生气的样兒。“要不就讓他回来休假一次？要他完全脫离部队，特别是在現在这种时候，他是不会願意的。”

我說“現在”是指目前战争快要結束了的意思，可是列德可夫却把我的意思誤解了，以为“現在”是沃洛嘉牺牲了以后的“現在”。

“是啊，真可惜沃洛嘉，”他說道。“是一个多么忠厚，純朴的孩子！他还写了許多好詩。你知道，医生曾經偷偷地把他的詩寄給高尔基看过，后来沃洛嘉还和高尔基通过信。我們从高尔基給沃洛嘉的信里选了一句話，作为学校里的标語。”

他把这条标语指给我看，上面写的是：“世界上再没有哪儿的儿童能比你们更苦的了。但是，你们应该用自己未来的工作，使全世界的儿童都成为象你们一样值得骄傲的勇士。”在这句确实是出色的标语上面，画着一个有点象涅涅茨人的高尔基象。

我们坐在一扇宽大的窗口旁边的安乐椅上，从这儿望出去，只见一条条新修的道路，从河畔伸展到大森林地带。木材加工厂喷吐着烟雾，电动拖车在市場附近的一垛垛木材中间穿梭来往。远处是一片深蓝色的处女林……

在我们一句话也不说沉默着的时候，窗外也在进行一种庄严的，无声的谈话；这种无声的谈话就是从苏维埃人初次进入叶尼塞河这片被人忘记了的土地那一刹那间开始的。

我斜着眼看了看列德可夫。他站起来一跛一跛地（他配了假腿）走到窗前。在他那严肃的兵士的脸上，在微微显得有点浮肿的蒙古人式的眼睑中间，长着一双睿智的眼睛，一阵激动的情绪从他的脸上掠过。我明白了，他是在对这短暂的时刻作一次估价。

“你们作了很多工作，”我向他说道。

“不，刚刚才搞起来，这只是第一步，”他回答道。“战前我们自以为已经作了很多事了，可是现在，我才看见我们在成千上万的任务中仅仅只不过是作了两三项……”

告辞的时候，我问起他不久前出发到涅涅茨人屯子里去的事情，似乎那儿还流传着一些关于“圣·玛丽亚”号的故事。他是不是真的到那里去过，问过涅涅茨人？

“当然去过啦。这是雅东加族的一个屯子。”

“结果呢？”

“找着啦。”

我这时就象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心里突然咕咚跳了一下。

“都是些什么？”我强作镇静地问道。

“不仅找到，而且把那些情节也记下来了。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这些笔记放到哪儿去了。”环形的书架上放着许许多多的文件夹和一卷卷的纸，他瞧了书架一眼说道。“总之，大致的情形是这样：很久以前，还在我‘父亲的父亲’的时候，一个自称水手的人来到雅东加族，他是从喀拉海上被冰块撞毁了的一艘猎船上来的。这个水手说，他们获救的人有十名，在泰麦尔北边的一个岛上度过了冬季。后来他们就向着大陆走去，但途中他们‘开始大量地死亡’。可是他‘不愿意死在一个地方’，所以又继续往前走。他就是这样挣扎到雅东加人的屯子里来的。”

“他的名字没有留下来吗？”

“没有，他很快就死了。我这儿是这样记着的：‘他来了，说他要活下去。话一说完，就死了。’”

列德可夫的房间里挂着一幅带一角喀拉海的涅涅茨区的地图。我找到了这条熟悉的航线；——到俄罗斯群岛，斯捷尔列果夫海岬，皮亚辛河口……

“雅东加族在哪个区域游牧？”

列德可夫指了一指。其实在他没有指给我看之前，我已经用眼睛准确地画出这个地区北面的边界来了。

“他是‘圣·玛丽亚’号的水手。”

“你这样想吗？”

“让我们计算一下吧。根据他说的话看来，离船得救的一共十个人。”

“不错，十个人。”

“克里莫夫航海长带走了十三个人。船上还剩下十二个人。”

其中輪機員提斯和水手司卡其可夫二人在第一年漂流的時候犧牲了，所以剩下十個人。但問題還不僅在這裡。我甚至以前就能夠指出他們所走的道路，而且精確得差不到半度。不過，我那時候還有一個問題不清楚，就是他們到達皮亞辛河了沒有。”

“現在呢？”

“現在清楚了。”

我于是指在一個點上；假如地球上還有塔塔林諾夫船長的探險隊的遺迹的話，那麼這些遺迹就是在这个地方……

“親愛的安娜·斯切潘諾芙娜，這實在太不象話了，我在列德可夫那里竟坐了這麼久。”夜里，我來到安娜·斯切潘諾芙娜家里，發現她還坐在擺得好好的餐桌前等候我的時候，我連忙對她道歉說。“可是現在又該走了。讓我好好地吻吻您再走吧。”

我們擁抱了起來。

“您什麼時候回來呢？”

“誰知道呢？也許明天，也許永遠也不會回來了。”

“‘永遠’，我知道這是一個很可怕的字眼兒，”她嘆了一口氣說，並且給我划了個十字。“您不要這麼說吧。您還是會回來的，而且您會十分幸福的，連我們這些老人也還要托您的福哩。”

……深夜，——只有看了表以後才能猜到這已是深夜，我們從北地城起飛了。鮮紅的太陽高高地掛在天上。鵝毛般的白雲象從一個巨大的火車頭里噴出來的煤煙，奔馳着，迅速地增長起來。

我這時是不是在想我畢生所期待的一天总算來臨了呢？沒有！我剛才沒有參加機組檢查發動機的工作，我這時是在耽心，不知道這次檢查工作是不是作得徹底。

8 胜 利

我們在深夜两点鐘起飞，四点半的时候，便击沉了那艘袭击艦。不錯，我們並沒有亲眼看到它沉沒的情形。但是它被我們的魚雷击中之后，正如海軍同志們常說的那樣，就开始“騰云駕霧”了，也就是說它失去了速度，被云雾般的蒸汽籠罩了。

总的說来，这件事情发生的經過大致是这样的。袭击艦航行时那种泰然自若的姿态，使我和領航員之間发生了一場短暫的爭执（這場爭执最好是不要写在这本書里），我們爭的是这条軍艦是不是北方艦队的。當我們肯定了它不是的时候，于是我們就象我的这位領航員所爱干的那樣，首先离开它。然后一个急轉弯，进入目标航向。

可惜我不能把我为了把魚雷发射得尽可能准确起見所作的，相当复杂的飞行綫路描繪出来。这是一个相当完整的8字。同时，我还在交叉点进行了两次冲击；第一次冲击沒有成功。然后我們开始“爬”开，这样說一点也不假，因为德国鬼子并不是坐以待毙的，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說明。

在第一次进入时，射击員就嚷道：

“座艙里冒烟很厉害！”

在我第二次进入时，又听見三下强烈的打击声。可是这时我正咬紧了牙，向着袭击艦猛扑，所以根本沒有時間来考虑这些事情。而現在，我可是有足夠的時間来証明飞机被打坏了。汽油在漏，潤滑油也在漏。若不是領航員及时地使用了一件新鮮玩意兒，恐怕我早已烧焦了。右边的一台发动机在目标上空便

已經从低距轉为高距^①，后来进入极高的——簡直可以說是巨大的高距。

当然，我們帶有救生船，可以命令机組跳伞。但是，我們曾經在阿尔汗格尔斯克近郊一个平靜的內湖中試驗过这些救生船。就那样，我們从水里鑽出来的时候，还冻得象落水狗似地直打哆嗦。可是在这兒，在我們身下的却是盖着一层碎冰碴子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冰海！

我不准备把我的机組成員关于飞机状况所作的簡單报告一一列举了，因为这些报告很多，比我所願意听的多得多。在我听了其中一次痛心的报告之后，領航員問道：

“薩尼亚，我們还要坚持嗎？”

不坚持能行嗎！我們鑽入云层，我看見我們的飞机投在下面彩虹的双环中的清晰的投影。遺憾的是飞机正在下降。从我这方面可以說是沒有絲毫过失。飞机猛然疾速地往翼側傾斜，如果世上真有死神的話，那么無疑問地，我們能在这垂向大海中去的机翼上看到死神的面貌。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作的，但我終於使飞机脱离了險境。为了減輕飞机的負荷，我命令射击員扔掉机关炮的托盘。十分鐘之后，机关炮也翻着斤斗落到茫茫的大海中去了。

“薩尼亚，我們还坚持嗎？”

当然要坚持！我問領航員距海岸还有多远。他回答說不很远，再飞二十六分鐘左右就到了。自然，这是撒謊，他不过是为了鼓舞我罢了；到海岸至少还要飞三十分鐘。

在我的一生中，象这样一分一分地数時間并不是第一次了。

① 低距，高距均为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决定于螺旋桨叶的位置。——譯者注。

有时我遏制住恐怖，絕望而憤恨地数着一分一分的时间。有时它們象是沉重滾圓的大石头横亘在心里，我焦虑地等待着，等待着什么时候又有一块难熬的石头——一分鐘——落下去！

这一次，我并没有靜坐等待。我象发了疯一般，兴奋地鞭策着时间老人，推动它赶快前进，由于这种疯狂和激动，我的心中甚至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幸灾乐祸的快感。

“薩尼亚，我們能支持着飞回去嗎？”

“当然，我們能飞回去的！”

我們真的飞到了。在距海岸一公里半的地方，我們連看一看海岸也来不及，便一头栽到水里去了。說来也奇怪，我們这一下子并没有沉底，正好落在浅滩上。然而祸不单行，这时又涌来一陣冰浪，頓時把我們从头到脚浇了一頓。新聞局下一期的战訊里将会报导說“我机一架未返基地”。但这陣陣的冰浪，和我們掙扎到海岸上来以前飞机所受的整整一个鐘头的折騰，以及千万种新的劳累和忧虑与这个短短的句子比較起来，該有多少丰富的內容啊！

为什么我断定这是米登多尔法湾，并据此推断，我們降落在离人烟很远的地方了呢？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我們在海上飞行时，领航員已經沒有心思去进行各种計算，唯一使他感到兴趣的只有航向，那就是飞到海岸上去的航向。

現在，因为我命令先把飞机固定起来，所以他仍旧沒有功夫去进行計算。我們不停地工作，直到一个个都累倒在干燥的海岸上，倒在被太阳晒热了的一些石头之間了。我們靜靜地躺着仰視天空，天空洁淨，辽阔，沒有一点云影，也沒有一点霧絮。我們每个人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而每个人的心事又决定于一个

共同的感觉：“胜利”。

我們躺着，一点兒力气也沒有了，就連彈去脸上的沙粒都感到吃力，听任它在太阳底下晒干，一块一块地自己掉下去。胜利了。擱在领航員胸脯上的烟斗早已灭了，他突然大声打起鼾来，烟斗滑落到了地上。胜利了。除了仰望着充滿了蔚蓝色的，无限威力的天空，感受着手掌下面温暖的鵝卵石之外，再也不需要什么了。胜利了。

一切都是胜利，甚至想吃东西也是胜利。安娜·斯切潘諾芙娜塞給我在路上吃的夹餡面包放在飞机上，可是我实在沒法子命令自己站起来去取它……

我們检查飞机的經過是不值得多談的。射击員报告的发烟原因，显然是由于一顆炮弹在座艙里爆炸所造成的。如果不算这一、二百个弹孔的話，比起我有时駕駛回来着陆的一堆烂鉄来，这駕飞机的外表还是挺不錯的。可是它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再不能飞行了，并且以我們現有的器材，是不可能把发动机修理好的。

我們吃了一頓丰盛的午餐：第一道菜是奶粉，巧克力糖和奶油作成的湯，第二道菜还是湯，只不过是干湯而已。在吃飯的时候，大家决定：

一、将飞机在原地固定起来。因为飞机深深地栽进了沙“錨”地，反正我們是无力把它弄到又陡又高的海岸上去；

二、射击員留下看守飞机；

三、出发找人援助。

我还忘了說一件事：当我們在海上掙扎飞行时，似乎是无綫电員发现岸上有一个又象是房子，又象是一座高高的木架子般的東西。可是，等我們把飞机滑近岸边时，这件东西便隱蔽在拐

角的后面，看不見了。可能这是一个航海标志，也就是一座很少有船只来光顧的滨海建筑物。所以，我們离开这儿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不过万一不是呢？

不过，也可以哪儿都不去。吃罢飯以后，选择一块背风的，舒适的地方，重又躺在石头中間休息休息，一面觀賞着漂浮过去的淡青色冰块，海水閃閃发着光，潺潺有声地从冰块上淌下来。可惜收音机坏了；頑强的无綫电員无论怎样摆弄它，它还是象块頑石般的哑不作声。

总之一句話，不管怎样都应该走。走到哪儿去呢？很明显，应该朝那个航海标志走，因为它可能是电汽灯塔，也可能是防霧报警台，或者是其它类似的东西。

“但首先应该弄清楚，我們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我向领航員說道。

过了至少有一刻鐘，他方才答复了这个問題！誠然，他說的座标位置，并不是列德可夫問我塔塔林諾夫船长探险队的遺迹在什么地方时，我所指的那一点的座标。

可是领航員所說的座标和我在列德可夫的地图上所指的那一点相距是那样近，使我不由得向周围觀看了一下，会不会就在这咫尺之內，就在那块大石头的后面看見船长呀……



第十部 最后一頁

薩尼亞·格利高里耶夫述

1 謎 底

如要詳述找到塔塔林諾夫船長的探險隊的經過，恐怕還得寫一本書。說實在的，我掌握的材料很多。大家知道，從前有一位名叫居蒙-居維勒^①的法國航海家，當他還小的時候，便以驚人的精確度指出了他將在什麼地方找到拉彼魯茲^②的探險隊。但我現在掌握的材料比他多得多。比起他來，這件事對我甚至更容易一些。因為塔塔林諾夫船長的一生和我的生活緊相交錯，

① 居蒙-居維勒（1790—1842），法國航海家，環游世界兩次，到過南極。
——譯者注。

② 讓·法朗莎·拉彼魯茲（1741—1788），法國航海家，因船舶遇險遭難。
——譯者注。

根据这些材料所得出来的結論最終是既关系着他，又干連着我。

假如关于塔塔林諾夫船长回到了被他命名为“瑪丽亚島”的新地島这一点再没有什么異議的話，那么，他所走的道路便是这样的：在 86 和 87 子午綫之間，从緯度 $79^{\circ}35'$ 出发，向俄罗斯群島和諾登塞尔特群島前进。后来，大約經歷多次漂泊，便从司捷尔列果夫海岬向皮亚辛河口走去；那位惺惺忪忪的老人就是在皮亚辛河口发现了一个放在雪橇上的小船。然后他們又朝叶尼塞河行进，因为叶尼塞河是可能遇到人和得到拯救的唯一有希望的地方。他从滨岸島嶼的外側，可能是保持直綫前进的……

我們找到了这支探险队，也就是說，这支探险队所遺留下来的东西被我們找着了。我們的飞机曾經多次在这个地区上空飞行过，将旅客和邮件送到迪克逊，把机器和貨物运到諾尔德維克，不断往返地运送那些寻找煤矿，石油和鉄矿的地質勘探队。如果塔塔林諾夫船长現在能够到叶尼塞河口去看一看的話，那他定能遇到几十艘巨大的海船。在他曾經从旁边走过的島嶼上，他現在可以見到許多电气灯塔和无綫电灯塔，大霧弥天的时候，他还可以听到为船舶指路的电动霧笛的响声。如果他沿叶尼塞河溯流而上，經三、四百公里，他还可以看到那联結着杜金卡和諾里斯克的极地铁路。在那油田的周围，在矿山和伐木厂的周围，他将看見許許多多新近涌現的城市。

我在前面已經談到过，我一来到北方后，便开始給卡佳写信。放在恩城的这些未发出的信件有一大捆，我怀着一个希望，准备在战后我們一齐来讀这些信。这些信成了一种不是給自己，而是为了給卡佳看的类似日記的材料。我現在仅把日記中有关发现駐营地的几处摘录下来。

一，“……意識到生活已經十分接近从前我認為是无限遙远的地

方时，我感到万分的訝异。这个地方距一条极大的海路只有咫尺之遙。你說你的‘父亲之所以沒有被找到，唯一的原因只是因為沒有人寻找过’，这个說法完全正确。在灯塔和无綫电台之間，用木头杆架設了一条電話綫，而且不是临时的，是一条永久性的電話綫。南面十来里的地方正在开矿。所以，这块宿营地即使不為我們发现的話，再隔一段时期，矿工們也会撞到这兒来的。

“……领航員第一个从地上撿起一小块帆布。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海边可以撿到的东西多着呢！不过，这是一条用来套車拉雪橇的帆布纜繩。后来，射击員又找着了——一个鋁制鍋盖，一个压扁了的白鉄盒，里面装着几卷麻繩。于是，我們把从小丘到山脊之間这块洼地分成几个方块，每人在自己的方块內……

“我在一本什么書上讀到过，說科学家能够依据石头上所刻的銘文，推断出在我們紀元前便已經湮沒了的国度的全部生活。現在，这块地方就是这样逐漸在我們眼前复活起来了。我最先看到这兒有一只用防水布作成的小船；說得更正确一些，當我們看見一个压得扁扁的，象张薄餅似的東西歪歪地翘在被冲刷过的地面时，我最先認出它是一只船，而且是放在雪橇上的一只船。船里放着两支枪，一张皮子，一个六分仪和一具野外望远鏡。所有这些東西都已經生鏽霉烂，长滿了苔癬植物。野营倚着山岬，屏挡住海水，我們在山岬附近找到了許多各式各样的衣服，以及一个摊开的牡鹿皮作成的睡眠套。很明显，这兒曾經有人搭过帐篷，因为搭帐篷的木头和峭岩正好形成一个封閉的四方形。我們在这間‘帐篷’里找到一只装食物的小簍子，代替門鎖用的帆布碎片，几只羊毛袜子，和一床帶淡青色的白被子的碎片。我們还发现了一柄斧头和一根‘釣竿’，——在細繩的一端系了一个用別針作成的釣鈎。‘帐篷’的附近零乱地散置了一些東西——酒精灯，湯匙，和一只木箱子。箱子里装了許多杂七杂八的東西，和几根粗壯的，也是自制的帆布針。在某些物件上还可以辨認出‘圣·瑪丽亚’号猎船的圓图章，或者‘圣·瑪丽亚’号的字样。可是，这个营地却完全是空的——既沒有活人，又沒有死人。”

二，“……这是一台自制的行军厨房，是在白铁罩里放一个带盖的水桶作成的。通常在这样的桶下面装一个炉底，燃烧狗熊或者牡鹿的脂肪。可是，在这个洋铁罩里安装的却不是炉底，而是一只常见的汽炉子；我摇晃了一下，发现里面居然还有煤油。我试着打了打气，煤油竟细细地喷散出来。我们在旁边还捡着一盒罐头，上面写着‘小俄罗斯菜汤。一九一二年圣·彼得堡维霍列夫工厂制’。谁要愿意的话，满可以启开这盒菜汤，用这只在地里躺了将近三十年的汽炉子把汤烧热。”

三，“……经过多次毫无结果的探寻之后，我们便顺着去加尔契赫的方向回到营地。我们这次是从东南走来的。所以，过去一直被我们认为单调的波涛起伏般的山脊，现在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意想不到的形状。这是一个巨大的斜坡，往前渐渐转成了石质的冻土带，被许许多多宛如人手掘成的极深的狭谷所分割开。我们沿着一个这样的狭谷走着，起初，谁也没有注意那两块大圆石之间的一堆已半倒塌了的浮木。木头并不很多，约摸有六根左右，可是其中有一根是锯过的木头。木头用锯锯过，这一点使我们感到万分惊诧！我们以前一直认为营地是设在陡峭的山岬和丘陵之间的。然而营地是可以迁移的，我们很快就证实了这一点。

“要把在这个狭谷里所找到的东西一件件地数出来，即使是大致地数出来都是很困难的。我们捡到了手表，猎刀，几根滑雪棍，两支‘列明东’牌的单铳猎枪，一件皮坎肩，装着一种粘粘糊糊东西的烟斗。我们找到了一个快要霉烂了的，装有胶片的袋子。最后，在一个最深的狭谷内，我们发现一座帐篷。为了不致被暴风刮跑，帐篷下的边缘上压有浮木和鲸鱼骨头。就在这座需要用斧头才能把它从冰块里砍掘出来的帐篷下面，我们找到了我们要找的人……

“还可以推测出他临死时的姿态——他的右手摊在一边，直挺着身子，仿佛是在侧耳聆听。他俯卧在地上，我们从他身下的一个小皮

包里找到了几封他的訣別書。他无疑是希望这几封訣別書能在自己躯体的庇护之下更好地保存下来。”

四，“……关于我們能否看到他的这一点，过去本来是不会有，也不可能有希望的。可是，在死亡还没有被証实，在我没有亲眼看到他的死亡之前，这一天真的想法却一直在我的心里閃耀着。現在，这思想熄灭了。可是另外一个思想又灼灼生光地燃烧起来：我寻找他并非偶然，也不是徒劳无功的；他并没有死，他也不可能死。一个鐘头以前，有一艘輪船开到电气灯塔旁边。海員們摘下帽子，将一具被霉烂的帐篷残屑罩着的棺材抬到船上。礼炮响起来了，輪船上降了半旗志哀。只有我一人还在这空漠的‘圣·瑪丽亚’号的宿营地上徘徊，在給你——我的朋友，我至亲的卡佳写这封信。我現在多么想和你在一起啊！这场英勇的爭取生存的斗争結束快三十年了，可是我知道，对于你説来，他只是在今天才故去的。我現在仿佛是在火綫上給你写信，所写的是战斗中牺牲了的朋友和父亲。一陣陣悲慟和为他而驕傲的感情激动着我，面临着这永垂不朽的景象，我的心几乎要停止了跳動……。”

2 一件最不可思議的事

“我現在多么想和你在一起啊”，——我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咀嚼这几个字。我覺得这些話是那样寒冷，那样空虛，就仿佛是在一間空虛而又冰冷的房間里和自己的影子在說話似的。我所需要的不是这部日記，而是卡佳，是活泼，聪明，溫柔可愛的卡佳，是那相信我，热爱我的卡佳。在安葬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的时候，她扭轉身去不理睬我的态度使我受了很大的刺激，我曾

里
一

經幻想着要象牛虻那样回来見她，把所有証明我沒有錯的物証拋在她的脚前。然后，我又使她的父亲揚名天下，使他成为民族英雄。不过对卡佳說来，他仍然是父亲。除了她，还能是誰應該第一个知道我找到了她父亲的消息？除了她，还能有誰会对我說，假若我們所相信的神話还存在在世界上，那么一切都会美滿如意呢？我遍尝了战争的忧虑，劳累和变乱，終于找着他。迷迷蒙蒙的北极的幻景曾經照耀过我在不会說話时期的，茅塞半开的天地，可是我現在已經不是那个为北极的幻景所激动的孩子，也不是一个象年輕人惯有的那样固执己見的少年，而是一个飽經滄桑的成年人了。我站在那必将載入俄罗斯科学史中去的自己的新发现面前，感到驕傲和幸福。可是，我却无法抑制住心头的哀痛，因为所有这一切本来完全都可以不至于这样的！

我在一月底方才回到团里。第二天，北方艦队司令召見了我。

……我永远忘不了这天早晨，倒不是因为这天早晨的那种魚肚白色，同时又是气象万千的霞光使我感到它似乎是宇宙間第一个早晨的原故。在边疆的北极一带說来，这是一种特有的感觉。可是，当我抽罢烟，和艇长閑談了一会兒之后走到甲板上，佇立在沉甸甸的，被撕得稀碎的迷雾中时，我的胸腔仿佛是被一种期待着某种奇迹出現的感觉压迫着。霧靄忽而飘上甲板，忽而逸去。就在那极不規則的霧絮中，一輪圓月带着垂直发射出来的毫光，在群山之上慢慢探出它的脸来。后来，它变得愈发皎洁，好象是战胜了周围的一切，但却因此而疲憊，蒼白了。这时大家才发现，原来我們是面临着黎明前的玫瑰色的天空在行进。又过了几分鐘，月亮在飘浮的，正在溶散的霧气中最后一次地閃露了一下。于是，在科拉湾的上空便开始了一个青幽幽的，粉紅色的，披雪的黎明。

我們駛入了港灣。一座同黎明一般潔白的，粉紅色的，披雪的城市便展現在我的眼前。

小城象是被故意擺設在銀灰色的高坡上，為人一覽無余，山坡上閃露着花崗石美麗的光芒。一幢幢白淨的小樓房成直綫地排列着，一排比一排高，石級從樓房兩側的台階向各方伸出去。在緊臨港灣的地方，是一些修建成半圓形的高大的石砌房屋。後來，我才知道這些房子就叫做環形屋。它們彷彿是用巨大的圓規畫在葉卡杰琳娜灣上的一個半圓。

我登上了一節由橫跨在這些房子之間的拱門下通過的高梯階，從港灣的一岸看到了對岸。清晨那種曾在我心中時而翻騰，時而平靜的，莫名的激動情緒，又極其銳利地向我襲來。港灣沉浸在一片暗綠色中，它是那樣幽深難透，只有晴空的光芒使得它稍稍在顫抖。在為海岸密封着的天地里，有着一種極其遙遠的南國的情調，令人想到了高加索叢山環抱中的湖泊。可是，對面却是向遠方迤邐開去的，被冰雪封鎖着的小火山，在這一片雪山耀眼的背景上，只有個別地方顯露出幾株不大的樹木的細長黑影。

我是一個不迷信預感的人。可是，當我站在環形房屋旁，陶醉於北極城和葉卡杰琳娜灣這般明媚的風景時，我的腦海里不禁油然而浮現出了“預感”這個詞。這座城市給我的印象就彷彿它是我的故鄉，是我夢寐以求，尋訪多年未遇的故鄉似的。我懷着歡欣的心情暗自思量，這兒一定會發生一件對我非常有利，甚而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事。

司令部里一個人也沒有，我是在上班之前來到的。夜間值班員告訴我，據他了解，上級是命令我十點鐘之前到達，可是現在才七點半鐘。

彷彿是因為現在才七點半，這反而更好似的，我無緣無故

地松了一口气又走出来，仍旧从环形房屋的拱門內眺望港湾的景色。

在我去司令部这一会儿工夫，一切全都变了：在灰暗，森严的海岸中，港湾现在也变得灰暗森严了。在极远的地方，有一艘扁平的小火輪慢騰騰地向着北极城移动。我很想仔细地瞧一瞧它怎样靠岸，所以便轉到了另一条梯阶上去，这条梯阶拐了一个弯，联通着一个寬闊的平台。

这是往来于穆尔曼斯克和北极城之間的两条客輪之一。船上的旅客已經在甲板上排好了队，等待检查員檢驗証件。在走上岸来的几个海員中，夹杂着几个老百姓模样兒的人，甚至还有三、四个携籃提包的妇女……

从前有一个时期，我为了躲避卡耶尔·庫里，便跑到沙河和靜河汇流处的碼头上，长時間地观看碼头上的生活。輪船駛近了，船上飞起一根纜索，水手熟練地将纜繩一圈一圈地盘卷在歪斜的柱子上。碼头上頓時涌現出許許多多的人，把碼头压得似乎都显著地往水中下沉了。在这群熙熙攘攘，衣冠講究的快乐的人群中，我和誰也沒有关系。后来我無論在什么时候，看到旅客到站那种欢乐的，忙碌的情景时，必然就有一陣被弃的，孤独的感觉回到我的心头。这些印象无疑也就是从那令人伤心的年代留下来的。

可是这一次，可能因为船到的时候是在冬季，情况完全另一样，而且上岸的人也是另一类人，是一些滿怀心事的軍人，所以我沒有产生这种感觉。

說来也奇怪，同这天我在北极城中所看到的一切景物一样，这条老旧的輪船，挤滿了甲板的，不慌不忙的旅客行列，以及那些沿着海岸走到一座小屋子里去登記出差的三三两两零星的人

影，都給我一種愉快的感覺。所有這些事物都和我所期待的，生命中最美好的事關聯着，至於它們怎樣關聯，和為什麼關聯，我却無法解釋清楚了。

現在去司令部還未免太早，所以我就信步去找醫生，不過不是到醫院，而是到城里他寓所里去找他。

當然，他也是住在這些排列成直綫，一排比一排高的，白淨的屋子裡的。從海上看去，我覺得這些屋子更精緻，更漂亮了。這兒是第一排，而我要找的是第五排，第七座房屋。

我象惺惺忪忪人一樣，一邊走，一邊想着眼里所看到的一切。英國佬們戴着一種很滑稽的，象我們的馬車夫所戴的冬帽，穿着保護色的大披衫，他們趕到我的前面。我暗自想道，從他們穿的這些大披衫可以看出，他們對我們的冬天是不会有好感的。一個一本正經，胖呼呼的男孩穿着毛茸茸的白皮袄，肩上抗着鐵鍬，一位滿面鬍鬚的海員抱起他走了幾步。我心里暗想道，這可能是因為北極城兒童很少的緣故。

第五排的第七間屋子和它的左右兩邊任何一間屋都沒有絲毫區別，只不過這兒的階梯已凍成一塊真正的冰場，冰層下面隱約地可以看出一坎一坎的梯級。我一氣蹦上台阶。這當兒，從里面走出幾個海員，我和他們正撞了個滿懷。他們中的一個人小心翼翼地滑過冰場，一邊說，“不會在北極的黑夜中辨明情況，那就說明是缺乏維他命”。這些人都是醫生。所以毫無疑問，伊萬·伊萬內奇也一定是住在這間屋子里。

我走進門厅，推開一扇門，接着又推開一扇門。兩個房間里都空空的沒有一個人，屋子里充滿了旱烟味，床上的被子被人睡過以後還沒有疊，東西到處乱扔着，十足表現出男人居住的作風。同時，在兩間屋子里都帶着某種好客的情調，仿佛是主人故

意将門敞开的。

“有人嗎？”

根本沒有必要問这一声。我又走了出来。

旁边站着一个女人，她撩起裙緣正在用雪揉擦她那双光脚；我向她打听这间屋子是不是七号。

“您找誰呀？”

“找巴甫洛夫医生。”

“他大概还在睡覺吧，”女人說道。“您繞到后边去，那就是他的窗戶。多敲一敲！”

敲医生家的門当然要比敲窗戶容易一些，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却听了她的話，走到窗前去了。这座房子修筑在斜坡上，所以，屋后的这扇窗戶离地相当低。窗戶冻上了一层霜花，可是在我輕輕地叩了两下之后，用一只手将眼睛略微遮着，往里面仔細观望时，我隱約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这个女人似乎是弯腰在翻弄一只提籃，或者是一只箱子。当我叩窗戶时，她直起腰，走到窗戶边来了。她也和我一样用一只手打起眼遮向外看。透过霜花的碎屑，我在模糊的玻璃中看見一张象霜花一般零碎不全的脸孔。

妇人的嘴唇顫动了一下。她什么也沒作，只是顫动了一下嘴唇。凝滿了雪花，暗淡无光的玻璃挡住了她，使人很难看清她的样子。可是我却認出了她。她就是卡佳。

3 她就是卡佳

怎样才能表达出我們相逢时最初一刹那的，那种如醉如狂

的情景呢？我仔細看着她的臉，狂吻了一陣，又仔細地看着。剛問她兩句話，又打斷了自己的問話，因為我所要問她的事情仿佛已經是很早很早以前，一千年前的往事了。她雖然在列寧格勒受盡千辛萬苦，掙扎在飢餓綫上，並且失去了重見我的希望，這些事情不管多麼令人寒心吧，但是這一切究竟已成為過去了。而現在，她又站在我的面前，我可以擁抱她。天啦，這簡直令人不敢相信啊！

她的面色蒼白，清瘦，在她那失去了昔日嚴峻的神情的臉上，顯露出了一種新的東西。

“卡其加，你剪了頭髮了！”

“早就剪了，還在雅羅斯拉夫生病的時候就剪了。”

她不僅剪短了頭髮，而且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不過現在我不願去想這些事，周圍的一切，包括我們，也包括這間屋子，都象飛起來了一般，向一個地方飛去。這間屋子和剛才那間就象兩個近鄰似的完全一樣，裡面亂放著一些東西，當我敲窗戶的時候，卡佳彎腰從裡面取東西的她的那只箱子敞著蓋。屋子裡還有醫生，原來他一直就站在屋角裡，用手巾抹著鬍鬚，後來，他輕手輕腳地正要往外走，可是我沒放他走掉。不過這時主要的，最主要的事情（我怎麼老愛忘掉它！）就是卡佳現在是在北極城！卡佳出現在北極城，這是怎麼搞的呀？

“天哪，我還每天給你寫信哩！我們在莫斯科前後就差了一個鐘頭。你到瓦里亞·朱可夫家去的時候，我正巧在阿爾巴特排隊買麵包。”

“這簡直是不可能！”

“你給他留下了一封信，我當時就跑出來找你，可是到哪兒去找呢？誰能想到你會跑去找羅馬紹夫啊！”

“你从哪儿知道我到罗马绍夫那儿去了呢？”

“我什么都知道，全知道！我的亲爱的！”

她吻着我。

“我把一切的经过全都告诉你。”

她于是叙述了吓得半死的维什米尔斯基怎样到处寻找伊万·巴甫雷奇，对他说是我把罗马绍夫逮捕了。

“不过，这位海军少将尔同志又是谁呢？我写了一封信请他转给你，后来又给他本人写了一封信，可是什么回信也没有收到！你那时还不知道自己会到这儿来吗？为什么一定要我写信请他转给你呢？”

“因为我沒有自己的通信地址……我离开莫斯科后便寻找你去了。”

“哪儿去了？”

“去雅罗斯拉夫。我到了雅罗斯拉夫。接到任命的时候，我都准备要去新西伯利亚了。”

“你到这儿后，为什么不给柯拉布略夫去一封信呢？”

“我不知道。我的天哪，难道这真的是你吗？你真是卡佳吗？”

我们依偎在一起走来走去，不断地碰着地上的东西，我们总是一个接一个提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个“为什么”是那么多，就如同那将我们在列宁格勒拆散，使我们在莫斯科两条邻近的街道上错过，而现在又在我还是初次刚刚来到的北极城中，甚至在半小时前还不能设想到我的卡佳是在什么地方，使我们碰到一起的那些原因一样的多。

关于我找到探险队的消息，她是从中央机关报纸上塔斯社的通讯中看到的。她和医生联系了一下，他便协助她领到了来

北极城的护照。然而，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往哪儿给我写信。不过，即使知道的话，他们的电报和信件也未必能够寄到塔塔林诺夫船长的宿营地来吧！

医生出去转了一趟，然后带回一壶热茶来。他的这一举动虽说没有把一切向前飞去的那种速度终止，但好歹总算使我们并排坐到沙发上了。他端出一些硬得象生铁一般的面包干来请我们吃。后来他又拿来一罐炼乳，说了一些关于食具不好的客气话，将炼乳放在桌子上。

然后他便走出去了。我也就没有再挽留他。现在就剩下我们俩在这所寒意侵入的屋子里。这座房子的厨房里乱七八糟地堆积着罐头盒和肮脏的食具，门厅里冷得连积雪都融化不了。为什么会在这间屋子里呢？从这个屋的窗户外，往外可以看到连绵的小火山，看到浓重的雪水在复盖着白雪的悬崖峭壁间庄严地流过。不过，这仍然是一个我不准备追求解答的“为什么”。

医生临出门的时候，塞给了我一个电气玩意儿，我一接上手就把它忘掉了。后来经过一阵痛快的谈笑之后，我发现自己就象马儿在严寒中一般，嘴里冒出的浓厚的热气渐渐在融化，这时，我才想起这个玩意儿来。这是个电壁炉，看样子是本地造的，从它这一夜劲头十足，声嘶力竭的喊叫看来，它还是一个挺好使唤的玩意儿。房间里很快就暖和了。卡佳本来想将房间收拾一下，可是我没让她动手。我看着她，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仿佛是怕她会象刚才出现那样突然又不见了……

我在来医生家的路上，便发现天气在变化。现在差一刻都十点了，我走出屋子一看，刚才那阵呼啸着的寒风已经平息，空气也混浊起来了，松软的雪花沉重而迅速地降落着——这是暴

风雪即将到临的可靠的象征。

使我惊异的是司令部的同志居然已经知道卡佳到来的消息。司令员也知道了，否则他怎么会和往常不一样，笑嘻嘻地接待我呢？我很简略地向他报告了击沉袭击舰的经过，他对这件事并没有详细追问，只说要我今晚在军事会议上好好讲一讲。而“圣·玛丽亚”号探险队才是他现在真正感到兴趣的！

我开始叙述时有些拘束，有些难为情，虽然对于一个熟知我一生行径的人来说，对于我这次在执行战斗任务时找着了探险队这种巧遇不会感到奇怪。可是怎样才能象军队中要求那样，用三言两语简洁地把这思想向舰队司令员表达出来呢？他是那样聚精会神地，带着年轻人特有的真挚的表情，和对这事发生很大兴趣的样子倾听着，所以最后我就豁出来，不顾那些“三言两语”的要求，开始随随便便地讲起来了，因此一切顿时也就讲得和实际的经过完全一样了。

最后，只因为将军想起了卡佳，我们这才分别了……

我不知道自己在他那儿消磨了多少时间，大概有一个多钟头吧。可是等我走出门时，再也找不见北极城了，城市隐没在飞舞着刺人眼睛的，呼啸着的大雪里了。

我这天幸好穿了毡靴，就这样还不得不把靴筒拉到膝盖上面来。这哪儿还有什么一排排的房屋，连想也想不到这儿曾经有过房子！只有幻想才能想到在这漆黑一团，左冲右突的大雪里还有房屋，而且在其中的一间房子，第五排第七号里，卡佳按照我的意见，正在把硬得象生铁般的饼干放到火爐上烘烤。当然，我最后还是挣扎到这所房屋了。这时最困难的是认出它就是我要找屋子；在一个半钟头内，它变成了一座神话中的小茅屋，向一边倾斜着，积雪淹没了它的窗口。我象是暴风雪之神似

的，一头扎进了門厅里。在我的肩上堆积着厚厚的凝結了的冰凌，卡佳只好用扫帚把我渾身上下清扫了一番。

……似乎把話都講完了，我們已經两次接触到船长的訣別信。我这次把信帶到北极城来了，准备給医生看的，探险队的其它材料都留在团里。但是我們避开这些信以及和信有关的事情不談，我們就象是下意識地感到在我們相逢的幸福中，暂时还不能談这件事似的。

卡佳又談到小彼加現在的情况，——他現在长得黑呼呼的，眼睛稍稍有点兒斜視，整个脸型很象我已故的妹妹。我們商量了應該怎样对待姥姥的問題。她和別雷什金院长吵了一架，在集体农庄里租了一个“单间寓所”。我也知道了大彼加的情况。他又負了伤，得了勛章，重回前綫去了。他的营长是苏联英雄，卡佳在莫斯科时无意中認識了他。那人对她說，彼加根本“沒把死亡当回事”，这話使得卡佳大有感触。我还知道了瓦丽亚·特洛菲莫娃的情况，“如果一切真象卡佳想象的那样，那么，对他們俩說来就太幸福了”。屋子里已經有了点变化。东西的摆法变样了，变得使人悅目一些，它們象是在感謝她，感謝她把医生这间充滿男人气息的，冰冻的屋子温暖过来了。我們的小家庭生活 在抛弃我們整整一个半可怖的年头之后，經過这样久之后，現在終于又回来了。这样一个在我說来是无比重要的，奇迹般的变化发生已經五、六个鐘头了，可是，我对于卡佳現在是在我身边的这一事实始終还不习惯。

“你知道，我常常在想什么嗎？我覺得自己爱你太不够了，忽略了你和我在一起生活是多么困难。”

“可是我想的却是你和我在一起生活才困难哩。每次当你出发的时候，我总是替你担心，充滿了慌乱，忧虑和恐怖，不过这

也是一种幸福。”

我們一面談着話，她一面繼續在收拾東西。無論在什麼地方，在旅館里，在火車上，只要我們倆在一起，她總是這個樣子。這就是那些經常跟着丈夫走南闖北的婦女的習慣。我看到卡佳這種使人傷感的習慣，心里充滿了愛怜，體貼和悔恨的感覺。

後來，我們的鄰居回來了，他就是說我不善於在北極的黑夜中辨明情況的那位海員。這是一個面孔通紅的矮胖子，呆了不一會兒，我們又了解到了他是一位驚人的饕餮客。

他走進來和我們互相認識，頭一句話便聲明他是伊萬·伊萬內奇的同事，來北極城是準備在潛水艦上試驗某種救護儀器的。他今天晚上本來準備去穆爾曼斯克，可是該死的暴風雪打亂了他的全盤計劃。

“不批准哪，”他嘆了一口氣，說道，“所以除了吃吃喝喝之外，再沒有什麼可作的了。”

伊萬·伊萬內奇的家里既有葡萄酒，又有罐頭食物，可是他還說這些東西都不夠味，所以又去把自己的葡萄酒和罐頭拿來。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氣，打開了罐頭，不知為什麼還卷起了袖子來，把罐頭放在爐子上熱了一熱。我和卡佳這一整天都在吃東西，所以我們謝絕了他的酒會，不過他也並沒有因此敗興，獨自迅速地，狼吞虎咽地把所有的東西都吃得一干二淨。他從醫生口中已經知道我們失散和重逢的事，所以向我們祝賀。後來他又說，象這類的事情他知道的不下千百件了。

“這還算好的，您和尊夫人都能毫無怨艾地堅守獨居生活，”他用教誨式的口吻說道。“是的，天下什麼样的事都有啊！”

我不記得還談了些什麼事。我只記得自己更加銳敏地感到幸福，因為除了我們之外，還有其它的人和我们在一起。

后来他走了。整个晚上他都在向港口打电话，詢問有沒有批准。而这时暴风雪刚刚开始到巴倫支海上游蕩，哪里能談到什么批准不批准呢！甚至連屋子里的窗戶都会突然抖动起来，象是有人在外面搖撼，时而是畏怯的輕敲，时而是大胆的猛击。

这时，就剩下我們俩了。我怎么也看不够卡佳。我的天哪，我是多么怀念她呵！我什么也不記得！就象她夜里挽起头发——把发辮盘起来睡觉的习惯我也忘記了。她現在头发长得还不多，所以短短的辮子扎起来很可笑。可是，她仍然卷起辮子，露出两只我也已經忘記了的紅紅的小耳朵。

我們又开始談話了，現在是低声絮語。經過一段长久的沉默之后，話題完全轉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上。这另外的一件事就是羅馬紹夫。

我記不清在那兒讀过一篇关于古抄本，也就是羊皮紙抄本的故事。后代的抄写員擦去了紙上的原文，写上一些帳目和字据。可是經過若干年以后，学者們又能发现原来的文字，这些文字有时甚至是天才詩人的手笔。

这件事情就好比是古抄本，卡佳照羅馬紹夫的話把在松林里所发生的事情对我叙述了一遍，然后我就象是一块橡皮，擦去这番謊言，在謊言下面显露出了真理。我自己明白，同时也对卡佳說明了他的鬼把戏里面这复杂卑鄙的一着。他的这个鬼把戏前后玩了两次：头一次是向卡佳証明，說他救了我的性命；后来又向我証明，說他救过卡佳。

我把我們在义犬广場最后的一次談話一字不移地告訴了她，他的自白使卡佳感到万分惊駭；他的招供說明了我一切不幸的根源，揭开了那一直苦恼着卡佳的謎。

“你把这些話都記下来了嗎？”

“是的。象作記錄那樣記的，並且強迫他簽了字。”

我把他的談話重新敘述了一遍。從在小學念書時開始，嫉妒的感情就一直嚙噬着他那空虛不安的靈魂，他終生都為這種嫉妒的感情折磨着，始終在注意我。不過關於他靠桌子的牆壁上掛着一張卡佳的漂亮相片這件事，我什麼話也沒說。我沒有說的原因，是覺得他這種愛法對她說來簡直是侮辱。

她在聽我講話的時候，臉色很陰沉，但是一雙眼睛却在燃燒着……她抓起我的手，緊貼在自己的胸上。她的臉因為激動變得蒼白。她憎恨羅馬紹夫，也許正是因為那些我所不願談的事情，她更是百倍地憎恨他。可是他對於我說來是遙遠無關，微不足道的，我想到自己戰勝了他，不禁感到高興……

胖醫生還在詢問批准不批准的事。因為暴風雪一直不甘罷休，大肆猖獗，拋射雪彈，所以仍然還不能批准。暴風雪光顧了我們的漁村，也光顧了德國人那邊，它卷起洶涌的波濤，衝擊着隱蔽到挪威峽灣中的船隻。不准出港，港口封閉了，刮着九級大風。

我的妻把手掌枕在臉頰下面睡着了。她是多么美麗，多么聰明，我真不知道她因為什麼會永遠愛我。她睡着了，我可以長久不移地觀察她，同時想着，現在就只有我們倆人了。雖然這短暫的幸福之夜即將結束，可是我們終究從這場馳騁在世界上的暴戾的風雪中奪得了這一夜。

我需要在六點鐘前起床，我要卡佳答應我不把她叫醒；甚至在頭一天晚上，我們就把告別的話都說過了。可是等我睜開眼時，她穿着衬裙已經在洗抹食具，並且把濕淋淋的盤子斜放在爐子旁邊了。她知道我在什麼部隊工作，可是，我們並沒有談過這

方面的問題。只是在我匆匆忙忙將沒有喝完的杯子放下，剛剛站起來時，她又象過去那樣問我帶不帶降落傘。

我和胖醫生一起走出來。暴風雪平息了，整個城市湮沒在一條長長的，順着道路迤邐開去，象被刀子一切兩斷似的雪丘里。

4 訣別信

我臨走的時候，把船長的訣別信交給了卡佳。從前，我在恩斯克教堂公園里，也曾把我和達莎阿姨從被淹死的郵遞員身上撿到的信留給了她，讓她獨自一個人去讀。我那次守候在馬爾登長老炮樓下，我的思想隨着卡佳在一行又一行的讀着，我感到渾身都冷起來。

而這一次，我却要幾天之後才能看到她。可是反正一樣，我們宛如仍然在一起讀信，我知道卡佳能感到在她的肩后有我在呼吸着。

下面就是這些信。

—

聖彼得堡，水道測量總局

彼·塞·索柯洛夫海軍上校

我親愛的彼得·塞爾蓋耶維奇！

我這封信是在我們旅行將近終點時寫成的，遺憾的只是這次旅行將由我孤單一人來結束。但願這封信能到達您的手中。我覺得世界上大概再不會有什麼人能夠忍受我們所身受的一切痛苦了。同伴們一個接一個地相繼犧牲，而被我派往加爾其哈的偵察隊又是一去

不返。

我拋下瑪莎和您的教女，將她們遺留在困苦的環境中。如果我知道她們的生活得到了保障，那我雖死也可以稍覺寬心，因為我認為我們的祖國是不會因我們而慚愧。我們這次探險很不成功，不過，我們在返回我們發現的陸地，並對它進行了研究之後，已經盡我們的力量將這次失敗彌補過來了。

縈繞在我腦中最後的思想是我的妻女。但願我的女兒一生順利。請您象過去幫助我那樣幫助她們吧。在我臨死之際，我懷着無比深厚的感激心情想到您，想到我在您的領導之下工作的時期——我青年時代最美好的歲月。

讓我擁抱您

伊萬·塔塔林諾夫

二

水道測量总局

局長閣下

“聖·瑪麗亞”號探險隊

隊長 伊·李·塔塔林諾夫寄

報 告

謹以萬分榮幸，報告水道測量总局下列事項：

公元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六日，測得“聖·瑪麗亞”號所在位置為緯度 $79^{\circ}08'30''$ ，以格林威治為準，經度 $89^{\circ}55'00''$ ，在能見度良好，天氣晴朗的情況下，從漂浮的“聖·瑪麗亞”號船上發現船東有一片無名的、廣袤的土地，上有無數高山和冰河。在這塊土地所在的地區，過去也曾經發現過若干跡象：如一九一二年八月，我們看見成群大雁從北北東——南南西的方向由北飛來。一九一三年四月初，我們在東北方向的地平綫上看見一條清晰的，銀白色的地帶，被一層形

状极为古怪的云采，仿佛是远山中的雾气一般籠罩着。

这块土地与子午綫的方向相齐，它的发现使我們产生了一个希望：一旦有好机会时，便立刻离开船，踏上陆地，沿着海岸朝泰麦尔半島方向往前行进，再根据具体情况，直达哈丹加或者叶尼塞河口的，最先被发现的西伯利亚村落。在这个时候，我們漂流的方向是絲毫沒有怀疑的。我船随着浮冰以北偏东七度的主航向流动。即便这个航向再往西一点，也就是和当年南生的“佛兰姆”号浮动的方向相平行的話，我們也不可能在一九一六年秋季以前摆脱冰层的包围，而我們的粮食却只够吃到一九一五年的夏天。

我們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这些事情和本文的实质无关)，直到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們才在緯度 $81^{\circ}09'$ ，經度 $58^{\circ}36'$ 的地方登上这块再次被我們所开拓的土地的海岸。这是一个被冰雪封没了的島屿，它的位置标在本报告附图 A 上。五天之后，我們才抵达組成新发现的这块陆地的三、四个島屿中的第二个島上。这个小島編号为 Γ 。我在小島一个突出的海岬上选定了—个天文观测所，求得該观测所的座标为 $80^{\circ}26'30''$ 和 $92^{\circ}08'00''$ 。

沿这块陌生土地的海岸南行，我又勘察了北緯八十一度与七十九度之間的海岸。滨海北部是一块相当低的洼地，部分地区并且被一条寬闊的冰川淹沒。靠南的海岸逐漸升高，漸漸掙脫了冰层的束縛。我們就在这兒找到了一些漂浮的原木。在緯度 80° 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寬闊的海岬(或海湾)，由 C 点順西南西方向伸入。

自 Φ 点开始，海岸驟然轉向南南西方向。我原拟勘察这块新开拓的陆地的南岸，可是，这时我們已經决定沿哈里东·拉普捷夫海岸向叶尼塞河前进。

在向总局彙报关于个人所作的各项发现的时候，我認為有必要指出，因为船上的天文鐘两年来始終沒有校正过時間，所以尽管天文鐘的保养如何精心，个人認為經度的計算还不可能完全可靠。

伊万·塔塔林諾夫

附：

- 1.“圣·瑪丽亚”号值更日志(签字)付本一份。
- 2.天文鐘簿付本一份。
- 3.載有各种計算数字及摄影数据的布紋紙練習本一个。
- 4.实地拍摄的地图一张。

公元一九一五年于俄罗斯群島四号島营地。

三

亲爱的瑪莎：

恐怕我們的关系就要結束了，我甚至不敢希望你能够有那么一天会看到这几行絕笔的信。我們再也走不动了，走着路也要冻僵了。我們只有休息，甚至吃了东西之后身体也不暖和。我的两条腿，特别是右腿的状况很恶劣，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条腿是在什么时候冻坏了的。我在写信的时候，仍习惯用“我們”两个字，其实可怜的柯尔巴可夫死去已經三天了。多可怕的暴风雪啊，我甚至无法将他掩埋起来！暴风雪一連刮了四天四夜，——對我們說來，这实在是太久了。

很快就輪到我的末日了，不过我一点也不害怕死。显然我为了生存所作的努力已远远超过我所能作到的了。

我很对不起你，虽然別的思想負擔也很沉重，不过，这个想法却是最最沉重的。

这些年来，你耽受了多少忧虑，尝尽了多少痛苦，而現在，又是一次最大的痛苦。不过請你不要認為自己的終身受着束縛，如果碰上你認為和他在一起能够幸福的人，請你記住，这也就是我对你的希望。請你把這話也告訴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吧。讓我擁抱她，請她尽力多幫助你，特別是关于卡佳的問題多幫助你。

我們旅途非常艰苦。不过，我們表現得都很好，如果装备工作沒有延誤，如果装备的物資不是这样糟糕的話，我們說不定还能完成我們的任务呢。

亲爱的瑪申卡，我真不知道你們沒有我之后将怎样生活！还有卡佳，我的卡佳哟！我知道誰会来帮助你們，不过在我生命即将消逝的最后一刻，我不願意說出这个人来。我无法将这些年来郁积在心中的一切，毫不掩飾地向他傾吐。他就是那一向束縛着我的手脚的势力的化身。其实，只要他不妨碍我，即使不来“帮助”我，那我也能完成許多工作。想起这些事来，不禁感到万分痛心。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唯一能引以自慰的，是我以自己的劳动为俄罗斯开拓和增添了一块辽阔的，新的土地。亲爱的瑪莎，我实在不願終止这封信，終止这最后一次和你的談話。請你爱护我們的女兒，要注意不使她养成懶惰的习惯。这是我的形象，我这人从来就很懶，而且过于輕信別人。

卡佳，我的乖女兒！你将来会不会知道我曾經多么想念你，甚至在我临死之前还想瞧你一眼！

够啦。手都冻僵了，我还在写个不停。拥抱你們。你們永久的亲人。

5 最后的一頁

我不願意讓卡佳留在医生的房間里，更主要是因为這間房子还不是医生的，而是一位牺牲的指揮員的，屋子里的东西和家具都是他的。牆壁上对称地挂着几幀不十分成熟的，尚未完成的水采画，描繪着北极城的风景，屋子里整整齐齐地堆放着一叠专业書。此外，还有很多相片，全都是一个穿着乌克兰衣裳，留着长辮的姑娘，以及在她长大一些之后，抱着一个光屁股的胖娃娃所照的相片。这間房子里所有的东西，使人突然看到了旧主那已經停息了的生活。

呆在这样的房间里，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完全不必要的想法都会自然而然产生的。对于一个丈夫在空军服务的妇女说来，往往不易摆脱开这些思想。可是，卡佳还是决定要留下来。

“这有什么！”她说道。“这是最普通的事情了。”

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时，我能来北极城的次数也相当少，我只要知道她是在伊万·伊万内奇医生身旁，她每天都能看见他，那我的心里就感到愉快了。她很快就参加了工作，起初在医院里当护士，后来在医生门诊的旧北极城工作。两星期后，我再次来到这个地方时，她已经对自己的新生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鑽到这个生活里去的速度真是快得惊人。

这些地方常常有舰船出航，到远近的海道上和盟军会合，去歼灭德国鬼子的护航运输队。因此，这座小城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或多或少地和这一斗争有着联系。被大众热爱的指挥员的名字在这儿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其中有很多人的名字甚至全苏联的人都早已知道了。

我在恩城时，深感前线和后方之间距离的短近。而在这儿，这种罕有的，近得仿佛是一家人的前后院一般的关系显得就更加突出了，因为北极城的生活本身就比较在恩城更复杂，更加丰富多采。这样的生活不是从天而降，而是循序渐进的。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我们的人，上自司令员，下至任何一个红海军战士，都在这蛮荒的峭壁中牢固地扎下了根，决心战斗到最后胜利。正因为这是一种强度很均匀的紧张，所以它才会这样深深地贯穿到日常生活中的每件小事上去的。

回忆起一九四二到四三年间的那个冬天来，我觉得这恐怕要算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的，充满了家庭乐趣的冬季了。我当时每隔一天便要出动轰炸德寇的舰船一次，想起这些情况，很可

能会使人感到惊奇。不过，当你不知道卡佳的情况时，飞行时是一种滋味，而在你很清楚地知道她是安全地住在北极城，身体健康，再过几天，我又可以看见她在饭桌前倒茶的情景时，飞行完全又是另一种滋味。饭桌上方挂着一个翠绿的绸灯罩，伊万·伊万内奇用厚纸很艺术地剪了许多小妖精钉在灯罩上。在我的想象中构成了一幅图画：这个值得纪念的冬天里，曾经使得我和卡佳欢欣鼓舞的人和事都落在绿灯罩的亮圈内，而那些曾经使我们烦恼和伤心的人和事却躲藏在遥远的，阴暗的角落里去了。

我还记得我们在傍晚的一些集会。有一次，为了和医生取得联系，经过了长久的，劳而无功的一些尝试之后，我终于搞到一艘小艇，来到了北极城；尽管这时天色已经很晚，可是我们几个朋友还是团聚在这个光亮的圈子里。夜深有什么关系，如果不在一起，那么白天还不等于就是黑夜吗！

胖胖的，好吃的医生穿了一件肥大无比的皮大氅，从他房间里蹒跚地走出来，在桌旁占据了一个即使不是最显著，但至少也是最热闹的位子。他那种迫不及待的样子，好象是在期待着一件好事，或者，即使不是期待好事，那么最低限度也是在期待一件快乐事；凭他这付样子就够人热闹一阵的了，即使他不说话，也能听得见他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咀嚼声，或者平常呼吸时所发出的响亮的声音。

如果根据吵闹声来分的话，仅次于他的自然就要数我了。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谈过这么多的话，喝过这么多的酒，这样痛快地欢笑过！在我看见卡佳时的那种感觉，仿佛一直还留在我的灵魂里——一切都在向前飞去，往一个地方飞……往哪儿飞呢？谁知道！我相信是往幸福的乐土飞。伊万·伊万内奇医生在爱子牺牲之后，觉得自己完全成了病人，可是在这些傍晚的集会

上，連他也活跃了，愈加爱引用——主要在国际問題方面——他所喜欢的作者柯茲瑪·普魯特可夫的名言。

最后，如果以鬧聲的程度来分的话，末席应该属于我的领航員。他向来不講一句話，只是間或沉思地动一动眉头，从口中取出烟斗，一个接一个地往外吐烟圈。我上面似乎已經說过我很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卓越的领航圣手，并且对我也很好，——我素来就喜欢象他这样的性情。

卡佳这时忙着自己女主人的工作。我不知道她怎样把这所房子变成了我們的家，使我們能够在这里招待客人，从心眼里設法要使客人們都能酒足飯飽。但这些事都作到了。

当然，若不是无綫电广播每天晚上都带来关于我軍获胜的消息，那么也不可能有这些傍晚的聚会，不可能享受到和卡佳見面的幸福。第二天清早，当她送別我的时候，那好象兒童玩的大气球一般的太阳，羞人答答的、青春洋溢的太阳，那象征着北极一天开端的太阳，仿佛是特意为了我們而升起在一綫綿綿的群山之上……要不是无綫电每天晚上带来胜利的消息，那么也就不可能有这种高涨的情緒，即使有的話，那也是完全另外一种高涨情緒。这种高涨情緒是具有普遍性的，它不仅在此方这兒——战綫右翼的前沿，在这兒一个被茫茫大海所削断的荒凉的峭壁上，我們陆上战綫最后一个兵士守卫的地方，——而且在战綫任何一个地段中，都同样有这种高涨的情緒。

斯大林格勒的最后几响枪炮声已經消失，渾身被尘烟熏黑的战士从下水道孔中爬出来，受到强烈的阳光和雪輝的刺激，他們眯縫着眼睛，观察这座已成为一片废墟的、曾經奋力苦战过的城市。这一伟大的胜利的迴音嘹亮地縈迴在北极城花崗岩質的层巒叠嶂間。我們似乎已經作到了一切所能作的事，为的是使

胜利的迴音沿着挪威海岸传得更远。德国鬼子的商船队正偷偷摸摸地从一个国家流窜到另一个国家，讓胜利的迴音响到他們流窜的地方去。德国鬼子在卸載他人的武器，把搶来的鉄矿向自己的船上搬运，在巴倫支海上那充滿神秘的喧鬧声的、高度警覺的黑夜里运送鉄矿，讓胜利的迴音响到他們正在干罪恶勾当的这些地方去吧……

我們——医生，卡佳和我，把所有的閑暇時間都耗費在研究和挑选“圣·瑪丽亚”号探险队的材料的工作上。

不知道冲印探险队的胶片和辨認文件这两項工作究竟那件更复杂。大家都知道，年代愈久，相片的色澤愈淡，或者模糊不清。所以包装的封皮上总是注有保险期限，过了限期后，工厂即不再保証物象清晰。“圣·瑪丽亚”号胶片的保险期到一九一四年二月結束。不仅如此，因为金屬包皮內灌滿了水，所以胶片已經湿透了，而且胶片在这样的状况下显然又經歷了不少岁月。連北方艦队最好的冲洗員都說，这簡直是“异想天开”，即使他們是神灵的后裔，碰到这种情况，对于冲洗这些胶片也是束手无策的。可是我毕竟說服了他們。在一百二十张小心又小心地經過晾干的底片中，約摸有五十张是被認為可以“进一步加以处理”的。經過了多次的复制之后，得到二十二张完全清楚的相片。

我曾經讀过克里莫夫航海长的日記。他的字虽然写得小，字迹也很潦草难認，加之又被海豹油浸过，但这終归是两本經過装訂的練習簿上的一些互不相联的单頁紙张。可是这次所发现的塔塔林諾夫的文件呢，除了訣別信比其它紙片保存得比較完好之外，其它的都成为粘在一起的紙团了。要靠我們自己的力量把这样一团廢紙再恢复成天文鐘簿或者值更日志，变成地图

或者照片資料，這當然是不成的。所以這項工作也是在一位有經驗的人領導之下，在專門的實驗室里完成的。在塔塔林諾夫船長開列的附件中，提到了一本布紋練習簿，其中所記錄的一切，本書因篇幅關係，所以不準備詳細地敘述。我要說的是他根據自己觀察的結果，已經作出一些結論，根據他所提出的公式，可以計算北冰洋任何地區的浮冰運動的速度和方向。乍一看來，這几乎是難以令人相信的成就，因為從“聖·瑪麗亞”號以很短的漂流期間所經過的地方看來，似乎不可能得到面這樣廣的總結資料。不過，天生的明哲往往並不需要很多的事實。

“你雖然讀完了塔塔林諾夫一生的事迹，”我曾經這樣對自己說過，“可是最後的一頁仍然還沒有揭開啊。”

“問題還沒有結束嘛，”我這樣回答道。“說不定有那么一天，我能夠揭開，並且讀到這一頁呢。”

這一天來到了。我讀完了他一生的不朽~~不滅~~。

6 归 来

一九四四年夏季，我獲得一次休假機會。我和卡佳決定在莫斯科盤桓三個星期，然後第四周到恩斯克去拜訪老人。

我們是七月十七號到達的，——這是一個多么可紀念的日子啊！這一天，正好德寇俘虜被帶出來經過莫斯科游街示眾。

我們攜帶的箱子都很輕，所以決定先乘地下電車到市區中心。可是，當我們走出航空站後，我們整整等候了兩個鐘頭都不能穿過街道。我們起先站着看，可是後來實在是疲乏不堪，便坐在箱子上，後來又站起來。俘虜群還在不停地走。前面走的是

挺胸凸肚的將軍，其中有好幾個是著名的虐待狂和劊子手，他們戴着高筒帽，穿着制服，臉上刮得光溜溜的，帶着一付无可奈何的傲慢神情。將軍們大概都快到克里姆大橋了，而后面的兵士還一跛一癱不停地走着；有的衣衫襤褸赤着腳，有的穿着軍大衣，却敞着懷。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无比的憎恨瞧着他們。我和大部分的轟炸機飛行員一樣，整個戰爭中根本沒有見過一次敵人的真面貌，至于在空中向目標俯衝的時候，從這樣的位置怎么能看清楚什么东西呢！現在，可說是走運了，一下子五萬七千六百個敵人，二十人一行地在我面前走過。在這個光輝燦爛的日子里，莫斯科顯得特別瑰麗，他們驚訝地看着莫斯科，有的人垂頭喪氣，無精打采地瞧着腳下。

他們雖然是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命運；但是有一點却是共同的，就是他們的一舉一動和我們都是全然不相同，隔我們十分遙遠的。

我望了望卡佳。她把手提包緊壓在胸前，站在那里激動得很厲害。後來，她突然重重地親吻了我一下。我問道：

“是感激嗎？”

她很嚴肅地回答說：

“是的。”

我們帶的錢很寬裕。我們在“莫斯科”大旅館租了一套最高級的房間。共有五個房間，陳設華麗，有穿衣鏡，畫片和三角鋼琴。

起先我們感到有點兒惶惶不安。不過後來終於覺得這些穿衣鏡，地毯，上面畫着花草和愛神的天花板並不難于習慣。我們在這間旅館里感到很愜意，寬敞，而且十分舒適。

柯拉布略夫不用說是在我們到達的當天就來了。他的八字鬚整整齐齐地卷着，衣裝十分考究，穿着一件寬大的綉花衬衣。這件衬衣很合他的身，使得他酷象一位偉大的俄國畫家，不過，我和卡佳都想不起究竟是象誰。

一九四二年夏天，當我去叩他家那扇釘滿了毛氈的毛茸茸的門時，他在莫斯科。上一次，當他回家發現我的信，知道我要去雅羅斯拉夫找卡佳，他急得差點沒有發瘋，那時他在莫斯科。

“您怎麼想要到那兒去！去找卡佳！這是因為他們不肯給卡佳在西夫切夫·符拉什克胡同登記戶口，所以我頭天晚上帶她到民警局去了，而你卻要到那麼遠的地方去找她！”

“伊萬·巴甫雷奇，這不算倒楣，”我說道，“萬事但求結局好。我在那年夏天不很走運，所以，我甚至覺得等到現在，等到事情有了美滿結局的時候，我們才見面反而更好一些。那時候，我是又黑又瘦，象個野人似的，而現在，您看，我不是一個很正常，很愉快的人了嗎。您還是講講自己的情況吧！您都在作什麼？生活好嗎？”

伊萬·巴甫雷奇從來就不善於談自己的事，不過我們還是了解到許多關於公園凱旋路小學的有趣的消息。就是在這所學校里，我和卡佳生活中曾經發生過十分重大的事件。我們念完小學後，學校生活從此便逐年地和我們生疏了。想起那些熱情的，把人生想象得過分複雜化了的子就是我們時，不免感到有些驚異。可是對於伊萬·巴甫雷奇說來，學校生活依然在繼續着。他每天都要站在穿衣鏡前，不慌不忙地梳他的八字鬚，拿着教鞭去上課，一批一批新的學童象是在探照燈的照耀下似的，在他那嚴峻，愛撫和關切的目光下通過。啊，他的目光多麼厲害！我想起了格里沙·法伯爾所說的“眼光無價之寶”，如果他能

有这样的目光，那他“在戏剧事业上只要稍下点功夫便可以青云直上了”。

“伊万·巴甫雷奇，他在哪儿呢？”

“格里沙在省里，”伊万·巴甫雷奇说道，“在薩拉托夫。我很久都沒有見到他了。他大概已經成为优秀演員了。”

“他过去就不錯哇。我一向很欣賞他的演技。就是嗓門大了一点，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坏处！同时，这样吐字也清楚一些。”

我們挨个兒把全班同学都談到了。回忆这些被生活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老朋友真是又是伤感，又是高兴。丹娘·薇莉琪柯現在在斯大林格勒修建房屋。舒拉·柯乞涅夫現在是炮兵上校，不久前，在一項命令中还見到过他的名字。可是，有很多人的情况甚至連伊万·巴甫雷奇也一点不了解。時間仿佛是由他們的身旁閃过，他們在別人的記憶里永远是十七、八岁的孩子。

我們一直坐着在閑談。瓦連金·尼古拉耶維奇·朱可夫教授已經来了三次电话，挨了大家一頓痛罵，說他枉自作了个教授，居然又拿研究蛇或玄狐杂种的玩意兒作借口，連来都不肯来一趟。

后来他总算是来了，呆呆地站在門边，凝思地将一个手指头放在鼻子上。你瞧，他大概还以为自己走錯了房間哩！

“喂，教授，請进，請进，”我向他說道。

他打着哈哈，向我奔来。跟在他后面走进門来的是一位高大，丰滿的淡发夫人，假如我沒有弄錯的話，她从前就叫琪玲。

当然首先我又被盘問了一通，而且是交叉盘問：左边瓦里亚，右边琪玲，交相发問。問我为什么，根据什么和怎样擅自撞入別人的住宅，把所有的房間都串一遍，发现了卡佳是住在瓦·尼·朱可夫家里，好的办法不想，却偏留下一张既沒有注明到哪

兒可以找到我，又沒有注明我准备在莫斯科住多久的毫无意义的条子。

“木头，那就是她的床位呀，”瓦里亚說道，“床头上就是她的連衣裙！我的天哪，你怎么就沒有猜到只有女人的手才可能把我家里弄得那么有条有理呢？”

“沒有猜着，”我說道，“不过，关于女人的手这一点，我倒是絲毫也不怀疑的。”

琪拉哈哈大笑起来，并且这里面似乎也还是善意的，可是瓦里亚却睜大眼睛瞪了我一眼。显然，那个两只眼睛不一样大小的，神秘的任卡·柯尔巴克察的暗影还残留在他們家中。

妇女們到隔壁屋子去了。琪玲要喂她的第四个孩子，所以可以断定她們是有話要談的。

我們談的是关于战争的事。从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出战争即將結束的征兆。瓦里亚和伊万·巴甫雷奇听我講話时的那种神情，就仿佛即將向司令員作最后一次报告，說我軍攻占柏林的那个人就是我似的。

瓦里亚問我，为什么我們还不强渡維斯拉河。我回答說不知道，他不禁深深表示遺憾。关于北方的情况，若是从他所提的問題来看，似乎我所指揮的不是一个飞行大队，而是整个方面軍。

后来伊万·巴甫雷奇談起了塔塔林諾夫船长的事。为了怕卡佳听見，我将說話声音稍稍压低一些，把未曾发表过的細節对他講了一些。在距船长的帐篷不远的一个狹窄的峽谷里，发现了几个水手的坟墓——尸首暴露在地面上，压在大石头底下。尸骨都被熊和狼狗拖散了，也分不清是誰的尸骨；有一个头盖骨是在距营地三公里的洼地中发现的。船长在最后的几天里，显然是和一个比他早牺牲的炊事員柯尔巴可夫一起在睡眠袋里度

过的。給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的信上，本来写的是“給我的妻”，可是，后来又改为“給我的寡妻”。在船长的左手下面发现一个訂婚戒指，指环的内側鑄有“瑪·塔”两个字母。

我从箱子里取出一顆心形的金首飾給大家看。首飾的一面鑄着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的工笔画象，另外一面装有一綫黑发。伊万·巴甫雷奇走到窗戶跟前，戴上眼鏡，对着这颗首飾看了很久。他用手絹擦擦鬍子，然后又仔細地看。他看了那么久，直到最后我和瓦里亚連忙走过去，从两边搂抱着他，把他扶过来，讓他坐到安乐椅上。

“咳，我的上帝，卡佳多么象她！”他吐了一口气，說道。“到今年十二月就十七周年了。真是难以令人相信呀。”

他請我去把卡佳叫来，并說他在春季去过墓地一次，栽了些花草，并且还雇了一个工人把栏干油漆了一番。

朋友們在我們家里一直坐到深夜，琪拉还回到西夫切夫·符拉什克去喂了一次最小的孩子，回来的时候又把最大的姑娘帶了来。这就是希望将来成为著名演員的那个孩子。总而言之，照琪拉母亲的說法，已故的瓦尔瓦拉·拉宾諾維奇，連同她那所素有声名的学校加在一起的价值也赶不上这个小女孩。她还在吃奶的时期，就能很出色地“模仿声音”了，而現在她朗誦普希金的作品甚至不逊于大名鼎鼎的斯切潘良。

瓦里亚还是象往常一样，講了許多关于他的野兽的事，同时講得也还不很枯燥，此外，他还講了些关于在战壕里和齙齿动物作斗争的故事。我問他究竟証明了蛇的血液随年龄而变化的这个規律沒有，或者这个問題还是科学中的一个謎。他笑了笑，說証实了。

今天是莫斯科的美妙的一天，一开始便是我們因为俘虏要

通过而等候两个鐘头，——沒有比这样的开端更美好的了！在这天，一个鮮明的，意識到胜利的感觉忽然在心底里亮堂了一下，永远地留存下来了。当胜利的消息还没有在报纸上用黑字印出来，为了取得胜利还需要許多人献出生命，可是从那洋溢在各处的，不可捉摸的“归来的感觉”中，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胜利的迹象。生活重又回到昔日的位置上，战争把它們完全变了样，一九四四年夏日的莫斯科充滿新旧冲突的，奇怪而又新鮮的感觉。

这天晚上响起了礼炮。九点三刻鐘传出了“重要新聞”的呼喊声。瓦里亚說，應該赶快到十二楼去。这时乘电梯的人多得很，我們索性走上楼去；我們在半路上才知道去十二层楼是非坐电梯不行，所以我們原来准备走上去的打算完全落空了。

可是，我們最后还是設法上去了。現在在我的眼下便是在黃昏中的，瑰丽的莫斯科了。我和卡佳按捺着心上火热的，迫切的激情，会心地微笑着，相互看了一眼。我們手牵着手，站在一道垣墙旁。宁靜的天空被紫紅色的烟火不疾不徐地照耀得通紅，后来在我們的头頂上疾速地飞起一道道絢烂夺目，五光十色的火苗，然后又緩緩地落了下来。

7 两个談話

我在莫斯科需要办两件事。第一是在地理学会作报告，說明我們怎样找到“圣·瑪丽亚”号探险队的；第二是和羅馬紹夫的預审員談話。說来也奇怪，这两桩事情竟是互相关联着的，因为我在恩城的时候，便把我和羅馬紹夫在义犬廣場談話的記錄抄录了一份給檢察长。

我現在从第二件事开始說起。

一九四三年秋季，羅馬紹夫被判处了十年徒刑。这个消息，我是从恩城特刑处一位工作人員口中听来的；他过去在莫斯科办理这件案子时曾审讯过我。不知道怎么搞的，現在又把这件案子轉到地方法院去了，而且更令人不解的是轉去复审了。在我离开恩城前不久，我接到通知，說是莫斯科审讯工作組要求我提供一些补充材料。

这一切都是些討厭无味的事情。一路上，我想起自己又要再次卷入这件案子的令人厌倦的，复杂的气氛中去时，心中不免有些窩囊，要是沒有这件事休假該多么好哇！

下車后第二天我去报到，他們当时就請我去見負責审理羅馬紹夫案件的审查員……

这是一間公用的会客室，客厅里光綫不很亮堂，中間用木栅栏隔开。墙边摆放着許多寬大老旧的板凳，坐着一些形形色色絕不相同的人，有老头，有姑娘，还有沒戴肩章的軍人，大家都在等候着传訊。

我找到我的审查員的办公室——門上标着他那个希奇的姓：卫雪拉戈。因为時間还很早，所以我就把会客室里的地图上的小旗重新插了一下。这是一幅挺不錯的地图，只不过小旗落在战綫后面太远了。

一个熟悉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工作。这个声音是那樣的熟悉，圓潤，庄严，使我在一刹那間感到自己仿佛又成了一个衣衫襤褸，身上肮脏，褲子上还有着大补釘的孩子似的。

这个声音問道：

“可以嗎？”

就好象現在还不能进来似的，尼古拉·安东內奇輕輕將审

查員的房門推开了一点之后，便又关上門，帶着一付受了委屈的神情坐到凳子上。我最后一次看見他是一九四二年的夏天在地下电車站上。他現在的样子和那时候一样：道貌岸然而又帶有一种含蓄的矜持神气。

我一面吹着口哨，一面更換着波罗的海第二战綫上小旗的位置。从我对他說“我一定能找到探险队，到那时我們再来看誰是誰非吧”这句话之后到現在，已經过了十七年。他知道我找着探险队了嗎？这一点毫无疑問。不过他并不知道在塔塔林諾夫船长的文書中，发现了許多无法爭辯的，駁不倒的鉄証，証明我的認識是正确的；关于这些事，报刊上沒有透露过一点消息。

他双手撐着手杖，垂着头坐着。后来他瞟了我一眼，在他那灰白的大脸上掠过了一个情不自禁的，迅疾的动作。我快乐地想道：“認出来了。”他認出了我，連忙把眼光避开了。

……这是他絞尽脑汁在考虑如何应付我的一刹那。一个多么复杂的难题啊！看样子，他已經順利地解开了这一难题。他突然站起来，手举到帽沿上比划了一下，勇敢地向我走过来。

“如果我沒有認錯的話，您就是格利高里耶夫同志吧？”

“是的。”

我有生以来，似乎还是第一次这样吃力地吐出这两个短短的字。不过这也是我在考虑應該如何对付他的一刹那。

“時間对您說来可真是沒有白白过去哇，”他瞅着我的勋帶，繼續說道。“您这次是从哪兒来？您是在哪个战綫上捍卫我們这些渺小的后方工作者呢？”

“在最北方。”

“准备在莫斯科住很久嗎？”

“来休假，待三个星期。”

“您也是被迫到這間會客室來浪費許多寶貴光陰的吧？不過話又說回來了，這也是我們做公民的應盡的義務呀，”他以一種道貌岸然的神氣添了這麼一句話。“我想，您大概也和我一樣，是為羅馬紹夫的案子被傳吧？”

“不錯。”

他沉默了片刻。啊，我是多么熟悉他的這種沉默，我從小就多么痛恨他這種虛偽的，煞有介事的沉默！

“他不是人，是禍害精，”他終於說道。“我覺得應該，而且應該儘快地把這種人從社會上清除掉。”

假如我是一個藝術家的話，我這時一定要尽情地欣賞一下這個老牌偽善者的這番傑作。但是我是一個普通的人，我只是想對他說，如果及時把尼古拉·安東內奇從社會上除掉的話，那麼它（就是社會）也就不致於花費力量來管羅馬紹夫的事了。

我忍住沒有作聲。

關於“聖·瑪麗亞”號探險隊的事情一句話也沒有談。不過我對尼古拉·安東內奇是很了解的，他剛才之所以向我走過來，那是因為他畏懼我。

“我所說，”他謹慎地揭開話題，“您已經完成了自己所開始的事業，您為這件事業付出了許多勞動，我願意衷心地向您表示感激。同時，我還準備公開地這樣作一下。”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他要來聽我的報告，作出一付似乎我們一向是好朋友姿態。他向我求和，這實在太妙了！應該裝作我接受他求和的建議才行。

“不錯，好象完成了那麼一點。”

我再就一句話沒有多說。可是，他竟然那樣地興奮，在他那丰满多肉，沒有血色的臉上甚而泛起了一抹淡淡的紅暈。一切

事情都过去了，被人忘记了，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位权威人士，我怎么会不去跟他搞好关系呢？！我大约也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吧！说实在的，生活不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吗？我变成一个象他那样的人，我有勋章，凡事顺利，所以他可能是根据自己，根据自己的成功之路在推断我。

“……要是换个别的时候，这还不是一件哄动世界的大事吗，”他继续说道，“以舍弟的功绩而论，他是不愧称为民族英雄的，他的遗体也将隆重地运到京城，在川流不绝的人流瞻仰下殓葬。”

我回答说，塔塔林诺夫船长的遗体已经在叶尼塞湾的海滨安葬，而且他本人恐怕也不会希望给自己找到比这更好的墓地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说他命运的乖舛。他总是被人遗忘，假如不是我们（他居然好意思说‘我们’），恐怕地球上不会有人知道他是谁，知道他为祖国和科学都作了些什么贡献。”

这话说得未免太放肆了，我差点没对他说出最难堪的话来。可是这当儿，房门开了，从审查员那儿出来一位姑娘，请我到她那儿去。

我一直这样想，如果这位审查员，或者说这位女审查员（因为这次是一位妇女）不是那么年轻，不是那么漂亮的话，她一定不会这样特别做作地严格审讯我。不过，后来我的故事吸引了她，所以她就完全放弃了她的那种官腔了。

“格利高里耶夫同志，”我向她报告了自己的年龄、职业、曾否犯过法等问题之后，她开口说道。“您知道我传讯您是为了什

么嗎？”

我回答說，知道。

“您过去曾經有过一次口供，”显然，她指的是在恩城审讯的那一次。“其中有些不很明确的地方，所以我必須首先和您談談。”

我說：

“願意效勞。”

“譬如說……”

她念了几段。这是我把在义犬广场和羅馬紹夫的談話逐字照述的。

“照这样看来，在羅馬紹夫发表这篇声明攻击您的时候，他似乎只是另外一个人手中利用的工具。”

“这另外的一个人已經說过了，”我說道。“他就是在您的会客室里等候您的尼古拉·安东內奇·塔塔林諾夫。至于他們两个人誰是工具，誰是利用这工具的手的問題我却沒法說。不过，我覺得解决这样的問題不是我的，而是您的任务。”

可能是因为她把羅馬紹夫的誣告竟然恭敬地說成什么声明，所以惹得我这时的火气那么大。

“因而这里面有一个不很明确的問題：塔塔林諾夫教授力图破坏搜索队的目的何在？他自己不就是一位研究北极的学者嗎？寻找他失踪的堂弟的工作看来應該得到他最热烈的同情才对。”

我回答說，塔塔林諾夫教授的目的可能有好几个。首先，他害怕找到“圣·瑪丽亚”号探险队的遺迹会进一步証明我所控告的是事实。其次，他根本不是什么研究北极的学者，而是一个以几本有关“圣·瑪丽亚”号探险队的書起家的典型的伪学者。因

此，任何竞争也就自然而然地触及他的切身利益。

“您过去是否掌握有切实可靠的根据，认为搜索工作能够证实您控告的正确呢？”

我回答说有。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根本不需要讨论了，因为我已经找到了探险队的遗物，而且，其中有一些是我打算要当众宣读的直接证据。

就在这个答话之后，我的这位女审查员才很快地放弃了她那种官腔。

“怎么找到了？”她流露出一种真诚的惊讶，问道。“这是很早以前的事呀。二十几年了吧？”

“二十九年。”

“那么，隔了二十九年还会留下些什么东西呢？”

“很多东西，”我回答道。

“连船长也找到了吗？”

“是的。”

“他还活着？”

“噢，您是怎么啦，当然不会罗！不过可以说出他是在什么时候牺牲的……他是在一九一五年六月十八至二十二日之间。”

“呃，您详细讲讲吧。”

当然，我一下子不可能把所有的事都对她讲一遍。不过，就这样，塔塔林诺夫教授为了等候接见也等得够久了，在他来到这位美貌而好问的女人桌旁，坐上我刚才坐过的位子之前，恐怕已经想了许多事，独自和自己说了许多话了。

我把那些使他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事，以及那些因为犯罪的时间已经过去很久，而可以免去法律制裁的事都对她讲了。这是过去的事情了！不过，过去的事往往比起乍一看来所认为

的那樣要存在得久遠得多。

她傾听着，雖然她和剛才一樣還是一位審查員，但是這位審查員現在是和我一起在辨認那些被春潮漂到院子里來的信件，和我一起將北極旅行中的見聞作成劄記，和我一起把教員、醫生、黨的工作幹部運送到偏僻的涅涅茨區。克里莫夫航海長的日記已經讀完了，那支老銅矛鈎也找着了（在一系列証物的調諧的構圖中，我當時還以為這支銅矛就是最後的一根綫索哩）。接着，我又講到戰爭期間，這時我住嘴了。我們親身經歷的往事完全展現在我的眼前，在這幅圖景的深處，微微閃爍着那終身激動着我的思想。要向一個陌生人把這些事情解釋清楚是很困難的。不過，我終究還是說清楚了。

“塔塔林諾夫船長深深理解到北方海路對於俄國的全部意義，”我說道，“所以，德寇竭力要截斷這條航路也是不無道理的。在我飛到‘聖·瑪麗亞’號探險隊罹難的地方去的時候，我是一個戰爭中的人；後來我又找到了這支探險隊，也因為我是個戰爭中的人。”

8 報 告

這次我並沒有去爭取到地理學會作報告的榮譽，可也沒有接到要將報告用書面形式送呈的殷勤的邀請。因為關於“聖·瑪麗亞”號的科學遺產問題，符教授已經發表了一篇極為出色的論文，而這篇文章剛發表了還沒有一個月，因此我一再謝絕作什麼演講報告。可是他親自給我掛來電話，因此我終於同意了。

……大家都來聽我的報告，甚至琪拉的媽媽也來了。她碰

見我時，引經據典地對我說了几句短短的祝賀話，可惜我沒有記住。祝賀話說得稍嫌長了一些，我看到瓦里亞听她說時的那付順從的，莫可奈何的神情，不禁暗自覺得好笑。

我把柯拉布略夫請到第一排正對講壇的地方坐下，因為我已經習慣了在講話的時候瞅着他的動作。

“喂，薩尼亞，”他高高兴兴地說道，“這樣吧，我們約好。我把手這樣放在桌上，手心向下，那你就放心地講下去。同時要時時看着我的手！如果我用手輕輕拍桌子，那就是說你太激動了。如果不動，就是沒有激動。”

“伊萬·巴甫雷奇，親愛的！”

總的說來，雖然這一次相當可怕，但是，顯然我是一點也沒有激動。我所耽心的只是不知道尼古拉·安東內奇究竟會不會來听我的報告。

他來了。當我正在懸挂地圖的時候，我轉身一看，瞧見他坐在第一排距柯拉布略夫不遠的地方。他蹣跚着腿坐着，帶着一種木然的神情筆直地望着前面。我下意識地感到他在这幾天里有了一些變化：他的臉上顯露出一種落水狗的神情，腮上的皮肉也松弛地垂下來了，衣領上面高高地露出一截滿布着皺紋的瘦長的脖子。

主席是一位著名的老地理工作者。他在請我發言之前，首先將我簡略地介紹了一番，我對他這樣作法當然是高興的，我甚至還有點抱怨他的聲音太低了一些。他說，我是“和布尔什維克征服北極的历史有着密切关系的一个人”。後來，他又說蘇維埃北極科學應該在最有意义的篇幅中辟出一頁，來紀錄我的“天才的頑強的勞動”；我當然也沒有反對他這樣說。同時，因為大廳里這時充滿了掌聲，其中拍得最響的就是琪拉的媽媽，所以也

沒法子反駁。

虽然关于北方海路的历史部份很有趣味，不过这次似乎还是不该把这个题目講得那么多。

我講得相当不好，常常停頓住，把一些最普通的字眼都忘掉了。总而言之，就象琪拉的媽媽后来所談的那樣，我是“瞢头”了。

我的发言轉到我們現在这个时期来了。我概括地描繪了一下北方問題的軍事意义，講到伟大的斯大林奠定北方艦队基础的那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就在这当兒，我的卡佳在很远的地方，在过道阴暗的尽头閃現了一下便不見了。她有些不舒服（感冒了），所以答应我留在家裡。不过她現在既然来了也是很好的，簡直可說是好极了！我心头頓時感到特別輕快，所以我的談話也就更有把握，更明确了。

“諸位也許会感到奇怪，”我說道，“在战争期間，我却打算向大家彙报一个已經完結了將近三十年的老探险队的故事。这的确是一件历史。但是我們並沒有忘掉我們的历史，我們的根本力量，很可能也正是在于战争不可能改变和中止那些使我們國家的面貌为之煥然一新的伟大思想。苏联人民开拓北方的思想就是这种伟大思想之一。”

我打了一个頓，我本来很想談談我和列德可夫參觀北地城的情况，不过因为这事和报告的本題距离太远，所以我又勉强把話題拉回塔塔林諾夫的历史上。

我談到他的时候心情真是玄妙极了！仿佛我就是那出生在亞速海畔一个貧苦漁家的小孩，而不是他。仿佛我从小就在运油船上当水手，行駛于巴土姆和新俄罗斯城之間，而不是他。仿佛是我胜利地通过了“海軍准尉的考試”，之后便在水道測量局

工作,是我掌握着既要有骨气,又要宽仁为怀的原则来对待军官们那种目空一切的态度,而不是他。仿佛在南生书中加批注的人也是我,而不是他。“让冰原去解答这个问题吧”这一杰出的思想也是我的手写成的。仿佛他的一生不是以失败和杳无音讯的死亡告终的,而是以胜利和幸福结束的。虽然现在的生活中也有朋友、有仇人、有爱人,但是生活本身已经变了样,获得胜利的不是仇人,而是朋友和爱人。

我越讲便越强烈地体验到一种感情,除了用亢奋的感情来形容它之外,我没法用别的话来称呼它。仿佛是在辽远的银幕上,我看见开阔的晴空下有一艘没有生命的帆船被积雪封盖着。是真的没有生命了吗?不,人们还在敲啊捶啊,忙个不停,忙着用木板封闭有亮光的舱口,用柏油纸和毛氈将顶棚遮好,准备着过冬……

当卡佳走向她的座位去时,站在过道上的海员们都往两边闪开。我心里暗想,他们尊敬地给塔塔林诺夫船长的女儿让路,这一举动是很公允的。同时她显得比所有的人都要美好,特别是她穿上这件朴素的英吉利服的时候。她比所有的人都要美好,在不知不觉中,她也卷入了我在叙述“圣·玛丽亚”号的航行情况时那种狂欢,那种兴奋的情绪中了。

这时,应该讲漂流的科学史实了。我首先肯定,塔塔林诺夫船长探险队所确定的事实,直到现在也没有失去它的价值。所以著名的北极科学家符教授研究这次漂流结果,才断定在第七十八至第八十平行圈之间,有一座无人知晓的岛屿存在。到一九三五年,这个岛屿终于被发现了,而且正是在符教授计算的地方。塔塔林诺夫船长这次旅行证实了:南生所得出的恒漂流路线,计算冰和风的相对运动的公式,给俄国科学带来了一个巨大的贡献。

当我講到怎样洗印探险队在地下埋了几近三十年的胶片的情形时，講堂里的听众都显出一种津津有味的姿态。

灯灭了，銀幕上映現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他戴着毛茸茸的帽子，靴統用皮带拉在膝盖下面，他倚着猎枪站在那里，执拗地低着头。一头死了的黑熊象小猫似的蜷縮着脚爪，躺在他的脚边。这是一个坚强的，大无畏的神人，是一个很少个人打算的人。現在，他仿佛就要大踏步地迈进我們的大厅中来了！

当他出現在銀幕上的时候，大家都站了起来。大厅里鴉雀无声，充滿着一种肃穆的靜寂，不用說是講話，甚至誰也不敢大声出一口气。

在肃穆的寂靜气氛中，我宣讀了船长的报告和訣別信：

“‘……其实，只要他不妨碍我，即使不来“帮助”我，那我也能完成許多工作。想起这些事来，不禁感到万分痛心。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唯一能引以自慰的，是我以自己的劳动为俄罗斯开拓和增添了一块辽阔的，新的土地……’”

“不过，在这封信里，”等大家坐好后，我繼續講道，“我想請大家还注意一个地方。那就是：‘我知道誰会来帮助你們，不过在我生命即将消逝的最后一刻，我不願意說出这个人来。我无法将这些年来郁积在心中的一切，毫不掩飾地向他傾吐。他就是那一向束縛着我的手脚的势力的化身……’船长在临死前不願指出名字来的人究竟是誰呢？关于这个人，他在另外一封信中是这样写的：‘可以大胆这样說，我們的一切失敗都应归咎于他’。关于他，船长曾經这样写过：‘我們这次去冒险，知道一定会遇到危险，但是我們並沒有料到会有这样的打击’。他曾經写过：‘最倒楣的就是我錯把探险队的給养装备工作委托了尼古拉，現在不得不每小时，每分鐘为此付出极大的代

价……’”

尼古拉！世界上名叫尼古拉的人多得很呀！

不錯，世界上名字是尼古拉的人很多，甚至就在这間講堂內也有很多。可是，当我說出这个名字时，只有一个人驟然把身板一直，东张西望，撐着的手杖也落到了地上。旁边的人撿起手杖还給了他。

“我今天要把他的全名講出来，并不是想要借此解决我和这个人之間存在多年的爭执。我們的爭吵早已經解决，为生活本身所解决了。但是，他在自己写的文章中，竟然繼續在強調，說自己一向就是塔塔林諾夫船长的恩人，并且象他自己所写的那样，甚至‘踏着諾登塞尔特的足迹前进’这个思想都是他想出来的似的。他非常自信，甚至还敢来听我的报告，这个人現在就在这間大厅里。”

听众中間传出一陣驚訝的私語声，然后靜了一会兒，过了不大功夫，又响起一陣乱哄哄的声音。主席搖了搖鈴。

“命运真是奇怪呀！在这以前，他的名字、父名、姓氏的确一次都沒有連在一起提到过，可是我們在船长的訣別信中找到几份文件。这里有一份債務書的付本。上面規定：一，回到大陆后，全部营利归尼古拉·安东內奇·塔塔林諾夫（名字，父名，姓氏俱全）；二，船长預先表示态度，不接受任何奖賞；三，如果船只損毀，船长应以全部家財偿付尼古拉·安东內奇·塔塔林諾夫（名字，父名，姓氏俱全）；四，船只和保險費归尼古拉·安东內奇·塔塔林諾夫（名字，父名，姓氏俱全）所有。这个人曾經对我說過，說他只承認一个証人：那就是船长本人。希望他現在能当着我們大家面前收回自己這句話，因为現在船长^①指出了他——把他的名字、父名和姓氏都指出来了！”

我刚一講完話，大厅里掀起一陣可怕的騷动。前排許多人站了起来，后面的人就大声喊叫，要前面的人坐下，因为后面看不見。他則举起手杖，口里嚷着：

“我請求发言，我請求发言！”

他被准許发言了，可是大家不讓他开口講話。我一生从来没有听見過象他刚要张口說話时那样可怕的鼓噪声。不过他还是說了一些話（誰也沒听清楚），然后便沉重地敲着手杖，离开講坛，順着大厅边上走出去了。他現在是在高度的空虛里；在他所走过的地方，許久都还空着，大家仿佛都不願意迈进他拄着手杖，刚刚走过的地方。

9 最后一章

这节車厢是开到恩斯克去的。車厢里异常拥挤，光綫又很暗，地板上，架子上，到处都是人，这些人自然也是去恩斯克的。要是在过去，这节車里的人足足可以使县城的人口增加一倍。

我們和邻座的旅客，或者說得更正确一些，是和邻座的女客互相認識了。她們是莫斯科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她們說是去恩斯克工作的。

“干什么工作呢？”

“还不太清楚。到矿井工作。”

如果除开彼其加在教堂公园里所說的那条河床下的，里面到处是骷髏的坑道不算的話，那么，恩斯克从来还没有过什么类

① 俄文中船长和大尉同为 капитан，因为薩尼亚的軍銜是大尉，此处有双关意义。——譯者注。

似矿井的东西了。可是，这些姑娘却肯定說她們是去矿井的。

每个包厢經過三、四个鐘头之后，总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和旁边包厢不同风格的生活。仿佛那橫隔在包厢間的一道道薄薄的半截板壁所分割的不是車厢，而是人們的感情和思想。有的包厢里吵吵鬧鬧，兴高采烈，而另外一些包厢里却是冷冷清清。我們的包厢里充滿了欢乐的气氛。姑娘們虽然因为自己沒能留在莫斯科进行暑期实习，可是她們的懊丧情緒並沒有持續多久。她們把一个在这个問題上遂了心願的叫瑪莎的姑娘奚落了一通之后，便尽情地唱起歌来了。我和卡佳整个晚上都在欣賞这些新鮮的，战争期間流行起来的抒情歌曲，其中有几首很有意思。总的說来，姑娘們一直唱到恩斯克才停止，甚至夜間也唱（不知她們为什么会决定不睡觉）。这次不算十分长的路程（三十四小时）在姑娘們的歌声里，在时而欢乐，时而哀伤的青春歌声催眠下昏昏沉沉地过去了。

火車从前是在黎明时分到站，而現在却是在傍晚，所以当我們下車时，这座小車站在暮色蒼茫中使我感到分外可爱，給人一种古老情調的，舒适的感觉。在車站建筑物前是一块滿栽着菩提树的寬闊的入口广场，旧日的恩斯克也就在广场边上終止了。我們走到林蔭路上，便看到远处有着一排排黑压压的房子，屋頂上迅速地飘过一团团被下面射来的光綫照耀得通紅的烟云。在恩斯克看見这样的景色是十分令人惊异的，我甚至对姑娘們解釋說，这大約是河对面某个地方失火了。因为我一路上吹嘘了很久，說自己是恩斯克土生土长的，这兒的每一块石头我都熟悉，所以她們也就真地相信是失火了。可是，結果却并不是火灾，而是恩斯克在战争期間建成的火炮工厂。

我虽然也看到我国的許多城市（譬如牟城）在战争期間发生

了多么惊人的变化，不过，我童年的时候并不熟悉这些城市。而现在，当我和卡佳走在城墙根大街，果戈理大街上时，暮靄疾剧地浓厚了。我觉得过去这些沿着碉堡围墙懒洋洋地伸展开去的街道也仿佛是在急促地奔跑，准备卷进繚繞在厂房上空那永无休止的，噴吐着烟火的云团的运动中去。我們眼前看到的是一座武装良好的金城湯池；这虽然是我們的第一个印象，但却是一个真实的印象。对于我説来，它自然仍旧是从前那个象亲人般可爱的恩斯克，不过現在我又見到它时，就好象是会見了老朋友。当你仔細地注視着这张熟悉的，有了变化的脸孔时，由于心中那千万种柔情和激动使你不自覺地要发笑，不知道該从哪兒談起的好。

我們在北极城就写信告訴彼加，說我們要来看望老人，所以他也在筹画把早已批准的休假期凑到这个時間来。

虽然我从莫斯科发了电报来，可是并沒有人来車站接我們，所以我們断定彼加沒有回来。但是当我們走出車站，在站前廣場旁馬尔庫茲宮前那儿座气势汹汹的獅象間，我們碰見的第一个人就是彼加。他从前是一个恍恍惚惚，喜欢凝思冥想的人，脸上总挂着疑問的神情。尽管他現在晒黑了，变成了雄赳赳的軍官，可是我仍然一眼便認出是他。

“哦哈，原来他們在这兒！”就象他已經找了很久，現在終於找到了似的。

我們互相拥抱，他然后走到卡佳跟前，把她的手握在自己手中。他們之間有着在列宁格勒共患难的遭遇，虽然在世界上我可說是他們最亲近的人了，可是，当他們彼此捏着手站在那里的时候，甚至我和他們之間的距离似乎也很远。

我們撞进达莎阿姨的房間时，她已經睡覺了。她用肘撐着，

斜着身坐起来，沉思地瞅了我們許久，她大概还以为自己是在梦中看見了我們。我們失声笑了出来，她这才恍然醒悟了。

“上帝呀，是薩尼其卡！”她喊道。“卡佳也来了！可是他自己却出去了！”

“他自己”是指法官，“又出去了”的意思是說我和卡佳五年前回恩斯克时，他也是出发到区里某个地方去参加巡迴法庭了。

达莎阿姨忙碌着安置我們。因为餡兒餅用的是黑面，而且又是用进口油煎成的，所以她心里总觉得不安。所有这些都是瑣事，不值得多說。最后，我們只好用强力把她劝止住坐下来，讓卡佳去張罗家务事，我和彼加来帮助她。彼加象他自己所說那样，为了使餡兒“味道鮮美”，往餡里撒了些精料，而我又把去污粉当成了食盐，差点沒有放进餡里去，急得达莎阿姨在旁直叫。然而，說也奇怪，餡兒的味道竟很好，达莎阿姨放了一小块到口里尝尝，虽然她說“佐料”少了一点，不过，在战時說来，餡兒餅能作成这样也就不錯了。

午飯的时候，达莎阿姨一定要我从五年前，我們在恩城車站和她分別的那一天，那个时刻之后的全部經過，絲毫不漏地講給她听。不过我說服了她，等法官回来后再作这样的总结。然而，我們却趁这时讓彼加把他的情形講了一番。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听着他講。为什么怀着激动的心情呢？因为我認識他已經二十五年多了，現在的他給我的感觉并不是象卡佳所描写的那样变成了完全另外一个人。至于我一向認為使彼加与众不同的，那种對我說来是神秘的“艺术家的作风”，現在变得更为定型，更为明确了。

他拿出自己的画册給我們看。彼加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沒有在部队，而是在前綫剧团里担任美术师。画册中都是些关于战斗

生活的写生画，大多是草草仓促画成的。但是那种为我们部队每个成员，哪怕是只呆过几天的人所熟知的精神力量，却在这些速写中表现得极其深刻。

我往往留恋战争时期那些令人难忘的画面，它们一个接一个地相互更替，不留一丝痕迹，我本能地为此深感惋惜。现在，在这些虽说是轻描淡写的，但意境深长，甚而可以说是天才的表现手法中，我又看见它们了。

“罗，就是这样呀，”当我向他祝贺时，彼加善良地微笑着说道，“法官说画得不好。英雄主义表现不够。我的儿子现在也爱绘画，”他又添了这样一句，象他平时在感到满意的时候那样，嘟着下嘴唇。“不错，他似乎也还有点才能。”

卡佳从箱子里取出尼娜·卡比丹诺芙娜的信。她现在还带着小彼加住在新西伯利亚。达莎阿姨一向就很关心姥姥，所以她定要别人读几封信给她听。

姥姥还和过去一样不在营里，单独住着，尽管别雷什金院长亲自来向她道歉，请她回到营里去。可是姥姥就象她自己在信中所说的那样，从小就不会对人低三下四，所以她仍然谢绝了他的请求。在她拒绝院长的请求之后，使全区的人大吃一惊的，是她突然参加了当地文化宫的群众性文化工作。

“我在学裁缝，”她信上简略地说道，“祝贺你和萨尼亚。我从他小的时候就了解他，还作过荞麦饭给他吃，希望他能长高点。他是个可爱的人……你可不要欺负他，你的性情不怎么好。”

这是我们告诉她，说我们已经找着之后，她给卡佳的回信。

“我一夜都没有睡着，”在她听说探险队的遗迹已经找到之后，在信中写道，“我老是在想可怜的玛莎。我心想，她不知道

你父亲的悲惨的命运这倒也好。”

小彼加身体十分健壮，从相片上看来，他已经长得很高了，并且越长越象他的母亲。我们回忆起萨尼亚，大家静默了很久，仿佛我们又怀着哀悼的心情站在麻木不仁的死神面前。

卡佳打从春天便着手为姥姥和小彼加设法搞一张去莫斯科的通行证，她满心希望在我们回去的时候能见到她们。

在这天晚上，我的，或者说是卡佳的一个宿愿——全家住到列宁格勒去的想法，不断地在脑海里重复。带着全家——带着姥姥和大小两个彼加一起。在我们的想象中，未来的住宅已经找到了，而且不是在别的地方，就在基洛夫大街上。我们在未来的住宅里选了一间较僻静的屋子给大彼加作绘图室，免得别人妨碍他。其实，他倒是很欢迎一位给卡佳的印象很好的女人偶尔去“妨碍妨碍”他。不过这天晚上，大家自然心照不宣，一句话都没有谈到她……

法官回来的时候，全屋子里的人都还在睡觉。达莎阿姨本来想叫醒我们，可是引起他大发脾气，所以我们只好装着没有醒，又继续躺了半个钟头。和五年前完全一样，他在厨房里又是喷鼻子，又是呼哧呼哧地搞了好半晌（他在洗澡）。然后，又传来他在过道中走路，和水珠从他身上滴下来的沉重的声音。

卡佳又入睡了。我悄悄地穿好衣服，走进厨房。他赤着脚，穿一件干净的衬衣，刚洗过的头发和胡鬚还是湿淋淋的，坐在那里喝茶。

“到底还是把你吵醒了！”他迎面走过来，紧紧地把我抱住。

不论什么时候，我只要回到故乡，回到我生长的家中，“喂，讲讲吧”这个严峻的命令总是在等待着我。老头很知道，在我们离别后的几年里我都作了些什么，我的生活是否正当。他的眉

毛很浓密，和又粗又长的头发联接着，他就象真正的法官那样，严厉地盯着我，审问我。而我也知道，在世界上没有比从他口中能听到更为公允的判决……不过这一回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法官并没有要求我作彙报。

“全明白啦，”他带着满意的神情用手抹抹上唇，眼睛盯住我的勋章。“四顆嗎？”

“是的。”

“还有第五顆，为了塔塔林諾夫船长，”法官严肃地说道。“要把这件事情說清楚有些困难，不过你会領到的。”

要把这件事情說清楚有些困难。但是老人显然办得很認真，所以当傍晚我們重新围聚在桌边时，他講了一篇話，企图把我所作的事情作一个总结。

“生活在前进，”他說道。“轉瞬間，你們已經是成熟的，有所作为的人回到故乡，你們說家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簡直不認識它了。的确，它不仅变了，而且成熟了，就象你們一样，为了斗争和胜利放出了內在的力量。亲爱的薩尼亚，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脑子里还产生了另外一些想法。你已經找到塔塔林諾夫船长的探险队，理想實現了，那些在想象中似乎是幼稚的神話的事都成为現實了。他在訣別信中不正是向你，向那能够繼承他的伟大事业的人求助嗎。他所指的就是你，我認為你可以当之无愧地和他并坐，因为人类和科学就是被象他和你这样的船长和大尉推动着前进的。”

他举起酒杯，为我的健康一口将酒飲尽。

我們一直坐到深夜。后来达莎阿姨宣布該去睡覺了，可是我們都不同意，便跑到沙河边去散步。

噴吐着烟火的云团依然一个接一个地在工厂上空急促地奔

馳。我們走到河边，走到当年一个穿大棉褲的黑瘦的男孩用烂肉釣青虾的大缺口。時間仿佛停滯在河岸上，停滯在沙河与靜河汇流处的两个古老的炮楼間，耐心地在等待着我；現在我又回到这兒，我們面面相覷地瞧着。可是前面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呢？是新的考驗，新的劳动，新的幻想。是幸福还是灾祸？誰能知道呵……但是在这次众目睽睽的注視下，我並沒有低下自己的眼光。

應該回去了。卡佳开始感到发冷。于是，我們沿着堆滿了木材的河岸走了一段路后，便折回家里去了。

城里靜悄悄的，充滿了一种神秘的气氛。我們互相偎抱着，默默地走了很久。我回忆起从恩斯克出走的情形。那一次城里也是这样阴森森，靜悄悄的。我們的年齡还很小，有着不幸的遭遇，但都很勇敢，而未来却是可怕的，不可知的生活……

我的眼睛潤湿了，可是我并沒擦去这欢乐的眼泪，也不因自己流泪而羞愧。

尾 声

在一座巍峨险峻的峭壁下，从石缝中挣扎着长出了许多北极野生的罌粟花，由这儿前眺，眼前展开了一幅瑰丽的画景。岸边虽还是明镜般浩瀚的海水，而远处却是满目冰穴，和伸入到神秘的远方去的淡紫色的冰原。北极的空气在这儿也显得异乎寻常的明净。多么寂静，多么开阔。在这孤零零的坟墓上空，只有苍鹰偶尔打从这里飞过。

浮冰互撞着，打着旋儿，由墓旁漂过；有的冰块漂得快，有的漂得慢。

这象是一颗戴着闪闪放光的银盔的巨人头颅漂过去了，他的面目很清楚——乱蓬蓬的发绿的胡子对着大海，鼻子扁扁的，一双眼睛在花白的箭眉下微微地眯缝着。

一座冰屋漂近了，海水象无数的小铃铛清脆地响着由房屋上淌下来。这象是一些铺着洁净桌布的节日的大餐桌。

海水无边，漂流不断！

几艘驶进叶尼塞湾来的舰船从老远的地方发现了这座孤坟。舰船降半旗从墓旁缓缓地驶过，发出了致哀的礼炮，迴音萦绕在空中经久不绝。

坟墓是用一色的白色大理石筑成的，在北极不落的太阳的霞光中放射出夺目的光辉。在齐人高的地方镌刻着墓铭：

“伊·李·塔塔林诺夫船长遗体安葬于此。船长生前曾经完成了一次极其英勇的航行，一九一五年七月发现北地岛后，于归国途中不幸牺牲。”

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 □□□□□ □□□□

S S □ = 1 0 4 9 7 2 6 1

□□ = 8 5 6

□□ = [http://book4.5read.com/300-36/
diskaae/aae97/08](http://book4.5read.com/300-36/diskaae/aae97/08)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2 □ □
3 □ □
4 □ □
5 □ □ · □ □ □ □ □ □ □ □ □
6 □ □ □ □ □ □ □ □ □ □
7 □ □
8 □ □ □ · □ □ □ □ □ □ □
9 □ □ □ □ □ □ □ □ □ □ □ □ □ □ □ □ □
1 0 □ □ □ □
1 1 □ □ □ □ □ □
1 2 □ □ □ · □ □ □ □ □
1 3 □ □
1 4 □ □ □ □ □ □ □ □ □ □ □ □
1 5 □ □ □ □ □ □ □ □ □ □ □ □ □ □
1 6 □ □ □ □ □
1 7 □ □ □
1 8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2 □ □
3 □ □ □ □ □ □ □
4 □ □ □ □ □ □ □ □ □ □
5 □ □ □ □ □ □ □
6 □ □ □
7 □ □ □ □ □ □ □
8 □ □ □ □
9 □ □ □ □ □ □ □ □ □ □ □ □ □
1 0 " □ □ □ □ "
1 1 □ □
1 2 □ □ □ □ □
1 3 □ □ □
1 4 □ □ □ □ □ □ □ □ □ □

□ □ □

□ □
1 □ □ □
2 □ □ □ □ · □ ? □ □ □ □
3 □ □ □ □
4 □ □

5 □ □ □ □ □
6 □ □ □ □ □
7 □ □ □ □ □ □ □ □ □ □ □ □ □ □ □
8 □ □
9 □ □ □ □ □ □ □
1 0 □ □ □ □ □
1 1 □ □ □ □ □
1 2 □ □ □ □
1 3 □ □
1 4 □ □ □ □ □ □ □ □ □ □ □ □ □ □
1 5 □ □ □ □ □ □ □ □ □ □ □ □ □ □ □ □
1 6 □ □ □ □ □ □ □ □ □ □
1 7 □ □ □
1 8 □ □ □ □
1 9 □ □ □
2 0 □ □ □ □ □ □ □ □ □ □ □
2 1 □ □ □ . □ □ □ □ □ □
2 2 □ □
2 3 □ □ □ □ □ □ □ □
2 4 □ □
2 5 □ □ □ □ □ □

□ □ □

□ □
1 □ □ □ □
2 □ □ □ □ □ □
3 □ □ □ . □ □ □ □ □ □ □ □
4 □ □ □ □
5 □ □
6 □ □ □ □ □
7 □ □ □
8 □ □ □ □
9 " □ □ □ □ □ □□ "
1 0 □ □ !
1 1 □ □
1 2 □ □ □
1 3 □ □ □ □ □ □
1 4 □ □ □ □ □
1 5 □ □ □

□ □ □

□ □ □ □
1 □ □ □ □
2 □ □ □ □ □ □ □ □ □
3 □ □
4 □ □ □ □
5 □ □ □ □
6 □ □ □ □ □ □

7 □ □ □ □ □ □ □
8 □ □ □ □
9 □ □ □ □ □
1 0 □ □ □ □ □ . □ □ □ □ □ □
1 1 □ □ □ □ □
1 2 □ □ □ □

□ □ □ □ □ □
1 " □ □ □ □ □ "
2 □ □ □ □ □
3 □ □ □ □ □ □ □ □
4 □ □ □ □ □ □ □ □
5 □ □ □ □ □ " □ . □ □ □ " □
6 □ □ □ □
7 □ □
8 □ □ □ □
9 □ □

1 0 □
1 1 □ □
1 2 □ □
1 3 □ □ □
1 4 □ □ □ □ □
1 5 □ □ □ □
1 6 " □ □ □ □ □ □ □ □ □ □ "

□ □ □ □ □ □
1 □ □
2 □ □ □ □ □ □
3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5 □ □
6 □ □ □ □ □ □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 □ □ □ □ □ □
9 □ □

1 0 □ □ □ □ □
1 1 □ □ □ □ □ □ □
1 2 □ □ □
1 3 □ □
1 4 □ □
1 5 □ □ □ □ □ □ □ □
1 6 □ □ □ □ □ □ □ □ !

□ □ □ □ □ □
1 □
2 □
3 □ □ □ □ □

4

"

"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

"

20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9